

被綁的
普羅米修斯

陳獨秀傳

王觀泉 著

观泉自述

一九三二年生于上海，因家贫自小便当学徒、跑码头，尝够生活的艰辛。但在疲累的岁月里，我仍然欣赏Apollo的壮美，祈求Athena的智慧，打棒球，踢足球，研习音乐，雅好集邮，并爱看闲书；然则“一卷在手欣然而忘食”之说，在我，乃物欲无法满足时的阿Q式的叹息，心仪仍在米饭和咸菜……

一九四九年，我踏上革命道路，一九五八年去北大荒劳动。在牛棚和五七干校熬过十年浩劫之后，我进入文学研究领域，先后出版过几部文学史论专著，并因而获得研究员的资薪而摆脱了窘迫的以往。我的生活原则是：不服输，不吃后悔药。对自己的要求是：力保时代的清醒——尽管研究的是过去，却执着于今天。



被綁的
普羅米修斯

陳獨秀傳

王觀泉 著

被绑的普罗米修斯——
陈福秀传

蘇國香



歌词

普罗米修斯是人类哲学日历
上最高尚的圣者英雄逆考

摘自马克思《博士论文》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振风塔下的叛逆	9
一八七九—一八九七	
从“辩诉状”谈起	9
战乱中的没落世家	11
“龙性岂能驯！”	16
振风塔的比喻	19
政治风云中的私生活	31
第二章 投身现代革命	43
一八九八—一九一九	
第一部军事著作	43
四次留日,初露革命锋芒	46
从结党谋反到舆论革命	61
南陈北李议论爱国心	81
《新青年》燃起不灭的火种	84
北大教授,《新青年》北迁	94
五四运动,一个时代的开端	101
监狱中升起思想界明星	107

第三章	创建工人政党	115
	一九二〇—一九二七	
	南北对峙, 中国共产党成立	115
	召开一大, 南陈北李皆未参加	143
	在矛盾中调整民主革命策略	159
	从西湖会议到国民党一大	172
	与共产国际的风风雨雨	191
	不祥之兆的一九二五年	199
	陈独秀要五千条枪, 不给!	204
	国共分裂, 李大钊惨遭绞杀	214
	共产国际难解国民党情结	230
第四章	笃信托洛茨基	249
	一九二八—一九四二	
	左右撞击, 别谋革命途径	249
	三个同龄人走两条革命之路	259
	“不断革命论”的教训	273
	组织托派, 普罗米修斯被绑	279
	潜心学问, 监狱成研究室	304
	带着被绑的耻辱走出牢门	314
	终于没有走下高加索	323
	后记	349

序

命运的历史安排

流逝的岁月，被记录下来，就是历史；岁月，有时会设下奇巧到令历史学家都难以置信的如烟往事（顺便说一句，这也是造成宿命观念的历史偶然性因素），一八七九年，就是发生奇巧的年份……

一八七九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在中国在俄国相继出生了三个男婴，待到他们步入而立之年的本世纪初，按照这两个国家当时的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及各人的家庭状况和个人教养，相当可能成为官吏、学者或神职人员，各自体面地度过舒适安宁的一生，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不必费我们的笔墨了。然而这三个男子汉都背弃了门第和长辈的期望，摆脱了“世纪末”颓废主义的感伤和愤世嫉俗的烦躁，不期而同地服膺“共产主义的幽灵”，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领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但是三位风云人物没有因了共同信仰共同事业而成为走在同一条革命道路上的战友，当十月革命使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崭新时期，他们分成严重对立的两派，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跨国性——几乎波及世界各国——的尖锐而又错综复杂的，甚至是极其残酷的斗争，长久不衰，绵延至今……

好，现在我们可以写出这三个人的名姓了——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中国出生了陈独秀，排行“老大”；十一月七日，托洛茨基在俄国呱呱坠地；这一年的圣诞节前五天——十二月二十一日，斯大林出生。笔者每想到这三个人物的如此奇巧的生日安排，竟无端地冒出“既生瑜，何生亮”这个也许可以称之为使伟人遗憾终身的感叹词儿，显然这是迷信或宿命论作祟，不足道的笑谈，写出来乃是为了轻松一下，往后我们将会感觉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三个领袖人物组成的历史，是多么沉重！

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方时差

中国和俄国是如此不同的国度。俄国虽有亚洲腹地大块版图，但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却在欧洲地理版块上，传统上是个欧洲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顽固保守了

数千年封建皇权的大亚洲帝国。当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声嘶力竭地说：“怕不怕洋人逞洋势，恨只恨家鬼害家神”，组织“岳王会”大谈“尽忠报国”之期的一九〇五年，俄国发生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约两千余名手无寸铁的工人的生命酿成的“流血星期日”惊醒了沉睡的俄国。其时，斯大林已经成为列宁的信徒，职业革命家。当时在瑞士的托洛茨基在“流血星期日”的感召下潜回俄国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而且以理论家的身份完成了日后使他一败涂地的“不断革命论”的理论体系。综上所述分明看出，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已经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已经在俄国革命和国际共运中占有一席之地之时，陈独秀甚至还算不上是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这不是人与人之间政治的或文化素质的差异，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渐的历史时间差，不必多久，大约十年光景，当马克思主义从西方向东方渗入，中国就出现了第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当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以更为新潮更为现实的列宁主义的理论及实践经验传播到中国时，陈独秀，以及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张太雷、瞿秋白、张申府、周恩来、蔡和森、毛泽东、张国焘、赵世炎、郑超麟等等已经形成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群体。在俄国，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进入列宁为首的苏俄新生国家领袖群体时，陈独秀已经成为“中国的列宁”，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的共产党，进行震撼世界的大革命。笔者没有任意拔高传主政治形象的意图。人们往往习惯于既定的事实和思维定势，一旦与传统观念相左，就会大惊小怪，“简直不可思议”！实在说来是很简单的，我们是从组织史角度对陈独秀、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予以排比的。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党总书记较斯大林还早一年，斯大林是在一九二二年俄国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选定为总书记的。笔者只是把历史真相从某种不太引人注意的（组织顺序）角度予以披露而已。不是老说国无论大小，党无论大小，以此论理，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已逝的岁月还证明：国与国或党与党之间多一点儿平等多一点儿民主，少一点儿老子党的霸权；领袖与领袖之间少一点儿干涉多一点儿“各自为政”的独立性，也许中国革命会少走些弯路，一代文化巨人暨革命家陈独秀就不至于悲惨到顶着叛徒、汉奸的恶谥凄凉地死于穷乡僻壤。

“中国的普列汉诺夫”

是不是可以认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是在一个时代的缔造者列宁的领导下，施展他们的革命才干。陈独秀不同。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的不同点很多，择其要者论其不同主要在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是参与由前辈革命家普列汉诺夫、列宁构筑的党所展开的俄国革命事业。陈独秀之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他本人就是这项工程的缔造者。

陈独秀从拖着辫子反对传统文化反对神权反对封建帝王制开始,经历从“康党、乱党到共产党”的政治道路,组织了一场彻底改变中国传统的新文化革命运动,又将这场运动推向全社会,引入工农劳苦大众,组成了远程目标是走向无阶级社会的,因此也是最激进的政党,现代中国的一切革命进步和制度更替,皆源出于陈独秀,以及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整整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掀起的巨浪大潮。作为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是继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先河的孙中山先生之后的第一人。陈独秀在从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进期,也即是说在相当于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向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推进时,且不说要大大复杂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革命经历,至少没有一位时代缔造者或先驱成为他的导师。陈独秀和他的中国伙伴们只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后来又在共产国际的支配下)探索着一场超越社会制度正常更替的无产阶级革命——陈独秀们既要承继孙中山的遗愿与国民党合作完成资产阶级旧式民主革命,又要在此基础上违反国民党党旨,强行完成资产阶级新式的民主革命,最后还得把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深入下去,“无间断”地进入社会主义最后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国目的。在这种曲折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中发动如此复杂的又是分几个阶段而且还不得间断的革命岁月里,中国的陈独秀们没有普列汉诺夫等从事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探索者的指引,更没有列宁这样的在普列汉诺夫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中脱颖而出的革命领袖的直接领导。列宁探索了资本主义上升为帝国主义时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且在俄国胜利地予以实践。列宁在从理论到实践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为俄国也为国际共运培养了一批革命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就是其中杰出的两位。把俄国革命说个大概,也就反衬出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肩负的是什么样的重担,关键还在于陈独秀要挑几副担子。抗战胜利前夕,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在筹备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在预备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谈到中国革命历程时提到陈独秀,说:“陈独秀在某几个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①这是个极富哲理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从毛泽东的话中分明悟出,陈独秀确实肩挑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两副重担。陈独秀,还有李大钊,他们既要普列汉诺夫似地把马克思主义传布到本国,把这项来自西方的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从而产生出符合在中国实践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和策略,还得肩负实际的革命斗争重任。李大钊在一九二七年上就惨遭绞杀,陈独秀在二十年(一九一三—一九三二)中被捕五次,这种血腥经历也证明着中国领袖人物的风险

^① 《“七大”工作方针》,转引自《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第1版文本。本章所引毛泽东所言均据此文,不另注。

历程，在国际共运中是相当突出的。

当然，我们只是从陈独秀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共产党和投入社会革命的层面上提出陈独秀肩负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双重任务，不是说陈独秀就是中国的普列汉诺夫或列宁，也不认为他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达到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成就和功勋。我们只是从中国的历史条件下，革命领袖人物应负的责任的角度加以类比的。陈独秀没有普列汉诺夫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贡献，没有列宁领导俄国革命胜利的光荣；他虽是中共领袖，但在国际共运中却没有显赫名声；他著作等身，然而没有充实马克思主义宝库的经典理论传世。上引毛泽东七大预备会上的报告中还指出，陈独秀“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这个褒贬是适度的公允的。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评价被掩埋在镇压托陈取消派的粗暴行动中。是啊，批判的武器永远敌不过武器的批判。陈独秀不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他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这段话引自列宁写于一九〇一年的《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当时显然要求把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为要扩展工运的规模，需要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头脑的领导，列宁把能够解决上述引文中提出的诸多“问题”的人称之为“思想家”，陈独秀运筹他的智慧把握革命发展的进程，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革命思想家，更是具有科学预见的政论家和敢担风险的斗士；在此，我们还可以下一个非理性的判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领袖指挥过千军万马，却至死也是个缺乏政治韬略的直肠性格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在这一个“点”上，陈独秀像托洛茨基而不像斯大林。一九三四年，陈独秀已被中共开除出党五年；已被国民党投入监狱判刑八年，服刑二年有余，左右不是里外皆错。当年的朋友中不少躲之惟恐不及，文化巨匠鲁迅却感情色彩极浓地多次提起这位五四主帅，在一篇回忆曾热情地配合陈独秀发动新文学运动的骁将的散文中写道：“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①玩味鲁迅对陈独秀光明磊落的性格的描述，笔者认为我们的非理性的判断是合乎情理的。从中国传统文化一隅考察陈独秀类型的从政知识分子，多少使我们感到狂狷人生的“士”的历史包袱，即使在被认为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以至于矫枉过正的一代资产阶级文化新人身上，都无法甩掉。指挥战争的将军连“兵不厌诈”的战略战术都忘却，其下场注定是悲剧无疑。

^① 《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

陈独秀从怀着民族主义情绪投入社会改革起，提高到崇尚法国大革命而归结到召唤无产阶级革命；从出版《新青年》呼吁“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光临中国出发，掀起新文化运动，惊醒中国知识分子摆脱走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老路，发动他们中最先觉悟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组建无产阶级政党，又把原本是由疲软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领导的已经濒于失败的旧民主革命，发展到与无产阶级政党合作而取得生机，铲除北洋军阀，完成南北统一的北伐大业，拯救了国民党；更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肩负资产阶级新民主革命重任储备了组织的和干部的实力，以及民众拥护的潜能。陈独秀等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对于中国社会革命和进步运动的发展，都是应当彪炳史册的。

充分肯定陈独秀一生的勋业，我们并没有疏忽他（尤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应承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责任，以及在理顺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关系方面和在与国民党的斗争方面的缺失。当然，笔者更不会放弃陈独秀倾向托洛茨基后在理论上和组织路线方面干扰中共实现革命的研究。只是我们在这项相当棘手的研究中，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的一本书中的一段话考虑在内，这段话如是说：

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①

几十年来中共对待“托陈取消派”的历史令人遗憾地证明：要坚持或遵守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的理论原则，是多么地困难。但历史显然还是朝着光明的未来发展着，于是我们才有可能写部书来谈陈独秀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

一九五二年的斯大林生日

历史推进到了一九五二年。以这一年为时限，一八七九年出生的三个国际共运领袖人物只剩下斯大林了。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遭暗杀身亡已十三个年头；陈独秀病故四川整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当斯大林在这庆祝自己七十三岁生日时并没有想到

^①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

不出半年他也将撒手人间。^① 斯大林在接受亲朋同志和若干国家领导人的生日祝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不至于有什么遗憾了罢。列宁在逝世前二年把俄共总书记的权位交给了他^②,为了保卫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斯大林利用极权并以“为了苏维埃的名义”消灭了所有的政敌,其中主要是残酷镇压了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开党内思想的和路线的论争扩大到党外并用非同寻常的秘密手段予以铲除的先例,从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成了解决党内分歧的快速有效手段。斯大林还通过共产国际组织,把反托洛茨基形成运动推向各国共产党,造成声势浩大的国际反托潮流,中国共产党是最早赶上这股潮流的大党之一: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作出《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认托洛茨基最近言论上的态度,反对俄国共产党之布尔塞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及第三国际的领袖,实际上可以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仇敌所利用。”^③一九二五年的托洛茨基仍在党内还被称为同志,不出三年就被流放西伯利亚,开除党籍,驱逐出国终于遭到暗杀。令人深感惊异的是主持议决批判托洛茨基的中共四大,正是后来服膺“不断革命论”成为中国托派领袖的陈独秀!到了一九五二年,如烟往事早已被历史的狂潮冲刷得杳无影踪,却发生了一起也许连斯大林都不至于想到的重大事件——正是斯大林生日这一天,中国公安对国内大约五百名托陈取消派成员及被株连者大兜捕一网打尽投入监狱。有人称这是中共送给斯大林生日的一份特殊的礼物。这纯属偶然,却是让历史奇巧到神秘的偶然。

历史,显然在回顾沉重的往昔时不断改正着非正常发展时期产生的错误。五十年代被抓的中国托派比之于三十年代俄国托派的命运要好一些,在毛泽东“机关反革命一个不杀的方针”^④下,总算活下来,历经二十七年风雨到了一九七九年,当局把尚在监狱服刑和监护的最后十余名托派成员予以释放并恢复公民权,同时对他们的领袖陈独秀也从“禁区”中解放出来并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和政治荣誉。应当指出,八十年代中共改变历来对托陈取消派的政治态度,如同当年反托洛茨基运动是国际性

①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

② 指出下列事实作为斯大林任总书记的背景资料和补充认识是十分必要的:在被认为是“列宁遗嘱”的《给(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信》中谈到斯大林时指出:“斯大林同志担任总书记以后,掌握了极大的权力,我不能肯定,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为此,列宁曾建议“想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在这次大会上“各代表团讨论了列宁的信以后,考虑到斯大林的功绩以及他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其他反党集团进行的不调和的斗争,主张让斯大林继续留在总书记的岗位上”。转引并参考《苏联共产党史》第404~405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60年中文版。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2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2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质的统一行动相仿,也带有一定的国际色彩。一九八八年初,前苏联共产党有关当局就对三十年代以“托洛茨基反社会主义右倾集团”罪遭处决的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二十多位屈死者恢复政治名誉,主持这类案件的前苏共十九大代表阿法纳西耶夫特别指出,在复查冤假错案时,托洛茨基也不例外。^①

一拍即合之谜

陈独秀性格刚毅、意志顽强、脾气暴烈、桀骜不驯;他处事旗帜鲜明、果敢决断,绝少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去适从别人。这种性格、脾气和判断事物的极端主观,对于普通的革命者其长其短尚无关宏旨,然而对于一个领袖,就不这么简单了。诚如上引列宁的话中所指出的,由于这种人善于比其他人能更先解决运动中存在的诸种问题,主观决断往往是正确的甚至是非立即决断不足以迅速排除阻挡革命前进的障碍,于是刚毅、顽强、果断以及旗帜鲜明等等就成了作用于历史发展的权威,如果相反呢?也会因具有权威性质而难于收拾。不能说陈独秀在政治上大起大落都归结于他的性格,并因了他的权威而影响中国革命。绝对地如此这般予以认同,会掉入唯心主义或宿命论的泥淖。然而也不能完全否定权威人物的性格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马克思在谈论历史人物对社会发展能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的诸多因素时说:“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②一八七九年相继出生的三个人物的性格显然在一定的历史交汇点上左右着它的进程和走向,也造成了他们自身的悲剧而影响世人的评估。本传将在相应的历史编年中研究由传统文化、法兰西文化和现代社会主义文化交互影响下终于成为中国共运领袖的陈独秀的性格,其中最具研究意义和研究魅力的是:如此一个绝少适从他人主张的政党领袖,竟然会倾倒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理论及他对中国革命的策略性的见解,一拍即合。假如我们把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理论的时机考虑在内^③,更显出在理论上的互补作用——陈独秀的“二次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共产国际指导失误使中国革命受挫,本人受到不应有的排斥、诬陷又无处申辩等因素之外,就要数落他的性格造成了他本人和一个群体——托陈取消派的悲剧了。

① 参阅《人民日报》1988年2月6日、6月19日国际版新华社莫斯科电文相关报导。

② 《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93页。

③ 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理论的1928~1929年,正是托氏被开除党籍逐出国门之期,从中当可悟出托氏理论对陈独秀的吸引力以及倔顽脾性对政治家的决断作用,至少陈独秀犯了策略方面的严重错误。

因此而引出两段伟人的话

屈死者恢复了名誉或得到了公正的对待，尚在人间的不幸者们的灵与肉的创伤，将在今后的岁月里得到补偿；至少他们感受到了政治昌明的愉悦。本书就是在政治昌明造成正常学术研究风气下对陈独秀进行全方位研究的一个尝试。写到这里，在我的脑际涌现出来两句话——

恩格斯说：

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①

鲁迅说：

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②

笔者的观点、奢望和本书要旨尽于斯。是为序。

^① 《致李卜克内西——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之际》第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

^② 《忆刘半农君》。

第一章 振风塔下的英才

(一八七九—一八九七)

从“辩诉状”谈起

予行年五十又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①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六日，国民党上海警务系统会同公共租界法租界捕房，在一个托派叛徒引领下协同作业，兜捕了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托洛茨基派”十余人。陈独秀在领导反对租界捕房同意引渡的斗争失败后，经过审判和反审判的抗争，抢在判决之前，发表“辩诉状”，一以抗诉法庭非法宣判，再以借此公开宣判的机会阐明本人愿将中国引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宏志，虽被中共开除党籍，现在又身陷国民党牢狱亦决不悔改。本节开头所引即“辩诉状”的第一段。这段话提挈“辩诉状”全文，概括了他奋斗的一生，辑为传记伊始，颇具史乘意义。

陈独秀把自己三十余年革命一生的事业浓缩为四个“反抗”，贯彻始终。在中国，志在社会进步的任何政党，面对这些个“反抗”，都不会提出与之相左的意见，更说不上反对，——“反抗清帝”结束封建制度，才有“反抗北洋军阀”谋求民国统一大业，接着是为了建设近代资本主义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而“反抗封建思想”，最终“反抗帝国主义”达到孙中山先生遗愿“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孙中山及其政党的革命终极目标，他的晚辈革命家们没有完成也完不成中山遗愿。对

^① 强重华等编《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第21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以下凡引“辩诉状”中文（笔者在引注之前曾以1933年无出处之原版《陈案书状汇录》予以校订过），均据此版本，不另注。

于陈独秀及其政党,完成四个“反抗”只是最低纲领,其革命终极正如“辩诉状”所示:“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这就越出了国民党的国策。

在“辩诉状”中,陈独秀把三十余年革命史剖成两个历史时期,以“五四”运动为临界时限,是符合中国近百年社会革命的逻辑发展的。从近代向现代的革命质变以“五四”为断,原因就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十月革命改变着国际斗争格局并波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如若对整整六十年前的又是因直接抗诉司法当局的自辩而被迫写得含蓄的抗诉状书,以今之语言予以政治性的诠释,所谓“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云云,显然指的是十月革命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破坏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历史,诚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斗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分成了相互对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对立斗争了二百年,终于在俄罗斯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无产阶级斗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使马克思主义从纯粹理论研究跨入了实践的历史,陈独秀的“后半期”就是十月革命闯开来的历史在中国的尝试。诠释的结果使“辩诉状”富含新鲜感,读来顿觉六十年尘土一扫而尽的痛快。陈独秀确是顺乎世界革命大潮在中国“兴风作浪”的弄潮儿,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英法美德日等帝国主义的重炮轰击、鸦片麻醉和破坏性的经济掠夺迫使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危境中猛然奋起的一批爱国志士中,就其一八七九年出生的年龄所承受传统文化的压力予以衡估,他接受渗入中国文化中正在发酵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主要是对封建制度具有强大摧毁力的法国大革命)远远超过被囊括在“近代史(一八四〇—一九一九)”中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黄遵宪、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以至于孙中山或早夭的国民党奇才朱执信^②等等士大夫阶层或知识分子中的先进,陈独秀属于最早觉察出改良主义和“老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断无生机的少数革命家中之一人;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中,只有陈独秀一人用大约三十年——从“弱冠”到一九一九年——的时间完成了从“选学妖孽”转变到“康党”,又从“康党”飞跃到共产党的世界观大裂变,终于赶上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1版)第1卷第239页。

② 朱执信(1885—1920),广东番禺人。他是国民党人中最早拥护并诠释三民主义的学者和革命家。1905年加入同盟会一直追随孙中山。朱执信还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著的《马尔克 Marc》发表于1906年2月出版的《民报》第2号。由于朱执信在该文中介绍了《资本论》,因此毛泽东曾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来看,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引自胡培兆、林圃合著《〈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56页。朱执信于1920年9月21日在广东虎门被桂系军阀杀害。次年1月筑衣冠冢于广州驷马岗,1936年移葬广州执信中学。

“世界革命大势”，肩起‘五四’运动以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重担。切莫以为我们又在故作惊人之语，找点资料证实一下如何？以“五四”运动和中共建党为例，除蔡元培长陈独秀十一岁，其余全部“将领级”人物中没有一个人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①，胡适生于一八九一年比鲁迅小十岁，比陈独秀晚出生十二年；“南陈北李”中共精神领袖李大钊较陈独秀小整整十岁；若以中共前三届中委计，全都比陈独秀晚生十至十五年，惯常以二十年为“代沟”，像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俞秀松、刘仁静、张国焘，以至于毛泽东、周恩来等全都是上世纪最后十年生人。笔者不厌其烦地拘泥于年龄的加减排比，主要是欲说明陈独秀服膺“共产主义的幽灵”所要甩掉的历史包袱，远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但却比谁都快都彻底，甩到了同庚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水平线上，在亚洲大概只有日本的片山潜或河上肇才能与之相比吧。

从年龄的角度以计量统计学的方法，将陈独秀放在同时代的革命家中予以排比，资证他投身革命和世界观变化的“高速运动”，也许是不足道的，姑且写下算是为笔者引入自然科学理论对某些历史现象进行辅助性质的论证和研究的方法论的实验，略备一格。只要查出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接受非法传入国门的马克思主义终于成为共运领袖者惟有陈独秀一人，计量统计原理介入历史学科就不无借鉴之处。

战乱中的没落世家

路是人走出来的，再远的路程再快的速度运动，也得一步一步丈量。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生人只陈独秀找到马克思主义，历史为什么选择他；他属于老一代革命家，为什么会赶上在中国推行“在经济上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度发展的生产制”的崭新的革命大潮？^② 于是研究陈独秀的身世，分析他与同时代书香门第或知识分子的共同性和不同点，就显得很是必要。我们并不信“三岁定八岁，八岁定终身”的俗俚，然而，人毕竟是童少青壮中老地走去的，初涉尘世时的社会环境，时局影响，家庭状况及其

^① 中共一大代表中何叔衡生于1876年，长陈独秀三岁。他虽然投入了中国共运，但统观他一生，一如赶上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老一辈革命家，很像积极参加公社战斗并被选为公社委员，担任过军事委员会委员、公安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并英勇地战死在街垒战中的德勒克吕兹(1809—1871)，他们只是有声望有地位的战斗员，却不是领导革命的指挥员。

^② 《陈独秀著作选》第213页。

成员给予的第一印象不可低估^①，况且“江州义门陈氏”出了这么个“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②这是他祖父对“四房合一子”^③的预测，咒言，还是谶语？话尽管难听也不是事实，不久有他的后悔之日，但是从阶级对立的角度的判断，倒是极富阶级性的判断。陈独秀的家世和童年少年生活很值得说道说道。

我们已经提到陈独秀生于一八七九年，为的是方便与两个俄国同庚进行比较研究，现在立传编年，就得遵照传统历法计算岁时：陈独秀于清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生于安徽省长江北岸重镇安庆市北的后营。据考，后营原是清廷防军营地，毁于太平天国安庆之役，终至废弃而成为居民区，陈独秀三儿松年说：“安庆北门‘后营’旧居，又名十八家，是贫民窟”^④。陈家祖籍应是怀宁县广圩，因屋基恰好处在两个地保分辖之间，称为“陈家剖屋”，由于家道中落又加“剖”谐音“破”而被诤称为“陈家破屋”。其实这祖籍这“破屋”与陈独秀毫无关系，陈松年回忆说他父亲就生在后营，因此“说陈独秀是怀宁县人也可以，实际上是安庆人”^⑤。这个出生在贫民窟中的婴儿却有着“绳索蔓引，派衍支繁”的“江州义门陈氏”家庭的光耀史，使他呱呱坠地就登入十九世“庆”字辈谱系，得谱名庆同^⑥，少长读书考科取官名乾生，字众甫，号实庵。一九一四年为舞文弄墨忽忆及故乡的独秀山而取笔名独秀山民，又删去“山民”冠以姓氏成为陈独秀；翌年，创办文史哲经刊物《青年杂志》，使陈独秀不胫而走盖过谱官字号，成了这位安庆伟人的正名，一如周树人成为鲁迅之后谁还记得绍兴才子还有小名

① 最早关注此项研究的是在日本广岛大学完成《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1879—1915)》(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初版)的陈万雄先生。他认为创办《青年杂志》时的陈独秀年已36岁，思想上和性格上已相当成熟，因而“其早年的经历无疑关系重大”，对此“作一比较完整的了解，必有助于对他日后的思想事业的研究”。并着重研究了家世和婚姻、新旧的教育、中西学问诸方面的问题。由于此书完成于1975年，当时像江州义门《陈氏宗谱》等第一手家族资料，《扬子江形势略论》等重要论文尚未发现，因此，从资料角度，陈万雄稍嫌落伍，但其问题的提出，考证功力和方法论，此书至今仍有一定的权威性，而且超过国内此项研究。

② 《实庵自传》，原载《宇宙风》旬刊第51~53期(1937年11月11日、21日、12月1日)，转引自《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中下三卷本，三联书店1984年6月第1版)下册第552~563页。本章凡引自传均据此版本，不另注。

③ 陈章旭生四子惟老三衍中有后，陈独秀哥哥庆元于1909年去世后，衍字辈四房只陈独秀一个传代人了。

④ 沈寂《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载《陈独秀评论选编》(上下册，王树棣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下册第324页。

⑤ 陈松年《回忆父亲陈独秀》。

⑥ 《义门〈陈氏宗谱〉》，载《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安庆市历史学会、市图书馆编，1981年1月出版)第55页。以下引谱记均此，不另注。

阿张正名寿樟字豫山这类名姓符号呢。与鲁迅相仿,陈独秀也有好几十个笔名或别号,既有工作需要和他人称呼,也有时令雅好或放放酸气发发牢骚而为之者,我们将在相关的时期里写写这些符号的象征意义,这也是颇能显示个性的文化国粹。这里先举一例资证笔名与心境的关系。一九二七年十月刚创办的中共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的《寸铁》栏经常出现署名“撒翁”的短文,知道个中奥秘者谓乃撒手不管一老翁之意;如改成“我老翁撒手不干了”,也许更符合人物性格。撒翁,就是时年四十九岁的陈独秀的时令笔名。当时已被排斥出党中央的他,正受着来自共产国际和中共两方面的严厉批判。陈独秀真的甘心当“撒翁”?牢骚而已。他不仅文章尖锐泼辣,针对性强且极富机智,赛过鲁迅杂文,而且还在探索革命新路,正是在这政治实务和政治追求的真空期,接触并接受了托洛茨基理论。“撒翁”是陈独秀政治转型期的心迹表露。笔名,竟有如此强烈的历史特征。

有关陈独秀在庆同时期和乾生时期的资料首推他自撰的《实庵自传》。在自传中记载家中有三个人给他的印象极深,影响着他的志趣和性格,“我记得家中有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祥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陈独秀排行第四为“老么”,加上他的两个姐姐,就是庆同生活的全部,因为他的记忆中没有父亲……

陈独秀的父亲,十八世衍字辈谱名衍中,字象五。衍字辈的父亲即庆同的祖父章旭生有四子一女,但只有排行老三的衍中有后,待到一九〇九年“阿弥陀佛的大哥”在沈阳遽归道山,庆字辈只剩下陈独秀一个男丁。据江州义门陈氏谱记,其太远祖可溯至唐初,几经迁徙由远祖汝心公自江州迁至安庆定居,时在南宋孝宗淳熙(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年间,历时九百年延续十八世到了本世纪初,安庆陈氏家庭不仅家道中落,连香火亦几近熄灭。参天大树枝繁叶茂有萎顿枯死之日,家庭盛衰亦脱不开万物生长的规律,只是多了催生促死的社会因素,比如封建帝王时代的满门抄斩并株九族就是彻底灭绝家庭的政治残暴手段。义门陈氏传至陈独秀过继给了最后一位足以光耀宗祠的叔父昔凡(衍庶)。当这根陈氏独苗加入抗清谋反队伍,这位继父为了保护家庭的政治地位或免遭因窝藏政敌而罹灭顶之灾,被迫宗祠退继,于是无论从家规从法律,江州义门陈氏已无后矣。陈独秀与家族的关系以及他并不因继父是大阔佬而经济依赖等事,在当时的学界是受到大家钦佩的。陈独秀最后一次在上海被捕的消息传到北平,为声援营救陈独秀,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立即在国文系发表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当讲到“陈先生是一位革命家”时,举的第一个例证就是这件事:“那时我们许多青年人在美国留学,闲暇时就讨论文学的问题,时常打笔墨官司。但我们只谈文学,不谈革命。但陈先生已经参加政治革命,实行家庭革命,他家是所谓大世家,但因恋爱问题及其他问题同家庭脱离了关系,甚至他父亲要告他,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开的一所大铺子的掌柜听说小东人来了,请他到铺子去一趟,赏个面

子,但他却说,‘铺子不是我的’,可见他的精神。”^①胡文中要“告他的”父亲,即继父陈昔凡,两代人各自的政治立场都很坚定。实际上当然没有如此严重,继父不仅没有上告继子,还暗中接济这陈门叛逆留在安庆老家的妻儿,亲情总是在的。往后的叙述中我们还要写到陈独秀的继父,现在回到“正房”继续说说庆同的生父陈象五先生。

陈象五生于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九月十九日(一八四八年十月十五日)。据宗谱记载他生在“习儒业十二世”而“功名俱未显”的贫穷读书人家。一八五三年初太平天国军洪秀全率部从武汉顺长江东下于二月中攻克九江急下安徽占领安庆。安庆是长江下游临江重镇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天国军拿下安庆后分水陆两路向南京进军一途势如破竹,在首次攻克安庆后不到一个月就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定为太平天国国都。六月,太平军西征部队进军安庆扩大了守备兵力以保卫天京。我们之所以要插入这段历史自然与陈家有关,“咸丰之季,赭寇犯安庆,城中故族转徙他乡,象五父及长兄投笔从戎。象五及季弟随母避乱乡间。家徒四壁,无以为生。”文中季弟就是日后陈独秀的继父昔凡。我们当然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待当年陈家的顶梁柱——陈独秀的祖父章旭和大伯父衍藩“投笔从戎”去镇压太平天国,斥之为反动,城里的读书人家有几个能认识译名“长毛”的太平天国军是革命队伍呢,苦的仍然是老百姓。安庆在清军和太平军拉锯战几进几出的兵荒马乱之中,避乱乡下的陈家全仗陈章旭的夫人“劳太恭人勤女红以度日”,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在食不果腹的战乱流离之际“犹不忍象五兄弟之废学”,日夜操劳挣得辛苦钱为儿子找良师授课。据说象五“生有异姿”年少束发受书长得非常俊帅,他每天放学回家,在挑灯夜织的母亲膝下发愤读书。此情此景,不只说明了陈象五记住“毋至若辈坠读书种子”的母训,亦使母亲在儿子朗朗读书声中消除一天劳累,并编织着将来儿子中举当官的梦,这是支撑着中国女性承受全部苦难仍维持家业的精神力量。但是陈象五没有圆成母亲的美梦。

经过大约八年的战乱清军收复安庆,劳太夫人携子回到安庆。令母亲高兴的是象五终于考得秀才,“劳太恭人喜动颜色曰:‘吾儿本窶人子,而亦得入士林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再在陈氏宗谱中录一段感人肺腑之言以明象五的孝道:“顾太恭人积劳成病,象五亲尝汤药,依依膝下。宁国孙太守慕象五名,延为西席。象五以母病力辞。太恭人趋之行曰:‘家无长物,若恋我转无以供菽水,非云孝也。’象五重尊母意,遂行。比至宁国,而太恭人已物故矣。象五闻信奔丧,痛哭血下。先是太恭人以季子昔凡弱,不能成立为虑。象五承母志,训海季弟无微不至。太夫人丧不数年,昔凡举于乡矣,而象五之心始慰。”母子亲爱之情催人泪下。

陈章旭之妻劳氏,怀宁劳秉全之长女,生于道光四年(甲申)七月十八日(一八二

^①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第312页。

四年八月十二日)，“善于勤俭持家，母义足训，教子一端，尤足世风。”她去世于同治九年(庚午)九月二十九日(一八七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是年象五二十三岁，十九岁的昔凡五年后中举人登入仕途而圆成母亲的美梦。这位老太太似乎至死也未见投笔从戎的夫君回家，很是凄凉，但亦算未得大儿子死于战乱的噩耗。^①

也许正由于象五在母亲孤苦零丁时特别爱护弟弟昔凡，循循善诱其知书识礼，因此当象五去世时已踏上仕途的他长期周济象五全家，培养陈独秀。这位一度得四品顶戴的朝廷功臣万万不会想到在他周济的孙儿辈中竟然有两位继承父业的杰出的共产党人陈延年和陈乔年！时光倒错的超前叙述盖出于乾坤扭转的政治大动荡之故吧，现在该回过头来送终陈象五。

据谱记，慷慨有大志的陈象五因“屡困场屋，不得已纳粟，以府经历分发江苏”，在哪儿当什么小官则谱无记载亦不复可考，看来并不起眼，也许可能“候补”至死亦未“得缺”上任。倒是设馆执教名声日隆，谱载“皖中知名士，半出其门”固然难免夸张之虞，但说“四方来者日众”应是可靠的。不知何时陈象五旅至苏州投入安徽霍邱老乡窦军门下任塾师。据说陈独秀第三个儿子松年的岳丈就是窦军门的第五子，祖父执教竟然为孙子辈埋下姻缘的种子，此亦奇巧也。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姑苏城中瘟疫大作，陈象五不幸染病于是年八月十五日(公历十月七日)逝世于苏州怀宁会馆。陈象五去世后，可能沾点儿亲戚关系的“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汤寿潜为这位怀才不遇的好好先生在谱牒上撰写颂词，竟然一反歌功颂德的传统八股，通篇大发牢骚，值得留作史料：

国家取士，偏重科目。以至奇特之士，皓首穷经，不能一用。同光之际，士习臃肿。腐滥之文，国维寝弱。象五思有以振之，为文必宗先正，而学部经济，与夫忠君爱国之忧，悉见于行墨间。不雕镂字句，以为举世不好之文，此其所以不遇也。^②

最后，汤寿潜写的“象五犹不死也”，乃得福于他生了个陈独秀。

但是陈独秀对这位老爸连一点儿印象也无，以至于闹出一场很是闻名的笑话。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中，陈独秀在广州任陈炯明省长组阁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有一次宴会席上，陈炯明正正经经的问我”，陈独秀在“自传”中写道：“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我也正正经经的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

^① 衍藩于1861年被太平军刺伤致死。陈独秀大哥庆元被兼祧为嗣。

^② 汤寿潜(1857—1917)，武昌起义后被举为浙江省都督，民国成立被临时政府任命为交通部长，新潮人物也。

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当时在座的人们，有的听了我的话，呵呵大笑，有的睁大着眼睛看着我……”问得出奇，答得机巧。这种半开玩笑半诋毁，当然是由于陈独秀到广东不只是办教育之故：一九二〇年的陈独秀已是中国共运的领袖人物了。

陈衍中象五仙逝姑苏时，庆同尚不足两周岁。^①

“龙性岂能驯！”

沧海何辽阔，
龙性岂能驯！

上二句诗作于一九三八年深秋，其时陈独秀已“白发染红尘”五十九年，开始他一生最悲惨的江津四年生活，却依然冷察时势，傲然不可一世，觉察不出实已“卧病山中生事微”的窘迫。^②

陈独秀的桀骜不驯的“龙性”，庆同时期就养成了，这多半要归结于他那具有封建极权思想的祖父陈章旭。当时他是最大辈份^③，字太占，亦字晓峰，生于嘉庆二十四年（己卯）七月二十八日（一八一九年九月十七日）。谱记他“学问极其深醇”却从未中举，只是有着至死也没有候补上的“盐提举衔候选知县”虚名。封建时代封给读书人的这类虚衔比比皆是，如瞿秋白的祖父贞甫虚名“云南白盐井大使”并有五品顶戴的高帽，仍然布衣终身。不过有此虚名当幕僚客或设馆执教却颇有招徕效应，两位共产党巨子的祖父都如此这般了却一生，只是陈独秀的祖父因人见人怕的脾气连教师爷也未能当好。据说他的长子衍藩十一岁已读竣五经，义理清通。这番功劳不能全归功于父亲，因为他“法教森严”令儿子望而生畏，还得“妣之助教居其半”才使儿子成器。我们将会发现章旭“森严”的教规在庆同身上碰了壁。

陈章旭的老四昔凡于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恩科中举，不久出官奉天（今辽宁省），在陈独秀受教祖父的六到九岁（一八八五——一八八八年）内，昔凡奋力官场，终于

① 在自传中陈独秀说，“我出世几个月，我的父亲就死了”，不确，但他说“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模糊记忆，还是对的。

② 所引五言摘自《和陈钟凡》及七言《赠欧阳竟无诗》，均见张君、房学朋编《陈独秀诗选》，《宣城文艺》编辑部 1986 年 10 月出版。

③ 据《陈氏宗谱》“天、章、衍、庆、遐”顺代排列，陈章旭系陈天植子。天植兄弟天畴的儿子章寅无子嗣，以陈独秀的父亲为继子。天字辈断宗，陈象五去世，惟章旭一系维系陈族，至今遐字辈只剩下陈遐和一人了。

获得四品顶戴，陈章旭祖孙三代才得以摆脱贫困。陈章旭执教小孙子，时年六十又七，渐入老境脾气越发古怪，几乎把所有亲朋都视作陌路，“亲戚朋友都绰号我的这位祖父为‘白胡爹爹’，孙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偏偏有一个小孩不怕，就是庆同，“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五经》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还是不必重复这句前面已经引过的“显然不符合”事实的咒语吧。陈独秀在五十七岁上蹲在国民党的牢狱里回忆“祖父对我的预料”，发出如下感慨：“我们知道打着不哭的孩子很多，后虽不定有出息，也不定做强盗。……我后来并没有做强盗，并且最厌恶杀人。我以为现时代还不能免的战争，即令是革命战争中的杀人，也是残忍的野蛮的事，然而战争还有进步的作用；其余的杀人，如政治的暗杀，法律的宣告死刑，只有助长人们的残忍与野蛮性，没有一点好影响，别的杀人更不用说了。”这段理想主义的内容，出于陈独秀之口，如果我们不考虑身陷囹圄给他的心理压力，那么，这正是政治领袖的悲剧性格的自然流露。

庆同的童年除了严厉的祖父外，别的家庭成员，尤其是母亲和哥哥都十分爱护这聪明的老幺，这是在自传中写到的，还有没有写入自传中的大姐（排行老二，死于一九三九年）也曾给庆同以温馨。衍藩忍气吞声地在森严的教规中幸得慈母劳氏的护爱才不致成为心理障碍的畸零人。与大伯衍藩相仿，庆同在祖父的棒喝背后幸得春晖沐浴，摆脱怨恨，体察到家庭的温暖和世间的爱，当庆同受到祖父毒打痛骂时，“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对我并不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好言劝勉我……我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我揩眼泪，一面责备我道：‘你这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的哭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陈独秀不无感叹：“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别人对我哭，尤其是妇人的哭。”细细推敲柔以克刚的这段回忆，似乎也是造成陈独秀悲剧的一个心理因素。这虽然是我们的推测，但也有他本人的回忆足以验证：“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性格的遗传，也有影响吧。”这是的确的，除了不能忍受眼泪的折磨，陈独秀在自传中说他母亲也“往往优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认为是个“弱点”，

这在妇道人家是性格柔弱使然，无所谓的；政治家而有这个弱点，将会给历史带来不可估量的错失。

不管怎么说，陈独秀的“母亲的眼泪”竟然成为“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这小倔头终于在母亲的眼泪调节下忍受着老倔头严森的教育渐渐进入书林，最后竟然感到离开了祖父还真不成哩！毕竟他有深醇的国学底子，精于传统文化通晓经史。陈独秀曾不无遗憾地说：“自从祖父死后，经过好几个塾师，我都不大满意”，聪明过人的孩子非博学导师莫属。最后，陈独秀是在“阿弥陀佛大哥”的半认真半迁就的教导下修毕考科的正统学业。这将在下一节叙述，这里再叙叙庆同的童年生活。

陈独秀的童年可真是相当清苦，这主要不是指物质受用，是指精神生活。他从小就背上了忍气吞声这个形容词所包含的心理压力，陈独秀回忆说他的祖父还有一些怪癖，“一是好洁一是好静”。其实这全不算是恶习，好洁好静总比邋邋遢遢和鼓噪打闹好些。但凡事不能过分，洁静而成癖就成了全家的灾难：“家中有一角地方有一件桌椅没有扫抹干净，我的母亲，我的大姐，便要倒大霉。”至于好静，简直静到全家不敢呼吸的阴森程度：“他不许家中人走起路来有脚步声，我的二姐年幼不知利害，为了走路有时有脚步声，也不知挨过多少次毒打”，就便是庆同的外祖母来串门，“都不得不蹑手蹑脚的像做贼的一般走路”。陈独秀没有说他是否因好动而受到好静的爷爷惩罚，咱们就不必去探个细微末节，至少在一天数个时辰的科教时，这个好动好闹好问个所以然的不安于现状的“强盗胚”是决不会舒服的，弄出点儿响声来挨板子总是难免，而每到此时此刻，好静的爷爷反倒咆哮如雷而好动的孙儿则一声不吭，反差之大令全家陷入窘境。陈独秀也许从小就懂得沉默是最好的反抗罢。使陈独秀不仅感到纳闷而且生气的是这位患有洁静双癖的老人竟然是鸦片贸易入侵中华的第一代烟民，他不但在家中开灯弄得乌烟瘴气，还常到街坊烟馆最嘈杂最龌龊的老枪群集的烟榻上吞云吐雾，“那时他好洁好静的脾气那里去了呢？”陈独秀说他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在监狱中写回忆时“才有了解答”。我们留点无关宏旨而解开后又不值一哂的疑问让读者思索去吧。陈独秀出生时，上距鸦片战争不到三十年，距为禁烟而充军而吃尽苦头的林则徐之死不足二十年，中国人已为这毒物沦为半殖民地上的“东亚病夫”。陈独秀从小就瞧不起祖父，任他如何毒打决不吭声的性格中潜在深沉的反抗精神，也在吞云吐雾的腐败中培育着反帝情绪。

庆同的生活是不是影响他的一生呢？我们不妨测度一番，往后我们将叙述到陈独秀教育儿子严到不近人情，甚至还蔓延到工作中，他主掌中共达七年之久，虽然不到专制独裁的程度，但“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①，这是祖父给他的负面效应；同时，我

^① 《包惠僧回忆录》第368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6月第1版。

们还得看到陈独秀作为领袖有时显得专横独断，这在处置那些扯皮的事或面对不敢负责任的卑琐干部，这专横也罢独断也罢，全都转化为权威性，这可算是正面效应。大凡这些使人联想到祖父遗风的性格相似点，很希望相关学者从家族史的遗传基因科学角度研究陈独秀的性格形成，也算是对童年陈独秀产生过影响的老辈人的纪念。

振风塔的比喻

陈独秀出生前五年——一八七五年即光绪元年，他继父昔凡于是年恩科中举。进入官场后凭才气和努力，不久即因在山东治理黄河水患有功而迭受器重，自此官运亨通。因此，笔者以为陈独秀出生时，陈家开始经济转机，并已经搬出后营贫民窟迁入了大南门培德巷东口新宅。^① 陈独秀就学祖父的数年，要说生活是相当过得去的，然而在一个严厉到人见人怕的长辈统治下，死了夫君的媳妇是相当难维持家政的。陈独秀的母亲生于一八五二年，一八八一年二十九岁起守寡，当时大儿子庆元九岁，以下是两个谱不记生年的女儿^②，最后是年仅两岁的庆同。在公公的严管下依靠小叔昔凡的资助育儿持家，辛苦劳累孤独零丁十九年于一八九九年逝世，享年四十八岁。死时她日夜思念的两个儿子都在东北。兄弟二人闻娘重病日夜兼程南下，进得家门见到的却是呼天喊地都不应的亡亲，陈独秀曾沉痛悲歌：“关东遭丧乱，飞鸿惊寒弦，南奔历艰险，意图骨肉全。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长歌当哭，悲痛欲绝，“无言执兄手，泪湿雍门弦。”陈独秀是个重感情而又特别冲动的热肚肠，当他与哥哥同时跪在慈母灵前时，怎么能想到上引几句丧悼慈母的哀歌，是十年后写在他痛失大哥的《述哀》诗中！

孤零零地死在安庆老家的陈独秀的母亲，由于以男性为中心的谱记，致使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只知她是怀宁查传芳的长女，此知，等于不知。还是把这位被她的孝儿颂为“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的好妈妈按传统称她为“陈查氏”，并借重鲁迅哀悼“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的长妈妈的颂词，以寄托我们对养育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巨子的无名女性陈查氏的哀思：“仁厚黑暗的地母

① 由于包括陈松年在内都认为陈独秀出生在后营贫民窟。笔者维持旧说，但提出异议：陈独秀出生时，他未来的继父昔凡公已作官五年，而且祖父章旭还活着，是不会让恩重如山的哥哥衍中全家仍住贫民窟受苦的，陈独秀当生在培德巷新宅。因此陈独秀才说 he 自己是“小户人家”子弟，五岁后过继给昔凡就富些了。

② 大姐嫁商人吴向荣，晚年亦住江津，与陈独秀有往来。二姐嫁与陈昔凡的文友安徽山水画家姜筠的侄子姜超甫，死于1920年。

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①

中国传统家教的说法是“长子代父”，陈象五去世时，大儿庆元尚不满十岁，而当祖父章旭去世时，庆同的大哥年已十八，府学廪贡生；聪敏好学，为人厚道，因祖父去世而颇有“解放”之感的陈独秀就在比他大八岁的“阿弥陀佛的大哥”培育下成长，时年十二岁，从此时起直到一八九六年参加县府院三级考试得中秀才这五六年间，“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章，除温习经书外，新教我读《昭明文选》，每读时，我也有点头痛，渐渐读出味道来了”。被梁武帝于天监元年（公元五〇二年）立为太子未即位而卒的“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这部南朝梁代诗文选集（原本早已失传）以现在的眼光看仍不失为一部相当不错的古典文学辑集。但是在科举时代，在没有考得功名之前的童生若要读它，则认为是不合适的，只是哥哥不愿雅拂乃弟讨嫌八股，从开启文章作法词藻应用的角度推荐为之，孰料竟使陈独秀“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因此而“使我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虽说“长子代父”，总归是兄弟又加菩萨心肠使他不忍硬逼小弟只攻科举之学。这种相当尴尬的师生关系一直硬挺到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

这里，笔者不禁欲插几句对陈独秀研究算不得闲话的闲话。中国的史学界中人碰到难以启齿的不好说透的事，或者是碰上敏感的问题以及政治禁区，总是来一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于是，著者摆脱政治困境，读者体察个中隐衷，历史在苦涩中沉默……如今历史正在——或被迫——逐渐透明，才感悟到所谓“由于众所周知”云云，已经使沉默的历史僵成化石。陈独秀研究尤其如此，纵观他一生，从安庆初涉反清斗争和拒俄运动，留学日本至辛亥革命，北京大学到五四运动，尤其是从中共建党与国共合作，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斗争到“八七”会议，以至中东路事件与开除党籍，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和他与国共两党要员的关系等等，几乎每个时期每项活动都被蒙在一层能见度不良的帷幕里，大量能“显露他的重要生命力”的书报刊物文件档案和知情人口碑资料，不被化成灰烬亦被锁入石库不容人见，即使是此节研究的陈独秀六岁至十八岁长达十二年的学研生活期间读过哪些书，受过哪些哲学思潮的影响，敬仰或崇拜过哪些思想家或伟人，就无资料征询，陈独秀本人没有留下记载，知情的同好友人或同志没有（也不敢）留下美好的回忆。陈独秀十二年读书生涯的前六年由于祖父森严的教规除经文八股外，也许未涉书林，后六年大哥任其自由读书期，我们也只在《实庵自传》中知道他读过《时务报》受过康梁变法维新思潮的影响，摆脱“选学妖孽”的羁绊成为“康党”。但是从时序方面深究却又成为问题了，《时务报》创办于一八九六年的上海，正是他考中秀才的那年及以后的事（顺便说一句，《强学报》亦于是

^① 鲁迅《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

年出版)。对于这位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初涉文化学术期的知识来源仍是陈独秀研究中的盲点,这决不是个小问题,比如他深厚的国学底子,对文字学音韵学雅好和造诣,可以肯定与这十二年的学研有直接关系,我们却一无所知。一九二一年中共建党前就认识陈独秀的包惠僧,初次见面就尊陈独秀为老师,形容他学问之深博犹“好比是书箱子”,正由于令人遗憾的“由于众所周知……”我们竟连这“书箱子”的垫底之书都茫然,江河湖海考不出其水之源头!

带着诸多无法综核名实的遗憾继续往下写去。光绪二十二年,十七岁的陈独秀面临县考之难,这倒不在于临时抱佛脚,而在于急遽发生的全国政治形势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投入社会运动的日子已经来临。陈独秀就是在这场运动中成熟起来的。

甲午年即陈独秀县试前二年——一八九四年,发生了继鸦片战争之后削弱国力最严重的甲午中日战争。次年,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告终。甲午海战和《马关条约》给中国知识分子和志士仁人的冲击,超过以往任何侵华战争和不平等条约。

从地缘政治角度,发生在渤海黄海面上的中日海战较之于发生在广东洋面上的中英海战,对于动摇清朝统治摧毁封建制度,来得直接而且迅猛,因为从辽东半岛和胶州湾登陆的日军,使地处天津口岸大沽口岸仅百里之遥的北京直接暴露在侵吞中国胃口最大的日本帝国枪口之下。我们不必从战略战术的角度去研究京城的防卫和朝廷准备迁都逃亡诸事,仅从《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条件之苛刻大大超过以往历次不平等条约,即可断定正是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走向。从此,日本帝国逐渐取代英国并及欧美列强主奴中国的耻辱外交,陷入了持续时间最长——直到一九四五年世界二战和中国抗日胜利;蒙受历史压力最大最久以至于台湾被日本全盘奴化和国家分裂——出现了国中之国的“满洲帝国”,又因大部国土沦陷,沿海最富庶的城市陷入东方式野蛮的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而影响民族文化素质的下降,这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的五十年苦果。

也正由于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使近在咫尺的北京朝野陷入一派悲鸣之中,惊醒着积压了四十年丧权辱国怨气的知识分子,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强烈的反弹。四月二十二日,即《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五天,康有为授命梁启超发动湖广两省来京应试的举人联名上诉都察院转呈光绪皇帝反对《马关条约》。此举引起了京畿有识之士深思再三,从这天起到五月二日短短十天内,康有为策动十八省来京应试举人千余众集会松筠庵反对《马关条约》,要求变法维新。会后六百余举人甘冒犯上作乱之罪慷慨署名上诉状,这就是震撼封建王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不愧为世纪末的政治革新家,他雷厉风行,在嗣后六七两个月内力疾挥毫连续四次上书,并会同梁启超等出版《万国公报》(后易名《中外纪闻》),把西方围绕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和变法维新思

潮上达士夫贵人并推向全国,接着是成立强学会正式联党从事组织活动。“公车上书”与历史上“文谏”(如王安石的变法图强运动)不同,除社会进化的时代潮流不同外,康梁变法是在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的外来影响和中国已经开始的洋务运动条件下,由官僚和准官僚士大夫阶层发动的群体运动,而且很快就得到“圣主”的权威认同,他迅捷对造成“公车上书”动因的《马关条约》予以严重关注“朝意颇为动”,谕旨“命鸿章改《马关条约》;鸿章以全权签约,无更改理,虑腾笑万国,坚不从”^①。四年后事败,李鸿章顶了个卖国贼的恶谥,却卸脱了应当承担丧权辱国主责的“朝意”。犹太固然可恨,总不能因此而赦免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罗马总督彼拉多和希律王。历史往往如此不公正,久而久之,人们忘却英烈血迹,甚至把同情的秤砣倾斜到仍在小瀛台安度“晚年”的光绪皇帝一边,笔者既然抱不平于这桩历史公案,不久还会谈到的。

在一八九四年上谁也预测不了促成维新运动的“公车上书”竟会以惨败告终,在当时却以锐不可当之势向全国蔓延,朝野齐动,究其根本,乃在于“公车上书”不同于时人记忆犹新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它承认大清王朝“列祖列宗及我皇上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康有为上书中语)的前提下,不动太岁头上之土,只是将“君主万能”改为“君主立宪”;通俗地说来是一旦变法成功“国朝圣主”依然,只是参政议政制度和政府职能向近代资产阶级国家体制转化,现成的例子正是甲午战争的胜主天皇制的日本。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关心国事到逐步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起步是甲午战争中国败北,陈独秀一九〇三年在家乡筹备“安徽爱国会”,一九〇四年去芜湖创刊《安徽俗话报》时,已经留学日本经过世面经过反清斗争的洗礼,而且已经吟咏出“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②的诗篇,表明了自己投身社会运动就不信改良主义而别谋革命的理论 and 途径的心绪时,仍然承认自己觉悟的起点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③

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结束的大清帝国从衰败到溃灭,起于英国的鸦片贸易和炮舰政治。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之后,东西方列强武装侵略和经济掠夺接踵而至,不平等条约一个接连一个;国内,武的造反起义,文的上书劝进亦接连发生,惟独甲午海战和《马关条约》才使有识之士从单一的提高军事实力上升到改造腐朽的朝廷制度的高度,发生了声势浩大的以国家政体改革为终极目的之“公车上书”,用现

① 转引自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第4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8月新1版。

② 《题西乡南洲游猎图》。

③ 《说国家》,《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55页。

代政治语言诠释：“公车上书”到“戊戌政变”，是开创近代中国革命史的第一次政治大革命。笔者认为，也是由于历史研究中的极左思潮，对于除了农民运动以外的政治运动总是否定出超于肯定，戊戌政变亦不例外。其实“戊戌政变”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坚甲利兵政策失败的必然产物，也动摇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观念，若如大胆一点，则可以认为戊戌政变是中国引进西学的洋务派，让位于从文化思想、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上层建筑全方位接受西学的新一代洋务派的开始。这场运动虽然也以失败而告终，甚至它的领袖还不光彩地成为保皇党，但其意义之深远实不容低估。真正肯定这场运动对近代中国革命的先导作用的第一人还是感叹“勤王革命皆形迹”的陈独秀，他指出：“甲午之役，兵破国削，朝野惟坚甲利兵是羨，独康门诸贤，洞察积弱之原，为贵古贱今之政制学风所致，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他回忆当年：“尊古守旧者，觉不与旧式思想，旧式生活状态相容，遂群起哗然非之，詈为离经叛道，名教罪人……吾辈后生小子，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耆儒，以此指吾辈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①他下结论：“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②掷地有声之言道出了戊戌“六君子”诸烈士的血总算没有白白流淌在京畿道上。

好，下面我们将顺编年时序写一写传主从院试到江南乡试及其他了。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问，“公车上书”期间年仅十七八的血气方刚的陈独秀，就因“恒于广座”为康梁派辩护而被斥为康党；自己又极讨厌八股文，连考科必习之“馆阁体”书法都不值一晒而拒学，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勉强去考功名呢？岂不言行不一，二重性格吗？这将涉及人物与时代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深层研究，对于那些性格刚烈，里外透明，说一不二的人尤其如此，虽不好回答却也不能回避。

生活往往以极其复杂的综合形态影响着、推动着或者是阻止着人的自由行为。康梁运动的兴起揭开了近代中国上层建筑革命的帷幕，由于参加这场运动的全都是举人以上的知识分子和官僚，还有黄遵宪、陈三立等大学者的支持，一度连张之洞、陈宝箴这样的朝廷重臣都附和维新，于是在社会上就造成一个奇特的观念，即从事政治斗争不仅要有知识还得有功名，这才能接近朝政参与改制。因此，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有为青年尽管讨厌八股取士，内心中仍然重视功名，甚至还“不大瞧得起”那些“捐班出身的官”，且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陈独秀，甚至连世纪末已经去南京入江南水师学堂学洋务技艺“将灵魂卖给洋鬼子”的鲁迅，还返回家乡参加了一次县考。^③ 人的

①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30页。

② 《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同上书第214页。

③ 1898年12月18日鲁迅参加会稽县考。

思想不能,至少是难以超越社会群体思想,本传主人就是这般见识:“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那时人家生了儿子,恭维他将来做刚白度(即买办),还只有上海十里洋场这一块小地方,其余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这是社会因素;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考虑到陈独秀是个敬重母亲的孝子,由是之故他也压住了自己的心愿而去实现“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这是家庭因素。如果允许笔者说几句超前的话,那么我们还应当看到陈独秀成为一个坚定不移的革命家是在离开家乡留学日本以后的事。小县城里出康德的故事在德国已属特殊,在中国更不可能。安庆是皖北沿江富庶的地方,但是它脱不出小农经济落后的生产方式,城镇手工业生产力低下和封建保守闭塞的城市文化对人的思想束缚,与陈独秀相仿,李大钊不冲出乐亭去天津求学而留学日本;瞿秋白不离开常州经北京而走向苏俄;鲁迅不经由南京接受新学而去日本;生在绩溪的胡适没有留学美国的机会;孙中山只在香山县而不去英美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蒋介石不铤而走险赴日本学军事……所有这些日后中国舞台上的人物都将一事无成,即使是血气方刚性格坚毅的青年也无法自然产生,只有在先进生产力社会才会萌发和具备的革命智慧和科学宇宙观,正如恩格斯在致爱·伯恩施坦的一封信中发“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的牢骚时所说的,在德国“这个‘大儿童室’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所以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①。这就是陈独秀以“官名”乾生走向考场的家庭原因、社会原因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

一九三七年,陈独秀在国民党监狱中应《宇宙风》编辑陶亢德之约撰写《实庵自传》,本当计划写到“五四运动”,结果因七月发生中日战争而提前出狱,只写了两章行年至一八九七年十八岁去南京参加乡试为止。这两章中最精彩的就是院试和乡试部分。现在,我们抄录于下并适当地作些解释和关于科举制度的知识介绍。

像我那样的八股文程度,县考、府考自然名次都考得很低,到了院试,宗师(安徽语称学院为宗师)出的题目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正在收拾考具要交卷,那位山东大个儿的李宗师亲自走过来收取我的卷子(那时我和别的几个人,因为是幼童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0页。

县、府试录取第一名，或是经古考取了提堂，在宗师案前面试，所以他很便当的亲自收取卷子，我并不是考幼重，县府试也非第一名，一入场看见卷面上印了提堂字样，知道经古已经考取了，不用说这也是昭明太子帮的忙），他翻开我的卷子大约看了两三行，便说：“站住，别慌走！”我听了着实一吓，不知闯下什么大祸。他略略看完了通篇，睁开大眼睛对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问我十几岁，为啥不考幼童？我说童生今年十七岁了。他点点头说道：“年纪还轻，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

真是写得生动活泼，似乎不是在监牢里而像胡适那样坐在米粮库家宅宽敞的书斋里悠然自得地写他的四十自述，单就这一点就足以见陈独秀的笔墨兴致和死生置之度外的乐观情绪。文笔实在潇洒，但今天读起来且不说青年即使中老年人也不免对科举制感到陌生而费解。

科举是用层层考试的规章为朝廷选拔各级各类的文武官员的考试制度，开始于隋唐一直沿袭到清末。所谓考秀才，要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三关。未过三关前的读书人称为“童生”，三考中的者正名“附生”，还有诸如“庠生”、“茂才”等别称，最通俗的称呼就是“秀才”。县府院三试的报名手续非常麻烦，要有五个保人和一个有廩生学衔的证人，主要担保考生不是门出倡优皂隶下九流。县考期在每年的二三月间，要考四场或五场。考毕发榜很特别，把考试及格者每五十人为一组写成圆形，有五十人一圈和分三十人外圈二十人里圈两种，第一名把姓抬高一字，由右起一个三百六十度与第一名隔邻。陈独秀说他县试和府试的名次都很低，不知他在第几圈第几座。鲁迅的县试被列为第三圈第三十四名，可见名次够低的，因此而不参加府试了。看来陈独秀够耐烦的，竟然三试全员考出。^①

考试内容全出自四书五经文论和试帖诗，应考文不得超过千字。所谓“截搭题”，这纯粹是为了防止作弊而发明的恶作剧，其方法是取某书某段两句话掐头去尾地截搭一起让考生去“蒙”题句出处再作文发挥。陈独秀的截搭题取自四书中《孟子·梁惠王》中“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真可说是莫名其妙的题目配胡截乱搭的“皇皇大文”。难怪考毕回家的陈独秀“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大概在大哥看来小弟院试必定砸锅，祖父和他十多年心血算是泡汤了，“看见大哥那样失望的情形，却有点令我难过”。

也许文曲星高照陈府，“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

^① “图”或“圈”上有的考场不列名而写学生的编号，如后来曾与陈独秀在北大提起过考秀才故事的蒋梦麟，在绍兴府考“放榜时鸣炮奏乐，仪式非常隆重，榜上写的是录取考生的号码，而非姓名……我发现自己的号码也排入圆图。”载《西潮》第58页，台湾鲁南出版社1979年1月初版。

把我取了第一名”，榜上有名而且还是姓氏抬头的“院案首”，惊呆了阿弥陀佛大哥，榜上列名的“红案”通报到家“母亲乐得几乎掉下眼泪”。不清楚陈独秀是否穿戴“雀顶蓝袍”与同科秀才们齐集考棚行“簪花礼”然后在县府州三部大员领銜下招摇过市开到文庙祭拜孔子。估计在所不免，那么行进在夹道迎送队伍里的陈独秀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原来竟然使他“更加一层鄙薄科举”，表明了他对八股取士“禄蠹”竞争发自内心的愤恨，但街坊邻里的心目中这脾气石硬的小青年实在前程远大：“我们这一门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一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了我的父亲才有一个秀才，叔父还中了举，现在看见我们弟兄又都是青年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许多神话，说我们家的祖坟是如何如何好风水。”提到风水，陈独秀也有过生动的描写，说如若某家子弟屡考不第不怪自己学业无成而抱怨风水不好，竟“掘出尸骨来改葬”。当年门庭冷落的寡母人家，现在不但说风水，甚至玄到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坟前的一管笔”，真是离奇得出谱。迎江寺里的振风塔因其七层塔身八角楼檐每角系一铜铃，江风吹拂五十六只铜铃叮当作响而得名，从明隆庆四年（一五七〇年）建成后矗立在江岸边古寺内到陈独秀考取秀才的那年已风吹叮当三百二十六载，唯独钟情于不起眼小户人家？距陈独秀榜上有名至今历史忽忽又过了将近一百年，安庆不出陈独秀，谁会注意聆听铜铃叮当！反倒塔以人传，名胜也得依附在名人身上，难怪听了那些出格颂扬的陈独秀揶揄道：“人家倒了霉，照例总是编排得比实际倒霉要超过几十倍；人家有点兴旺，他们也要附会得比实际超过几十倍。”其实从轻松的字里行间，使我们觉察出蹲在班房回忆当年时亦颇有三分得意之情，这是不用“精神分析法”就能悟出个中微妙的——“最有趣的是几家富户，竟看中了我这没有父亲的穷孩子，争先恐后的托人向我母亲问我可曾定亲。这就是我母亲大乐而特乐的社会原因。”

亲，终于定下，娘的心愿似乎正在一一实现，然而当事人又如何想的呢：“母亲快乐，我自然很高兴；所害怕的，来年江南乡试的灾难，又要临到我身上来了。”是否中举，前途未卜，有一点则可以肯定，就是祖父的咒语已经落空，十二年的国学教育和考秀才的功力，为日后去东北在继父昔凡公家借用他的丰富的书画度藏以及他对诗书画的精湛的技艺和学识继续深造，奠定了基础。受到陈昔凡的器重和关照是陈独秀一生的重要环节和机遇。写上几句，是对这位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间接——算是培养人才吧——作出贡献的老辈，留个永久的纪念。

县试是所有读书人都可参加的，若是屡考不第而又进身心切尚可一直考下去。如中共一大代表中，吴玉章中秀才比陈独秀早一岁，何叔衡却晚至二十六岁才中。由于清初在完善科举制度时，乾隆帝曾有“各省学政考试生童，为士子进身之始”的上谕，考秀才就决定着“进身”的命运。官儿，可以“捐班”，比如与本传主人多少有点儿

关系的反清英雄徐锡麟，就出资捐得道员资格分发到安庆任武备学堂副总办，在那儿起义并壮烈牺牲，就是著名一例。但是参加乡试唯一的条件是院试名列前茅，是“捐”不来的。

陈独秀以院试第一光荣被选拔考举，“大概是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吧，我不得不初次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了”，“江南乡试是当时社会上一件大事，虽然经过了甲午战败，大家仍在梦中……”

为什么要到南京？为什么名作“江南乡试”。明代，今江苏和安徽二合一称“江南省”隶属南京，清康熙遂分苏皖两省，安庆成为分省后最早的安徽省省会。但乡试仍依明朝制度不变，苏皖两省秀才皆在南京考举，考试院仍称“江南贡院”。据考证江南贡院开考于南宋乾道四年（一一六九年）距陈独秀踏入考场时光已流逝七个世纪，圆成多少美梦，造下几多怨魂？陈独秀说他“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二魂半”，孝敬母亲一个举人的梦是注定圆不成了。陈独秀回忆当年沿江考生“很多愿意坐民船，这并非保存国粹，而是因为坐民船可以发一笔财，船头上扯起一条写着‘奉旨江南乡试’几个大字的黄布旗，一路上的关卡，虽然明明知道船上装满着私货，也不敢前来查问”，这个细节道出了尚未黄袍加身就不可一世就可中饱私囊的某些读书人的嘴脸。陈独秀等是乘轮船赴考，同去的有他大哥、大哥的先生和同学，以及先生的几个兄弟，结伴而行的这支队伍中只有陈独秀没有去过南京，乘坐把民船远远抛在后面的轮船，不仅可提前抵达而且还满足了不与黄旗下狐假虎威者们同流的虚荣，“我们一批人，居然不想发这笔横财，可算得是正人君子”，三分揶揄中显得三分清高，倒亦合乎陈独秀们的秉性。

陈独秀一生数途南京，甚至还有房产，但只有两次留下对南京的回忆，就是考举这一次和被捕押往“国府”的最后一次。两次皆光彩异常。有人对陈独秀被押在南京拘留所时答记者问中涉及南京的回答颇有看法。记者转述的陈文如下：“（问）先生对此次被捕，感想如何？（答）余无何种感想，惟对于我二十年来未到之南京，见各处建设及商业之繁盛，真胜昔百倍，在此国难日亟之时，政府仍能努力发展建设，此点实为国家前途庆幸。”囚车掠影街景似有吹捧国府之嫌。这种怀疑可以在判刑后蹲在监牢里回忆首途南京的字里行间得到答案——

这是一八九七年的南京，观察之细致，描写之生动令引者想作为一个世纪前的南京街景志保存于此以飨读者：

一到南京，看见仪凤门那样高大的城门，真是乡下佬上街，大开眼界，往日以为可以骄傲的省城——周围九里十三步的安庆城，此时在我的脑中陡然变成一个山城小市了。我坐在驴子背上，一路幻想着，南京城内的房屋

街市不知如何繁华美丽，又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为曾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多少倍。进城一看，使我失望了，城北几条大街道之平阔，诚然比起安庆来在天上，然而房屋却和安庆一样的矮小破烂，城北一带的荒凉，也和安庆是弟兄，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个“大”。可是房屋虽然破烂，好像人血堆起来的洋房还没有；城厢内外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驴子，跑起路来，驴子头间一串铃铛的叮令当郎声，和四个小蹄子的得得声相应和着，坐在驴背上的人，似乎都有点诗意。那时的南京用人拖的东洋车、马车还没有，现在广州人所讥讽的“市虎”，南京人所诅咒的“棺材”和公共汽车，更不用说；城南的街道和安庆一样窄小，在万人哭声中开辟的马路也还没有；因为甲午战后付了巨额的赔款，物价已日见高涨……人们已经叫苦。

南京的悠久历史上谱着的建康时代、六朝繁盛、明朝大都、太平天国京城等等俱往矣的千百年昌盛岁月，到陈独秀踏上此地之期已荡然无存。《马关条约》明定把素有“天堂”雅称的苏州和杭州列入日本开发的商埠，近在咫尺的南京已笼罩着太阳旗的阴影。朝廷腐败财政枯竭民生凋敝，往昔脂粉气香冽的秦淮河变臭……时年十八岁的陈独秀记住了这一切，待到在写上面这些话时，南京，确实成为繁荣的“首都”，答记者问中之言没错。妙在顺着上引回忆，笔锋一转就把读者的视线从现象引入本质：“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南京人的面容，还算是自由的，快活的，至少，人见着人，还不会相互疑心对方是扒手，或是暗探；这难道是物质文明和革命的罪恶吗？绝对不是，这是别有原因的。”“别有——什么——原因”？从社会进步的特定意义上，陈独秀一生追求的正是“物质文明”的合理分配和享用。应当承认这是可以普遍接受的超党派的社会运动，只不过由于追求中碰到了阻力和对抗，才迫使中共和陈独秀采取了暴力革命的理论 and 手段。陈独秀思想的成熟始于不久的拒俄运动而萌发在即将面临的这场灾难性的乡试，因而对南京留下深刻的印象。

江南贡院是仅次于北京顺天贡院的第二大试场，有考棚两万零四百余间，占地超过十万平方米，如果你去过南京当可知晓今夫子庙闹市区就是当年的贡院。考生从三层飞檐门楼的“明远楼”入场被圈在高八米的考棚里，四周还有岗楼卫兵日夜监察，活脱监狱一般。“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场考试了。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给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考试计三场每场三天，中间出放两次俾便考生休整并领第二次第三次考卷，真够陈氏兄弟苦的。

好，终于把这不安分的青年关进了“矮屋”。陈独秀在自传中详细地记录并回忆

了考棚和考情,但没有考科内容的记载,因为有一件事完全搅乱了他的考试情绪并影响了他半生的走向……

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正是这徐州大胖子的怪异行为彻底轰毁了安庆考生的情绪,思路奔突出贡院……

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呆看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抢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

言词之尖刻已远超于科举制度的批判而“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抓住了本质上升到了极顶。笔者不厌其烦地写从甲午战争到康梁变法期陈独秀从安庆院试到江南乡试的历史,就在于从中可以窥测陈独秀的独特的思想发展(或者说是成熟)的轨迹:他善于在那些人们见怪不怪的现象中诱发自己思考根本性质的内在的因而也是不易发现的问题。又,从方法论,合理的联想思维本身就具有统筹研究事物的辩证法素质,以之联想社会问题,就是唯物史观的契机,尽管距主动运用这一法这一观相去远甚,却不得不承认:时年十九岁的陈独秀对社会作综合的深层的研究能力已日臻成熟,观察事物的渗透力强,以至产生了跟上时代的联想,科场上“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斩钉截铁告别“举人、进士、状元郎”的封建士子陈腐道路,但能不能因此而就踏上“康党、乱党、共产党”的征程呢?笔者注意到在回忆思想变化时他用了“十几年”这一时限,也许正是探索陈独秀思想转型与时代同步前进的参照数。我们乘陈家秀才郎在考场上看得发呆之机,玩味一下。

从江南乡试那年起,把“十几年”定为十五年,是传主曾为之奋斗过的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开国之年;假如把“十几年”定为“十”的极限:十九年,恰好是创办《青年杂志》的年份。不难分析,陈独秀把甲午战争的思想震动、《时务报》的思想启蒙和科场奇遇触发的思想觉悟,圈定时限为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党”,后又经过辛亥革命成

为“乱党”，这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终结，是亦终结了陈独秀一生三次思想转变的第一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国历史以一九一五年九月《青年杂志》的出版和年底袁世凯称帝为标志。这两起性质截然不同的事件发生在同一年，实乃是潜在着历史必然性的偶然，前者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即将以超越辛亥革命的深度踏上改造社会革命的历程，但是它的成功与否，恰恰要取决于这个阶级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参与及其政党的政策和策略，关于这一点，颇有些类乎十九世纪连续爆发的几场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本传将在适当的历史阶段予以比较研究。至于说到袁世凯称帝，则标志着发生在武昌起义遗留下的废墟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将会碰上的首要敌人仍然是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期待成功的依旧是孙中山为之奋斗的主要目的：“耕者有其田”，于是又决定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农民参与革命的政治态度（顺便说一句，法国大革命时期农民的参与对资产阶级利用无产阶级并最终舍弃这个阶级，是一个重要的砝码），这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政治思想上的共识却也是导致分裂的根本所在。总而言之，中国到了一九一五年，人们不必目光远大，就可窥测到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即将来临，陈独秀正是催生新时代的革命群体中的排头兵，从此时起，他踏上了不久就被毛泽东颂之为“思想界的明星”^①，亦被田桐、岑西林、蔡元培、严范孙、章士钊、胡适等等党国显要和学者赞同的道路^②，走向他一生第二个思想时期的光辉征程——崇尚法国大革命为楷模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入“德”“赛”二先生，终于在以俄国十月革命为终极的本世纪第一次世界性的红色风暴席卷下，不仅使得已经被他以“甘冒全国学究之敌”的勇气与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联袂掀起的白话文，从纯然记录语言的文体革新，质变为思想解放运动，不失时机地把已经启动的文学革命引上政治轨道，迎来了中国第一次红色浪潮的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作为政党理论的传播机遇。

应当公正地指出，这段历史（一九一五——一九一九）连同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的突出贡献，是全体中国知识分子惨淡经营的硕果，其中包括在辛亥革命中成长的国民党人的努力，尤以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戴季陶等创办《星期评论》以及营救五四运

① 《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第79页。

② 田桐（1879—1930），湖北蕲春人，陈独秀留日和二次革命安徽讨袁时的同道，为孙中山事业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但不同意国共合作，亦不支持国共分裂时的“四一二”暴力。岑西林（1861—1933），广西西林人，清末邮传部长，此人系保守派，因只是自清末起一直反袁世凯而参加过护法运动但却排挤孙中山。在捕陈上持反对态度，认为连“市民一门共闻宿儒归隐汉唐宋明党祸最酷之日，然如此事亦未之前闻”，支持进步溢于言表，看来，人，确是复杂而不宜匆忙“定性”。严范孙（1860—1929），天津人，清末进士，提倡西学东渐，民国以后热衷教育事业，创办南开大学，呼吁释放陈独秀群体中著名教育家之一。

动不久被捕的陈独秀事件表现出的国民党人的爱国心和进取心。对于社会运动本身,正是这段思想运动鼓起了推翻北洋军阀的政治动员令,国共两党都培养并涌现出了一批日后建国立国的精英。

袁世凯的皇帝梦迅即破灭实已埋下北洋军阀毕命之期不远的火种,随之而来的是国共分裂和资产阶级新民主革命,农民的投入使中国共产党赢得胜利,却成了陈独秀悲剧的起点。若从现代文化思想发展的角度,“五四”传统依存而业绩至此告终,从此中国知识分子走向两极,所遗留下来的政治上思想上的分歧,至今影响着这个游移阶层的归宿和被认同。

陈独秀科场奇遇不仅使他浮想联翩,连审视历史的我们都随之超越时空局限与传主同步甚至比他想得更远更深。现在,再从综合探索拉回编年叙述,——总而言之,南京行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乃兄情绪低落,失望的是翘首以待佳音的母亲,还有更失望的一位,就是秀才郎的未婚妻高晓岚。不论怎么说,彻底摆脱“三场功名磨成鬼”的纠缠,正可顺着自己的思想开拓前进的路。

政治风云中的私生活

一九一八年六月三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北大教师“进德会”选出评议员和纠察员的消息。此会是由蔡元培倡议的志在鼓励并约束教师“遵纪守法”的组织。分三种会员,甲种取基本之戒:不嫖娼不赌博不纳妾;乙种除遵守甲种三戒,外加厘守教师清贫和清高的二戒:不当官不当国会议员;丙种等于过清教徒生活或当年盛极一时的“斯多噶主义”,除遵守甲乙五戒外,再加烟酒不沾而且不吃肉(护生)戒尽红尘乐事。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和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皆于是年初参加,经半年的筹划和审议,这次陈独秀被选为评议员,李大钊选为纠察员。进德会成立之后是否还有教师出入八大胡同烟花楼台或被“李纠察员”逮住而予以难堪,就不必也不能查证了。必须指明,这是个自觉参加因而也是严以自律的组织;此会没有任何社会政治色彩,纯系道德规范性质,比如曾被鲁迅怒斥为“奉卖过人肉”的刘师培^①也被纳会并被选为评议员,即此一例足以资证此会性质。

^① 刘师培(1884—1919),江苏仪征人。早年主笔《警钟日报》,参加光复会,是反清勇士之一,还曾译过《共产党宣言》并提倡无政府主义,1908年被端方收买竟成为清廷帮凶,鲁迅斥其卖人肉即指此事。辛亥革命后被列为民国敌人被通缉,后经陈独秀等念其曾有功于早期反清运动和深厚的国学根基,呈请总统宽恕,后入北大执教。惟政治上仍顽固而遭贬损。鲁迅、胡适等对其孜孜学问及成就则持佩服态度。鲁迅的话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1页致钱玄同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评议员陈独秀时年虚岁四十，拥两位妻子并有子女七个。当时，陈独秀与第二位妻子高君曼同居于北京，身边还带有前妻高晓岚所生的么儿松年和君曼的大女儿儿子美，生活甚是安定。看来还得赘一句：进德会颇开放而认可了陈独秀的家庭结构。下面就可以谈谈他的家庭结构和私生活了。

上世纪末的青年，从理论上说是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最后一批牺牲品，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解体和西风东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替代了男女之间本该由自由恋爱完成的终身大事。然而从实际而言，他们仍然是封建婚姻的——最后一代——牺牲品，陈独秀就逃不脱这样的命运，一如鲁迅遵寡母之命娶朱安为妻相仿，说是“母亲给我的礼物”，结婚乃孝道而已。后来，这种婚姻受二十世纪初西潮冲击而破裂者比比皆是，当然也有封建包办而白头偕老的，如李大钊，如胡适。在自由恋爱作为反封建争取人权的社會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后，抛弃“礼物”再自己选择佳偶是不足为奇的时尚，陈独秀的自由选择和家庭结构引起非议乃至遭到以继父衍庶为首的陈家大族的强烈责难，是因了前后两位夫人出自同父异母的姐妹道。

关于陈独秀与高晓岚结婚之期，历来都是根据陈松年按照大哥延年的生年推前一年，定为乡试不第的一八九七年，是年冬陈独秀结婚。但是为什么要推测，为什么不引陈独秀自己的话予以资证呢？《实庵自传》写到南京乡试赁屋旅次时有一段写他们住房没有茅厕却又用不惯马桶，只得在住房两侧的空地上拉野屎的描写，说到有几个平日口不离礼义廉耻正心修身的荒唐鬼还“时到门前探望，远远发见有年轻的妇女姗姗而来，他便扯下裤子蹲下去解大手，好像急于献宝似的”，陈独秀特瞧不起这种“臭”到了家的伪善，那他自己怎么办，只得挨到黑夜，“因此有时踏了一脚屎回来，已经气闷，还要受别人的笑骂，骂我假正经”，接着，陈独秀说出了一段直到今天还没有被陈独秀研究者重视然而却既有史乘价值又显示个性的话：

“假正经”这句话，骂得我也许对，也许不对，我那时不但已解人事，而且自戕得很厉害，如果有机会和女人睡觉，大约不会推辞，可是像那样冒冒失失的对一个陌生的女子当街献宝，我总认为是太无聊了。

被揶揄为“假正经”，涉及品德秉性，理当正言反驳，但因此而坦率到说出自己当时性饥渴、不拒与女人睡觉，实在出格到令人瞠目，不禁想说几句题外话：这种通体透亮的性格和脾气，如若用在政治交锋上，是否会产生有碍韬略运筹之虞，真为他日后处世担三分忧愁。这段引文的史乘意义是证明乡试前陈独秀一直独善其身，把男女之情逼闷在内心；既然大儿延年生于一八九八年，那么陈高结婚的日期肯定是在乡试不第回家后的是年秋冬季节的某个黄道吉日。

高晓岚，小名大众，长陈独秀三岁。她虽是荣至黄马褂披身、衔高至将军的安庆统领高登科的长女，不幸由于幼年丧母而受继母亓（音 Qí）氏虐待，不仅生活与小姐身份不配，都无缘受到起码的教育，待到了同父异母生了个女儿后竟贬作丫环使唤。为摆脱家庭尴尬，高登科这个将军也无法可施，只得将晓岚带在身边。这门文官之（庶）子配武将之女的婚姻，从高晓岚方面，有了个秀才郎夫君的家，真是苦尽甜来，然而从陈独秀方面，这门当户对的婚姻不啻人生悲剧，只是徒增了他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信念，显然也埋下了高晓岚的幸福家庭之梦终将破灭的种子，不必责备血性男儿处在西潮东渐初期的无情和对抗。但这毫无爱情的婚姻却给陈独秀带来了一个“多子多福”的家庭：结婚次年，延年出生；世纪末那年长女玉莹出世；一九〇二年，长大后以乔年的名字写在党史上的遐年诞生；隔了八年之久于辛亥革命前一年松年降世，正是他一直跟随着陈独秀历尽磨难，在江津先是协助年迈体弱的父亲和继母潘氏送终陈独秀的养母衍庶的夫人陈谢氏，后是埋葬父亲送走继母，后又于一九四七年夏将乃父棺木送安庆与亲娘高晓岚合葬；由于这老儿子长寿，逃过了“文革”大祸而见政治昌明，参与筹筑新墓再安葬双亲，见到了中共落实政策的措施也波及乃父，看见了“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因为他“创造了党”等等宽心话。这大概是陈独秀的后代中最幸运的一个，“多子——未必——多福”啊！

现在可以查明的陈独秀写作一生的第一篇系列论文《恶俗篇》的前三篇短论都题作《婚姻》，开宗明义的目的是要从专制婚姻捆绑死男女真情的热点，煽起反对封建制度的青年心：“夫妇乃人伦之首，为世间第一件要紧的勾当。若无夫妇，便没世界。……你道中国人婚姻的坏处是什么呢？就是不合情理四个大字。……不由二人心服情愿，要由旁人替他作主，强逼成婚，这不是大大的不合情理吗？”《婚姻》篇不仅呼吁男女恋爱结婚自由，这在本世纪初虽然仍不时地发生在族堂宗祠当众捆打自由恋爱者，但若不是死顽固，尚可默认乃至宽容既成事实。陈独秀的勇敢还在于文中提出“退婚”自由这一条：“世界各国的法律，男女不合，都可以禀官退婚”。这在一九〇四年上简直惊世骇俗，非咒其大辟则无以解气了。这大概是陈独秀十年后创办《青年杂志》激发青年心的滥觞。

说到做到言行一致是陈独秀一生始终如一的品德，不合理就得打碎它以争取合理，于是就苦了高晓岚，她成了打碎不合理婚姻的牺牲品。

结婚第二年，即高晓岚怀孕大儿子的一八九八年，陈独秀就离家去杭州入求是书院就读新学，正当他在学习英文法文算学格致舆地等接触西洋文明的必备课业时，发生了戊戌政变，再也坐不稳课桌的陈独秀投入了反清变法活动，也感受到了革命流血的残酷，准备了三年之久的变法维新以那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开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再登龙座“训政”，把吓破了胆的光绪软禁入中南海孤

岛瀛台,再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变法中坚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和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捉拿并迅即于二十八日下午绑赴菜市口杀头示众,合计共一百一十八天,反革命的残暴的速度真值得那些慢条斯理的造反秀才们找找教训的。教训的结果自然是革命者内部的分裂,康有为梁启超走向保皇,梁启超逃到日本办《清议报》鼓吹保皇立宪,继续捧那个扶不起来的天子光绪,康有为则远行到加拿大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据好事者查考保皇会在南北中美洲日本南洋等地建立十一个总会合一百又三个支会,这就是十八世纪法国“保皇党”在中国借尸还魂。革命让位给了孙中山、宋教仁、章太炎、邹容、徐锡麟、秋瑾、蔡元培、黄兴、陈天华等等新潮人物,其中有不少武将,至少他们全都懂得“武装推翻”的本意,当时连文质彬彬的蔡元培都热衷于研制炸药,并且传入了雅好暗杀活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其英雄们的无畏精神,更激进的志士已开始行动,这就是陈独秀吟唱“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的时代风潮写照。“戊戌六君子”的血吓退了一些反清志士却扑不灭反清怒火,这就是鲁迅所说的“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没有的”。陈独秀在杭州投入斗争洪流,但很快就被觉察遭搜捕而逃往东北继父衍庶门下,从此开始了他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生活。到辛亥革命前一年么儿松年出生,其间数度回家在与当时住在大南门培德巷生活已经获得改善的夫人生活的同时,却爱上了晓岚的妹妹君曼,她是感受西潮的新式女性,较陈独秀小十五岁,有文墨。辛亥革命成功,陈独秀一度当上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那时安徽省会设在安庆,陈独秀与君曼同居于宣家花园都督府。其实早在二年前陈独秀在致苏曼殊的信中就透露了与君曼的关系:“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①所说的“佳人”就是高君曼,这是一九一一年前后的事,但在安庆就不同了,培德巷一个家高晓岚侍候着四五个孩子^②,真是含辛茹苦,忍气吞声地看着宣家花园中自己的夫君与自己的妹妹过着卿卿我我又热热闹闹的生活。既是家庭悲剧又是社会悲剧。鲁迅元配夫人朱安守寡侍奉鲁母长达三十余年;郭沫若的发妻孤苦伶仃在乐山故乡一直活到七十年代;当时在陆军学堂毕业的郁养吾的弟弟郁达夫的第一夫人孙荃在富阳守家看孩子亦超过半个世纪……中国封建道德对于女姓的“贞节操守”远较西方国家残酷不知多少倍,甚至连《圣经》时代的封建加宗教约束都比中国宗法制开明多少倍,《新约》中就

^① 柳亚子编《曼殊全集》(5册,北新书局1929年4月出齐)第四册第122页。据此信中有“公其有诗贺我乎?”句,看来,陈独秀与高君曼同居是很高兴满意的,才有雅兴向苏曼殊索诗。

^② 说“四五个孩子”是因乔年和松年之间还曾生过一个女孩,生于何年不详。“早殇”于何年亦不详。据松年回忆,陈氏宗谱直“到我的儿侄一辈时”女儿才排入宗谱。大女儿玉莹之所以知死生是因为她于1928年患病去世于上海宝隆医院,其时陈独秀和松年均在上海,故有记忆。

有圣徒立言道：“我对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①多么开明圆通。中国妇女却凄惨度过了数千年缓慢爬行的封建制度，正期待着孙中山们尤其是陈独秀们来解放她们。

陈独秀与高君曼同居后于一九一二年生女儿子美。第二年，对高君曼对陈独秀尤其对他的前妻儿老少及陈家大族都是灾难的一年。先提示一下灾难的历史背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义终于推翻了中国的封建王朝制度，孙中山们的事业结束但不能算是成功，是为辛亥革命。次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其实一九一二年的中华民国成立并不证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实在说来直到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逝世，辛亥革命的目的也未能达到，不然他也不会会在遗嘱中忧心忡忡地要汪精卫写上“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就民国元年形势，至少有两大问题没有解决，一是清国末代皇帝仍偏安皇宫隆宗门东华门一隅，不仅“宣统”年号不变，而且“御前会议”照开，还不时发布“上谕”。爱新觉罗·溥仪仍被一帮极端顽固的皇亲国戚太监宫女簇拥着窥测方向，时刻准备再上金銮宝殿；再就是民国内部分裂成南北两派，北派袁世凯凭手中万千兵马辎重，笃笃定定坐镇北京不仅候着总统的位置而且还在远谋皇帝的宝座。要推翻原来中国的封建制度社会实在难上难，至于包括农村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一整套压迫人的纲纪伦常和宗社族权的彻底铲除，孙中山及其伙伴们只开启了解决这类社会问题的门，登堂入室彻底清扫铲除这座国门内的封建残余污泥浊水，正有待陈独秀们踏上政治舞台了。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七日清帝正式宣布退位，溥仪这个刚脱开裆裤的小毛孩则等待着王公大臣们继续灌输帝王观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几乎与溥仪退位的同时，孙中山也辞退，实质上却是被迫把大总统一职交给了袁世凯，时为二月二十三日。三月十日袁世凯大总统粉墨登场向清宫登殿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孙中山先生是个具有非凡决策头脑的革命家，后来他在充分研究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和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给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带来了新的生命力时，就颇感慨地说：“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金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②当然此教训总结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考虑是否与陈独秀联手北伐的时期。在一九一二年的当时已经失去政治地位和军权的孙中山于八月十四日离开上海经天津小作逗留于二十四日抵达北京，第二天，他和他的革命战友党国元老们在京西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把同盟会正式改

① 《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7章。

② 《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35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第1版。

建为国民党的成立大会。这是失去军政大权的辛亥革命领袖“解职不是不理事”的第一个政治姿态。孙中山一反热衷于开创铁路筹办实业的计划，是想接受宋教仁等建立政党内阁争取国会多数来夺取已经失去的中华民国的政见。

咬人的狗从来不叫。在中国，“枪杆子里出政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刀马步骑战争史。当天真的革命者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暗杀行为是无补于革命之时，反革命可是深懂阴谋学派的暗杀理论与行动有时却非常奏效，还不等孙中山宋教仁们动用政党内阁机制，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被袁世凯爪牙暗杀在正欲登车北上的上海火车站，接着是通缉孙中山。这时孙中山才开始旷日持久的讨袁和北伐大业。七月，坐镇上海的孙中山与被袁世凯免去安徽省督的柏文蔚密商讨袁计划，被袁世凯内阁总理段祺瑞批准辞职而欲一心扑向教育与舆论革命并已和亚东图书馆着手出版事业的陈独秀，应柏文蔚之请复任都督府秘书长。从上海赶赴安庆，协助柏文蔚筹划讨袁事宜，起草了言词尖刻的安徽省独立宣言：“临时总统袁世凯凶残狡诈，帝制自为，戕贼勋良，灭绝人性，恶贯满盈……”柏总司令尚来不及收拾“恶贯满盈”的袁世凯，就被皖省代理都督胡高泰逐出安徽，悻悻回南京作寓公。但他的邻居应召而去的陈独秀，却在逃到芜湖时被驻军龚振鹏捕获，这是八月二十七日。第二天，前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安武将军”倪嗣冲奉袁命从河南带兵进攻安徽于是日攻克安庆被委任为皖省都督。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至少在安徽迅即失败。九月一日杀人魔王张勋率部攻陷南京并放纵其部属在市内奸淫烧杀，幸亏陈独秀赴任前把怀着遐和（哲民）的高君曼送往上海居住并委托亚东图书馆照料生活，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也。其实陈独秀安庆出逃本可乘船直下上海，其所以逃亡时选择芜湖中转，也许是想顺便为接受他的建议刚从芜湖迁往上海的亚东图书馆料理些善后事宜，根本原因可能是不甘于皖省讨袁失败而指望龚振鹏！龚本是柏文蔚部的旅长，据高语罕回忆：“这位军人本是和柏公同立在反袁旗帜之下的，不知因何事与柏不谐，而迁怒于先生”^①，不明底细的陈独秀正好撞在枪口上！这是陈独秀一生第一次被捕。“已经出了布告，要枪决先生，先生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吧！’”视死如归的精神令人敬佩。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迅即传遍芜湖，刘叔雅、范鸿偃、张子刚三位安徽先进闻讯赶来求情，加上龚振鹏虽因私利私怨与柏文蔚反目，毕竟不是袁贼附逆，遂放了陈独秀。史料记载也确是如此，倪嗣冲坐稳皖都督位置后发的通缉令上陈独秀名列榜首，他不仅被目为柏文蔚的竟然也是“龚逆振鹏死党，蓄之谋叛之犯”^②，真是大水冲跑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中国有很

① 高语罕《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

② 《陆军上将銜陆军中将安徽都督民政长勋二位倪令》。

多旧式军人政治素质低,头脑简单,常为一己私利而损害革命,陈独秀应从中得出教训,视死如归固然是革命者最高品德,但不善保护自己的单纯不怕死,作为领袖人物,这种不无三分鲁莽的无畏送死却也是英雄主义和刚烈性格的负效应。我们做这种几乎于心理分析的推测,也许会有助于探索陈独秀五次被捕险象环生的一生与中国革命中敌友我三方往往被扭结在一起的那种盘根错节而又扑朔迷离的历史大背景。龚振鹏的突然反目,朋友变为敌人;捉拿陈独秀的通缉令又把他目为龚的“死党”,正是这种敌我友分合无定的关系使陈独秀险些丧命。事情至此还没完。十月二十一日,抓不到陈独秀的倪嗣冲派兵查抄他的安庆老家。抄的是继父衍庶的家,原因是抓住一直住在祖父家受教育的延年和乔年,作为人质胁迫陈独秀归案或断其后。当时延年十五岁,乔年十二岁,他们听到兵丁破门而入的不祥之声,立即从后院翻墙逃走,跑到乡下远房叔伯家躲藏,“他家被一抄干净,把昔凡公收藏的字画一抢而空,统领手下的人,还到处捉拿陈独秀的两个儿子”^①。高晓岚闻讯抱了才两周岁的松年和女儿玉莹亦离开安庆逃到乡下与两个儿子团聚,吓得七魂出窍。这一年,陈家衍字庆字辈两代人的经济支柱衍庶已于五月十日去世,再加上这位弃官下海为商的老人生前最后一笔大投资:派员赴东北收购大豆趸批给英国商人遭违约欺诈而倾家荡产^②。至此,江州义门陈氏章旭一支只剩下陈独秀忠烈一门。

正是这灰色的一九一三年,断了陈独秀回安庆之路并被迫考虑将儿子接出来以免遭不测,遂于是年冬和次年初将三个儿子先后接出。从此,高晓岚与大女儿玉莹一直住在安庆。一九二八年玉莹去世,两年后高晓岚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四岁,结束了她那含辛茹苦的一生。陈独秀早年撰文呼吁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在例举的多种不合理的婚姻时说:“一位才貌双全的才子,配了一位一字不识的蠢妇……这样的男子,配了这样的女人,不能退婚再娶,也算是终身恨事了。”^③引在这里相当扎眼,算是为埋葬在封建婚姻废墟上的将门之女出了一口气。

陈独秀少小时特别怨恨严酷的祖父,但他对子女亦无情到令家人朋友都难以谅解的程度,若细细分析起来倒是与祖父对孙辈的森严家规有质的区别,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就是当时崇尚的军国民教育,其楷模则来自古希腊文明精粹之一的斯巴达城

① 万峰岩《陈遐文谈陈独秀》。

② 1909年陈昔凡通过辽东任职时的同僚、时任浙江巡抚的增子固合伙在杭州创办益大公司,通过一刘姓翻译同上海英商怡德洋行签订向英方倾销东北大豆,由于英商违约私自向东北收购大豆,豆价因此暴涨,昔凡据此向英商提出违约诉讼,由于一,刘译员串通英商欺骗昔凡;二,恰遇辛亥革命合伙人浙江巡抚增子固倒台失去保护;三,英方却通过腐败的外交部赢得胜诉等原因,陈昔凡破产,详见《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

③ 《恶俗篇》。

邦的尚武精神，即通过严格的体能锻炼和以爱国主义为中心的智能教育，为积弱的中国培养青年人的自然适应力和斗争的牺牲的精神。据曾同延年乔年一起在上海“同学法文于法国巡捕房”的潘赞化回忆，“他俩兄弟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食则侷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衾，夏不张盖，日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悴，人多惜之，而怪独秀之忍也”^①。铁石心肠的陈独秀因常不在上海，即在亦孰视无睹，就难为了小姨暨继母的高君曼。潘赞化回忆道：“君曼时时泣诉于余曰：‘独秀性情与人不同，为延年兄弟不在家住食，我也苦说数次，他总不以为然，说姑息养奸，不可！不可！……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而不知者谁谅我？’”她托潘赞化向陈说情，“而独秀以为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陈独秀如此绝情倒也迫使两个孩子提高了生存适应力和顽强的进取心。当然孩子们反过来也冷淡了对他的亲情，有被潘赞化和包惠僧这二位不同经历不同政见的老人共同回忆过的一件事，颇能说明陈氏父子间的奇特感情，“仲甫先生任北大中国文学系学长时，旧学新知，为士林所推重，延年视之则漠然，常对别人说：‘吾父亦不过是新官僚旧学者而已，读书虽多，而不能为天地立心，不能为万民立命，与文盲何异！’因此师友之间多以延年为狂妄，并有指责延年为一无父无君之狂徒。”^②对乃父的评说显然错了，但同样的绝情使我们顿悟这位有抱负的青年人身上流的正是乃父的热血，继承了刚烈的性格。剔除父子情深的传统观念，也许正体现了勇于蔑视一切权威的“五四”精神。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迷信吗？陈独秀在灰色的一九一三年躲过了死神的追捕回到上海，唯一可心的是君曼为他生了个儿子遐和也叫鹤年或和年，后来他以陈哲民的名姓隐居香港于二〇〇一年去世，他的姐姐即陈独秀最小的女儿子美，如今孤子一身沦落纽约。^③

据陈松年回忆，陈独秀自芜湖回上海后为高君曼子女的生活安定和安全计，“在南京东厂街（秀山公园旁边）盖了两座草屋，大约十余间，置地数十亩，作为高君曼和二弟妹的居住点”^④，但高君曼并未即时去南京，一直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渔阳里二号以及别地，直到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才携子女搬往南京草屋并长逝于此，时为一九三一年。高君曼长期受肺病折磨，靠陈独秀托亚东图书馆从《独秀文存》、

① 《我所知道的安庆两小英雄故事略述》。

② 包惠僧《回忆陈延年烈士》。

③ 陈子美文革运动中因不忍受残酷折磨，于1970年身绑海子角，漂浮洋面，潜逃到香港打工，1975年迁往美国，据美国《环球时报》1997年9月4日所载吴琳琳的报导。本书转引自《陈独秀研究动态》1997年10月第12期。

④ 《再访陈独秀谈话记录》。

《字义类例》、《英文教科书》等书的稿酬和版税中每月抽几十元生活费养育全家已属困难，何来的余钱补养和治疗这富贵病。当时陷入因“五卅”运动而急转直下的北伐战争和接踵而至的中山舰事件等等复杂又棘手的政治困境中的陈独秀，亦无心照料南京的家，况且其时他已另有新欢，与“以至亲密关系，进而发生爱情”的高君曼逐渐疏远。高君曼在南京长达五六年的孤苦伶仃的生活，虽然鲜为人知，但也不是无可稽查而湮没尘世，我们从陈公博的《我与共产党》的长篇回忆中录摘出一段，公诸读者——

自宁汉合作之后，我刚由海外归来，参加南京政府，以后国共已由党的斗争入于军事斗争，我个人和共产党直接上无甚所述。我到南京之后知道陈仲甫夫人高君曼女士贫病交困，我到过他家中。她太凄惨了，住在城南一间草屋，卧病在床，家具破碎不全，絮被也支离散烂。我真为之凄然，只有尽我所能的接济她，君曼夫人因病久失医，终于逝世，我又囑仲甫的朋友潘先生为之营葬，草草尽一点朋友之责。^①

陈公博以中共一大代表始而从政，却终于汪精卫南京“和平”政府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处决。但我们不能因人废文，这段回忆不仅描述可信，感情真挚，且有史料价值，比如由潘赞化料理高君曼的身后，就出诸这篇回忆，因为连经办人潘赞化都只字未提。陈公博在陈独秀被捕后还去探监：“我见他时，真是头发秃白，形容憔悴，仲甫先生本来有些秃顶的，现在年力渐衰，更秃白可怕，我自然不愿再提往事，只是关心他的生活如何。仲甫又表示感谢我照顾君曼夫人，我只有唯唯，心内有说不出的凄怆。”半个世纪后重读此文，如果能有鲁迅翁“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雅量，笔者以为陈公博当年探望并周济高君曼，探监陈独秀等事；事后又感情至深地记录下来，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都不失君子风度。政治人物的一切全都具有政治色彩，一定要这么说亦自无不可，写陈独秀的私生活如同看拿破仑传相仿，在频繁的戎马倥偬中的罗曼蒂克亦蒙上战云密布的沉重帷幔，不得轻松愉悦之情。

一九二五年，无论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对社会革命或国共合作，都是沉重的一年。从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卅”惨案，廖仲恺被暗杀，到西山会议的召开和“戴季陶主义”出台，给

^① 转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79年4月编)第2册第252页，下引同。据陈公博这段回忆，以及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等人回忆，陈松年说陈独秀为高君曼在南京建屋十余间置地数十亩，似不确。如在三十年代的南京市里真有房地产，高君曼怎么能贫病交加而去世；甚至连善后都得潘赞化资助协理呢？又据知情人口碑，其时高君曼的母亲就住在南京(亦可能住近地扬州)，亦因贫困或政治原因没有参与料理亲生女儿的葬仪，但却照顾了陈独秀和高君曼所生的一子一女的生活并扶养成人。

是年重振军威的北伐大业创开了一道灰色的裂痕。国民党决定明年召开二大，共产党方面则于十月召开四届中央执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双方都在研究国民革命对策，正在这关键时刻，陈独秀突然失踪！这给在沉重中进入更加沉重的一九二六年的中共，无疑是个尤其沉重的打击。被强调群众运动而扭曲了的红色革命，虽然不重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群龙无首”的局面确也给决策造成严重困难。事情大体如下，一九二五年底，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秘书处的任作民发现多时未见陈独秀来视事，日子一久他就恐慌起来。向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等执委报告了陈独秀失踪的消息，于是大家都惊恐起来，当时从广州到上海的陈延年跑去找汪孟邹，因为陈独秀常去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那儿委办些庶务，取点稿酬或与南京偶尔来沪的高君曼会会面。怎奈连汪孟邹亦说久不见陈独秀，正在犯愁哩！于是党中央同志们“设想军阀和帝国主义秘密逮捕了陈独秀，秘密处死了他”。中共中央还委派浙江省委请与国民政府江苏省长陈陶遗有亲戚关系的高尔柏去松江找这位省长探听消息，但也探不到陈独秀的风声。“一天，在工人部闲谈，张国焘说，老头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他差不多要哭出来。我们都以为陈独秀已经死了。”正是这个“噩耗”，以及左右分裂愈益严重的国共两党关系等原因，促使中央迅即再集中北京召开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这是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参加者有李大钊、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彭述之、谭平山、罗亦农、赵世炎、任弼时，以及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其时延年是中共粤区书记、乔年是北方区执委会组织部部长）等共十二人。正当会议因总书记失踪或被处决落入沉痛之中，陈独秀突然出现，跑到了当时设在四川北路广东街（今福德路）正兴里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又惊又恨又喜的任作民立即拍电报到北京，向特别会议报告陈独秀不找自到的消息。事后大家难免批评甚至责怪一阵陈独秀，但当知道陈独秀为何“失踪”时，真啼笑皆非，原来陈独秀在高君曼定居南京后另有新欢。谁也不知这个小家设在上海何地，连前后几任秘书薛世纶、任作民、王若飞都不知。二十多年来一直关心并代处理家务的汪孟邹亦不知，至于新欢施芝英其人其名其事直到笔者撰写这部传记前不久才调查清楚，可谓“独家新闻”。施芝英当时是虹口区四川北路某医院的医生，陈独秀因看病而与她认识并同居，不久陈独秀胃病发作住院，得到她的悉心照顾。本以为住院数天即可出院“上班”，其结果是因病重不能出院而演成“总书记失踪”的闹剧。陈独秀与施芝英的关系维持到一九二七年春，当他孤身一人搬到设在四川北路横浜桥南安慎坊中共中央宣传部住下，大家才悟出这个谁也不知的小家庭亦破裂了。^①

^① 有关陈独秀“失踪”与施芝英的短暂同居，是郑超麟先生向我提供的两篇文字资料和一封长信。超麟先生向笔者特别提出由于施芝英有个不是陈与施生的女儿在陈出狱到武汉暂居时找过陈，“文革”后这个不是陈的女儿的后代又到上海某机关要求确认他们是陈独秀的儿孙辈。为此，某机关向当今唯一见证人郑超麟证实此事，答案就是本文所引梗概。陈与施并无子女，郑超麟回忆此事共写了两篇文章，其中《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授权笔者可以引用。又，文中任作民是任弼时的堂弟。

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中共党史上确实是个“特别”会议，曾提出了包括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北京或广州等问题多项，因陈独秀失踪乃虚惊一场，因此在最重要而又得立即决策的《中央地址问题》中，单列一条：“此项意见须征独秀最后意见方始确定”^①。看来，陈独秀的这次荒唐的罗曼史，党中央还是持原谅并宽容的态度，也许李大钊“纠察员”菩萨心肠之故吧，我们也就不必在此说三道四了。也许是普列汉诺夫的个人（权威）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救了陈独秀一驾。使人纳闷的是，时年四十七岁、脑袋拔顶、被胃病折磨得形容枯槁以至于毫无世俗意象上的男性魅力的陈独秀，竟然能使白领阶层中的女人垂青。绕开这个有趣的问题继续往下叙述，更使人纳闷的事还在后面哩。

与陈独秀不无关系的郁达夫在一九三二年为出版自己的短篇小说集作序时曾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微雪的早晨》，多少也带有一点社会主义色彩。”^②这三个短篇小说有没有社会主义色彩，是文学史论家的事，我们研究陈独秀，却对《春风沉醉的晚上》故事本身发生兴趣，说的是一个“在外国学堂里曾经念过八年书”的知识分子失业落魄至于住入工人区某小窄房的二楼，同楼住着一个心地善良的单身女工，朝夕相处发生了爱情。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郁达夫把故事发生地点安排在邓脱路（今丹徒路），而陈独秀一九三〇年从老靶子路（今武进路）搬迁的新居亦是邓脱路，而同楼住的亦是一个单身女工。如若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不是写于一九二三年而是一九三〇年之后，有考据癖的人会怀疑起小说中的落魄读书人也许就是化名南京“李先生”的陈独秀，而女主角陈二妹则活脱是陈独秀一生最后的家庭归宿潘兰珍了。郁达夫不是刘伯温而是大作家，于是我们只能说他的这篇自以为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才子佳人小说确实具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表现生活的准确性，不然怎么能和陈独秀与潘兰珍的结合何其相似乃尔！潘兰珍的身世亦与郁达夫笔下的陈二妹有相似之处，她是南通县乡下人，四岁就随家逃荒到上海，十三岁就背起沉重的生活包袱去纱厂当童工。^③好容易活到及笄之年即遭流氓欺骗失身，同居

① 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5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1991年2月第3次印刷。中共中央的地址，因随即发生了“三二〇”中山舰事件，未移迁。

② 《达夫自选集·自序》，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3月第1版。

③ 所有回忆都说潘兰珍是纱厂工人，笔者以为有误：一，潘兰珍的父亲是烟厂工人，可能随父入厂当童工；二，上海的纱厂及其工人区在沪西南地区，而位于沪东北的邓脱路恰恰是卷烟厂工人聚居地，因为英美烟草公司就在对江浦东和韬朋路（今通北路），都邻近邓脱路，郁达夫把陈二妹安排住在邓脱路是生活真实，因为她是烟厂女工；三，陈独秀被捕后曾同友人说过，潘兰珍可以回烟厂自食其力。以是，考定潘兰珍是烟厂工人要比说她是纱厂工人准确；四，据黄永盛、王亚非调查报告《飘零枝叶度残年——陈独秀在江津》中查明，潘兰珍，亦称丽珍，又名若兰、云仙，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载上海《党史文汇》1986年第4期。

后又被抛弃。总而言之，当年已经五十二岁的“李先生”与潘兰珍由邻居而同居，时年仅二十三岁的她已经尝够一个中国女性工人所可能遭受到的全部苦难和屈辱。她早出晚归间歇见到过着隐居生活的可怜兮兮的老人，不说阶级感情也可说是同情心油然而生。五十二比二十三，从世俗的眼光，陈独秀够荒唐的，但设身处地为他想想，一九三〇年和次年，高氏姐妹相继去世，活过半百的孤独老人再找个伴侣，应当视作没有多少罗曼蒂克可言的理性选择。潘兰珍找到“李先生”从精神上确立了人的尊严，但她并不知“李先生”乃中共领袖陈独秀。同居时，陈独秀已被中共开除党籍，却又走上了运用托洛茨基理论以实践中国革命的孤单的羊肠小道，注定了他要遭到来自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方面的政治压力，也注定了潘兰珍将忍受别样的苦难，果真如此，同居不到两年，陈独秀被捕，潘兰珍承担起了狱里狱外两副沉重的生活担子，一挑就是五年，出狱后辗转到江津定居，在捉襟见肘的贫困生活中送终陈独秀。嗣后在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强活了七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个月的月底——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在上海浦东老家死于癌症。年仅四十一岁。幸耶不幸？如果考虑到她曾是“托派头子”的妻子，如若继续活下去是逃不脱一九五二年的托派大兜捕的，况且接踵而来的制裁运动有的是。

我们是采取综述的方法一揽子写清陈独秀的私生活，往后不大有机会写将门高氏姐妹了，但潘兰珍，还是会写到的。

也许政治人物的一切确实都具政治色彩，说抛弃原配夫人是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说再找新女性是西潮东渐的恋爱自由，既可原谅其“重婚”的挟嫌，也可宽容其“失踪”……以至使我们在综述传主私生活时，犬牙交错地写了他的政治生涯和思想状况，为往后叙述作了不少提示设下了一些铺垫，这只是写作方法的选择，比如拿破仑的一生够浪漫，他的私生活都可写成大书，且已出版很多，然而多数传记作家还是把他的私生活与从“将军公民”到终身皇帝的大起大落的经历扭在一起写，这里除了方法的探讨，当然也不是随便提到拿破仑。据笔者的比较，陈独秀一生大起大落的政治风云——是起抑是落，都对推进社会革命对国际共运对国共两党诸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或留下的遗产，都像拿破仑之于法国；还有，陈独秀的鲜明的爱憎，宁折不弯的倔劲，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追求新潮的执著，也使人想起拿破仑；顺便说一句，这正是女人心眼里满溢阳刚之气的男子汉！

第二章 投身现代革命

(一八九八—一九一九)

第一部军事著作

扬子江为东半球最大之水道，绵亘五省，便于商运。东京以后，兵争重地，洎咸同间，粤逆蜂生，蠹流江表，曾胡诸公初出山时，即以通靖长江为平荡东南之重计，卒不越其算中。近时敌斲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覬觐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

以上引自署名“怀宁陈乾生众甫”的《扬子江形势论略》^①，这是目前发现的陈独秀第一篇著作，文末自述作于光绪丁酉冬，即乡试不第的那年冬天。令人感到兴趣乃至吃惊的是通篇六千九百四十八字从长江源头一直写到上海吴淞口入海，又从历史上围绕着长江所发生的战争和江防措施，一直写到用上世纪末欧西最精锐的火器和防御设施保卫长江的全线安全通畅和两岸民生太平；历史与现实联系之紧密，进攻与防守之间的军事辩证，以及用“西法”考察全江重镇的地形地貌、水文和船运和攻防诸方面，都使人难以相信这出于仅只到过一次南京的十八岁小伙子之笔，我们随便引点儿精彩的片断，看看乡试场上碰了一鼻子灰的热血青年内心中升起的那股子保卫社稷的烈火和智慧。

陈独秀在文中从全江流至湖南长寿县向东流经夔州与湖北宜昌交界之巫峡段，以为此地“千崖悬壁，无路可缘，江如悬瀑，迥异常流”，可取其“一人守御，万夫莫战”之势。自荆州以下直到东流入海应予以相应的防守设备和兵力，而重点江防计划则集中在武汉三镇下游经江西而安徽而江苏到上海、崇明而吴淞口出海。这样来研究

^① 引自《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1页，三联书店1984年6月第1版。本章所引陈独秀文章如只注明页码而不注出处，皆引自此书。

长江防守既符合历史上对这条江的政治的经济的要求,更切合处在内部骚扰(指农民起义)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殖民政策从沿海顺长江向内陆扩展的急迫防务,因此,陈独秀对防御设计的体系也是近代化的。比如他在叙述自九江到安庆又从安庆和芜湖的防御对保卫长江重地南京的重大战略意义时,指出:“……芜湖距金陵一百七十三里又三分之一里,县城距沿江五里,南有青弋,直贯皖南,西有裕溪,可达皖北。故先主谓孙权曰:江东形势,先有建业,次有芜湖,盖亦滨江要冲也……历代恃为重镇。”又说到明代创业时太祖及将军们力克此段江面上的采石和牛渚诸要冲使南京垂手而得。据此陈独秀特别指出:“此山炮台,须设德国之起落旋转钢甲圆筒炮架,以便兼顾上下游。”还应“屯兵牛渚,亦可以馆和州之门户诸险,乃上而安庆、下而金陵之关键也”。这里可以看到陈独秀在注意欧洲的军事工业,并已达到相当熟悉的程度。另一处在讲到江口炮台建造材料时强调要用“德国格鲁森厂所制硬铁”铸造才能抵挡敌船上的重炮轰击。《扬子江形势论略》不仅注重炮台的坚固程度,这大概并不特别超越那些守军将领的知识范围,使我们感到陈独秀的出众之处是在于他具有把万里长江作为一个——当然从战略上来说是可分割的——整体防御思想,而且把这个思想贯彻在具体的战术技术设计上,例如他在谈论江淮地区防御设施时,考虑到以金陵为中轴保卫圈内安庆、芜湖、池州,江北的重镇扬州、浦口,江南要地镇江以及常州(瓜州渡)直至金山短短的水系密集着如此多的而又是富庶的城镇的复杂的联防,如若用“烽火台”的脑袋岂非坏哉。这位业余江防小专家真够新潮的,他指出应“设德律风、电灯,使各炮台消息全通,联成首尾之势”,只有达到用电话和探照灯灯语连网协同指挥作战,“金陵之门户始固”。长江江苏段布防的严密难攻直接影响列强向江南最富庶的三角洲实施经济掠夺的行动,因为当时尚无铁路公路向内陆延伸,长江是中国的命脉当然也就成了帝国主义侵吞的佳肴。

陈独秀撰写《扬子江形势论略》的一八九七年,随着鸦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接踵而来的不平等条约,长江由东向西上溯的重要口岸业已被英美法俄德,尤其是日本瓜分殆尽。加上“俄营蒙满,法伺黔滇”,还有什么“国朝”可言!然而囿于社会思潮和时局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文的思变法维新,武的欲保卫国土,其最终目的仍在于安内攘外以维持清朝政统,康有为梁启超如此,陈独秀亦复如此。恩格斯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看到“中国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预测出“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①,现在,可以令人遗憾地指出恩格斯的估计太乐观了,他只能代表欧洲的革命家和进步人士对亚洲对中国

^① 《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1版。

受殖民掠夺在感情上的同情和支持,尚缺乏理性分析和经典革命家应有的权威指导。当恩格斯写下上述引言后经过漫长的四十年,激进的康梁派的任务仍定在维新以保卫“国朝圣主”万世不变上,而陈独秀的长江防务计划中除为了确保“欧西之铁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外,还有“若防内乱,必据上游”的防御措施,并明确指出曾国藩及其部将胡林翼率领的湘军从湖南出发“平荡东南”的业绩起自绥靖长江而占据南京,消灭太平天国革命。其时,另一支革命队伍的领袖孙中山亦曾把富国强兵的理想寄希望于洋务派而上书李鸿章以进改良主义之策,只是在碰壁之后又被圈禁在英国伦敦的牢狱中,才省悟到和平的改良主义是不行的,要使中国进步,“不得不稍易以强迫”^①,即便如此,距暴力推翻封建制度在认识上还遥远得很哩。百分之九十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作坊劳动,亘二几千年不变的封建制度“迟缓律”(瞿秋白语),越来越脆弱的国力却承受着越来越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锁住了人们的思想,且不提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只说欧西文明的传布也还得有一段漫长的“老师打学生”(毛泽东语)的时间差要用血去补上的。

《扬子江形势论略》发现于一九七八年,因此,在这之前的陈独秀研究论著中无从提及,而在这之后的此项研究中又因碰上政策逐步落实的形势,使得某些好心的研究者忘却实事求是学风,在对此文的研究中不提曾国藩平定“粤逆蜂生,蠹流江表”的事实^②,其实大可不必,在上世纪末走向革命的领袖人物中佩服“曾文正公”者大有其人,比如毛泽东,迟至一九一七年还在某封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③以比陈独秀更敬重的口吻重复了二十年前《扬子江形势论略》中曾胡败太平军的故事,而这个时候的陈独秀主办《新青年》已两年多了。要研究或议论历史上倒错认识的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不能以今人今时的认识强解彼人彼时的认识,有人很有见地地指出:“曾国藩的军事活动经验,对后来毛泽东的战争生涯也不是毫无关系的。”并举例蔡锷将军的《曾胡治兵录》“就是一本毛认真读过的书”。这部治兵语录也是蒋介石运兵的重要参照理论之一,曾被选为黄埔军校教材。似乎还应特别强调:陈独秀的《扬子江形势论略》作为一部准军事著作,显示他一投入社会运动就注重军事,研究攻防战略,使我们认识到他的刚烈的性格,走向暴力革命的潜在能力和指导或指挥战斗(比如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斗争)的军事素质。

由于在《扬子江形势论略》的正文夹注中有“湖中水师当另议”,“其造台设炮诸法式见扬子江筹防刍议第八条”,“扬子江筹防刍议言之甚详”等提示,估计尚有姐妹篇

① 转引自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上册第95页,中华书局1981年9月第1版。

② 如魏知新著《陈独秀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李洪钧著《陈独秀评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等都只提反帝不提抗太平军事。

③ 李锐《为什么“独服曾文正”》。《读书》1992年第9期,三联书店出版。下引同。

《扬子江筹防刍议》一书，可惜至今尚未发现。

四次留日，初露革命锋芒

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修齐治平”的抱负。一八九七年的陈独秀，“修身”已毕并用《扬子江形势论略》以明其参与“治国”的志向，“齐家”亦因已成婚而告终，于是可以踏上“治国平天下”之道，正是一八九八年动荡的时代造就了他的反叛性格和全身心投入革命的决心；同时还决定了他从康梁派向纵深发展，以更新的理论适应新的革命形势。

据多方查考而至今尚未详确的，是一八九八年陈独秀离安庆去杭州就读于刚成立一年的“求是书院”。这是浙江省第一座西式学校，由时任杭州知府的新潮派人物林启（迪臣）创设，校址在蒲场巷（今浙江大学门前的大学路）路东，与求是书院毗连的是武备学堂。

陈独秀在求是书院所学的课程有外文（英、法文）、天文、地理等学业，据说还设造船学一门课程。陈独秀本人对求是学院只字未提。在他所遗留下来的写于杭州或回忆杭州的诗中有赠沈尹默的诗一首和赠刘季平暨沈尹默的诗一首，被有些学者认为是陈就读求是书院的见证，但是刘季平的回赠诗和沈尹默的回忆录中皆无有关陈独秀就读求是书院的记载。^① 有两点应当肯定的，一是一八九八年的时局和求是书院的学风使陈独秀投入轰轰烈烈的反清斗争并初次尝到革命风险；二是陈在求是书院的时间虽短但经历不凡。

说一八九八年，也许不被人注意，但折算为“国朝”光绪二十四年即戊戌年则一切透明，引起国人的无限感叹和眼泪。陈独秀因支持变法维新的言行被查实而匆匆逃离，远行东北避难继父陈衍庶家中。假定他春季开学入求是，可以推算出此次杭州之行最多只逗留半年光景，但却是陈独秀研习英法文直接从西书研究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开始，也为他三年后去日本储备了深造西学的知识。

陈独秀真是生逢乱世，一八九八年去杭州碰上了百日维新惨败的全过程，匆匆往东北跑去又逢义和团从山东起义席卷北方；到了东北不久，一九〇〇年碰上八国联军抢掠烧杀北京的同时，沙俄帝国全面侵入东北。这一切，现在还不是陈独秀发言的时候，一是时局尚未发展到中国在众多帝国侵略中独与沙俄矛盾最大；二是陈独秀因家母病危与乃兄匆匆赶回安庆，首途东北逗留时间比杭州还短。

关于陈独秀与乃兄庆元从沈阳奔母丧赶回安庆的事在第一章中已谈，这里要补

^① 这两首诗当作于辛亥前陈独秀在杭州任陆军小学堂老师时。

充的是在忆母丧和哭兄亡的《述哀》诗中所说的“南奔历艰险”和“弟就辽东道，兄航燕海边”^①这几句诗对陈独秀生涯的史乘意义。关于“南奔历艰险”，传统说法是，陈独秀从东北往安庆奔丧未与乃兄会齐前，在途中曾被东北响马贼“红胡子”抓住，由于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搜抢不出几多钱财，准备杀了他。正在这危急时刻，恰好被曾经是“红胡子”头的张作霖知道，讯问之下，知陈独秀是陈衍庶的儿子，使他记起衍庶在任新民府知府时曾赦免过他的死刑并招安改恶从善。现在知恩必报就放跑了陈独秀。^②这未免太过惊险，写在这里也算一个故事，当然笔者并没有把它视作无稽之谈，因为三十年代还有王森然在所写的《陈独秀先生传》中说，陈独秀“其子延年，为张雨亭将军所最钟爱”^③，虽亦不知其本源，但是把上面两件事联系起来，陈独秀因为有了在东北作官多年的继父陈衍庶而与张作霖（雨亭）有关系，而张作霖确实被新民府收编并委以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而走上仕途。我们提供奔丧遇险的另一可能的事实是义和团起义。义和团是非常复杂的平民革命现象，它既有仇恨帝国主义殖民压迫的积极方面，又存在盲目排外反被统治者利用的消极一面^④，因此在较长时期内都不被进步力量理解和承认。一九二四年，陈独秀曾在文章中肯定了义和团，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之，曾说及他本人：“义和团的野蛮，义和团的顽旧与迷信，义和团时的恐怖空气，我都亲身经历过。”^⑤这“亲身经验”从陈独秀当时的行踪看只能发生在奔丧旅途中。义和团在山东朱明灯率众起义后最早响应并发展迅猛的地区之一正是在陈独秀南归旅途必经的营口至沈阳一线，遇险，就在所难免了。笔者倾向此说。^⑥

“弟就辽东道，兄航燕海边”是指他与哥哥庆元料理母亲丧事结束离开安庆再赴东北的经历，因在《述哀》中有“海上各为别，一别已终天”句，始知这是兄弟二人生死

① 本章所引陈独秀的诗除另注明外，均引自张君、房学朋编《陈独秀诗选》，宣城文艺编辑部1986年10月版。

② 转引自横山宏章《陈独秀》第14页（朝日新闻社1983年5月）和陈万里《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第12页。资料来源都是孙伯醇日文所著《ある中国人の回忆》，笔者未见此书。

③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21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④ 义和团积极效应：“直隶义和团传入东北，营口居氏起练义和拳。”“清廷命地方官捕拿严办练拳棒者”；消极效应：“吉林将军长顺、吉林副都统成勋出示晓谕称：义和团氏，上能护国，下足保家，虽有法术，正而不邪，业已钦奉嘉奖，并赐名为神勇义和团。”以上均引自《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00—1911）》第1、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

⑤ 引自《我们对于义和团的两个错误认识》，《向导》第81期，1924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报。

⑥ 陈万里亦持此说，详见陈著《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第15页第41注。

一别。在诸家陈独秀的编年上,几乎全部都说他们离家后哥哥去辽东道候补或说是到沈阳出缺,陈独秀则去日本留学。其实这一查证太简单了,奔丧和北返都是一八九九年冬或次年初的活动,陈独秀第一次留学日本是一九〇一年秋,间隔两个年头,因此我们以为“海上各为别”应当是兄弟二人从安庆到了上海之后换乘海轮北上,哥哥在大沽口上岸到河北某地出缺,弟弟则船到大连或营口上岸再次投奔继父衍庶门下,正是在东北一年多时间内冷静地思考稍纵即逝的康梁理论和实践的教训,戊戌政变的结果反而更加剧了垂死挣扎期的清帝国的残酷统治并引来了庚子八国联军血洗燕京和《辛丑条约》割地赔款(当时以本息将近十亿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赔偿,全国人均赔银三两!)。在这全国受辱的大背景下的陈独秀又在东北小气候里耳濡目染具有东方式封建野蛮传统的沙皇俄国在这块土地上的残暴行径,诚如列宁在八国联军扫荡北京和沙皇俄国全线入侵东三省的当时所指出的:“他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①一幕幕的惨剧激怒了陈独秀,也证实了我们对“海上各为别”的编年研究是正确的,大约用了一年的光景陈独秀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一九〇一年春,陈独秀回到安庆老家作留学日本的准备,这一年他二十三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就在留日盘缠上与本来就无爱情可言的夫人发生了一场不轻的经济纠纷,“独秀留洋,欲借其夫人十两重金镯作为游资,坚决不肯,常时吵架”^②,十两黄金是个巨数,高大众虽无文化,但面对着“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的丈夫,心中明明白白地知道迟早要被抛弃的;至少这个家要依赖夫君维持是靠不住的,坚决不肯把十两黄金交给夫君放洋之用,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旧式妇女节俭理财就是为了持家,纵然管不住丈夫也能养儿育女维持家政,事实证明高大众是对的。

(一)

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编辑出版于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四日(一九〇一年十月十五日)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一书的《同瀛录》揭示:“陈乾生 重甫 二十四岁 安徽怀宁 二十七年十月 自费 东京学校”。

近代中国派青年学子留学日本是从洋务运动的“西学为体”和维新变法期为适应所变之“法”的要求而掀起的,所谓“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

^① 引自《中国的战争》,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1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第1版。

^② 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小英雄故事略述》,载《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第202页。

胜于中国学堂三年”^①。据说第一批十三名清国留学生于一八九六年派赴，《同瀛录》截至一九〇二年八月计为六八三人，加上不登记的考察的陪读的至约千余之众。有这么多的中国青年在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又思想活跃的国度里，学生当然不会只单纯研习学问，还会应运而生各种政治组织，说东京是清廷血腥镇压变法维新后的反清运动基地是不为过的。陈独秀于是年末参加了由留日学生组织的“励志会”。此会成立于一九〇〇年，被冯自由称作“实为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先河”^②。但没有什么明显的政见，只是意气相投的同乡同学在异国联络感情互助交谊组织，陈独秀加入该会很可能是受同学张继的影响。正由于励志会没有政见最后终于因血气方刚者与苟且偷安者之间发生矛盾，而形同虚设。章士钊在回忆励志会时说：“初时论颇激昂，渐次变质，陈乾生（即陈独秀未改之名）张溥泉（即张继未改之名）等，后参加而先脱会”^③。当然励志会仍是进步的组织，会员中不乏反清英杰和烈士，比如一九〇〇年八月由唐才常主持的自由军策动在武汉、安徽、江西等地“勤王”起义失败后被捕杀的二十多位烈士中就有好几位是励志会成员，那次起义失败后逃回日本的会员秦大力，与沈云翔、雷奋、戢元丞、张继、王宠惠等创办《国民报》（月刊），“大倡革命仇满学说，措辞激昂，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④，会员雷奋、杨廷栋等还创办《译书汇编》，编译欧洲法政名著，对冲击封建传统意识和传统思想束缚人心方面，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在谈到陈独秀在日本曾经阅读过哪些资产阶级法政文化书籍时，由于没有第一手资料，而成为研究空白，本传也只得围绕着陈独秀可能接触到的书刊提供他读过的书的线索，除励志会译书外，在他登记注册入学的清国留学生会馆图书馆藏书中有《法国革命史》、《英国宪法史》、《美国独立史》、《近世社会主义》（德富苏峰），还有如国际法的书，叙述沙俄灭波兰，英国灭印度，英法入侵中国的书以及希腊独立战争史等书，有研究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书，还有多种地理方面的书，甚至还陈列着战术讲义，指挥研究，以及新兵教练、国民皆兵教育等准军事书籍。据鲁迅回忆清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还有书刊出售，以使学生感受时新^⑤，都会引起陈独秀的阅读兴趣的罢。当然，我们开列上述书单为陈独秀在日本可能涉猎的书也并非臆测或徒费笔墨，因为这些书本可以作为陈独秀早期著作和思想行为的知识本源开拓研究渠道，还是举个小例子，具体一下我们提出的研究方法。比如在留学生会馆的藏书有一套《福泽谕吉

①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游学二》。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98页，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

③ 引自《疏〈皇帝魂〉》，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30页，文史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版，1981年8月第3次印刷。

④ 冯自由《革命逸史》。

⑤ 鲁迅《朝花夕拾·藤野先生》。

全集》，福泽(一八三五—一九〇一)是推动日本明治维新的著名教育家，他为提高日本的军国民教育质量，为强化民族体能训练，曾提出一个惊人的见解：“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当以兽性主义；十岁以后，方以人性主义”^①，这大概是进化论学说向社会学渗透中关于提高国民竞争能力的最极端的教育学说。陈独秀很欣赏福泽理论，他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提出改革陈腐教育方法的“四大主义”，其中就有福泽谕吉的“兽性主义”，文中解释并推荐福泽理论，“兽性之特长为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日本称霸亚洲，唯此兽性故”，又反思道“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搏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面白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源出于福泽的体能观，最终落到从政从军卫国护民的社会革命上，至今仍不失其意义。这种不近人情的“兽性主义”，在陈独秀是十分认真的，前面我们曾提到过他对两个大儿子的近乎残酷的丐其独立谋生“不以他活”，于此亦找到了依据。这类源与流的关系，还可举出多例，这里只想以此说明一个属于研究方法和导向方面的问题。当政治上解禁到可以从汲取历史教训的角度研究陈独秀时，首先要弄清楚他一生的生活轨迹，如去过几次日本，是不是去过法国等等，这方面，一批中外学者和相关部门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只此为止就不够了，应当是在考证生活轨迹的同时，就他所见所闻所学对世界观的形成，政治见解的嬗变，思想理论的建立，以及其所以能超越群儒思想局限的原因诸方面的研究同步进行。不能说我们于此已有相当成熟的方法；提出来也只是一孔之见。留学生会馆里存有一部福泽谕吉的全集，十多年后陈独秀在文章中提到福泽教育学中的一种理论，当然不能肯定他必定是这一地这一时读的这一部，但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找到这一部并说读的正是这一部，绝非杜撰；至少研究导向是可取的。

作为一部传记，弄清楚传主行踪显然是重要的。过去都认为陈独秀第一次留日是一九〇二年^②，现在业已证明是一九〇一年，由于陈独秀在《清国留学生第一次报告书·同瀛录》中自写“东京学校”却没写东京的什么学校，因此又有不同说法，一种说法他人的是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但它创办于一九〇二年。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提到弘文学院时说：“黄兴和鲁迅初抵日本时，就在这里学习，陈独秀亦出身此校，其后再入高等师范科进修。”^③黄兴和周树人(鲁迅)都

① 转引自《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88页。下同。

② 如邱玉汝的《陈独秀年谱》(香港龙门书店1974年9月初版)即持1902年留日说。邱谱乃第一部陈独秀年谱，考证出很多鲜为人知的资料，功不可没。

③ 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45页，三联书店1983年5月第1版。

是一九〇二年官费留日,当时弘文学院刚刚创办,正好入学,因此,一九〇一年十月到日本的陈独秀首先入学的应是弘文学院的前身成立于一八九九年的亦乐书院^①。

据后来的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接读哥哥希颜一九〇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的信中说:“善乎皖域志士程仲辅氏有言曰:(此君现游日本,兄未到堂时,蒙见来访。)……”^②按汪希颜是写信前一个月“到(陆军学)堂”的,以此推测,陈独秀于是年二月末或三月初回国返皖途中在南京结交了为陈独秀一生出版著作和经济生活具有绝对重要的汪氏兄弟,第一次留日是一九〇一年十月前至次年二月末,时约五个月。

(二)

陈独秀先后四次到日本,其中一九〇六年在芜湖皖江中学任教时利用暑期与同事苏曼殊联袂赴日度假,估计不足两个月。“申江别后,弟即偕仲甫东游,至处暑后始抵皖江”^③,赶上下学年课程,不能算是留学。

一九〇二年九月陈独秀第二次留日,与同乡好友潘赞化一起注册入学成城学校陆军科。成城学校是当时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是清廷洋务派派练新军指挥官的一所学校,创办于一八九八年,校长由日本军部总参谋长川上操六兼任,可见其重视程度。鲁迅曾说:“在东京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④,指的就是成城学校和东京警视厅主办的警官速成科,以及稍后的振武学堂。陈独秀入成城学校是据上面曾提到过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书”自填入学志愿获悉的,历来研究家们于此并无异议,但仔细推敲起来似亦不无疑点。

一九〇〇年之后清国留日学生思想上逐步成熟,加上孙中山等受过欧洲文化熏陶的更激进更新潮的革命家亦先后抵达日本,在留学生中添了一撮从“仇满反清”到“反清反帝”的火种,这就使清廷派往日本的兼有监督留学生责任的驻日公使蔡钧紧张起来。一九〇二年夏,蔡钧因传闻留学生图谋不轨,密奏清廷,建议暂停派遣学生。正在此时,有江苏、江西和浙江三省留日学生九人拟自费入成城学校研习陆军。校方规定入读军校一定要清国公使具保,正在为留学生恼火的蔡钧自然不出保单。于是就酿成“成城学校事件”,此事发生在七月三十一日,事情被曾是上海南洋公学教师的

① 陈入亦乐书院并无确实资料,系笔者据实藤记载和鲁迅回忆入学弘文等资料推断的。

②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4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文中程是陈的误记。

③ 苏曼殊1906年9月13日致刘三信,《苏曼殊文集》下册第469页,花城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苏曼殊事迹皆引此书,不另注。

④ 鲁迅《呐喊·自序》。

留日学生吴稚晖知道,他挺身而出与张揆均两人召集了几位朋友会同准备入成城的学生(后来发展到二十人)进行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斗争,直到蔡钧吁请日本警厅出面抓捕学生,软禁并迫使吴稚晖和张揆均离开日本,已是八月下旬的事^①。等到陈独秀、潘赞化等来日本要求自费入成城学校的九月,蔡钧、留学生会馆和日本当局三方签定了留日学生入军校规定,其中的一条即是:“欲入海陆军学校者,当俟福岛少将归国后,再行商议。”福岛安正少将何时回国,无从查考,但陈独秀填写入校的九月,距要福岛安正批准的条款出台的日期咬得如此之紧,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可能予以审批的。我们还从一九〇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苏报》一则报导中的:“本月二十一日(五月十七日),有一游学日本陆军退回之学生陈某,在拐角头之藏书楼开演说会”的内容,推测陈独秀并没有达到入成城学校的目的而被“退回”^②。再则,与陈独秀同去日本的潘赞化后来入学并毕业于东京警视厅警官速成科。以上均证明陈独秀并无成城学校陆军科学历。至于他对军事并不陌生,则早在《扬子江形势论略》中已显示出准军事战略研究的天才。

一九〇二年到日本的陈独秀已经完成抛弃改良主义而逐步走向反封建并上升到反帝斗争的思路历程,有诗为证:“‘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唐才常“勤王”失败,影响到励志社的分裂,潜逃回日本的原励志社员与老社员中的戢元丞、杨荫杭、雷奋、张继、陈独秀等激进派,会同一九〇一年入成城学校研习陆军的蒋百里,后来曾心血来潮加入成城学校的苏曼殊、潘赞化等等学生成立青年会,“是为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这个团体“初有人谓意大利独立之前,先有‘少年意大利’,故定为‘少年中国会’”^③。从效法意大利马志尼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证明有相当部分留日学生已经把目光从日本的明治维新移向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也许正是孙中山在日本筹措革命的影响,只是怕“少年中国”太过刺激清廷徒损事业而易名“青年会”,这个会在出版方面比《译书汇报》更进一步,曾译过《法兰西大革命史》等著作。从励志会译介卢骚、孟德斯鸠、斯宾塞等资产阶级意识理论创导者的著作,到直接介绍欧陆资产阶级革命典范的法国大

① 参见《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八章第五节“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吴稚晖为此事还自杀未遂一次,遗书中有“信之以信,明不作贼,民权自由,建邦天则。削发维新,片言可决。以尸为谏,怀忧曲突……”

② 引自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第175页《安徽省城大学堂第一次冲突之原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又,在房兆楹辑《清末民初洋学学生提名录》初辑第44页陈独秀名下是“等待入学”,亦可证明陈未入成城学校。可参见陈万里著《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第6页。本章所引全部拒俄运动言论,除注明出处外均引自此书,不另注。

③ 《革命逸史》初集第16、102页。下同。

革命,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增加译书的种类,而是中国青年酝酿暴力革命,并萌发把中国革命纳入世界革命轨道的一个质的变化。当然,这些当年大都尚拖着辫子的青年会会员也还没有完全摆脱“兴汉灭满”的民族主义情绪,峨冠博带汉官威仪的美梦还没有清醒,也出版过《中国民族志》(刘光汉师培著)等书,这不是“历史局限”,这是本世纪初知识分子的文化思潮由东向西转型期的必然经历。

在这次约略半年时间里,陈独秀的另一生活要素是结交了一些革命志士,如国学大师章太炎、“革命军”邹容、“义士刘三”(季平),因任拒俄义勇队临时议长而名噪一时的汤尔和等,连同青年会中坚张继、蒋百里、苏曼殊,以及后来成为拒俄运动义勇队的一批青年学子,渐渐形成了一个进步圈子,“驰驱甘入棘荆地”,期待革命召唤。

“成城学校事件”后清廷为防止学生闹事更为防止反政府活动,在加强原有的各省监督制外,加设专事管理留日学生的总监督一职,第一任总督是汪大燮,于一九〇三年一月到任。^① 但是学生亦因成立了清国留学生会馆而逐渐打破了省域出现联治,针锋对麦芒,终于在湖北留学生监督姚煜身上爆发了首次严重的反监督行动。

一九〇三年三月初,湖北省学监姚煜因“无端攫留学生之逆鳞”(章士钊语),激怒了学生,遂由邹容带头,联络了张继、陈独秀、翁浩和王孝缜,探听到姚煜某夜有奸情,结队潜入姚煜住宅,当场捉奸,由张继抱腰,邹容抱头,陈独秀用剪刀剪下姚煜的辫子,行所谓的“割发代首”之惩罚以解恨,邹容等还把姚的辫子悬挂在清国留学生会馆门楣。^② 愤怒青年感情用事的不择手段,倒也起到了震慑作用。后来这五个青年中张继成为孙中山辛亥革命、民国政府和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要员,当他代表孙中山与中共领袖陈独秀谈判时,可曾想到这一幕近乎荒唐的斗争?看来国共合作初期是颇有些往昔并肩反封建的友情在,当然友情并没有阻止张继坚决反对国共合作。

被剪去辫子的这位“偶辖一省海外学务”的“风尘下吏”当然无法继续充任公职,五位肇事者中抱腰、抱头、剪辫的三位首要亦因此而被清廷驻日使馆提请日本警方强令遣返大陆,没有被遣返的翁浩和王孝缜不久参加在日本成立的拒俄运动学生军。回到国内的张继和邹容在上海与主持《苏报》笔政的章士钊同结金兰,海盟山誓反清到底,五月,邹容因出版《革命军》而深得章太炎赏识,正是因《革命军》在《苏报》上逐日披露而引出了一场轰动朝野的《苏报》案,章太炎被捕入狱,邹容则为义气而自动投案入狱,两年后被虐死狱中。《苏报》被查封后,张继参加编辑《国民日报》又与陈独秀共事。

^① 汪大燮(1859—1929),浙江余杭县人,字伯棠,他比较开明,如到任不久发生拒俄运动,他不主张镇压学生。

^② 回忆此事者不少,但冯自由《〈革命军〉作者邹容》文中忆及此事时独不列陈独秀名,在章士钊《疏〈黄帝魂〉》中始见陈独秀名,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29页。

陈独秀被遣送回国后直接回安庆老家干革命，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综叙。

(三)

陈独秀几乎都是在国内遭追捕而逃到日本的，一九〇三年被日本遣返中国，事隔四年到一九〇七年又因从事革命活动，愤怒的恩铭连下数通羽书非抓到陈独秀除之而后快。陈独秀匆匆逃到日本，恩铭没有抓到陈独秀，反而被徐锡麟在安庆起义中一枪毕命。起义失败，徐锡麟付出了生命，“鉴湖女侠”秋瑾也因此案而被送上断头台惨杀在绍兴闹市轩亭口。徐秋案与本传主无直接的关系，因有人考证陈独秀第三次赴日本是因徐锡麟案受牵连的缘故，就要在此予以澄清：他是在芜湖利用汪孟邹办的科学图书社为据点联络革命事被芜湖候补道汪云浦查获而潜逃的。徐锡麟被杀害于七月六日，其时陈已在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并参加了由章太炎发起的“亚洲和亲会”。

章太炎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和革命行列中一绝，他一生七次被捕六次脱险，最后一次就是前述的《苏报》案被捕判徒刑三年。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刑满，蔡元培、蒋维乔、叶翰等十多位同盟会的友辈和学生到狱门恭候，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也专门派了孙毓筠、龚炼百等多位盟员前往上海接迎章太炎并于出狱当天把他送往日本，加入同盟会并接手主编《民报》。章太炎在日本名声大噪，“是时东京人材最盛，满洲人留学至匿姓不敢言”^①。这时的章太炎也许在同盟会受欧美派的影响，也许他在上海提篮桥“外国牢监”里关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仇外思想而欲跨越国界联合东南亚弱小民族共同抵御列强，遂萌生成立亚洲和亲会，章太炎在亲订的《约章》中明确提出“建亚洲和亲会以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一切亚洲民族，有抱独立主义者，愿步玉趾，共结誓盟”。成立后果然有印度、越南、缅甸、菲律宾、朝鲜等国在东京的志士仁人参加。用时髦的话说，这可算得是中国第一个为争取民族解放的国际统一战线组织。其中值得人注意的是日本人士参加者中有幸德秋水（一八七一—一九一一）。他是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加入亚洲和亲会之前他已去过美国考察社会运动并归顺无政府主义正欲图谋暗杀天皇，这正投章太炎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之好^②，更使人会的中国会员中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或是崇尚“金铁

^①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08页，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章太炎事迹皆引此书不另注。

^② 比如他认为魏晋南北朝兴起的均田制度就符合社会主义等等，参见《民报》第六号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当是孙章联袂期章在释义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为社会主义，在早期民主革命中附和者不少。

主义”的血性青年受到鼓舞，中国人会者有：张继、刘师培、苏曼殊、陈独秀等数十人。其所以在亚洲和亲会上多叙几句是因为陈独秀这次留学长达两年半（一九〇八年秋回国度暑一次）一直到一九〇九年十月归国。这两年半时间除加入亚洲和亲会，别无活动，是陈独秀潜心学问研究和反省往昔南北奔走呼号勤于革命的风风雨雨，以至表面上看来大有血性锐减之势，行动上亦无所表现。比如章太炎、张继、刘师培等师友都是当年加入同盟会投身孙中山革命的，他却不予参加，章张刘们的热与陈独秀的冷，是有深层原因的；表现在思想上，这冷亦有踪影：“目断积成一钵泪，魂销赢得十篇诗，相逢不及相思好，万境妍于未到时。”尤其是下引七绝更甚：

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

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与谁。^①

陈独秀第三次赴日本与苏曼殊、邓仲纯“三人共同住在东京神田区东町二丁目一番地汪寿馆的一间小屋里，曼殊向仲甫学字学诗文，所以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诗，不仅像，好多都是仲甫作的或改的；而仲甫则向曼殊学英文、梵文，每天都都呀也呀的”^②。回忆还说陈独秀那时集中精力研习音韵文字学，这在陈独秀与章太炎的交往中可以窥测一二，下面我们引一段趣闻：“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计年岁当是戊申（一九〇八）的左右……章太炎在东京民报里来的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坐，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两扇纸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楚的。主客谈到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也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③后来陈黄都是国学大师级人物，都不“区区”。当时都敬仰章太炎又都是苏曼殊的朋友，终于因各自倔脾性而不欢，但因缘尚未了结，十年后，在北京大学，这一对又碰上了，一个任文科学长，一个成为泰斗级国学教授，这时的分歧就不是十年前的脾气而是学术和政治分野了，五四时代北大人还会记得说陈独秀是“毁孔子庙罢其祀”的激进派，而把“八

① 诗后自注：“丹顿即 Dante”（但丁），裴伦今译拜伦。

②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261 页，中华书局 1980 年 8 月第 1 版。

③ 周作人《知堂回忆录》第 482 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 1971 年 1 月版，下同。文中戴震（1723—1777），安徽休宁人；段玉裁（1735—1815），江苏金坛人；王念孙（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父子，江苏高邮人，均为清代著名文字学家。

部之外皆狗屁”赠给了黄季刚，少年意气老而弥坚也。

至于与邓仲纯朝夕相处结为学问上的好友，这对陈独秀的晚年惨境是个福音，这也许就是人生缘分了。

这一时期的陈独秀勤于研习英文，大概也涉及法文。从学问底藪和气质，陈独秀一辈子是个学究，他不仅在当总书记时未忘研究文字音韵，连蹲班房也埋头作古诗撰写文字学方面的书。他第三次留日归国后的第一大功绩是在一九一三年杀青《字义类例》^①一书，开中西比较研究在文字学方面之先河，终于在监狱在晚年——几乎可以说是研究到撒手人间，才初初完成毕生大著《小学识字教本》之大半。由于陈独秀是托派，政治上的残酷打击波及学问，他在文字学方面的卓著成就一直被打入冷库，但有些学者并没有忘记陈独秀的这部著作，一九七一年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梁实秋作序并主持出版，也许出于政治方面考虑，删去了陈独秀所作的《自叙》，作者的名字也未刊于书上，终于面世的这部著作虽印刷精良，但在九泉下的著作人也不会满意的，因为这次仍然被改书名为《文字新论》^②。考虑到本传囿于篇幅，不可能再为陈独秀与文字学多费笔墨，具引一段《自叙》，留一点悲剧政治家的学问印痕：

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字之基本形义，熟习这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者也。上篇释字根及半字根，下篇释字根所孳之字，每字必释其形与义，使受学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此不独使受学者感兴趣助记忆，且于科学思想之训练植其始基焉。不欲穷究事物之所以然，此吾国科学之所不昌也。^③

陈独秀第三次留日还在学问上留下了《新体英文教科书》两册，惟此道不孤，至今只有历史意义了。他的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著作是第一次留日后于一九〇二年由商务印书馆石印出版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皖怀陈乾生重甫编辑），显然其知识源自求是书院和第一次留日期的留学生会馆藏书，这部书以及如鲁迅与顾琅合作编纂的《中国矿产志》都属于西方科学文化东渐初期开启民智的普及著作，已成古典，如今已少有人问津，一并在此存照。

① 《字义类例》，亚东图书馆民国14年12月出版，32开线装石印本。署陈独秀。

② 《文学新论》，台北语文研究中心1971年出版，16开精装手抄影印本。

③ 据台静农先生保存的文本。

一九〇九年初陈独秀萌发诗兴,是因政治上失落情绪借诗以一吐胸中块垒,当然也与苏曼殊的生活有关,前曾经引过的《本事诗》(十首),就源自苏曼殊的令所有朋友纷纷作诗的一段恋情。苏曼殊是个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另一个半路出家的和尚李叔同(弘一法师)相同又极不类的文学家,综观其一生则始终徘徊在世俗生活、革命冲动和佛法无边的玄想之间,与陈独秀结交是他一生重大转折,苏曼殊从一九〇二年初次与陈独秀相遇在青年会就对陈的学问和为人产生近乎崇拜的心态,他曾数度追随陈独秀,并接受陈的邀请到皖江中学执教,一再支持陈的革命行动。一九〇七年苏曼殊再度与陈独秀在东京会晤并住在一起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而言之,已从俗名苏子毅成为曼殊上人——一九〇三年十月,这个以但丁拜伦为师的风流后生竟到广东“惠州某寺,落发为僧”,时虚年二十龄,也许真可谓之正面意义上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为那时他是成城学校陆军科学生并加盟于拒俄义勇队及军国民教育会,也就是说,一九〇七年上他已剃度四年并潜心梵文和佛教法理研究,却仍然摆脱不了红尘之累。一九〇九年初春,在某次演奏会上认识了调筝女百助枫子,大动凡心,为她拍了不少照片分寄小说家兼编辑包天笑等好友,然而当曼殊的苦恋终于打动筝女芳心,却又不肯冲破戒律圆成美梦:“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陈独秀了解曼殊在天上地下的炼狱中戕杀感情的磨难,他读了曼殊的十首《本事诗》,不仅修正了他的若干诗句,并迅即唱和十首。把此事写入陈独秀传不只为了传主有这段经历,也由于陈独秀的十首唱和《本事诗》是苏曼殊抄清并保存下来的,这在陈独秀一生的诗作是一笔大遗产,并使我们分析陈独秀第三次留日的思想状态时有了一些依据,这几年除几首诗,没有任何文字可资研究参照。苏曼殊与陈独秀一唱一和,前者是“赠尔多情诗一卷,他年重检石榴裙”,后者是“黄鹤孤飞千里志,不须悲愤托秦筝”。一九一八年当苏曼殊默默地上海广慈医院——也许不能说“圆寂”——谢世时,陈独秀已经成为振臂一呼的新文化运动旗手,彼此相去远甚,数年友人,还有走得更远的……

(四)

陈独秀最后一次去日本是一九一四年七月,在日本迎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是应章士钊之请去东京协编《甲寅》。二次革命失败到日本碰上了尚不明真相的国际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个政治动荡中,在东京的革命者由曾任两广护国军副都参谋的云南武将李根源以“欧事严重,集同人讨论”为目的,创建了欧事研究会,

陈独秀与章士钊参加了这个会。欧事研究会几乎囊括了当时的显要,如李烈钧、熊克武、钮永建、冷遹、程潜、李执中、彭允彝,殷汝耕、陈炯明、邹鲁、龚振鹏、李书城、谷钟秀、张耀曾、沈钧儒等一百余人^①,看看这些代表人物,可知这个会会员的命运不是表现在迅即消沉的欧研会当时,而是在他们各自的政治归宿中悟出中国革命的历史大浪淘沙惊心动魄。陈独秀在欧事研究会中是否有活动,无从查考,但当时孙黄分裂各自为党,给他的印象一定很深,直到事隔十多年后,国共分裂的前夕陈独秀在《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中还从历史角度提到了这个会:“有些人不相信国民党有什么左右派之分别,可是在事实上,国民党左右派之分化,及历来右派形成组织,都非常明显:最初是孙黄分裂,右派由欧事研究会变为政学会。”有的研究者认为陈在一九二五年底提出这段历史,实在敏感到国共双方都不愿听的程度,于是首先要否定这是国民党第一次分裂。被长期掩盖的历史真相要大白于天下将费很多口舌^②,我们只能长话短说。讨袁失败的孙中山于一九一四年四月到东京重起炉灶成立中华革命党,但遭到很多辛亥元老的反,这就是欧事研究会创办的政治背景。从上开名单中所列的文魁武将,甚至包括武昌首义的革命军总司令黄兴都不加入中华革命党而名列研究会并被拥为“名誉领袖”。明白人一眼就看出欧事研究会决不是什么学术研究团体,后来其所以没有酿成严重分裂的政治后果,是因国内形势急剧下泻: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全面奴役中国的二十一条、改号洪宪称帝等一系列倒行逆施,大敌当前才使欧研会中李烈钧、熊克武等重又集聚孙中山麾下“护国讨袁”,但裂痕却亦难以愈合,这就是陈独秀的欧研会“变成政学会”(按应称政学系)的简史。我们之所以要把二十年代国共合作时的历史在此叙述,重要的理由有两条:第一,陈独秀正是在辛亥革命执政党领袖让位给袁世凯的疲软举措,二次革命时期广东惠州、龙门、顺德、海南等几乎全省的以及湖南郴县,江苏南通,浙江杭州并远至辽宁本溪等几乎波及全国的讨袁战争全都以惨败告终,并及他本人险些在安徽讨袁中丧命等一系列灰暗事实面前,觉悟到他日若要继续革命以拯救中国,必将开辟新的途径,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宏伟设想已在他内心中萌生、躁动。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将冲破落后生产力对思想的束缚,带着无法摆

^① 据李根源《雪生年录》陈独秀名列第十七。李根源与陈独秀同庚,卒于1965年。该年录中华民国2年条下有陈仲甫在日本的记录,当误。这一年陈正陷在安徽讨袁失败烦恼中。因此而使郑学稼《陈独秀传》(上册第104页)亦错将陈独秀算在日本了,其实讨袁失败后安徽只柏烈武亡命日本,陈则躲在上海。有当时在苏州的苏曼殊于是年六月初五(阳历七月八日)致刘三信中“仲甫六月中旬携家至沪”为证。

^② 例如在尚明轩著的《孙中山传》(及其所附的年谱)中只提《中华革命党宣言》中写下的“意见分歧”,“互相诟谮”,却缄口不言欧事研究会分裂一事。尚著北京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1981年9月第2版。

脱的先天不足,超前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已指日可待;第二,陈独秀在孙中山逝世和廖仲恺被刺相继发生,西山会议派及戴季陶主义活动伊始,就指出国民党的右派势力已经抬头,不像历来所说北伐一开始他就丧失了对国民党右派的警觉。

陈独秀这次到日本住至次年七月因高君曼患重病而回。在日本整整一年入雅典娜法语学院研习法文并有学世界语的愿望,“仆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①。

章士钊一九一四东渡日本,五月创办《甲寅》,是章士钊继《苏报》、《国民日报》、《独立周报》之后又一次主政革命刊物。每次都与陈独秀有密切关系,这次章士钊东渡办刊,当然也想到了陈独秀:“记者足下,得手书,知暂缓欧洲之行,从事月刊,此举大佳。”这是陈在得到章办《甲寅》的信后的复信,因陈在复信中有“静待饿死”的窘迫,那就来东京罢。当然,东京生活也仅免于饿死。傅斯年在陈独秀第五次被捕吁请“政府处置此(指陈独秀——引者)案应分别陈氏之功罪”时,还提到陈独秀在《甲寅》时期的生活,说:“民国二年反袁举义,失败逃亡,在日本渡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②也许真是穷则思变,革命不论什么主义,总是处在劣势地位的志士仁人勒紧裤腰带而为之的事业,早在一九〇三年章士钊与陈独秀在上海编《国民日报》时就过着“对掌辞笔,足不出户,与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何物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③。革命乐天写照如此生动真可谓之无出其右。李大钊是《甲寅》月刊初期的积极撰稿人,由章士钊牵线搭桥认识的陈独秀。

前面曾提到过这时期陈独秀诗兴大作,而且除了为章士钊所作的小说《双桡记》作了两篇《叙》外,只是写诗,胡适有过回忆:“他有充分的文学训练,对于旧文学很有根底,苏曼殊章行严的小说文章,他都要作个序子,这是散文方面的成绩。说到诗他是学宋诗的,在《甲寅》杂志上发表过许多作品,署名‘独秀山民’、‘陈仲’、‘陈仲子’,他的诗有很大胆的变化,其中有一首哭亡兄,可说是完全白话的,是一种新的创造。”^④胡适毕竟是文学大师,短短几句肯定了陈在散文和诗歌方面的源与流,也因胡的博闻强记,使这段话颇具史料价值。陈独秀在《甲寅》第一卷第三期上首先问世诗七首;写的都是第三次从日本归国后与高君曼住在杭州执教陆军小学堂时期平稳的生活,下面我们将详谈杭州生活闲适的政治原因,这里再为胡适所评而信笔几句。杭州,真可谓雅俗共赏,俗则穿行山水间流连忘返,只享受自然风光美景,聊以悦目实无

① 《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函》(署CC生)。下同。

② 《论陈独秀案》,载《独立评论》第24号,1932年11月出版,北平,胡适主编。

③ 《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署孤桐),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30号,1926年1月30日。

④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载《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第289页。

深意。雅者不同，游起来就很“累”，因为背上了一个淹隐在湖光山色之间的吴越文化的悠远历史包袱：

石级穿林三百层，层层仄径绕山行。碍云密竹两旁立，裂地清泉一路鸣。山意不遮湖水白，钟声疏与暮云平。月明远别碧天去，尘向丹台寂寞生。^①

诗中嵌入两个典故即第七句写西湖十景之一“南屏晚钟”和末句点出吕洞宾炼丹台，全诗是在竹林清泉的幽景里隐入唐宋之间为韬光庵名景之一的观海亭所作“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的对联的意境。如不明典故就无以解诗，若明典故而咏景，其学问的积累岂非累煞人哉！文人包袱真多啊。按陈独秀的性格坐在观海亭里决不会抛却拯救尘世苦难的心志而去炼什么仙丹，倒是“黑云压地地裂口，飞龙倒海势蚴蠕。喝日退避雷师吼，两脚踏破九州九”^②更符合他的性格，以至直到八十年代末，台静农在回忆五十多年前落难在江津的陈独秀时，记得的诗依然是当年杭州虎跑泉畔“酒旗风暖少年狂”^③，更够鼓舞人心的。

为胡适称颂的陈独秀的散文就是给苏曼殊的《绛纱记》和章士钊的《双桺记》所作的序言。都披露于《甲寅》，只是《双桺记》发表在先，当《绛纱记》发表时，《甲寅》已迁往上海出版矣。

陈独秀时年三十六岁，已经是饱经沧桑，历尽革命艰险，情绪低落，“国政剧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去年今日，指的是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他在《双桺记》序中感伤于朋友壮烈牺牲文词凄苦却忍不住“革命白革”的丧气之情：

靡施之，徇情邪，愤世邪，盖未可偏执一见，其出于高尚之牺牲精神，非卑劣弱虫所可议其是非，可断言也。夫自杀者非必为至高无上之行，惟求之吾贫劣庸懦之民，实属难能而可贵。即靡施之死，纯为徇情，亦足以厉薄俗。罢民之用情者既寡，而徇情者绝无，此实民族衰弱之征。予读《双桺记》，固不独为亡友悲也。

也许这正是胡适赞叹不已之笔罢，嗣后陈独秀再也不写再也无情绪写这类散文以抒胸臆了。具引在此，也算是从文风到思想都向过去告别。

① 《游韬光》。

② 《夜雨狂歌答沈二》。

③ 《酒旗风暖少年狂》，《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2月第2期，北京鲁迅博物馆出版。

果然如我们所预期的，陈独秀在写《双枰记》序不久顺着“革命白革”的气愤，写成了重要政论《爱国心和自觉心》，他根据自己亲历的十四年革命经历，在日本学得的相关知识，总结了对于国家，民权，人治，法治，和把中国引向资产阶级民权国家的个人见解。此文与《双枰记》序发表在同期《甲寅》上，前者署“独秀山民”，后者署名“独秀”，从此行不改名坐不更姓，陈独秀名扬全国乃至全球。此文在当时引起的激烈争论中，李大钊还撰文与之商榷，开“南陈北李”思想交流之先声。下面我们将予以专门的研究，现在再把陈独秀留学的事作最后了结。

一九一五年六月陈独秀从日本归国留居上海，这是他一生最后与日本告别，开始了成为“思想界的明星”的崭新的革命生涯——筹备《青年杂志》的出版。但在留学出国问题上还留下一个谜，即关于陈独秀是否去过法国留学，因为曾有人说陈独秀在留日期间“并至法国读书若干年”^①。又《国闻周报》在陈最后一次被捕发的配照片消息上亦有“留学法日”^②一说。后经一九〇二年随清廷使臣孙宝琦去法国一直住到一九一一年回国的李石曾证实，陈独秀未去过法国：“来示代询陈氏留法问题，弟所知者：陈父（独秀）未到过法国，子则留学若干年”^③，但是否可作为权威的否定呢？因为王森然、《国闻周报》等说陈留法也不是随便可以否定的，怪于资料，不论也罢。在这里，笔者提出一个新的质疑，陈独秀在所写的《说国家》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中国人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此文写于陈独秀第二次留日被强行遣返后的一九〇四年，当时他只去过日本，不能说是“去到各国”，如何解释？是夸大声势的虚写，抑是确实去过别的国家的实写。去过何国？按当年实况，似乎只有在东北时可能去过刚“亡”给日本的朝鲜，恕笔者孤陋寡闻只提出问题而无圆成的实证力。

从结党谋反到舆论革命

陈独秀从安庆出来到江津结束的一生，娶妻三位子女七八，留日四次，被捕五次，思想从马克思到托洛茨基，地位从中共总书记到被开除出党，名誉从“思想界的明星”到叛徒汉奸，身后不只自己被恶谥压顶还株连家属及大批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革命家的政治命运。对于这么一位经历复杂远远超过常人，生平事迹扑朔迷离的领袖人物立传，要给读者以总体印象，方法论就显得很重要，经研究，我采取编年和综述交替的体裁和方法。对一生重大经历不作严格意义上的按年份叙述，而是整体综述。这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整体

①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

② 《国闻周报》第9卷第45期，1932年11月14日出版。

③ 邱玉汝《陈独秀年谱》第16页。

印象深,比如他四次留日,假如我们按严格编年把前后跨度长达十五年的留日生涯与期间多次回国从事反清活动绞在一起写,忽而日本,忽而中国,不仅笔者叙述麻烦且徒费衔接笔墨,读者也在化整为零的交错叙述中被搅乱逻辑程序,得不到“陈独秀留日”的整体印象;第二,运用有限档案资料考证一项重大经历,既能最大限度地集中筛选力求准确,如果再把人物与时代的关系考虑在内,整体综述比较容易写透人物性格和思想发展脉络。为使整体的综合叙述避免割裂历史造成编年上的紊乱,我们在叙述时并没有忘记在适当的时间段里插入相关的史迹,上挂下联,不使脱节。这就是我们在综述独秀家庭和私生活时以相应时间段内发生的多起重大历史事件作为背景的原因,不然从高晓岚到潘兰珍的私生活描写,对于一个政党领袖,从政治上讲意义不大,从书写上讲是不经济,但现在的处理,读者在每一历史阶段都会想到私生活在陈独秀大起大落烽火一生坎坷大半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有多大,不然这性格刚烈的男子汉是会疯的,这似乎不必深奥至弗洛伊德哲理就能明白的常情。

一九〇一年三月第一次留学日本归国,途经南京回到安庆老家,少不了与老朋友们畅谈留日观感,使那些满怀反清情绪又囿在变法维新失败而找不到新的斗争之路的青年们,在陈独秀的鼓动和从日本带来介绍欧洲政经文化的书中开启斗争的智慧。目前,我们虽然无法考察出陈独秀究竟带来了哪些书报刊物,尽管这是重要的,因为当时陈独秀邀约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张伯寅以及年龄稍长的柏文蔚等假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专辟一陈列新书刊的阅览室以文会友。没有书能成吗?资料遍觅不得,万般无奈,于是我们根据陈独秀在日本期间已经出版和可能接触到的大致估出如下书目:首先是孙翔云、秦力山、冯自由、戢元丞等主办的《国民报》,其中以秦力山所著的有“中国必须彻底革命”、“满人虐待汉人历史”、“批评清朝九代谕旨”、“暴虐政治之历史”等等强力煽动内容的《暴虐政治》一书最具吸引力。其次是《译书汇报》,以该报创刊号为例,计有:《政治学》(美·伯盖司),《国法泛论》(德·伯伦知理),《政治学提纲》(日·鸟谷部铎太郎),《社会行政法令》(德·留海斯烈),《万法精理》(法·门德斯鸠),《近世政治史》和《近世外交史》(日·有贺长雄),《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日·酒井雄三郎),《民约论》(法·卢骚),《权利竞争论》(法·伊耶陵)。单行本除前引外择其要者有:《国家原理学》(日·高田早苗),《国法学》(日·岩琦昌、中村孝),《各国国民公私权考》(日·井上毅)等等。也许读者不禁要问,这个书单的可靠性如何?简单的回答是:这些书报刊物全部是陈独秀参加的励志社同人所译所编所著。也正因有了这些中译西书,因此安庆官府和保守派把藏书楼称为“西学藏书楼”^①。

一九〇二年,大概是行将灭亡的清朝统治最黑暗的一年,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

^① “闻来往是(指藏书楼)之人,均系极有热心……并在是处代售在日本所刊之华文报。……安庆府知府某闻此藏书楼代售是报,则为大怒”,引自《拒俄运动》第274页。按《国民报》1901年10月创办于东京,为第一份华文政论月刊,共出4期,秘销国内。

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一整套整肃中国的治外法权日逐完善，换来了逃到西安躲避了四个月的慈禧太后挟光绪回到北京，开始了垂帘听政六年的最残酷的统治。与此同时，爱国志士的斗争亦逐步升级并开始联盟，其中最重要的应数一直在华侨圈和帮会圈内活动的孙中山的事业得到了章太炎代表的最早献身革命的元老派、秦力山（代表励志会新生力量）等的支持，一九〇二年孙中山参加了由章太炎等发起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这是四月二十六日的事，到十一月，上海成立爱国学社，蔡元培为学社总理。^①章太炎、黄炎培、吴稚晖，以及学过军事的章士钊、何海樵、海仙兄弟等曾先后任教于此会，大群南洋公学、江南陆师学堂的青年学子会集学社实行学生自治。与此同时被煽动起来的学生还有上海广方言馆、杭州浙江大学堂和教会统办的蕙兰书院等等。广方言馆涉及未来清廷洋务事业，清廷决定派兵镇压，最后达到调停而平息，杭州两校的学生，前者效法陈独秀成立励志学社，是否巧合，不得而知；后者成立改进学社，江浙一带学生风潮此起彼伏，“举数十年陋儒浅士卮言曲说，一举而廓清之，以伸独立之权。吾国学界中当有渐被其影响，以固此学生社会，不使露西亚之学生专美于世界”^②。把中国的这场说不上是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比之始于同年发生在圣彼得堡的大学生集齐喀山大教堂前的示威运动，足见有识之士已经明白学生中出现愤怒的一代将催革命高潮的来临，当然，一九〇二年的学生只是中国学生运动之滥觞，其扫荡旧世界的威力，恐怕连在藏书楼上与众义士议论斗争的陈独秀也未必估计到的，但发生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敖德萨、里加、喀山等俄国土地上的学生运动已经有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在行动。

一九〇〇年当世界各国人民正浸淫在告别十九世纪迎接二十世纪的“世纪末”狂欢时，中国人民却被八国联军扫荡得笼罩在一派黑暗之中，其中苦难最深的是东北人民，沙皇俄国乘八国联军之机，由尼古拉二世亲任总司令先后派出十七万兵丁全线入侵东三省，七月中旬相机制造“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俄国的人侵还引发了日本对东北的野心，于是就在辛丑和甲午之间，中国发生了气势宏大的拒俄运动，青年学子成了这场运动的主力，而本传主人则在这场运动中跻身革命领导的高层。

一九〇二年四月八日，沙俄在东北取得了实际上的控制权之后才与清廷签订了十八个月内分三批撤军的《中俄交接东三省条约》，到次年四月八日，据条约应向清廷交还金州、牛庄、辽阳、奉天等地，十天后不仅不撤兵反而向清廷提出七条新款，欲把东三省变成它的永久殖民地“黄色俄罗斯”，遂使在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五日就发起于

① 《蔡元培年谱》第14页，中华书局1980年2月第1版。

② 转引自《中华民国史》第145页。

上海张园的拒俄运动会重又点燃怒火，三年后的拒俄运动不仅不再向躲避在西安的“皇太后、皇上”发电“伏乞饬议和王大臣及驻俄使臣，力拒俄约，以保危局”，而是以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为主力的全民性反对沙俄和抗议清廷无能。投入的质量提高，输出的要求亦高涨，带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的色彩。抗议声中编成的拒俄义勇军则是运动升级的产物，正当上海张园首次拒俄大会发出“夫俄自大彼得以来，专事吞并为政策”的同时，四月二十九日，日本留学生会馆召开组织义勇队（后改为学生军）大会，评议长汤尔和大声疾呼：“大丈夫日日言不得死所，今俄人于东三省之举动，日本警报诸皆已知之，此直吾国之奇垢极耻，亦正我堂堂国民流血之好机会。”到第二天就有一万八千多人报名，留日义勇队的壮举大大鼓舞了国内各省市民众和港澳南洋诸地的华侨，纷纷成立拒俄组织。

安徽，就由陈由己领导。有人说“在东京已参加‘拒俄’反清运动被遣返国的陈独秀经上海回安庆，就继续于拒俄救国的工作”^①。就是说陈是因在东京参加拒俄运动被遣返而把运动引入安庆“继续干”的。这纯系误传，澄清的理由如次，首先，前面我已有过交待，陈独秀等“五剑客”是三月三十一日演出了“割发代首”全武行被遣返的，而东京拒俄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于四月二十九日，遣返在先；其次，东京学生军独缺五剑客中的陈独秀、吴稚晖和邹容，不合情理；尤为重要的一条是：过去对在日本滋事的学生，清廷驻日公使确实采取遣返或押送回国的办法，惟独参加拒俄运动的学生一经查出，不仅不遣返而且还禁止回国：“外务部日前发电致日本留学生监督汪伯棠京卿，略谓迩来留学生借拒俄为名，纷纷回国颇多，与定章不合。……倘有暗自回华者，一经查出，立即饬革云云。”一九〇三年再掀拒俄运动首开记录是上海，日前查阅得到的清廷决定镇压拒俄运动的文档是癸卯三月九日（公历四月六日）张之洞的电报：“新党因俄约事在张园集议……”可见陈独秀是在上海拒俄的启动下匆忙赶回安庆拉开安徽拒俄运动的序幕。陈独秀以在东北碰上庚子年沙俄洗劫东北目击者的身份就是强烈的煽动象征。五月十七日之前，安庆城内张扬出《安庆爱国会知启》，全文以沙俄军队撕毁第二次退兵之约开始，接着用“事迫矣，势亟矣”的速度运动号召“我神州血性男子”奋起抗争，定于十七日下午一时“开演说会于藏书楼，公布斯旨，且议补救之言，善后之策”，“知启”不足五百字，写了拒俄而且还从拒俄发轫，旁及全局：“若我人心稍懦，俄约一经许允，则东西各国执利益均沾之说，并起而图，德索山东，法占两粤，日据闽浙，英取长江，我最可爱，最可有为的大中国，岂不胥沦于异域，而尚有尺寸干净土哉！”如此一说，拒俄一役牵动全局。若争自由独非毕其功于斯则不足与也。此文署以“皖城爱国会同人敬启”，厘为陈独秀捉刀，不至为谬见。

^① 郑学稼《陈独秀传》上册第49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年3月初版。

据五月十七日《苏报》报道,安庆藏书楼“组织一爱国会,同时到者:大学,武备桐怀公学各学堂约二百人,外来者合计三百人以外”,那天时逢大雨,藏书楼本是前安庆敬敷书院残剩的房基上改建的局促窄小的议事堂,大部分义愤填膺的群众只得站在门外冒雨听会。大会“由陈君仲甫开演大旨,谓当今非提倡军人精神,断不足以立国”,报道说陈独秀的讲话“词情慷慨,满座唏嘘”。演说完毕,陈独秀提议即将成立的爱国会分设“演说”和“体操”两部会,并拟出版《爱国新报》,这些提议获得与会全体通过后,即“公举七人(陈君仲甫、潘君缙华、大学二君、武备二君、桐城学堂体操教习杨君)”为领导。会上“立时起草,向众宣布,如办有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侵凌云云”。从报道中可以看到在陈独秀的设想中拒俄运动应拓展为反对整个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全方位大运动,当然是以东南沿海一线的“独立”为限,这也许就是南北分治的观念罢。今天来研究他的演说,最重要的乃在于指出民众在国家观念上的劣根性:“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外国人性质,只争荣辱,不争生死,宁为国民而死,不为奴隶而生。”东西对比,令人汗颜。如果离开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民众被内外夹击得连起码的温饱都无从保证的经济条件以及长时期来封建奴隶教育害及心声麻木,是很难接受陈独秀所指的劣根性的;同时如若我们不了解陈独秀由于崇尚从古希腊民主政体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短裤党的英雄主义色彩的知识储备,那么把外国人说的那么爱国,也似乎太过击伤国人之心了,然而在当时却被听众所接受。在演讲中还提出了“三要件”即:“第一消息”;“第二思想”;“第三体魄”。关于“第一消息”,当今我们处在信息社会,容易理解消息对于决策的重要意义,在本世纪初,这又是陈独秀独特的思维产物,使我们记起他在策划扬子江防时提到电话和探照灯相仿。“第二思想”,陈说的是宣传,即“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其不许爱国,恐怕不可得”。“运广长舌”,指的是反复进行思想教育。顺便说一项资料:《广长舌》是幸德秋水普及社会主义的一部著作的书名,于此亦可见陈独秀早在一九〇三年前就接触过社会主义此道了;至于第三体魄,则不必多费口舌,当时普遍提倡军国民教育,不论是东京的义勇队还是安庆的爱国会都把体操作为学生的主课,俾便“执干戈卫社稷”。

会议结束“由陈君由己提出《爱国会会员签名簿》……依次签名者一百二十六人”。实在是继上海爱国学社、东京留日义勇队之后排行第三的一支最大的拒俄队伍。由陈独秀和潘赞化兄弟、王国桢、葛光廷等议决的《安徽爱国会拟章》分宗旨、义务、办法、规则、戒约等七款。在《戒约》中有两条可谓居当时拒俄诸公约的领先地位,一是“戒主张各人自由,放弃国家公益”;另一是“戒盲昧仇洋”。于今,似乎不必解释,在当时第一条显然为的是强调集体主义的军事行动(军国民教育中的首要),至于后

一条,我们也许可以认为陈独秀等毕竟是出洋留学过而知道外国人不尽然是帝国主义帮凶,就像鲁迅形象地所说,外国人也不都是到中国来请人“吃外国火腿”(踢人),也有为我中华的正义之士,因此义和团的“灭洋人”的口号万万喊不得,如时髦一点解释,则当年陈独秀已萌生了国际主义的意念,这也是孙中山遗嘱“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思想。

安庆爱国会拒俄运动之所以动作快捷并取得很大的成绩,在归结于陈独秀们的斗争智慧斗争策略以及雷厉风行的作风之外,还与改版后的《苏报》上开辟《学界风潮》栏及时而又详情的宣传报道有直接关系,还与章士钊是当时《苏报》主笔断不可分,不仅上海《苏报》,连刚创刊不久的天津《大公报》以及保守的《中外日报》和出版才几天的《国民日报》都刊登陈独秀和安徽拒俄运动的消息报道。

几乎与上海、东京、安庆等地拒俄会议同时,这些消息就引起了清廷严重关注,以端方张之洞为首的镇压此次运动的联网很快组成,严禁严拿严办以至就地正法的密电密札羽书遍及南北,安庆藏书楼是侦察此案的重点之一。

六月七日,即《苏报》登载《安徽爱国会拟章》的当天,《中外日报》刊出《安庆近事述函》一文,文中说,某日“安庆府知府某忽然身率差役,至藏书楼内,将创办之少年人数名拘执而去,并出告示,将学堂封闭”。一千人等被拘执至府衙,“即签差往拘学生。所拿之学生等系甚有体面之人,得巡抚出面干与方已。不然,则定受该府非凡之虐待矣。此数人者,现已获释”。五天后天津《大公报》刊出的《禁止演说》一文中把《中外日报》的消息具体了:“爱国会陈、潘诸君因东三省事于前月二十一日(按即公历五月十七日——引者)会议于藏书楼,演说设立社会事,桂太守亲赴藏书楼宣谕禁止外,旋出告示”,消息中转载告示全文。“访闻近有由东洋游学回国之人,在该处私设社会,演说悖妄之词,摇惑人心,实属荒谬,有违国家法律。”这是篇极其珍贵的资料,上述两报两条消息,就可以确认陈独秀的确在拒俄演讲会不久被“拘执”过一次,因为桂太守以为陈独秀等乃“甚有体面之人”遂没有施暴政。的确在安庆地面上的秀才郎又刚从日本回来的陈独秀可算是个人才,且又是赏花翎顶戴的陈衍庶的继子,夫人又是将军之女,同僚桂英太守放他一马,实亦情理中事。但到了半个月之后,清廷外务部向沿海诸省包括安庆在内的各督府发出“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的密电令,陈独秀等就面临“二进宫”的厄运,只得逃跑,“闻其被释以后将暂往日本避难,是亦殆为上策也”^①。陈独秀没有及时去日本而躲到了上海。其时,章太炎和邹容已因“《苏报》案”入狱,但并不寂寞,结交了著名诗人陈去病及生于安徽芜湖的四川人文史学家

^① 以上考证引文均引自《拒俄运动》。又,目前陈独秀研究界公认陈一生被捕5次,其实应加上这一次,共6次。

谢无量、陈大复等热血青年，又与苏曼殊相会，结交了后来成为章士钊的纪实创作《双枰记》主人翁的何梅士。陈章何苏朝夕相处，章士钊有言道：“余与何梅士居上海，形影相续者半年有余，无一日不促谈至漏尽。安徽陈由己，亦与余及梅士同享友朋之乐也。”^①陈独秀亦留下“何郎弱冠称神勇，章子当年有令名”的诗句记录了他们的友谊。

到上海后的陈独秀虽与《苏报》与《警钟日报》都有联系，又与章士钊蛰居昌寿里之偏楼主掌《国民日日报》没日没夜拼命工作，有章诗为证：“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但陈独秀除发表了几首诗外，没有留下激动人心的文字。在此期间有一件名声历久不衰的是《国民日日报》从十月八日起以“法国大文豪器俄著，中国苏子谷译”的署名长篇连载到十二月一日的《惨社会》。雨果名著《悲惨世界》是五部逾百万言的巨著，苏只译出第一部第二卷的若干情节加以中国式的改写，但与林琴南译“泰西小说”不同，或者说不忠于原作的任意添加远超林译。而且添加的是发泄愤恨的时政内容，不过无论怎么说，把雨果这部巨著率先引入中国之功不可没，至于如何改述如何添加而又如何抨击世弊，我们只看鲁迅的小说集《故事新编》也就达到了阅读时的心理平衡。就词章清丽直白雅达，则以现代白话的要求《惨社会》也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陈独秀的功力了，因为“这时曼殊汉文根基尚浅，文字亦不甚通顺，仲甫隐然是他的老师”^②。《国民日日报》停刊，《惨社会》被腰折，据陈独秀回忆“有甘肃同志陈兢全在办镜今书局，就对我讲：你们的小说，没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若你们愿意出单行本，我可以担任印行，我答应了他，于是《惨社会》就在镜今书局出版，并且因为我在原书上曾经润饰过一下，所以陈君又添上了我的名字”。据核查经陈独秀改名为《惨世界》出版的苏译是一九〇四年的事，其时曼殊早已离沪溯江而上经武昌漂湘水到长沙与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等老友新朋筹建华兴会，又掀起了狂热的革命劲头。

陈独秀则接手了这十回本的“殊不成句，且作字乖八九错”（章士钊评语）的译文续完十一回又增译编了三回到小偷金华贱“石头人似地跪在马路上树荫底下，面向着孟主教大门”忏悔他的恩将仇报的第十四回。柳亚子认为“推翻器俄原书结局，把孟主教改为贪和尚的是苏曼殊；而推翻苏曼殊的翻案，依照器俄的本意，把贪和尚恢复孟主教原来地位是仲甫”，继而得出结论：“不完全的《惨社会》是曼殊原著，完全的《惨世界》却是仲甫所成并修改了的。”但陈独秀实在也没有全“依照器俄的本意”，他在为曼殊修改前八回时也渗入抨击时弊揭发阵营内狂妄之徒的故事：“朱菱溪，湖南时务学堂头班生，镇艾人，为人卤莽灭裂，在挟同学，使派己充代表，回上海组织民权社，经

^① 载《警钟日报》1904年4月25日《杂录》栏章行严悼何梅士诗。参见章著《双枰记》。

^② 柳亚子《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有关陈苏与《惨世界》并柳亚子相关回忆除另注外皆出此书（三）“专考研究类”中的两节。不另注。

营出版事业。迷于狎邪，所事不终，陈独秀在《惨社会》小说中露骨攻之，菱溪大怒，必狙击陈独秀然后快。时独秀与吾同居，经调停始无事。”^①这个故事被安在第八回里。其实当《惨社会》在报上连载或镜今书局单行本，读者除了看一种外国小说的兴趣外，主要还是看改头换面抨击时弊，借题发挥掺入当时改革与保守，反清和保皇之间的激烈斗争。甚至还有诸如“我们法兰西人，比不得那东方支那贱种的人，把杀害他祖宗的仇人（指清政府——引者），当作圣主仁君看待”这类雨果连想都想不到的种族歧视的话，陈独秀在煽动反清的民族主义情绪，还要作什么注释呢，至于一九二一年胡寄尘把《惨世界》交给泰东书局出版时，苏曼殊已去世三年，陈独秀已是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共领袖，再也无暇顾及文学作品的译著了。这一版被删除陈由己的名字改为《苏曼殊大师遗集》，实是镜今本的翻印。泰东版唯一贡献是把书名改为《悲惨世界》，并且袭用至今。

柳亚子说：“我以为仲甫在《惨世界》中，所要构成如此的结局，实在是由于他的贪懒，也可以说是由于他的才尽。大概仲甫续成此书时，写到十三回明男德自杀以后，已是筋疲力尽……”这段话是很费解的。贪懒？才尽？筋疲力尽？谁能信时年仅二十四岁的陈独秀如此三“尽”呢？然而轻易否定柳亚子的判断亦不对，若要知人论世，滑过这段话去写一九〇三年的陈独秀更是不作兴的。仔细估摸柳亚子的话是有些道理的，不过他是站在护卫曼殊的立场上所言，在陈独秀的立场，是因了拒俄运动受到官方镇压，引起知识分子和革命队伍内部分化：《苏报》案发抓走章、邹，吓退了吴稚晖，张继去了湖南，苏曼殊经湖南暂短停留南去香港欲借枪行刺康有为^②，陈独秀却仍在上海蛰居阁楼改写《惨社会》，实在腻烦透了，况且《国民日报》停刊，在上海已无安身立命之地，借《惨世界》之题发泄心中愤恨也够了，就匆匆（甚至可能是回老家后）结束《惨社会》，准备换换空气找寻新的刺激。这思想这行踪，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后为避蒋介石捕拿而躲在东京写上述那些分析时的柳亚子，并不知情，他只感到陈独秀笔懒，改得他以为相对苏译是不理想，却不知陈为何如此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

陈独秀回安徽筹创《安徽俗话报》是他早期革命经历中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一，从参与别人编报办刊，到主政一份刊物以自由陈述自己的革命主张，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二，用白话文办一份群众性的通俗报纸，走自下而上发动民众道路。与十年后的《新青年》“对仗”，是下里巴人在前阳春白雪殿后，而和者皆不寡，中国本世纪初的两个十年代，真是令人惊异的进步。

^① 《疏〈黄帝魂〉》。

^② 柳亚子《苏曼殊研究》第13页“……返香港、住中国日报社，欲以手枪击康有为，为陈少白所阻，不果”。

一九〇〇年前后,部分最早觉醒的知识分子大概受俄国民粹派的影响,纷纷走出书斋走向基层尤其走向小农经济城镇从事思想开发以启民智的工作,陈独秀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中就明白指出:“若说起穷人来,越发要懂得点学问”但又不能人人上学,怎么办?“就是买几种报来看看”,可是“现在各种日报旬报,虽然出得不少,却都是深文奥意,满纸的之乎者也矣焉哉字眼,没有多读书的人,那里能够看得懂呢?”于是就想到“用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写在纸上,作成一种俗话报,才算是顶好的法子”^①。据有心人统计,从一八七六年三月三十日上海申报馆发行的《民报》(日刊)起,到辛亥革命前夕,各地出版白话通俗报多达六七十种,造成这股声势浩大的议论白话化的运动,实在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强力发端。不管你承认或否定,都是对包括维新变法在内的秀才造反缺乏广泛社会基础的一个逆反,如果我们再大胆一点,也是对包括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起义等大批量群众参加的革命血洗的深刻反思,没有将近二十年的白话报艰苦创业,提高不了民众的自主意识和革命投入,就启动不了取之不断的兵源——农民的觉醒。后续的历史证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很多将领干才都出自文化素质很低的农村,不能全归结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这场民智运动,至少应当肯定白话报的先声作用,没有白话文化的普及,也许就难有五四运动的提高。令人稍稍意外的是陈独秀的很多当年叱咤风云的朋友,并没有支持陈独秀第一次以白话文启民智的事业,于是就落在了他的安徽老乡们的身上了。陈独秀回到了安庆,那时,潘赞化兄弟等拒俄义士,已远避日本,就与仍在家乡的房秩五、吴守一等商议出版事宜,最后承知名人士胡子承大力鼎助,陈独秀拿了他介绍给汪孟邹的信到芜湖科学图书社。胡子承致汪孟邹信写了如下内容:

陈君重甫拟办《安徽俗话报》,其仁爱其群,至为可敬、可仰;然内地风气至为阻塞,加以专制之官吏,专与学堂、报社为仇,若无保护而行此于内地,恐后祸未可预测耳。^②

胡子承的信写得坦诚感人。信中进而指出报有两种性质,一是“南北官报之官样文章,实无益于群治”,但如“欲输入东西政治文明之思想于吾群,则必受官吏之凌辱,不卜可知”。胡显然倾向于后者。一九〇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半月刊《安徽俗话报》第一期迅即出版。如果我们知道芜湖科学图书社没有印刷厂,稿件由陈独秀集齐后寄往上海章士钊创办的大陆印刷局印刷,再把报纸(十六开二十页的书册型)运回芜湖,

① 以下注明办报宗旨的引文皆出于《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

②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3页。

陈独秀又投入繁琐的分发邮寄等工作乐此不疲。从拟议出版计划到面世前后才两个月光景,其速度,即技术发达至今日似亦不能望其项背,这就是革命的光和热摄发出的奇迹。五十年代中在一派极左反右声中,与陈独秀共同办报的房秩五偶然在冷滩上购得四本《安徽俗话报》,不禁老泪纵横,“怆然有感,追悼三爱”作诗一首并序以记五十余年前往事:“三爱为故人陈仲甫主办《安徽俗话报》笔名也。忆余在清光绪庚子前后,作童子师于安庆,结交仲甫。仲甫少余两岁,意气甚豪……仲甫几无日不来校,纵谈时事,极喜笑怒骂之雄。一日约共办《安徽俗话报》,余任教育,守一任小说,余稿悉由仲甫自任之。”诗中有句曰:“苍茫五十年前事,贝叶重 缙益惘然。”^①在惟恐累及身家性命的黑暗时期斗胆以收集窝藏托派领袖的言论,并写下文情并茂的诗篇,亦只得向壁而泣:“往事苍茫谁与语,侧身两望泪滂沱。”真是醉人的友情!

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共发表文章十七题五十一篇,除三篇未署名余皆署“三爱”。据查“三爱”是陈独秀、实、撒翁、只眼之外,用得最多的笔名,根据报上文章内容分析,“三爱”寄寓爱国爱民爱自由。

据陈独秀亲拟的俗话报的读者对象是低层的工商学,男女老少咸宜。他还鼓动“做官的”和“当兵的”看此报,前者看了“可以明白各地的利弊”,后者看了“可以知道各处的虚实”,把工作做到统治国家的层面上了。因此它的内容是省内外新闻、历史地理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戏曲、商业和生财之道的各类技能,还刊登政府文告启示律例以及读者询问等等五花八门无所不容。如小说门中指出欲登当代“人情事故、佳人才子、英雄好汉”的故事,“包管比《水浒》、《红楼》、《西厢》……还要有趣些哩……”他自己写了小说《黑天国》,讲的是沙皇俄国把男女政治犯发配到西伯利亚(黑天国)服苦役的故事(发四回,未完)。从小说中提到伊哥克(即伊尔库茨克)拿木士克(即鄂木斯克)以及“机布府大学”(即基辅大学)又提到发配在矿坑的囚犯中有诗人、学者、军官,还有波兰人等等情况看,很可能是俄国十二月党人案以及无政府主义流放者的生活写照小说的杂凑。至于小说中:“原来俄国也是一个专制政体,君主贵族,独揽国权,严刑苛税,虐待平民,国中志士,如有心怀不服,反对朝廷的,便要身首异处”等等描写,你尽管可以当作“时事”来读的,不如此这般就不是陈独秀了。

俗话报还考虑到老百姓讲究实际而提倡“凡有新鲜巧妙的法子,学会了可以发财的”并鼓励本来就会做生意的“徽班”商人看俗话报“格外大发其财,我才喜欢哩”。在这类有些油腔滑调而又包罗万象的内容中突出的一条是:把政治把国家大事把民族兴亡的时势及时向闭塞的穷乡僻壤传递。陈独秀在这报上披露的第一篇文章《瓜分

^① 《陈独秀诗选》“附诗”第 133 页。下同。

中国》^①，全文以急迫的心情从八国联军、辛丑条约重新瓜分中国、俄国独吞东三省说起，再揭露中国政府的腐败和军队不堪洋枪洋炮一击的现状，把无法抗拒的“国破家亡”的厄运摆得一清二楚，接着向读者发问：“唉！大家睡到半夜，仔细想想看看，还是大家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保身家不问国事，终久是身家不保，做亡国的百姓好呢？！”全文到此，戛然而止。如果这位读者读到这儿，还能睡得着觉，可真是死到了家了。

在第一期上，三爱还发表了《醉东江·愤时俗也》词一首，“眼见得几千年故国将亡，/四万万同胞坐困/……好长江各国要瓜分，/怎奈你保国休谈；/惜钱如命。/拍马屁，手段高，/办公事，天良尽。/怕不怕他们洋人逞洋势，/恨只恨我们家鬼害家神。……”这首大白话词可以说是新诗投身文化革命的第一篇，至于这首辛辣地讥讽嘲弄挖苦卖国政府卖国官僚的歌一直唱到什么年月才算是唱到了头，彼此记忆犹新，不必在此唠叨的。属于唤醒民众投入保家卫国行列的还有《说国家》、《论安徽的矿务》、《安徽的煤矿》、《亡国篇》等，在这类文章中显示出未来的领袖人物的国势调查社会调查的功力和科学求实精神，这正是通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知识储备和方法论。在分七次登完的长文《亡国篇》中，陈独秀例举全国连贯东南沿海并深向中州、云贵边陲二十多条铁路和九省十四个大型煤矿落入洋人之手，轻重工业及其农林牧原材料和能源大部成为外国资本，民族资本主义不得发展，还有关系到国家政权的治外法权、国防权、航路权和关税权等等资料详尽数据充足简直可以称之为统计学论文，但结论不是向读者交待数据，是用坐实的数据向读者宣告：改朝换代不算亡国，帝国列强用大炮用鸦片使中国屈服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就“不必要外国人来当皇帝”，这国家“却真是亡了”。当时还没有对这种国势造出一个“半殖民地”的政治词汇，但这个词的性质已被陈独秀圈定。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安徽俗话报》正是由于这些无可辩驳的火辣辣的文章，深得大众的赞赏，销路剧增至四千份，行销全省并及上海等长江沿线城镇，还远走华北和东北，计有五十八个代派处，名声大噪。以上例举诸文所论是国家大事，而如《恶俗篇》中谈婚姻的，却撩拨着广大青年男女的心，也击中了顽固守旧派的要害，破纲纪伦常，破三从四德，破宗族权威，破金字塔式的家庭传统，而当把外国的离婚法律介绍入俗话报后，被卫道者所千刀万剐的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真正地动摇了中国传统封建专制主义的根本。男女不平等是一切压迫和剥削的最原始形态，中国尤盛，以至开明若胡子承，亦对《恶俗篇》忧心忡忡：“至《俗话报》出版以来，同人皆颇欢迎，而局外则多訾议。如‘自由结婚’等语，尤贻人口实。其实此时中国人程

^① 本节所引陈独秀发表在《俗话报》上的文章，除另注明外，皆引自《陈独秀文章选编》文本，不另注页码。

度至‘自由婚姻’尚不知须经几多阶级；若人误于一偏，不将‘桑濮成婚’概目为文明种子乎？”又说“鄙人甚敬此报，甚爱此报，而又不肯随声附和此报，意欲更图改良，立定宗旨，可乎？请与重翁等商之”。胡子承一辈深知中国封建传统积重难返，又碍于太过激进而冒犯上下，难能可贵是他确实支持新潮派的陈独秀，万不可伤了“重翁”的革新精神，在另一封信中说：“重甫兄血性过人，于社事尤为关照，凡事请与酌行也。”^①时年二十六岁的本传主人的品德、性格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受到这般爱护，足见他确实有受人倚重的魅力。

崇尚武力，以为中国之受列强鱼肉之累，谁都可以在中国版图上割地、索赔、镇压民众，就是民众缺乏尚武精神和手中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逃亡到日本的梁启超面对瓜分殆尽的中国，总结出的一条重要原则是：“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他甚至语出惊人：“今日之世界固所谓‘武装和平’之世界也。列强会议，日言弭兵，然左订媾和修好之条约，右修扩张军备之议案。盖强权之世，惟能战者乃能和。”^②如若不注明出于梁启超之手笔，怕以为是当今报上批判穷兵黩武的时论了。这实在是进化论弱肉强食自然规律引入社会机制后解决侵略与自卫，使民族独立的极限手段。陈独秀深通此理，他不仅在《亡国篇》诸文中大力申诉“各人尽心国事，弄得国富兵强”，又在《东海兵魂录》借一九〇四年二月日俄海战一役，指出日军大胜的原因在于兵民皆具“轻死好战”、“尚武轻文”的“大和魂”，以鼓励国人应重视战斗精神；又撰写《中国兵魂录》两篇借历史上爱名将的故事激发老百姓的尚武精神，这也是陈独秀性格刚烈一面的反映。他还写了《枪法问答》三则，这类知识性的文章如同他写的万国地理相仿，已没有现实意义了，但这又与别的失时文有些不同，因为，这是在新军洋式操典及新式兵器传入中国的初期，又逢组织拒俄义勇队，又面临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不但热衷军国民教育还热衷于无政府主义、俄国虚无党和阴谋学派的暗杀行为之期。枪法，制敌于死命的最基本常识显得很重要，同时我们从三则《枪法问答》中看出，就当时的步兵单兵战术，作者的确精于此道，实为西方武器东渐史留下光彩的履痕。文中提及营级单位步兵行动中的协同作战与步兵枪法要则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一段说：“若离敌近，子弹去的路很直”，“若是离敌远了，子弹去的路很弯”，这已涉及到弹道学理论了。^③陈独秀不是说着玩儿的，因为其时正是他去上海参加暗杀团和回芜湖组织岳王会的革命实践阶段。下面将予陈述。

① 《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6页。

② 引自《梁启超文集》上册第151页《论尚武》。

③ 《枪法问答》及上列的《安徽的煤矿》和三篇兵魂录，皆转引自《党史资料》1980年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不到两年,至一九〇五年九月出了第二十一二期合刊号停刊。停刊的原因好几条,据说是“因登载外交消息,为驻芜湖英领事要求中国官厅勒令停办”^①,但并未到立即查封的危地,主因还在于陈独秀不愿办下去:“记得我大叔说过‘仲甫的脾气真古怪哩。《安徽俗话报》再出一期,就是二十四期,就是一足年,无论怎么和他商量,说好说歹,只再办一期,他始终不答应,一定要教书去了。’”教书,指的是“到李光炯先生办的学堂里去教书,其实是干革命工作去了”。在办俗话报时,陈独秀也没有放弃别的立志革命的机会,他有使不尽的精力,当一九〇四年初他单身过江来到芜湖科学图书社靠“每日吃两顿粥”的清苦生活编报,立下“推倒一时豪杰,扩展万古心胸”时,就结交了李光炯、卢仲农、柏烈武等皖地革命志士,但还不到他离开俗话报的火候,仍安心“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命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现在回顾陈独秀在俗话报上发表的几十篇文章,一是感到他的学问宽泛,除了上面分析过的外,他还游刃于中国古代历史,中外地理,戏曲理论,甚至饶有兴致地告诫妇女,装扮乃束缚个性成为男人玩物的象征,包罗万象无所不论,正暴露他胸无改革底藪及长期离群孤战的烦躁心情。像这样漫无边际的编下去写下去,且别说胡子承啧有烦言,连他本人也会山穷水尽不禁厌烦而产生立地走出编辑室再投入革命实践的念头。

正在此时,国际国内局势急剧动荡和革命志士对反清斗争的紧迫感,也使大家考虑采取更激烈的手段。

一九〇四年底,陈独秀编定第十八期报,还未来得及去安庆过春节,一九〇五年一月,俄国发生了“俄皇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鲁迅语),标志着横跨欧亚大陆两大地理板块的“最野蛮、最中世纪式、最落后的亚洲国家”(列宁语)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这对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主义革命起了莫大的促进。果不其然如此,同年八月,孙中山终于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和滞留在日本的部分光复会会员组成中国同盟会,确立了三权分立,提出了三民主义,并正式亮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宣言。以推翻清朝结束封建制度社会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指日可待。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高度评价孙中山组建同盟会的历史意义,认为,“中国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基本上还是统一的。产生最深刻分歧的问题——即应向西方学习多少以抗拒西方的问题——并未使一些人产生推翻传统制度的认真打算,甚至没有产生这种倾向”^②。分析是中肯的。当时激烈至于准备远走满洲与沙俄军队拼个死活的学生军,想到的并不是派代表到上海到全国各地联合同道胁迫政府根据

① 房秩五回忆。

②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晚清史》下卷第5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版。

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去向清朝政府握军事实权的北洋大臣袁世凯请缨，以助清军一臂之力，甚至有人热昏到“欲求日本援助，并求日本转求各国援助”云云。^① 就是陈独秀本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封建是强烈的，但推翻国家机器尚停留在激奋的感情阶段。

一九〇五年二月，仍在维持俗话报的陈独秀，参与了李光炯、卢仲农把原在湖南长沙的安徽旅湘公学回迁芜湖设安徽公学的事宜，这个学校在长沙时就曾集纳过黄兴、张继、赵声以及后来的苏曼殊等教员，引起政府严重注意，于是就有迁回之举，据安庆岳王会外围组织“维新会”成员高语罕回忆：“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湖南时的教员虽未随迁来皖芜，但很快又将刘师培、柏文蔚、房秩五，陶成章、张伯纯、周震麟、谢无量、冷荒、江彤侯、俞子夷、张之屏等请入教席，苏曼殊南转了一圈也到了该校。“安徽公学成了当时中江流域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成了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总汇。”^②既是中心，总得有个组织，果然如此：“安徽公学迁芜不久，陈仲甫、柏文蔚、常恒芳等就有‘岳王会’的组织，这个会的取义，是要大家效法岳武穆的‘精忠报国’，实际上是一个专搞军事运动的机关。”难怪陈独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作《枪法问答》了。不久，安徽公学师范班学生常恒芳应安庆尚志学堂邓绳侯之请赴任该校任教导主任，安庆就有了岳王会分会。安庆分会及其外围组织几乎全是军人，他们经常在迎江寺宝塔里集会，或在大观亭后面的树林里议论，但集会议论些什么则无口碑或文档资料，连陈独秀乘回家省亲之机多次向尚志学堂和岳王会会员演讲的历史亦无从查考。

柏文蔚（一八七六一—一九四七），安徽寿县人，安庆武备学堂头班毕业后去芜湖入安徽公学任体操教师。在这之前他已有与赵声等在南京组织强学会密谋反清的光荣历史，在他与陈独秀组成岳王会之后不久，应时任新军三十三标二营管带赵声之请去其营任训练队长，后任第九镇管带，于是岳王会又多了一个南京分会，会中亦多军人。他们都受命于芜湖总会会长陈独秀的领导。岳王会大概有点类似法国大革命时期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家布朗基（一八〇五—一八八一）领导的“四季社”，有一套严格的人会议事、秘密活动纪律，不轻易发展会员，为了壮大力量，各地岳王会相继成立过若干外围组织，如常恒芳、熊成基、范传甲等在安庆成立过“维新会”、“励学会”、“同心会”、“华族会”，都是会员独立负责行事的小组，柏文蔚也利用他武备学堂的身份成立“同学会”以扩大影响，而岳王会的全部秘密组织的一整套形式和内容，在当时只有陈独秀一人有经验可以借鉴或供资证，因为他在筹建岳王会前即一九〇四年秋冬之交在上海参加过上海军国民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爱国女校联袂的暗杀团。

^① 《拒俄运动》第172页。此昏话当场就被批驳。

^② 《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下同。该文运用了高语罕《入蜀前后》和《百花亭畔》中不少相关资料。

暗杀团原本是东京学生拒俄义勇队派赴回国吁请清廷与沙俄宣战的汤尔和和钮永建遭致拒绝后回到东京,由原军国民教育会中最激进的杨笃生、黄兴、周来苏、苏鹏等组成的秘密团体。暗杀团很快渗入国内活动,而上海暗杀团成员则几乎囊括了蔡元培、章士钊、刘光汉等革命宿将,杨笃生则亲自到上海以此为革命据点,陈独秀就是由他监誓入团的。这是个布及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长江沿线并深入保定、天津、北京等清廷心脏地带的极其庞杂的组织。我们无法在此详作考查,可以这么说吧:义勇队“拒俄御侮”其宗旨是帮助清朝攘外安内,是护国主义团体;军国民教育会则是“革命排满”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统治,是民族主义团体;两者之间可以划一个旧新交替的句号。陈独秀参加暗杀团有他自己的回忆:“我初次与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是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子民先生也常常来实验室练习,聚谈。”^①清朝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补编修满腹学问又近视眼的蔡元培先生都感到毛锥之不敌冷热兵器而加盟暗杀团:“吾泱泱大汉民族”子民实在是被“国朝”统治到发疯的程度了。后来包括本传主人在内,都谴责过暗杀团行为,笔者以为于此不可一概而论,亦有个时代风气、革命潮流和确否必要的选择,李大钊倒是对暗杀有过一次比较公允的至少是介乎于可行可不行之间的分析,谓之曰:“暗杀可倡于有德之群,不可倡于丧德之群。暗杀可行于英雄,不可行于盗贼。暗杀于英雄,则除奸诛佞,长义侠之风功乃比于甘露杨枝。”^②话虽如此说,但要这帮秀才去实行,太难为他们,这里举个有趣的例子,陈独秀加盟暗杀团不久,有安徽志士万福华“闻前桂抚王之春有勾结俄人侵略东三省之举,异常悲愤,乃向友人假得手枪一枝”,并约集了一帮志士把王之春哄骗到福州路金谷得西菜馆,“即举枪击之,以不谙先拨机制(按即保险栓——引者)然后放枪之法,攀机十余次,均无子弹射出”^③,被暗杀者虚惊一场,暗杀者被外国巡捕投入监狱,总算没被引渡,辛亥革命后获释,闹剧一场。蔡元培们实在是弄不得刀枪的。

中国为暗杀而最早研习炸弹的是湖南人杨笃生(一八七一一—一九一一),他与周来苏、苏鹏等在日本研习炸药,曾因此而炸瞎一眼备受折磨,当他和上述二位并张继、何海樵等人京谋炸西太后不成,即先后潜回上海发展蔡元培为暗杀团重要骨干,蔡不仅找秘密试验室,购置仪器和制作炸药的甘油、硝、硫等化学药物,还立即发展爱国女校懂化学的钟宪鬯和俞子夷加入作为技师,因是极端秘密,首开学习时,试验室“设黄

① 《蔡子民先生逝世感言》。

② 引自《暗杀与辟德》,载《李大钊文集》上册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本章所引李大钊文皆出此文本,不另注。

③ 《革命逸史》第2集第78页。

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各签名于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乃开始教授制炸药之法，若干日而毕业”^①。炸药造成了，装在由黄兴和蒯若木从日本秘密带来的弹壳里，做成了十多枚，由孙少侯秘密带到南京郊外试验，没成功。复又经杨笃生参与下试验多次才成功。蔡元培兴奋地说：“未久而中国第一炸弹，发于考察宪政五大臣车上”，这枚炸弹是由吴樾引爆的。

吴樾(一九八七—一九〇五)字孟侠，安徽桐城人，家贫，一九〇二年由吴汝纶介绍到保定师范学堂读书，同学中有张啸岑者是陈独秀大嫂的弟弟，一九〇三年他与张啸岑以及马鸿良、金慰农、金燕生等返皖度假途经上海时认识了陈独秀，一见倾心相见恨晚，回保定后又认识了赵声，而赵又是陈的密友之一。其时岳王会尚未成立而暗杀团则已经派出各路人马，其中一支由杨笃生(化名宋红)等密藏炸弹潜到北京伺机行事。一九〇五年春岳王会成立不久，吴樾写了绝命万言书决心以身殉国，为此他利用假期回家安排老父少妻诸后事并专程去芜湖与陈独秀和赵声握别。回北京后与杨笃生商议时，正值谕旨重臣载泽、端方、绍英、戴鸿慈和徐世昌出洋考察立宪事宜。九月二十四日，吴樾携炸弹混入北京正阳门车站接近了五大臣，但因仓促间炸弹受震提前引爆，五大臣中仅载泽和绍英受伤，吴樾则当场牺牲。此举影响极大，推迟了清廷以立宪为由的苟延。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胜利，陈独秀在缅怀已故友人的诗中曾沉痛哀念吴樾：“孟侠龙眠有老亲……碎身直蹈虎狼秦”。策划暗杀五大臣的杨笃生后来远走英伦并恰在陈独秀作诗悼念吴樾之时于“六月十三日忽投利物浦埠之大西洋海岸自尽”。陈独秀若知此下场当亦会悲歌一曲悼笃生的罢。

辛亥革命胜利后，安徽革命者为追念皖籍烈士勋业，搜集范传甲、张劲夫、李朝栋、薛明甫、张星五、周正举、刘志贤和吴樾等九位英灵遗骸，合葬于安庆西门外平山头，此事由陈独秀撮成，由当事者张云屏作墓表，柏文蔚书石以记烈士事迹，并得孙中山手书“皖江九烈士墓碑”之殊荣。安徽义士当然远不止这九位，但这九位革命志士的烈火全都是陈独秀点燃或助燃的。

岳王会以安庆和南京两会(或称“分部”)力量最巨，孙中山派员回国发展组织时，这个石头城就成为重点，又因当时“专力军事行动”(陈独秀语)，因此以柏文蔚为首几乎全由军人组成的岳王会就成了孙中山派往南京的皖人吴春阳(旻谷)动员入盟的骨干队伍。柏文蔚回忆道：“是年秋，孙中山派吴旻谷来组织长江流域同盟会，余首先领导岳王会全体同志加入……公推赵声为长江盟主，另设机关于鼓楼之东，并选定玄武湖之湖神庙为会议地点”^②。但是光复会于前同盟会迤后，都与安徽的岳王会没有组

^① 俞子夷《蔡元培与光复会草创期》。有关制造炸弹并和吴樾炸五大臣事见《蔡元培年谱》、《蔡子民先生传略》、《杨笃生传》、《吴樾烈士事迹》(张啸岑)等资料，不一一注明。

^② 《五十年经历》，载《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织上的联系,南京入盟的岳王会员也无以会为组织单位的革命行动,加盟一事想来陈独秀知情,但却没有任何表示,且亦无任何资料可以认定南京岳王会有举动。会员中最著名的倪映典后来是作为安庆马营管带参加的安庆起义,马革裹尸于一九一〇年广州新军起义阵中。柏文蔚直到二次革命才动的武,陈独秀则根本没加入同盟会。

对清廷的安徽统治发生大震动的两次起义中的熊成基安庆起义与同盟会无干,是岳王会全体将士的独立行动。徐锡麟起义虽与岳王会无组织联系,然据时人的权威回忆,有会员参加则无疑。① 徐锡麟是一九〇六年赴安庆任职,期间陈独秀返家有否与之接触互通革命信息虽无资料却有线索可绳,常恒芳曾在回忆中说他的会员中有徐锡麟的密友石人俊,因此他和他的会员们常受邀赴徐的家宅或巡警学堂把酒论当世,如朱蕴山(一八八七—一九八一)他参加了徐锡麟起义,被捕,与徐同时押赴刑场陪斩,表现出了岳飞视死如归的气节。辛亥前安徽革命形势以陈独秀家乡最激烈,是很值得研究的,这不应该再受制于托派不托派了。

熊成基安徽起义失败后,安徽岳王会再没有实行过大的行动,本世纪初十年频繁的起义可以说除了造成大清王朝处于烈火烽起四面楚歌的政治效应之外,从军事的角度全部以惨败告终:一九〇六年萍乡、浏阳、醴陵起义,一九〇七年两广的黄冈、惠州、钦州、镇南关起义,东北所谓“马侠”受命宋教仁等的抗清斗争和四川泸州、成都和叙府起义,直到秋瑾轩亭口被斩首、熊成基到哈尔滨谋反不成就义长春,倪映典战死广州,终于黄花岗革命悲剧,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在革命起义中的民勇们糊里糊涂地陈尸疆场或绑赴刑场,留不下几多教训,而决策人物或干才的死亡,就引起领导层的不满和反思。对于这类问题最早作理性分析的则是陈独秀,他总结多条,其中有一条说:“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革命自然应做军事行动,然而在没有相当的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以前,即贸然做军事行动,且专力于军事行动”,就等于列宁所批判的“暴动儿戏”,陈文中说“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自始即失之过早,辛亥革命也因早熟而失败了”的结论是有道理的。② 近年有学者认为陈独秀的这一分析写于一九二四年,因此不足以证明在一连串起义的当时就有如此的清醒头脑,“但对追述和分析他之所以不加入同盟会的原因,仍然有参考价值的”,但是笔者不敢苟同说陈独秀“不加入同盟会,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都是不值得颂扬的”,因为:“同盟会毕竟是在全国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的一个革命‘旗帜’”③。是“旗帜”就得参加?这不合陈独秀的倔脾气和独立思考的思维习惯,陈独秀一直对同盟会有意见(或者认为是成见

①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392~398,438~441页相关资料。下同。

② 《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中册第592页。

③ 任建树著《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第71~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亦可),他认为:“左派首领孙中山等,生长在广东海岸外国新式产业发达的地方,所以产生了三民主义革命的理想;右派领袖黄兴等,生长在湖南内地农业社会里,所以抱定了简单的排满理想。这两派革命的宣传,自然也就不同:广东派的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等,在《民报》上便有一些关于民权、民生的理论;而湖南派的陈天华、杨笃生等,都只有激烈的很流行的排满小册子。”^①有一则回忆中说:“陈独秀对于当时的同盟会人士,除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外(他很佩服他们),他认为都是些平庸人才,不足与谋,也不足与言。”^②前引是理论阐述中带有情绪,后引是情绪中有理论,把这些归结起来,岳王会时期的陈独秀尽管摆不脱排满抗清的时代潮流,但他已经在考虑未来革命引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 and 运作,因此他欣赏在“外国新式产业发达”的地区成长的头脑,决不会把革命终止在内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上,这说明同盟会这面“旗帜”上已分出“西”和“东”,说到底,是先进的生产力冲击落后的生产关系,西方资产阶级的立国思潮在引导着本世纪初的东方革命实行家们要赶紧解开狭隘民族主义情结。上述陈独秀的引文和别人的相关回忆都说明了这个使我们写起来倍觉枯燥的理论问题,已经困扰着陈独秀,因此,我们以为陈独秀不加入同盟会(但也并没有阻止岳王会加盟)以及嗣后直到辛亥革命,约莫三年间“与实际革命较为疏离”^③,是思想家在沉思;或在实践之后的闭门思过,说得抒情一些,是“伟大的孤独”期。不承认“疏离”,以为此说“是无足够的证据”,却又例举不出仍在革命旋涡中翻滚的“足够的证据”^④,实在是好心肠者以为革命家只有马不停蹄地在革命道上奔跑才不失革命本色。这种错误观念不知埋没了多少革命干才,叶挺将军就是一例,这非本传研究范围,提此一笔却也不多余,因为陈独秀是熟悉叶挺将军的。

岳王会事业结束,陈独秀着实轻松了好一阵子,同时他过去的伙友如章士钊去了英国,吴稚晖、张继先后到了法国,也使他虽感寂寞却亦清静不少。从一九〇六年起他断断续续在芜湖徽州初级师范学堂,芜湖皖江中学等学校执教鞭,曾教授过语文、地理、教育学和日语(时称“东语”)。也一度出任过师范学堂的监学等职。一九〇九年深秋最后料理毕发妻晓岚及子女的生活后带着高君曼迁往杭州,定居到辛亥革命那年的年底。

轻松生活的见证,一是诗兴大作,一是研究小学和书写擘科大字。

据各种资料综合截至目前共发现陈独秀遗诗约三十九题百二十首之谱,作诗纪

① 《辛亥革命与国民党》。

② 引自濮清泉《我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③ 《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第91页。陈万里这一分析既符合传主当时的行踪亦贴切思想。

④ 李洪钧《陈独秀评传》第45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

年跨度起自一九〇三年的《哭汪希颜》，止于去世前一年的《挽大姐》，真是人生凄苦，始自哀音而终于悼念。遗诗中有三分之一即十二题五十首写于我们定为疏离社会革命的杭州孤独期。这时他在陆军小学堂和社会上结交了马一浮、刘季平和沈士远、尹默兄弟等文友，尤以刘尹二位最为契合，有诗为证：“病起客愁新，心枯日景沦。有天留巨眚，无地着孤身。大火流金铁，微云皱石鳞。清凉诗思苦，相忆两三人。”天上、地下，景色、气象，心枯意阑最忆朋友，诗题点破的就是刘三（季平）和沈二（尹默）。刘季平（一八八〇—一九〇八）曾与苏曼殊同学于东京成城学校，那时就结交陈独秀。刘季平不仅是名噪沪上的才子，而且以大无畏的精神把瘦死西狱并被弃之荒冢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遗柩偷偷运出并落葬上海华泾因而获得“义士刘三”的殊荣。因这三人的友谊伊始特别显出传主性格和旧式文人别具一格的交结，我们引沈尹默的生动回忆给叹人心之不古的当今留点传统——

光绪末年，陈独秀（那时名仲甫）从东北到杭州陆军小学教书，和同校教员刘三友善。……有一次刘三招饮我和士远，从上午十一时一直喝到晚间九时。我因不嗜酒辞归寓所，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的很好，字其俗入骨。”^①

尚未谋面，登堂入室即臧否主人，这种坦率非宰相之肚是难下咽的，“这件事隔了半个多世纪”——沈尹默继续回忆：“陈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发愤钻研书法了。”陈独秀任性脱口而出，听者终于咽下此苦口良药，并从此订交，而北大而《新青年》而四川，最后尹默诗以“鹤坪树老鹤不归，存歿之感徒尔为”，向潦倒的不归老鹤洒泪挥别。

据马一浮回忆，陈独秀那时“差不多每天都和沈尹默、刘三几个人到他那里去谈天，他们在一起，时常做诗，互相观摩，约莫也有一二年，不过仲甫先生不论做诗吟月也好，酒醉饭饱也好，有事无事，仲甫先生他一个人，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篆字，始终如一，比我们哪一个人都有恒心些”^②。这段回忆又令人记得沈尹默说：“在杭州的那段时期，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① 《我和北大·我和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230页。此作在别处刊登时有异文。

^②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60页。

于是就在素有“虎跑水龙井茶”之美称的茶亭里吟出的诗声：“……山绕寺钟外，人行松涧中……莫就枯禅饮，阶前水不穷……烹茶自汲水，何事不清幽。”

即使夜雪春寒冷冽日子亦因佳人好友而登临吴山的雅兴：“……相期素心人，寒空荡胸臆。登高失川原，乾坤莽一色……上有鹿皮翁，浩歌清涧壁，饥来啃坚冰，荒岩坐晨夕。不笑复不悲，雪上数人迹”，真个能成吴山上的隐士？回答是否定的——

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郊，犹自绝追攀。

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还。道逢王子晋，早晚向三山。

终于找到答案，“疏离”一时的斗争旋涡，并不是放弃政治立场从此脱离革命队伍，“黑风吹海绝地纽，羿与康回笑握手”。尽管“新得佳人字莫愁”，但诗却越写越沉重，写出了血，写出了羿射九日和共工颡项，看来，陈独秀是绝然采不成东篱之菊而命定“刑天舞干戚”的。况且定居杭州那年适逢“城头变换大王旗”，在起义节节失败，烈士纷纷倒下之中光绪改换成宣统，刚过而立之年的陈独秀却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登上皇基的事态中想到了自己周围的同志伙友肝脑涂地者不少，使他产生了鲁迅“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愤恨，要“滴血写诗报良友”，写了《存歿六绝句》以纪念六位烈士和六位伙友，为保存史料亦以此追悼这些早已逝去的英烈，我把已经引过的悼吴樾外的其他五位烈士的诗句摘于次：

悼何梅士：“何郎弱冠称神勇……白骨可曾归冥海”；

悼汪仲伊：“汪叟剧谈骋古今……论才恻惜老成心”；

悼熊子政：“熊侯垂死爱谭兵……淮上哀吟草木声”；

悼章谷士：“谷士生前为诤友……冢中傲骨成枯骨”；

悼葛循叔：“循叔耽玄有异同……东风吹泪落孤坟”。

这些都是诗，但录在这部传记中毋宁把它们看成中国近代血泪史之一叶则更惊天泣鬼神，加上还有未悼的宋玉琳、倪映典、薛明甫、张劲夫、方悖言、凌毅、范传甲等岳王会会员，全都没有活过辛亥革命……即使在《存歿六绝句》中存者：赵声、章士钊、孙少侯、郑赞成、江彤侯和苏曼殊六位，除章士钊外，似乎都没有活过陈独秀，有的竟也没有听到武昌起义的神圣炮声！

还能说些什么呢？还能说的是有些位岳王会会员和陈独秀的几位皖江密友虽然活过了辛亥革命又历尽苦难而活到了一九四九年，但等候他们的也未必是好果子。

南陈北李议论爱国心

写下此节题目,不禁又使笔者忽生宿命观念,历史又奇巧到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当事人在《甲寅》上议论爱国,爱何等样的国之类既抽象又满溢感情色彩的问题时,也不至于想到不出五年,他们竟然能超越因南北封建割据连辛亥革命成果都断送的绝境,引入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接轨。

李大钊小陈独秀整十岁,但他于一九一四年初“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时,已经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不只国学底渊深厚,还系统受过政治法律学业,通日、英文,并就民权、国家政体、宪法、经济学理,以及国内国际时事写过不少论文,其中像《弹劾用语之解纷》、《一院制与二院制》、《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法律颁布程序与元首》等论文,虽然带有北洋军政时期明显的局限性,但仍是民国之后介绍欧洲资产阶级立国制度诸问题的早期的理论媒介,当然,这门学问与主政《甲寅》的章士钊尤为对项入港。章士钊于一九〇七—一九一一赴英国研究的正是法律、政治等这类大学问,又长于逻辑学而特注重学理文章的明晰,及所论问题的科学性。当李大钊以《物价与货币购买力》和《风俗》(研究的是国家和国民群体的关系)寄给《甲寅》时,立即得到章士钊的赏识,马上写信约请李大钊到《甲寅》晤谈:“一九一四年,余创刊《甲寅》于日本东京,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从邮件中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巽言复之,请其来见。翌日,守常果到。于是在小万川林町一斗室中,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①李大钊在《甲寅》编辑部斗室里还认识了高一涵、易白沙和陈独秀。易白沙(一八八六—一九二一)因民元前长时期在安徽怀宁中学、安徽师范学堂主掌校务而与陈独秀是老熟人;高一涵是安徽六安人,时在明治大学法政科学习,与李大钊算是同修一门学业而与陈独秀则是大同乡。像李陈想不到五年后会成为马克思主义同道相仿,当时闷在《甲寅》斗室里的李高易陈亦不会想到当他们聚会《新青年》编辑部时,章士钊却成了他们的对立面;但友谊是不嫌政治而永存的,章士钊就怀念从那时起“以迄守常见危致命于北京,亘十有四年,从无间断”的友谊,而公然为“共党要犯”陈独秀辩护更属本传将要描写的重要内容之一,况且章大律师的辩护词也会使人记起《甲寅》国家政体问题的论争——是学问总要串在一起的。

陈独秀发表《爱国心和自觉心》的《甲寅》第一卷四期实乃空前,不仅上述五位《甲

^① 章士钊为张次溪著《李大钊先生传》所作序言,转引自朱成甲著《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第5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寅》朋友都有文章刊出，连远在美国的胡适亦以译作《柏林之围》名列该期。顺便说一句，法国小说家都德的反映普法战争的短篇小说，当时是作为爱国主义教材传入国门的，那也是时风。李大钊在《厌世心和爱国心》中就企盼中国出现“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的作家以鼓士气而消弭厌世心。这一期《甲寅》还以《杨笃生手写遗诗》为题配发《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一文，精制烈士手迹影印铜图十九帧，悼念这位叱咤风云又悲愤自沉的章陈老友。这里具引烈士遗诗《梦觉》以为蔡元培、杨守仁、陈独秀策划吴樾引爆“中国第一炸弹”之壮举划一句号：

驾鹅日夕念东飞，梦里神州觉后非。
凄恻荃菽余涕泪，青红儿女几甘肥。
分明短剑长挽在，太息渔标藓迹微。
万里白鸥聊可没，蓼云黄鹤詎无归。

《甲寅》第四期陈独秀还在日本，当李大钊发表《厌世心与自觉心》的《甲寅》第一卷八期出版，陈独秀已回上海踏上塑造他一生光辉业绩的艰苦卓绝的现代革命征程。

《爱国心和自觉心》可以说是陈独秀失望于维新变法历经武昌起义、民国成立到讨袁失败的前半生惨淡生涯的一个愤怒的总结。

全文以“范围天下人心者，情与智二者而已”开篇，即述：“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呜呼！国人其已陷此境界否耶？”^①

回答是肯定的，中国人已既无爱国心亦不存在自觉心，如果不大加挞伐这情智俱无的局面，亡国是肯定的。全文虽只四千余言，由于在严谨的结构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已经是民国三年的中国却仍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危地，并且面临倒退回封建制度的危险，“时政乖违，齐民共喻，以今之政，处今之世，法日废耳，吏日贪耳，兵日乱耳，匪日众耳，财日竭耳，民日偷耳，群日溃耳，政纪至此，夫复何言”。看着这些愤愤之言，听听这些刺耳之论，我们仿佛看到陈独秀瞪着眼睛垂首顿足之势。请注意此文出台的一九一四年的局势：

- 一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停止参众两院议员的职务；
- 二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 五月，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撤销国务院，中华民国名存实亡。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67~72页，下同。

尤有甚者——当陈独秀写《爱国心和自觉心》的前三天，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七日，日本占领青岛，控制了整个山东，埋下了迫使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这枚定时炸弹！正是这时局急剧滑向深渊之时，陈独秀在文中留下了不少令国人看了心惊胆寒又难以下咽的“举世怪骂”：“夫国民之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子遗，尚若天上焉。”简直比亡国奴还惨，这中国还自觉爱它干吗？还气到说出“如此国家，一日不亡……拥众攘权，民罹锋镝，党同伐异，诛及妇孺……海外之师至，吾民必有垂涕而迎之者矣”，“以吾土地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再引下去连笔者都有点儿感到陈独秀真是气昏气疯，气到丧失理智的程度。这是条重感情的汉子，他必定是想到“十次起义，十次失败”（孙中山语）密友伙伴肝脑涂地的业绩付之东流……他受不了啦，不发泄要疯了，就尽兴发作而成此引起“读者大病”的讨国檄文。四个月之后章士钊在发表李大钊的《厌世心与自觉心》的同时，他写了带有此场争论总结性的《国家之我》，文中有如下一段，说陈独秀文发表之后“愚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①。实际上是倾向陈独秀激愤之言的章士钊从理智上是持公允之说的，“今距此事（即指陈文发表）又数月矣，国中政事，足以使青年之士意志沮丧……不幸卒如独秀君所言，渐次为自觉心所排去。甲乙递传，如中恶疫，流行之广，速于置邮。”于是章士钊认定：“独秀君如汝南晨鸡，先登坛唤耳。”他还举公认的权威梁启超的言论为例，证明陈独秀文章经过反思是可以接受的，“夫梁先生方以不作政谈宣言于众者也，劝人不为煽诱刺激之论者也，今骤然与昨日之我挑战，其所为惊人之鸣，竟至与举世怪骂之独秀合辙，而详尽又乃过之”。是凡这些都是章士钊在为陈独秀的“举世怪骂”找台阶下，其心意是好的，但综观他的全文倒是分外理智地证引西方政治家国体观，期以找到“前已解散之国家，不爱可也；今后建设之国家，不爱不可也”的理由。

李大钊以“致《甲寅》记者”的形式写的《厌世心与自觉心》，从标题当即明白是为消弭《爱国心与自觉心》文中“举世怪骂”之副作用的。因此，全文以读毕陈文“伤心无已”起兴，引出两种厌世结局：“不为屈子之怀沙自沉，则为老子之骑牛而逝”，厌世者或愤恨或消沉具结于此，前者是刚烈的厌世心，后者是消沉的厌世心。担心的是怕陈文蔓延孳生而扩大轻生厌世的自杀率。他认为中国有三种人，一是“昏梦罔觉者”，一是“丧心溃气者”，再就是悉数寥寥的“聪颖优秀者”，他们是“国所不亡，命脉所系”的一群，恰恰是这群人中愤于袁世凯签署民国以来最大耻辱的二十一条而“或以精神，或以躯干，纷纷向以自杀之途”，如果这一群轻生“国真万万无救矣”，他在文中以远超过章士钊的论据，以资证国家再恶也得设法改变其恶势；至少“亦宜亟谋所以自救之

^① 引自《甲寅》第1卷第8号，下同。

道”。历来研究者都认为李大钊批评了陈独秀文中的错误^①，纠正了“举世恶骂”的副作用。如果因了陈独秀的“举世恶骂”而忽视了警世骇俗的积极的时代作用，完全倾斜于李大钊的纠偏，恕笔者直言，这是明显带有时代烙印的政治偏见。首先，《爱国心与自觉心》全文并非一味恶骂，是集中了大量的事实证明截至一九一四年的中华民国因政权陷在袁世凯手中而国家机器已经糜烂，根本谈不上爱不爱而是要砸烂它；其次，陈独秀在不爱它而厌恶它时也未忘为它开出一帖治本的药方，文中有如下一段：“自今日始，外不举债，内不摸金，上下相和，岁计倍增，年减外债若干，期以十稔，务使不为财政之累，然后十年教养，廿年治军，四十年之后，敌国外患，庶几可宁”，瞧，不仅开出药方连吃几帖治几时都给厘定，但袁世凯是根本办不到的。如果我们拨开陈文中气急眼的昏话，从全文主旨入手研究，就可以看到这正是陈独秀于四年后更凶猛地拖出“四十二生的大炮”轰击旧文化的钢铁手腕的前兆。《爱国心与自觉心》仅只给那些内骨子里满装着守旧思想的人一点小的震动，受到“诘问叱责”者也只限在极小圈子中的“十余通”信，比之于掀起新文化运动大潮，遗老遗少和洋场恶少恨不能食肉寝皮陈独秀，可真是小菜一碟了。我们都知道，李大钊不仅为人温良敦厚，学问之道亦重理性而很少渗入意气。但是要论“砸碎旧世界的锁链”的气派和战斗力，还得数陈独秀这门大炮。同时我们还应了解一下李大钊当时思想的政治背景，他曾有过北洋法政学校《言治》派拥护袁世凯立国和反对孙中山二次革命的经历，虽然李大钊的拥袁与军阀宵小有质的区别，乃是出于在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时代大背景下所产生的正统国家观使然^②，而且很快就有所觉悟，到日本之后，尤其是在写《自觉心与厌世心》时，已经识破了袁世凯藉签署二十一条走向卖国求“帝”之路，断然划清界限，但对国家观念者“既有其国，爱固不忘”者，多少还蒙了一层正统的阴影。因此，笔者以为陈文是矫枉过正，大可不必在几句“举世恶骂”上分个南陈北李孰是孰非。否则，保守的已不是历史老人而是我们时代的新人，其不亦悲乎？

《新青年》燃起不灭的火种

其实，李大钊发自内心的感情还是支持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的，他在《厌世心与自觉心》中假友人之口说：“读独秀君之论，曾不敢谓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这时，李大钊仍在早稻田大学继续深造，从日本早期社会主

① 参见《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12页1915年8月10日条：文章对该杂志第四号所载陈独秀的《爱国心和自觉心》“提出批评，反对厌世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

② 参阅朱成甲著《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第8章《拥袁的背景·原因》，此章和第9章《反袁思想的形成过程》是李大钊从拥袁到反袁的权威研究。

义学者安部矶雄教授研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并通过他及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的自由学风和当时风行东京帝大河上肇、片山潜教授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著中吸收社会主义革命理论。^①陈独秀的思想则转入如何救国的新阶段,于一九一五年六月回国住上海嵩山路吉谊里二十一号着手编辑《青年杂志》了。

《青年杂志》创刊的出版预告正是刊登在发表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的《甲寅》第八期封底,陈独秀又把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所有革命志士和宿将统统抛在后面,只有紧跟的份儿。

一九一五年真是多事之年,简言之,以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开始,终于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当皇帝。这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页,几乎家喻户晓,不必在此喋喋。

一九一五年也有其觉悟的一面,那就是以城市工商、学生为主体的全国民众点燃起反对日本抵制日货的火焰,不要小瞧这股扑不灭的火焰,它是第一次全民反帝大动员,是后续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全国大规模爱国行动的一次预习。袁世凯曾多次以“妨碍邦交”下令严禁屡禁不灵。对于孙中山的事业来说正是在二十一条和袁世凯称帝的倒行逆施中获得的生机,造成“孙黄和解”,欧研会解体,协力组成声势浩大的护国讨袁军,不仅镇住了袁世凯,更为日后的中国军事舞台积聚了新生力量。

一九一五年令人沮丧的是一批知识分子和辛亥功臣的转向。前者,如开近代中国社会科学西学东渐以启民智的严复,竟会跌入筹安会泥淖;后者,如曾是孙中山与大陆革命联络的重要骨干孙毓筠,为上海光复建立战功的李燮和,武昌起义后出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的胡瑛都参与复辟,甚至连先革命后叛变,只因陈独秀等吁请大总统准其“得以余生,读书赎罪”的刘师培亦掉了魂似地加盟老立宪主义者杨度麾下策划了“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报,传之万世’”的闹剧。可以认为这是革命党第一次实质性的分裂,后来陈独秀把这一历史现象称之为“同盟会之袁党化”,话虽尖刻,却入木三分戳到痛处。笔者把筹安会助袁复辟帝制看得很重,固然因它把辛亥革命毁于一旦,但这只是稍纵即逝的表层效应,更沉重的是由此而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因袭的封建霸权“朕即国家”的传统观念在相当一部分中是轻易甩不掉的,不仅更大的复辟闹剧还未开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也是人权,民主和立法治国长时期得不到承认(承认本身就得立法)的根本所在。这正是陈独秀在《新青年》前期(一九一五—一九一八)所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① 参见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第339页。但文中说1918年“河上肇博士已将马克思《资本论》译成日文”云云则有误,据资料,河上肇译《资本论》是1923年的事。当然,李大钊读《资本论》还可从英译本。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等等。

当然只指责知识分子甩不掉包袱是以偏概全，更多的还是在觉醒，正是在这多难的一年中产生了一批新的革命力量。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堂学生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这古怪的化名于是年暑假发出“嚶鸣求友”的《启事》聚义革命，引来了第一批朋友蔡和森、萧三、何叔衡、张昆弟、罗学瓚等，后来竟然都成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无产阶级革命家。时为南开学校学生的周恩来也在天津崭露头角，被拥为南开演讲会副会长。

一九一五年另一惊人之举发生在巴黎，是蔡元培、李石曾，以及吴稚晖、吴玉章等在法国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会，为日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批用欧洲先进的文化学术和科学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为中共输入一批懂得国际实务而又虚怀若谷的高级干部；国民党则纳入了一批左派和开明派。

一九一五年，国际上也发生了若干与中国的新兴有密切关系的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处在战略相持阶段，帝国主义国家敌我双方军队胶粘在一起的局势有利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使工人运动获得发展。这一年列宁在所发表的重要论文《论欧洲联邦口号》中首次提出与马克思社会革命学说相悖的理论，即：“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①的理论，这个开近代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促成了十月革命的诞生，却也播下了托洛茨基悲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种子，其与本传主人的休戚相关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自一九一五年起在第二国际分裂后，经过渐次形成的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深入，“共产主义的幽灵”已从西方向东方飘荡，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旧向新过渡的国际条件已具备，这对国共两党都是有利的。

但是，一九一五年当时，促成进步和革命的国内国外诸多因素，全都只是一种蕴藏的力量，或者说是地下运行的地火，反动势力和复辟的邪火却是明显的，致使整个社会受着痛苦的煎熬，要为多难的一九一五年下个结论是很难的，看看文学家的鲁迅这段话喻之以一九一五年前后的形势如何——

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艺术家萎黄，有许多艺术家向新的山崩地塌一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并开拓着自己的生活……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683~687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第1版。

中国自民元革命以来,所谓艺术家,没有萎黄的,也没有受伤的,自然更没有消灭,也没有痛苦和愉悦之歌。这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一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①

这段满溢着新陈代谢社会进化论观念的如诗一般美的话,用胡适的见解予以补充就完善了,他说:“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在《新青年》上有许多基本革命的信条”^②,胡适还大度地承认,陈独秀的“革命的精神”,“与我们留学生的消极态度,相差不知多少。他那时所主张的不仅是政治革命,而且是道德艺术一切文化的革命!”超越政界军界,把触角伸向意识形态一切领域,这正是动摇社会基础的政治大革命。

陈独秀早就想办一有个性的刊物,“据我大叔回忆,民国二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叫我认真想法”^③。讨袁失败后包括孙中山、黄兴、李根源等在内的政治家都在抱怨革命者的军事力量不敌北洋军政府的军队,又一次掀起组党组军热潮时,陈独秀却从这股热潮中退出来,从思想革命的基础上总结政治斗争屡遭失败的根源,陈独秀思索的问题与鲁迅等作家的群体之研究“改造国民性”,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都在于人的思想启蒙工作。鲁迅们是用文学艺术上的全盘欧化以清洗国人因袭守旧的封建传统^④;陈独秀们用的是政治手段,传入以法国大革命,英国宪章运动,美国的民主自由,普鲁士的铁血主义,以及与以上相关的卢梭、叔本华、尼采等的哲学思想和达尔文主义强化国民的个性解放,自我革命和参与意识,这一派后来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着眼点仍然是鼓吹革命。鲁迅等下的是一帖温和的药,陈独秀等下的是猛烈的泻药。因此,我们不得不指出,文学革命的主将鲁迅在《新青年》群体中只是一个方面军的指挥官,而陈独秀才是中国文化思想政治大革命的主将,鲁迅的听将令“遵命文学”,此之谓也。

一九一三年的陈独秀办刊之所以未能如愿,据当事人回忆是因亚东图书馆绌于经费且亦没有找到别的业主承担。这自然是原因,但不是唯一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时机未成熟,一九一三年时革命者们都陷在讨袁失败四出亡命的苦况。到了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办刊时机成熟又经汪孟邹的努力,终于在七月五日谈妥由陈子寿、子沛兄

① 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之二》。

② 《陈独秀评论选编》。

③ 《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2页。下同。

④ 以在日本写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为基准。

弟主掌的群益书社“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青年杂志》。

为陈独秀立传当然应写足他的功业，但任何一件事的成功，都有其复杂的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笔者认为，初创期的《青年杂志》颇多受益于《甲寅》，比如稿件注重实务，即使理论性很强的文章其出发点或立题亦然，因此政论多，火气大的杂文随笔多。再是栏目设置，如《甲寅》上的《时评》（国内外）、《通讯》（配记者答复）都是直接套用，而像《论坛》则衍化为《随感录》；刊物的规模，二者亦有共同之处；至于《甲寅》斗室中的易白沙、高一涵、李大钊后来都成为《青年杂志》的编辑或编委更是直接受惠。记上一笔，为了说明陈独秀办刊的经验来源或作传的编年需要，也为了表彰章士钊——《甲寅》封面上那只老虎一度使反动势力吓得够受。

《青年杂志》是每期逾三十万言的大型刊物。陈独秀六月回国，七月签约，八月预告，九月出版，这紧张的日程安排，若再把当时高君曼肺病发作，“大房”的延年、乔年到上海工读，“二房”子美、遐和刚学步，真够陈独秀焦头烂额的，人们不禁要问，有没有人助他一臂之力。由于缺乏资料故很难说个明白却又不得不说。

陈独秀回国，易白沙（一八八六一—一九二一）亦回国，他除为《甲寅》在亚东图书馆发行主事外，就协助编《青年杂志》，直到陈独秀及其刊物迁往北京，他则回湖南执教，旋辗转天津南开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如此一位革命骁将竟会自杀——一九二一年在广东陈村投河自尽，那天是屈原自沉汨罗的端午祭，当然不是巧合而是择定的凶日。翻开《青年杂志》从第二期起，易白沙的长篇论文不少，其中最具有社会影响的是《孔子平议》，是五四前猛烈抨击孔学、动摇封建传统哲学和宇宙观的重要论文，个中最闪光的是批判“尊孔者又以古代文明，创自孔子”的历史唯心主义，明确指出，“夫文化由人群公同焕发，睿思幽渺，灵耀精光，非一时一人之力所能备”，首肯人民创造历史，真是结结实实的唯物主义史观。在叙述草创期的《青年杂志》时，缅怀一下易氏，显彰他是新文化运动横扫孔学流弊的先行者，他没有白死，他是二十世纪的屈原！

这里还要谈谈至今不明其死因的又一文化骁将高一涵（一八八四—？），据他自己回忆，“守常回国后，汤化龙请他编《晨钟报》……七月，我也回国，守常约我同编《晨钟报》”^①。李大钊是一九一六年五月回国的。但自创刊号起，期期都有高一涵的论文，有时还同期刊出两篇，因此可以认为时在日本的高氏亦参与了草创期的编辑工作，而当《新青年》迁往北京，时任北大教授的高一涵就正式加盟《新青年》成为编委，他不只编《晨钟报》、《新青年》，并实际参加斗争成为陈独秀的得力助手之一。与易白沙主事驳诘古史不同，高一涵学的是政法，论文直接针砭时弊或鼓动青年参政，如《新青年》

^① 《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高一涵，解放后曾任过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文革后曾多次撰文回忆李大钊、陈独秀。

自创刊号起连续刊登三期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长篇论文中指出,专制政体以君主独夫一人说了算,而“共和国本建筑于人民舆论之上……每视人民之舆论为运施”。为达到“格君心之非,与谏止人主之过”,使国家按宪法运行,他把希望寄托“在染毒较少之青年,其或有以自觉,此不佞之所以专对我菁菁茁茁之青年,而一陈其忠告”。勸勉中国青年“练志、练胆、练识”勇敢投入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共和革命。高一涵文章紧跟在创刊号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和《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之后,显然是作学理上的配合;其中不少内容及其诠释甚至用语都是围绕《敬告青年》而为之的。

《青年杂志》没有宣言,但可以把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作为本志宣言看待,《敬告青年》一开始就从新陈代谢生物进化学理入手,把青年推上社会进步非之莫属的窄门,必得穿行而过才有生路可寻。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勸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陈独秀要求青年追求西方人的价值取向,欲以西方青年观勸勉中国青年,然后从生物学的新陈代谢从容转社会学意义上的新陈代谢。可以说自从严复于上世纪末译介达尔文进化论到了《敬告青年》,已被陈独秀用至极限,完成其历史使命矣。

然而在一九一五年上,陈独秀要求“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尚未到火候,只就复辟和反复辟的时势“谨陈六义”,以供抉择: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义,囊括了国民性改造,社会进步,国体民主的全部要素,就缺主轴。主轴当时有两根,一是三民主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前者已提出十年而被扼杀在复辟声中,后者则时机尚未成熟。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的功绩在于这两大主义空白的三四年间提出了一个过渡时期的理论以催生社会革命,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

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①

《新青年》之所以成为进步的堡垒、顽固守旧的对立面和反动势力的主敌，最初的由来正是由于引进这二位先生，然后才随着社会革命的深入，十月革命后国际格局的变化，问题与主义之争显明，加上知识分子的分化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政府公敌。

《新青年》从一九一五年第一卷一期起，到一九二二年第九卷第六期止可以有几种分期方法。^②从地点上说是：上海（至一九一七年第二卷五期）——北京（至一九二〇年第八卷五期）——上海（至一九二二年七月终刊），这时，中国共产党已问鼎中国社会革命。

从编辑部和编委会人员分期，自创刊起到迁往北京的初期即第一、二两卷是陈独秀独主全盘；俄国发生“二月革命”的一九一七年三月，胡适归国出任北大文科教授，次年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箭杆胡同九号陈独秀寓的《新青年》编辑部就在无形之中组成，成员中还有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王星拱、陶孟和等，但这只是轮流坐庄的松散联盟，正式亮出编辑名单是一九一九年的第六卷，这卷的六期依次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责任编辑；一九二〇年第八卷起，陈独秀又独主全刊，他委托陈望道责编，直到终刊。

从社会革命的角度分期，一九一七年第二卷第五期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六期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打响新文学运动第一枪，为《新青年》第一阶段结束而开始全方位探索文化运动向社会革命发展之门径；以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主义专号》标志着找到门径深入堂奥并一步到位，先是参与后是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真正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已掀起，地火亦已喷吐而出。这之后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而渐次转向单一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刊物。

考察上述三种分期，还应注意两点：一是一九一八年五月第四卷第五期上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和第六期胡适主编的《易卜生专号》，前者象征着新文化对于书刊印刷传媒系统的占领；后者象征着新戏剧对于舞台和电影立体传动艺术阵地的占领。在中国文学艺术的现代化上，《新青年》的功勋没有任何一个刊物可与之匹敌，没有《新青年》就没有中国的文学艺术与西方文学艺术的接轨。

这里似乎应当特别强调或者说是识别的是，陈独秀属意文学，和文学家有动机上的区别，这倒不尽然表现在胡适是“文学改良”陈独秀是“文学革命”，在于时代对文学

①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② 传统上不把中共成立后《新青年》（瞿秋白主编）季刊、不定期刊（1923年6月—1924年12月）所出的九期计在内。

的召唤和使命感陈与胡不同，与鲁迅亦不同。这里举个例子，一九〇七年，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有如下一段话：

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瑞已也，亦希诗人如狄斯丕尔(Shakespeare)；不惟波尔，亦希画师如洛菲罗(Raphaelo)；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诃芬(Beethoven)；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Carlyle)。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嗟夫，彼人文史实之所垂示，固如是已！

十年后的一九一七年，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有如下一段话：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培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

鲁迅的“既有……亦必有……”和陈独秀的“予爱……予尤爱……”，两者所议内容相类、例子相类，连语法结构都极相似，考其根本的区别乃于鲁迅是从文学本位出发，藉文学之力以改造国民性；陈独秀则咄嗟立办，令文学以为革命，因此鲁迅成功为文学家而陈独秀则成功为革命家，也正因彼此出发点不同，尽管陈鲁二公气质相类，都是丝毫没有奴颜和媚骨的硬汉子，但只有陈独秀才有魄力“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才急不可耐地发问并声援“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文学之助革命是感化人心，革命才能催生“感化人心”的社会。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责编的《马克思主义专号》，导致中国知识分子从联袂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以毕辛亥革命未竟之业，渐次走向分裂，在政治上则逐步走向对峙的立国观念，以胡适为代表的群体提倡实验主义而实践“好政府主义”的主张；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群体则提倡马克思主义而实践社会主义革命，两造之间的重大区别在于，倾向资本主义制度的知识分子并无独立组党从事革命建国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实力；是依附在国民党的“建国大纲”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则积极组党独立干革命。在中国，党派和主义不少，然而除国民党和共产党外，从来就没有产生足以左右社会革命进程或走向的第三党。

统观以上三种分期和两种值得注意(现在来说是应当加强研究)的方面,可以发现《新青年》基本上各种思想、主张、主义、理论并社会科学各门的民主竞争的阵地,没有成为一个单一主义控制的政治实体,它是辛亥革命向纵深发展时,两种宇宙观在复苏中华民国的最低政治纲领上共同对敌,是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战线的产物。因此,谁都可以在这本刊物上一展雄辩之才以表达自己的理想。胡适责编可以宣传实验主义,李大钊责编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孰是孰非由社会裁决。《新青年》之“杂”既是蛊惑当局的迷彩,也显出编辑的雅量。我们曾经批判过胡适说的“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根据胡适以后的表现,此话也许值得批,但在当时这个“理想”未必右倾,陈独秀认为“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真无非难执政之理由”,他的理想是用起点较高的德赛二先生强化民众的政治素质,灌输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以提高参政意识。直到后来大家都看出分歧,却仍然从爱护出发,致使最终几乎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时,仍然保持学术研究的特性,没有成为急功近利的宣传鼓动小册子。为协调各方的主张也为要抓住袁世凯、张勋两次复辟均短命的有利形势,先则于一九一八年底出版周转频率快的《每周评论》,以与时局短兵相接,还相继出版《国民》、《新潮》等刊物,李大钊还积极改组《晨报副刊》使其倾向革命,所有这些刊物的中心人物仍然是以《新青年》编委群体为主,可以说,五四前后北京的以及各地的刊物都惟《新青年》马首是瞻。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论文、随感录和通信答疑等长短文章不下四百篇,后来保存在他自己编辑的四卷《独秀文存》中的二百多篇百分之九十以上均发表在《新青年》。当我们在研究了办的宗旨,又研究了《新青年》的分期、性质、社会影响诸问题,再综述陈独秀文章的时代应变及其作用就方便多了。总体来说创刊起到张勋复辟,陈独秀毛锥的第一大主题是传播以法国大革命为轴心的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和实践,次则以康有为为靶子批判孔学为主的封建传统文化,直接指出这是复辟倒退的思想基础,前者如《法兰西与近世文明》、《现代文明史》(摘译并述说)、《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后者如《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而《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是袁世凯皇帝梦破灭和张勋复辟之前的黑暗政局中的重要檄文,可惜的是文人的笔管止不住武夫的枪筒。在这期间又一大项是动员了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沈尹默等等文人,掀起从文体改造到文学创造的“准”文化革命运动,批判了以林纾为代表的文化顽固派,这场革命所得罪的人虽不是权贵政要,但却动摇了社会基础,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的影响远远超过批判时政的作用。不仅使遗老遗少视若异端,恨之入骨,也大大开罪了不少国学研究家,甚至远隔重洋研习西方文化的一代新人中也有人陈独秀、胡适的文学观大加挞伐,如吴宓等“当时在哈

佛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①，甚至下决心“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顽抗到底的劲儿不次于林纾也，如此说来胡适还真不易哩！陈独秀的笔墨还挥向进化论转为社会发展的课题，如他说的“觉官有妄，而物体自真；现象无常，而实质常住”，“原于种性，相续不灭”等，都是进化论中总结得的自然辩证法。当然，陈独秀并没有止于此：“原子种性不灭，则世界无尽；世界无尽，则众生无尽；众生无尽，则历史无尽”^②，已经接近历史唯物主义，距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只差发展的一步了。

陈独秀除去主政《新青年》作总体设计和组稿撰稿，还以相当精力化在通联工作上，《新青年》设通信栏，吸引了全国各地青年的来信，他的不少主张都是通过答读者问方式更直接地教育着他们，或说是指点迷津罢。在所联系的青年人当中不乏日后的革命干才，如叶挺、恽代英、柯庆施、蔡和森、舒新城、王统照等等，当时都是中学和大学学生，或小学教员，或社会青年，其中不少人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少人成为学者，也有不少人成为国民党中坚。这里举个答叶挺的例子。是年二十一岁的叶挺是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的学生。一九一一年起就学军事的叶挺，却非常爱向宇宙与人生科学探秘，他在《致记者信》中有“足下之孤诣、略见于《甲寅》”，可见他与陈独秀“神交”已久，在长达三千余言的信中除陈述革命抱负外，在探讨“宇宙胡为而然耶，吾人何处而然耶”这个属于带有认识论性质的问题时，虽然阐明了无神论探索宇宙奥秘的立场，却有落入不可知论黑洞的挟嫌。陈独秀答复全文统引如下：“足下颇疑宇宙之谜，非科学所能解释，是犹囿于今日科学之境界，未达将来科学之进化，必万亿倍于今日耳。足下对于宇宙人生之怀疑，不欲以耶、佛以解，不欲依哲学说以解，不欲以怀疑故，遂放弃现世之价值与责任，而力求觉悟于自身，是正确之思想也，是邻于科学者也。”^③这个答复简捷明了，具有预测科学发展定能逐步解析宇宙奥秘的洞察力。对于世纪初期的学者以今之观点观察其科学言行，雅不在于他的解释有多少足观于今，在于其具有发展的眼光。比如完全用今天自然科学的成就指数去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举之大量科学例证，就会落入汰去金而留其沙的本末倒置的泥潭，反无辩证法可言了。

《新青年》在全国青年、知识界和学者、学术团体中的地位 and 声誉简直可以编一部以指导当代思想革命的极有意义的书，这里，笔者欲引用当时已是南社主人的著名诗人兼学者柳亚子的一封信，以作为本书对陈独秀与《新青年》的阶段性的总结：

① 引自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1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85页。

③ 《新青年》第2卷第6号《通讯》栏。

梦鸥足下：

示悉，国教请愿事，弟绝对反对，因弟为主张倒孔之一人也。贱名万勿假借，否则当提起诉讼，至要至要。原件璧还，并奉劝足下勿为无益之举。《新青年》杂志中陈独秀巨著宜为写万本读万遍也。^①

此信写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距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才两个月，真是紧跟啊。

北大教授，《新青年》北迁

一九一六年是在全国各地相继发出讨袁反袁声中来临的，相对士气消沉的去年是强心的一年，陈独秀在新年第一期上发表新年贺辞性质的《一九一六年》，热情洋溢地辞旧迎新：“一九一五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当一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陈独秀作文，尤其是《新青年》中文往往喷射出丰富的感情，且有撩拨人心的煽动力，这是虽言进步而措辞则绅士腔的学者所无法比拟者。读陈独秀的政论或杂感，从任何角度只有鲁迅能与之比肩。

然而有谁能想到，落笔万言的陈独秀是个穷措大，我们发现，《青年杂志》出足第一卷后，停刊半年才出版第二卷。可见发起青年运动的旗手大概陷入了困境。据陈独秀致胡适信“《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②，可见停刊的原因出于讨袁战争，使刊物无法向外埠运销，不得已而暂停刊。另一重要原因是经费支绌，战争使“百业停滞，吾业尤甚，日夕旁皇，真不知所以善其后，奈何奈何！”^③为应付书业萧条，遂有亚东和群益合并的创议。九月十八日即第二卷第一期勉强出版之日，“仲甫、已振同来，根本赞成竭力相助亚东和群益合并另行改组之事”^④，后来又拟再纠入通俗图书局三家合并。亚东图书馆是汪孟邹的芜湖科学图书社在陈独秀等支持下搬到上海后成立的，如今要合并实在是不得已的事，但合并亦不易，关键仍在资金上，于是就有了去北京招股集资的意想。这一意想是陈独秀一生的一个伟大的转折。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去北京集资，现在只能考证出极抽象的一点是北京有与陈独秀友好而愿资

① 《柳亚子选集》上册第162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

②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页陈独秀致胡适信。

③ 同上书第2页汪孟邹致胡适信。

④ 《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4页。

助的湖南、安徽两省的若干资本家^①，事情果然如此！但对于陈独秀及《新青年》，就不单是如此了。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陈独秀和汪孟邹去北京，汪孟邹于次年一月十七日回上海。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经销北京大学出版部书籍的生意，致使亚东图书馆不仅独资办下去而且从福州路江西路口的福华里搬到书店林立的广东路棋盘街开张。陈独秀曾与汪孟邹说过“你要死，只管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上马路！”^②此说不枉，这一搬就活，竟然活到了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上被查封，书店比陈独秀多活了十年。

陈独秀没有回上海，被蔡元培挽留了下来。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从法国回来的蔡元培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次年一月四日到任，大刀阔斧改革校政，主要是鼎力聘请各路专家，聘请陈独秀，尤为蔡元培得意之笔：“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③接着他又回忆了十年前刘师培向他推崇陈独秀安徽俗话报的往事，加上他与陈独秀还有暗杀团一段令人难忘的交往，立即决定聘请陈独秀。正在此时，“有一天”——沈尹默回忆道：“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继续写道：“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其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谈，要他把《新青年》’

① 关于这次去北京筹资金致使陈独秀因此而入北大，显得特别重要，据汪孟邹说向湖南安徽两省陈所认识的绅商筹资外，别无资料，筹到的金额则在陈致胡适信中“约可得十余万”，但向谁筹得，信中没提。这里笔者提出质疑：是否从崇古斋筹到款？据资料：1904年，时正飞黄腾达的陈昔凡曾拿出一万两白银交北京文物商张鸿瑞在琉璃厂开设崇古斋古玩铺，辛亥革命后陈昔凡卸任到北京曾在古玩铺后院住脚，住了好一阵子。这时距陈独秀1916年到北京集资相隔才四年，距陈昔凡去世才三年。少东家去筹款，似亦情理中事。可能有人会反质说胡适曾有过这少东家不领情的记载，但也有陈独秀“将家中拥有的几十万家财捐给革命派”的记载（见前揭陈万里书第10页），总而言之，胡适说，陈万里（引日本人燕尘）说，及笔者推测，都居于可信可不信之间，但笔者的推测似较可信。崇古斋资料见陈重远作《陈独秀家开崇古斋》（载香港《大成》月刊1993年第2期）崇古斋自开张到1956年公私合营之前，一直与陈族有联系。

② 《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7页。

③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第1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下同。

搬到北京来办吧。’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诉独秀，他慨然应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①

陈独秀一心扑在《新青年》上，蔡元培诚心盛意礼聘独秀。当时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汪孟邹充满着感情地向汪原放等亚东伙计们谈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真是令人感动的现代“三顾茅庐”！就是被蔡元培殷殷之情感动而允诺加盟北大文科后的陈独秀仍然怕因此而误了编刊物，在他给胡适的信中说：“蔡子民先生已接北大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②从这封信中，我们还知道胡适已决定返国投入文化运动，因为信中还有“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亦可担任”。两个月后，时年二十七岁光彩照人的胡适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一年后，蔡元培还为他的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写了热情洋溢的序，并企盼胡适继续努力，“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③把全书写完。可惜的是岁月流逝，老人们全部都带着遗憾进入历史，连中共领袖瞿秋白都留下“中国哲学史、国语文学史，只看到一部分，至今尚未完成”的遗憾^④，这下大概轮到胡适心紧了，胡适是认识并器重瞿秋白的。

北京大学，蔡元培，以及汤尔和、章士钊、沈尹默、钱玄同、刘师培，以及曾有过误会的黄季刚等等老朋友热情欢迎陈独秀，都集聚在蔡公麾下为复兴中华文化而努力。但一九一七年的政局和复辟风暴却把陈独秀们又拖入黑暗的漩涡。这一年六月，“辫帅”张勋率领他的部众，从徐州一路杀入北京，康有为亦同时化装潜入，演出了一场拥末代皇帝溥仪再登龙廷的丑剧，给辛亥革命划了一个难堪的句号。人们对张勋在镇压“二次革命”时杀入南京纵其部下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的暴行记忆犹新，如今进军北京，吓的全城大乱，纷纷逃命。这次复辟当然比袁世凯称帝还惨，前后只十天，但令人费解的是北京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把末代皇帝及其王公大臣太监宫女赶出紫禁城，竟然仍让他偏安一隅，直到一九二四年才被冯玉祥所部赶出。

当张勋、康有为文武簇拥溥仪登上金銮宝殿的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躲避到天津的陈独秀出现在南开大学的讲坛上大谈《近代西洋教育》。复辟结束，陈独秀回北京，从此一直住到一九二一年初。

① 《我和北大·我和陈独秀》。

②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6页。

③ 《中国哲学史大纲·序》，商务印书馆1918年8月第1版。

④ 李克长《瞿秋白访问记》，载《国文周报》第12卷第26期，引瞿秋白说：胡适“专门的东西，又不肯去搞。中国哲学史，国语文学史，只看到一部分……”

从二卷一期起《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晚饭后到仲甫宅，适子寿亦在此谈说一切。子寿拟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来商于仲，仲与予均赞同也。”原来群益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信云《青年》杂志与他们主办的《上海青年》周报刊名雷同，有侵权行为，“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看来我国早就有了商标法^①。

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三日当时由范源濂主掌的教育部，两天后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后下令委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月薪大洋三百。在二卷一期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同时，陈独秀带着《新青年》抵达北京，他组织钱玄同、刘半农等改革文科教学，首先推出的是实行白话文教学，这是从形式——欲书面文字与语言沟通，使其具有普遍大众性质的全面表达能力，这是一场开天辟地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一七年国际上发生了积极的变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因对德宣战而成为“战胜国”，好兴奋了一阵子。

一九一七年真正在世界上引起天翻地覆的是俄国二月革命造成的克伦斯基政府只经暂短的八个月，就被列宁领导下的布尔塞维克击败。十月革命打破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国际格局，极大地震动了中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第三天——十一月十日上海《国民日报》率先拉开“美克齐美占领都城彼得堡”的报道序幕^②，接着上海《申报》、北京《晨钟报》等竞相作出反映，当时《新青年》又因经营支绌处在第二卷六期出足（至八月）第三卷尚未出版的休刊期，未能及时作出反映，但对二月革命和它的政府则作了详细的报道，不管怎么说，克伦斯基的政府使沙皇制度终于结束，也是个进步。《新青年》则在十月革命一周年时由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开始引入十月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与此同时蔡元培则高呼“劳工神圣！”中国工人在这一年颇有三分解放的感觉。然而当吴佩孚出于阴险的政治目的顺应着叫唤“劳工神圣”时，共产国际和中共都丧失了警觉，中国工人付出了血的代价。

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是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的精神支柱。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布告，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③。陈独秀呢？“陈独秀到北大，专当学长，没有开课，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发表过什么演说，可以说没有和学生正式见过面。”陈独秀是通过他的文章，他联合的一批学者办的《新青年》，他影响下全国各地出版的印刷物，以及日隆的声誉，成为勇夺天下

① 《回忆亚东图书馆》第 32 页。

② 美克齐美，即 Maximalist，过激党的译音。

③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 323 页，三联书店 1984 年 12 月第 1 版。蔡元培布告：“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部令派陈独秀为本校文科学长。”

的青年人的领袖的。

一九一八年,时任北大教授并兼任图书馆长的章士钊力荐李大钊加盟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因蔡元培和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从此“北方之强”的李大钊和南陈再次聚首,与在日本《甲寅》斗室中不可同日而语了。

就在李大钊主掌北大图书馆的是年九月,湖南毛泽东初次来到北京,经过时任北大哲学教授的原长沙师范老师杨昌济保荐给李大钊在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毛回忆说“我的职位很微,大家都不理我”^①但却认真学习,“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看来毛泽东有过当大学生的念头,但只住了不到四个月就回归长沙。这对已经在筹备新民学会立志革命的内陆学生而言,此次短促的北京行却开阔了文化视野,打开了世界之窗;他还通过图书馆和哲学会、新闻学会认识了北大学生张国焘、陈公博、谭平山、段锡朋、康白情等日后在国共两党中都有所影响的人物。有三个人给毛泽东印象最深,除陈独秀和胡适还有一个叫朱谦之(一八九九—一九七二),也许由于他宣传无政府主义,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说起他了,在五四时期可是一位遭北洋政府逮捕关押的学生领袖人物,“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张”。对那些纯而又纯的绝对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普鲁东主义、新村运动种种学说,都是反动的,一句话一个词儿就把历史唯物主义踢翻在地,但是翻开中国现代革命史在第一代革命家中受过上述这些主义的影响而最终走向革命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真是数不过来;再说,在中国,最早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名单中很有几个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张继、吴稚晖、刘师培、刘师复、蔡元培、李石曾、江亢虎……名单越开越光彩,陈独秀、他的儿子陈延年和若干留法学生,黄凌霜、区声白……一直开到毛泽东。至于无政府主义者们的日后的政治归宿或体面或栽面,那是由他们的心迹和足迹所造成的。

告别了复辟的一九一七年,我们的心情好得多,该我们轻松一下说说陈独秀在北大的趣闻轶事了。一九一七年的北京大学,著名的“红楼”正在建筑中,文、理本科当时都在景山东街马神庙“四公主府”,学生和教员在公主府内很是热闹,大概是文科的好事学生给老师们排行,忽然传出“二只老兔子和三只小兔子”的美谈,两只老兔指己卯年出生的陈独秀和朱逖先;三只小兔指辛卯年生的胡适、刘半农和刘文典,而当这些受到学生们敬慕的兔爷们凑巧集中一起时,学生们又发现他们休息的房间排行又是“卯字号”——原来这里的房间按子丑寅卯……编号,于是兔子在兔窝就成了北大

^① 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以下所引毛泽东的话和实质性的介绍均自此书,三联书店1979年9月第1版。

一景。此事直到一九六一年，五只老少兔子中硕果仅剩的胡适还在致于右任八十华诞的贺信中提及，因为于右任与陈独秀同庚故有此说：“回想民国六年我到北京大学，那时蔡子民先生、陈仲甫、朱逖先、刘叔雅（文典）、刘半农（复），和我都是卯年生，又都是在北大，故当时有‘卯字号’三代的戏言。”胡适回忆中多了一只大兔子——生于丁卯（一八六八）年的蔡元培，这又是奇巧中的奇巧。^①

陈独秀在北大又一趣闻则与冯友兰保存的一张照片有关，本传好不容易找到，就很值得一谈了。一九一八年六月文科哲学门第二届毕业时学生和老师合拍毕业照，蔡元培亦亲临致祝并合照留影。合照时“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放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豪放，把脚伸在梁漱溟的面前。照片出来以后，我们的班长孙本文给他送去了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孙本文说：‘这是你的脚’。这可以说明陈独秀的气象是豪放”。现在看到这照片听了这故事，仍然使我们感闻到五四时代北大师生融洽，孜孜学问的勃勃生气，不是学生年轻而是陈独秀不老，顿时使我们记起他在《敬告青年》中的那句西谚：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生理年龄的差距被心理年龄的相近抹平，于是就打成了一片，成为青年之所钟情的导师！

一九一八年是《新青年》从文化革命向政治革命倾斜的一年。

李大钊加盟北大无疑给《新青年》事业增添了新生力量。一九一八年的陈独秀已虚龄四十，李大钊才是卅龄的新青年，他首次露脸《新青年》时才二十七岁，正是“饮尝青春之甘美，浹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的大好时光——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当兹春雨梨花，重门深掩，诗人憔悴，独倚栏杆之际，登楼四瞩，则见千条垂柳，未半才黄，十里铺青，遥看有色。彼幽闲贞静之青春，携来无限之希望……^②

别以为文章就这么作下去了。果真如此也许就是曼殊和尚或别的憔悴诗人，决不会是面对绞索而不惧的李大钊，几番抒发青春期之雅美后，笔锋回转，直面人生：

……总之，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观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

^① 《知堂回想录·一二一 卯字号的名人》；李若松《胡适之给于右任的一封信》，台湾《传记文学》第59卷第6期。

^② 李大钊《青春》，《新青年》2卷1号。

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瑰丽端庄之文字抒青春抱负之胸怀，这篇题为《青春》长达八千言之散文，恰巧登载在《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的第一期首篇，诚可谓之一锤定音，奠定了“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马首是瞻”^①的基石。南陈，是宣传鼓动家、政论家和目光尖锐反应敏捷的战略决策人物，北李则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等论文，以及《马氏〈资本论〉释义》等一宗译文，成了为实践无产阶级革命而引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也许是唯一的——理论家。五四运动时期那些不懂外文的第一代革命家，不论其承认还是否认，主要是通过李大钊的著作和译文懂马克思主义ABC的。可惜的是至今尚没有从马克思主义东渐媒介史角度研究源和流的关系，肯定是门有趣也有意义的学问。我们只能从南陈北李联袂革命的友谊和同志情分上写出几道题目留个见证而已。

一九一八年无论是中国大背景抑是《新青年》小范围都是催生向上的一年。首先，《新青年》正式定为同人刊物：“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谓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设立编委会委员分工负责制，定每月召开编辑会议厘定下一期稿子。^②鲁迅加盟编委会，遂正式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结交。这一年的《新青年》又一改革是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这之前(一至三卷)中一逗到底或圈读。以现在的眼光，标点符号的更动还值得一提？切莫小瞧这圈圈点点，以中国文化守旧派的顽固，恰恰连小到标点符号都不放过，鲁迅就曾感叹过此项改革之艰难：“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③从内容到形式，《新青年》都向催生五四运动接近了一步。

一九一八年最令人鼓舞的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觉悟，三月二十五日，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交换《中日共同防御敌军协定》草案。东方帝国日本为确保他的“大东亚共荣圈”利益继续奴役中国，利用中国反“美克齐美”的政治需要签定的这个卖国条约首先引起日本中国留学生于五月五日在东京举行千

① 章士钊为张次溪著《李大钊先生传》序言，宣文书店1951年8月初版。

② 《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4卷3号。

③ 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人游行示威抗议这个条约；二十日，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召开紧急大会，抗议政府卖国亲日；第二天，北京大学联合北京师大、北京法政、北京工专等学校二千余众游行前往总统府要求废除条约，又次日归国留日学生代表上书冯国璋总统提出同样要求。三十日，外交总长陆徵祥和日驻华公使林之助互换两国政府批准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学生请愿失败。但这次请愿是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学生联合行动，涌出邓中夏、张国焘、许德珩、李汉俊、黄日葵、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等一批最早的学运骨干；无疑是一年后五四学运的一次规模不小的预习，意义极其深远；更为积极的是这次反对中日防敌协定的学生运动还波及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都市大学生都出现了规模不等的抗争，这又造成了以北京为动员司令部的学运格局。

五四运动，一个时代的开端

一九一八年在俄国欢庆十月革命一周年和中国激进知识分子遥祝布尔塞维克胜利的欢欣鼓舞中落下帷幕，历史让给了难以磨灭的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九年的形势是严峻的：一月十八日、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开幕，名义上有二十多个国家参与研究战后国际新秩序，实际上由美英法意日五国主宰一切。中国派出以外交总长陆徵祥为团长，由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 and 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组成的代表团，向大会提出了七个提案和两项要求。最重要的是两项要求即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和归还山东，于是形成了中国对日本的矛盾，最后竟然形成了英法意三国代表巴黎和会向日本转让了本应由战败国德国交还给中国的青岛和胶州湾全部山东权益，经过反反复复的拉锯到四月，“战胜国”的中国遭到最可耻的失败。五月一日，陆徵祥把巴黎和会上惨败的消息传到中国：“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湾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业已失败。”这是上海《大陆报》代表民间新闻传媒的最早消息。第二天，当徐世昌大总统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林长民在《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中证实了中国惨败于巴黎和会的事实，北京全城以大学生为中坚点燃起了自甲午战争以来一直未熄灭过的仇日怒火，两天后——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等六所大学，北京工专等七所专科学校的学生代表上午会齐法政专科学校决议示威游行事宜，由傅斯年任总指挥，于下午一时十三所大学集聚三千余学生进军天安门，愤怒的学生打出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抽象口号，其具体口号则是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收回山东利权”，并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个卖国贼，等等。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自天安门出发，由西向东挺进，途经东交民巷折向赵家楼曹汝霖家，这时愤怒的学生已不是喊几声口号所能罢休，于是就发生了学生火烧赵家楼，并把未能逃脱的章宗祥打了一顿的事。事态向武力方向发展，

官方即调集军警弹压并抓走了三十二个学生。^①但是一九一九年已非去年五月。这一天学生的愤怒情绪和受到社会工商各界乃至朝野开明政要和士绅的广泛同情,迫使政府于三天后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七日,蔡元培率领全校师生在红楼北广场欢迎出狱归来的学生,五四怒火烧向全国烧向全民,变成谁也阻挡不了的政治风暴,可以说这是近代中国在历经了将近五十年洋务运动西学东渐,将近三十年的进化论传播,最后是辛亥革命的一个总和。五四怒潮是由《新青年》上强烈的反对封建主义,广义上的文化革命,和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主体引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这三股交互作用的旋风形成的。而陈独秀及他的最激进的伙友和追随者将在这场运动引出的未来历史中承担责任。早在一九一九年一月,陈独秀在他的一篇并不引起学术界重视的千字文《除三害》(即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中指出:“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②端坐在箭杆胡同九号四合院里的陈独秀,显然已经在思考组建的政治实体。名词具有时代特征,意想中的政党是“依赖国民为后援”者,就是现在所说的广大群众拥护的政党,我们虽然有一定的理由说明一九一九年初的陈独秀心目中已初步形成要组织一个可以在中国实现俄国十月革命的政党,但为免任意拔高传主的挟嫌,暂且不表,比比国民党如何?陈独秀要考虑的政党其理论基础、政策策略和社会基础决不会等同于国民党,这是可以肯定的。现在,由于较为明晰的历史名词而把孙中山国民党所领导的革命称之为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那么,陈独秀意想中的政党必定是实行资产阶级的新民主革命,是无可怀疑的。当然,笔者写下上述见解,已不必也不会引起争论了,因为陈独秀即将组成并领导的正是其最低纲领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九一九年的一月,到了年底——十二月一日,在他撰写的《本志宣言》上,正式宣告:“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

① 被捕学生名单最早公布于5月6日《晨报》第2版,缺四名。在龚振黄所编《青岛潮》第14章中32名学生姓名俱足。因从未见任何有关五四运动史或现代史上列出过这个名单,为保存史料,亦为当事者或其家属亲朋后人忆念,经笔者核实,将名单俱引如下:

北大学生二十名:熊天祉、梁彬文、李良骏、胡振飞、梁颖文、曹永、陈树声、郝祖宁、杨振声、萧济时、邱彬、江绍原、孙德中、何作霖、鲁其昌、易克、许德棧、潘淑、林君损、易敬泉;高等师范八人:向大光、陈宏勋、薛荣周、赵允刚、杨荃俊、唐国英、王德润、初铭晋;工业学校二人:李更新、董绍舒;中国大学一人:刘国于;汇文大学一人:张德。又,率先冲入曹汝霖宅的匡互生未被捕,他准备去自首以赎回被捕的学生,被同学劝阻。见周予同《火烧赵家楼》,载《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325页,原载《每周评论》第5号。

关系。”^①绝对断绝，斩钉截铁，没有回旋余地。这才是硬汉子的政治抱负！两年后陈独秀的主张被写入中共第一个党纲：“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必须与力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②我们的分析完全符合陈独秀政治思想的形成和成熟轨迹。

一九一九年是陈独秀思想飞跃之年，当然这与形势的急剧发展有关：苏俄政权巩固，第三国际成立，中国快速升级的学生运动，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革命的理论的发端，问题与主义之争引出了一批被李大钊称之为“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知识分子……这些革命举措反馈到箭杆胡同，成为陈独秀的“绝对断绝”的物质力量！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已指日可待。

但是一九一九年也是陈独秀险象环生之年。

一九一九年的北京大学文科，经蔡元培的支持和陈独秀雷厉风行的改革，已经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堡垒，尽管陈独秀、胡适，以及《新青年》编辑部一再声明：“近年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言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③，但外界把《新青年》与北大文科作为连体看待却也是事实，不仅《新青年》编委同人悉数在北大任教，还有《国民》、《每周评论》和《新潮》形成了一个宣传新文化政治的强力集团，于是恶意中伤就冲着北大文科及学长陈独秀和教授胡适等闯将。这时诸如林琴南写《荆生》和《妖梦》，设计荆生（武夫徐树铮）把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田其美和田恒（陈独秀）、狄莫和秦二世（胡适）和金心异（钱玄同）痛打一顿；或把包括元绪公（蔡元培）在内的一干新文化人物去喂了妖怪等等，虽然引起了一阵哄笑，毕竟毫无实效，反使陈独秀等革命激进派及他们的言论引起广泛的注意，等于作了一次全国性的舆论报道。^④在这场被参战者李大钊称之为“新旧思想之激战”时，当谣言中伤到陈独秀这一级风云人物，蔡元培就感到势孤力单，或者说是终于顶不住逆风狂暴了。

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学校的体制改革：文理二科合并设教务长职一统领导更

① 原载《新青年》7卷1号，转载于《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427页文本时，改题为《〈新青年〉宣言》。

② 引自《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第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

③ 《新青年》6卷1号。

④ 《每周评论》第12号转载林纾《荆生》，同时转载原发表在《晨报》上的李大钊《新旧思想之激战》，“正告那些顽固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要他们公开站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别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

替原学长负责制。此事正处在以林琴南顽固保守派为代表围剿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之期，因此北京、上海报纸即传言陈独秀胡适等改革派已被迫辞职云。为此，胡适曾以信函方式辟谣：“这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一种怪言，说文科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并说陈独秀已逃至天津。”^①那么谣言是怎么造出来的，其起因又何在？原来外间传闻陈独秀嫖妓，“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可作大学师表”^②，也即是说谣传被革职并落荒而逃之事起因于陈独秀嫖妓。这就使蔡元培格外尴尬，当胡适辟谣之后，为平息社会舆论，蔡元培发表《致〈神州日报〉函》申明陈独秀没有辞职，取消学长负责制纯系校务云云，但事情并不因此平复。不得已，蔡元培等于三月二十六日到医专校长汤尔和家：“昨以大学事，蔡鹤公及关系诸君来会商”，会上汤尔和坚持陈独秀“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娃，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此种行为如何作大学师表”，力主汰其学长职。出于无奈，蔡元培把原议暑假后实行教务长负责制提前实行，算是把“倒陈”案平息下来。这是四月十日的事，第二天，汤尔和在回家前“途中遇陈仲甫，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晒已”，可见此事是真的。回想陈汤于世纪初订交日本，相与参加反清、拒俄诸大业，如今终亦分道扬镳矣。于此，我们也不用讳言，陈独秀确实有嫖妓好色的劣根，正好被道学家们抓住作为打击的炮弹，陈独秀“怒目而视”汤尔和的记载，正好说明被彼看出了内心深处的恨。与此同时，我们也得表彰一下胡适在陈独秀被排斥问题上的宽容气度，他在给汤尔和信中陈诉道：

三月二十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噓？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和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胡适的这封信既表明了自己主持正义的立场也婉言批评了汤尔和，当然，书生总管是书生，他认为汤尔和一派道学夫子弹劾寻花问柳的面孔，乃因“先生每

① 见1919年3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四人指陈、胡及钱玄同、刘半农。

② 有关此事的全部资料：胡适致汤尔和信、汤尔和致胡适信，汤尔和日记和胡适的抄批，皆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81~292页相关文字。不一一另注。

日抄读宋明理学语录，始大悟八年三月之事，自亦有历史背景，因果如此”。一场保守与先进对垒的历史在这里被庸俗化了。更有甚者，胡适还把陈独秀因此而离开北大走向组建中共皆怪罪于三月二十六日夜之蔡汤会议：“独秀因此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之创立及后来中国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之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看来，在胡适心目中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之夜改变了中国之命运，这种看法除从别一面证明陈独秀确是五四时期中国思想重镇外，只能说明胡适过分自信了：“独秀在北大，颇受我和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子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奥地利大公弗兰西斯·腓迪南在塞勒耶弗遇刺殒命，奥向塞尔维亚宣战，遂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似乎是公认战争起因说。难道三月二十六日这不吉祥之夜真的是决定中国命运之夜，不禁使人记起圣·巴尔脱罗米欧之夜。^① 偶然和必然这一对因果在除旧布新的历史的交会点上碰撞出了火花。

蔡汤会议和保守派向革新派的反扑所引起的全国性轩然大波，由于来了席卷全国更大的冲击波——五四运动而消声匿迹。对三月二十六日之夜的看法，汤尔和实在较之胡适少些书生气：“陈君当然为不羁之才，岂能安于教授生活，即非八年之事，亦必脱鞴而去。尊见为此后种种皆一夕谈所致，似太重视。……又弟意当时陈君若非分道扬镳，则以后接二连三之极大刺激，兄等自由主义之立场能不生动摇，亦属疑问。”不仅如此，汤尔和还认为胡适亦应对新文化运动负责：“又弟在教育上固不敢逃罪，而兄在八九年力主打破枷锁，吐弃国渣，影响所及，岂止罢课而已，为功为孽，兄自知之，无待弟之解释也。”这可真是倒打一耙，但在这一耙中，分明看出五四时代胡适的功绩是不能否定的，因为他坚定地站在陈独秀一边。

发生上述事件的当时，胡适在上海，因此，陈独秀被去职的消息是得自汪孟邹的信息，五月四日的学运则得自陈独秀的信：“四号下午，京中学生三四千人聚集天安门，到东交民巷各使馆；适礼拜日，英美公使都出去了；学生即到曹宅，曹逃避，章宗祥刚在曹宅，受了一顿饱打，幸亏有一日本人竭力保护，送在日华医院竭力医治，现在生死还不能定。”^②

当时胡适正在南北通联吁请杜威来华讲学。杜威在日本讲学，是通过胡适、陶行

^① 1572年8月23日圣·巴尔脱罗米欧殉难节前夜，法王查理九世奉母命，趁全国新教徒去巴黎参加法王王妹婚礼的机会，斩尽杀绝全部新教徒连幼儿也无一赦免。遂引起新旧教派厮杀的法国内战。

^②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1页。

知函请,郭秉文面请,于四月三十日到上海,五月二十九日胡适陪同杜威夫妇抵达北京,《新青年》六卷四期为胡适责编,开卷之文就是胡适的《实验主义》。杜威夫妇在中国住了两年又两个月,从南到北并深入中原地带跑了十一个省。讲起杜威,似乎有点令人胆寒,但在一九一九年上却有他进步的和存在的条件。比如周恩来编辑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旨趣》上就说过“现在世界的最新的思潮是讲‘实验主义’,我们学生尤应当将我们所学的去求实验”^①,毛泽东在湖南就向健学会会员作过肯定杜威教育思想的演讲《采用杜威教育主义》^②;陈独秀更对杜威哲学进行过研究并予以适应时势的肯定:“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以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的。”^③中共党内最早批判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是瞿秋白,是在已经成为党刊的《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发表的《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嗣后是蔡和森在所写的最早最猛最系统地批判陈独秀托派立场的《论陈独秀主义》中指责陈独秀是“美国式的‘科学’和‘民主主义’(《新青年》杂志的两个主要口号)的宣传者;哲学上,他是从美国杜威博士的实验主义进到法国启蒙时代的机械唯物论。”并肯定之曰:“这恰好是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欧洲大战时期发展起来的思想和政治表演”^④。蔡和森写毕此文不久就在广东惨遭国民党杀害,是他的绝笔。但是不得不令人遗憾地指出,他对陈独秀提倡科学、民主以及运用杜威哲学的批判都是酷评,为嗣后的正确认识陈独秀中期思想和研究西方哲学社会学和政治思想在五四时代的传播都是无益的。

杜威来华并不是杜威哲学在中国的起步,它随着达尔文进化论,詹姆斯(一八四二—一九一〇)的心理学,以及陶行知的教育理论的形成而在中国已有了较深的印象,陈独秀以及周恩来、毛泽东等政治家之于一度崇尚杜威,这是应当专题研究的。实验主义,也是区分五四之前和之后;资产阶级革命从旧到新;它是马克思主义从一般介绍到实践运用之间的一个过渡哲学思潮,因为它具有进步的一面,所以陈独秀接受了;因为它是唯心主义的,所以陈独秀终于抛弃了它。

暴风雨终于袭来……

① 引自《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旨趣》,《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下册第455页,三联书店1959年12月第1版。

② 转引自《伟大的开端》第2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③ 《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7卷1号。

④ 《蔡和森文集》第80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

监狱中升起思想界明星

我们叙述历史,不论过粗或过细,不论是顺编年,还是跳跃式的超前描写或倒叙,都为的是表现传主的生活踪迹和思想发展。把“六三”运动放在现在谈则更切贴传主的一九一九年风险生涯。五四运动的怒火燃向全国之后,又从北京发端,将运动由学生深入到广大民众。六月一日,政府竟然发布两道大总统令,第一道令是不准集会抗日不准抵制日货,并公然为曹章陆卖国行为辩护,说他们“能尽维持补救之力”云云;第二道令是不准罢课,这等于是在学生怒火上浇了一瓢油;三日,北京各大学学生纷纷组织演讲团深入全市街区抗议政府发布卖国有功、爱国有罪的混账令,开展轰轰烈烈的爱国抗日宣传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民众,气势不凡,群情激奋。这时镇压学生的统领已换上王怀庆,他不仅派出大批步警挥警棍乱抓乱砍,还出动骑警冲撞演讲团,当天就逮捕一百七十八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占大半,第二天又抓了七百多学生,把北大辟为临时监狱。目睹这场壮烈斗争的陈独秀即席写了《六月三日的北京》:“民国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节的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里因为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将近一千学生被投入监狱刺激了陈独秀,终于写下了署名只眼的旷代奇文《研究室与监狱》——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①

“只眼”是陈独秀《每周评论》上的专用笔名,自然是取“独具只眼”之意。这短短九十六个字乃人类文明进步的最抽象概括,其实这是他提倡德赛二先生的形象化了的说法:要追求科学的发明和发达就得在研究室甘于寂寞人生,要追求民主自由的生活就得甘冒入监狱的生命风险,人类文明大抵如此。

第二天,六月九日,陈独秀起草了使他投入监狱的《北京市民宣言》: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424页。下列《北京市民宣言》同此引,原载《每周评论》第25号。

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

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四、北京保安队由市民组织。

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人士谅解斯旨。

宣言草成“交由胡适英译后与高一涵同去嵩祝寺左近一个承印北大讲义的印刷所当夜印好”。第二天下午,陈独秀约了好几位朋友跑到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茶馆,“我们就把印好的《北京市民宣言》一张小传单放在没有人的茶桌子上,用茶杯压好,等到吃茶的人回到桌子上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引起陈独秀和我们高兴”^①。陈独秀与哪些人一起去撒传单的?撒传单先后共两次,陈独秀成为托派后谁也不敢提起他,七十年代末写了陈独秀却避掉了一个人,就是胡适:“到了十一点钟回家,我和高先生在洋车上一边谈,看见没有关门的铺子,我们又要给他一张。我还记得那时是六月,天气正热,我们深夜还在谈话”,忽然得到报馆来电话“说你们走后,陈先生在香厂被捕了,他是为了这件事而被捕的,然而报上载着他是反动!这是反动,那么现在的革命是不是反动?‘反动’抹杀了许多事实,他怎么能算是反动?”其他参与撒传单的有时任北大理科教授王星拱,文科教授高一涵,北大预科教授程演生,内务部佥事邓初,这可真是规格最高的撒传单的革命伙计了。

情况是这样的,第一次撒传单顺利,鼓舞了这些革命浪漫主义者的轻率行动,第二天——六月十一日晚上,陈独秀等鲁莽英雄们竟然跑到前门外最热闹的香厂,还先去浣花春川菜馆打牙祭,然后兵分两路,王星拱和程演生去城南游艺馆,别的则在陈独秀率领下到了新世界……这帮书生真是呆到了家,第一次出敌不意,顺利撒出传单,其实这时传单已落入敌手:“前因本署捡得传单一纸,内云欲在新世界抛扔炸弹云云。署长当以此事无论有无,究以有关治安,遂由署抽派便衣巡官长警每晚夜分布

^① 引自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狱》。

在新世界商场内注意侦查。”^①陈独秀等真是自投罗网，他们上楼直到屋顶花园向下面露天影院撒传单：“哪知道，我们正在向下撒传单时，屋顶花园的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天真、幼稚，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张传单给那个人……”那个人是坐探：“当即会同本厅密探李文华等将该人扭获，当从该陈独秀身上搜出传单一卷，信件一封，遂将人证一并带署等传提讯。”陈独秀在押途中“故意大呼大跳起来，说：‘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以保护未捕者。这是当事人高一涵的亲历。陈独秀是勇敢的，陈被捕当夜，“有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兜围北河沿箭杆胡同陈氏住宅，破门而入。陈氏眷属均从梦中惊起，当时被搜去信札多件”。看来问题是相当严重了。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马上见报并迅即传向全国各地，遂引起了全国性的并有相当多的政要人物和单位出面营救的运动。与此同时从被捕第二天开始北京各报记者、各地驻京记者、中美通讯社和路透社等外国记者和通讯员纷纷去警厅要求会见陈氏或向警厅探听消息，舆论压力之大远超官方想象。《北京市民宣言》中的关键是第二条要罢免并驱逐出北京的六个官员，曹、陆、章是五四点名的卖国贼，外号“小扇子师爷”徐树铮当时里挑外撅也不至引出麻烦，严重的是段芝贵和王怀庆二人。前者是京畿卫戍总司令、后者是五四运动发生后取代镇压学生不力的“泰威将军”李长泰而遽升为兼任京畿卫戍总司令的原京师步军统领，他素有“屠夫”恶谥，当然也是徐世昌大总统手下的得力干将。不必埋怨陈独秀直抒愤怒胸臆而错失斗争策略，是他把脑袋别在裤腰上道出了人们普遍的心中积愤，从而酿起了空前浩大的救援运动。若想写出全貌，可专著一本。要言之，如果没有迅速造成全国性的强大压力，单就第二条就可使陈独秀永世不得翻身。强大的舆论攻势证明陈独秀是一座火山，震动不得，使警方不敢轻易判处，甚至使政府感到棘手，这时被捕才三天！六月十四日，在警察总监吴炳湘被迫出面解释的布告中说被捕的当时，探员“并不知其为何人，亦不知其系何姓名”，又说知其名后去抄家时亦“极其文明和平”，对陈夫人“业经具结、并未受何等惊扰”云云，显持退势。从六月十一日被捕到九月十六日宣告无罪出狱，北洋军政府亦不得不在愤怒喷发的火山前却步。现在回顾陈独秀第二天被捕，从他不遗余力地宣传科学和民主的角度，正是《新青年》传播新思潮的胜利，全国民主意识的大觉醒。当然，我们不能估计过高，总的说来，笔永远敌不过枪，舆论压力到一定的时期会引起国家机器的疯狂镇压，一九二七年的李大钊就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被送上断头台的，何况还有“宁可错杀一千，不愿放过一个”的极端黑暗，以及根本不准你议论、绝

^① 《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第二次被捕》，本节所引此次被捕全部资料除注明外，均引自该书该节。

对封嘴的大黑暗哩！下面，我们引若干舆论以存真——

罗家伦：

我们现在心中忧虑的，不是我们自己被诬言，而忧陈独秀先生的被捕，旧派手段的卑劣一至于此。陈先生在狱里始终不许与熟人见面，身上还有伤痕……

《民国日报》记者，陈独秀惨受拷掠：

据局中人泄出消息，陈君被捕后，已由警厅拷讯两次，遍体并受有微伤，颇有将与大狱之势。小徐及曹、章、陆受全国学生之气，愤无可泄，几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涵庐通讯：

……然当军警会议的时候，又有人说王怀庆在议席上说话最多。归根一句话，非严办不可。又有人说，吴镜潭（即吴炳湘——引者）对于陈先生并无恶意，不过段芝贵要求严办……

现在北京思想界，均呈一种不安状况，行坐谈论总是陈独秀的案件……不但是抱新思想的人如此，就是桐城派的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诸人，也不以政府为然，常常向人表白说，主张不妨各异，虽同是士林，斯文一体，文字之狱，万不可兴云云。

黄昆仑：

夫苟使鼓吹新思想之人而受武力之摧残……敢请同学诸君对于陈先生竭力为之营救，或出于示威运动，亦所不惜。

章士钊致龚心湛内阁总理：

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君独秀，闻因牵涉传单之嫌，致被逮捕……执政因文字小故而专与文人为难，致兴文字之狱，幸而胜之，是为不武；不幸不胜，人心瓦解，政纽摧崩，虽有善者，莫之能挽。试观古今中外，每当文网最甚之秋，正其国运衰歇之候。……

田桐激将徐世昌大总统：

中国历史可为羞耻之事，莫如儿皇帝之称。……阁下未为总统，先有豫为儿总统之决心，较之儿皇帝更下一等矣！人以此点判断阁下，曰性嗜虚荣，恇怯无耻，虽然，爱国之心怯而求荣之心勇，图治之心怯而媚外之心勇，求材之心怯而杀才之心勇，……阁下之勇亦未可厚非矣。桐谨劝阁下能将陈独秀刑之菜市，人当服阁下之勇，不然即日释之，还人自由，人亦感阁下之仁。如不杀复不释，日令司锦衣者鞠拷再三，以缩短其生命，或再稍延时日画鸩以饮之，此乃小人之智，士君子所不为，天下后世所为谬笑者，愿阁下思之。

抄到田桐，笔者不禁絮叨几句，田桐，“民国元老”，与陈独秀同庚。这封致徐世昌的信是这次声援释放陈独秀的舆论中最为激烈，近乎檄文，于《民国日报》发表引起强烈的反响。后来田桐坚决反对国共合作“护党救国”，以至就从不提此公早年的壮举了。

胡适：

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请再读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的一条随感录(下面录《研究室与监狱》全文，略——引者)：

《每日评论》上我的朋友陈独秀引我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受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你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几句话出版后的第三天，他就被军警捉去了，现在已有半个多月，他还在警察厅里。
.....

岑西林(一九一八年军政府七总裁之一)：

倾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近以市民排外嫌疑，遂致被捕。……窃念国家虽败，文字犹兴，际此时艰，人心浮动……况市民一哄，宿儒归隐，汉唐宋朋党祸最酷之日，然如此事亦未之前闻。

李辛白(北大庶务主任)：

依他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为我们痛苦。

毛泽东：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陈君之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下午四时陈独秀出狱，陈独秀出狱是民主战胜专制，是五四民主大团结争取人权的第一场漂亮仗。

李大钊吟诗欢呼(全诗三段录第一段)：

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与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刘半农作长诗欢呼：

D!

我已八十多天看不见你。

人家说，这是别离，是悲惨的别离。

……

威权幽禁了你，还没有幽禁了我，

更幽禁不了无数的同志，无数的后来的兄弟。

出狱后的陈独秀生活在友谊的欢愉之中，作诗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激，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全诗所散发出来的对于反动军阀统治阶级的宽恕，在陈独秀一生真是绝无仅有的孤例：“……那里有什么威权？/不过几个顽皮小弟兄弄把戏。/他们一旦成了人，自然会明白，自然向他们戏弄过的人陪礼。/那时我们答道：好兄弟，这算什么，何必客气！”竟然还继续写道：

他们虽然糊涂，我们又何尝彻底！

当真彻底的人，只看见可怜的弟兄，不看见可恨的仇敌。

提枪杀害弟兄的弟兄，自然大家恨他；

……

奉劝心地明白的姊妹弟兄们，不要恨他、怨他、气他、骂他；

只要倾出满腔同情的热泪，做他们成人的洗礼。

受过洗礼的弟兄，自然会放下枪，

……一同走向光明里。^①

这首题作《答半农的〈D—!〉诗》，如若不是关傻了，就是真的会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奇迹？实在令人失望，今后也有他吃不尽的后悔药。包括他两个亲骨肉儿子在内的一批批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倒在军阀、国民党的枪口下……当然，我们也不必把此诗中之心迹流露看得过分严重，人在狂风恶浪中孤独搏击时，难免气馁一时的，重要的是立即走出低谷。

是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号》，最终导致《新青年》编委会的分裂，据周作人回忆十月五日“下午二时至适之寓所，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②。七卷一号上陈独秀发表《新青年》创刊以来第一篇《本志宣言》，终于写

① 《新青年》第7卷2号。

② 《知堂回想录》第357页。

下了：“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但是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相待。”请注意这里提到“财阀”、提到“敌意”，令人想起马克思的名言“剥夺剥夺者”，陈独秀毕竟是陈独秀！

出了监狱的陈独秀并不等于彻底地自由了。这时他虽已“辞”去北大文科学长，因名声日隆，首先警觉的是警方，在他家左近安了岗警，监视其行动，便衣也多了起来，若无其事的陈独秀毫不在意，忙于接手独办《新青年》，亦常被青年学子和有关方面请去演说和集会；文章也没少写，支持青年创办刊物等事也没少干。当时正值赴法勤工俭学事业草创，陈独秀大力支持，如少年中国学会欢送许德珩和陈宝镗赴法，茶话会设在南池子欧美同学会，陈独秀与李大钊、蓝公武、徐宝璜等教授莅临并致词：“陈独秀的致词，对五四运动评价甚高”^①。送行许德珩不久，北京有一批青年创办了社会科学期刊《新社会》，这可是异军突起。当时的刊物几乎都与北大与陈独秀有关，都有北大师生参与，唯《新社会》与北大没有任何瓜葛，但是他们却找上门去了。《新社会》是五四运动第三天五月六日北京学联《上大总统书》上签署的二十二个学校中的俄文专修馆的学生瞿秋白以及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耿式之、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等青年合办的，按照郑振铎的说法他们是五四运动中的“单干户”：“我们这一群代表着‘俄专’、‘汇文’、‘铁路管理’的便在一起，成了一个小单位”^②。刊物出版后，十一月九日，郑振铎与耿济之带了创刊号去箭杆胡同拜访陈独秀：“陈独秀对如何编好《新社会》有所指示，并谈了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问题的看法。郑振铎受到感动和启发”^③。其实在《新社会·发刊词》上“我们改造的目的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等内容中已经表明了《新社会》就是受《新青年》和陈独秀的启示而办的。《新社会》群体在五四时期是相当左倾的，如中国第一篇《马克思年表》就出自群体中的郭绍虞^④，这也可以算作知识分子倾倒马克思的中国红色思潮的一个总结。《新社会》群体中多位通俄文，更不必提这个群体中当时以最轻的年纪而被尊为“老大哥”、“小组组织的领袖”（郑振铎语）的瞿秋白。只是《新社会》群体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历史荣耀而已。一九一九年受到陈独秀支持和鼓励的还有湖北恽代英主持的共存社（利群书社）和早就受益的湖南毛泽东的新民学会（长沙书社）等。

一个更大的计划，一个孕育出中共的组织和一群出类拔萃的青年，成熟在红色的一九一九年。一九一九年对于陈独秀虽是艰辛的却又是充实的，他用如歌般语言咏

① 德珩《我和陈独秀》，《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后来陈宝镗未赴法，留学去了美国。

② 《忆秋白》第10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③ 《新社会》第3期郑振铎《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又见陈福康编《郑振铎年谱》第2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④ 载《晨报》第7版《副刊》12月1日，署名绍虞。

叹今后的努力和理想：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有关劳动分工对人的精神和创造力的摧残和剥削阶级统治下的劳动异化理论，陈独秀的歌，唱到他死也是乌托邦式的，然而确实是鼓舞人心的革命进行曲。

第三章 创建工人政党

(一九二〇—一九二九)

南北对峙, 中国共产党成立

显示中国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和具有爆炸性革命能力的, 引导劳工阶级贫民阶层投入革命的, 诱发朝野政要社会士绅中那些尚未泯灭的爱国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终于结束——它终结在两个“点”上: 第一个点, 是五四运动向纵深发展, 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五四运动, 在其开始……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 就不但是知识分子, 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 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①。第二个点, 是陈独秀被捕, 他的被捕和释放, 给五四运动画了句号。对于第一个点的认识是传统的, 不会引起非议, 因为无论是国民党或是即将成立的共产党都在这场给军阀和北京政府以沉重打击的运动中得到了政治上的好处。马克思主义者们自不必解释, 国民党亦复如此——也许得的好处更多些——这就是孙中山以及包括蔡元培等元老支持这场运动的原因^②, 也许可以说这是国民党, 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共同反对北京军阀政府的第一次合作, 未来统一战线的精神投入。

对于第二个点的认识, 则不仅是新鲜的而且是残酷的。所谓“新鲜的”是由于从未有人提出过; 所谓“残酷的”则因为是由陈独秀本人用命换来的。然而正在这新鲜而又残酷的点上, 分明看到未来中国革命的领袖已经显出。笔者在第二章叙述陈独秀被捕时不厌其烦地录引各方代表的营救呼吁, 从田桐、胡适、傅斯年到李大钊、毛泽东, 显然包括五四运动中的各派政治力量都服膺陈独秀。在近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历史交汇点上, 除孙中山之外, 惟陈独秀获此殊荣。

^① 引自《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竖排本)第2卷第693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3月第1版8月重排本。

^② 关于这项研究,可参阅刘永明著《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第3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

激烈运动过后必定有个体整和总结的过程,抱着各种政治思想的参与者都将进行反思。五四运动不是某一政党在既定的策略下发动的,而是广大学生知识分子在《新青年》的理论感召下,针对巴黎和约的屈辱和北京政府卖国行为的自发的运动,于是大部分参与者必然产生运动结束的落漠感,主力军的学生或继续念书或毕业后云散,运动中涌现的领袖人物则随着各自的政治理想开始新的谋算。这就是激烈的政治动荡之后出现的思想空旷,或可以称之为政治真空的吧?“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线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①鲁迅的回忆令人感慨万千,但他还是看到了有前进的一群。事实也确乎如此。五四运动后掀起了民国以来第一个出国潮,除各省推荐赴法勤工俭学外,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赴美留学,这属于高升的一群。以匡互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运领袖最后成为学者,钱玄同回书斋,以及刘半农赴法国,王光祈留德国等可以纳入“退隐”行列。一九二〇年刘少奇、任弼时、韦素园、曹靖华、蒋光慈等等一群到俄国;尤其是瞿秋白去“饿乡”,则是“前进”行列中的最激进分子,据他一九三五年临刑前的回忆就引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青年群体:“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上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或一九二〇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②。“转变和分化”的看法与鲁迅相同,都证明了革命的深入正在汰去一部分人。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得到蔡元培同意,在北大图书馆设有办公室,后来又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成立启事的公开组织,由李大钊主事,最早有十九人参加。^③

在告别一九一九年时,有几件事应当在此作一交代。

首先是十二月二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长沙各界在省教育会前焚烧日货,遭到督军张敬尧的镇压。毛泽东及新民学会成员发动“驱张运动”,并派出代表分赴省内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谋求支持,毛泽东率四十人的“驱张代表团”于十八日抵达北京,住在北长街福佑寺里,生活很是清苦,却独自开设“平民通讯社”向全国各大报纸发布驱张意义和斗争消息。经毛泽东等湖南青年长达半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把张敬尧驱出湖南,并使他一度处境极其难堪。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第一个业绩,得到了

①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② 《多余的话》,转引自周永祥编《瞿秋白年谱》所附文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53年4月第1版。

③ 十九人名单保存在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

陈独秀的重视：“现在压迫湖南的暴力去了，湖南青年底奋发一日千里。”^①

十二月，无政府主义者王光祈呼吁成立“工读互助团”，得到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十几位热心公益的学者的支持。如今是连音乐界也不记得曾获得过德国波恩大学音乐学博士学位的王光祈（一八九二—一九三六）五四时期倡议开办过两个组织，另一个是少年中国学会，都得到李大钊等学者的支持，风风火火好一阵子。工读互助团，后来虽无实绩，却开创了平民教育互助教育工读教育的先声。^②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的又一件大事促成了陈独秀离京南下，那就是当时孙中山麾下炙手可热的陈炯明邀请陈独秀出任西南大学筹备员，后来又擢升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对于陈独秀一生又是不下于三年前到北京的机运。只是他现在还不急于去，还有更重要的工作使他脱不开身，我们也就暂且不表。

一九一九年在中俄政府级关系史上亦是重要年份——七月二十五日苏俄政府发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这个宣言直到第二年的四月才见诸中国报端，其时距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只早了四个月，当第三次对华宣言发表的一九二三年九月，中共已就加入国民党达成共识。

使我们流连忘返的一九一九年，该叙述的事似乎太多了，总不能因此而疏忽了传主的思想演变，既然大家都在五四运动中经受考验，以决定在运动后那场焕然一新的民主革命中接受新一轮的考验，首先面临的是对南北分裂局面的政治选择，其次是对中国在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的选择——就当时而言，恢复帝制已不可能，南北割据决不会久长，孙中山国民党的立场是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从陈独秀的立场，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其要分两步走，即先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土地分配，解放农村生产力），然后接续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不论是“二次革命论”或“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都决定了前期的中共可以（却不是非要）同国民党协同作战铲除军阀以使南北统一，又决定了后期国民党必定会与中共争国家政体而引起内战。因此，陈独秀及其群体能不能掌握在十月革命启示下深化五四运动掀起的民主革命，关系着未来中国之命运，因为，从本质上讲国民党与北京政府终将都是人民革命的对立面，就当时的政治形势，如若没有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政治倾向及物质援助，五四运动后国民党的前途：一是被北京封建军阀政府消灭——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彼此都见得到的事实，敏感一点的人不仅没有忘记讨袁、护国的失败，还预感到广州元帅府也无法摆脱朝不保夕的厄运；二是国民党被迫与殖民力量联手消灭北京政府的同时宣布共产党为非法，以此换得一个靠在欧

① 《敬告广州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6月第1版。以下只列篇名者均引自此书上、中、下三册。

② 参阅《新青年》第7卷3期《工读互助团问题》专栏。

美帝国列强胴体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性质的半殖民地国家。二者必取其一。一个是再三欲取北伐胜利一统南北的国民党，一个是正在建成中的共产党，谁能准备好动员群众的口号，把握全民政治亢奋的机遇，谁就能指导中国革命。这时，又是陈独秀，他调整了全民动员的口号和革命理论，陈独秀政治思想在前进：

劳动界诸君呀！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现在宪法都有了，共和政体也渐渐普遍了，帝王贵族也都逃跑或是大大的让步了，财产工商阶级要求的权利得到了手了，目的达到了，他们也居了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①

这段话是极其重要的：陈独秀理论中的“民主”，不是不变的，是可变的。民主，作为“新兴的”财产工商阶级（即我们现在的词：资产阶级）的旗帜，其任务是反封建，是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就是旧民主革命。民主，作为新兴的无产劳动阶级的旗帜，其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在中国就是新民主革命，只是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因了它有受帝国主义压制的一面，所以中国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第一阶段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切莫小瞧这段引文，在一九一九年，只有率先高呼民主和科学的陈独秀一人在五四运动之后给德莫克拉西予以崭新的可变的因而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顺便说一声，认为陈独秀始终抱着法国大革命思想投身无产阶级运动的研究走向，看来是站不住脚的。代表陈独秀五四时期思想和宇宙观积极升华的言论很多，但上引这一段简赅的话实在是搏住了建党前陈独秀的思想主脉。当然，赋予民主以时代特征的解释亦不必具有多么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终于盼来了一九二〇年，这是中国之命运攸关的一年。看看陈独秀在干些什么？箭杆胡同九号真是静得听得到时钟嘀嗒声，陈独秀独处书房，满屋的雪茄烟味儿辣人眼睛，元旦这一天他竟完成了大小文章十三篇！长者，《论自杀》近万言，是例证丰富理论性强又富含浓重感情的陈独秀“标准”论文；短者一事一议惜墨如金却撼动人心，且引几句算是庆贺天增日月人增岁吧：

解放就是压制的反面，也就是自由底别名。近代历史完全是解放底历

^① 《告北京劳动界》。

史,人民对于君主、贵族,奴隶对于主人,劳动者对于资本家,女子对于男子,新思想对于旧思想,新宗教对于旧宗教,一方面还正在压制,一方面要求自由、解放,事实本是这样:何必要说得好听……^①

陈独秀要行动了,他在书斋里已经运筹好了行动纲领。这次走出书斋可是与十五年前从安徽俗话报编辑部,十年前从陆军小学堂教员休息室出来大不一样,他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对于青年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感召力,还有一批若李大钊般的同志,若蔡元培者的同盟军,拱托着事业的成功。正当他在接受陈炯明邀请而南下前夕,延年乔年赴法勤工俭学。两个在“兽性主义”苦炼下的青年走向革命,对陈独秀不只是个安慰也卸却了他的重任。剩下松年和鹤年两个儿子就可各自照管各自的母亲了。

一九二〇年一月“陈独秀君,应西南大学筹备员汪章二君之约。已于前日(二十九)抵沪”^②,其实这次去上海并非去广州到任,而是代替胡适去武汉参加武昌文华大学毕业典礼。因此他二十九日到上海,二月二日就溯江而上于四日匆匆赶到汉口;四天后是从汉口直接回的北京。既然连当时的报纸都错作广州行,我们就插空为陈独秀武汉的四天活动排个日程:五日下午三时出席协进会在文华大学举行的欢迎会,作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说;次日上午九时,出席文华大学毕业典礼,作《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说;临行前一天上午九时,被接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应汉口青年会之请发表《新教育之精神》演说;八日临行装点好行李于下午二点被接到堤口下段保安会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了一通抵制日货,发展实业和城市自治等内容的演说,又被请至普海楼酒家应武汉学界宴饮,就文字改革诸问题一抒己见,才匆匆赶到车站乘京汉路返回北京。这是陈独秀首途武汉,难免带回来了武汉官僚们对陈的政治倾向强烈的演讲的不满,这就引起了北京官府和警厅的警觉……乘在向北京前进的车上的陈独秀还蒙在鼓里,北京警察局的监狱里又为陈独秀腾出了位置请君“二进宫”。

中国军人任性变化,忽而惩恶扬善造福民众,忽而恶性发作阻挡革命,既有政局因素、军事制动因素,以及粮饷辘重来源等因素,也有个人政治素质和品德上的问题,陈炯明(一八七八—一九三三年)够得上是个典型了。他于一九〇八年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登上历史舞台,一直追随革命到一九一七年被孙中山委任为援闽粤军总司令,战功显赫,在一九二〇年八月为孙中山夺回广州之前,他惨淡经营闽南。当时尚倾向社会主义的戴季陶向张国焘推荐陈炯明,称他为“社会主义的将军”,“这位将军仰慕

① 《解放》。

② 《民国日报》1920年1月31日第10版。以下有关陈沪、穗行踪均引自此报消息,不另注。

新文化,爱谈社会主义……但陈独秀先生似没有特别重视陈炯明”^①,陈炯明却特别仰慕陈独秀,甚至向北京政府国务院呼请核准陈独秀南下筹办大学^②。其实这时的陈独秀已逃到上海,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渔阳里二号原柏文蔚的住宅里运筹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现在,我们把镜头推回北京,二月十日京汉路来车抵达北京站,陈独秀一下车就被几位朋友接到王星拱教授家暂避,使在箭杆胡同陈宅左近蹲坑捕拿陈独秀的警探们蹲得好苦。守候陈宅扑空,焉能罢休,继续跟踪,终于探明陈已移住到刘叔雅教授家。所幸此事被马叙伦教授获悉,“乃借电话机语沈士远,士远时寓什坊院,距叔雅家较近,然无以措词,仓卒语以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盖不得露其姓名也。……故士远往告独秀,即时逸避。翌晨由李守常侨装乡佬,独秀为病者,乘骡车出德胜门离平”^③。参与掩护陈独秀逃离的高一涵不记马叙伦的回忆,但写李大钊护陈出京却很是生动:“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渍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帐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前往上海。”^④

林琴南老夫子决不会想到“文白之争”时他的“小说攻势”,不仅没有把陈独秀等打倒,反而打出了名,紧接又发生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枪杆败在笔杆下的“捉放陈”轰动全国,以致本来就名声日隆的陈独秀真的成了记者追逐的“明星”,这次到上海又立即见诸报端:“陈独秀君应西南大学之约,前赴广州,阴历年终过沪,即乘轮过粤”。逃离北京的陈独秀到了上海竟然还给他的安徽老乡、京师警厅总监吴炳湘写了封揶揄有加的信“夏间备受优待,至为感佩,日前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仄,特此专函补陈”^⑤。真可谓潇洒走一回,倒也符合他的性格。

但是,这一次,陈独秀也没有“即乘轮过粤”,却借记者采访的机会表明了他对办西南大学的见解。广州欲办大学是南方政府与北方政府对峙的产物,曾得到南方诸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99页。本章以下所引张国焘回忆除特别注明外皆出此书,不另注。

② 转引《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1期。

③ 马叙伦《石屋余沈》第133页,建文书店1948年7月初版。

④ 《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⑤ 《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

省政要的支持和资助,其起因是陈炯明的以海关关余创办西南大学的建议被广东省政务会议通过拨款一百万元。据查,一九一九年全国关税的收入为历史上最丰年,共收入四千六百万两关平银(约一千五百万英镑),移交政府的关余约二千二百六十余万两,广州关收入二百四十七万一千九百两。^① 陈炯明先委任汪精卫和章士钊为筹备员,他们又敦请了吴稚晖,在请陈独秀时还特别请蔡元培就近力促。被困厄在京的陈独秀虽同意办校,但在办成什么样的大学,尤其是西南大学办在何地则与汪章吴三氏有异,他不同意办在上海,更反对李石曾吴稚晖提出在法国巴黎或里昂办中国大学的建议,事情就搁了下来。三月二十一日,李大钊、吴稚晖和从法国归来的李石曾到上海与陈独秀面商校址事宜,终于以广州目前形势不靖,章士钊因政治原因不想在广州供职等理由,说服陈独秀,遂校址暂定在上海同济学校原址,李石曾因可用部分庚款办校,继续与法国方面会商。这次陈独秀不仅没有固执己见反而透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陈君更证以中山先生之意见,以为粤中办学,非先去野蛮粤人不可。”^② 连同孙中山在三月间曾为《新青年》题写“天下为公”等信息,看来孙中山在上海闭门读书“期以学识唤醒社会”时期与陈独秀就有较多的接触。笔者为给读者加强孙陈关系的印象,在叙述各界名流吁救被捕的陈独秀时,特意留下孙中山吁救陈的一则消息,放在这儿发布:“孙中山先生当时在上海,一见到徐世昌、段祺端的代表许世英,就郑重提出陈独秀被捕的事,他指出:‘你们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听了这番话,口口声声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③ 过去一直说信念坚定又温文尔雅的李大钊深得孙中山的器重,如今又悉陈独秀给孙中山的印象也颇佳,南陈北李成为国共合作初期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就性格而言“孙大炮”在决策行动时也许更倚重南陈。

西南大学一经定在上海,陈炯明倒十分痛快立即命军政府电请上海关代拨八十万,三四两月各半,其实这是空欢喜一场,消息一发布,几方就为这百万元扯皮,由是之故,陈独秀就在上海安下了家,并把家眷接来。从此时起至十二月十六日离沪去广州是陈独秀坐镇上海联络全国筹建共产党的重要时期。大体有以下几件事:

一,《新青年》回归上海继续出版。首先编定的是五月发行的“劳动节纪念号”,是创刊以来篇幅最大的一期,有两个显明的特色,一是除李大钊写的《“五一”运动史》,以及介绍英法美日劳工运动概况的几篇,全本刊物都是当时各主要工业地区和棉纱、煤炭、钢铁等轻重工业的劳工调查报告,这在《新青年》属首次。它表明回归上海的

① 《民国日报》1920年1月4日第3版。

② 《民国日报》1920年3月24日第10版。

③ 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新华文摘》1983年第18期。

《新青年》已随着陈独秀把德莫克拉西作为新兴劳工阶级的旗帜而跨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舆论的阶段。嗣后就出现了“社会主义讨论”，“俄罗斯研究”等专栏，各期社会问题调查亦偏重于罢工运动和产业无产阶级的劳动和生活研究，就引出了胡适的“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 的汉译本”的属于办刊宗旨的疑虑。但就在这种状况下，《新青年》同仁亦尚未分裂，直到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在各地展开组织工作的一九二〇年底，陈独秀在致胡适和高一涵的信中还承认：“《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① 可见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对于《新青年》的编辑思想，一直保持着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协作上。那种因此而以为陈在建党时期仍有右倾思想的研究，实在左得出奇。实际上是从五四运动到国共合作这五年，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旧向新转化的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或称之为“法国大革命思想”），还有其革命性的一面；在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的心目中，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同盟军，直到国共合作仍是同盟军；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政党真正与资产阶级政党分裂，就其政治立场，使胡适们与陈独秀们向背，那是二十年代中后期的事，但仍与“玄学鬼”张君勱们有区别。就《新青年》而言是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季刊时期）才正式分裂，它标示着一个时代——五四时代的结束。

陈独秀把编辑任务交给陈望道是一九二〇年底，象征五四时期的《新青年》终结的第九卷，陈只是精神指导了。在这可纪念的最后一卷上出现了北京上海两地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张申府、蔡和森、张国焘、李达、李汉俊、施存统、戴季陶、陈公博、周佛海、沈雁冰、陈望道、沈玄庐等的文墨，但仍然不缺胡适、吴稚晖等的文字。这里，我们不妨弄点花絮轻松一下，如九卷二期开卷四篇论文相继为：胡适的《国语文法的研究法》，陈独秀、区声白的《讨论无政府主义》，高铨的《性之生理学》，存统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看看题目，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确实颇能悟出什么叫作《新青年》的学术雅量和使陈独秀很遭了些酷评的民主自由学风。如若我们再说这一号出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个月，这学术自由之风也许会吹得我们清醒些吧。

二，全力投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首先是与北京对等，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此，陈独秀从两个方面着手准备。首先谈思想建设，有关他从激进的民主革命向马克思主义渐变的言论前面已有相当摄入，这里指的是陈近期言论的特点已

^① 有关这场争执的原始资料以《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为题编入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 1954 年 12 月第 1 版。

不是说说的宣传鼓动,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中国产业无产阶级为摆脱资本剥削这类根本性质的问题,为建设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奠定理论基础。例如发表在“劳动节纪念号”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就相当突出。上海厚生纱厂到湖南招募女工,是中国资本积累初期惯用的手段,先是用内陆乡下无知姑娘来顶替开始有觉悟并纳入工会组织的城市女工,破坏工运;后是开辟廉价劳动力市场,迫使背井离乡的姑娘就范于资本剥削。陈独秀广泛收集了十多则报导和评述,从中找出代表资本剥削伸向农村廉价劳动力市场的最典型的例证(穆藕初的意见)予以批判,陈独秀抓住了两点,第一,他明确指出:“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我们把这段话稍微现代化一下,就是现代工人运动已经从单一的经济争纷跨入政治斗争层面,其结局必然是先要求工会组织,接着组织代表工人政治权益的政党;第二,陈独秀运用剩余价值理论揭露穆藕初的所谓工人工资逐年递增的资本隐型剥削,“照穆先生说,十年前每日工资只一角七八分,五年前只两角四五分,现在有三角左右,表面上已经是递加的现象,照马克思底学说,工人每日劳力结果所生——即生产物——底价值,就是五年前比十年前只加一倍,现在又比五年前只加一倍,而两项工资增加都不及一倍,实际上岂不是递减的现象吗,这种递减去的不是都归到剩余价值里面,被资本家——股东——掠夺去了吗?”加上物价上涨、劳动工时的增长而营养摄取量大等因素,资本家以为的加法,对于工人却是减法,全都被隐在剩余价值这个怪物里了。关于运用剩余价值理论,运用资本剥削产生的不合理分配,从理论角度较深刻地解析无产阶级贫困化,以及因此而发生的连最起码的温饱权都受到日益严重的侵犯,更谈不上生存发展的基本人权等等,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劳动者的觉悟》、《答知耻(工人底时间、工资问题)》等长短文章中都有所表达。这里,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说一句,陈独秀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剖析社会问题的特点是它的实践性质,如若说到理论研究,与陈独秀写上述所引文章的同时,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论文,比较南陈,北李的论文不失为一个重要补充。

陈独秀还有一个特点是随和大众,他要做起文章来,古今中外广征博引,洋洋洒洒,使胡适等学者都钦佩不已,但走进工棚或船坞面对成天为温饱奔命又时时担心被炒鱿鱼的工人,他的讲话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能扣人心弦,又没有丁点儿书生气,很有列宁的辩才:“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还有许多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才能把我们的货物和我们自己送到远方,这都不是皇帝……底功劳。可见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工人们想:咱们既然是“台柱子”,那么

要求“管理政治、军事、产业”，是必然的啰。^① 陈独秀曾一而再而三而四论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的弊端，但他非常重视当时上海拥有全国百分之二十六的逾五十万的“台柱子”，把他们从分散走向集群，果能如此，一旦中共成立，“台柱子”“据于治人的地位”的日子也就不远了。以上谈的是陈独秀把中共作为以工人为主体的组织方面的思想舆论工作。

接着就是建党实务了。

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日定为一九二一年的七月。但是，有相当的资料证明中共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如一九二六年在莫斯科的蔡和森为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说：“究竟吾党何时成立的？何时发起组织的呢？仲甫到沪一九二〇年‘五一’节后，即邀请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成，不久，戴季陶、沈仲九退出了，于是一九二〇年就正式成立了。”^② 现有资料，这可能是最早持一九二〇年说的具有回忆性质的党史；接着是在一九二八年瞿秋白为参加召开于莫斯科的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而作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中，邓中夏在一九三〇年写于莫斯科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都提到中共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在当事人中陈公培回忆是一九二〇年夏；董必武于一九三七年回忆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一九二〇年五月。”最具体的要数一九五六年施存统(复亮)的回忆：“一九二〇年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沈仲九、刘大白、陈公培、施存统、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名字已忘)，在陈独秀家里集会，沈玄庐拉戴季陶去，戴到时声明不参加共产党，大家不欢而散，没有开成。第二次，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由上述五个人起草党纲。”他还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它的机关刊物也叫《共产党》”，由于施于六月二十日拿了党纲赴日本找周佛海联系留日学生组党事，因此，可断定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六月二十日之前。尤为关键的是施文中提到的党纲，现在找到了：这份题为《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的文件，于五十年代发现在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档案里，据毛泽东一九二一年一月致蔡和森信中有“宣言即仲甫所为”^③这句话，比照施存统文，宣言是在第二次建党会上通过的。笔者承认这个中共宣言的权威性。至于宣言内容，将在谈中共一大纲领时予以比较研究。

一直参与李大钊北京组党又与陈独秀直接联系的朱务善说：“大约在一九二〇年

① 《劳动者底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

② 本节有关建党的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一大”前后》第1、2、3辑，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0年6月、8月和1984年6月初版，不另注。

③ 《共产主义小组》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版。

五六月间,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与当时革命青年邓中夏、张太雷、高君宇,及后来成为叛徒的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接着在提到邓中夏一九二〇年建党说之后明确指出:“当时并无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后来大概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所以各地在此之前成立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方面,参与建党全过程的李达曾斩钉截铁指出一九二〇年夏成立的是“C. C. P. (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回忆中他还说“成立共产党的会议是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的,也即是说在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成立的。”李达的回忆与施存统几乎一致。但是因了回忆者除董必武以外,不是英年早逝便是后来的脱党者或被厘为叛徒者,因此就缺乏被认可的权威性。当然最有权威肯定中共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夏的人成了最无权谈共产党的人——就是一手造成中国共产党的本传主人,他在《对于时局的我见》中以回答“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时,谈到了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若干原则,其中一条说:“国家、权力、法律,这三样本是异名同实。无论何时代的法律,都是一阶级一党派的权力造成国家的意志所表现……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会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着重点引者加)此文发表在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一号上,文中的“吾党”指的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可见中国共产党确实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日之前。那年二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上海时就研究过在北京大学已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共产党事宜,正值此时,苏俄为护卫西伯利亚安全而到中国谋求共产主义联盟事宜的代表先后两批到中国,其中由俄共(布)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远东局与共产国际协议派出的维经斯基和杨明斋四月到北京与李大钊会谈,五月在上海与陈独秀会谈,即在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集最坚定分子成立了共产党。

一九二〇年是国际共运的丰收年。这一年亚洲就有印尼、伊朗、土耳其和印度建立了共产党,还有埃及、英国、澳大利亚和法国建了党;另一重大事件是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左翼统一成立了德国共产党。不能不说这是一九一九年三月才成立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成绩。往下我们将专门研究陈独秀、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现在顺着编年,综述一下在上海党和陈独秀的通联下各地共产党相继成立的概况。

杭州(浙江)党。由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沈端先(夏衍)、汪馥泉、傅彬然等学生办的《浙江新潮》受到陈独秀的关注有直接关系,“……《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我祷告我这班可爱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向发挥《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①。后来这帮“小兄弟”中的施存统、俞秀松就到上海在

^① 《〈浙江新潮〉——〈少年〉》。

陈独秀、陈望道和上海党的协助下成立了中共杭州支部。在谈到杭州活动中应当提一下已经刻在历史的丰碑上面却被人们遗忘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杭州组中的萧山人沈玄庐在一九二〇年秋冬期联络了李虎成、徐行之(S. Y.)以及萧山衙前小学几位教师积极组织萧山衙前农民运动，参与起草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衙前农民协会章程》以及《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等三个文件登在《新青年》第九卷四号上，轰动全国，这是中国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最早的农民运动文献，《章程》第三条明确提出“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沈玄庐(一八八三—一九二八)萧山大地主，早年追随孙中山辛亥革命，讨袁失败后二渡日本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和李汉俊是建党初期陈独秀的重要助手，也是孙中山倚重的干部，曾与张太雷一起参加一九二三年由蒋介石领队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由于他坚决反对国共合作遭到被中共开除党籍的厄运，后来又因参加西山会议派而开罪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终于参加国民党“四一二”清党运动，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被刺杀在衙前车站。他似乎永远不会想到自己的血会洒在他所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土地上。是他个人的“反动”，还是含有时代的或别的什么错误葬送了前途？

武汉党。由恽代英、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等筹建。武汉组实力雄厚，其中刘伯垂(? —一九二八)是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后回武汉投入的。又因李汉俊是湖北人，因此他格外关心武汉的共运。武汉党中的秀才恽代英是马克思主义天才理论家，他曾受陈独秀委托翻译过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上海大学期间他是党刊《中国青年》主要负责人。武汉还成立了 S. Y.，并拥有一社——利群书社，一刊——《武汉星期评论》。这里还得交待一番，武汉的恽代英和肖楚女于一九二〇年底在四川重庆教书与杨闇公发起成立了 S. Y.，当时从法国回来的吴玉章还是个与陈独秀无关的“青年共产党”，独自开辟马克思主义之蹊径，终于纳入中共，后来被尊为“吴玉老”。

长沙党。这是个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卓有贡献的组织，几乎不必开列名单，单一九一九年起向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〇年秋以上海外国语学社输送到苏俄留学，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级、将帅级领导人的至少四十位。这个组的负责人毛泽东从一九一八年起一直受到陈独秀的器重，由他负责的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是最早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走俄国人的路的少数几个组织之一。蔡和森在留法期间还和陈独秀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虽只出了五期(内含一期增刊)在湖南却很有影响，他写的《民众的大联合》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好文章之一。

济南党。山东在近代革命史上吃够了德日帝国主义的苦，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就是青岛胶州湾的归属问题，民众和知识分子反帝情绪尤为激奋，王尽美、王志坚、邓恩铭等济南一师学生，李祚周等一中学生和工专的王象午等学生先后组织励新学社、

康末尼斯特学会,终于成立党,出版过《济南劳动周刊》。

广州党。广州党是陈独秀直接指派北大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去家乡开辟的。一九二〇年底到广州的陈独秀甚至还任过一个短时间的书记。广州党曾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等进行过理论方面的争论,广州党具有较强的理论水平,其中杨匏安(一八九六一—一九三一)是属于党内最早研究《资本论》的著名理论家。广州党有仅次于上海的宣传阵地《广东群言》、《劳动与妇女》(沈玄庐主编),广东党的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工作超过任何省份,高峰期曾有机织、汽车司机、理发、土木、建筑、机织、皮革等行业工会三十一个,还有香港的海员工会。^①

中共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是一九二〇年夏,上海党成立后由施存统带了党纲到日本去开展的,成员有周佛海、彭湃、杨嗣霞、林孔昭等十来位,陈独秀指定沈玄庐为书记。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大体由在日本受过西方教育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留学苏俄直接接受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一部分、在马克思完成主义研究的重要侨居地法国留学的一部分和在国内坚持斗争的一部分,合共四部分成员组成。其中留法共产主义小组是这四部分中的强项,曾经出现过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郑超麟、李维汉、张昆弟、聂荣臻、李立三、李富春、刘伯坚、郭隆真、陈毅、蔡和森、张申府、尹宽等等著名共产党人。旅法建党是由赵世炎负责与陈独秀取得联系,并由上海党的陈公培和北京党的张申府协同完成的。

以上是一九二〇年全国各地和留法、日两国学生建党的概况;综合起来有五个特点:一,北京建党最早;二,各地建党都通过上海党和陈独秀;三,有共产国际来员指导和资助;四,各地党的刊物皆效法上海或由上海派员促成;五,萧山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共成立后的第一个农会,开中国现代农民运动之先河。它虽和“二七”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同样遭到残酷镇压,但应予显彰。不能因为沈玄庐后来的政治态度而否定中共党史上第一场农民运动。

一九二〇年,马克思主义东渐史上重大事件是《共产党宣言》足本中译问世。就此事,本可以谈谈陈独秀舆论宣传工作中上海地区的陈望道、施存统、李达、李汉俊等高级知识分子运用外文媒介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囿于本传的篇幅,这个问题只能笼统一句: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学说,早在上世纪末已被传入国门,但是作为政党理论引入只能认定起于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它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截止一九二一年中共在短短三四年间,如若没有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那些通晓外文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辛勤译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考茨基、培

^① 陈公博《广州一年之劳工运动》。

培尔、李卜克内西、河上肇、片山潜等经典著作和诠释经典著作的著作，只靠消息报道是“悟”不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出版陈望道翻译并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的《共产党宣言》就有了一部完备的共产主义革命教科书。据统计从一九〇三年赵必振、一九〇五年朱执信分别摘译《共产党宣言》若干片段到全译本出版，历时十七年共十二次引入中国。被喻为“无产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固然非常重要，然而在文化程度普遍低下的中国社会条件下，《共产党宣言》的作用远远超过《资本论》。据资料，中共建党前后（至一九二二年），接触过《资本论》的只有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杨匏安、瞿秋白、李汉俊、费觉天、周佛海、陈公博以及留法的蔡和森等极少数马克思主义者，这并不等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重视经典著作，正相反，陈独秀、李大钊都重视经典理论指导作用。罗章龙回忆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有一个分德、英、法三个语种的翻译班子，由李大钊领导，李大钊建议罗章龙的德文组翻译《资本论》，并译出了第一卷，甚至立下了译马恩全集的勃勃雄心。^① 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倾向是三十年代后期的事，主要是由于战争环境，干部文化水平低，又因出现了王明路线而盲目批判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终于导致思想取代主义。

现在已经到了要把全国六个支部和海外巴黎、东京两个支部集中在一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研究实行社会革命事宜了。这既是中国的需要也是新生苏俄的需要——列宁为迫切巩固新生俄国，第一策略要绥靖当时主要控制在日本手中的西伯利亚，显然这项策略需要中国、朝鲜甚至梦想日本实行民主革命以保持与俄国亚洲地区的和睦。于是在远东方面，他首先决定在红军绥靖高尔察克、谢苗诺夫白匪的同时，建立暂时与苏俄“脱钩”的缓冲国——远东共和国，利用其地理优势与中、日（包括被奴役的朝鲜）作外交斡旋。对中国则在授权负责东方事务的加拉罕起草发出苏俄对中国南北政府第一次宣言（也称作《第一次加拉罕宣言》）的同时，派出多支队伍往中国探听“东北王”张作霖、直系吴佩孚以及北京政府的虚实，谋求友好。其次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与民族主义政党谋求外交合作。我们只能从传记的需要叙述与李大钊陈独秀联系建党的一支队伍的情况。据少年中国学会章志回忆李大钊最早接触苏俄方面来的人是苏俄政府和布党远东局派出的布尔特曼，他是由水路自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直达天津的。当时是李大钊恰好掩护陈独秀从北京潜逃到天津乘轮赴沪的二月，风声很紧。当布尔特曼会见李大钊等进步人士的第二天，天津《益世报》就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②的探子密报，致使联系中断。但布尔特曼的短暂接触，获得了中国已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信息，致使苏共和共产国际立即作出去中国谋

① 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② 《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

求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速决行动,指令一,在远东成立分支机构——这就是日后张太雷入主中国科的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指令二,派维经斯基夫妇、军事干部马迈耶夫夫妇和俄籍华人杨明斋等五人以《生活报》记者在中国设俄华通讯社名义先途北京。在有些中共党史(包括天津地方党史)中不提布尔特曼只提维经斯基与李大钊的接触,其原因是维氏是授权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共产国际首任代表,具有权威性。

格里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一八九三—一九五三)出自俄国内地平常百姓家,一九一三年去美国谋生时参加政治活动,十月革命的第二年春回国参加俄共(布)后被派往远东地区从事地下工作。在鄂木斯克与高尔察克白卫军战斗中被俘流放到萨哈林岛这个沙皇俄国极东的传统流放地。一九二〇年一月他逃出萨哈林归队后立即被任命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之一。从时间上看,维经斯基几乎是出了监狱接上俄共关系立即被派往中国的。后来他又于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七年三途中国。陈独秀与维经斯基有过政治分歧,但他的政治生命与本传主人同起同落,他是陈独秀衔命建党直到被逐出党中央的历史见证人;他本人也随着陈独秀的殒落回到俄国被逐出共产国际,安排在全俄农业合作社管园艺!这个“园丁”较之加拉罕、鲍罗廷、加伦等国际援华老同事的命运,强在没有被斯大林恐怖主义处决!

与维经斯基同来的杨明斋的命运要悲惨得多。杨明斋(一八八二—一九三八)生于山东平度县马戈庄贫农之家,一九〇一年“闯关东”闯出国门到西伯利亚劳动,并发愤学习,终于成为学贯中西的高级知识分子并参加十月革命。一九二〇年杨一到中国在积极投入建党等重要工作的同时,热切关注五四运动后掀起的第一场东西文化学术大交流大论争,于一九二四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专著《评中西文化观》,全书以丰富的资料和理论与名噪一时的大学者梁漱溟、章士钊、梁启超的诸种文化观进行争辩。本书不负此项研究的责任,但一想到这位山东贫农子弟不仅是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是我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比较文化史的先驱,对他死于斯大林恐怖主义下的命运,应不只是悲痛哀思而且要予以显彰。^①

一九二〇年三月左右,维经斯基等在北京由同情中国革命的白俄、北大讲师波列伏伊(柏烈威)和伊凡诺夫(伊凤阁)^②引见给了李大钊以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等

^① 杨明斋是由中国学者向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提出经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查实后平反的,见余世诚《一位忠厚长者》,载《人物》1989年第4期。

^② 有些研究者说柏烈威(生卒年月不详)和伊凤阁(1885—1942)是共产国际成员,不对。他们都是倾向进步的学者,北大俄、法文教师,都和鲁迅有联系,柏烈威曾译过《阿Q正传》,伊凤阁协助鲁迅编译苏俄文艺理论,他还曾把彭湃烈士的《红色的海丰》《彭湃手记》译成俄文。有关维经斯基资料据《维经斯基在中国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等资料综合。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在很快议决成立北京马克思主义小组之后即赶往上海。这时维经斯基小组内又增加了在哈尔滨任自由记者多年而熟悉中国北方形势的俄共（布）党员斯括扬诺维奇和生长在贝加尔湖畔的布里亚特蒙古族妇女萨赫扬诺娃；她是最早建议利用远东地区打通中国革命之道的少数远见卓识的俄共党员之一。到了上海，又与国际工会联合会（赤色工人国际）远东工作组于一月就派往上海的福罗姆别尔戈接上关系。

五月，维经斯基一行与陈独秀接上关系后立即给上海的近代资产阶级工业生产所造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大环境吸引住，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这也证明李大钊认为中国建党应当在上海并由陈独秀主政的认识是正确的。当时集聚于陈独秀周围的如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等人的学识、阅历、社会经验和地位，要比集聚在北京李大钊身边的那群学生有更迫切的革命实践愿望和行动的实力。根据各种回忆资料综合而得出维经斯基的工作方式、学识、阅历得到了陈独秀的赏识，决不是过誉之言，据当事人张国焘回忆，陈独秀曾一再强调新成立的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重要性，并希望国际能委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们的顾问”，“他慨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中译本。他认为……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和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到莫大的帮助”。我们几乎很难理解陈独秀会如此期望一个人，一个比他小十四岁的俄国人——只因为这个俄国人来自列宁的故乡、深通马克思主义和有较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

维经斯基一行在上海逗留了好几个月，他本人一直住到年底，杨明斋则住得更久些。维经斯基的工作基地在上海，其成员亦曾参与武汉、济南、广州等地的活动，成绩斐然，但也有弄错的。广东方面有一则回忆说李大钊把三个俄国人介绍给回广州度暑假的北大学生黄凌霜，委托黄协助俄国人以办俄华通讯社的名义在广州展开组党活动。由于黄凌霜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把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起来，并在接受了俄国人的领导和资助下展开工作，直到陈独秀委托北大毕业生陈公博、谭平山和谭植棠来广州组党才使三个俄国人醒悟过来，于某日请区声白等吃了顿散伙饭。这可以算中共建党中的一个意外事件，后来还引起了陈独秀和区声白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①

维经斯基在上海期间还拜访了孙中山。维经斯基拜访孙中山是在陈炯明进军广州稳操胜券，孙中山即将赴粤再度策划北伐、“元帅升帐”的前夕，维经斯基与孙中山在谈话行将结束时感到孙中山“非常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把刚刚驻扎在广

^① 《共产主义小组》下册谭天度、刘石心的回忆文。

州的广西反革命军队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斗争,同遥远的俄罗斯的斗争结合起来?‘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不能和俄罗斯建立联系’,孙惋惜地说。他接着仔细地询问,能否在海参崴或者满洲建立一座大的电台,以便我们从那里和广州联系”^①。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与俄国布尔塞维克交谈;显然这是礼节性的,建立电台云云充其量只不过是孙中山深感缺乏政治宣传能力而钦佩俄国的科技而已。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再革命也“革”不到十月革命道路上,除非被逼到山穷水尽是不会考虑与俄国合作的。孙中山和国民党的不幸是一九二〇年冬季形势距山穷水尽已不远矣。维经斯基拜访孙中山是陈独秀建议的,从一侧面证明陈独秀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决策中是考虑过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这当然不是国共合作理论,但是否构成他的“二次革命论”,也未必;即便有此潜念,此时议论也为时过早。不论怎么说,从年初孙中山同意陈独秀陪同维经斯基来访,这是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在开初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合作的一个象征,这在以前也是没有研究过的,其实我们还可举不少例子证明这种象征,比如十一月二十一日当时最强的工人组织之一的上海机器工会于下午三时届白克路(今凤阳路)开成立大会,陈独秀、杨明斋、胡汉民、戴季陶等被邀请参加。会上孙中山和陈独秀各自发表了维护政党利益的话。孙中山的发言是“详述机器与资本势力之关系,而归宿于三民主义。略谓我人欲贯彻民生主义,非从官僚手中夺回民权不可”。会上,孙中山情绪很好,他一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占用了胡、戴、杨的发言时间。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阐明“工人团体,须完全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②。不论承认中共成立于一九二〇年或一九二一年,这次会议可以看作是两大政党领袖在争取工人争取上海。如若把北方政府控制全局而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尚无立足之地的形势考虑在内,陈邀孙参加机器工会成立会,实在是中共方面把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看成是进步势力的一个举措。这里既有共同打倒北洋军阀的社会革命因素,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人当时的政治倾向因素,也有陈独秀当年参加孙中山讨袁护法等交往的感情因素。坐在主席台上的孙中山并不知道,上海机器工会正是在挂着“外国语学社”的共产党总部筹备的,陈独秀是该会经费募集处主任、名誉会员。

时在上海企盼着陈炯明能很快绥靖广东的孙中山,对于工人运动的支持,从反对封建军阀割据的政治策略,有些像十九世纪法国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共和党人鼓动工人投入推翻王朝建立共和相仿,孙中山在会上大谈其三民主义,工人欣赏的估计只是“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三有主义。中国工人能满足而就此罢休吗?实在说来,并

① 《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

② 《民国时报》1920年11月22日第10版。

不取决于工人，而取决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能不能满足最低限度的“三有”生存权。孙中山去世，两年后蒋介石犹如“共和”胜利后的法国资产阶级一样，收缴工人的武器并打断他们的肋骨。这倒不是蒋介石存心“反动”，是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使然。工人阶级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悲剧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而大白天下的^①，陈独秀深通此道，因此，他断然拒绝“资本家厕身”工会。当时的工厂和行业已经出现黄色工会，北京政府已多次密电上海镇守使何丰林着令认真查处机器工会并整肃陈独秀，“如认为违犯刑法，即行缉拿惩办，以遏乱源”^②。并在上海发行最广泛的《申报》上公布北京军部致何丰林的电报以示高压手段。但当时似乎还有点儿民主气息，机器工会还能在报上公然予以批驳，说“本会与社会党、俄党，实无丝毫关系”^③。

工人组织工会，共产党人投入工人运动，国民党人争取工会，北京政府整肃工会，资本家唆使工贼破坏工会，这正反双方的系列行动，标志着中国的产业无产阶级确已登上政治舞台，但是我们决不能估计过高，陈独秀在机器工会成立不久的一篇文章中曾说：“就是我也不敢希望我们中国工人们马上就有外国的这样大的运动，说句极没出息的话，中国工人但能结起团体来要求得到外国工人已经得着的各样好处，那就算是大大快意的事了”^④。这样的工人、工会、工运的水平，对于维经斯基、杨明斋等俄国人来说，当然是很难理解的。陈独秀的估计并不右倾，以后我们会叙述到共产国际有些驻中国代表比陈独秀更悲观于当时中国工人的觉悟。为什么会造成由十月革命掀起的国际第一个红色浪潮三年之后的中国工人运动仍处在为邓中夏所说的“原始自发的罢工运动时期”呢？这是个关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在殖民经济下疲软发展的理论问题，我们只能从社会认识的感性上略作分析。首先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受到殖民资本压制而几乎仍处在原始积累时期，剩余价值剥削严重，控制剥削的压迫手段残酷；再是工人源自农村，文化程度低下并生性散漫，加上城市资本（剩余价值）剥削较之农村地租剥削要弱些；也不受天灾人祸（军阀混战）的影响，以致造成农民进城“吃”工资安于现状，迟迟达不到工人的阶级觉悟，在这种工人阶级状况下建立起来的工人政党，当然有与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同样的疲软，这是带有根本性质却历来不被承认的一条。再把话说开去，后来陈独秀及其托派的悲剧正是这个根本性质的一条造成的，使本应是以产业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政党主要由农民和“前农民”的工人组成，

① 参阅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总会委员会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两个宣言和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载《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61年5月第1版。

②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4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

③ 京电见《申报》10月16日，驳文见《民国日报》10月20日第10版。

④ 《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

以致迫使中国共产党走“基本上是农民战争”^①的道路,真是后患无穷。

陈独秀除编辑《新青年》外,把精力全都投入工人运动,四月二日,他到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作《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十八日为筹备“五月一日世界劳动纪念大会”陈独秀出席由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组织的近代上海各界工会首次大联席会,议决通过五月一日除电车、电灯、自来水、电话、电报各业外均休假一天纪念五一劳动节,“特请陈独秀讲劳工要旨大意”,并被推为筹备会顾问;为要学生支持上海首次纪念五一劳动节,陈独秀还于二十一日赶至中国公学向学生和教职员工作《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的演讲;三十日,不堪忍受资本家剥削的袜厂女工发动罢工并筹备成立织袜工会,负责人吴莲彩等拜访陈独秀,陈给予女工们以鼓励;五一节那天,与施存统、陈望道等到澄衷中学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海工人大集会;六月三日参加上海日本纱厂和码头工人罢工集会;七月四日又去上海船栈公会年会上演讲……在此期间,他还曾冒险多次到沪西小沙渡棉纺工厂区以及南市外滩码头工人区作调查研究或接受各行业工人访问,密切关注工贼离间工人、破坏工会的恶性事故,组织工人补习学校……以上是他亲自参与的工人运动。

在舆论方面,从《新青年·劳动节专号》到八月《劳动界》创刊,陈独秀全力挥毫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自主意识、集群意识,开导他们认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法则,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又在与维经斯基、杨明斋,以及在日本研习过马克思主义、见识过成熟的工人运动的李达、李汉俊等的理论探讨中,使他对中国的工人素质和工人运动形成了一个清醒的观念,甚至清醒到告诫民族资本家,如若不改善工人的生活和生产条件,连资本家都得消亡:“倘然今后仍旧照现在一样,工人们连这三样好处也得不到……那时革中国资本家命的,不是可怜的中国工人,乃是可怕的外国穆藕初、虞洽卿先生们。所以中国工人这样困苦,不见得单单是工人底不幸,不知道一班资本家见到这层没有?”^②在陈独秀的这段几乎被人忘却的文字中,我们深深感到他对于改善工人生活,是作为前资本主义时期向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过渡的必备的物质条件,关系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生死存亡的两个敌对阶级在特定条件下相互依存的辩证角度考虑的。写到此,笔者不禁想起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古罗马帝国时代被奉为剥削原则的一句话:尽量剪毛,但不要剥皮。可以把毛剪到极限,但不能剥皮,要给以再生毛的活命条件。这一条不遵守则两败俱伤,且莫论陈独秀的事业,孙中山也白搭“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事业,受益的恰恰是封建军阀及支持他们的外国列强。

^①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宣言的批语,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

^② 《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

孙中山向工人许诺三民主义,是从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出发的。陈独秀提出工人组织起来与资本家斗争;先争生存权再争政治权,其首期是把发展资本主义考虑在内的这种为壮大工人队伍及其阶级素质的良苦用心,如果失调就会掉入“二次革命”的泥淖,当然在一九二〇年上谁也不敢说这是他接受托洛茨基理论的自身基因,症结在于中国民族工业资本的发展关系着能否消灭封建军阀的国共双方的利益。这就是陈独秀和孙中山参加机器工会的启示。作为俄国布尔塞维克的杨明斋是不可能认识这般复杂的关系的,但戴季陶估计是认识到的,我们没有必要马上研究“戴季陶主义”,只提一下孙中山逝世后他写的一副挽联中的下联足矣:“吊民伐罪,功业并美列宁”。这可真正是戴季陶主义的精髓及他精明的政治韬略,端坐在机器工会主席台上被“孙大炮”长篇发言占取了说话机会的这位理论家可谓有“根”!到了北伐行将成功,再“并美列宁”就将损及国民党根本利益,即使孙中山活下去而没有南京政府,国共仍然要分裂而彼此火并存其一的。在一个具有二三十年专制独裁史的中国,无论什么政治气候都不可能出现多党制政府,这是封建制度给现代中国政治家们留下的最沉重的历史包袱。

中共上海支部成立后,经与维经斯基、杨明斋等商议决定再成立两个组织,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S. Y.),一个是外国语学社。八月二十三日 S. Y. 在陈独秀家成立,第一次入团者九人: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袁振英、金加凤、叶天底、丁默村,这个名单中前六名当时已是中共党员,施存统被选为 S. Y. 第一任书记,杨明斋是 S. Y. 的指导者。成立后的 S. Y. 与杨明斋任社长的外国语学社和华俄通讯社三个单位一起搬迁到新渔阳里六号^①,这新址也是陈独秀等中共要员联络全国各地中共支部和上海工运组织的总部,老渔阳里二号陈宅则成为当时已经独自经营的《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等刊物组集稿件的文牍和出版机构,也是上海党部和陈独秀秘密活动地点。正是在这里陈独秀指示陪同蔡元培赴法的张申府到法国后持他的手书找勤工俭学生赵世炎研究组建共产党事宜,值得纪念的老渔阳里!顺便写一写欢送蔡元培,陈独秀去上海码头,只见人声鼎沸,送行者中有胡汉民、吴稚晖、张菊生、王正廷等政要名流数十,陈独秀是以北京大学旅沪学会名义参加的。他很重感情,无论从公务从私谊,他都非常钦佩蔡元培,此次离沪远行,陈独秀依依不舍,竟然乘小火轮一直尾随法轮高尔地埃号至吴淞口外才在波涛滚滚的洋面上挥别!^② 其实,我们不是随意“顺便”的,一切都一环扣一环进行着。正是这一天——十一月二十四日,汪精卫和张继亦随蔡元培登上海轮,但他们不去法国,是先期广州筹

^① 有三条渔阳里。陈宅的渔阳里在今南昌路上,杨明斋的在今淮海路上后弄堂距陈宅不远,原为戴季陶住宅。另一条与本传无关。

^② 送蔡送孙皆见《民国日报》11月25日第10版。

备迎接孙中山。第二天,孙中山登上中国号轮离沪赴穗,同去者有伍廷芳、唐绍仪和许崇智。那么,陈独秀离沪赴穗的时间也就不远了。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北京、杭州、长沙、广州、武昌等地亦相继成立青年团。这就要谈到外国语学社了。该社由杨明斋任社长,俞秀松任秘书,名义上这是个公开的外语学校,还在报上刊登招生广告,实际上是由各地中共支部或青年团支部保送来上学的,以俄文学习为主,教员有杨明斋、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和在哈尔滨学过纯正俄语的王元龄小姐。^① 日文教员李达,法文教员李汉俊,英文教员袁振英,但没有开这些语种班。有些史书中把外国语学社视为 S. Y. 的一个赴俄预备班或为中共培养直接学取十月革命经验的干部训练班也无不可。我们从各种有关回忆录把经外国语学社派赴新俄的名单大致排列如下:刘少奇、任弼时和他的叔伯弟弟任作民、彭述之、肖劲光、杨尚昆、柯庆施、王一飞、汪寿华、梁柏台、李启汉、曹靖华、蒋光慈、韦素园、罗亦农、胡士廉、卜士奇、华林、廖平化、任岳、许之桢、马哲民、周昭秋、吴葆萼、应文蕊、傅大庆、陈启沃、谢文锦、袁达时、秦抱朴、黎冰若、叶天底、韩百华等^②,从这份名单可以悟出外国语学社在中共干部史组织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下面还得提起以往研究中虽提及却没有联系起来综合考察的几件事。

一、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和 S. Y. 与青年共产国际的关系。先从青年共产国际谈起,共产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中国连五四运动都未发生;五月,共产国际以执委会名义发信致全世界无产阶级青年组织(泛指)告知即将成立青年共产国际,号召参加;十一月青年国际在柏林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厘定《青年共产国际纲领》并再次号召工人青年参加。次年七月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二大仍然没有中共代表。一九二一年一月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设东方部^③,由后来成为张太雷莫逆的舒米亚茨基总负责,维经斯基代表团除杨明斋外都到东方部主持中国、朝鲜、日本诸国共运工作后,共产国际才确认陈独秀主持的中共。青年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才向上海 S. Y. 发出派遣一名只有发言权而无选举权的代表参加原定于四月中旬召开的青年国际三大。上海就派俞秀松参加。后来青年国际三大推迟到与共产国际三大期间套在一起开,因此当六月二十二日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张太雷和杨明

^① 王元龄是外交家、俄国问题专家李家鳌的外甥女,随夫在哈尔滨学俄语,“七月份回到上海。冬天杨明斋同志到我的地方来接洽,过了阴历年约二月份初春,我到这里来教书,未到大热天约阴历五月份就结束。”《王元龄回忆外国语学社的情况》,载《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6月第1版。

^② 在外国语学社学过俄文的大约有五六十人,不全都到苏俄留学,也有已上路而未去成者。已列出的这个名单,仍难免有漏有错。

^③ 共产国际在东亚有两个局,另一个设在塔什干。

斋于七月十二日又端坐入席青年国际三大，张太雷还被选入执委会，俞秀松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青年运动和 S. Y. 成立的报告。

二、七月十二日这一天，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正是这一天，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作了一次发言；也即是说这一天张太雷赶了两个会，但他内心一定非常兴奋，因为终于让世界各国共产党知道中国出了共产党！但是共产国际并不重视中共，只准张太雷作五分钟发言，于是只得在书面发言中归纳出最重要的若干内容宣读，短暂的讲话中有一句话特别重要：“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运动的关注。”^①这位瞿秋白的同学、常州小伙子实际上是发了一通带有威胁性的牢骚。

三、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革命或东方民族革命问题，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时由列宁提出并经过比较民主的讨论（主要是罗易和马林的意见）后形成了国际共运史上第一个《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但这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虽有中国人参加，却不是中共代表。这就要说到共产国际的建立及其与中国与中共的关系了。

成立于一八八九年的第二国际终于在一九一四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炮火声中分裂。这时的国际共运因对于战争存在着沙文主义或国际主义的不同认识而处境危急，十月革命终于使国际共运产生了一个新的中心，既振奋了共产党人亦刺激了社会民主党人。这时已经夺得政权的领袖列宁和他的布尔塞维克党显然处在绝对优势地位，抢在准备恢复第二国际的一九一九年二月伯尔尼会议召开之前，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俄共（布）名义向各国共产党发出建议成立共产国际的电报，次年一月又以俄共（由列宁和托洛茨基签署）、波兰、匈牙利、德国、德奥、拉脱维亚、芬兰、巴尔干革命联盟和美国等工人党共产党代表联名发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使正欲召开的伯尔尼会议处境被动。三月二日共产国际一大在莫斯科匆匆开了四天会。会议总共五十一个代表，其中只有当时分裂出来的十九个马克思主义党的三十八个代表具有合法身份，其余十三个是被请来的虚设的党组织代表，只有发言权。中国出席者就是这种性质的代表。可见这次国际大会的代表性是相当不充分的，但却是划时代的。开会第二天，资格审查委员会契切林在报告中提到：“中国和朝

^① 五分钟发言今载《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全文今载《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5期。

鲜,即侨居在俄国的中、朝工人团体将要到会。中国代表是刘绍周和张永奎”^①,登记册上名义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小组”,有发言权。刘绍周在三月五日会议上由列宁宣布:“现在请中国代表发言”后,发表“祝词”。这位时年二十七岁的代表显然很关心祖国,讲话从“对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五万万中国人民感受特别深”起兴一直讲到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最后以“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向旗帜鲜明地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第三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结束。次年七月刘绍周又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这次他的登记名义很具体:“中国工人党中央局”。刘绍周在这个主要是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代表会的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发言,值得注意的是刘提到进步力量正集中在上海,“那里有孙中山及其第一次革命的拥护者,还有学生总联合会,工会和社会主义党”,那种认为“看来,刘绍周对国内具体情况了解不多”的看法,是片面的,正是他把维经斯基在上海组建“社会主义党”的业绩公诸于国际共运大家庭。^②中共承认这份及时传媒的情谊,终于在一九五六年接受了刘绍周加入中共的申请。但在一九二〇年上刘绍周并没有因参加过两次共产国际大会而跻身国际共运行列,也与中共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当他于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满洲里踏入国门,邂逅了也与中共毫无关系的瞿秋白,这位常州青年对擦肩而过的刘绍周印象极佳,曾在《饿乡纪程》中把遇到刘绍周欣喜为“在满洲里得(苏俄)事实”。现在就可谈瞿秋白与中共接轨了——

与中共建党毫无关系的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出身于日渐败落的“士的阶级”家庭。一九一六年十七岁的瞿秋白离开常州辗转湖北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到了北京,因就读俄文专修馆而熟悉旧俄,又因发生了十月革命而熟悉新俄,两年后发生的五四运动使这位从小多病的青年投身政治,在五四运动后出国潮的第一个回合中他因通晓俄文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合聘为特派记者,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六日,与同样身份的俞颂华、李仲武离开北京,于次年一月二十五日抵达莫斯科,由于他曾参加过北大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眼下“俄罗斯红光烛天赤潮澎湃”,在采访并向国内发出《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等数十篇报导的锻炼中成为一个与共产党没有组织

^① 刘绍周(1892—1970),广东高要县人,五岁随在俄国经营茶叶的父亲赴俄受教育,1917年4月被选为中华旅俄联合会会长,十月革命后改为旅俄华工联合会,仍任会长。参加过一、二两次共产国际大会,1920年随北京政府张斯馨访俄代表团归国。一九四九年九月在新疆支持陶峙岳部起义。解放后入外交部任顾问。张永奎(?—1977),早年丧母,流浪哈尔滨街头被一俄国医生收养后到俄国,与刘绍周共事,与刘参加共产国际一大后从事组织华工归国的工作,多次出入国门,历尽艰险,最后于1920年初经土耳其绕道回国,最终在甘肃省师大教授任上逝世。

^② 引自乌传袞、马宝华编《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大事提要》第16页,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1985年8月。

关系却读过《资本论》深通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问题专家,或者用时髦的话可以称他为“非党布尔塞维克”^①。一九二一年五月,当张太雷前来参加共产国际三大而在莫斯科见到同乡同窗瞿秋白,张太雷介绍他入了党,因此瞿秋白便以“党员记者”的身份获准报道这个第一次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会议。当时外国语学社的学生先后抵达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瞿秋白是他们的教员之一,而且是这些仅只读了不到二三个月的俄语半文盲在俄国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然而谁又能想到当时自认为是一个“很小很小无足轻重的小卒”,六年后竟会接替元老陈独秀。瞿秋白小陈独秀整二十岁,若论党龄这老少俩倒都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一大之前的同辈。到此,中共早期史(一九二〇—一九二八年六大)上三个领袖人物——南陈北李、瞿秋白,全都进入本书,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日,风光的陈炯明将军率粤军进入广州市。在上海的孙中山早就企盼着这一天,半个月前,他就在致蒋介石的信中欣喜道:“竟兄此番回粤,实举全身气力……我望竟兄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为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其实,孙中山心里很是明白,陈炯明是翻脸冷血的野心家,即使是在此信中还担忧地要蒋介石代言:“兄不妨以我之意思,尽告竟兄也”^②。我们不能在此再岔开写早已对陈炯明不满的蒋介石的事了。总之孙中山连番数次表示对陈炯明的好意之后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抵达广州,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欲以广州为据点借重陈炯明再次掀起北伐大业。但陈炯明想用手中的兵力从“联省自治”打开缺口以与文人政治家孙中山抗衡中夺得大权。对此陈独秀一针见血:“武人割据是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不过冒用联省自治的招牌,实行‘分省割据’,‘联督割据’罢了。”“若在现时群雄割据的扰乱中,鼓吹联省自治,上有害于国家统一,下无益于民权发展”^③。当然陈独秀写出这些话时,孙中山早已被陈炯明于六月十六日兵变的大炮又轰回上海。

人,尤其是政治家,无论是为革命或反革命都有两张面孔,对前者称作“革命的两面手段”,对后者就斥之为“反革命两面派”。实际上人们只看到一张面孔。陈炯明在闽大兴社会改革被誉为“漳州政绩”时就敦请进步文化人陈独秀等襄办教育,十一月二日进的广州城,十天后《民国日报》上就出现“粤军陈总司令为国中提倡新文化最得力之人”的表彰性消息:“闻陈总司令以吴稚晖陈独秀诸先生为新文化泰斗,已去电请其来粤,提倡新思潮”,与此同时他还在广州市内严厉打击赌博、抽大烟等歪风邪气,

① 有关瞿秋白的早期经历可参阅他的回忆录《饿乡纪程》、《赤都心史》。

②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6页,档案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文中竟兄即陈炯明,字竞存。

③ 《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

甚至振兴农业支持工人组织工会,然而就在这些明面措施的暗面,却竭力阻止孙中山南下,这隐在背后的面孔,明智若陈独秀一时之间亦看不清的,而且还收到了十二月四日陈炯明催陈独秀去广州的电报,于是,陈在袁振英陪同下于十二月十七日离开上海经由香港于二十九日抵达广州,住在九曲巷一幢三层楼的二楼,还雅兴大发自榜其门曰“看云楼”。“陈独秀先生到广州后,受到一般青年的欢迎,陈炯明亦礼待有加,以示与新人物合作的气度。”关于陈在广州办教育的情况似乎不必多谈了,由于经费支绌使计划泡汤甚至连原议的大学也办不成。这就要说到那笔关余金额了。

前面我们曾提到一九一九年广东海关应交军政府关余将近二百五十万关平银。由于中国海关的一切权益尤其是关税的厘定、收益和关税、关余支配权皆操纵在总税务司和各国驻华外交使团手中。帝国列强从来就把北京政府视为中国政府,如今孙中山到广州,以美国政府为首的外交使团公然提出广州军政府仅只代表广东一省而拒绝把原议关余交付,最后竟然划给了北京政府。这不仅打击了孙中山北伐大业,也打击了陈炯明的广州施政,陈独秀亦因此而失去了拟议中的大学创办资金百万。当时的外交部兼财政部长伍廷芳曾向各国驻穗领事团提出若不给关余将接收海关的抗议。然而当帝国炮舰开进白鹅潭把炮口对准广州时,交涉啊、抗议啊、正义呼声啊,统统哑了。但陈独秀却有的是要干的工作。据张国焘回忆,李大钊竭力支持陈独秀去广州认为至少能起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潮广泛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由于在建党时曾有过共产党员不准到政府部门担任官职的约束,因此,李大钊在致陈独秀的信中“指出‘不应受共产党人誓不做官这个约定的约束,何况办教育也不能说是做官,而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特别有利。’陈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事实正是如此,陈独秀在广州用省政府教育行政最高官员的身份为广东民众接受新教育新文化,为工人启蒙教育,为社会主义的传播,作了大量工作。归纳起来是:一,从社会改革的根本提出适应资产阶级产业文化发展的新教育制度,例如在《新教育是什么?》的演讲中充分论证了教育是随着社会经济基础不断更新以适应其基础的上层建筑,从而提出了改革教育首先得改革社会的根本性质的要求:“我们既然不能否认社会的力量比个人大,我们便应当知道改革教育底注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后来他又在用现代语言来说可以叫作“宏观调控”的理论指导下厘定改革教育的三个法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全省教育系统图》、《每年教育经费概算表》,得到了广东政府的同意,于是陈独秀被任命为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委员有汪精卫、戴季陶和许崇清,这是一九二一年一月的事。

在陈独秀的广东教育经历及其言论中有一项值得单列研究,就是一月二十二日在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所作的《工学生与劳动运动》的演说。演讲中陈独秀公开提出世界“不是资本家创造出来的”,“所以工学生,要和体力劳动者结合团体,共同

进步,把资本家推倒,以做社会上种种改造的事业”。这时站在学生面前的陈独秀就越出广东省教育委员长的职务而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讲话了。在一次大战前后某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曾一度进入国会而取得合法发言权,这自然是以不超越推倒资本主义制度为极限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被目为修正主义,导致第二国际的分裂。陈独秀和中共接受了这个教训并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因此谈陈独秀在广州“做官”,决不可忽视他以教育最高官员的合法身份受到孙中山陈炯明看重以及他在文化界的隆重名声,不然谁有资格或敢于向学生宣传“把资本家推倒”?“王法”不容么,此其一;第二,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论述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不是由工人阶级自发产生时,曾说过:“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那么由谁去教育工人懂得“把资本家推倒”的革命理论呢?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是“由有产阶级中学识丰富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成长起来的。”^①陈独秀鼓励学理工的学生们到工厂去,不单是以工程师的身份参与发展生产力的智能劳动,还要与工人“结合团体”干“把资本家推倒”的解决生产关系的革命。这正是列宁关于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理论的中国实践,在中共党内,从理论上解决的首推恽代英,他曾在致刘仁静的一封信中明确地说:“就我的意见,俄国革命,分明不是起于劳动阶级的自觉,分明是起于列宁等利用革命去贯彻他的波歇维克的主张。所以俄国究不能说不多仗列宁等人。中国真有这些人没有呢?我以为很明显的一件事:便是中国如有社会革命,必须有非劳动阶级的人为之指导。”^②令人惊异的是陈独秀的讲话和恽代英的信先后相差一个月,可见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身工人运动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完全成熟。难怪陈独秀十分重视湖北恽代英和他的利群书社在组建党方面的作用。事实正如恽代英所预测,在中共五大以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级都是“非劳动阶级的人”,领导了中国轰轰烈烈的革命。如若推而广之,国民党方面制定三民主义以为立国之本者亦都是知识分子。

陈独秀在广州的第二项工作与在上海时期差不多,即从各方面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手段掀起民众运动的舆论,主要是:一,把由陈炯明出资由陈公博和谭植棠等任编辑的《广东群报》“改为党的机关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发布第三国际及各地工人农民运动与其它群众运动的消息和情况”^③,陈独秀在甲种工业学校的演讲稿最早就发表于斯,然后再由《新青年》转载的;二,把本来是为训练教育干部的“宣传员讲习所”“用以训练工、农、妇、青的干部的学校”,又据张国焘回忆“……也许由于广东过去的革命

① 《列宁选集》(四卷本)第1卷333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第1版。

② 恽代英《来鸿去燕录》第89页,北京出版1981年5月第1版。

③ 谭植棠《关于广东共产党的成立》。

运动多未从乡村发动,因而广州的共产党人能最先注意到农民运动”,此话不枉,比如最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一八九六一—一九二九)就是广州 S. Y.,另一位农民领袖阮啸先(一八九七—一九三五)是广州中共党员和广州 S. Y. 组建者。这些中共农民运动领袖因其早逝如今几已被人忘却,但在国共合作期发动农民参军北伐,以及后来壮大红军,功不可没。以上提的是陈独秀利用合法身份从事民众运动的情况。

在发动民众尤其是启发青年学子投入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中,一月十六日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的演讲《社会主义批评》,是陈独秀广州期间的“代表作”。由于听众乃法政大学生,演讲富含理论性,从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向中国传媒的角度今天审视此文,其意义首先在于文中以较多量的事实向听众实证“由于剩余价值造成生产过剩,由生产过剩造成经济恐慌(Crisis)”这个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病态,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萧条,国力相对削弱,工人运动呈上升趋势,一时之间“资本主义迅速崩溃”,“国际苏维埃共和国为期不远”的呼声震天,各国工人党领袖活跃异常。对于十月革命后到一九二〇年中共建党时期的国际和国际共运大背景,向来中共修史者讲得很少,尤其是造成左倾思潮之本源更讳莫如深。我们在这插一杠子谈谈这些问题,当然与陈独秀的事业有关。

十月革命的第二年三月,当列宁力主的布列斯特条约的签订使苏俄的国际关系相对好转,加上这一年发生了芬兰工人一月起义,日本八月米骚动,德国“斯巴达克派”壮大和十一月革命,以及这一年欧洲有九个国家相继成立共产党等一系列汹涌赤潮,集中表现在第一个执政党领袖列宁的兴奋过头而讲了并作了不少极左的话和事。本来列宁是头脑比较清醒的政治家,他对欧洲国家的革命不抱大希望,但一九一八年的赤潮,尤其是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下的德国革命形势看好,使列宁冲动起来,他以为欧洲革命已经成熟,并打算采取行动:“(一)要用十倍的努力去弄到粮食。……(二)要十倍的招收兵员。为了援助国际工人革命,春季以前,我们应成立一支拥有三百万人的军队。”^①三百万条枪,干什么?还用问吗?两个月以后,似乎连三百万的兵援也不必了:“现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二日,我们看到,不仅在前沙皇俄国的拉脱维亚、波兰、乌克兰,而且在西欧各国,在各中立国(瑞士、荷兰、挪威),在遭受战祸的各国(奥地利、德国)都发生了强大的‘苏维埃’运动。”^②上面这些话是讲给欧美的工人和共产党听的,明显的一个目的是要点燃美洲大陆的革命烈火。几乎与上述讲话同时间暴发的匈牙利革命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列宁不只热烈欢呼高度评价,甚至他对夺取政权的设计亦从单一的巴黎公社模式转向又一模式的研

① 《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全集》第35卷361页。

② 《给欧美工人的信》。

究,说匈牙利“给世界做出了比苏维埃俄国更好的榜样”,“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甚至使盲人也重见光明。匈牙利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与俄国截然不同:资产阶级政府自动辞职,工人阶级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统一立刻在共产主义纲领上恢复起来”^①。这在列宁关于用什么手段夺取政权的言论中是仅见的。为了巩固这个“比苏维埃俄国更好的榜样”,列宁不惜号召红色恐怖:“希望你们坚定不移。如果在昨天加入你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或在小资产阶级中间有人表现动摇,你们就要无情地镇压。枪毙,这是怯弱者在战斗中应享的命运。”“加入”的毕竟是同盟军,不是枪口前的敌人。如此严厉,谁还敢“加入”。匈牙利苏维埃很快就被摧毁。以上这些国际共运事件和列宁的言论都发生在距陈独秀站在法政学校讲坛上论述中国“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前不久的事,但并没有冲昏陈独秀的头脑。在他的演讲中大量涉及当时的历史:俄国内部布尔塞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斗争;俄共(布)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区别和矛盾;涉及到“柯祖基著书大肆攻击俄国底无产阶级专政”,并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白的说”以反驳考茨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批判了导致第二国际分裂的原因之一“伯伦斯泰因的修正派”进而提到《共产党宣言》而肯定无产阶级专政,肯定了列宁也肯定了“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是真是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在演讲中无论是品评国际背景,抑或以此研究中国共运的可能性,这个急性汉倒没有任何极左的或过火的言行,但革命原则是明确的:一,“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洲更格外破产”,二,“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当发达的”。这里还得指出《社会主义批判》对国内的五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派别的批判,和对国际共运中党派和主义之争的述评,以今之理论,有些观念已陈旧,有些则为更科学的分类及其研究方法所替代,但是此文的信息量和知识传媒量,直到七十年后的今天来说也是很突出的。

笔者在阅读陈独秀的数量很大的长篇论文时,产生了一个总体印象,他的论文是“板块结构”性强的固体,难以割裂,以至似乎不可能从割裂开的若干内容中吃透全文,《社会主义批评》尤其如此,这是中共建党时期最重要的文献,犹如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都是中国共运史的经典。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五十年代李达对陈独秀在学识和理论上的评断:“他(指陈独秀——引者)本人并不阅读马列主义著作,书架上有一部法文《资本论》,他从不曾翻看过(他懂法文)。他在报纸上写普通的政论是动听的,对于中国的革命理论则不懂,也不研究。”^②后来他在一篇

^①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

^② 以下所引李达、包惠僧、罗章龙、陈潭秋、刘仁静等人的文字全部引自《“一大”前后》第2辑,不另注。

谈中共建党期的思想斗争的文章中再一次重复这调子：“陈独秀是个资产阶级左派，他不研究马列主义。”李达是当时比较通晓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少数人中之，他写的《马克思还原》、《评第四国际》等论文在当时是很起了些作用的。后来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由于跟陈独秀、张国焘搞不好，一九二二年，我就到湖南去搞自修大学，这次是毛主席让我去的”，不论谁让去，从此脱离中国共产党总归是个错误。解放后他虽写过解析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小册子并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仍不免在文革运动中惨遭迫害至死。笔者十分同情这位中共元老的不幸一生，但是也不能不指出他讲陈独秀不读不懂马克思主义是极其错误的，不在这里说几句，难以平复心中郁闷，更对不起历史。李达文章中说陈独秀不懂马克思主义但又没有举出具体例子，而在他看来“当时并没有人能把考茨基跟马克思主义分别开来”的奥义，恰恰就在《社会主义批评》上“分别开来”了！陈独秀不仅直接批判考茨基，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是对考茨基的“正统派”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理论的批判。因此他才能指出中国党要走俄国的路，“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以作恶的机会罢了”。李达的偏见还表现在，对陈独秀是：不看，不懂。对别人是：不看，也懂，“当时大家并不懂辩证法，被介绍过来的只是布哈林的均衡论，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过来……斯大林的东西，当时就更见不到，直到一九二六年，斯大林的文章，大家也见不到，只是掌握在陈独秀手里。毛主席的伟大也在这里，他没有看斯大林的文章，但思想却是一致的”。表现了在膜拜心理支配下的唯心主义。倒是大革命后脱党而跑到国民党里去当官、于一九四九年毅然从澳门回归大陆的包惠僧回忆中说了真情：“陈独秀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书比我们多，他有读书的修养，也有办法找到书。”老人写回忆不只是一要实事求是，更得有点儿勇气。

陈独秀到处演讲，讲超越教育改革的内容，讲一个崇信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家必然会讲的内容，于是就得罪旧教育卫道士，得罪遗老遗少，广东师范学校保守派教师联名向军政府呈文弹劾陈独秀，开驱逐陈独秀之先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借批判陈独秀改革教育打击孙中山也是最佳借口，一箭双雕。过去在议论广东教育界时，疏忽了这个政治背景，因此也就小瞧了陈独秀的政治影响，亦难以解释陈独秀连中共一大都不参加而坚守广东的意义。这是一九二一年三月以后的事，而此时我们已经无暇顾及陈独秀和广东了。因为共产国际委派而由列宁亲自决定到上海正式联络并指导中共建党的马林已经启程。

召开一大，南陈北李皆未参加

马林(一八八三—一九四二)，荷兰鹿特丹港人，本名 H. 斯内夫利特，像所有神

秘的地下工作者一样有几本护照,几个笔名,通若干种语言。马林,是他去苏俄参与共产国际后的改名并以此闻名于世。他还有中文名字孙铎、倪恭卿等。他在一九二一年到中国之前已有在本国从事工人运动和在荷兰殖民地爪哇、印度尼西亚建党的经历,一九二〇年到莫斯科代表爪哇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二大,因为他有在亚洲殖民地建党和革命的经历,而这一届国际大会中心议题就是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国家民众运动和民主革命问题。这样,马林就受到列宁的倚重,成为“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秘书,主席就是列宁。另一个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一八八一—一九五四)亦受到重视,正是他们二位完善列宁关于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与社会主义革命“接轨”理论方面起到了从抽象理论走向实践的不可估量的作用。罗易于会后被派到共产国际设在塔什干的远东局工作,他在中国的活动将出现在一九二七年的武汉。马林则立即受到列宁派遣去中国,但由于远东不靖,拖至一九二一年成行于六月三日抵达申江码头,一路上既住过豪华旅馆也遭致驱逐出境的难堪,现在终于到了时称世界十大都会之一的上海,化名安得烈森住入南京东路大东旅馆。中共一大前夕迁入麦根路(今已废)三十二号公寓。^①

马林对列宁的殖民地人民革命理论的补充择其要点有:第一,“多年以来,社会主义运动对殖民地漠不关心,而资本家却比许多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更为重视殖民地的意义。资本家懂得,东方的发展会给资本主义带来什么后果。”换句话说,共产国际没有把受到列强欺凌的东方革命提到日程上来。直白说来当时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或多或少竖起维护本国无产阶级利益的壁垒。第二,如何对待落后国家的革命主力:农民。列宁只是从原则上肯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要支持殖民地的斗争。从可以借鉴的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经验,农民往往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革命力量,但是马林的看法不同,他从分析荷属爪哇和印尼两个殖民地的工人大多来自“无法靠务农生活”的农村入手,证明在这些国家干革命离开了农民可能一事无成,这完全适合中国。后来列宁采纳了马林的见解,指出“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可以说是马林最大的贡献。

马林在国际二大讨论殖民地问题的列宁纲领发言的第二点,我们则把它单列于下,为第三点:“我要声明……如何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相互关系上,确定一条正确的方针。”正是在厘定这个正确的方针上,或者说是当这个方针要具体到中国落实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与否上时,列宁(后来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发生了矛盾,这是项复杂的研究,总而言之这使鲍罗廷、维经斯

^① 本章有关马林行踪和马林引文,除另注外均引自《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2版。不另注。

基、罗易、罗明纳兹、陈独秀等都栽了跟头。最后一点，马林尤为重视中国革命，马林建议将《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和《补充提纲》以几种东方语言发表，“并专门发给中国和印度革命者。我也建议远东也成立共产国际宣传局”。可说正是马林促使列宁，促使共产国际对远东对中国革命格外关心，最后竟至于使共产国际全副力量都倾斜在中国革命上。马林是共产国际的中国魂。

既然谈马林干脆就谈圆了。一九二四年马林离开中国并因与伊尔库茨克东方局产生矛盾愤而离开共产国际，回到了荷兰老家干革命。后来他也因反对苏共整肃托洛茨基而退出荷兰共产党，成立了倾向托洛茨基的组织“革命社会党”。这就是中共修史长期不提马林的原因。马林死得很悲壮：一九四〇年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荷兰，他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斗争，秘密出版《斯巴达克报》，不幸被捕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二日被德军处决。几乎在荷兰的马林被德军处决的同时，中国的那位被鲁迅(O. V. 笔录)很刺痛了心的托派陈仲山因抗日被捕被日军处决后塞在麻袋里尸沉黄浦江底。中国的托派死的沉闷，任啥也没留下；荷兰的托派死前的豪言壮语被记录了下来，他说：“我们必须为国际事业而牺牲”。子弹只是把国际歌声打断……

与马林抵达上海的同时，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派出协助中共建党的代表尼可尔斯基(一八九八—一九三四)。尼可尔斯基在包惠僧和刘仁静的回忆中是作为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来华的，这可能有误，但他与中共建党的关系就是这么一次，令人遗憾的尼可尔斯基亦是作为托派于一九三四年被处决的。^①

马林是通过曾参与维经斯基小组工作的福罗姆别尔戈接上了尼可尔斯基的关系始与李达、李汉俊、张国焘等中共方面负责人研究召开中共一大事宜的。

前面曾谈过马林是六月三日到的上海，距现今已查实的中共一大开幕日总共只有五十天时间。在这五十天内要集中各地代表已属紧迫，还得立即把共产国际要求中国迅即建党的事告知陈独秀。于是李达在与马林谈妥代表事宜领取经费后向除上海以外的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六地中共组织发信要他们“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李汉俊则急信陈独秀，包惠僧的回忆道：“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出席会议……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都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

广东代表陈公博和夫人乘轮经由香港抵达上海，住大东旅馆。他带来了陈独秀致会议的一封信，由于信件没有保存下来，只张国焘回忆中有个记载：“陈先生的信中除说明他辞职尚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外，并向大会提出组织与政治的四点意见，要求

^① 李玉贞《参加中共一大的尼可尔斯基》，《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7、8期合刊号。

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四点意见已不可考。包惠僧亦是乘海轮抵达上海的。

现在说说北京代表。陈独秀不出席，李大钊也没出席。陈独秀不参加的原因，有别人的回忆种种，但李大钊不参加，没有任何主诉原因的资料。北京代表张国焘回忆中说：“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刘仁静有两则回忆说李大钊不参加的原因，先说：“北京支部接到上海开会通知后召开会议，李大钊未能出席，在会上有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人去出席一大。”刘在另一段回忆中说李大钊一方面是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时，也没有谁推选到他”。刘仁静两段回忆均未证明，李大钊究竟被什么繁忙的工作缠住至于连参加个支部会都没空更不必提去上海了？至于“没有谁推选”这位北京支部创始人，能吗？

笔者没有崇拜权威的迷信谬见，也不会使感情替代研究，又为讳避干涉投票选举的民主原则的嫌疑，不去查证支部为何不选李大钊，我们只从张说“校务纷繁”，刘说“工作忙”着手研究，看看能不能得出李大钊既不参加支部会又不出席一大的答案。

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杂文《记“发薪”》，说北京政府教育部欠薪严重，有时不发，有时只发一成二成，说“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九千二百四十元……”鲁迅任教育部佥事的薪水是二百五十元，也即是说欠了他约三四年的薪水，此文写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可教育部拖欠薪水却起于一九一九年。到了一九二〇年三月，被薪水欠得揭不开锅的教职员工发起了索薪斗争。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八个公立学校成立了“北京国立专门大学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是北大教授马叙伦，李大钊是联席会议新闻股总办；在马叙伦出缺或病假时代主席。十四日，联席会议宣布八大学学生罢课教员罢教，这就是著名的“索薪斗争”。罢课罢教新闻是由李以代主席身分发布的。事态发展到五月底，政府不仅不发欠薪而且逐步采取强硬手段拒绝谈判，终于在六月三日这一天：各校校长和教职员工、学生千余人到国务院请愿，自上午九时迄下午四时，官府始终拒绝不见，越闹越僵，突然国务院“门前密布军警，即用枪柄肆行殴打，并往来追击，当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北大校长蒋梦麟打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头破额裂，血流遍体，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昏迷倒地，不省人事，此外受伤者三十余人，如此野蛮横暴虽土匪盗贼何以如此”。读者大概不至于忘记六月三日正是马林到上海那一天；也即是说，当马林顺着船梯下船踏上上海之日，李大钊正在国务院率众与手持步枪警棍的警察斗争终于被打翻在地之时。我们再查一下曾是李大钊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窗好友白坚武（一八八六一—一九三八）的日记以

资佐证,六月七日,白在日记中写道:“阅北京学界通电,教职员被摧残者李守常亦在列,殊为悬虑,斯真率兽食人也。”后来白坚武还就此事写信给友人询问以证李大钊被打成伤之事。^①这次“索薪斗争”也许因为只是知识分子为免饿饭的“纯”经济运动,几乎不被国人注意。

终于查清李大钊未能出席一大的原因,作一交待以慰英灵,免得读者以为李大钊连个一大代表资格都“选举”不上!令人遗憾的倒是张国焘那句话:“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来出席”,终于未来,致使代表中的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董必武、周佛海等未能一睹五四名将、中共精神领袖李大钊的风采。

综上所述,参加一大的各地代表为——

北京代表 张国焘 刘仁静

上海代表 李 达 李汉俊

济南代表 王尽美 邓恩铭

武汉代表 陈潭秋 董必武

湖南代表 毛泽东 何叔衡

广东代表 陈公博 包惠僧

东京代表 周佛海

以上是被公认为确凿参加一大的名单,共计十三人,但是有两个代表曾引起议论,就是包惠僧和何叔衡。包是参加了会议而代表资格引起非议,简单说来他是武汉党成员,但因人不在而没选他,作为广东代表则包不是广东党成员。在一部权威的中共党组织史上注明包惠僧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②。

笔者认为包惠僧一大代表的资格是无疑的。谈何叔衡,就复杂了,何叔衡与毛泽东同到上海,有谢觉哉当时的日记作证:“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阴。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③,这样看来何叔衡在湖南选为代表是无疑问,也到了上海。首先令人怀疑何叔衡没有参加会议的是存于共产国际中国档案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的一句话:“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④那么哪地方只一名呢?一个是日本,另一地研究者都说是广东,派的是陈公博,但不

① 李大钊领导索薪运动、被打等未见《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1921年相关日期。《白坚武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版。

② 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2页,红旗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③ 《共产主义小组》下册547页。引文中五个圈显然是中国共产党之隐。

④ 王健英编的那部中共组织史认定12名是按取消了包惠僧代表资格而裁定的绝对“代表”人数。

论有无资格或作为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是从广州来的，而别地都是确凿的两名，总数是十三名。首先指出湖南只有一个代表的是张国焘。他回忆说何叔衡没有参加：“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但是有人把张国焘回忆何叔衡被拒一事斥为“幼稚无知的造谣”^①。张国焘怀恨中共要人可谓多矣，为什么偏偏把谣言造到何叔衡名下呢？不是有点儿奇怪吗？

笔者对何叔衡很尊敬，他是中共史上的长老，他还是中共第一个政府——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最高法院院长，一九三四年冬长征开始，被秦邦宪、周恩来、李德最高决策组决定留在江西与病号瞿秋白等向白区转移，终于在转移到福建牛家岭被敌人发觉，五人中只逃走了一个壮年人，其余四个中三个被俘，何叔衡当场牺牲。^②当然，我们不只信张国焘一人的回忆，还得找证据。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于莫斯科，会毕，留下一批干部入中山大学学习，何叔衡是编入“老年班”的学员之一，第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写信给时在列宁学院学习的董必武询问一大开会情况，五天后董必武复信说了关于召开一大的五个情况。信中说：“一，大会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二，参加会的有……”(名单中有何叔衡)；“三，议事日程有职工运动、对别的党的关系和在政府作事务官等问题，都有争论”；“四，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在)嘉兴东湖船上，将会开完”(东湖应为南湖——引者)；“五，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③。信是由张国焘代交的，因此信中有“国焘同志还能记得许多，请问问他，当更知道详细点”等等内容。看了这封信，简直不必思索就可得出何叔衡确实没有参加一大代表会。因为董必武所答都是会议日程表上的例行公事。另一证据是毛泽东的回忆。毛泽东有关一大的回忆有多次，说及代表成员的回忆有两次：头一次是一九三六年与斯诺谈话，末一次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上的讲话。在九大讲话中提到牺牲者名单中列有何叔衡。与斯诺谈话中没有提何叔衡。“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接着在向斯诺介绍一大代表参

① 叶蠖生《对〈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一文的质疑》，载《党史研究资料》合订本第1集第6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第1版。

② 详情见拙著《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中《转移、被俘、劝降》一节，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③ 《“一大”前后》第3辑第87页。

与各支部工作的成员名单中也没有何叔衡。^① 最后一条有力的证明是,所有关于中共一大的回忆文章中,凡提到代表者都有会里会外活动、发言、争论以及生活等方面的记载,惟独对何叔衡连一点活动的记载都没有,这实在也只有一种解释:没有参加会议。其实何叔衡只参加过一次全国党代会,就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湖南省涌现的中共政治局委员级人物不少于五名,但一大召开时像蔡和森、彭述之、任弼时、向警予等都在留法留俄,于是只得何叔衡去上海了。笔者在研究中共领袖瞿秋白时涉及何叔衡与一大关系,只说他与毛泽东“一起到上海筹备中共一大”,没有说他参加一大。^② 中共一大距今逾七十年,自然会被历史遮盖住(或忘记)了不少真相。

上面说的是代表、代表资格诸问题。下面再研究一个问题,即开会的日期。

关于日期,过去是一说,后来是两说,其实还有三说。在新发现的交呈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写道:“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就开始了”^③。这段话中有两个日子,即预定召开的日期和实际召开的日子;另一个日子——七月一日,是中共官方定的。当然在没有决定七月一日而没有查明七月二十三日是一大开幕日期时,各种回忆录中从七月初到七月中旬都是概算,如今既然已经找到记载开幕确期的文件,一切冰释。但是既然在做文章,也不妨找点儿冷僻资料作为余兴,想来读者不会厌烦的。比如在一部关于一大召开前后历史情况的资料集中有一篇叫作《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作者为陈公博,这篇可以列入文献级的通讯就刊登在中共一大结束后那个月出的《新青年》上。^④ 此文以通讯体裁书写并保存了发生在上海的七件大事。差不多件件都与本传有关,最重要的有两件,一是详细报道陈独秀在广东办教育受到的围攻,保守顽固分子唾骂他为“惑世诱民,凶于兵祸”,是简直比大军阀张勋还坏的“文阀”,甚至用谐音骂陈独秀为“陈毒兽”,大动肝火咬牙切齿:“独夫不去,四维不张”并“乞即天令驱逐,粤人永拜嘉惠”。好一个“四维不张”。谁都明白陈独秀最具皖北人的倔脾气,如若发起火来把雪茄烟往烟缸里一拧,满头短发直竖,真是“怒发冲冠”! 这段本应安置在前面讲的故事留在这儿,为的是渲染一番七月不参加一大的陈独秀在广东的恶劣的环境氛围中正在与老顽固们恶斗。

① 见斯诺《西行漫记》第4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1979年12月第1版。文中“只有一个湖南人”,就没计何叔衡,一大还有两个湖南人:李达、周佛海。

②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

③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

④ 《新青年》第9卷3号。

在中国反封建决不会如《国际歌》唱的“这是最后的斗争”，连叶楚伦元老都赞叹说“陈独秀不配做偶像，然反对他的所说的话，更没有影子。广东是孔教会保皇党最多的，还有许多学棍，将学校霸占着做自己的产业的”。叶楚伦以及于右任后来还与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等创办上海大学，与黄埔军校一文一武，造就了大批经国干才。不能因他后来参加过西山会议唱过一阵子反调而废弃他正确评论陈独秀。

陈公博文第二个文献意义是证实中共一大的开幕日，全文是这样开始的：“暑期前我感到了一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不想在上海十日倒发生很多风波，尤使我终生不忘的。”陈公博偕夫人李励庄到上海住南京东路大东旅馆，三十一日晨五点多钟因邻室发生洋行侍役瞿某枪杀丝厂女工孔某案，使担惊受怕的陈公博当晚就领了太太逃往杭州，结束了“春申浦”十日游”。^① 七月三十一日向上推算十天是七月二十二日：“我到上海的翌日，就碰到两个从前外国的教授……”因此可以推定一大开幕于七月二十三日。

根据文件和各方资料汇总中共一大会议日程如下，二十二日夜预备会，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开代表大会；二十五、二十六日休会，部分代表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二十七日起至三十一日大会议决一切。目前这几乎是公认的会期，但是否仍有疑？我们写下去再说。

三十日，“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再继续开会。这个侦探的到来，没有使党受到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以后，很快警察就突然前来进行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去”。这就是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安排的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是在一艘荡漾在南湖的画舫上开的，这是最后的一会。张罗这次会议的王会悟曾有过乘火车去嘉兴，开旅馆歇脚、包一顿午饭、租船开会等细节详情记忆，却没有最重要的日期记忆。七月三十一日仍然是推算的，而这一推算是不准确的。其实日期之谜在任何党派会议任何历史事件上有出入者除特殊重要，大可不必刨根究底，但是有人偏偏认为南湖会议不可能开于八月一日，原因是“查阅一九二一年八月二日《申报》，却报道八月一日下午嘉兴狂风暴雨，吹翻了南湖游船四五艘。八月三日、四日，《申报》还继续报道此事。然而，在所有中央一大代表回忆中，都未提及狂风暴雨之事。这表明南湖

^① 由于这起凶杀案可资证陈公博离沪及未参加南湖会议，又可考证南湖会议日期，因此在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和《我与共产党》发现后，就引起了中共党史研究者的广泛重视。这里笔者再提供一条线索，《民国日报》8月3日还登警方悬赏捉拿凶犯的消息一则。

会议不可能在八月一日”^①，真够认真的。再是，考证出七月三十一日结束一大会议的某军事机关的作者因此而荣立二等功，文章则发表在某权威社科刊物。于是笔者也考据癖发作，实际上只不过是借此机会留下点儿掌故在书中，没多大学问在内的。因为恰恰当事人提过会议开在南湖风雨中；不仅一个而且有二个代表写下了在狂风暴雨中开会的情景，一个是湖北代表陈潭秋，一个是日本支部代表周佛海。陈潭秋说：“这一天早晨天色阴暗，但到八时以后，即有不少游船往来湖上，对于我们的会议进行，殊感不便。到九时半以后，天忽大雨，游人均弃舟登岸，大为扫兴，然而对于我们倒很便利了。”

一九四四年，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或原因——也许是即将逼入死胡同的政治家在希特勒失势于西部战场导致日本法西斯亦行将灭亡的时局敏感吧，中共一大中的两个最终成为汉奸的代表都撰书大写其参与中共的经历，陈公博的《我与共产党》早在第一章中多次引用，现在轮到周佛海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了，此文与陈公博文同样是从自己接触马克思主义、仰慕陈独秀一直回忆到脱党，各走各的路。如不具偏见又能汰去政治谩骂的部分，周佛海与陈公博的回忆录，张国焘的回忆录同样是对中共党史和中国社会史研究具有史料意义的。周佛海回忆到一大移往嘉兴召开时说，三十日深夜那次遭巡捕房搜查的会议他没有参加，因为那天“我忽然肚子大痛大泻，一个人睡地板上……大约十二时左右，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探头探脑进房来，轻轻的问我道：‘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我骇了一惊，才知道出了事”，出的就是捕房探子搜查李汉俊家，从时间上推算这已是三十一日凌晨，也正是与李汉俊同时被搜查的陈公博惊魂未定回到旅馆又听到隔壁房间凶杀枪声的时辰。周佛海与毛泽东匆匆跑到渔阳里李达家：

我们商量决定，鹤鸣（即李达——引者）夫人明日早车赴嘉兴。先雇一大船等着，我们第二班车去，乘船游南湖。于是连夜分头通知各人。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到北站上车，我也抱病前往。到了嘉兴，早有鹤鸣夫人在站等候，带我们上船。当地的人，以为是游南湖的，也不注意。我们把船开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我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②

^① 叶永烈《红色的起点》第2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下面提到的另一考证见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在此之前邵文还曾在某权威党刊上披露。

^② 原载周佛海《往矣集》，转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文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下同。不另注。

《申报》上是“狂风暴雨”，陈潭秋是“天忽大雨”，周佛海是“大雨滂沱”都证明中共一大结束于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再则《申报》三日报道一日南湖“阴云四布，狂风大作”因而翻船的事是下午五点以后的气象，风势很猛，但只刮了一小时就停止了，并不影响一大会议那条大船的安全。其实，分析董必武致何叔衡信中说“隔了一日”去嘉兴；张国焘说“第二天停会”，都证明一大会议结束于八月一日。实例还有，但已经够唠叨了。

以上是日期。代表参加的情况大致如下，开幕式一大代表以及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全都参加，这之后，两个外国代表一直未参加会，由张国焘每天向他们汇报，三十日周佛海病缺，两个外国代表到会准备作总结报告，终因发生捕房侦察，会场易地，南湖会议马、尼未参加，代表则缺陈公博和行动受法捕房监视的李汉俊。

现在再简约地说说代表状况及别的未了事宜。

一大代表中年岁最大者，按传统的说法是何叔衡，是年四十五岁，最年轻者刘仁静十九岁，山东两个代表邓恩铭刚满二十，王尽美二十二岁与远东局代表尼可尔斯基同年；毛泽东为二十八岁，老二董必武是三十五岁，比马林小三岁，二李加陈公博皆三十一岁，包惠僧较毛泽东小一岁，陈潭秋是二十五岁，周佛海和张国焘皆二十四岁。论学历，董、周、二李留学日本，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陈潭秋和包惠僧皆大学生，山东两位是高中生，毛泽东可算中专毕业生。论民族邓恩铭是贵州水族人，余皆汉族。以上统计可以证明中共是个由激进理论教养的青年人组成的政党，较之已经有三十余年历程并拥有一批风雨阅历的老谋深算的干部的国民党，简直难以相信二年后能与之并起并坐。这群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与俄国或欧洲同道的成长道路不尽相同，中国共产党人不是深刻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投身革命，他们是在十月革命的实践，陈独秀的感召，和孙中山革命迭遭失败的教训中“悟”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的，它必然导致的不足是缺乏理论素养而重视经验，重视感情投入，对于理论大多只取其应变性强的又是比较浅显的革命道理再加上恶劣的、残酷的、长期的战争环境，很难形成一支具有较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干部队伍，但并不妨碍成千上万只是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的农民大众在战场上前仆后继。李大钊和陈独秀以及别的若干知识分子干部一再发愿要组织人员译《资本论》，从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人译此书，一九二四年陈启修在北京大学设《资本论》讲座，一九三一年陈启修译《资本论》第一分册出版，中经侯外庐、王恩华、吴丰觉、千家驹的摘译本，潘冬舟的陈启修续译本，到一九三八年出版郭大力、王亚南译的足本《资本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化科学水平低、出版自由受政治压制的国度，应当说是相当快速的了，但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在中国究竟起到了过多大的作用呢？一九七一年七月莫洛托夫在答记者问时提到他受斯大林之托找毛泽东谈话，他回忆说“我同

他谈完后对斯大林说,值得接见他,他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当然,离马克思主义者还很远,他向我承认,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①。这已是一九四九年底的事了。不读《资本论》决不妨碍毛泽东指挥中共在农村,在城市,在战场上打垮国民党,夺取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都没有读过《资本论》,要说中共有多么大的教条主义危害,“本本主义”危害,“言必希腊”严重脱离实际的危害,实在是很难说得圆的。极左思潮,运动频仍,而且运动一来就带来严重的破坏因素,生产关系解决后生产力长时期内得不到复苏,以及漠视乃至仇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全都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低下中找到根源。不禁令人记起鲁迅批判创造社时的一句话“革命是教人活……”读者也许又会厌烦笔者“离题万里”,其实不,这对于从事中共犯倾向性错误作规律性研究时,这段叙述是十分必要的提示。中共如此,国民党亦如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所含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据说是从美国林肯的名言“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所涵盖的理论而成,还有什么“戴季陶主义”,陈立夫的“唯生论”,等等,究竟有多大的救国救民的理论价值,更谈不上于哲学有所贡献。“枪杆子里出政权”,肉嘴撞上了枪口,什么话都哑了。枪的重要决定了革命采取什么手段,斯大林说的“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之所以受到中共的极端重视,就在于一语道破中国历史的演进。谁“扩军备战”强,——在中国就是谁赢得了“带枪的人”:农民,谁必定取得胜利。这不仅马克思没有说过,连列宁也尚未碰到这个棘手的事实而说透。也是中共一大代表们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研究党纲或政策时想不到的。马林虽然强调殖民地民众的革命力量,但他总结印尼爪哇的经验时,侧重研究的是由不能在农村求温饱而进城市劳作的无产阶级队伍的组成及其素质,不是农村破产后农民投入革命的利与弊的研究。陈独秀被公认的错误是反对农民运动,但造成这个“反对”的原因(理论上的和实践中的)是什么?又与他后来崇信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有些什么关联和联系?谁也没有认真研究过。毛泽东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及其一系列的策略,从井冈山打出了一个新中国。莫洛托夫说毛泽东是“农民领袖”,“离马克思主义者还很远”,是事实还是污蔑?都是值得绞绞脑汁的原则问题。但这要心平气和,学术平等。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当时新发现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上有段批语:

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的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

^① [俄]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第138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①

真是直言不讳地道出中国革命性质包括手段，但却没有说因此而必然会发生的无穷后患。毛泽东指出“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以此发动农民上战场，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分地到户，这就是打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战争”的本源！陈独秀恰恰碰在这堵他怎么也想不通的土墙上！而不是失势在大工业生产的钢板上。还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中共领袖，和那些接受欧洲教育的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以及在莫斯科遥控中国革命的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们全都在这座中国革命土墙上碰碎了他们的理论。引了毛泽东的一九五八年总结，对中共一大也就不必过多地追究其“空想”的程度或成分了。至于一大期间争论最激烈的几个问题：是俄国革命之路，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之路，即暴力革命还是议会斗争；中央民主集中的极权制还是地方党分权制；党员能不能在政府部门当官或当议员；以及加不加入共产国际等等问题，以及这些理论的和现实的问题与陈独秀的关系及功过，更不必提出作单项研究，顺着历史走下去便了然的。

下面要谈谈李汉俊和那场有惊无险的搜查。

李汉俊（一八九〇—一九二七）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典型，他出身东京帝大，通日英法语，就当时中共在国内的党员，他，以及李达、陈望道都可以说是相当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几乎同时脱党的政治决定亦令人感到中共开始活动就存在排斥不同见解、排斥党内民主的不良倾向，这当然不能完全错怪陈独秀霸道，据李达回忆：“一九二一年二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李达还为陈李矛盾作过调解，由于不是个人恩怨性质，因此“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这是一大以前发生的事。五十年代，李达多次撰文回忆一大前后的活动和思想理论状况，但是对李汉俊的描写是不公正的，如说李汉俊的“本性原是一个热中利禄的人，所以在党的成立大会开过以后，就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这首先与历史不符。李汉俊在中共二大时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是在中共党的湖北省工团联合教育顾问任上脱党的，与李达脱党时间差不多，在一九二二年的年末，或者说是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中共三大之前。笼统说“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也使不明真相的后人往右里猜测。李汉俊和他阿哥李书城都是在“四一二”政变后作为

^①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第1页。

国民党左派和亲共分子，一个被杀一个被关的。李汉俊真要“热中利禄”凭他一身本领会死得如此悲惨吗，再说果真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内务部也不会在一九五二年向他的家属颁发烈属证书，上书“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李汉俊是维经斯基、马林等上海工作期间的主要的组织谈判、学识交流的翻译，为了给不懂外语的信仰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李汉俊还翻译了马克思《经济学批判》、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和马尔西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皆署名李漱石译）。不论李汉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的认识对或不对，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与陈独秀甚至与马林的矛盾，主要是在思想理论认识上，中国革命导向上的，其次才涉及到彼此在性格、生活举措、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他的脱党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共正式进入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之后一些人的脱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要而言之李汉俊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才是脱党的主导思想。脱党后他主要是作为学者生活着，北伐期间他在武汉出任湖北省教育系统的最高官员，四一二蒋介石上海政变，七一五汪精卫武汉政变，同年十二月十七日，他和詹大悲同时被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下令逮捕，不待家属出面营救，当夜就被处决。且不论李汉俊是参与中共建党的元勋，那次被枪毙的两位都可算是有大贡献于中国社会革命的民族英雄。^①中共一大后第一个不幸去世的是山东代表王尽美，他是一九二五年七月肺病久治不愈逝于病榻，李大钊比李汉俊早八个月被杀，但他未出席一大，因此，李汉俊是第一位倒在敌人枪口下的一大代表；尽管他已经失去了共产党员的称号。

七月三十日那次险情的排除，首先应归功于马林的地下工作经验，其次就是李汉俊的沉着应对。

关于这次险情李汉俊无回忆，出事后即来的包惠僧只轻描淡写几句，幸亏另一当事人陈公博有详细的记录，不然又是糊涂账一笔，陈公博说，一大开会早就引起捕房注意“时时在暗里踪迹”，那天夜里代表们刚离开……“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而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那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国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筐，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

接着是把二人隔离，分别审问，怀疑陈公博是日本来的社会党。排除怀疑，结束

^① “1919年1月，我到上海找孙中山……我们住渔阳里，詹大悲、李汉俊住路北，我们住斜对面路南。李汉俊刚从日本回国。常谈俄国消息。五四运动后，开始谈马克思主义。”（《董必武回忆》）。

审问，搜查也无结果，气氛顿时有所缓和，法国总巡发现李汉俊通达法语，四壁藏书颇丰，“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对着满墙的书中置陈的英文的马克思经济理论之类的书，讲了如下一段颇有点儿高卢鸡的民主气度的话，耐人寻味：

搜查之后，微笑着对我们说：“看你们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其余以下的话，都是用训话和命令的形式。

尽管为文者没有“善终”，因此而使这段春秋笔法长时期来未能用以实证一大险遭灭顶之灾，实在可惜。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部故事讲完，剩下的是宣布南湖会议结果：议定了党的组织问题，通过了党章，并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设书记一名由陈独秀担任，宣传主任李达，组织主任张国焘，中共中央设在上海，兼负责上海支部，各地支部设书记一人。据周佛海回忆：“仲甫未到沪的时期内，由我代理”。那时周佛海正在热恋之中，三个月后他与杨淑慧结婚旋即返日本继续学业。他是一九二四年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任上致信中共声明脱党的。那时国共合作，脱离中共只是不当跨党分子，一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无所谓“反动”。一九三九年周佛海从国民党的重庆陪都政府走向南京汪伪政府，与陈公博一起落入日本“幕府”，走了人生末途，无可救药矣。

中共一大闭幕在狂风暴雨掀翻四五条船的险境中，较之于日后社会革命的惊涛骇浪，也许根本不算一回事儿，这就使笔者想起秀才郎董必武的那句文绉绉的形容：“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中国共产党成立，南陈北李皆未到会，陈独秀被选为书记，李大钊没有进入中央的和地方的组织。我们逐日检索李大钊从七月一日至年底的谱记，亦无参与党的活动记载，但是李大钊并没有忘却共产党员的责任，我们这里只能简略地或者说是象征性地指出：七月一日，他发表了《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和现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北京大学日刊》发布《政治学系教授启事》：“本星期四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之现代政治讲题为《工人的国际运动》，由李大钊先生担任”。身负新华门前枪托击昏重伤的李大钊，正在冷静思考中国革命及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问题。

陈独秀之被选为共产党书记，主要是他具有出任这一职务的资历和威望，但还有别一推力。一九三二年蹲在班房里的陈独秀在研究文字音韵学之余，常与狱方准予帮他料理其生活的濮清泉（德志）谈谈往事，据濮回忆，有一次他说之所以要陈独秀当

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①，曾与陈独秀同案被捕被徒刑的濮清泉后来的命运也是够惨够难堪的，八十年代他能如实写出陈独秀的这段并无夸耀成分的话，算是中共政治宽松后的历史收获。正因如此，前面在详考一大时，我们没有对会议进行理论评估，是留到这里让读者听听濮清泉回忆中陈独秀自己怎么评估一大的：

他说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就有“左”和“右”两种倾向，张国焘、刘仁静两人是倾向极“左”的，主张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他两人是醉心左倾名词的“疯子”，简直是痴人说梦。他俩也不看看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情况，以为那样少数的无产阶级就可以单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真是“幼稚得可笑”。李汉俊却倾向极右，他主张党只能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搞实际革命工作。他认为一切都要合法，不能进行非法活动，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落后了，要想像俄国无产阶级那样，最少还要几十年。

回忆中，陈独秀还是很惋惜李汉俊，说“蒋介石连这个合法的人，也不允许他存在，必杀之而后快”。陈独秀还说一大拒绝了左右两种倾向，制定了党章，认为“这个章程是按照列宁建党的原则，即布尔塞维克党组织精神而制定的，是订得好的，比欧洲各国的党章要革命得多”。

陈独秀回忆中关于左和右的倾向的见解也有持不同意见的，这可不细论，值得研究的是陈独秀没有参加会议，他的说法不能算回忆，是根据当时的记录、代表事后的谈论以及和马林的交流加上自己的分析形成的，陈讲话中值得注意的是估计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势孤力单，因而否定了张国焘、刘仁静的盲动冒进，但他又不同意李汉俊说中国无产阶级要几十年后才能赶上俄国革命。这正是两年后他经过一阵子反对，终于同意国共合作的思想预兆。顺便赘一句，国共合作正是李汉俊“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可行性实验，可惜的是他脱党了，也就谈不上“合法”不合法了。

谈中共建党，还有一个研究热点，就是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和行动。对于毛泽东一大的回忆或议论实在太少，这是可以想见的。毛泽东在一大担任会议记录，另一个是周佛海。既然职司是记下代表的发言，于是自己就很少发言，这就引起了两种测度，首先是李达，他没有直接说毛在会议上的表现，只说他在住所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

^①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下同。

寻思,他苦心思索竟至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正是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毛泽东同志后来做全党领袖,在这时已显露了端倪”。另一回忆者是刘仁静,他说:“毛主席在一大会议上,很少发言,因为他刚离开湖南,对马克思主义知道得不多,加上他很慎重,所以大会上并没有什么斗争。”刘仁静活到了总算能讲讲真话的八十年代,是最后去世的一大代表。^①

一大十二个代表是由全国共五十三个党员(不包括留法支部)中选出的,据查各种回忆录和资料这五十三个党员中只有一个工人,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发展工人党员,把党的支部及工作重点推向工厂。就在中共成立后第十天——八月十一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于上海,主任是张国焘,李启汉、包惠僧、李震瀛、许白昊等是干事,阵营是相当强的。这个组织是由前面曾提到过的工会国际派到上海为即将成立的工会国际联合会联络中国工作的福罗姆别尔戈催生的,因此,也有人认为它成立于一大之前,陈独秀在上海展开工人运动,成立机器工会等都与福罗姆别尔戈有关。我们依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定为正式成立于一大后,当然少不得马林尤其是尼可尔斯基的协助,因为尼可尔斯基与福罗姆别尔戈在伊尔库茨克远东局曾同事过。至此,从中国方面来说党、团、工运组织都有了,从共产国际方面,计划中只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任务没有完成,最终也没有建立,可能这与后来马林认为中共比较弱和产业无产阶级队伍不够强大的考虑有关。

劳动组合在北京(罗章龙)、长沙(毛泽东)、汉口(包惠僧)、广州(谭平山)(括号内的为主席)设有分部,它名义上是公开组织。上海总部是由原上海各左派工会或工会中的左派为活动基础,创立时,发表了一个立场鲜明但措词比较温和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书记部在成都北路十九号(今八九九号)办公,但是再公开再温和亦不见容于当局,未等其开展工作,就被查封。于是上海总部在张国焘领导下迁往北京与北京分部合署办公,从而加强了北方局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这对于北京长辛店铁路工人,对于京汉铁路工会的发展,以至酿成“二七”惨案,将是以后叙述的内容了。这里要补充的是,劳动组合书记部虽被取缔,但机关刊《劳动周刊》从八月二十日创刊起维持到翌年六月主编李启汉被逮才遭封禁。这周刊的《发刊词》写得很是风光,它号召工人支持这个自己言论园地:“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中国无产阶级抬腿起步就以天下幸福和平为己任,工农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亦由此而萌发,从事工人运动的人在革命中或胜利后多半遇到更多的麻烦,这只是中国革

^① 刘仁静于1987年8月5日死于车祸。

命的农民运动性质使然,不存在普遍性。李启汉被判刑关了两年又四个月,出狱后辗转去广州继续革命,他是震撼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工委、干部局长、党团书记,在广州碰上“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惨遭杀害,时年二十九岁。李启汉生于一八九八年,湖南江华人。

在矛盾中调整民主革命策略

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一日,陈独秀在包惠僧陪同下回到了上海,换个说法是上海党方面遣包催陈到职的。

一大结束,除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各地代表迅即回原住地展开正常的组党建党工作,然而中央却无法展开正常工作,有些重大决策因总书记不在而难以成立。临时负责的周佛海一是无此水平和资格,再是他急于回日本。李汉俊不久去了武汉,组织部主任张国焘忙于刚成立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李达则忙于组织力量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当时这项工作超过一切也最有贡献。马林,作为职业革命家简直无法理解陈独秀猫在广东拒不到任的做法。于是就委派包惠僧去广州,以《党纲》第十四条:“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的党纪,要陈独秀回上海。陈独秀决不是恋官的人,但是与陈炯明的教育契约,尤其是孙中山元帅府刚开始北伐之期离开有“革命策源地”之称的广州,似亦有全功尽弃之虞,因此,是在辞职不准的情况下请假回到上海。陈独秀在广州跨两个年度合共九个多月,在教育上有无实绩此可不论,后来孙中山与国民政府,黄埔军校、鲍罗廷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能在广东站住脚,陈独秀与广东党组织甚是功不可没。曾陪同陈独秀在广州的袁振英,此时已脱离中共去法国留学,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邀请他归国任广东大学教授,北伐攻克武汉后到武汉任军校政治教官。

上海党员们对陈独秀到任很兴奋,陈亦对成功召开一大表示满意,“可是第二天”,张国焘回忆道,“当我见着他的时候,他的态度有些冷淡了。他说要花点时间料理私事,不愿立即举行中央会议,也不愿与马林见面”。这下车伊始说变即变使大家很扫兴,马林深感奇怪,也使追究历史的后人产生疑问。据各方回忆,陈独秀态度变冷的原因是抱怨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共干涉过多,似有独揽中共大权之嫌,如擅自派张太雷到日本与日共方面联络,着其派员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与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我们还从马林的共产国际工作报告中发现中共对国际伊尔库茨克远东局着令尼可尔斯基出席中共党的全部会议,表示不满:“他们对这种监督表示愤慨”。关于中共是否该接受共产国际领导、接受经济资助等方面,陈独秀与马林更是意见相左。马林工作积极雷厉风行,急于求成心情迫切,当然亦就难免独断专行或越

俎代庖,致使陈独秀不快甚至感到有伤自尊。正在顶牛之际,一件意外的事扭转了整个局面——十月四日“午后二时许,法捕房特派巡捕多人,赴环龙路渔阳里二号陈君住房搜检,将积存之《新青年》杂志,并印刷品多种,一并携去。同时将陈君及其夫人,及拜访陈君之友人(内有褚、邵两君,皆国内知名人士)五人,一并带入捕房”^①,这是陈独秀一生的第三次被捕,此引是最早见诸报端的消息,难免有错,经考证被捕的是陈独秀夫妇(化名王坦甫和王林氏,下同)、杨明斋(牟有德)、包惠僧(杨一生)、柯庆施(胡树人)。抓他们的是探目黄金荣包探程子卿,出面审理的是谳员聂某。因陈独秀等被捕后用的是化名与警方周旋的,因此捕房以为陈尚未捕到,就派员在陈府斥候。褚辅成成长陈独秀六岁,与陈乃老相识,他是老同盟会员,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反袁斗争中被捕险遭不测,袁死后获释,功高一筹,确系“知名人士”。他一进捕房未待陈独秀歛眼神就吵吵嚷嚷:“仲甫,这是怎么回事?”于是王坦甫显原形,陈独秀就作好公堂会审进行斗争的准备,并请了法籍大律师巴和为辩护律师,据包惠僧回忆是马林花大力气出大价钱雇的,包还回忆陈独秀在看守所传讯时,独揽责任,准备坐牢,要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出狱后继续干。一个领袖有为属下担责任的行为,是十分令人敬仰并产生愿为领袖和事业献身的的作用。果然先即放了高君曼、褚辅成和邵力子,第二天,除陈一人外都保释候审,第三天,陈独秀亦由张继和褚辅成交押金五百保释候审。此次被捕最后以陈独秀非法出售《新青年》等禁书为由按照“新刑律第二百零一条,着陈独秀罚洋一百元充公,抄查书籍,一并销毁”。从四日被捕,六日保释,八日开庭罚洋结束,前后五天,算是有惊无险。这次被捕又掀起一场风波,其所以没有若第二次被捕似地形成新闻大潮,只因是很快了结之故。至于有人说释放陈独秀又不判刑,费了很大的周折,甚至电请时在广州的孙中山设法营救,并正是“孙中山打了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将陈独秀释放”的。还有人说此次很快释放陈独秀,美术泰斗刘海粟功不可没,是他找到国民党左派又是侠义之士李征五,李见是“刘海粟来找他营救陈独秀,当即一口答应,随即找到法捕房,保释了陈独秀”。同时我们还从胡适日记中获悉,当他知道陈独秀被捕后,马上与蔡元培研究如何营救,胡蔡认为法国驻上海领事“此人比较开通”,决定通电呼吁释放陈独秀。^② 以上都可能是罚款便了的因素,名人徇情使法律网开一面,倒也能显出本传主的人品,在社会上是有口皆碑的。

从看守所放出并掸净被捕后事的陈独秀就全身心投入党务。首先是与马林谈判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第二是议决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加紧组织马克思恩格斯

^① 《陈独秀被捕》,载《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强重华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本章凡涉及陈独秀被捕资料,除另注出处,皆引自此书。

^② 胡适出面营救,见《胡适的日记》1921年10月6日条。刘海粟营救见《刘海粟谈陈独秀》,载1983年11月15日《团结报》。

列宁经典著作和诠释性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第三是在加强工会工作的同时加强妇女运动，成立“平民女校”培养妇女干部，由李达兼任校长，教员阵营之强可盖当世，有邵力子、茅盾、陈望道，以及陈独秀终身好友高语罕，陈自己也出任教员。这个学校实际上是上海大学的前身，后来并入上大，由女校引出来的故事如丁玲、王剑虹、杨之华等就够写好几本书。以上各项比较起来，与马林协调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为最重要。岁月汰去了历史的秘密色彩，也就网开一面利于较为客观地审视历史，若论到中共建党初期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不用讳言，在它的第一页上就发现陈独秀与列宁的“特派代表”马林的关系如果不说是对立的话，至少是处在不协调的层面上；对于每次重大决策，几乎都经过不同程度的争论，从不同意甚至对抗到同意——包括说服后欣然同意、勉强同意或组织压服。从多个一大代表回忆和相关文件中判断，一大通过的党纲是九月陈独秀回到上海后才厘定的，党纲上涉及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第二款第四条写的是“联合第三国际”，这明显地表现了陈独秀打算“独立干革命”，但这是违背各国共产党绝对服从共产国际领导的《共产国际章程·总纲》第二条的。经过马林力争，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第六条《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中亦不承认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纪律，只定下“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和向国际远东局“派一特命全权代表”^①。陈独秀够硬气，是这样定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也就有了张太雷去伊尔库茨克工作的决定。马林当然不服，但他不便与倔强的陈独秀闹翻，而向国际远东局作了汇报，于是远东局维经斯基在中共二大期间发来可以认为是共产国际对中共行使领导权的第一道命令。下面将掂量出这道命令对中共对国共合作的斤两。

马林与陈独秀研究的第二项是接受经济援助。发起中共的一群知识分子大多穷措大，共产党诨号“穷党”，不只指“穷人的党”，它不可能如国民党那样有国内外资本家和地主官僚的经济援助，中共唯一的经援就是共产国际了。目前并没有详确的资料可以证明陈独秀是在什么情况下同意接受经援的，只在二大前夕（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陈独秀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获悉，中共的经费确实来自马林的拨款。该报告写道：一年来共花经费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其中只有少得可怜的一千元是“自行募捐”，余皆在马林“国际协款”中实报实销，从中可以得出中共在经济上依赖共产国际的结论。^②不必用“吃了别人的嘴软”的世俗衡估，但陈独秀处境尴尬是可以想见的，这是他独立思想和倔强性格的革命生涯中第一次受挫。从共产国际方面，把钱用以支持中共是恪尽国际主义责任，这仅仅是开始，苏俄和共产国际很快就会感到支

^①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

^②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载《“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本章有关中共“二大”和“三大”文件除注明外，皆引自此书。

援中国革命的钱袋之沉重。由于“党员少，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我们的全部精力组织工厂工人”，支出中有三分之一（一万元）作为各地方劳工运动经费，由于劳动组合书记部迁京以及李大钊、张国焘等组织长辛店铁路工人和京汉铁路工运，北方工运就成了支出的强项。关于经费总支出以工运为主，不尽然如陈独秀报告中写的尚无条件开展农运和兵运工作，这还与陈独秀等领袖人物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工人运动的理论的“正宗”认识，以及对于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实践的机械搬用有关，连后来的“农民王”毛泽东当时也没有觉悟到农民对中国革命的决定性意义。象征中共认识发动农民革命的必要性是中共三大后成立工农部，而实际重视农运是国共合作破裂以后的事了。农运和兵运工作，后者除了直接对旧军队的策反和改造外，农运要解决的主要也在于兵源的革命投入。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认为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其实不然，我们在此点拨存照，以后将会说述的；况且有关农运问题还涉及到共产国际莫斯科总部那些只有十月革命经历的理论家（及其派出代表）的指导有关——他们显然是轻视农运的，其中具有直接失误责任的总代表鲍罗廷和广州公社起义代表纽曼，在下面也会说到的。

陈独秀主持中共后第二项行政工作是与属下研究派代表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与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远东劳大）。顾名思义即知这是共产国际在亚洲地区推行国际统战政策的会议。中共派出了以张国焘为团长的十五人代表团，当时中共党员不足百数，可见这个代表团相当庞大；其中包括一大代表、S. Y. 书记，以及在苏俄留学的学生（负责俄文翻译和向导）。总团还包括国民党（张秋白），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中国社会党（江亢虎，当时在苏俄），妇女爱国团体（王丽魂），社会团体（山东省议员王乐平），而工人代表唐山铁路工人邓培被列入中共代表团内。这是中共成立后派出的第一个赴俄代表团。远东劳大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开幕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厅，二月二日闭幕于彼得堡乌里茨基厅。大会代表不足二百人，中国代表团受到重视，会议期间列宁在国际远东局苏米亚茨基、英文翻译爱芬陪同下接见了张国焘、张秋白和邓培，这三位恰好代表国共两方和工人组织，关于这次会见的内容目前只发现张国焘的回忆，将在国共合作时综述。这里先引列宁同工人代表邓培的谈话轻松一下：

……告辞的时候，列宁以亲切的态度双手紧握着邓培的手，用英语同我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请你将这意思说给他听。”邓培这个朴实的工人领袖，听了我的翻译后张口大笑，点头不已，作为对列宁盛意的回答。列宁睹此，也露出乐不可支的笑容。

邓培是北方支部派出的代表,显然增强了正在运动铁路工人投入革命的李大钊等的信心。远东劳大由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组会,原定一九二一年底在伊尔库茨克召开,后决定移到莫斯科召开的原因乃在于苏俄着力于远东革命,便于列宁亲临指导。张太雷参与组织,中国方面皆由陈独秀负责,尼可尔斯基则负责人员输送。远东劳大期间,中共代表团成员与外国语学社派往莫斯科学习的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等等第一次交流彼此两年来的境况。当时已是党员的瞿秋白则是第一次与中共内地党员接触。远东劳大结束后有王尽美等留下学习以培养后续干部。

马林和陈独秀三个月的紧张工作,从马林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中推测,他对中共对陈独秀是满意的:“陈独秀被要求放弃他在广州的位置而负起党的领导。党出版《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对工会组织经常性的宣传工作也已开始……少数共产主义小册子也已译成中文。”还汇报了陈独秀在广州“在教育方面经历了巨大的困难”等情况,同情之心溢于言表。应当公正指出,陈独秀从广州抵达上海后,对马林拒而不见的态度是错误的。

在使中共总部基本上进入正常工作的同时,马林就全力从事联合民族主义政党的可行性研究,这才是马林接受列宁委托衔命使华的重任,也是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主题之一。在上海组党期间马林就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人物,在与张继交谈时,请他委派国民党人参加远东劳大,此事由张太雷作了妥贴安排,这就是第一个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受到列宁接见的来由。马林则通过张继获得了时在桂林的孙中山的邀请。他深入了解国民党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在北伐中的地位 and 孙中山的为人等等,这一切显然都是在陈独秀的关系和李汉俊、张太雷的译述协助下进行的。我们曾在第一、二两章中多次谈到陈独秀与张继等国民党人的莫逆交往,加上此时孙中山和国民党的不利处境,都有利马林的工作。其时张太雷已从北方调到上海成为马林的助手,他已去过莫斯科参加过国际大会,在远东局有职位,学习马克思列宁著作和十月革命史卓有成绩,更由于参加国际三大关于殖民地革命问题委员会而与列宁多次会议接触和接受指导,他还深通英文,这些都利于马林在中国的工作。张太雷是个奇才,估计他当时的俄文亦已能阅读,当他二十八岁在广州街垒战中遭工贼冷枪击毙一刹那,嘴中呢喃的竟是一句俄语!

马林是极有头脑并敢负责任急于下结论的激进分子,他不仅实际工作,还积极撰文如《中国南方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外国资本家对孙中山的劝告》等等,部分地宣告了他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国共合作可行性研究)实践的产物,使我们有可能从中认识外国马克思主义者促成中国最终达到无产阶级专政为止的的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的理论努力及其成果和教训。研究马林

论文是很重要的,但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要研究的是对他的论文以及在此期间的言论,在中共党内也明显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般说来持不同意见的最终只有陈独秀一人,集中在国共的理论方面,马林压不服陈独秀,而在实践上中国书记只得服从国际代表。尤其是马林周游了大半个中国之后,陈独秀与马林又开始新一轮的谈判,关系又一度紧张起来。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乘岳阳号轮顶水上汉口,事被湖南省长赵恒惕获悉。那时湖南省自治运动搞得火热,甚至在所出版的《湖南自治筹备周刊》上刊登《远东自治共和国之地方自治法》,“为求多方参考,故闻苏俄代表马林经该国来,正表欢迎”,赵恒惕还信告谭延闿约请马林来长沙传经,受到赵省长等的礼待。马林向他们介绍苏俄、远东共和国等情况的同时亦考察了长沙的劳工运动情况,后来他还在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长沙青年团组织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和劳工运动领袖黄爱和庞人铨“被省长逮捕并杀害”的事,可谓此行不虚。事后,有些人才恍然大悟远东共和国“其为列宁保护西伯利亚避免日本攻击的伪装卫星国”^①,大有上当之感,说句笑话,算作“劳资两利”吧。马林离长沙时,赵恒惕为安全计,还派卫队护送到桂林,给孙中山送了一个人情。

十二月二十三日,马林抵达桂林,“在那里我作为孙逸仙的客人逗留了九天”。当时北伐大本营设在独秀峰下太平天国桂王府旧址,孙中山正在遥控讨伐吴佩孚。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失败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包括吴佩孚与别系军阀之间的狡滑周旋,孙中山的军势尚不足以使吴佩孚陷于孤立而消灭之。吴佩孚很有生命力,他不仅尚能抵御北伐,还将使中共和共产国际上一次大当,只是现在尚未到时候。马林孙中山交谈虽无实质性认同,但总体印象尚可。所谓没有实质性认同,是指作为共产国际一方与民族主义政党党魁之间就共同北伐问题方面,没有任何契约性的共识:“我曾经三次与孙中山长谈关于苏俄承认他以及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虽然华盛顿会议已使中国处于空前不幸之地位,但到他胜利结束北伐之前,要与苏俄结成联盟是根本不可能。”孙中山的原则是“待北伐胜利结束,立即与苏俄公开建立联盟,他的看法是中俄携手将完成亚洲的解放。但如果建立一个不适时的中俄联盟只会遭致列强的干涉”。双方各不相让的立场一是孙中山仍然持一年前与维经斯基交谈时的态度:独立完成北伐;二是国民党的总体立场倾向欧美,尽管华盛顿(太平洋)会议使中国处于不利地位仍坚信只要不与苏俄联盟,国民党能独立统一中国。当然孙中山与幕僚们研究结果认为也不宜与俄国闹翻,“表示愿与苏俄结成非官方的联系,不再前

^① 吴相湘《美国档案馆图书馆观感》,载台湾《中国时报》1978年11月。有关远东共和国资料见《湖南自治筹备周刊》1921年2月21日第1期,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发行。

进一步。他同意派一个他的最好的同志到苏俄去”。这就是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的最初的承诺。然而代表团成行的一九二三年七月,孙中山已完全失去北伐成功的希望,被迫依靠苏俄走国共合作之路。

所谓总体印象尚可,是马林告别孙中山后与张继结伴十天广州之行,产生一种极有利于国民党的工作意向:“在上海,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这个强烈地影响着马林催生国共合作的结论,是由他研究了“国民党组织的性质”之后得出的。他认为一,组成国民党领导阶层的知识分子有革命性,“在我接触的官员中,有好几个对俄国革命和红军的组织表示极大的兴趣”;二,构成“国民党内的资本主义因素”的侨民“资助这个工人党”;第三,南方军队中有很多人参加了国民党,而孙中山则在军队中进行演讲时“明确地例举苏俄红军例子”;第四点,错误地把国民党视为“工人党”又说“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还一再强调孙中山及其部属:“在广东支持工会,在罢工中常站在工人一起。如今年正月海员罢工期间,国民党与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十分清楚的”。据以上四点,马林把国民党定性为民族主义革命党,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诠释为“反对外国统治;争取民主;争取公民的生活”。并指出最后一条(指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在这个调查报告中马林认为完全应验了他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关于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一定要联合民族主义政党的理论,为实践这个理论找到了国民党。^① 其实这种估计是右倾的,因此马林于三月七日抵达上海与陈独秀谈判国共合作,遭到坚决拒绝。陈还把他的立场通报各地。谈判中断,马林立即去北京。北京之行目的是通过苏俄驻北京使馆外交使团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各送报告为他的计划求援,前者是述南行看好国民党、国共合作意向,后者则建议苏俄外交使团派代表驻南中国以进一步促进国民党靠拢苏俄和中共。旋即返回上海,这才四月初,真够马林辛劳的。回到上海再度与陈独秀等商议,仍遭拒绝。陈独秀知道马林去北京乃为请共产国际方面向中共施加影响,他也向共产国际远东局发出坚持立场的信,这就是著名的四月六日致共产国际远东局吴廷康(维经斯基)的信,这是陈独秀给共产国际写的第一封信。值得一读,全信如下:

吴廷康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

^①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译文不少,但各有删节,我们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文本为主,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文本补充,不一一注明。

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夺权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是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为荷。

陈独秀^①

上开六条中除第四条系策略性考虑外，余皆说明真相，其中的第三、五条虽然言词稍嫌尖刻，却说明了专制独裁党的性质和孙中山本人的脾性，他虽然生在沿海又长期在英美生活和活动，但一投入政治仍缺乏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风范，染上中国封建国君统治意识的内容和形式。当然这不只是孙中山一个领袖如此，甚至可以说他还是其中较开明者。统观现当代中国社会运动领袖史，甚至连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都不免背专制独裁践踏民主的历史包袱。所谓“历史包袱”笔者指的是笼罩在人的认识之上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传统文化束缚，因此同样不能要其个人负全部的政治责任。

马林与中共与陈独秀就国共合作谈判破裂，适逢莫期科即将召开共产国际四大，他就于四月二十四日离开上海乘日轮鹿岛丸走水路经新加坡、马来亚、阿姆斯特丹在欧陆绕了大半个地球再经柏林于七月初抵达莫斯科。

马林走了，来了达林(生卒年月不详)，他是十月革命时期的青年积极分子，加入俄共(布)后在青年国际从事青年运动。这次来华原本任务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动青年运动。但是他刚到上海就被苏俄在北京的使团长裴克斯电召北京。裴克斯向达林转达苏俄政府要他以政府代表身份与孙中山建立联系，指示他应全面了解孙中山，这可能是裴克斯阅读了马林报告之后想更多了解国民党而作出的决定。改变了身份的达林回上海后就在张太雷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干部陪同下匆匆赶赴广

^①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载《“二大”和“三大”》。

州,其时陈独秀亦与张国焘等前往广州。

一九二二年五月的广州,形势已经明显不利于孙中山。陈炯明由暗叛变为明反,四月九日,北伐军自桂林开拔至濠江即遭陈炯明部阻拦,十八日,时在梧州的孙中山委派廖仲恺去广州力劝陈炯明参加北伐,仍遭拒绝。二十三日,孙中山再次致电并派廖仲恺、马君武、居正、汪精卫、伍朝枢、古应芬、程潜等多名国民党元老找时在惠州前线的陈炯明,简直可以说是哀求他回心转意共谋北伐大业。铁了心的陈炯明根本不领情。孙中山北伐败局已定,但尚未想到一个月后陈炯明变本加厉攻打总统府。……

就在陈炯明拒绝北伐与攻打孙中山这剑拔弩张对峙下的广州,陈独秀与中共、达林与共产国际却办成了三件大事,一是召开了两个大会:五月一日至五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达林出席传达了远东劳大精神并鼓励中国工人投身社会运动,陈独秀出席并发表演讲《劳动节的由来和意义》,同时在广州《群报》上发表《告做劳动运动的人》,提出了在工人阶级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前,为夺取政权,应当参加资产阶级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这是达到无产阶级终极目标的第一步。五月五日至十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达林出席传达青年国际开展青年运动的精神。陈独秀到会并发表《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的重要演说。两大精神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研究精神”和“实际活动精神”,他说:“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这是陈独秀以总书记身份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勸勉革命者。据张国焘回忆,劳动大会曾邀请孙中山莅会演讲,“但他婉词谢绝”。这当然是一种政治态度。但是孙中山没有拒绝会晤达林。达林是四月二十七日抵达广州的,两天后他就出现在孙中山官邸,从此,据说达林与孙中山每周至少交谈两次,直到六月中旬离开广州。达林是两会主席团成员,可想而知的忙,他仍耐心地几乎是没完没了地与孙中山促膝谈心交流政见。孙中山仍处在与马林谈判的原则上少有进展,陈独秀的记载是:“青年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民主改革派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甚至连党外联合都不承认。^①信念坚定的政党领袖往往就在困境中显出魄力。但能支持多久呢。

陈独秀在广州也特别忙,不仅忙于两会,忙于达林—孙中山会谈,他还偕同陈公博等去惠州接受陈炯明的邀请,这是第三件大事。二陈是老相识,武夫陈比中共陈大

^① 《告全党同志书》,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85~103页。

一岁，二陈的政治生涯皆起于反清斗争，应当说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介入政治，就立场各异，别后不足一年，各自走向不同的路，且越走越远。这次从陈独秀的立场当然为的是力劝陈炯明与孙中山修好，联手北伐；“从旁边劝说孙、陈之间避免火并。但这种活动为时已晚了”^①。一九二二年五月的孙中山和陈炯明对峙，从纯军事的角度，已不是战场火并的对等关系，而是孙候着陈的打击。我们老是宣传正义战争必定战胜非正义战争，却很少讲战场上是实力（兵力和火炮辎重）的拼搏，不是正义必胜非正义的公式所能决定的。当然，战争失败并不等于正义失败或政治失败，因此失败的战争也能使正义一方清醒起来谋求再战必胜之路。如果说陈炯明的炮火没轰败孙中山，只能说孙的事业不会失败，而实力已经彻底败北，这时才迫使孙中山倾向中共和苏俄。

从惠州回到广州的陈独秀不必多绞脑汁即可料到中共投入革命运作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先于达林匆匆赶回上海，投入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的决策制定上，他绞尽脑汁用最准确的语言和实例完成了两个文件：六月十五日发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以下简称“主张”，引文不另注）；六月三十日以个人名义向维经斯基发出第二封信（以下简称“第二信”）。

真是无巧不成书，中共发表“主张”的前一天，陈炯明施诡计把孙中山的智多星廖仲恺骗往惠州途经马龙陂扣押监禁在石进兵工厂；“主张”发表的第二天——六月十六日，陈炯明从惠州集结军队四千余众包围并炮轰总统府，险遭不测的孙中山被迫逃离广州。由于陈炯明叛变事件发生在中共“主张”和“第二信”之间，叙述起来就方便多了。总而言之，此时的中共虽然仍拒绝国共合作，但对于失势的国民党总算网开一面，同意党外合作。

关于国共合作，以往研究者都着眼于陈独秀是经马林和达林的说服，孙中山挨炮轰后改弦更张投向苏俄，以及共产国际的多次指示压服，致使陈独秀作出让步，承认“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并且把“邀请国民党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作为中共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一个方法一种主张。但是，单单从说服、指示、压服等外部因素解释陈独秀同意联合国民党是不够的，因为它不具备理论促进理顺思想的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个纲领的第四条中分明写着：“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之前，必须与力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关系。”可见，中共党员加入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31页，此事在陈公博的《我与共产党》中有更详细的记载。

国民党造成联合战线,首先得修改党纲,这应是下届党代会的事;中共党员成为国民党员不只是一句“跨党分子”就能解决的,还涉及到对于革命的对象与动力的再认识和再组合,还涉及到在军阀打倒之后中共与国民党继续革命时必然产生一个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一个要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歧。这,无论从马克思主义从中共政纲党纲立场,从这群特殊的知识分子的性格(尤其是陈独秀的性格和他对国民党的略带歧视性质的认识),能够做到“主张”中提出的联合国民党等党派开联席会议共商革命大事,已经是让步到极限了。陈炯明倒孙后,六月二十日,共青团在发布的《对于政变的宣言并答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中提出“努力起来援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以根本推翻武人政治”^①。这是联合国民党的另一说法。此时孙中山所乘的永丰舰仍在白鹅潭水域中游弋,坚持反陈炯明五十余天,很英勇。陈独秀已在六月三十日致维经斯基的信中下了“孙恐不能制陈”的测断,又经达林的多次说服,陈仍不同意国共党内合作,只是表明:“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②可见,要中共达到服从共产国际的指令,还得依靠中共领袖人物的“自我说服”首先是陈独秀的自我说服。这就要说到二次革命论的作用了。研究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思想既是枯燥的却又是有趣又有益于日后他为何服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研究。

统观陈独秀在一九二一年底到广州两会的演讲和专为两会所写的论文,联系上述两个文件,以及期间所做的相关论文,对于在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上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要分两步走的思想 and 理论框架已经完成,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有所提示,也即是说陈独秀早就因了对中国资产阶级疲软、工人阶级不发达,农村自然经济大大超越城市生产力等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因素,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因此他一直在研究两步走的问题,讲得最清楚而且是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提出来的是一九二〇年九月的《对于时局的我见》:“在社会党(中共曾拟名“社会党”——引者)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打后者”^③,这就是中共取联合国民党完成北伐的理论依据,也是“主张”和致维经斯基第二信提出愿与国民党“携手”的依据,这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但第一步完成了怎么办?原来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而且陈独秀明确指出当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共“决不屑学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构和权力作政治活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走议会道路,这就是中共决不能与国民党党

① 《“二大”和“三大”》第49页。

② 同上书第55页。

③ 《陈独秀著作选》中册第165页,下同。

内合作的理论依据。这是个重大原则，因此在“主张”中表述得异乎寻常的清晰：“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但是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照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立民主政治为止”，联合战线强调了中共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理论上就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处在对立地位，也就谈不上党内合作了。这里难免令人闻出教条主义或机械唯物论的气味，却不存在通常责难陈独秀的错误——右倾机会主义。于是我们可以下一个简单的结论：党外联合，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自我说服”的，党内合作则是被共产国际压服的。这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现得最明显。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召开于上海，会址设在李达的住宅南成都路辅德里六二五号（今成都北路七弄辅德里三十号），代表十二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项英、蔡和森、邓中夏、高君宇、施存统、李震瀛、杨明斋、王尽美、陈望道；列席代表邓培、向警予、张太雷、邓恩铭、林育南。代表全国党员一百九十五名（境外党员二十三名）。新代表中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是蔡和森，李震瀛和邓中夏则是最早的工人运动领袖和理论家。高君宇为国共合作鞠躬尽瘁，他生于一八九八年，比孙中山还早逝几天。上届中共执委陈独秀、张国焘连任，增加了蔡和森、高君宇和邓中夏，候补执委是李汉俊和向警予，元老级李大钊此时始入中央机关，亦为候补执委。二大在舆论宣传方面除把《新青年》改为党的理论刊物由一九二三年一月归国的瞿秋白主编，另创办《向导》周刊，由刚从法国归国的蔡和森任第一任主编，这是周转快的时评杂论刊物，把两份党刊交给两位留学生办，证明陈独秀很重视吸收外来的“正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二大通过的九项议决案最重要的是加入第三国际，组成民主联合战线，以及中共党员可以出任政府或议会等三项。

九项决议中《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是极其重要的文献，是中共投入社会革命的近期达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确定日程目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较为全面的理论的和政策的原则。当然首先阐明的仍是如何联合，下面这段话说尽了一九二二年的中共（实际上是陈独秀）的政策：

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①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集第64页。

“暂时联合”目的就是指的“近期达标”，成功了，统一战线就不存在了，“因为民主党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

《关于议会行动的议决案》是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的对应文件，由于决定与国民党造成联席会议共同协商革命事宜，就得参与国民政府议事，首先就得用这一条修正一大党纲“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的第十四条规定，正是这一条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合法斗争”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利益的理论和策略。全文五条，第一条批判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迷们“简直以全副精力集注于这种合法的饶舌的改良主义行动之内，而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及其他一切必要的违法工作抛在九霄云外”。第二条肯定“第三国际产生于投机主义改良主义流血的破产之中”，他“重行估定无产阶级参与资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民意机关’的价值，他把马克思主义上面的改良主义的油烟完全抹去，阐明无产阶级议会行动的革命性质”，接下去这段话对于陈独秀研究具有深远意义，我们单独引述如下：

……设定无产阶级参加抛弃、退出资产阶级议会，及完全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步骤；并且把这类合法的行动完全隶属于违法的革命行动之下，至此的革命的议会行动，成为激起或辅助无产阶级一类革命风暴的重要方法之一。^①

这一条，不只说明二大通过的与国民党造成统一战线，只是中共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的策略，也分明看出，陈独秀没有任何议会道路的想法，至此细心的读者也许会联想到我们叙述陈独秀广州办教育时就曾研究他在论文和演讲中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迷的错误。可见两步走、不断革命之类说明中国从旧到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交替时期，陈独秀并没有走议会道路的任何右倾思想，不然就不好理解二大特别作出“议会行动”的决议并修改不能当官或出任议员的一大党章，此与成为托派领袖后的陈独秀被研究家们指责接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根本是两码事，因此批评陈独秀一贯右倾，投降取消派，亦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当然这是很棘手的研究，我们提出来也许是自找难题来难倒自己，但不妨认为惟其可能难倒才有研究价值。

我们就在这个暂时悬于此的问题中结束中共二大的叙述吧。因为压服中共的先后两道“金牌”已由莫斯科和伊尔库茨克传到中国，马林也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充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集第73页。

足了国共合作之电，走向上海，没有参加中共二大的李大钊也怀着国共合作的可行性心态来到上海。

从西湖会议到国民党一大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中央接到由维经斯基签署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全文如下：“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七月十八日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和菲利浦同志（斯内夫利特）紧密联系下工作。”^①这无疑是在给马林大胆在中国行使职权令中共服从的上方宝剑。果然如此，八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单独给马林发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指示四条，主要是第二、四两条：“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和“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在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也即是我们常说的“党内有党”，之外还得加上“会内有会”。国民党能同意吗？同意了又能维持多久？陈独秀最恼怒这两条。

有一点也使人感到莫斯科那帮革命家们怎么想出来的，即要求在“入党”“入会”的同时“建议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宣传创建民族独立的中华民国”，但是——请注意——共产国际还明文规定：“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地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从字面上都显得矛盾的这条指示，真是右倾到了家了，或者国民党真的成了马林南巡讲话中所说的已经革命化到社会主义“工人党”。

这里还要讲一下，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有多条政治活动渠道，指出下面的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国际一面要马林、达林团结国民党，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另一面则在团结吴佩孚，认定他是革命派，而那时孙中山正在讨伐吴佩孚。这种近乎两面派的中国策略，马林很早就觉察到了：“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②“赤塔的俄国人”当然不是赤塔远东共和国的意见，而是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拉狄克、季诺

^① “通知”和“指示”见《“二大”和“三大”》。

^② 1935年伊罗生访问了已经脱离共产国际而转向托派的马林。事后伊罗生将此次谈话记录成《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发表在1971年的伦敦出版第45期《中国季刊》上。中译文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2页。伊罗生是他在中国用名，本名伊赛克（H. Isaacs），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1932年来中国主编英文版《中国论坛》，参加民权保障同盟，与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交好。伊罗生后来转向托派，但他与马林的谈话记录真实、可靠、重要。

维也夫等同意的在赤塔主持中国工作的代表们的中国策略。下面我们会谈到“联吴疏孙”的策略给中国革命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八月十四日,孙中山到了上海,这是孙中山一生遭到最沉重打击的艰难时刻,不只摧毁了他的事业,也从精神上摧垮了他的身体:“文率同志为民国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①这时他肯定想到的是苏俄,共产国际,维经斯基、马林、达林、陈独秀、李大钊,中共……

孙中山到上海正在期待新的伙伴时,陈独秀虽在上海,却无法与他联系,因为在这之前五天——八月九日,陈独秀又遭“法总巡捕房特别机关西探目长西戴纳,会同督察员黄金荣,华探目程子卿、李友生,包探曹义卿等捕获”。关押在卢湾区法租界总巡捕房。这次除在陈府抄查出若干禁书,还抄出四万元汇款单,幸亏没有引渡,不然会产生麻烦,上海警厅属北京政府管辖,拿了南方政府的巨款,还得了!即使没引起麻烦,这次亦不准保外候审,由于情况严重,因此营救的声势比上一次大,除蔡元培、胡适等在北京向法驻京使馆呼吁释放,还发布全国十四个社会团体宣言抗议逮捕陈独秀。终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关了九天,十八日以“宣传布尔塞维克之嫌疑”罚洋四百了事。这次从被捕到释放过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没有被逐出租界,一是在签署营救宣言的十四个社会团体中有北京和上海两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当然不能证明统治当局的宽容,但说明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西来潮”被社会广泛承认,也迫使当局不得不略有收敛。

这次出狱后,中共中央机关对于“老头子”的安全引起了重视,陈独秀也不再吊儿郎当到处乱窜,他的家也秘密起来,不久还配了秘书,设了单线联系的交通,才使这位总书记安全无恙地工作了整整十年,当然这十年的后四年已与中共没有任何关系了。

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二大,但这时已在上海与阔别二年的陈独秀商议北方党的工作和国共合作事宜。李大钊到上海的日期是很重要的。但中共方面或有关人的回忆皆无确切记载,于是有的研究者就想当然地认定北李是为营救南陈而于二大后赶来上海的。其实这完全错了,因为胡适的日记中分明写着:“八月十八日,夜七时,守常请俄新代表约佛(Yoffe)吃饭,同席的有莫斯科大学中国学者 Ivanoff 及参赞二人。陪客有子民、孟和、石曾、梦麟。”^②这也是陈独秀从看守所押往法庭受审后无罪释放的一天。根据这则日记李大钊至少是十九或二十日离京二十一或二十二日到达的上海。请注意这个日期,还有更重要的事亦要依靠胡适这一天的日记予以证实哩。

在此之前马林已从北京抵达上海,立即向南陈北李传达共产国际决定中共以加

① 《告国民党同志书》,《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448 页,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② 《胡适的日记》下册第 431 页,中华书局 1986 年 3 月第 1 版。

入国民党的方式展开革命运动的策略。为了统一思想，马林紧急提议由陈独秀出面召开一次会议，这就是最后压服中共和陈独秀的著名的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这确实是一项决定国共合作和考验中共是否听命共产国际的“特别会议”，因而历来受到中外研究者的关注，然而，西湖会议的会期，也是据胡适日记推断李大钊抵达上海的日子延伸而定的，估计是二十二、二十三（或二十三、二十四）两天，李大钊是南来行囊甫定，马林坚定国共合作的促迫心情实在令人感动。

西湖会议参加者目前一致肯定的有南陈北李、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连同有国际远东局身份的张太雷，和马林合共七人。^①

西湖会议是议题单一，争论激烈，结论单一。要而言之是对马林提议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国际”指示来了个否定之否定。马林回忆说：“只有一两个人反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反对最强烈的是张国焘。”据蔡和森和张国焘的回忆确切地说来除有远东局中国科领导身份的张太雷之外的全体中共代表都是被压服的，而且还有最终闹到罚以开除党籍都反对国共合作的强硬派。还是陈独秀讲得理论透彻议论客观：

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即国焘——引者）、蔡和森、高君宇和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②

西湖会议奠定了国共合作基石，开创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击败北洋军阀使南北统一中华——真正地——民国起来的历史时期。陈独秀和李大钊识大义顾大局的精神实在是值得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

但是，到了危及中共和国际共运接轨的严重地步，仍然有人反对，反而复杂了起来，因为反对来自三个方向：中共、国民党和俄国。这方面的资料在中共早期党史上不算少，我们举其最可靠的：蔡和森在中共六大一次涉及党史的权威发言中指出：“自从西湖会议（一九二二年八月）以后，经过很坚决的反对李汉俊、陈公博、施存统等不加入国民党的观念……”这证明中共内有不服压的党员反对国共党内合作。蔡和森继续说下去：“当时孙中山对国际代表马林说，中共如加入国民党，就应该不能有共产

^① 在马林与伊罗生谈话涉及西湖会议代表中有瞿秋白，可以排除，那时瞿秋白还在莫斯科。马林对会议日期的回忆也有误，致使曾多次研究“斯内夫利特战略”的道夫·宾，以为开过两次西湖会议，见拙著《西湖会议及其它》载《龙江党史》1993年第5、6合刊号。

^② 《告全党同志书》。

党存在。”^①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按孙中山的主张，显然不是合作而是国民党吃掉共产党。对这个问题，陈独秀讲得更具体，他说，西湖会议后——

国际代表及中共代表进行国民党改组运动差不多有一年，国民党始终怠工或拒绝。孙中山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国际代表马林因此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②

从语气上判断，陈独秀颇有三分内火欲喷发，那么事实确如陈、蔡说的那般吗；说得透明些是：中共总书记的回忆可靠吗？回答是肯定的。只是由于近来研究两党历史的人出于某种政策上的考虑而不提孙中山的强硬态度，我们把这些写出来，当然为的是卫护传主，卫护历史，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想研究历来主张一党专政的党魁孙中山能强硬下去吗？老生常言道：时势造英雄。一九二二年夏季被陈炯明轰出广州的孙中山已经没有恢复北伐的时空条件了，他的强硬只能是他的资产阶级政党理论及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一种精神力量，已没有任何实力可言了。下面我们还将说及，这里只是从纠正长期以来被扭曲的历史角度，为陈独秀上述言论，先辩解几句。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马林和李大钊与孙中山研究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张国焘则被派去各地向中共组织传达二大精神和西湖会议议决国共合作诸事。其中反对党内合作最强烈的是广东和北京两地中共支部，最终竟至弄到个别党员因此而脱党或绳以党纪的严重地步。上海方面则加紧与孙中山谈判，在取消了向党魁个人表忠心、押指模等陋规之后，南陈北李、张国焘、蔡和森和张太雷等中共元老在张继家并由他作介绍人，在孙中山主盟下加入了国民党，成为最早的跨党分子，当然要认真弄通思想单靠仪式革新是不够的。未知张继还能与陈独秀合作剪辫子的壮举吗？

前面我们曾提示过反对国共合作的呼声还来自俄国，这就是托洛茨基：“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起初就是错误的。……我们的团体（一九二三年底反对派），除拉狄克及他的几个亲近朋友之外，一开始就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且反对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③。托洛茨基派只做到了反对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却没有阻止住由列宁同

① 《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问题时的发言》，载《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第1版。

② 《告全党同志书》。

③ 《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双山译，无出版处所）。

意斯大林执行马林组合的国共合作，这是导致陈独秀悲剧的序曲，正剧留在后面揭幕。此处还得按国共合作的进程往下叙述。

九月四日，孙中山立即召集国民党中央负责人和各省党部合共五十三人来上海。陈独秀是作为国民党员列入改组代表的第一位中共党员，马林也被邀参加改组会。国民党中当然也有激烈反对共产党加盟的，这就是日后所发生的西山会议派、戴季陶主义等的起因。只是由于国民党独裁了几十年，习惯听命孙中山，加上那些老谋深算的国民党元老心中明白，被陈炯明逼到犄角的国民党，没有中共和苏俄的“给养”是断不能翻身了。通过了合作决议，组成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起草委员会，起草了国民党党纲和党章。接着又令汪精卫和胡汉民起草《中国国民党宣言》。

国共合作就如下围棋，孙中山手下一盘死棋因了共产党加盟而全盘皆活，一九二三年元旦，孙中山核准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第二天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党章》，气象万新，国民党党威大振，导致南方实力向孙中山倾斜。一月十六日，陈炯明被滇桂联军逐出广州；十七日，越飞抵上海，第二天即与孙中山谈判，签成《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国民党完成联俄联共大业，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荣返广东，坐镇大元帅府。从此，中山先生如日中照，舒心异常，痛痛快快地当了两年大元帅，勋业卓著。

现在说一说李大钊的行踪，据白坚武日记，他九月八日抵达洛阳继续为共产国际完成“联吴”重任。若在西湖会议之前，这是可以理解的，如今国共合作，南陈北李加入国民党，此时越飞使团照旧打“联吴”牌局，还想当然地做起“孙吴联盟”南北统一的梦。把如此重大的决策系在李大钊一个人身上，李大钊则系在他的同学、时为吴佩孚顾问白坚武的私人情谊上，太悬了。真不知李大钊匆匆洛阳大道，有何感想。只得走着瞧了。吴佩孚在中国军阀中大概是学养最佳、谋略最深的了，他在李大钊衔令共产国际“联吴”而通过白坚武引见之初，就痛痛快快地顺应“保护劳工”的口号，来了个左（联俄）右（联英）逢源的计谋，不仅得到了俄国飞来的“最好的军阀”这顶不伦不类的帽子，而且还得俄国造武器弹药，装备了他那群杀起人来连眼睛也不眨一刹的“兵匪不分的兵”。

当吴佩孚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报纸上看到《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心中明白左源被截，“联吴”到此结束，就立即命令部下作好镇压一直是他心患的由李大钊、罗章龙，邓中夏等辛辛苦苦地培植起来的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召集龙济光、李嘉品、颜启汉、温雄飞等部属研究已经在广州再图与北京政府一决雌雄的孙中山的行动。^①二月五日吴佩孚闻郑州铁路工会有举动，过了一天，又沉默了一天，二月七日，吴佩孚

^① 《白坚武日记》1923年1月27日前后诸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版。

在京汉铁路中心郑州大开杀戒,造成震撼中外的“二七”惨案,工人的血顺着两条冰冷的铁轨淌向武汉三镇,李大钊竟然毫不知情,还在武汉向大学生们作文明演讲……上了一个使他抱憾终身的大当!马林对去年四月致共产国际的报告很自负,说:“我的报告成功地粉碎了赤塔依赖吴佩孚的方针”。然而真正粉碎俄国依赖吴佩孚的方针的是中国铁路工人的血!应当严肃指出,二七惨案的发生,苏俄中央、共产国际包括列宁斯大林拉狄克在内的领袖们都应负一定的政治责任,李大钊和中共自不例外。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一片抗议、讨伐、斥骂军阀的凶残暴虐,惟独缺少这自我反省的一页。整整过了七十年,能够说出来也算是历史确实是在发生积极向上的变化。

二七惨案中吴佩孚杀掉了施洋、林祥谦等共产党人,还通缉“共党要犯”,其中包括马林、陈独秀。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流血。

二七惨案的当天陈独秀就全力投入善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都发表了致中国工人或铁路工人书,号召团结在中共旗帜下与军阀展开殊死斗争以换取民主自由。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等撰文一以抗议吴佩孚屠杀工人,再以号召统一国民运动,枪口一致对准北洋军阀和北京政府,从二月七日当天起陈独秀多次撰文抨击“困兽犹斗的军阀”并斩钉截铁肯定,一九二三年的中国工人不但是国民运动的“重要部分”而且“已经是最勇敢的急先锋了,试看铁路工人已经首先起来以血肉和军阀相搏,便可明白”,愤怒的中共总书记指出二月七日工人的血“不只是为工人的自由与人格而战,乃是向军阀们黑暗势力,为全国人民之人格与自由而战”^①,中国工人尤其是产业无产阶级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就以解放全中国为己任,没有丝毫帮会气和自私自利的工团主义意识。然而就如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斗争一样,陈独秀也在总结郑州—武汉流血事件中引出继续斗争的教训和经验。陈独秀在建党初期,的确是工人运动领袖,他当之而无愧,后人则颂之而不应受过。

“二七”惨案发生在共产国际一再催促国共党内合作的最紧张的时刻,为顾全大局,陈独秀有很多话是没有说出来的,这不必多举例,只要看看中共发的告工人书中“为保护劳工目前利益及完成其组织力战斗力起见,在一定限度内,并不反对那些开明一点,进步一点的党派和势力,采用这种假仁假义的‘保护劳工’政策”。通过吞吞吐吐的言词中,分明对共产国际从联吴疏孙到既联吴又联孙的政策是不满的,牢骚只得憋闷在肚中。似乎还可以从历史事件的单纯叙述中脱出来说说中共领袖们的感觉,“二七”惨案后中共卸掉了“联吴”的包袱,却对国共合作谨慎起来,不用讳言是加深了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非理智的感情色彩,其中以蔡和森最为激烈,他在《向导》上发表自己写的和与别人写的好多篇“公开地猛烈地批评国民党领袖的缺点和错误”的

^① 《怎么打倒军阀》。

文章，曾引起孙中山向马林提出“不应公开批评国民党”的不合乎民主议政的要求，蔡和森是光明磊落的，后来他还曾为此而在党内高层会议上进行自我批评，说自己犯了“左倾”错误。然而不管怎么说，二七工人的血，为中共增强了坚持独立的政党意识和工人组织独立的自主意识。是啊，从主义和立场的角度，工人的血与国民党是不发生任何直接关系的。

二七惨案不久，陈独秀和中共机关就迁到广州正式筹办中共三大。他抵达广州，孙中山无上欢迎，并以“陆海空军大元帅”的至高权威委陈独秀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大本营”的宣传委员会委员，受委托与马林一起草拟国民党改组计划。李大钊则在三大前不久抵达广州。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区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今恤孤院路三号）召开。

共产国际对中共三大的召开于五月发来了十三条指示^①，辗转陈独秀手中已是七月十八日，不仅三大已结束，连追加传达都不成了。但是历史上的信息技术障碍不影响我们顺时序写历史。迟到的十三条指示真可谓之前所未有的超前。指示中心或者是唯一要求中共解决的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因此，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所以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一九二三年春末初夏的中国，国民党还没有召开改组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彼党是否顺利通过合作并付诸行动尚未定局；共产党则正刚开毕全党统一国共合作思想的三大，怎么能立即着手解决“没收地主土地”？如信息技术过关而在中共三大前传达，陈独秀该如何贯彻执行，势必先得党内统一思想后与孙中山谈判。我们可以武断一句：且不论土改，甚至连国共合作都得因十三条指示而砸锅！真理向前多跨一步都可能成为谬论，孙中山虽然提过“耕者有其田”，陈独秀虽然一再被斥为轻视农民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但孙中山怎么能接受衔接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土地改革呢？陈独秀即使重视农民运动，又如何能在北伐胜败未卜时期解决土地问题以彻底解决农村生产关系，完成工农联盟呢？在中国，这项任务不是到一九四九年之后才逐步完成的吗？太超前了。

幸亏十三条指示没有按时到达。

中共三大计有代表四十名（约数，有表决权的是十九名），当时（包括海外）共有党员四三二人。可以提及的代表中有何孟雄、王荷波、谭平山、阮啸仙、恽代英、于树德，还有远东劳大时受到列宁接见的工人代表邓培，以及由陈独秀从莫斯科动员回来的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

瞿秋白等新人。李大钊是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即返北京主持工作,并等待迎接鲍罗廷。国际代表马林参加这次会议,是他在中国的最后一次活动。三大的主题是动员全党服从中央关于国共党内合作的决议——即西湖会议精神。据蔡和森回忆,由于党内合作已成定局,因此三大“所争论的是关于C. P. 政治面目和劳动运动的独立性”^①。由于“马林的意见,只要孙中山能够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国民党,因此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这就严重了。但引在这里,我们为的是给陈独秀洗刷戴了半个世纪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原来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不是陈独秀喊出来的。总书记当然要对口号负责。但是他提和他同意,是有质的区别的。李立三的《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有如下一段话:

当时的中国党对于列宁主义对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一点也不了解。在第三次的会上讨论共产国际加入国民党的指示的时候,曾经发生很大的争论,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思想,赞成加入国民党,同时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共产党员不应该有甚么独立的工作。甚至说“中国共产党早生了五年”,这无疑是取消主义思想。(原有着重点,双括号内的引文未注明出处——引者。)

把上引的与蔡和森的回忆对照,李立三是在嫁祸于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是三大代表概括的马林的见解^②,至于说陈独秀曾经说过中共“早生了五年”,翻遍陈独秀在三大作的政治报告以及三大的全部决议及文档资料,都没有这句话。陈独秀被开除党籍是李立三执行的左倾冒险主义最严重的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李立三的政治报告作于次年一月,如果不说这是构成陈独秀开除党的诬陷错误之一,至少是加强了不明真相的普通党员对陈独秀的莫须有的仇恨。三大上,陈独秀虽然同意马林的意见,但他仍然在所主持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明确提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持我们的组织,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正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这些响当当的钢铁语言中哪里来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丁点儿味道呢?陈独秀明显是在设法把工作“归”入共产党么!可以为陈独秀洗刷的资料不少,这里

①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

② 这句话,蔡和森、李立三以及别的人的文章中有时写成“一切都到国民党内去做”。至于谁说的,一下说是马林讲的,一下又说出自陈独秀的嘴;有时则说是他们两人同时讲的,又有时说马林讲而陈独秀说成的。真是莫衷一是版本不少。

谨引三大代表、老同盟会员、李大钊的同学于树德(一八九三—一九八二)的回忆以结束这章公案吧：

在我的印象里，“三大”开得很急促，因为马上就要同国民党进行合作。会议的内容就是决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最后决定不是以全党的名义加入国民党，而是以党员个人身份加入。所以后来大部分人参加，少数人不参加，如陈独秀和彭述之就没有参加国民党，以表示共产党是独立的组织。^①

其实，三大没有忘记农民，不仅专门有《农民问题决议案》，还把“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作为中共中央的“中心工作”写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不必再说什么了吧。

这里一总概说中共中央机关的地址，因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先后两次被捕，中共中央机关为避免再遭不测，西湖会议后迁往北京，二七惨案后过渡到广州，又因考虑上海为工人力量最强以及与国民党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三大后又迁到上海，国共破裂前曾迁武汉几个月又迁回上海，此时共产党已是非法组织，开始地下秘密工作时期，与陈独秀已无关系，但国民党并不因此而不把他捉拿归案。

中共三大结束，派入国民党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员亦已内定，但国民党一大却迟迟不开，这当然不是技术问题，是彼党立场尚在摇摆。任何政党，它的主义和理论是不变的。投入社会运动完成本党主义的政策和策略是可变的。一九二三年党部迁往广州的国民党，与去年被陈炯明轰出来时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是在腹诽中山先生，他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实乃出于必然，正如“耕者有其田”不等于土地改革一样，他与共产党与俄国联合也不等于“一边倒向社会主义”，这样就不是孙中山，也就没有三民主义了。况且国民党内还有一些被孙中山称为“老同志”的党员从来就不同意不支持联俄尤其是反对联共。双方僵持不下，马林就显得很尴尬，这就是陈独秀所言马林“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的社会原因和党争原因。

八月初的马林到上海，此时孙中山履行在桂林与马林相约的派代表去苏俄考察的诺言。由马林联络妥善，蒋介石为团长，由沈定一(玄庐)、张太雷、王登云等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于八月十六日离开上海轮航大连，经由哈尔滨在满洲里出境于九月二日抵莫斯科，全部日程均由张太雷安排，本传不必细说。十一月二十九日代表团离莫斯科循原道于十二月十五日返抵上海各就各位，蒋介石则回溪口老家“息影慈庵”半个月，经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等函电千呼万唤于月底出山返粤，

^① 《“二大”和“三大”》。

其时距国民党一大只半个月了。

再回头说说送走了蒋介石赴俄代表团的马林，亦殿蒋之后抵达哈尔滨，正是在这“东方巴黎”的东北重镇见到前来中国工作的鲍罗廷，接任是莫斯科定的，在哈尔滨晤面则是巧合。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再度把维经斯基派来中国，他算是正式接替马林，在上海与中共中央合署办公，算是融洽，但此时的中共政策实权在鲍罗廷手中，有时难免矛盾。

这里我们还要谈一件以往国共合作研究中从不提及的重要史事，以证明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如何困难地甚至不惜委屈自己与国民党周旋的。在一部陈独秀传中有如下一段谈到陈独秀在西湖会议上屈从于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命令，说：“这大概是陈独秀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他所不愿意——至少是当时不愿意的事。一位个性倔强、脾气暴躁的人被降服了”^①，说得很对。要一九二〇年才成立的共产党，要这样一群由马克思与巴黎公社，列宁与俄国十月暴力理论武装而又经五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鼓动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去与国民党这些职业革命家进行政治谈判——似乎也可以称之为“议会斗争”吧，实在是太缺政治韬略。西湖会议后李大钊匆忙去洛阳，这是写入李大钊年谱中的公开事，岂知不到一个月他又成了洛阳客，这次是陪同张继持了孙中山致吴佩孚手书前往洛阳与吴佩孚谈判，显然李大钊是在圆越飞“吴孙联合”之梦。十月九日抵洛阳当天吴佩孚就会见张继，“张与吴将军晤谈甚欢洽”^②。但“甚欢洽”了些什么？该不是谈如何对付无产阶级政党吧。我们不作恶行推测，且说事实，两天后张继拿了吴佩孚复孙中山的信告别洛阳将军府，白坚武日记中透露了吴信的中心意思：“吴子玉复函孙中山，以共同忠于民国相勉，勿与卖国党、匪党邻近”，当时中国只有国共两大政党，且正在合作之际，细细品味，吴劝孙“勿与卖国党、匪党邻近”，真是不寒而栗，不寒而栗啊！更有甚者：“溥泉电孙中山意大略云同”，这可是太阴险了！这类绝密的内容，李大钊显然是被蒙在鼓里了。陈独秀更不知内情。后来，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提到联吴失察酿成“二七”惨案时指出“中共委员会与吴佩孚有过联系，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陈独秀和李大钊根本不信吴佩孚会“保护劳工”！但又不得不违心地去完成俄国交给的任务，这是中共在替代俄国错误的中国政策受过。

这时的孙中山当然决不会听从“勿与卖国党、匪党邻近”的劝告，但此时尚不宜与吴翻脸，因此回到北京的李大钊还在为“海参崴军械问题”致函白坚武哩！十一月五日，孙中山派张继拿了她的亲笔信去北京会见越飞，明确提出要求苏俄给武器装备和

① 任建树《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第2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② 《白坚武日记》相关日记条，下同。

派顾问训练北伐军。^① 无论是吴佩孚还是孙中山都在向苏俄要军火。给谁？可是要命的事！张继向越飞伸手要军火不到三个月，当吴佩孚的子弹穿透工人的心脏时，中共流血又流泪，国民党却什么也没有损失！而且还因此而除掉了一个与之争军援的大军阀。

国共合作注定是要破裂的，合作却也是势在必行的，因为苏俄、中共和国民党都有此必要，但“两国三方”之间的中共是勉强同意的。这里不存在笔者“大胆”假设，本着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李汉俊等的主见，中共连共产国际都只是“联合”而不是“加入”，还枉谈什么与国民党实施党内合作。

鲍罗廷与马林分手于哈尔滨，顺中东路经沈阳于九月抵达北京，受到李大钊、何孟雄、包惠僧等北京支部成员的欢迎，曾在苏俄使馆恳谈国共合作，大多认为这“既失掉了我们的阶级立场又违背了我们的党的纯洁性”，最后经过鲍罗廷的力疾解释尤其是李大钊的说服，终于使两个（另一个为广州）最激烈反对合作的中共支部回心转意。接着鲍罗廷拿了苏俄第一任驻华大使加拉罕致孙中山的推荐信于九月底到了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等上海党员，由于陈独秀本人没有回忆，也没有别人回忆，只得阙如。十月初鲍罗廷乘船南下于六日抵达广州，在旅馆小作逗留即搬往大东路三十一号，此地即著名的“鲍公馆”。

十月九日孙中山举行了欢迎会，广州政府一批著名的活动家出席了欢迎会。孙和鲍都讲了话；十五日，广州公园里举行了国民党党员大集会，孙中山和鲍罗廷出席大会并都讲了话。接着广州国民党党部、外交部和廖仲恺个人举行盛大欢迎会。仪礼完毕，十八日，孙中山亲自手书：“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此状——孙文”。由于南陈北李都不在广州，因此这里还得插入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上海筹备中共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会的要事。这次会议开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第二天下午闭幕，到会有中执委陈独秀、蔡和森、王荷波、罗章龙，驻京委员李大钊，驻鄂委员项英，还有一个团中央代表和一个“特别招待”（名不可考）。三届一次会议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尚未到上海，那时他在北京接受加拉罕对于来华工作的指点。

三届一次执委会讨论和所议的事可谓多矣，最后形成一个纪要两个报告和三个决议案，会后发了三个党内通告。除党务组织工作汇报和各项措施议决，两天会议全部内容都围绕“扩大国民党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展开讨论并制定今后计划，以供由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参与国民党一大工作的干部决策依据。

陈独秀曾一再抱怨中央执委人少且分散在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地，有时陈独秀在上海唱空城计，要筹备这次中央会议还要迅即形成一些文件实在够烦的，估计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孙中山与越飞》一节。

“老头子”常发脾气，常得罪左右，但他并不姑息护短，曾在全党大会上用第三人称对自己作了“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的自我批评。当时，陈独秀生活很清苦，老婆多病，侍候两个孩子，经济拮据，每月“革命津贴”只有四十元，生活主要靠出版不久的《独秀文存》版税维持，他与马克思有同样嗜好——雪茄。很难维持抽时令高档之小吕宋、古巴雪茄，郑超麟说他抽的是“劣质”雪茄，汪原放曾回忆说每次陈独秀到亚东图书馆，他母亲或婶母总要煮面条或炒蛋饭给他吃：“我的母亲、婶母常说：‘他苦呵！没有什么好的吃呵！一碗面，他总觉得是很好吃的！’”这就是一九二四年伟人的生活。^① 那时他工作特别忙，特别是三届一次执委会时期，他不仅要开好会，以尽总书记之责，而且还要参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以尽学者之责。这是中国思想界涉及宇宙观的很著名的论争，陈独秀正是在此时为亚东图书馆出版论争集《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批判了“玄学鬼”张君勱，也期期以待“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问题的”胡适“经过这回辩论，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②。巨事琐细忙得晕头转向，我们看看汪孟邹日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九日是个星期天，别人都去看梅兰芳，惟“仲甫独在编辑所做文”^③，那时的陈独秀是繁忙烦杂穷困加上危险，但是他沉着应对，“乃以‘烦钝不理’四字克服环境”，真可谓之老僧入定道行够深的。写在这儿算是闲笔。

闲笔一停，立即忙开，一九二四年元旦这一天，陈独秀主持召开了 C. P. 和 S. Y. 两中央局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正在上海参加中国国民党上海执委第一次会议的鲍罗廷作为国际代表一方出席了这次会议，目的当然仍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作最后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动员，估计在这次会议上仍产生比较强烈反对合作倾向，因此在最后形成的文件中还有诸如“我们须抑制一切感情并抛弃鄙视国民党之旧观念”之类的情绪流露，并提出了五条要求国民党改进的意见。^④

南陈忙，北李也够受。

一月四日，李大钊在国民党北京大学支部召开参加国民党一大选代表的会议（孙中山指定三名又选三名），第二天就与张国焘匆匆乘车到了上海。据张国焘回忆“停

① 据《郑超麟回忆录》（第 90 页）“当时独秀、和森、述之，每月领津贴四十元；张伯简、向警予和我，每月领三十元”，包括伙食费在内，因此相当清苦。但据唐德刚《读毛毛书补遗》（《明报月刊》1994 年第 1 期）中说：“那时舍身作‘职业革命家’的中国小嬉皮们，每人每月生活费十二元；‘家长’陈独秀月支二百元（他失去北大教授的薪金是四百元）。”中共“家长”薪水比“小嬉皮”（C. P.）高出十六倍，确否如此悬殊读者明鉴。

② 《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 1923 年出版。

③ 此处引文及上引汪原放的话均见《回忆亚东图书馆》第 87～90 页，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3 年 11 月第 1 版。

④ 《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对于国民党全国大会意见》。

留上海期间，中共中央曾邀请我们两人参加中央会议，讨论我们在广州应采取的态度”，李大钊在会上说述了北京党员的合作思想已通，“陈独秀先生十分欣慰，提议由我们两人会同已在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组成一个指导小组”，李大钊总负责。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开幕，三十日闭幕，代表总额一九六人（约数），与会代表一六五人，代表分孙中山指定、中共和国民党推荐孙中山批准，和各省推荐三类。中共代表共二十三名，其中孙中山指定七人，余皆由各地中共支部选出由陈独秀同意，中共党员中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林祖涵（伯渠）、毛泽东、李维汉、张国焘、夏曦、李立三、王尽美、杨匏安、彭湃、刘芬（伯垂）、宣中华等。这是南陈北李精心安排的，内中有老同盟会员、有已入国民党而为孙中山信任的、有来自苏俄可沟通俄中关系者、有地方工作卓有成绩者等等各路优秀，陈独秀是孙中山指定代表，但没有参加，什么原因？据说是鲍罗廷的意见，也许出自两位党魁地位无法“对等”的原故罢。笔者以为还在于陈独秀仍然对国共合作被动于共产国际的指令。前者是政治中怀有情绪，后者是情绪中的政治。尽管他的认识可能是缺乏斗争策略的机械论或教条主义，但法国大革命中历次工人参加斗争而最后倒在资产阶级“同盟军”枪口下的教训，陈独秀是不会忘记的。有了他，也许国共合作发生不少麻烦，但是没有他，中共在国共分裂后将垮得更惨。

中共的二十三位代表受到了孙中山的重视，他请李大钊入席与胡汉民、汪精卫、林森和谢持组成主席团，主席团兼任国民党章程、宣言、宣传三个审查委员会。从政党角度是一比四，况且林森和谢持是日后西山会议坚定的反共派。中共选派代表是无偏见的，国民党方面呢，能这么说吗？这种场合，除了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还得有灵活的工作方式，南陈处之难免砸锅，北李性格温和且精通国家法政，很能应付且游刃有余。还应公正地指出，当时的汪精卫乃是执行孙中山先生指示的坚定派。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一大无疑是特别关注的，大会召开前，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此文件由维经斯基参与制定后由当时的执委会主席保加利亚人科拉洛夫签发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传到中共恰在国民党一大前夕。如今几乎家喻户晓“新三民主义”，却很少有人知其本源出自这个文件。^①全文共八条，主要是解释三民主义的三条。这个文件对中共是带有强制性的：“从国民党建党直到奉为该党基础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将通过下述解释，表明国民党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

民族主义被“解释”总体要求“就是国民党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反对帝国主义和消灭军阀制度。为达此目的“国民党只有通过增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81页。

强、支持和组织国内各劳动人民阶层来放手发动全国力量，才可以向群众表明，这个民族主义体现的是健康的反帝运动的概念”。国民党能否接受这个“解释”？明白人一想便知将给陈独秀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民权主义被“解释”为“应使其有利于中国劳动群众，即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这一条是革命的结果，不会在过程中引出多少争议，民权给谁那是未来政府的性质所定，能否给“劳动群众”，几十年的历史已经不言自明。

民生主义就复杂了——实际上这是导致国共分裂的本因。全引如下：

民生主义，如果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那它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才能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反响。

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国有化原则在现在也可适用于它，因为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民生主义也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必须向缺乏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因为他们一部分人经营商业，一部分人担任国家官吏，他们以现金地租和实物税来盘剥农民。国家还应当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应当大力帮助农民解决灌溉、由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少地区移民、开发荒地等问题。

民生主义这一条中有关土地与农民问题的解释，比前述的给中共十三条指示还左，更令人吃惊的是，竟然还把民族工业收归国有的时间定在“现在”即一九二三年，遗憾的是这件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一九四九年还未提到日程，这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不能乱定的，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只“公私合营”，而且实行的是“赎买政策”。

看了以上综合在一起的“新三民主义”，尤其是连“中小土地占有者”都在消灭之列的“民生主义”，陈独秀怎么能免去那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呢？

事实真相如何呢？就可以谈国民党一大了。

开幕后第二天，按议程二十一日下午会议是批准国民党宣言草案，被临时取消了，因为“孙中山迫于右派的压力决定收回宣言草案”^①。原因就在于宣言中有“大土

^① 本章全部有关国民党一大和二大的引文和资料均来自《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下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地占有者”的土地收归国有，使国民党实权人物闻风丧胆的这一条。原来如此！今天能在本传中引入鲍罗廷写于一月二十三日会议“紧急关头的笔记”，也算是为陈独秀松一松他那已经拔了顶的脑袋。鲍罗廷抱怨在大会期间，国民党右翼代表们“经常从后门跑到孙中山那里，竭力用通过宣言会产生的危险后果来恐吓他。他们的朋友们从海外给孙中山打来电报，表示担心国民党会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如此等等。他们甚至得以在害怕分裂的左派国民党人中制造混乱”^①。孙中山，还有廖仲恺此时已定下了“以俄为师”的决心，但要按照共产国际的标准厘定三民主义，这就不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了。最后公布的国民党宣言中民生主义是两条：“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这在国民党领袖来说已经是顶点了。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不只是个物产问题，而且是构成社会制度的生产关系及其生产力。莫斯科的理论家们个个精通马克思主义，他们用的词儿就是：“消灭……土地占有者制度”，且莫提这是国民党根本不能接受的政治原则；在一九二三年上，连共产党也是无法实行的。土地的归属是由革命性质决定的——当土地问题提到革命日程，国共必然分裂。从理论上讲，这与领袖人物的倾向无关，有关的是加强培训以提高农民对革命投入的阶级的和政治的觉悟；以及一旦发生分裂，采用什么方法保存这实力使其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只是在这个（即在策略）意义上陈独秀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结果是中共总书记被罢免，苏俄政府代表鲍罗廷被召回。两位革命家的跟头都栽在企图迅速解决农村生产关系上来一个“分田分地正忙”，让农民投入民主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极左解释上。

国民党宣言中重要内容被删，会议期间国民党左右之间的争论和对中共代表的明显的排斥，以及孙中山的处境，是无法瞒过主席团成员李大钊的耳目的，他已作好反击的准备。果然如此……

一月二十八日，国民党代表方瑞麟发言，要求修改国民党党章，即在党员入党条款中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方提议毕，李大钊立即上台发言，他语言简练，立场鲜明。

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同志加入本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国民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资格加入国民革命事业，并望诸前辈同志指导一切。

这段极短的话讲完即向大会主席交出意见书。李大钊承认在当时的中国唯有孙

^① 《鲍罗廷笔记》，载《鲍罗廷在中国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这就肯定了三民主义，并申明中共是为“贡献于国民革命”而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现在看来李大钊的意见中最关键的并且是有物质力量和威慑力的是如下一段：

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地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党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团的团体。……现代的革命运动是国家的，同时亦是世界的，有我们在中国国民的组织与国际的组织的中间作个联络，作个连锁，使革命的运动，益能前进，是本党所希望的，亦是第三国际所希望的。^①

历史就这么的，国民党虽有民族资产阶级、爱国侨领和矢志国民革命的军人等方面的支持，但没有国际组织的强大后盾，共产党虽弱又是“穷党”，却有强大的国际组织（连同苏联政府）作后盾，不用多久，孙中山和国民党即就体会到李大钊书面意见的斤量：共产国际对国民革命在经济上是必不可少的，在政治上是绝顶重要的，它遏制了国际资本对于军阀的利用。

李大钊的发言和书面意见当即既有反对的也有支持的，最后汪精卫以章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支持李大钊的意见了结明争，但暗斗呢？当然，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反共之所以不得势，主要还在于孙中山坚决主张联俄联共，他在开幕词中就有过“当讨论问题时，必须各人虚心，不可以无意识的问题来挑拨意见”的政治暗示，在第一天的第二次会议时孙中山又赞扬“俄国革命不仅把世界最大权威的帝国主义推翻，且进而解决世界经济、政治诸问题”。并提出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显然包含着“以俄为师”的内容，这是国民党改组的灵魂，反对派是不敢贸然反对的。

由于共产国际“解释”民生主义的关键不被“宣言”采纳，为免中共就此问题发生对立，孙中山和廖仲恺等只得默认此项解释，因此才有几乎是由中共独揽的农民部（两届的部长皆林伯渠，秘书长为彭湃，二届补加罗绮园）以及全部由中共毛泽东、彭湃、陈潭秋等掌握的农民运动讲习会。于是农民问题成了中共的强项。

国民党一大还要在本传中记录在案的是列宁于一月二十一日逝世，二十五日上

^①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李大钊文集》下册第70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

午会议进行中孙中山临时到会，主席发布“紧急动议”，孙中山讲话宣布“俄国行政首领列宁先生已于前日去世”。敬颂列宁“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孙中山讲话中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是放权，说“本党此次改组，就是本总理把个人担负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鼓掌）……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这是本总理的最大希望”。他提议“用本会名义致电莫斯科，对列宁先生之死表示哀悼案”并“请鲍尔登（即鲍罗廷——引者）先生讲列宁先生之为人。请伍朝枢君翻译”。鲍罗廷沉痛哀悼列宁逝世，是“我们俄国所受的损失是无可计算的价值，亦是无可想法补救的”。他对大会“对于列宁有表示哀悼的纪念，鄙人非常感激，并对于诸君表示感谢”，鲍罗廷在“列宁虽死，列宁的主义万岁”中结束讲话。全场鼓掌。

列宁逝世，苏俄和共产国际乃至全球共运进入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时代。孙中山关于放权的讲话对国民党乃是头等大事。列宁生前对斯大林接权曾忧心忡忡，但孙中山是否察出他身后将是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呢。总而言之俄中两位革命领袖一年三个月内先后去世，决定了中国之命运还将悲壮宏伟地搏击下去。

北李随着国民党纪念列宁，在广州追悼列宁和纪念二七惨案一周年大会上讲话，讲话中哀悼列宁外，从国共合作的角度讲了“国民革命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与‘二七’死难工友有同一的价值，京汉路流血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流血同埋下第二次革命的种子，将来不久是要爆发的”^①等等，为国共合作找历史渊源。

南陈在上海亦在哀思列宁之死，惟因上海仍在北京政府管辖下不能有规模性活动。二月二日，陈独秀在创刊不久的 S. Y. 机关刊《中国青年》上发表《列宁之死》，这是篇仅只七百言的短文，却具有高度的理论性，从伟人之死并联系当时社会上以为列宁死了，“俄国革命将随之寿终（即苏俄瓦解之意）”，批判了唯心主义的英雄造世论：“他们不明白个人的主观意志无论如何伟大，决不能创造客观上绝对不可能的东西”，从理论上证明苏俄政府“已有不随列宁之死而动摇的程度”，制度是巩固的，这当然是就历史而言。同时陈独秀又指出：“个人的意志固然不能创造客观上不可能的东西，而在客观上可能的范围以内，却有个人意志回旋的余地，并且必须有个人的努力及天才的创见，这客观上的可能才能够适当的实现。”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已相当成熟并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了校验。我们当然无法、甚至是简单地述评从中共三大到国民党一大这短短半年间的总书记文墨，于是只得求助于统计学了。从一九二三年六月到次年二月，陈独秀共发表长短文章七十七篇，几乎论遍了当时国内外重大事件，包括批判国民党中反联共派（如《国民党与共产主义者》）和期待其革新党风（如《国民党之模范与改造》），还有我国最早的社会阶级分析《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

^① 李大钊为列宁逝世撰写两篇文章：《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列宁不死》。

级》，还有，提出把农民减租减息的经济要求与政治运动扭结在一起认识的短论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早期文献。

陈独秀的写作实在勤奋，他甚至不放过泰戈尔到中国受到社会扭曲接待，以及泰本人的和平主义观念，其与正在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中的进步力量之间发生左右为难的现象，参与《中国青年》编辑恽代英、邓中夏那帮小伙子的讨论，发表了《我们为什么欢迎泰戈尔？》和《泰戈尔与东方文化》。泰戈尔是东方文化系中的名人，然而他那套和平主义宏论讲的不是地方，于是就受到了“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的责难，泰戈尔来的不是时候，而且还不识时务地去“觐见末代皇帝”！我们这厢则没有闲情在此讲“泰戈尔来华”闹剧，但立此存照应是南陈文化思想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页。

国民党一大结束，广州的局势并不太稳定，陈炯明仍在左近顽抗，然而当大批苏俄军事顾问来广州，六月，黄埔军事政治学校成立，各地优秀青年投奔军校，海参崴装满武器辎重的军舰陆续驶进黄埔港，尤其是十月，U. K. 布留赫尔将军（加伦，一八八七—一九三八）抵穗被任命为广州军政府军事总顾问，在鲍罗廷的政治分析下，在加伦将军的军事部署下，一举粉碎直接威胁广州的反革命商团叛乱，黄埔军校功不可没，此举在政治上对孙中山北伐事业是好的开头。此时鲍罗廷和加伦军事顾问团的“以广东军事胜利支持孙中山的政治使命”的实力政策^①起到了扩大国民党政威军威的作用，迫使直奉诸系开始内讧。十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二十三日冯部进驻北京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果断：二十四日囚禁“贿选总统”曹锟；二十五日把辛亥革命后仍盘踞在故宫的末代皇帝溥仪赶出宫门，就凭此举，冯玉祥足以流芳百世；孙中山领导的反清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起于武昌首义的黄兴，终结于赶走溥仪的冯玉祥。

被赶出宫门时年十八岁而应负法律责任的溥仪逃往日本大使馆，坚决与民主革命政治为敌，终于当了汉奸，中国封建制度的最后一个谬种去日本使馆是必然的，他本人皇帝梦不醒，也是封建制度的最后一个恶之象征。

冯玉祥深知政治形势的复杂并认清自己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实力，在赶出溥仪的同一天向孙中山发电请来北京主政，十一月十日孙中山回电同意北上；十七日孙中山夫妇到上海发表《北上宣言》“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国共两位领袖是否会见，无资料，但国共之间的分歧和中共之立场是有案可查的。在发于十一月一日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的六日《附及》中说：“这个通告发出后，中央政策

^① [俄]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137~1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5月。以下凡引切列潘诺夫言论均据此书不另注。

略有变更,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于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中山在和会中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割中国的阴谋。”^①通告由陈独秀和秘书签发。接着又发出《中央通告第×××号》支持孙中山北上与北京政府谈判,但是鉴于国共之间的歧义已见端倪,摩擦亦已发生,陈独秀在文件中对孙中山北上作如下判断:“此宣言纯粹代表国民党中派的观念,措词含浑,大有与各军阀妥协之余地,且语多抽象,并无代表人民利益的要求,彼此次北去受军阀和国民党右派两面之包围,结果恐甚危险。”中共办法是维持团结支持北上,同时“向中山提出政治的具体主张”总共十三条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在《向导》上发表后,陈独秀与林育南(一八九七—一九三一)以 C. P. 和 S. Y. 中央局名义签署发表通告各地党团应支持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再次支持中山北上。此时的孙中山可说是联俄联共决心前所未有的坚定,但作为国民党领袖从维护全党团结及三民主义的党性原则,当然不能赞同彼党左派的彻底改革,但拒绝右派的分裂和向军阀背后的帝国列强妥协仍然是坚定的。中山先生革命四十年至民国十三年终于找到了苏俄支持使其绝路逢生,他心中是明白的,中共也没有给他出难题,这次北上李大钊作了大量工作,读者若稍微了解一些北京国民党内部斗争和军阀倾轧的历史,就不难悟出,李大钊正是在团结左派党人支持孙中山北上等一系列工作中得罪了东北王而埋下了两年后上绞架的祸根。但力促北上的孙中山腰板硬起来与军阀展开立国政见的斗争的主要是陈独秀,还有集中上海的《向导》和《中国青年》两大编辑部中的青年党员,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沈泽民等的理论开导和斗争。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上海住了五天的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登上“上海丸”日轮经日本小作逗留于十二月四日抵达天津。

十二月十日即孙中山到达天津第六天,陈独秀发表《孙段合作与国民党之命运》,这是篇很严肃的政论,但文章引“真金不怕火烧”言喻孙中山冒险北上起兴很有点趣味,陈独秀认为孙中山应该北上,“至于他是否真金,此次一烧便能明白”,这次,陈独秀多虑了。十八日在天津已经查出患绝症的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段祺瑞代表叶恭绰和许世英,把段祺瑞政府“外崇国信”乞怜于帝国列强的卖国行径痛痛快快地怒斥一顿^②，“一烧”之下,果然是“真金”!

十二月底,孙中山抵达北京口授书面记录《入京宣言》再次表示力促召开国民会议,在怒斥段执政的同时,把在京国民党内的右派批评了一通。三月一日,孙中山终于盼了十四年的象征着可能一统全国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了,可惜的是元首已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下列包括发表在《向导》上的文件亦同。

^② 何香凝《我的回忆》,《辛亥革命》第1集,文史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版。

不能莅会——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留下了：《总理遗嘱》、《致苏联遗嘱》、《家事遗嘱》，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却仍然还得乱下去的中华民国。下面叙述的历史原则上已与孙中山无关，五个月后，廖仲恺死在国民党右派冷枪下，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雅训到此结束。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与共产国际的风风雨雨

笔者为陈独秀立传，在很大程度上坚信——有时简直是依赖——读者融会贯通全局的解读力，导读的关键是设法找到并引用那些历来不是被禁就是不太被重视又确能表达传主心态和历史真相的资料，藉此可增强解读兴趣，并提高传记的信实程度。一九二二年十月，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尽管在一些传记中语焉不详，有的竟至不提，毕竟是众所周知的谱记，但是陈独秀曾主动要求去莫斯科以及他在大会上的遭遇，恐鲜为人知却是信史。

在一封被陈独秀预测出“孙(中山)恐不能制陈(炯明)”的致维经斯基的信中，陈独秀提出“我很希望九月能到莫斯科一行，但内地工作实在离不开，恐不能如愿”^①。陈独秀希望九月成行是共产国际将于十一月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九月的中国，中共二大已经结束，但马林强制提出的国共党内合作一事仍然遭到中共领袖们的拒绝，无论在二大前夕发表的中共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在二大“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中，以及陈独秀与离沪赴莫斯科的马林的交谈，都没有党内合作的可能性言行。但是，当马林七月底从莫斯科再回中国召开西湖会议强迫中共接受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共产国际指令后，陈独秀的处境——也即是说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先生们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地差劲儿了。马克思及他与恩格斯完成的马克思主义，本应是达到建立独立民主自由幸福祥和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乃至达到“世界大同”的目的，虽主张巴黎公社式的暴力革命但是民主和自由仍然是政党行为准则，遭受国际帝国主义集群攻击的新生苏俄的环境，迫使列宁采取一党专政和绝对服从的纪律约束。这一手段也被共产国际组织所采纳，参加国际的各国共产党提不同意见或修正部分决议草案是允许的——这是受集中制制约的民主极限，一旦形成决议就不容丝毫的反对和不同意见，若不遵守，就是修正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敌人。陈独秀之所以被马林制服，根本乃在于马林有列宁、苏俄和共产国际这强大的物质力量做后盾。于是踏上俄土的这匹野马得收收笼头，但能被制服吗？

^① 《“二大”和“三大”》第55页。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十一月五日于彼得堡开幕，四天后会址移往莫斯科，于十二月五日结束，其中套开少共国际三大和赤色职工国际二大。

为去莫斯科，陈独秀于九月离开上海到北京，中共中央机关亦迁往北京并决定陈出国期间中央局委员长由组织部长张国焘代理。中共参加国际四大代表团由陈独秀、刘仁静和王俊组成。其中刘是 S. Y. 代表，王是工会代表，他只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二大。据刘仁静回忆，他们三人化装成商人经奉天（沈阳）中转后抵达哈尔滨，由俄国人协助转车到满洲里，再由俄国交通用马爬犁偷渡国境辗转到了赤塔，才登上西伯利亚大铁路，列车一路走走停停一个多月，历尽千辛万苦赶到莫斯科，彼得堡四天会议已经结束，十月革命庆典亦没有赶上，陈独秀等三人和派来当翻译的瞿秋白住在“国际大家庭”琉克司旅馆。刘仁静说：“共产国际四大的基调与历届大会的基调有所不同”^①，为什么不同呢，据说前三次大会开在革命高潮期，工人运动前景看好，这次会议“则是在反革命发动进攻的情况下召开的”，不说低调至少调门儿不高，还多少使代表的心情沉闷烦躁，这当然是我们的分析，实情恐也只得如此，当时曾被列宁欢呼过的德国革命和匈牙利革命已被镇压下去，亚平宁半岛不宁，革命形势急剧下泻，开幕前不久，未来的国际公敌墨索里尼率领他的黑衫队党徒向罗马进军，竟然没有受到抵抗，乔里蒂政府垮台，国王任命墨索里尼执政，他等着德国伙伴希特勒上台共同向全球施法西斯暴政。参加国际四大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会后被迫流亡。这种国际形势下，大会倾全力投入研究并发表各种各式的支持欧洲革命的宣言、决议、草案、呼吁书，在形成的四十三个文件中，除共同性的各种决议，欧洲问题超过三分之一，在唯一的《东方问题指导原则》（附件九）中提到中国却没有内容，尤其使人难以理解的是《指导原则》中的第三大项《土地问题》一节，只字不提中国！指名提到的是印度、波斯、埃及、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诸地。真不知陈独秀看了这些文件感觉如何，他又怎么弄得通过去国际执委会为土地问题向中共一再发文件和指示，而在东方问题的“国际指导原则”中连一提的资格都无。历史证明，只有中国才为解决土地问题与共产国际发生过对立，也使中共内部发生对立，那些一再受到重视的欧洲、美洲和东方几个国家的土地问题，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方式予以调节解决的，谈土地问题而甩开中国，真是一个最大的讽刺。这是大会的总的理论原则，我们还将深谈此题，现在先谈谈大会的气氛。

按刘仁静的说法，会议的中心人物是列宁，“各国代表都有要见见列宁的强烈愿望”，因此，列宁“深入一些小组，和许多代表广泛接触”，真是十分遗憾，“广泛接触”中

^① 《回忆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载《党史研究资料》第3集第190～21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

没有中共代表团。列宁曾亲切接见过参加共产国际一、二次代表大会的刘泽荣(绍周),他与国内共运无关;三大时曾在会场邂逅瞿秋白,后来又与这位“东方稚儿”交谈过,当时瞿虽是“党员记者”但与中共亦尚无联系;与此同时,列宁还接见过参加远东劳大的中共、国民党和工人三方代表张国焘等,与他们亲切交谈多时,甚至还曾多次接见过列席三大的社会党江亢虎,惟独由中共领袖领衔组成的最高规格的代表团,未受列宁接见,甚至连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也无会谈的记载,这在当时,是意外而又尴尬的,陈独秀没有留下回忆,但时年仅二十一岁的刘仁静显然沉不住气,直到六十年后的回忆中仍不免耿耿,“我们那时原抱着很大希望参加大会,可是在大会期间,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也和我们一样无非是一般参加会议,共产国际领导对他既没有什么特殊礼遇,也没有安排什么个别交换意见。”大概不必再说什么以证明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了吧,所谓“老子党”的说法满不是牢骚一句。第三国际一成立就存在的。不过,以上还只是情绪,时髦一点的说法是会议“花絮”,一谈到会议日程,谈到理论问题以及决议案诸重要方面,中共代表更是不堪受气。

共产国际四大有五十八个国家的六十六个组织的代表四〇八名(三四三人享有表决权,六十五人有发言权),还有意大利社会党、冰岛工人党和蒙古民族革命党三个非隶属国际的“其他政党”和美国黑人组织^①,从参加正式组织之多代表人数之众中分析,中国共产党虽属新党,但无论如何应该属大党行列,而且共产国际选择了三个渠道(北京政府、吴佩孚和孙中山)要中共投入社会革命,更不惜要求中共降低施政施党纲领以适应绥靖中国的反俄势力,那么又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冷遇呢?这就又得重提马林作于莫斯科的《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说“重提”是由于前几节中曾一再引用过这一报告,只是把其中的若干内容故意留在这儿发布,实在是为本节专谈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设下的解读联网;俾使读者对共产国际为达到国共合作目的而如此轻慢中共和他的总书记,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认知。

总括来说,马林的这份报告是极其片面的:一,贬低工、农和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二,无限夸大国民党的革命性;三,对中国共产党做了极不严肃的贬损。马林报告劈头就说他在上海工作得很不顺利,“这儿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但却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工人运动”,由于“农民群众对革命完全漠不关心”而在“政治上不具什么意义”。他认为“随着凡尔赛和约而兴起的知识分子中的巨大骚动(指五四运动——引者)已成为过去,学生运动的领袖们由于中国政府给予留学机会而纷纷出国升学,结果,学生组织已失其意义”^②。经过三个月的南北之行,马林对中国的工农运

^①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第408页,三联书店1965年6月第1版。

^②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1页,下同。

动尤其是学生运动现状竟然如此悲观失望！那么中国共产党如何？这位参加筹建中共的特派代表说：“一九二一年七月，各地小组的代表在上海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加入共产国际，尽管它仍然作为一个宣传团体会更好一些。”在报告的另一段中称中共为“小团体”。在贬损中共的同时则把孙中山及其国民党说成是一个联系知识分子、进步侨民、工人和士兵的“工人党”，说：“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不仅孙中山，连其他国民党“领导者们在广州支持工会，在罢工中常站在工人一边”。马林还听孙中山“亲自对我说他认为他是一个布尔塞维克”，共产党是“宣传团体”、“小团体”，国民党反倒是其领袖是布尔塞维克的“工人党”，它在广州支持工人大罢工，而“广州的共产主义团体却不和罢工工人联系，也不支持罢工”！原来马林是抱着轻慢中共的情绪把中国革命的主力倾斜在国民党方面而提出国共合作的。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马林的这份报告在共产国际四大上是否散发，参加本次大会的陈独秀，还有刘仁静和瞿秋白是否见到过这份严重失实的报告。但是马林报告显然影响着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再加上本来就不重视东方殖民地革命的国际总倾向的会议议程，陈独秀大概会后后悔前来参加的罢。

共产国际四大共开全体会议三十二次，其中第十九、二十两次会议讨论殖民地革命问题。^①第十九次会议一开始，主席突然宣布限制指定发言人的发言时间，引起了部分代表的不满和抗议。使中国代表更为难堪的是本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执委会没有安排中国代表发言，临时提议可否为中共在下次会议安排发言。作为东方大国的共产党总书记率领的代表团在讨论东方革命的专门会议上竟然连个发言都是临时提议的，不禁令人齿冷。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二次东方问题讨论会就更热闹了，会议是在宣读抗议书中开始的：“参加签字的代表团在此抗议，主席团和大会在最后时刻缩短了发言时间，由此说明他们对东方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应当说，当时的共产国际及作为东道国的苏俄党还有点儿民主作风，不然是连抗议声也听不到的，正因为有这么点民主作风才让历史研究者在足足七十年后的今天明白：共产国际在运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初期，没有重视东方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更谈不上对中国的问题予以特别重视了。令人费解的是当这份在一定意义上主要是呼吁国际重视中国革命的抗议书由十四国共产党代表团签署时，中共代表团竟没有签名。陈独秀的刚烈性格毕竟执拗不过二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的战略目标。二十年代的共产国际，由于苏俄革命受到严重孤立和受到列强侵略的国际大环境影响，它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欧美各国工人运动上。在东方，受到重视的主要是与

^① 关于这两次会议的全部记录和下引的拉狄克的报告均引自《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2册第707~80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苏俄有边疆关系的波斯(伊朗)、土耳其等中东国家;在远东,共产国际的注意力在日本和朝鲜以及英共关注的印度、荷共关切的印尼诸国。共产国际当然也并不是故意轻慢中国,是由于共产国际(包括苏俄政党)对于中国革命的总体战略思想尚未形成,提不出什么行之有效的计划。正在其时,马林的报告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及本次大会主席团一个相当大的影响,总算为他们找到了可以合作的老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国民党,完成了中国革命的总体战略思想,偏偏陈独秀及他领导下的中共反对共产国际的决定,当然就得治一治中共了。

抗议尽管抗议,由执委会已经决定好的议事日程是“必须遵守的”,但临时提议让中共代表在第二十次会议上发言一事获得了通过。第二十次会议由美国代表卡尔任主席,十四国抗议之后,英国代表发言,接着是中国代表发言,共产国际会议规定用语是英、法、俄、德四种,陈虽通英、法文,但口语不行,瞿秋白通英、俄文,但不是正式代表无发言权,于是刘仁静上台用英语代表陈独秀在规定的时间内讲了中国革命和中共政策的一个短如兔尾的概况。这一讲话至少有两处明显与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相左。不必介绍,只要听听拉狄克在本次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结报告就可了然。共产国际的执委会书记拉狄克在报告中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简直出言不逊:

同志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中国同志在这里说,我们已在整个中国牢固地扎了根。我却不得不说:尊敬的同志,在工作开始时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这项工作,这是好的,但是毕竟应当看到实际情况,我们的中国党是在中国的两个部分发展起来的,彼此是相当独立的。在广州和上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因为许多人认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干预像罢工这样平凡的事情呢?那里我们有许多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去研究孔夫子一样,几个月前还是这个样子。由于孙中山倒台(指陈炯明叛变——引者),革命事业本来已在华南遭到一次打击,它(指中共南方组织——引者)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成为强大的力量呢?在北方,一般说来党是弱小的,只能依靠铁路工人,你们在那里怎么可能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呢?

讽刺挖苦的讲话中明显残留着马林报告对中共的不满。这样的指责似乎还不够,拉狄克继续说:

塔尔海默同志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不要事先夸耀胜利。这句话很好,

正像中国古代圣贤的话一样，值得学习和好好理解。……共产国际对西方的共产党说：到群众中去！而我们对你门讲的第一句话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者书斋，到群众中去！……

真难想像坐在台下听训斥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心中是什么滋味儿。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拉狄克教训人的口吻，而在于拉狄克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的身份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家集聚一堂的会议上宣布，中国共产党幼稚可笑到用读孔夫子书的方法把自己关在书斋中读马克思的书，现在拉狄克要把中国同志轰出书斋，轰到群众中去。本文没有必要也不具有研究拉狄克全文的任务，其实拉狄克对于中共和中国革命的轻慢态度倒在其次，重要原因在于他对中国南方革命形势和中共的对策，尤其是他对北方吴佩孚的策略、革命形势和中共北方党的对策作了错误的估计。而且一股脑儿地以此为据指责中共。历史真地是在前进着，不必今天来验证拉狄克的讲话，因为拉狄克报告之后两个月发生的二七惨案证明了拉狄克——当然是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中国政策——的报告是很错误的，这在前面已经涉及，只欠在此作一补充：拉狄克是以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吴佩孚政策开始他的中国问题的报告的。可见这是他的得意之笔：

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事件的过程吧！当吴佩孚军阀同张作霖打仗时，他有长江一线和那里兵工厂作后盾，但他没有掌握北方的铁路，控制铁路的人被日本人收买了。他是怎么办的呢？他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寻求支援，共产党派了一些党代表给他，在战争中间，党代表牢牢地掌握了铁路，供在那儿进行革命斗争的吴佩孚部队使用……后来，工人向吴佩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也使这些要求部分地得到实现。由于这样的支持，由于革命的资产阶级力量实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的同志就能够在华北的工人群众中站住脚。

拉狄克还以此作为重磅炮弹狠狠地轰向“尊敬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先生们”，他说：“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总是对我们说：傻瓜，你们不懂得，有些恩维尔帕莎、有些吴佩孚实际上一再出卖了你们。……你们反对统一战线。但历史却和你们开玩笑。”二七惨案一发生，吴佩孚一反水，拉狄克反倒被第二国际反弹回来的重磅炮弹击中，自认晦气当了一次“傻瓜”。无论第二或第二半国际有多大的错误，他们反对共产国际施行的土耳其政策和中国的联吴政策，却是正确的。对于陈独秀研究来说，共产国际的极右的联吴政策，难道没有渗入在胁迫陈独秀联孙政策中吗？精通马克

思主义和巴黎公社教训的拉狄克们怎么连马克思代表国际工人协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次宣言都忘了呢？这么一说，也许不必再辩论国共合作过程中是共产国际指导右倾还是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了吧。这对于本传可是关键性质的理论走向啊。

共产国际四大成立了二十个各种问题的委员会，陈独秀总算选入“东方问题委员会”参与制定东方问题的提纲和议决，但在委员会中起到作用了吗？前面已经作出答案，笔者不言，读者自明。

陈独秀真可谓之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但是这次去莫斯科对于陈独秀来说不失为一次在红都长见识开眼界的机会，似乎更增强了他一直认为中国革命要由中国人自己干的独立意识。

陈独秀在莫斯科期间办成了两件事，一是复函赵世炎等留法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派，同意“旅欧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 S. Y.，为统一起见，建议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法国方面接到陈独秀复函后于次年二月在巴黎召开会议一致同意少共改组加入中国 S. Y.，但名称则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陈独秀还建议赵世炎和旅法学生力争早日回国参加革命。不久一部分学生直接回国，一部分转到莫斯科入中山大学继续深造。旅法勤工俭学事业对于中共和中国革命输送干部一事大体上在一九二四年结束，形成了中共高级干部组成中的欧洲派。人员众所周知。陈独秀赴俄办成的第二件事是建议瞿秋白回国，瞿欣然同意并同陈独秀一起于十二月二十一日离开莫斯科踏上归途，陈独秀于次年一月十日回到北京，瞿秋白稍迟数日抵京；他们是在满洲里苏俄一侧分手的。

陈独秀回到北京几乎是行囊甫定，就发生了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中的那些决策者们绝不愿看到悲剧——二七惨案。陈独秀立即召开中央会议对中共成立后第一次工人惨案予以总结，派张国焘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二七事件并请示善后，共产国际发布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流血事件告中国铁路工人书》，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其他举措。

张国焘很快从俄国返回上海，正遇到躲在上海惊魂未定的李大钊，谈了些什么，不清楚，总而言之，李大钊作为北方党直接参与联吴的负责人会对共产国际的“多头外交”有所醒悟的。我们现在仍无资料可以证明因受通缉而从北京逃回上海的南陈与北李是否就二七事件交换过意见；因为“二七”后陈在京召开中央会议时李刚从武汉逃到上海，住在他的同乡孙洪伊家，而孙又是吴佩孚的幕僚。也许双方都无法谋面。不久陈就去了广州投入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的工作。这就联上了前面所述的历史。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还没有完，通过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等的工作交往仍发

生联系。从理论上说，陈彻底断绝与共产国际与苏俄的关系，是他走上了以托洛茨基理论指导中国革命之路。这时，包括拉狄克在内全都成了托派，受到斯大林的残酷镇压。

从陈独秀投入无产阶级革命到二七惨案，若按多少有点儿学究气的“思想分期”，似乎可以作一小小的结论——

二七惨案太惨，又惨得太突然，由于它发生在中共正为国共合作与共产国际亦与国民党发生争执和矛盾的关键时刻，无疑对中共对社会革命发生了极不良的影响。工人一度意志消沉，与党与进步力量与深入工人群众的知识分子疏离，使中共的工会工作陷入困境，一直做工人运动的北方党亦蒙受孤立，这些不幸给陈独秀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负面效应。据张国焘回忆，以上种种消极因素“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共内部。陈独秀先生就不只一次说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和带有流氓无产阶级色彩。他说：当职工运动进行顺利的时候，这些工人都是可爱的英雄；但一遭挫折，便原形毕露出来。邓中夏先生对陈独秀先生的这种态度大为不满，在他后来所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斥之为取消主义的倾向，指他‘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是工人阶级没有力量，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的理论就在此完全形成了’”^①。时在主编《向导》的蔡和森亦对陈懊丧于工人落后的言论很不满。取消主义或机会主义是苏共把托洛茨基作为修正主义政党派别予以批判时的严重的理论错误。邓中夏提出陈在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就“完全形成”取消主义思想，这未免过早亦嫌武断，但也确实说明了在农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制度阶级矛盾的右倾思想，这在前面分析建党前后陈独秀思想时曾多方面提到过：疲软的资产阶级造就不出坚硬的工人阶级。应当说，这是一九二三年陈独秀的真情实感。我们之所以在肯定邓中夏批判陈独秀的同时稍持不同见解，乃是因为在中共三大时，陈与完全倾斜于国民党的马林有较大分歧，而马林那种“将中共完全融化在国民党内”的思想才是不折不扣的取消主义，也导致了鲍罗廷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认为：接受了二七惨案副作用而贬低中国工人阶级革命性，与取消主义、机会主义有质的区别，陈独秀仍然是当之无愧的工人政党的领袖。这个结论可以从惨案发生后陈独秀的文章中得到验证：

必须认定劳动阶级是国民运动中的重要部分……知识阶级诸君啊！
……你们切勿想单靠你们决战的舆论和学生运动来打倒军阀，你们的舆论与运动倘不中途退却，固然也可以造成革命的空气，并且你们当中富于革命

^① 张国焘转述的邓中夏的批评，参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96页《中国共产党内的取消主义倾向》，东北书店1948年6月再版。

精神和革命理论的分子,自然在革命运动中恒站在指导地位,但是你们离开了工人、贫农的劳动群众便没有当真革命的可能;这是因为被压迫的劳动群众之现实生活的要求及阶级的战斗力,都具有客观的革命条件,并非是些浪漫的革命分子可比。^①

取消主义者在血的面前能对知识分子吐出这些“金玉良言”吗?读者不妨自行查找当时的各派报刊,包括斥陈者在内,有谁写出如此悲愤至于喷出血丝的话来着!

事后,不顾历史真相,讲不负责任的话,讲漂亮话,把秽语泼向被封住嘴的陈独秀身上,不禁令人感到历史实在是太阴冷了!我们就吹点儿热风暖暖陈独秀的心吧。

不祥之兆的一九二五年

读者看了这一节的标题,就明白,迅猛发展的形势,已经没有时间让我们细谈陈独秀的思想分期了。

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苏俄对华政策不变,进入斯大林时代的共产国际可以任人评说,但对中共对国民党对北伐对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命运的反帝大业,这既定的援华政策似乎比列宁时代更热了,这是与苏俄的生产力有所发展和急于开发西伯利亚的经济需要而使外交政策向中国倾斜有关。还应指出,当时莫斯科远东政策中的支持日本和朝鲜的工人运动和民族革命已彻底失败,使斯大林全力援华——这里用“援华”这个复合词为的是表示笔者的一个观点:苏俄的中国政策已经越出支持工人运动和中共革命,成为支持军政大权完全握在国民党手中的北伐统一大业。这一点,似乎与以北京政府使节名义活动的加拉罕的任务也有矛盾,在各种矛盾中得益的是蒋介石和他的事业。有一部鲍罗廷传中指出:“各方面,包括莫斯科在内,都把革命向前蓬勃发展归功于鲍罗廷的策略”^②,斯大林与鲍罗廷之间有了热线。但陈独秀于此是不满的。

苏俄政策不变,国民党呢?能保证联俄后的孙中山的新政见和新主张被他的继承人认可吗?

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客死北京。原来一直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不满的国民党人开始动作。

七月,戴季陶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此书成为一贯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

① 《怎么打倒军阀》。

② D. 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第17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党右翼们再次掀起逐共浪潮的理论本源。这是部被陈独秀的《给戴季陶的一封信》等中共党人批出名的著作,他还有两部哲学著作:《民生哲学系统表》和《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奠定了他后半生反共经历的“戴季陶主义”并据以殉职,这位曾经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秀才倒也是条硬汉子。^①如今已是不必再评鹭什么“主义”,“哲学”了,在中国主要是行,当戴著刚推向社会,无论是姓国姓共的先生们才刚开始拜读——八月二十日,协助孙中山制订国共合作的“中山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央真能继续中山先生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首领”^②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国民党的铲共大业首先在党内拼出了个右胜左败,镇住了国民党左派,吓退了中派,也使中共大为震惊,到了用阴谋学派手段解决政治矛盾的极地。回过头来再翻翻陈独秀批判戴季陶的“根本错误”“乃是只看见民族斗争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斗争的需要”(陈独秀还就此问题与戴季陶进行过面对面的争论)，“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的组织”之类的话^③,就感到太苍白无力,书生气十足了。可以说廖仲恺之死,是国民党分裂的开始;或者如罗亦农所言:为中国南方革命即北伐的发展史划分了一个阶段。

正当中共中央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等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维经斯基忙于震撼世界的“五卅运动”胜利后的形势和对策等一系列的党务政务时,传来了廖仲恺被杀身亡恶耗,同时迅即传来鲍罗廷决策,请汪精卫出面组成了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的“廖案处理特别委员会”,这个在廖被刺的当天晚上鲍罗廷作出的匆忙决定,显然完全打乱了中共中央的时局决策,而且鲍是作了决定后请陈独秀就范,连个协商的余地都无。四天后——八月二十四日又传来,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又被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在当时这是个无法无天大权在握的职司,因为“特别委员会有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三权中蒋介石握军事和警察两权,蒋介石很快就把许崇智清洗出三人委员会,剩下那苍白无力的政治权握在人亦苍白无力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手中,根本不是蒋的对手,又过了两天,粤军正式改为国民革命军,共分五军,蒋介石兼任第一军军长。到了此时,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从军队系统角度,已根本无法约束蒋介石,这是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委派的代表双手捧给的:“是他(指鲍罗廷——引者)把蒋介石推上了这个最高、最有力的领导地位,对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统一战线政策来说,这是历史错误”^④,对于蒋介石来说已经跨出登上党国领袖宝座的的第一步,而且畅行无阻,因为前面有强大的俄国军援为其开道。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时代

① 1949年2月11日在国史馆馆长任上自杀于广州。

② 亦农《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局》,载《向导》第130期,1925年9月18日。

③ 陈独秀批判戴季陶大小文章有多篇,引文出自《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④ [德]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141页,三联书店1985年6月第1版。

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犯下的无可挽回的严重错误。

对于中共来说,一九二五年一月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系列反帝救国、统战、北伐等等决策,五卅运动胜利而重又高涨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广大市民阶层的爱国反帝运动,省港海员大罢工对香港广州带来的革命气氛等等,全都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之夜的鲍罗廷决定中大大地降低了革命作用,甚至可以说是被摧毁了。难道又是一个巴尔托罗米奥的黑色之夜?

国民党产生了新领袖蒋介石,从政治观点,就如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之后中共选择了毛泽东,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选择。

一九二五年八月后蒋介石真是踌躇满志,为让国民政府总顾问兼廖案特别委员会顾问鲍罗廷放心,他把大儿子蒋经国送往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这是十月十九日,同去的党国高干子女二十余名。蒋介石“四一二”倒戈反共后,时为共青团员的蒋经国曾发表声明,说乃父“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这个重大事件近年被一再渲染,其实蒋经国发表的声明不久就在仍未易帜的武汉国民革命时期的报纸上全文刊登过^①,历史真是太健忘了,至于蒋经国本人日后的作为,那是别一部史书的事了。

国民党急转直下的右倾势力与中共一再发生磨擦,以及鲍罗廷作为广东军政府总顾问兼廖案特别委员会顾问的一系列的作法,显然没有经与上海北京两地的中共中央干部及维经斯基商议^②,甚至莫斯科也是事后获悉诸如八月二十夜的重大决策,从中共方面这实在太突然了,加上戴季陶主义及比戴更右的若干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正在筹划铲共的西山会议,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地点在北京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这次会议也称为中央执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它是五卅运动以来全国社会革命形势高扬和国共面临破裂的强烈对比期间召开的一次非同寻常的重大决策会议,单议决案就达十三项之多,内五个为全党性质问题议决案,其中有《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责任》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两大议决案,这还是中共第一次发布《告农民书》的中央会议。但是这次非寻常的全会却有点儿神秘兮兮——我们指的并不是会议开得神秘,指的是几乎关于这次重要会议议程的研究资料和回忆,连多少人参加这次大会都无资料可确凿资证,按四届一次执委选出的中央局委员五人,连同组织、宣传、工农和中央职工三部一委的领导四人合共九人,据九个地方各委一名参与地方问题议决案推断,本届扩大会可能参加人数约为二十左右。但

^① 1927年4月24日汉口《人民论坛报》。

^② 《我的回忆》第2册第460页。

是据各种资料综合计,其中中央委员张国焘自述没有参加,中委蔡和森在莫斯科,执委中最有必要参加的谭平山和张太雷亦未到会,最令人惊奇的是李大钊没有参加。^①共产国际方面,驻上海的维经斯基莅会,有资料说鲍罗廷也参加了会,如果确凿,则会议就更热闹了,因为鲍罗廷在广州受到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攻击,“国师”地位不稳,甚至“成了主要的暗杀目标”^②,但广东中共方面却引起陈独秀的不满,说鲍及广东党方面(当时的区委书记是陈延年)“忽视了整个反共阵线的力量,他们偏处广东一隅,企图以一部分革命军人、省港十几万罢工工人和二十万有组织的农民来对抗整个帝国主义、北方军阀和一般反共势力,显然犯了低估敌人实力的错误”^③。如果我们也用传统的简陋政治方法归类,是鲍左而陈右,由于共产国际方面跟着鲍罗廷盲目乐观,甚至于还抱怨“为什么鲍罗廷不向着全国革命的目标前进得更快些呢?”显而易见陈独秀在拉狄克们的眼中就更右了。应当承认,鲍罗廷在广州做孙中山的工作、改组国民党、国民党一大、镇压商团叛乱、打倒陈炯明、支持省港罢工,以及把涉嫌廖案的胡汉民“请”到莫斯科“考察”^④等等都是有利于北伐的,他的错误乃在于确实如陈独秀所指的轻敌,而致命的错误则是启用了蒋介石并给予了军警大权。如果知道会议议程和争论,对于研究陈独秀在本次会议上建议退出国民党的惊人之见是极有益的。在不能做这样全面的研究下,我们就听听后来陈独秀的回忆和感叹吧,他说:

在此时期(即戴季陶主义及酝酿的西山会议——引者)前后,中共所染机会主义还不很深,所以还能够领导“二七”铁路大罢工(一九二三年)和“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都未受国民党政策的牵制,并且有时还严厉的批评国民党的妥协政策。“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一抬头,便惊醒了资产阶级,戴季陶的反共小册子即应运而出了。是年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委员会提议: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势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及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们一致严

① 据李大钊谱记和宣侠父的《西北远征记》第30页,李大钊其时与国民党中执委兼北京执委王法勤、丁淮芬在张家口做西北军与国民党联合的又一策反工作。

② 《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第177页,

③ 《我的回忆》第461页。

④ 鲍罗廷原想予以惩处,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干涉加上共产国际方面怕惩胡而激怒右派,只得派胡去莫,甚至请他参加共产国际的若干会议。胡汉民于1926年4月归国,后来参与四一二清党。

厉的反对我的提议,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①

这段最清楚不过地说明十月扩大会的争论是相当激烈的,因为涉及至少跨四个年头(西湖会议到四大)国共合作的重大决策是否正确,首先共产国际两个代表决然反对退出国民党,中共方面瞿秋白肯定也是反对的,同时这还关系到共产国际与中共,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毁于一旦,这正是莫斯科决不愿意见到的败相,除了关系到苏俄与中国的关系,还关系到苏共党内的斗争——因为当时打击托洛茨基已经从苏共党内扩展到共产国际大范围,一九二五年一月的中共四大上就为此而作出了《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决议案》,而托洛茨基就不同意国共合作,从理论上与陈独秀是共通的。因此,陈独秀在本次扩大会上处在劣势地位很孤独,但决不是革命偶遭挫折贸然而定要退出国民党的,事后,他曾后悔地说:“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以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这些写于被开除党籍不久之言,如今读来仍感当年陈独秀未能坚持己见的深深懊悔。

在以往的研究中,都持此届扩大会议标志着陈独秀反对共产国际国共合作决策的机会主义的开始,退出国民党是极左,放弃合作中的领导权是极右,左右齐全。有的批判甚至断定“由此以至武汉时期就实行陈独秀主义之机会主义实际政策”^②。最早提出批判陈独秀主义的是蔡和森、华岗,稍后的是王若飞、周恩来等,他们大体上说是见证人,有一定的权威性,然而对于历史就未必如此了,因为他们全都是在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共被封住嘴巴、政治上处在绝对劣势时的批判或迫于斗争形势需要而写。今天我们对十月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提退出国民党一事的研究,就不能跟在历史局限性极大的批判后加注释的重复了。张国焘曾一再反对国共合作,也是最早指出陈独秀自始就缺乏合作革命信心的干部之一,曾揶揄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上“一直以客卿自居”。这在一九二四年张说是有点道理的,他错在一不想合作,二合作后放弃领导权。但是一九二五年戴季陶主义亮出,陈再度提退出国民党,就未必是政治上原则性的错误,而只是策略上甚至仅仅是时间上超前而不合适:此时退出不利于鲍罗廷把汪蒋联盟作为国民党核心的既定政策;旋而也不利于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等据鲍策制定的团结左派不断地向右派进攻的所谓“剥笋政策”。假如廖仲恺被刺后鲍罗廷不当夜作出严重错误的“国策”,退出国民党的意见是可以考虑的。当然这也改变不了陈独秀被划入右倾机会主义或取消派的厄运,因为共产国际是坚决支持国共合作的。

中共四届二次扩大会议刚结束,北京西山顿时热闹起来,十一月二十三日,那些

① 《告全党同志书》。

② 《蔡和森文集》第811页。

显然是被“剥笋政策”列入被剥无疑的林森、居正、邹鲁、谢持、张继、石瑛、邵元冲、叶楚伦以及沈玄庐等约十五名元老在碧云寺也就是等于在孙中山灵堂前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这就是著名的“西山会议”。西山会议持强烈的反共主张，他们反共反到反对戴季陶的反共策略派，把从上海赶来开会的戴季陶痛打一顿后送到菜市胡同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令其扶痛反省。西山会议公然提出本次会议将一揽子解决共产党问题，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以及开除汪精卫党籍、国民党中央党部迁上海办公，取消并停止广东中央执委工作和行使权限。西山会议可谓是马拉松会议，共开了四十三天，实际上不在开会而是国民党右派与中共决裂的总动员，会议一直开到把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中的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等中共党员开除出(国民)党才闭会，从国民党立场真是坚定过了头，其结果当然暂时不能为国民党所接受，那是场闹剧，等于是否定了孙中山！可见不祥之兆的一九二五年虽然是在西山会议的反共声浪中度过，但胜利者却是稳健反共的戴季陶派，这就是历来不少研究家们把陈独秀在四届二次扩大会上提退出国民党右派与戴季陶主义的逐共捏在一起批的政治原因，说“戴季陶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上要把共产党员撵出去，陈独秀主观上是为维护党的独立性，摆脱国民党‘牵制’，戴季陶是自觉地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陈独秀是自愿退出和放弃领导权的争夺。戴陈二人的出发点尽管不同，但殊途同归，结果是使四个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变成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党”^①。能不能只因是“殊途同归”而把一个坚定的反共理论家和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捏在一起批？动机和效果统一抑是唯效果是从？“效果”的历史真相确否如此？这类是是非非，真也不必再认真争个面红耳赤了，从感情上就难以通得过的嘛。一九二五年底的国民党，有戴季陶的理论开道，有蒋介石的枪把子，与疲软到站不住的“国府主席”汪精卫的印把子联盟；还有——实在令人遗憾却不得不指出的是——在苏俄的强力支持下，广州国民党的的确确在“变成清一色资产阶级政党”，西山会议的反共是昔日进的策略错误和超前的时差错失，三个月之后，一场真正的反共地震，会不会震得昔日那些苛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伙伴和当今的研究家们略为清醒些呢？

陈独秀要五千条枪，不给！

在传统观念的历史上，西山会议被认为是一个派别，即国民党右派集团召开了一个兴风作浪破坏国共合作的会议。笔者以为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史学，尚缺乏

^① 任建树《陈独秀传》第305页。

深层的本质的认识,前者只是描写,后者才是研究。从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受到工人阶级反帝觉醒的重大震动的政治效应角度,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是决定中国之命运而崛起的一种思潮;代表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买办的官僚的大工商业豪富群体和乘封建制度末班车赶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的官僚大地主阶级欲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及其国家机器的政治理想日臻成熟,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只是最初的理论及其实践,这当然是要认真对待的。令人遗憾的是中共决策者,特别是有权左右中共决策的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没有认真对待,除了写几篇文章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举措,而鲍罗廷根本就不把它当回事,陈延年曾把戴季陶的这本小册子央人译成英文交给他看,鲍认为这是“戴季陶站在国民党立场说话,未可厚非”^①,好一个“未可厚非”!尤其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简直把它给忘了。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开了二十天。代表名额二五六人,中共代表超过一百约占三分之一强,谭平山、瞿秋白、吴玉章(大会秘书长)、毛泽东、林伯渠,以及高语罕等共产党人领尽风骚,李大钊未参加会却被选入二届执委会,入选执委者还有谭平山、林伯渠、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等多名,毛泽东、董必武、夏曦、邓颖超、许甦魂等进入候补执委行列;连同参加监察,宣言起草,党务审查,党章审查,宣传问题审查等委员会的,以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商务运动等等部办组织中的中共党员,国民党二大中的中共实力确实不小。大会又通过了向苏俄政府和人民致敬电,高呼“中俄大联合万岁!”(四日),向国师鲍罗廷致敬并敬赠上书“共同奋斗”银鼎一座,以表彰他“能尽政治委员高等顾问之职”(六日),最后是十三日下午二时,有二一一人参加的弹劾西山会议大会,审查结果大会决定将谢持、邹鲁“处以永远开除出党处分”;居正、石青阳、沈定一等七人科以“暂时开除党籍一年之处分”;对张继、林森等五人处以“书面警告”;对于“戴季陶拟由大会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处罚层次分明,不谓不严,最后是皆大欢喜,尤其是共产国际和广东的中共方面认为是确保国民革命胜利的一次盛会,据说只是受制于陈独秀所派代表张国焘(中共与会代表的党团书记)在大会上坚决执行陈的右倾决策而胜利不够大而已^②,当然这也不影响鲍罗廷在开幕式和别的场合一再号召去战胜去“Overcome”(征服)军阀及其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决心和对成功的预测。至于戴季陶则已受训令反省,西山会议则分别严处纷纷忏悔作鸟兽散,似乎一切均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鲍罗廷团结奋进的意志进行着。还使中共广东区委对上海中央意见满腹:右了,陈独秀太右了。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470页。

② 参阅《周恩来选集》上册第119页。

国民党二大后鲍罗廷回莫斯科述职，加伦将军去北方作冯玉祥的工作——这是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继吴佩孚工作失败后在北方开辟的又一联华战线，所不同的，这次是从国民党北伐决策出发的。

在国民党二大上，由鲍罗廷推荐而得莫斯科方面看好的蒋介石，出尽风头，元旦那天开幕式后的群众大会的主席台上，一个身穿将军斗篷身板笔挺的军人受到广泛的注目，这就是蒋介石，他是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会议，当然也是第一次以党的中央干部身份亮相，“军事领袖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汪精卫等为之失色。……在一般代表心目中，他与汪精卫是两个重心；前者是军事的，后者是政治的”^①。但不少代表心中有数，西山会议的潜台词是“尊蒋抑汪”，用这个来击破广东左派的联合中派打击右派的政治均势是相当奏效的策略；阴谋政治的突袭性最懂得军人的作用，果不其然，两个月后蒋介石只小施伎俩，汪精卫就灰溜溜地“出国考察”了……然而在二大期间，他知道在袞袞诸公面前，在汪精卫面前，在鲍罗廷和中共跨党政要面前应当保持何等样的身份，他心中有数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及他们派来的军政顾问们对自己的左派革命将军的印象很佳，蒋介石心中最明白不过的是附议弹劾西山会议派，只能给自己带来左的光环，被弹劾者决不在乎他在台面上的态度的，虽说不上是周瑜打黄盖，但引申开来的政治谋算是相似的。所有这些，在陈独秀成为托派后，又一股脑儿地说成是陈独秀中央的错误，周恩来一九四三年曾对当时的蒋介石篡夺军权有过能轻易夺回来的带有回忆性质的研究，他说：“在军队方面，当时的实际情况（指国民党二大前夕——引者），蒋介石的第一军只有三个师……因此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回击的办法是：“把我们的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我带着这个意见回汕头去，并等中央回电到后，立即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当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实现上述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等了好久，中央回电不同意。”^②如今，我们不必去深究周恩来与广东区委陈延年等干部制定这个信心十足“完全有保证”的计划是否有点儿脱离一九二六年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已经强硬起来的实际；也即是说“左”了。只要考虑一下，与蒋介石及其黄埔军校打得火热的军事总顾问加伦，和不久前提拔蒋介石为党国二号人物的鲍罗廷能不能同意周恩来计划，此其一；二，中共一百多个党员能控制党代大会选票和汪精卫的政治倾向吗？英国工党成了执政党，最后执的是哪个阶级的政呢？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山岳党人一碰上一七九五年热月反动，一下就成了少数派（被损为“鸡冠派”），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全都是教训吗？三，当时的“代帅”胡汉民和资深将军许

^① 《我的回忆》第480页。

^② 《周恩来选集》。

崇智因涉嫌廖案一个被“请”去苏联一个被派往上海,蒋介石成了唯一的军队统领,国民党再左恐怕也左不到逐蒋于军外的火候吧!最后是蒋介石的左派将军的灵光,无法使国民党左派(甚至不少中共党员)相信在一九二五年底他会是破坏国共合作的祸首。蒋是很会保护自己的,直到“整理党务案”之后,他在黄埔演讲时还特别指出国共两党不能发生冲突“这两种势力发生冲突,一定会使革命失败……”^①如夜莺般的歌声是很能迷惑人的。至于弃蒋而与汪精卫另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且不说在蒋军中的中共干部是数量很少又大多是政工干部,这支力量在蒋军中是保证国民革命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撤下”来另组军队,试问,当时有多少叶挺这样的将才,组多少个师呢?加上黄埔军校已牢牢握在蒋介石手中,拥汪精卫组织队伍,谈何容易,最重要的是汪精卫有无这种魄力呢?再则,把中共党员从蒋军中“撤出”,与陈独秀要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呢?综上所述,说因陈独秀右倾而不敢壮大左派力量,或认定北伐期间陈独秀不注重军队工作和武装斗争,是不符历史的,对于本传这是个严重问题,下面还将深入论述。

国民党二大闭幕不数日,北京《晨报》上有一则报道其中说:“十六日开十一次会议,选举二届执行委员会……其中著名共党之谭平山、李大钊等有名,惟无陈独秀”^②,没有陈独秀的原因在谈到国民党一大时已作过解释,此处不必重复,李大钊当选是孙中山生前遗训和他为人为事业为党忠诚所致,他没有参加这次盛会的原因是非常有必要谈一谈的。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和今年初的李大钊不仅没有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连在京召开的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也没参加,因为他正忙于前面曾提到过的苏俄在华开辟第二战场的工作。五卅运动后,中国南方从上海到广东(含香港)一线形势很好,加上鲍罗廷的团结国民党的成功的策略被无限扩大,使莫斯科感到南方一统天下已胜券稳操,就把力量向北方转移。从中国时局实情,五卅之后的北方(含东北)确是英美日等帝国列强发动政治攻势并按照各自的利益向军阀集团施加影响的最佳地区,列强各有一本经,但他们也有统一战线,是鼓动奉直两系军阀联合起来抵御国民党北上,力控南北割据局面,为此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集中主要攻势于北方,选择反对奉直的势力,“在一九二五年全年里,外交人民委员部都忙于向不受英、美和日本影响且可能对苏俄友好的冯玉祥和另外两名国民军将领献殷勤。他们这些主动表示还包括派遣一个苏联军事代表团以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③。中国方面执行联合

①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93页,档案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② 《晨报》1926年1月4日。

③ [美]H·塔鲁格《斯大林时代的共产国际内幕》第185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

冯玉祥反对张作霖的纯然是为了苏俄远东利益的这一棘手的任务又落在李大钊名下，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共中央曾为此作过全党性质的议决。只是服从“保卫苏联”的口号而已。

李大钊与冯玉祥早有联系，一九二五年三月，李大钊促成冯部与加拉罕交谈接受苏联军援、整顿军队以及派员赴苏学习等事宜的原则。四月，鲍罗廷即从广州专程来京并赴张家口与冯玉祥谈广东政府、国民革命北伐计划以及军援问题，派遣军事顾问、调黄埔军校学员入冯部和苏联军援物资的运输线路，据各种资料苏俄方面向冯玉祥总部和孙岳部胡景翼部岳维俊部派出军政顾问不下百数之多，其中相当部分是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和绝对精通军事业务的专家。李大钊还派出王若飞、宣侠父等中共干部协助顾问与冯部的联络和组织工作。为打通苏俄军援物资交通，李大钊还对内蒙华北一线的中共组织和革命团体作了很多工作，全部工作还有国民党北京支部徐谦等重要干部参加，以体现国共合作精神和消除冯玉祥对南方政府北伐军即将北上的疑虑。为彻底粉碎依仗日本势力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出卖东北的阴谋，李大钊还委派中共北方重要干部任国桢去东北作郭松龄工作，鼓动他倒戈反奉，到十一月下旬，郭松龄终于与冯玉祥达成联合反奉密约，十一月二十二日郭松龄部在滦州易帜“东北国民军”，入冯玉祥部并通电倒戈反奉。一星期后，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发布《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应当说这是成功的策反，苏联政府出于远东自身利益最大的愿望是拔掉卖身投靠日本的张作霖，显然全力支持中共北方局和李大钊的这次策反工作。但是在东北经营了几十年的日本帝国主义能袖手旁观坐失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得来的这块肥肉吗？当然不。于是采取坚决支持张作霖镇压郭松龄的策略，这就使受郭松龄包围处在兵临奉天（沈阳）城下惶惶不可终日的张作霖绝路逢生，这个土匪出身的无特操的东北王的赌注终于押对，他不仅同意日军直接参与战争行动而且还乘机借了三百万日元以备挥霍。一旦战场决战，正义与非正义之争就不得不让位于枪炮弹药，日军不仅出兵四万直接投入扫郭战场，而且还先后出动八十架次飞机对仅距沈阳不过百里的郭松龄司令部白旗堡狂轰滥炸，彻底打乱了郭部阵脚；又加上原亦投入联冯反奉序列的原东北军李景林部背信弃义再次倒戈反郭，使郭部腹背受敌；更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军队陆空进逼郭部陷郭于困境时，冯玉祥竟然违约，按兵不动。从郭松龄通电倒戈的十一月二十二日到郭松龄夫妇被杨宇霆手令枪毙后尸体运到沈阳，张作霖凶残地下令将郭松龄开肠破肚以祭他的“阵亡将士”的十二月二十四日，总共三十二天，革命英雄尸堆上又多了一个年仅三十四岁的青年将领。李大钊的这次策反以失败而告终，接着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发表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奉系中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张作霖的左膀右臂郭松龄，已同国民军签订了协议，停止反对解放力量，向张作霖开战，争取搞掉他。”又遗憾地指出：“在决定性时刻，

日本的军事干涉救了‘奉系’。”^①之后,什么话也没了。国民党二大上全体代表向全国国民发了声讨日本“公然出兵满洲,卵翼张贼,助长内乱”云云。中共亦相应号召全国人民举行反对日本和声讨张作霖的示威游行,北京还召开群众大会公祭郭松龄,李大钊发表演说沉痛哀悼,最后是冯玉祥在回忆中作了毫无实质意义的深自忏悔:“在这样一场恶战之中,我感受的苦痛,是没法述说的”^②,完了,全完。冯玉祥决不会想到(似乎历来的研究家们也没有想到)正是把张作霖倚重的郭松龄策反联冯倒张,给张作霖牢牢地套上向日本出卖东三省保住小朝廷的大汉奸帽子,致使大小二张恨透了李大钊,埋下了欲斩杀李大钊的祸根。明智若李大钊者,心中是明明白白的。北方是很难再有作为了。

事情还未了,郭松龄失败身亡,张学良任总指挥率兵六万向山海关挺进,欲把郭松龄部下骁将魏益三部赶出关外。战争开始时魏部还得到冯玉祥的支持,最后竟然是得到撤退到滦州的命令。当国民党在广州准备召开二大之际,张作霖和吴佩孚握手言欢,正是开幕这一天,基督将军冯玉祥通电全国宣告下野,打算到苏俄去,这又是通过李大钊和加拉罕联系后办妥的。看来,李大钊是陷入了这场毫无结果的联冯反张(作霖)倒吴(佩孚)的军事泥坑中根本无法脱身去广州。这全过程,陈独秀当然不与闻,更不必说参加意见,中共只有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执行上级指令的义务嘛。

一个外国的研究家说出了我们想说也能说然而却囿于禁忌不敢说的一些话:“沈阳之战(即日军直接参与护张打郭战役——引者)表明,苏联的政策更关心的是维护其在靠近本国领土的华北的利益,而不是依靠南方的国民革命来达到苏联的目的。”^③促使苏联定下这个对华国策的原因,分析起来一是绥靖北方以保卫苏联更现实更快捷,二是对南方盲目乐观。为挽救已经失败的北方政策,回国述职的鲍罗廷于二月中旬抵达北京与加拉罕等研究对策,其结果是除了想以更多的经援和军援支持冯玉祥外,别无对策,但冯玉祥至少已经心灰意冷,退出“公众生活”去苏考察的决心已定。然而策反冯玉祥工作并没有修正,因此,可以说,共产国际和中共还得上冯玉祥的当哩,而陈独秀于此是极为不满的。

如今真相接近大白,聪敏起来的人也许会向历史讨教,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几重关系,对中国政局的分析以及相应的一系列的重大决策,比如像加在李大钊和北方局身上先联吴佩孚(吃了大亏)后联冯玉祥(又上了大当),中共中央同意吗?有没有争论乃至反对,如没有,是不是苏联一意孤行?至少截止目前没有见过上海的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09页。

② 关于李大钊鼓动郭松龄倒戈反奉运作过程可参阅阎雅新《李大钊和冯玉祥》第92~124页。

③ 《斯大林时代的共产国际内幕》第185页。

中共中央和陈独秀的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言论和态度,事后也没有在他写的《告全党人民书》等文件中提及这些,可见所有上述这些都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单方面的决策。“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已经根据实用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理由认定,全力以赴、全心全意地支持国民革命太冒险。从俄国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共产国际的民族与殖民地政策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它与革命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这一套计划中,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只是个第三等的参加者,远不能参与关系到自己命运问题的决策。”话虽刻薄了些,却也是事实,就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来说,一旦当北方政策彻底失败,保持与国民党的联合,就成了唯一的援华路线,这就决定了共产国际必定会执行唯恐失策而使国共合作破裂、对国民党越来越右的政策,而对中共执行的是决不允许其退出的强硬的压制策略。一当苏联政府——通过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失败,其替罪羊必定是陈独秀,或者还赔上一个鲍罗廷。我们这个分析也许比上引的美国历史学家还刻薄,却也是历史。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就是段祺瑞执政在执政府门前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示威的学生队伍开枪打死打伤二三百号人而被鲁迅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广州军政府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接到将中山舰开到黄埔待命的电话命令,即卸却炮衣露械升火向黄埔开去,此事被苏联军事顾问发现有诈,急令李之龙返航,二十日凌晨中山舰返抵广州,然而为时晚矣,这就是国共破裂开始的“三二〇事件”或称“中山舰事件”。此事争论至今,似乎尚无定论。^① 我们可以“客观”一些,从蒋介石年谱和日记看看,“十八日,下午四时,在中央军校开会议,力主北伐。共产党作乱,傍晚,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十九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痛恨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本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②。从中可以理出:一,十八日当天蒋介石已知李之龙行动;二,次日下午四点以前已“密议”作好二十日“定变各令”。时间咬得如此之紧又工作如此严丝合缝,谁下令就不难作出“客观”判断了。二十日蒋介石密令开始执行,首先逮捕了李之龙,查封海军局,中山舰被警方管制,然后是包围由中共主政的正在与港英当局进行炽热斗争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

^① “我们再追想去年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当时孙文主义学会派欧阳格惠东生缪斌王柏龄等,假造蒋校长命令,骗李之龙开中山舰至黄埔,另一方面则报告介石先生,谓李之龙要蒋校长赴俄国。结果,造成了三月二十日的冤案。”引自彭述之《读了蒋介石二月二十一日讲演之后》,载《向导》第192期,1927年3月18日。文中孙文主义学会,当时黄埔军校中的右派组织。

^② 有关蒋介石对于中山舰事件的引文和态度均引自《蒋介石年谱初稿》相关日期中文。不另注。

武装被缴，逮捕了第一军第二师中共党代表和政工干部四十多人，还把周恩来软禁长达一天，包围了苏联顾问处和领事馆并缴了顾问处卫队枪械，另把刚到广州的布勃诺夫等全部苏联人的居处设岗监视其行动，最后是宣布全市戒严。一切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完成。请注意，鲍罗廷授廖案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广州市警察局长一职，此时可谓正中下怀。没有这一职务，行动起来就不那么方便了。

一切办完，二十日当天，“公曰：今日若无决心，岂能挽救本党，报答总理乎？”

蒋介石反共的第一炮打得响彻天宇，接着就任凭他摆布了。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解聘包括季山嘉、罗加觉夫等在内的几个不同意北伐或为蒋不满的苏联顾问，要他们回国；二十三日，汪精卫政治软骨病重犯，请长假离职（一度谭延闿接任）；四月十六日，蒋介石任军委主席，形成“谭蒋体制”，可想而知谁主国民党浮沉。待到四月二十九日鲍罗廷与胡汉民回到广州，过去的一切革命举措和左派的努力皆被蒋介石抹得干干净净。蒋介石谋略的另一面，他知道“三二〇事件”后虽已大权在握，但尚未获得全党的支持，而又离不开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方面对北伐的军援，于是他演出了一场周瑜打黄盖的剧，免去欧阳格海军军校副校长之职，亲自下令释放李之龙并予以安抚，鲍罗廷一来广州，他立即亲去码头接迎，又在各种会议上不时呼喊诸如“中国革命必须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一类甜蜜的口号。

三二〇事件是先后总共只三天两个晚上的突发事件，当时鲍罗廷、加伦等都不在广州，新来的布勃诺夫虽然位高至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但对广州情况毫不知情，中共广东区委也因陈延年去北京参加中央特别会议刚回来摸不清虚实，比如十八日那天“毛泽东问陈延年，陈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①。可见大家都处在丈二和尚的困境。加上中共中央在北京的特别会议刚结束，又没有接到广东方面的调查报告，可以说从三月二十日到四月底这四十天，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以及国民党左中右，尤其是蒋介石，三方都在听候莫斯科的决定。然而鲍罗廷回来采取的是向蒋介石让步的政策：承认现状，一切不变。代表莫斯科最高当局的令人沮丧的决定使蒋介石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明白反共的通盘计划不会落空了。他马上乘势进逼鲍罗廷，同时也投鲍所好高唱团结赞歌。退让的结果，首先受到打击的是国民党左派和靠近中共的进步势力。五月十五日，当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把联共改为限共并为逐共奠定政治基础的“整理党务案”，汪精卫立即离广州轮渡赴香港远去。国民党中派则纷纷向右转，即便暂时不转亦被“闷杀”，右派（包括西山会议派，戴季陶以及胡汉民等）从此有了底气，尽管暂不宜表态，但已不必装着“愿挨”的姿态了。蒋介石从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两个方面都获得了政治资本，难

^①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第3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

怪有人称蒋处理此事心机实为“天才”，蒋则在日记中不无得意亦直言不讳地说：“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①大概此时的蒋介石还没有完全陷入权谋，因而内心亦不免波动：“纵览寥天，茫茫无际，难解满腔恐郁”，双重人格之苦难补政治上的权谋取胜。当然从国民党的立场则是大可不必，最后取胜的还是铁定的政治信念：“生命可以牺牲，主义岂可敝屣乎……今日事只有直前奋斗，以期毋恭所生，不负初衷。”^②

三二〇事件，中共的处境最尴尬，倒霉的当然仍是陈独秀。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二大之后，陈一直就受到来自各方的“右倾”“投降”“退让”等指责不一而足，被李立三颂为“我们党内极有政治天才并且极有组织能力的”陈延年掌握的广东区委甚至以党内文件的形式批判中央右倾。此事未了，北京传来了“三一八惨案”，这件事对中共来说，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三一八惨案”发生只两天，中共中央马上就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但是三二〇事件就复杂了，情报说法不一致使中央举棋不定，迟迟形成不了决策性文件，又不得不立即研究对策。经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瞿秋白等研究，据张国焘的唯一的见证式回忆是决定“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局势。具体来说，我们要维持汪蒋合作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为此，陈独秀又闹了一阵退出国民党的情绪，这当然又是为莫斯科决不允许的，于是就提出了日后受到中共方面等强烈批判的“办而不包，退而不让”的策略，以保留在国民党之内，“同时积极准备着新的进攻以夺取领导权的斗争”。但李立三认为广东的退让是暂时的，是“新的进攻的准备”，而陈独秀的退让是永久的，是“十足表现了专一奴服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③，现在来分析这件事以及加上陈独秀在四月三日第一四八期《向导》上写的《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文中提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行中的一个柱石”，看来陈独秀及中共上海机关在事发初期不明真相而不得不维持现状的环境下，确实是采取了让步政策。但是当鲍罗廷在广州一再向蒋介石实行实质性退让后（如同意蒋的驱逐季山嘉等顾问，同意“整理党务案”等等），陈独秀却腰板挺直反对鲍的真正右倾投降主义的做法；到了六月，陈独秀为回答蒋介石发表《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一文所作的《给蒋介石的一封信》，首先驳斥了中山舰事件乃共党分子所为的谣言；再是力辩中共跨党分子在国民党内并没有做过任何不利于三民主义和北伐大业之事；批驳蒋文中四点“共党阴谋”，全文虽无豪言壮语却理直气壮，有理有节地以“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共产主义招牌，做了些三民主义的工作”，也即是说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完

①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 551 页。下引同。

② 上书第 547 页。

③ 李立三《1925 年至 1927 年中国大革命》。

成本党最低纲领——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成功。

由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的政策不仅没有因国民党党内分裂,右派活动明显增强而予以制裁或采取诸如停止军援主动撤出顾问等打击手段,这就使得中共处在无法忍受境地。更有甚者在共产国际把筹码越发向国民党倾斜的同时,还用中共支部要服从国际总部的纪律压迫中共跟着右倾,而且不得声张,这种右倾加霸道,在当时是明显不利于中国革命,在事后是不利于澄清事实真相,在陈独秀成为托派后是找到了政策错误的替罪羊,大家都被酱在搅混的历史中无法自拔,即使九十年代的我们耗费很多根本不必考证辩解的篇幅,其实,就在为众所诟病的说蒋介石为“柱石”的陈独秀文中还说:“共产党如果忽然发疯想建设工农政府,单单推倒蒋介石是不够的”,话虽有牢骚,但倒透露未来中国革命(即实行最高纲领时)蒋介石及其资产阶级政党必定是被推翻的对象。在陈独秀来说,这与五四时期提出民主是为了与封建制度争资产阶级的权利;待到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掌握民主和争民主权利的是无产阶级,必然的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这在第二章中曾多次作过分析和述评,此番重提是极有必要的,以后没有机会再在这类纯然是辩嘴说理上耗费笔墨,因为陈独秀已忍无可忍地与鲍罗廷发生原则性的争论而大大得罪了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

陈独秀——当然是已经被开除出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的托洛茨基派的陈独秀,他带三分愤怒的情绪在历数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失误,当谈到三二〇事件时指出:

次年,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正是执行了戴季陶的主张,在大捕共产党,围缴省港罢工委员会,苏俄,视察团(内多联共中央委员)及苏俄顾问的卫队枪械后,国民党议决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分子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册缴存国民党,我们都一一接受了。

与此针锋相对,陈独秀提出惊人的主张,他说:

同时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的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东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①

向鲍罗廷,向苏联政府驻在广州考察政局的位高至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家们提出只是五千条枪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而得到的回答是:不给,一条也不给。

^① 《告全党同志书》。

国共分裂,李大钊惨遭绞杀

国际代表不仅拒绝陈独秀的足以改变一下广东军政局势,使风风火火的农民运动(及各地的农运讲习班)有实质性的发展,也可以壮大一下中共的独立武装的形象的五千条枪,还振振有词地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好一个“疑忌”与“反抗”!共产国际早在一九二三年的五月指示中就明文要求中共促成实行没收土地的政策,并把它作为改造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甚至还提出要“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若是“推”不动呢?反抗它一下又有什么不可的,五千条枪在用轮船从海参崴输入黄埔港的源源不断军援中是九牛一毛,自以为是前来帮助中国开展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明明白白地议决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与土地问题的国际主义者们怎么如此害怕把枪交给革命兵源的中国农民呢?不奇怪吗?不应研究苏联对争取北伐胜利的目的及靠谁取胜这两大问题吗?国际代表不仅拒给武器,还公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实在不敢相信这是共产国际援外代表的言论。机会主义一至于斯,陈独秀是连想都不会想到的。

陈独秀的上述意见(或者说是牢骚)发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的《告全党同志书》中,是陈独秀对于“向(忠发)李(立三)极左路线”开除他党籍的决议案的申诉和反驳,不清楚全党同志是否能见到,但陈独秀文中的要求共产国际给五千条枪,共产国际要中共当国民党的“苦力”之类事实的揭露和申诉,没有受到中共中央的任何反驳说是造谣;后来几位猛烈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李立三、蔡和森、邓中夏、华岗等均只选择有利于他们认为的右倾事例,缄口不提共产国际右倾和五千条枪的事,看来陈独秀讲出了谁也不敢“碰”共产国际的历史真相,于是今天看来诸如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啊,反对并污蔑农民运动啊,向资产阶级“专一奴服”啊,统统成了苍白无力的批判;至少得重新研究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和功利主义观的批判,不管出于谁的手笔,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求“德先生”莅临学术领域。向国际代表要求五千条枪一事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一直无人引述,这种对历史真相的强令封闭,如今终于因“德先生”飘然而至而解禁,看来历史与现实终于在“民主”这个词所包含的学术自由的意义上撞击出了“五四”火花,就不必考虑落实政策之类属于权力部门的事。好轻松啊。

这么说,当然并不是肯定陈独秀的一切主张。总体看来,当他的正确的主张(有不少意见开始时曾得到中央干部的共识)得不到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认可,在与中央干部调节自己的主张时,不是通过一定的领导艺术予以说服或稍作修正取得共识,再去与国际代表协商乃至争论,而是一再否定自己,既迁就本党同志又屈从国际代表,

他的性格很难说会屈从别人,当然在共产国际代表面前完全没有这个因素也不是事实,但主要还是出于他对于与资产阶级政党共同北伐铲除封建割据完成民主革命缺乏正确的理论导向,加上物质因素——依赖苏联政府的经援军援,因而忽左,左到一而再再而三向共产国际总部要求退出国民党独立革命;忽右,右到“退而不出,包而不办”政治上这种不死不活无所适从的行径,确实纯系机会主义的策略。

据张国焘回忆,“党务整理案公布以后,广州的中共同志无不万分激愤。有的说,‘鲍罗廷被绑票了,张国焘、谭平山作了投降代表’”。有的说“‘为何不主动提出改变国共合作方式,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为何不退出国民党?’‘为什么要被动受处罚、被整理?’”可见,到五月下旬即北伐准备阶段,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提出国民党的要求,连一直跟着鲍罗廷的广东区委也至少在情绪上产生波动,这时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应当向共产国际坚决反对整理党务案,不怕高压,量共产国际代表暂时还不至于闹到撤换陈独秀的绝境,结果因别的干部迅速改变观点,继而自己也怀疑起来了。终于“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这就是人们指出的陈独秀“第三次大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①。至于“让步”的性质,则不必指明而读者心中清清楚楚。

陈独秀几次顶不住共产国际的高压终于使“国际倾向渐渐胜过中国的倾向”而一发而不可收。

屈服于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尚可原谅,反对北伐呢,是不是右的错误?

七月七日,陈独秀在《向导》第一六一期上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提出不同意北伐,认为“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一个要离开广东向北方进军,一个却提出留守广东以“防御吴佩孚之南伐”,这可真是南辕北辙了。我们为何要在正文中具体写明陈独秀反对北伐之文发表在某期《向导》呢,原因乃在于从中山舰事件,尤其是整理党务案以来,陈独秀及中央一直对广东(主要是对鲍罗廷)方面向蒋介石退让怀有不满情绪,就在《向导》上一再发表那些使国民党也使鲍罗廷感到棘手的长论短文敲打国民党,以至造成“《向导》明显反对北伐”的社会影响,待到《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发表,等于正式宣布中共中央反对北伐,反对北伐的问题还严重反映在《向导》一七〇期上彭述之的《我们的北伐观》,彭是反对北伐的,但情况有所不同,一则是北伐的形势出人意料的好,再则是彭文发表的九月,北伐军距攻克武汉三镇已指日可待,再重复反对北伐已失去意义,因此彭文从不准军事独裁,从以党治军的角度,提出应使汪精卫“赶快销假复职,使政治上有领导的中心”。终于出现了张人杰等四个人抗议陈独秀的反北伐论。说张人杰也许不为读者熟悉,他就是张静江,是当

^① 《周恩来选集》第123页。

时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代理主席，从党务组织角度等于是国民党中央主席向共产党中央书记提抗议，可见问题相当严重了。据《向导》编辑郑超麟回忆：“我们收到了这信，陈独秀以‘记者’名义回答了几句，放在《读者之声》栏内，同那些学生、店员写来讨论问题的信一同发表。”^①笔者揣摩陈独秀以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对待张人杰的抗议，哪管他什么国民党主席的身份，这倒是很符合他的性格的举动，也许他获悉九月的张静江已经以脚有毛病为由辞去了中常委主席一职（张静江的脚有残疾），这个职务已经被蒋介石“接任”了。蒋介石好不容易取得党主席一职，北伐又胜利在握，彭述之竟然提出要汪精卫回国复职，这还得了！终于埋下了迅速铲除中共的第一个地雷。

地雷埋在地下，但地上的陈独秀真是不可一世，不仅把国民党主席的文章当成无名小卒来信贬损了一通，而且早在文章发表之前为取得上海中央同意他的主张，在有彭述之、张国焘、瞿秋白参加的会议上，他发了脾气，拍了桌子，还张口大骂；骂得拥护北伐的张国焘不敢抗辩，也镇住了同样拥护北伐的瞿秋白^②，只有反对北伐的彭述之很得意。

然而，陈独秀哪里知道，蔑视对方，压服自家，只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现实狠狠地教训了他，因为反对北伐一下子就把自己推向了“两国三方”（苏俄、国民党、中共在国民党内兼职的干部和中共广东区委）的对立面。这里可以先下一个结论：反对北伐正是酿成陈独秀悲剧的序幕！再赘一句无原则的话，知识分子从政就是不行，这位五四旗手领导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得心应手，连元老蔡元培都礼让三分。但是在政治舞台上，他一下子就暴露了毫无韬略的政治幼稚病。更谈不上权谋，这在第一章中已经点明说日后有他的苦吃，如今开始应验了。

北伐，是老一代国民党人从反袁就开始的至高无上的经国大业；从另一个角度说，北伐正是孙中山洗刷他让位给袁世凯造成辛亥革命彻底失败的政治错误而毕生经营的一场战争。孙中山以莫大的勇气深入军阀盘踞的中心而带着遗憾去世的；即使他活下去，北伐之战仍是要打的，军阀政治劣根就是各自有帝国列强靠山，各自有活动的地盘，既可无原则地团结也可翻脸不认人，这是连冯玉祥都不免的。如今，更复杂了，因为又加上一个有权命令中共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力主北伐^③，奈何哩。纷纭复杂的政治（具体到眼前却是全局性的）或军事（具体到或一战役决战），只求得重要一役的成功，就得不失时机地认可并迅即付诸行动。北伐是消灭军阀政治统一

^① 《郑超麟回忆录》第128页。

^② 同上书第130页。

^③ 其实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中国政策，在1926年蒋介石准备北伐，开始时也采取反对的态度认为“北伐是必需避免或最多只能列入未来计划的军事冒险”。国际代表反对北伐的理由与陈独秀大体相同。后来只是为了稳住蒋介石和害怕破裂国共合作而同意北伐。

全国的重大举措,反对北伐的陈独秀显然是犯了局部利益涵盖国民革命全局的错误。陈之所谓局部利益指的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文中提到的诸如北伐将增加工农城镇市民的军费、将被剥夺刚刚得到的“些少自由”、右派借机镇压工人运动、推迟解决土地问题,以及怕右派夺权,吴佩孚南伐等等。不能不承认是存在上述不利因素,但毕竟是次要的而且是可以调节可以避免的。因此还得肯定于此陈独秀犯了不是统筹革命而陷人为平头百姓争琐细小利,实乃政治家大忌。

北伐,如果从行政上或组织上计,以六月五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总司令算起,当天组成总司令部。四日,蒋介石发布北伐宣言,第二天他被任命为有任免所辖革命军和党代表的至高无上权限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人部部长;十日,军事总顾问加伦向蒋介石“报告飞机及各军器到齐”^①,至此,北伐准备结束;二十七日总司令离开广州踏上北伐征程。

军事家们通常重视“捕捉战机”一词所包含的烦恼和愉悦,据高级顾问切列潘诺夫说:“新北伐计划是由李济深根据加伦的主张拟定的”^②,确实抓住了有利战机,就是首攻吴佩孚(部众二十万),次攻孙传芳(二十万),暂放张作霖(三十五万)一马,并据以明确行军路线,具体的主战对象和主战场,这完全准确的政治分析和战机捕捉是与鲍罗廷的详明的情报调查,政治敏锐感和加伦等全体军事顾问(指挥权下达到团,个别到营)的努力有直接的关联。这里,我们有必要慎重指出一个鲜为人知(或者说是因有利于陈独秀故知而不提)的事:开始研究北伐时,陈独秀曾在上海会见从苏联赶来的高级政治代表团——布勃诺夫调查委员会,在与这位红军政治部主任,以及高级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库比亚克等会谈时,持的是支持北伐态度,陈独秀“非常热心地谈到,国民革命军必须立即出师北伐”并指出要首先攻打吴佩孚。“他的理由是吴佩孚虽具有几乎是中国军阀的首领的威望,但他的兵力不多。……如能粉碎吴佩孚,就将赢得政治上的大胜利”。这时的陈独秀不仅支持北伐,并且胸有成竹地为加伦将军制订北伐战争计划作了正确的政治和军事分析,无疑给苏联顾问们以强烈的印象。既然陈独秀在与布勃诺夫会谈时支持北伐,为何又撰文反对北伐,应当认为陈独秀是有政治头脑的。与布勃诺夫会谈是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日的上海,撰文反对北伐是七月七日,其间四个月中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总书记敏锐察出蒋介石已开始违拗孙中山的北伐政治主张,而别谋新的即反共的途径。这四个月间陈独秀曾两次提议退出国民党,尽管遭到压制,但中国“政治大裂变”的前途已清清楚楚,因此陈独秀惟恐工农城市小资产阶级既得的那些琐细政治小利毁于北伐而坚决反对

①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 617 页。

② 〔俄〕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 417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5 月第 1 版。下同。

北伐，因小而失大，但证明陈独秀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已经足够了。

迅即北伐并对吴、孙、张三大军阀的政、军态度亦与苏联政府当时执行的对华政策紧密相连，据苏共政治局三月下旬作出的《关于远东政策的决议》中有关中国局势的分析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经使中日关系问题变得极为重要。目前，需要尽力获得一个喘息机会，这实际上意味着要‘推迟’满洲的政治前途问题——也就是在实际接受在近期内满洲南部仍然由日本控制这一事实”^①。这就是说暂置张作霖与日本勾结而不顾。据切列潘诺夫的回忆暂不打孙传芳（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赣、闽五省）是鲍罗廷的主张，看来当时苏联对远东局势比较满意，急于铲除是英国（含欧美）在中国的利益，因此就把吴佩孚作为北伐第一枪的对象。陈独秀政治和军事的策略亦吃透了苏联的中国决策。

国民革命军原本六个军加上广西的李（宗仁）黄（绍竑）部，和给吴佩孚湖南沉重一击的唐生智部（他原系吴部将，于五月反戈归蒋）合约十五万兵力，以十五万打三大军阀的七十五万，除计划周密、指挥准确和苏俄装备外，确实是顺应了全国人民反对军阀（等于是反帝反封建）的窒息二十年的心声化为力量的表现，亦说明陈独秀反对北伐是不合民意的。

正是北伐进展迅速又无多大的风险，使蒋介石足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清剿中共和对付“本党”异己。

七月十二日，唐生智部陷长沙（叶挺独立团建奇功），十九日春风得意的蒋介石与加伦等一行游岳麓山谒蔡锷、黄兴、刘昆涛墓并应允湖南大学学生作演讲之请；第二天发布《对外宣言》“仗义率师，伸张天讨”。三天后——二十三日“阅《向导》报共党领袖陈独秀诽谤北伐文”。立即研究对策，二十四日发出《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电》，公开指责“陈独秀君《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反对本党北伐，阻止国民革命。查陈独秀君乃中国共产党领袖，《向导》为中国共产党言论机关，此种言论，中国共产党当负其责任。值此严重时期，发此言论，显然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影响重大，不敢默然”^②。瞧，陈独秀被冠上了公然“破坏两党合作”的罪名。至此，陈独秀分明处在左（共产国际批评他的退[国民]党思想）右（蒋介石斥他破坏国共合作）两难的困境。埋地雷炸共产党的国民党反而与共产国际步调一致！难怪有人形象地说：“一九二六年夏天，中共骑在虎背上，处于驯之不能，下之不得的状况。”^③事情到此还未了，当北伐军一路从湖南乘胜势向湖北挺进，一路在江西攻打南昌逼孙传芳迎战，终于攻下武汉三镇，捣毁了吴佩孚经营了多年的老巢，蒋介石“得双十节已克武昌城消息，于此聊解心

①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② 以上所引蒋文均引自《蒋介石年谱初稿》相关日期条目。

③ 《斯大林时代的共产国际内幕》第199页。

病”。其时，总司令在江西督导全局，在稳操胜券的形势下深谋远虑：“以后军事政治，或可较易设施乎？”这句看不出偏向的话，在说话人脑海里的政治偏向是十分明显的。一直在大本营的政治敏感的加伦将军是有所觉察的，他在六月五日的一份给上级的报告中曾指出，蒋介石正在扩展权势以“取代孙中山”造成他的独裁政治，但他又害怕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决裂，在这左右之中，加伦认为蒋介石处在摇摆不定的政治秋千上^①，作为军事专家能够认识到这一步是很不简单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加伦能超越军事家不问政治的传统限制，把他的一个积极的想法向周恩来提出建议，当时周是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但加伦显然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向时任中共广东区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提的，据周恩来回忆：“出师以前加伦曾请转问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②回忆是可信的，蒋介石的左右摇摆决定了加伦意见的摇摆，决策责任就落在陈独秀身上。周恩来带了加伦的意见专程到上海向陈独秀请示。生病住在医院里的陈独秀要周恩来找上海中央的干部研究决定，“开会时，又是张国焘当主席，也没有真正讨论，只由他说了两句，说北伐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周恩来带了这莫明其妙的反对又不反对的废话悻悻而回。向来办事干脆利索的陈独秀对付蒋介石怎么如此唯唯诺诺含糊糊，作出了放任不顾蒋介石的政治走向和机会主义决定呢？其实还是共产国际和它的主人苏联政府倚重蒋介石的策略使然。

被史书上称为“五一五事件”的整理党务案之后，鲍罗廷在一再向蒋介石让步的同时，当然他感到此公已经转向，六月，即北伐前夕，鲍罗廷向广州的全体苏联顾问作了一次报告，其中提到统一战线在国内的力量划分，认为国民党由五个派别组成，第一、二两派是老国民党西山会议和与买办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右派；第四派是国民党左派和仇视帝国主义的小知识分子；第五派是中国共产党（请注意这里出现的中共只是国民党中的一派！）；不上不下的第三派是“以蒋介石的军人集团为首的中派分子”。既然把蒋介石定为中派，又认为第四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站在他们（指蒋介石——引者）一边的”^③，这就是说要反蒋介石很可能就把国民党四个基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进步势力给闹翻。陈独秀的模棱两可的反对又不反对就是共产国际把蒋介石置身于中派使然。鲍罗廷把蒋介石定为中间派成为中共对蒋介石的决策依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谭平山参加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扩大全会在一次发言中提到“按国民党党员社会成分，可以分成反映着复杂的中国社会结构的五种类型”时，蒋介石就被定为“中间派”，说“这一派的拥护者在国民党里不多，但它现在独揽军权”，“这一

①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 394 页。

② 《周恩来选集》第 124 页。

③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 393 页。

派系的领袖是戴季陶和蒋介石”，前者是理论家，后者则用枪炮“在一定程度上推行前者的思想体系”^①。蒋一面“需要国民党内的共产主义者支持”，一面则拉拢资产阶级右派“以便打垮共产主义派”。看来蒋对共产党采取的竟同陈独秀同样是反对又不反对。中共是反对又不反对蒋介石，蒋介石是反对又不反对中共，但看谁率先一步打破均势。政治斗争中最难对付（动辄用向右倾斜威胁左派）的是中派，难中之难是对付坚定右派信念的中派，蒋介石即是。

在北伐以前共产国际（包括苏共对华政策）下达的决议或指令，通常是原则性的指导之后是支持并赞扬国民党，对中共的意见总是先搬出列宁关于殖民地民族革命的见解，然后是一九〇五年的经验教训，在涉及具体如何对待国民党或国民革命时，常常使用诸如在“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同时又要“反对极左情绪”这类使中共无所适从的“原则指导”，在北伐之前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大会的《关于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为最典型，难怪有人说这是个“同它以前所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政策的声明一样，充满了模棱两可的词句，没有减轻中国共产党人被束缚在一种限制性战略的感觉”^②。“上峰”一至如此，你能要“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讲出蒋介石统治国民党是“右派翻天”的话而坚决反对之吗？更有甚者，直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大会，布哈林还在为国民党唱赞歌：“革命中国的首府广州，对亚洲殖民地奋起的群众来说，就成了一个独特的‘红色莫斯科’。”^③如此这般肉麻吹捧广州政府，捧它为亚洲革命圣地，陈独秀竟然还要退出来，岂非右倾到了家！令人遗憾的是一九二六年冬的国民党已经不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了，这是稍有政治嗅觉者都能明察的。如果共产国际不是只靠驻外代表的调查，能听听中共的意见，冷静下来考虑一下为什么陈独秀在北伐之前两次向国际提议退出国民党和暂不同意北伐，是不是有合理的成分？现在由我们来分析，为什么会造成中共对蒋采取反对又不反对的模棱两可的政策，归结一句话就是共产国际“它没有提醒人们注意国民党内部由于右派公开反共和蒋介石的高升，危机已迫在眉睫”。待到布哈林肉麻吹捧广州时，中共已经陷入再也不能使国民党向左转的泥坑，国民党作为资产阶级政党正在由蒋介石一派逐步完成。这时中共的陈独秀及伙伴们不仅在为共产国际的“错划成分”受过，还在“被束缚在一种限制性战略”的境遇下作着把北伐往左引的最后的努力，这就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真是难能可贵！

现在乘蒋介石在十一月八日攻克的江西重镇南昌决策他那肯定不利国共合作的远程计划并竭尽全力经营南昌大本营之际，谈谈北方形势。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 181 页。

② 《斯大林时代的共产国际内幕》第 187 页。

③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 146 页。

中共中央一直在上海,地方工作主要是北京和广州,由于形势发展,一九二五年五月分别在这两地设中央临时委员会协调地方区委工作,连同地方组织中最庞大的江浙委员会(辖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形成南北中三个中心,此时所说的中共中央主要是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十月离沪,以上中央委员)和有国际代表身份而兼中宣部长的彭述之。这是北伐时期“五人小组”的中央机关和地方党形势,共产国际的主力是在广州,其次是北京(由苏联驻京使馆大使加拉罕负责并有一个代表团驻在),驻上海代表是维经斯基及远东局派出组。若论中共党员的生活,广东最佳,因为它是公开的机关,加上不少党员在国民党有兼职,因此生活过得去,还是自由自在的。但是上海和北京两地就苦了,都是处在北政府控制地面上的非法组织,时有被捕被杀的危险。过的大都是职业革命家捉襟见肘的清苦生活,陈独秀苦得吃碗蛋炒饭都感到喷香的令人忍俊不禁的事前面已经提及,别的人大都靠在上海大学讲课或译著稿酬勉强温饱。北方局更艰难,因为它是在军阀虎口下求生存。李大钊是个颇为特别的例外,他一直是北大教授,当时是两个孩子的爸爸的兼职革命家,生活虽然过得去,但处境超常危险。“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共北方局和国民党的北方机关立即隐入苏联大使馆一个沙皇时代的兵营内秘密工作。广州开始北伐,北方政治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实际上南北夹击中共的悲剧已经开始,只是北洋军阀是处在被国民党打击的劣势下公开镇压共产党(讨赤),南方则是在合作的幌子下排挤共产党。李大钊身为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和国民党北京地方党的负责人之一,成为军阀整肃的双料对象。他临危不惧泰然处之,既出现在“三一八”铁狮子胡同军警镇压游行队伍的现场,又出现在最棘手的处理国民党内部纷争的会议上,当时北京执行部丁维汾说内部纷争是北京国民党存在的三大问题之一(另外两个是北京政府武力压迫和经济困难无钱活动),李大钊却能得到多数国民党人的敬重,迁往苏联大使馆不是简单的机关搬家,是一场政治斗争,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有几十人敢于入内办公,李大钊功不可没,他并不顾及正是这一步使他走向绞索。而国民党方面还对李大钊有过类似弹劾的非礼举措,但是李大钊最大的贡献不是在北京调处国共关系,这位在深度近视镜片下始终闪发热情亲切目光的儒雅之士,却一直在作着兵运工作。五四时期,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翻译家,国共合作后他是北方军运领袖,甚至可以认为李大钊从中共成立之后一直在运用他本人的各种社会关系为国共合作为苏俄政府的需要干着最危险的军阀策反,称之为“虎口拔牙”,是很确切的。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方面出席的代表是谭平山(中共)和邵力子(国民党),在第八次会议上谭平山发言谈到农民问题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最近几年,中国革命经历了一段可谓革命浪潮高涨与低落时期……例如,今年七月,革命处于低潮,当时,国民军撤出北京,国民革命军(广州部队)

还未从广东省出师，这时我们必然要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当时的反动气焰。”^①谭平山例举的高潮是郭松龄反戈倒奉，低潮是郭松龄倒奉失败，这两起事都与李大钊有关。谭平山在提到象征革命高潮复起的北伐战争时的十四件事中第五件“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广州政府之间建立正式的组织联系”，这项工作就是李大钊在“三一八惨案”反动气焰嚣张期间办成的。

前面我们曾经叙述过冯玉祥通电“下野”和由李大钊联系加拉罕完成冯玉祥赴苏考察的心愿，这是三月的事。北伐打响，解决西北军阀割据是北伐军无力开辟的战场，于是又想到冯玉祥，李大钊邀请于右任跑一趟苏联动员冯玉祥回国配合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重任交给于右任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使臣”，当时中共对这位上海大学校长很是倚重，据各种资料分析，可能是北方局李大钊决策后建议中共中央采纳的：“在南蒋北冯之间，我们自然希望有一个以于右任为中心之中间势力作缓冲，但于右任是否有实际领袖之可能，尚希兄方再从各方面加以考察。”^②于右任完成了请冯归国的使命。

从军事观点考虑，冯部遭奉直晋鲁四系“讨赤联军”围攻于京郊南口，八月初，南口战役经四个月苦战以国民军惨败而告终，这是任何视军队为生命的将领最大的心病，迫使冯玉祥再无心思考察，就顺应于右任直接敦促，于八月十七日匆匆离开莫斯科回国，于九月十六日抵达发布“五原誓师”的冯部驻地绥远省五原县。陪同回国的有中共将才刘伯坚和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最重要的是带来了斯大林同意武装冯部四十万兵丁的承诺！这对冯玉祥不啻是绝处逢生，但是否能收住冯玉祥不往右倾的野心，那是以后的事。在北伐当时无疑是摧毁西北反动军阀的重要的军事保障，这是李大钊在北京遥控而由蔡和森、刘伯坚和于右任在莫斯科完成的，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北方局的最后一项工程，李大钊不仅是冯玉祥归国而且还在五原誓师的作战计划上出了关键性的意见，李大钊的计划要点是：出兵陕西辗转而直扑潼关，这样“一则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这一作战计划的特点是既配合甚至可以说是纳入了北伐军作战序列，又能绥靖西北的最佳方案。后来“国民联军进军陕西，解围西安，出兵潼关，会师中原的一切胜利，都是实行李大钊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计划的结果”^③。笔者同意这一结论，应当指出的是李大钊的作战计划最后是经中共中央陈独秀的修正和同意后作为文件下达的。五原誓师第四天，中共中央在专门的一份文件中据李大钊的作战计划指出，南口战役失败后蜷缩在甘、绥两地的冯部若不取陕西则无法生存，“得陕西后，可望东出潼关，沿陇海路直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6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集第295页，“兄方”指中共中央。

③ 《李大钊和冯玉祥》第210页。

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并指出进攻而取胜靠此,如遇不利而撤退亦不致溃败。^①李大钊在促冯玉祥出山和组建冯部的同时又一贡献是策划山西阎锡山晋军退出“讨赤联军”,并与冯玉祥共同完成四省联合抗奉张,这是相当棘手的并且与北伐十月后的政局与军势有直接的关联。几乎在做冯玉祥工作的同时,李大钊就托人向晋阎的驻京代表询问对国民党的真实态度,并晓以大义,不久,晋军代表从太原带了“阎锡山决与国民党合作,至时彼唯以(国民)党令动作”的保证。在中央局十、十一月份的报告中谈到制奉张应采取的四项原则中就有冯部“必须与阎锡山联合,然后合陕、甘、绥、晋四个省区才更有力量制止奉军不敢轻犯”^②。这是最大限度地孤立和箝制当时力量最强的张作霖的重要举措之一。在一份专门为联晋阎的文件中甚至指出“中国南方革命势力与奉张反动军阀的斗争,谁能拉住阎锡山便是谁占胜利”。李大钊的工作时时处处都在埋葬张作霖。总而言之北伐开始,李大钊的工作是与广州出师的国民革命军共同造成一把钳子,从北部配合北伐部队由湘而鄂而赣而顺长江南下(解决孙传芳)和顺京汉路北上,最后钳住张作霖作出了简直可以说是一生最后的努力。阎锡山是最有计谋的守门老将,他没有全部履行承诺,只是应允不参加奉张的联合讨赤行动,即此一点,终于也使那年的张作霖成为孤军,这是出关后的张作霖最艰难的时刻,立地爆发他的土匪本性欲杀掉任何危及他生存的人,而且先向知识分子开刀,先是邵飘萍,再是林白水,然后是共产党国民党一起杀。从策划郭松龄倒戈到离间阎张,使张作霖把反共的仇恨集中在李大钊身上,只是时机尚未成熟。

李大钊这次军事策反工作是成功的,足以弥补为共产国际“联吴疏孙”错误政策给他带来的沉痛。中共中央一直支持李大钊的工作,曾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西北军工作》(转发刘伯坚发自库伦的信)、《冯阎联合问题与对奉政策》等文件,还在《向导》上发表文章支持“冯玉祥回国,国民军再起”,为冯玉祥及其国民军摆脱南口阴影以鼓其军威制造舆论,冯玉祥东山再起又鼓舞了正在洛阳浴血战斗的北伐军,“西北国民军代表李鸣钟抵广州,报告冯总司令率全军加入本党”^③,八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即任命冯玉祥为军委委员、国民党代表兼国民政府委员。陈独秀认真投入是项军务工作,他还发表《对于国民军再起的希望》。这是北伐后陈独秀撰写的政策性极强的长篇政论,详细分析了冯玉祥参加北伐对局势转机的意义,及其应当持有的战略思想。西北革命军的组成对于北伐不仅具有解决战争(绥靖中原、西北)的军事意义,更有政治意义——策动军阀内讧和倒戈附蒋,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其顺应民气同仇敌忾之感,连胡适都赞扬说:“冯玉祥之对曹、吴倒戈,放开眼

①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论报告选辑》。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集第481页。

③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57页。

观前后二十年全部历史,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胡适因此受到了陈独秀“此见实不同凡俗”^①的褒扬,引此一段若是单说明胡适没有钻故纸堆未免落入就事论事之虞,更应悟到这时的知识分子没有分裂,在国民革命大局上仍然同声相闻。

陈独秀在北伐前撰文并用“老头子”的地位反对北伐,被扣以右倾机会主义。北伐一旦发动,他迅即改变立场主政支持北伐,关注北伐军的进展,指导全党配合,这且不论,单说他的写作,我们作一简单的统计,从九月的《我们现在为什么而奋斗?》,在详细论述“国民革命包含着民族革命民主革命两个意义,也就是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主义这两个意义”,深刻揭露军阀政权打着反共反苏的旗号反对国民革命起,到本年底《孙传芳败后之东南》止,三个月写了论文、杂文、随感五十余篇,或短兵相交或深刻剖析,从各个方面批判各种右派势力和某些重要人物歪曲、反对、破坏北伐的言论,同时还或多或少阐明中共的民主革命政策及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的和社会的基础(针对讨赤派攻击共产党欲利用北伐达到阶级革命目的的角度写的解释性的文字)。这个阶段的努力是国共分裂前陈独秀为国共合作共同北伐作最后的也是最积极的配合。研究者们于陈独秀反对北伐作了详细的分析批判,这当然是必要的,令人遗憾的却没有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支持北伐的言谈举措。不是为了“摘帽”,要比这积极得多,我们的方法若借用军事术语来说是欲对陈独秀研究作“战略转移”,比如暂且抛开“托派”这先入为主的传统认识(其时与托派没有任何关联),开拓新的研究途径,庶几可以不受右倾机会主义或反对派的干扰,达到公正,嗣后再研究他转向运用托洛茨基理论并组织托洛茨基反对派研究中国的政治立场,也不至于怀有传统偏见,得出新的结论。

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九月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曾竭力阻止法国无产阶级在此时起义,认为现在“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②。但是当巴黎工人没有听从马克思的劝阻于半年后(一八七一年三月)起义时,在英国伦敦的马克思却积极支持起义,每天每时每刻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起义并想方设法支援起义。马克思先反对后支持的态度受到列宁的高度重视,并以此来批判普列汉诺夫无理责难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武装起义,说反对巴黎起义的马克思“当他看见人民群众运动已经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标志着世界历史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伟大事业表示莫大的关切”,终于蘸着流淌在巴黎街衢上工人的血写成了《法兰西内战》,而“普列汉诺夫为十二月事变的一部

① 《敬告广州青年》。

②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下册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4月第1版。

‘著作’，却几乎成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福音书”^①。引马克思与巴黎公社及列宁赞赏马克思对巴黎公社两种态度的言论，笔者的观点是显然的：就是我们应当用列宁的——至少是以公允——的态度对待陈独秀先反对后支持北伐的政治立场。要完成这项战略转移性质的研究，至少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充足的资料；二是从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双方的得失，及其与蒋介石的内右外左的政治谋略作全局性的统筹研究；三是要打破禁区摆脱传统研究的束缚。

十月十日，国民革命军在叶挺独立团奋勇战斗的强攻下夺得武昌，莫斯科又是一片欢呼，在欢呼声中，把中共远不只一个陈独秀的不少干部对蒋介石右倾的忧虑和提防化为乌有，十六日《真理报》发表 A. 库列拉的《中国革命的光辉胜利》，文中有一段说“今年三月（指中山舰事件——引者）曾有人担心国民党领导会向右转，转向反动的一翼。由于同共产党一起工作的左翼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间派的联盟，这种危险现在已经完全消除了”^②。对北伐胜利的赞美终于在十一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大会达到顶点，参加会议的代表在讨论布哈林的讲话时颂歌一片，“中国的运动已经成为被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范例”等等不一而足，只有土耳其代表斐迪表示了对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日益巩固，它将把持运动的领导权”的担忧，但谁会听信这些扫兴的话呢。共产国际看好蒋介石由中而左，陈独秀就右而又右了。广州成了“红色莫斯科”，上海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了什么呢？

共产国际述说中国革命时猛劲儿地捧国民党，上海十月二十三日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未经交火就惨败在残暴的李宝章大刀队下。这年底的中国共产党还在与国民党捏紧一个拳头打北洋军，为国民党刨掉辛亥革命种下的长达十五年的祸根，还在总结工人第一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中准备第二次起义，但是不久共产党将陷入两面夹击却无法应付两个战场的困境，首当其冲的就是李大钊。

北伐战事正按加伦将军十月占领武汉的设想进行，由于超乎寻常的胜利，顺利，所到之处平民百姓对战争的支持，以及若干小军阀归顺，大军阀局部战区或将领率部倒戈等，使原议的总作战计划有所突破，比如江西战争使孙传芳部重创，使苏鲁皖作战向更有利于北伐军的方向发展，所有这些，从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影响到北方尤其是北京军政府的前途，被笼罩在阴影之中，使是年底搭台上任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处在他出关以来最危急阶段，尤其是当北伐原议最后解决的孙传芳因江西战区被北伐军到九月彻底解决之后，他最后两个据点浙江和福建亦于年底被北伐军吃掉，这就使张作霖在政治上处于孤立，为摆脱此困境张作霖一度曾在安福系的鼓噪下唱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下册第 335 页。

②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大事提要》第 141 页。

一阵“奉粤联盟”，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只是从中可以估出奉系确实孤独难熬。但是张作霖毕竟有五十万兵力又有东三省巩固的大后方。这时被陈独秀讥讽为“中华直奉国”的直系败北，使张作霖成为最后一个军阀，相对而言仍然能称霸北中国，同时除日本外，使原来扶直系的英国亦有可能因吴败北而扶奉系，按东北话说反使张作霖“硬勃”起来。此时，张作霖唯一的险情就发生在冯玉祥的东山再起，使东北腹背受敌，这是万万不能形成的，张冯原本是宿敌，就是郭松龄倒戈服冯反张险些使这个没有“北洋军”背景的纯土匪彻底完结。这口气未消又面临中共并苏联全力支持冯玉祥坚挺西北军，又正好处在他走马上任安国军司令的吉期，这一抹阴影成了他一块心病，于是把一切气都撒在中共北方局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左派身上，于是李大钊的命运可想而知。

陈独秀对冯克张的战略要求是“使奉张不敢轻于尝试”，于此曾有过极好的分析，认为由于奉系内部有新(张学良)旧(吴俊升)两派之争，日本力阻张向南发展，冯军再起及晋阎中立等四个因素“更足以使奉张的军事计划，对西北更急于对南方”^①，可以想见张作霖对于中共李大钊支持冯玉祥和离间奉晋关系对他发展西北的战略计划的威胁有多大。

前面曾说过张作霖欲杀李大钊是步步进逼，我们尚没有找到为什么选择在一九二七年四月这个继“中华直奉国”之后即将成立“中华民国”(即新民国)的前夕下手的直接资料，但证之下列重大事件的排列中能推测出一些头绪的。

一，一九二七年一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决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暂定设在南昌，结束左右相争错综复杂的“定都之争”，鲍罗廷、宋庆龄等“武汉派”虽然经南昌去武汉筹备政府成立，但第二批何香凝、林伯渠、邓演达等“实际上变成了蒋和蒋的集团的高级囚徒”^②，蒋介石向计划中的南京新民国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此事从政治上对北京刚戴上安国军总司令的张大帅是个刺激，对张学良等新派的刺激更大。

二，二月，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又一批共产党员和工人优秀子弟成了李宝章刀下的牺牲。

三，三月六日，蒋介石唆使 AB 团捣毁赣州总工会，杀害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接着是捣毁吉安总工会，“三一七”九江惨案，“三二三”安庆惨案，又顺着北伐军下江南捣毁工会的悲剧延到江浙，死的全是共产党员、优秀工人。在捣毁工会的同时，蒋介石还以“整理党务案”为由清洗江西省内市县的国民党党部，驱逐左倾国民党员。终于把支持西山会议反对国共合作的元老李烈钧拥为江西省主席，使在此地安

① 《敬告广州青年》。

② 《中国国民军的北伐》第 495 页。

营扎寨,便宜行事。

四,这是决定李大钊命运的关键一条,鉴于北伐军所向披靡,扫荡南方的战绩和动向使惯于看风使舵的张作霖摸透蒋介石的心事,多次向中外报界放出空气,说他“本人始终反对共产,南军苟驱俄人,南北不难妥协”,又说“至南北妥协问题,倘蒋介石能驱逐蒋军中之俄人,表示诚意,余决不峻拒”。张作霖的军师杨宇霆更透亮:“蒋介石若对于共产派加以彻底的压迫,则南北之妥协非不可能之事。”请读者注意,张杨的言论我们是从陈独秀文章中转引的^①,这样选择是可以证明中共对于消灭最后的最大的军阀是非常认真的,恰恰如此才使张作霖利用北伐军尚未北进之时,想争取与蒋言和,张作霖的计谋不可谓之不精,然而历史到了我们这一代研究人员眼光下,还要看得更透些,那就是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必将是正面御敌(军阀)的同时背后受创(国民党)。无论是南北分治的老民国,还是即将成立的新民国,就他们所代表的利益决定了无论是打得难分难解,抑是妥协求和,其共同利益都是建筑在压迫工农的基础上的。我们还可以引申一层,即使北伐按着孙中山“荡平军阀,南北统一”的历史发展,全国统一之后,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仍然是政府的敌对势力,非被“荡平”是不能建立中华民国的。把这一点摆出来,可能会遭到腹诽中山先生国共合作北伐的本意的批判,那是因为传统研究往往是从某种政治需要出发,国民党作为中国唯一具备执政党优势又干了几十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一旦政权在握,迟早是会提出资产阶级建国纲领的。这里不存在个人的政治态度。这是由中国社会发展所决定的,甚至世界大势都证明资产阶级革命在特定的时间和条件下总是要求无产阶级参加,一旦革命成功,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完善,不镇压无产阶级就不成其为资产阶级政党了。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之所以说是错误的,就在于它没有(或者是不想)看到,国民党还没有夺得政权前就开始铲共了。这个教训不是来自共产党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而是由国民党的阶级性所决定的,所谓“四个阶级的联盟”,那是它的权宜之计或者是共产国际的一厢情愿。从法国大革命到英国宪章运动,又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到二战后实力雄健的法国共产党从议会上败下阵来的历史,都证明资产阶级政党或政治势力终归是以消灭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政治力量为己任的。陈独秀多次要求退出国民党而被一再否定,错的究竟是谁?正因为中共被一再绑住后脚,因此直到嗅得着蒋介石干戈的火药味儿的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陈独秀和他的伙伴们仍然无权独自决定中共的命运,总书记一手提枪配合北伐搞工人起义,一手握笔配合制止奉张南伐的北方局,写了将近十篇长长短短的文章,想给蜷缩在苏联大使馆里处境危殆的李大钊以一点可怜兮兮的笔墨支援,声嘶力竭地揭露

^① 张作霖的引文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第414页,杨宇霆的引文见同书第370页。

张作霖在北京杀害邵飘萍、林白水、刘汉臣、高之奎，在上海逮捕谢复生、王汉良等书生……真是太软弱无力了。中国共产党和他的总书记是应该有所作为的，然而手脚被绑住了！张大帅是你喊你想喊的，我抓我想抓的，于是李大钊就成为他捧给南军反共祭台上的最佳牺牲，并不惜通过外交手段取得英美法日等国驻华使节和外交使团的“谅解”，冲进东交民巷。

一切都在象征，一切都是象征。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后惨遭杀害的该次起义技术总指挥奚佐尧等共产党人和工人，象征着军阀统治覆灭前最后的牺牲；陈赞贤等的死则象征着国民党铲共的第一个牺牲，两者合拢，象征着南北一统共同的敌人是中国共产党，李大钊上绞架就是未来数十年中国国民党统治史的象征。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由张作霖精心挑选的东北宪兵队和陆军队、警察队和便衣侦察队组成的三百余众突袭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以及中东铁路驻京办事处、庚款委员会和远东银行等机关，逮捕了李大钊等三十五人（内有他两个女儿，后来又逮捕了他的夫人赵纫兰）和苏联使馆人员十六名，七日见报，北京文教界以北京大学为首国立九校校长立即组成代表团并议决向主观地认为“头脑新颖”的张学良请愿。十日，北大校长余文灿和北师大校长张贻惠受众所托先致函张学良说明次日拜访，第二天上午和下午两次赶往文昌胡同张学良官邸，张学良避而不见！问题显得严重起来，校长们迅即又组织了北京二十五个公私大学校长吁请释放李大钊，又遭拒绝。

什么“李大钊系一文人，且系精心研究学者”，张作霖独不怕文人舆论。被迫无奈退而求其次，说“李大钊为一事，共产党为一事，同人之要求当局，将李大钊移付法庭……应受适当法律制裁”，还认认真真的“推定法大朝大北大法律教员，对于东交民巷事件，根据学理发表一篇建议书，希望奉方取宽大主义，一并移交法庭办理”。当时的政治委员会还推举梁士诒、杨度和罗文干为代表，以东交民巷捕人事件如果不按法律办事而科以军法裁判“其结果将贻法权委员会以领事裁判权不宜交还之重大口实，实于国家前途贻害甚大”为由，直陈安国军司令请求“以法处理，以期昭示中外，以彰公允”^①。天真善良的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在没有任何民治和法制保障的恐怖统治下，只能以自己的良知良能冒被杀戮的危险请愿，请愿，请愿。国家机器却按非“宪政”时期常规动辄军法裁决。全社会都在盼着“付之法律以示公允”的时候，张作霖是连军法会审都懒得召开，就由曾经任过北京政府上海镇守使的何丰林为审判长会同清一色军警法官秘密向李大钊等二十人宣判绞刑。二十八日上午宣判下午执行，由李大钊首上绞架，报载他“神色未变，从容就义”，另十九位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都视死如

^① 以上引文均见《晨报》4月7日至本月底有关报道。

归循次走上绞架！安国军总司令的“仁慈”表现在收殓李大钊的棺材为大洋七十，馀皆四十上下。绞刑从下午二时开始，五时结束，入殓后运往下斜街长椿寺停厝，至次日凌晨干净利索地斩尽杀绝，同时贴出《安国军司令部布告》：“李大钊等，实系赤党，宣传共产，意图扰乱公安，颠覆政府……”至此张作霖咬牙切齿李大钊三年之仇终于到此了结，可以心安理得地喝他那东北老白干了！^① 我们说李大钊之死是北方的军阀和南方伐军阀的国民党合作铲共的一个象征，现可以证之以资料了：

北京四月三十日快函云 前日方传开谓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二十八日下午李大钊先生及其他十九同志已被万恶军阀惨绞毙命矣。据云前晚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记者按此讯甚确，二十九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惟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故张作霖即决定于二十八日，先将李大钊等处刑……^②

文中提及的《晨报》亦转引如下：

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二十名已被绞决矣。据云此次军法会审因所有案情经警察厅司法处审问整理，早已明晰，无再行详审之必要。……而前晚（即处决的前一天二十七日——引者）又得前方某重要将领来电，即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晚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③

无论是共产党人是国民党人甚至是绞死李大钊的奉党中人，在李大钊墓木已拱的今天，知道了李大钊的死因，读读上面的两则报道，应当都会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的罢。

李大钊之死，是五四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几位领袖人物中第一位血洒黄土的先辈革命家：“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

① 与李大钊同时被绞死的十九人名单（经笔者据几种报纸订正过）如下：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莫英、张艳兰、阎振三、李崑、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国共两党皆可在此找到自己的先烈。

② 汉口《国民日报》5月12日。

③ 《晨报》4月29日。

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这几句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朴素之言,应当是泣鬼神而惊天地的。对于国民党来说,以国民党中央执委身份被绞的李大钊,应当是国民党的先烈;对于中国共产党,李大钊是精神领袖和永远微笑着的兄长!

陈独秀对李大钊之死悲痛异常,多年后谈及此事仍满怀柔情:“守常是一位坚贞卓绝的社会主义战士。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平生的言行,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张作霖要逮捕他,事先他也有所闻,组织上曾劝他离开,但他坚持岗位,不忍搁下工作。……世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先驱,革命家的楷模,是一点也不过誉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比当时的人深刻得多。他对同志的真诚,也非一般人可比。寒冬腊月,将自己新制棉袄送给同志,青年同志到他家去,没有饿肚子出来的……”有人问陈独秀:“人们说‘南陈北李’你比他如何?他说差之远矣,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①

李大钊的死不仅震撼进步社会,当时适在广州受反共惊吓的鲁迅获悉噩耗就回忆起李大钊那“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②。连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逆潮流而行的守旧学者也悲从中来,如吴宓在闻讯绞杀事件后的第二天日记上就记着:“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李大钊等之绞死也。”^③这是没有任何政治偏见只从凶狠残杀生灵的“纯”人性的默哀,大多数中国人就是在默默地承受着正义被绞杀的历史中觉悟的。

南陈北李联袂创建中国共产党,现在只剩下南陈了。

共产国际难解国民党情结

李大钊被捕于“四一二”之前,被绞于之后,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敏感的时期,各股政治力量都在翻云覆雨的政坛上或主动或被迫亮相,这又是一种象征——象征着错综复杂的党派斗争和社会革命即将走向单一——国共分裂,两党成为正面战场,观望者是有的,但毕竟到了姓国还是姓共的最后选择时机。惟独中国共产党仍处在共产国际万变不离其国共合作、共产党通过国民党实现本党最低纲领的困境中,在受到国民党打击的同时又增加了垂危的军阀的打击。李大钊的死,总算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明白了“对于革命,对于工人和农民,蒋介石和张作霖一样是仇敌!”^④共产国际莫斯科总部发表抗议杀害李大钊的文告,“让张作霖系在二十五名中国共产党人颈

①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② 《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

③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4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④ [俄]魏琴(维经斯基)《悼李大钊同志!》,《向导》第195期,1927年5月8日。

上的绳套成为他自己的绞索吧”^①。若以此抚慰英灵则足矣，但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与策略是不是因把蒋派划入军阀行列而改变呢？这要顺着历史写下去，有必要把结论先写出来，免得花费繁琐考证笔墨。

在获悉“四一二”事变后，共产国际、苏联政府以及斯大林，还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决策者都在立即召开的国际执委第八次扩大会（五月十八—三十日）上发表指点中国革命前途的言论。终于以斯大林力主中共仍留在国民党的意见，制定了“四一二”事变之后的第一个决议（五月决议）。全文特别长，但原则却很简单。该决议认为中国现在有三个政党，即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其性质顺序是：反动政府，虽已开始屠杀工农但仍在打倒军阀，革命政府。瞧，蒋介石又处在右和左中间，武汉政府则既要打南京又要打北京！反过来那就是既受北京打又挨南京揍。李大钊就是南北夹击的牺牲。难怪此时的陈独秀已经不是考虑退出国民党而考虑如何独自干革命了，但能让他这么办吗？

作为上述使陈独秀无所适从的国际决定的理论根据是：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对武汉政府估计不足的观点和实际上否认它的重大革命作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的上层分子，就其阶级成分而论，不仅代表着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而且也代表着一部分中产阶级。因此，武汉政府是国民党左派的政府，它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农民的专政，但是它已走上了这种专政的道路。^②

看到此，也许读者已在笑了。共产国际怎么老是看好国民党，“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把中国共产党整肃得左右不是的时期，布哈林吹捧广州为“独特的‘红色莫斯科’”，如今经过“四一二”事变，长江沿海一线共产党员和工人的鲜血仍在流淌之期又确认武汉政府，称之已走上工农民主专政的道路！更令人费解的是说：“一旦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取得胜利，这个政府尽管失掉了些激进的资产阶级的同路人和克服一系列的背叛行为，但它必然会向这种专政（指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方向发展。”陈独秀正是在根据国际争取武汉政府走向工农专政的两个月中背上了至今都洗不干净的右倾大黑锅。如若中共不打算办呢？说服的办法仍然是说不尽道不完的用之四海而皆准俄国一九〇五年的历史教训：你不想这么干而那么干吗？“实际上是重蹈了俄国孟什维克一九〇五年的错误”，孟什维克这顶帽子在二三十年代是可以要人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296页。人数有误。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329页。下同。

脑袋的，于是只得服从，陈独秀气得屡发胃病几不能躺卧。

那么怎能使武汉走上“这种专政”之路呢？五月决议中说：“当前，中国的总形势要求共产党采取下列军事政治战略：共产党支持对北方采取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必须在武汉政府所辖地区内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加强瓦解蒋介石后方及其军队的工作，以期最后消灭之，当然也决不排除在适当时机对蒋介石采取直接军事行动。”

对于这一“战略”似乎不必指出其一厢情愿的机会主义色彩，到了五月，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力量“最后消灭”已经坐镇南京的蒋介石了。这就是共产国际的国民党情结，给中共不吞也得吞的一个苦果。

以上就是结论。写历史可以结论在先，历史本身则是逐日进行的，于是我们就以陈独秀为轴心写下去。

一九二六年底次年初广州政府总顾问鲍罗廷，以及宋庆龄、宋子文、孙科、徐谦、吴玉章、林祖涵（伯渠）、陈友仁、邓演达等等经南昌陆续抵达武汉，成立了武汉政府筹委会，恭候汪精卫出任党政两主席。鲍罗廷乐观地认为“完全有充分的准备在武汉建立自己的中央政府”^①。为配合武汉政府以抵制越来越明显地走向分裂的南昌行营，中共中央亦于二次工人起义失败之后迁往武汉，首先抵达武汉的是瞿秋白和张国焘，连同从莫斯科开罢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的谭平山，组成临时的中央三人小组。这三位恰好是“整理党务案”两党联席会议的中共代表，当然如今的国民党已不必整理什么“党务”了。从共产国际方面，驻上海的代表维经斯基亦到达武汉，连同刚从莫斯科来的罗易，以及鲍罗廷一起协调国共关系，三位代表相互之间观点上有冲突时，以老鲍的意见为重，他们与瞿秋白的关系相当融洽。其时瞿秋白已完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〇国际》。

一九二七年元旦那天起武汉人民连续狂欢三天，欢迎久违十五年（一九一一——一九二六）的国民革命军，并再度掀起北伐高潮，武汉人在发扬辛亥首义的尚武精神参与统一全国的热潮，但历史能使老百姓如愿以偿吗？就在狂欢的最后一天，英国军舰上大批水兵荷枪实弹冲上岸，向汇集在江海关前欢庆的群众队伍动武直接为军阀扫荡革命，造成“一三惨案”。中共中央就此事发表抗议外，还联系英日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势力抵制北伐镇压人民革命的时局，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一月二十八日），其中突出的一条是号召农民“起来！集中你们的势力于你们革命的农会！推翻地主劣绅的政权，帮助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创造在农会领导之下的乡村政权”，并要求工农联合斗争。这是国共分裂前中共中央发布的最后一个宣言，其中关于“创造在农会领导下的乡村政权”，就是经常在共产国际文件中出现的“农村苏维埃”，此说联系

^① 《中国国民军的北伐》第495页。

陈独秀在这之前不久所写的《孙传芳失败之后的东南》中提出的中国民主运动三种可能出现的形式中的一种“是农民推翻乡绅政权的暴动,此种运动才开始,将来或者是中国民主运动最后的最高的形式”^①,简直是等于预测到了中国革命“基本上是农民战争”(毛泽东语)的前景了。在北伐的九月,陈独秀为配合北方局李大钊鼓动冯玉祥国民军反奉时提到的“国民军欲图向奉军反攻,首先尽力与民众尤其是农民合作,巩固其在陕甘的政权”^②,又在另一篇论文中明确提出“农民是国民革命中重要的广大民众”,“应该和农民合作,惩治贪官污吏、地主、土豪,而不应该放任贪官污吏及驻军勾结劣绅、地主、土豪,蹂躏农民”^③。综上所述,直到四一二事变之前陈独秀是非常重视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决不能容忍镇压农民的事发生,怎么能说陈独秀一贯反对农民运动呢?至于说陈独秀控制下的《向导》腰斩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是某些人根据时政需要的捕风捉影,无端滋事。^④正相反,陈独秀虽然曾指出过“湖南初期的农民运动,缺少党的领导,遂不免有些原则的幼稚行动”,同时指出“所谓幼稚行动在任何国家革命的初期高潮中都不能免”,可见他对湖南农运的过火行为认作是免不了的,是可以理解的;与此同时,当许克祥借口农运制造“马日事变”策动土豪劣绅反攻倒算镇压农民运动,抄左派的家并殃及工人讲习所和商民协会等一系列反革命行动,则予以政治上的猛烈抨击。这里引一则被陈独秀记录在案的惨绝人寰的反攻倒算:“……此外岳州、平江、浏阳、宝庆及湖南,都在铲除暴徒名义之下,解散民众团体,屠杀工农及共产党人之事,成了普遍现象。此项屠杀之惨,我们可以举出一例,即湘潭总工会委员长杨昭植被杀之事。杨于五月二十六日被捕,在学坪斩头,随后将其头抛掷数十下,再用麻绳系电杆上示众,将杨尸倒悬于演说台上,以刀剖解,以铁丝作钩,取出腹内脏腑,灌火油于腹中,用火燃之,旁观有不平者,即以赤化论。至于捕获工农活人剥皮置沙上,旋转呼号而死者,也不只一次。”然后陈独秀将笔锋一转,面对着惨无人道的杀人凶手,愤怒而沉痛地写下:“试问湖南农民对土豪劣绅曾否有过这样野蛮残酷的行动?”^⑤

说了一句湖南农运“缺少党的领导”,又说了一句湖南农运“过火”,不去研究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就给戴上“污蔑农民运动”的帽子,受着“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众腹诽,这样对待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公平吗?在当时,有几个领袖人物若陈独秀般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第310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第273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第264页。

④ 详情见蔡铭泽《〈向导〉为何未全文转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闻研究资料》第53期,1991年1月。

⑤ 《湘南政变与讨蒋》,《陈独秀文章选编》第425~428页,引文在426页上。

写过反动派如此凶残地杀害工农兄弟的文章！几十年来长期不批左，容忍极左并一再鼓励极左言论和行为，陈独秀大概是受害最严重的特例。因此多说几句是可以理解的，深信读者是愿意知道历史真相的。

细心的读者不禁会问，总书记为何不率领中央去武汉？问得有头脑。陈独秀是郑重而又郑重地作出留守上海的决定的一——他要在工人二次起义失败的废墟上争取第三次起义成功，抢在北伐军占领上海之前由工人武装占领。陈独秀留下了若干强将：军委主席周恩来（秘书王一飞），宣传部长彭述之，上海区执委书记罗亦农和前任书记尹宽，组织部长赵世炎（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以及《向导》编辑郑超麟，一直在上海从事工运的前工委书记汪寿华以及顾顺章等干部。由周恩来（总负责）、罗亦农、汪寿华、赵世炎、尹宽、彭述之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起义，并筹组上海市政府。起义的计划由陈独秀设计并由他作最后决断，一句话，由陈独秀亲自裁决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志在必胜。

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名义上都是国共合作配合北伐军江浙两翼挺进重镇上海（顺便指出，这一真相过去一直未能作历史的说明，因此起义中很多不能尽中共之意而迁就国民党的做法，皆被目为右倾并推给了陈独秀），国民党驻上海特派员钮永建，还有杨杏佛，与中共起义指挥部联络协同动作，同时参与的尚有上海工商界政治实力人物王晓籁、虞洽卿和他们控制的上海工商会及其工团武装，还有杜月笙和他的武装，中共方面为充分利用并监督其实战，由罗亦农、汪寿华负责输送了一批坚定的工纠队员入工团武装，陈独秀等还策划成功兵临城下后接受蒋介石就地扎营不动的白崇禧部薛岳的第一师配合起义的承诺。^①

起义本身就是共产党配合北伐上海决战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也是中共军事上第一次成功的巷战。当时北伐军何应钦部和白崇禧部正向上海市郊松江、龙华等地挺进，孙传芳已不敌而败，张宗昌奉鲁军死守吴淞，毕澄芳部向上海挺进，原孙部镇压第一、二两次工人起义的刽子手李宝章仍负隅顽抗，但北伐军兵临城下，大势已去。这次起义成功的关键是陈独秀时机选择准，战机捕捉更准。若计算时间从二月二十四日陈独秀主持特委会议总结二次起义失败教训并决定择日再次起义起，至三月二十一日起义开始，次日胜利，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为上海第三次起义巷战胜利发布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全国工人阶级书等文告止，前后共一个月又四天，一言九鼎的陈独秀主持了二十九次特委会（有时一天两次）。武装起义当天陈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北安填坊中宣部督战，因《向导》编辑郑超麟住在此地，成了陈与施高塔路恒丰里（今山阴路六十五弄）由罗亦农坐镇的起义指挥部之间的交通。二十二日凌晨三时，陈亲自去恒

^① 起义时薛岳部就驻起义指挥部所在的闸北区，起义后薛岳被调防，由刘峙部接替。

丰里参与总指挥。

从三月二十八日起到“四一二”清党是半个月——从起义开始到失败，合共四十九天。国共分裂从此日算起！但彻底分裂尚待三个月又三天，这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的九十三天！陈独秀在这九十三天中所感受到受制于国共合作所产生的各种棘手的问题，欲解决而无权的困惑；革命速度的刺激；武装工人的伟力；枪炮火拼诱惑人们的冒险精神；捕捉战机的千钧压力以及胜利后的喜悦，超过他前半生，也是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最后一次辉煌业绩。然而，谁又能想到这辉煌的九十三天竟使陈独秀在戴着污蔑农民运动帽子的上面还套上了一顶组织与指挥工人运动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在一本研究陈独秀思想的小册子上指责“汉口特别会议以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①。汉口特别会议召开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就是说一九二七年起陈独秀就一错到底了，那么胜利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呢？在理屈词穷无法回答的情况下就不顾历史真相，硬说是错在陈独秀没有利用起义后“高涨的”革命形势壮大革命力量，而是“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一方面他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企图以妥协退让来缓和冲突，说对于蒋介石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差不多都可以答应”。“另一方面陈独秀把阻止时局逆转的重点放在以汪抑蒋上面”。从方法论的角度，这种为证明一己结论的需要而断章取义摄取证据，如今已扣上“以论带史”不值一驳，但是对于陈独秀，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方法，都是一个目的：把他拴在右倾机会主义的耻辱柱上。前面曾经多次指出对蒋“妥协退让”和“以汪抑蒋”皆是共产国际指令，不得违抗。陈独秀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处在不得违抗的困境下尽量力争上海工人起义的主动权，尽量不受共产国际的干扰。^②

当北伐军从广州出发直下两湖江西，实现二个月拿下武汉的加伦计划，陈独秀已经觉察蒋有二心时，共产国际捧出汪精卫要中共倾心武汉政府，有鉴于这一明显右倾的中国政策，陈独秀才在二次失败的废墟上急不可耐地策划第三次起义，在产业工人全国为最的上海造成一支工人武装，以备不测；也正由于他觉察出逼临上海的何应钦部白崇禧部将以城下重兵迫使工人的上海投降，因此他在起义胜利后首先强调的是，一，工人武器装备不可交出；二，动员工人纠察队、农民武装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支持起义的薛岳部使之倾向武汉政府；三，把倾蒋派的代表清洗出上海市政府委员

^① 魏知信《陈独秀思想研究》第8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下同。

^② 据郑超麟回忆，1926年苏联又多了三个人干预中国革命，“曾发表过这个意见：陈独秀不能执行新路线，但另换一个领袖是不成功的，因为他在党内的威权太大了”。见《郑超麟回忆录》第132页。

会；四，按照共产国际和武汉政府的要求准备迎接汪精卫。^① 四条的核心是第一条，在起义成功后第三天晚上中共特委会讨论“对付白崇禧要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的办法”时，陈独秀强调：“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②，只差一点就指名道姓点“蒋”了，正是这一“点”，在共产国际的阴影下捆绑住了陈独秀的手脚，但总书记仍在努力，他说：“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此时的上海，就像一八七一年五月的巴黎，凡尔赛梯也尔杀手们调集了大批军队（其中主要是色当一役败在普鲁士阵下的“皇家”俘虏）完成了对于工人巴黎的包围。巴黎公社委员会虽然有多数派和少数派之分之争，但保卫巴黎的决心是一致的，决策权是主动的。一九二七年工人的上海，中共领袖们的决心是一致的，却无决策权，权在武汉，权在上海苏联领事馆，权在莫斯科！巴黎的工人是走向战场的牺牲，上海的工人却惨死在昨天是朋友的枪口下。巴黎和上海的工人都死得英勇，惟一的区别是上海工人死得不明不白死得窝囊。过去把责任推在陈独秀身上，如今证明是个大冤案！因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抛弃”还是“马上动作”以决定上海工人命运两造间，选择了后者，他说：

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陈独秀是“投降”吗？右倾吗？“双手把工人武装交给国民党”吗？一切为之辩护或翻案，在这一斩钉截铁的“与之决斗”中全都显得多余！也许这就叫“铁证如山”罢。

但是事与愿违，因为蒋介石是共产国际看好的中派；仍然是武汉政府团结的对象，因此才被迫采取诸如“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反张”，工人罢工要征得“国民党及老蒋的同意”等等右倾让步举措。^③ 这一切都是在共产国际“一，不要用武力冲入租界；二，注意左右派的冲突”的指示下作出的让步；二十六日蒋介石到上海，中共特委立即开会作出“蒋来别有用心”的决断，坚决维持工纠队武装，并作好再次巷战的准备，同

① 参阅 1927 年 3 月 23 日夜起义特委会议记录，载《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 37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2 月第 1 版。

② 陈的上述意见是 3 月 18 日最后一次会议上由罗亦农转达的“老先生来函”，第 389 页。下同。

③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 428 页。

时致电武汉政府要求撤走替换薛岳的坚决拥蒋的刘峙部等等防范措施,然而这一切全都白费心思。上海的中共中央较之巴黎公社委员会更面临腹背受敌之苦,陈独秀更不能如国际巴黎支部的创始人瓦尔兰(一八三九—一八七一)一样正面对敌,只得如鲁迅所言横着战斗以提防暗箭!

陈独秀从写出第一篇军事论文到第三次武装起义,充分说明若要论以知识分子报国,在中国非掌握武力莫属,应验了老祖宗的雅训:投笔从戎。

成功的起义使陈独秀的威望在上海的中央干部中达到顶点:“陈同志是我们中国革命领袖,我们应一致表示,坚决的表示拥护陈同志的报告(一致拍掌)”,“我提议大家坚决表示拥护陈同志(一致拍掌)”^①,这就是历史真相。

翻过这一页,“陈同志”就惨了。

三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到上海,陈独秀拒不会见。^② 不仅不见而且准备反他,罗亦农、彭述之、周恩来、赵世炎等全都同意。但武汉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不同意陈独秀和上海中央提出的“进攻蒋军”^③的计划,大概是为避免陈独秀干出有违国际驻武汉代表指令的缘故,接二连三电催陈独秀所带领的半个中央到武汉参与所谓的左派政府工作,中共临时中央则催陈来武汉准备中共五大。果真能成行还算幸事,不幸的是四月一日汪精卫从国外回来,成了武汉政府——当然也是共产国际——内定的领袖,这个克星使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又加一码,就是《汪精卫陈独秀宣言》。

令人费解的是中共方面最早见汪的不是领袖陈独秀而是周恩来:“自从暴动以来,陈独秀就在我的房子居住了,他占了我的床,我则睡在办公室里的一张竹床上,周恩来来,我们还未曾睡。独秀、我,以及其他宣传部的人员都在办公室里。恩来说:‘三点水’来了,我今天得到俄国同志通知第一个去看他,此时别人还不知道。”^④汪精卫出国回来,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不通知陈独秀,这实属奇怪。“周恩来主张直接送他到汉口去,不让他在上海同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员见面,陈独秀赞成这个意见”,其实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私下会见了蒋介石、吴稚晖、蔡子民、李石曾,“见面之后,蒋同志等提出两件事,要兄弟赞成,一是赶走老鲍,一是分共。从四月一号到五号,一共五天大家都是商量这两件事”^⑤。汪精卫不是不同意而是“以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以上这些事,周恩来是否比陈独秀先知,今

^① 3月25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4~403页,引文在第403页上。

^②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38页。

^③ 《告全党同志书》。

^④ 《郑超麟回忆录》第118页。

^⑤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474页,下同。

不可考。共产国际及其驻上海代表肯定是知道的，因为汪是被“俄国同志”护送回来的。汪精卫的狡猾乃在于他在与蒋介石谈判的同时还与陈独秀斡旋，又是由周恩来中介引见的，“有一天，他（指周恩来——引者）同独秀出去了。独秀回来，说他去看了汪精卫，汪精卫告诉他，已经同蒋介石见了面，在座的还有吴稚晖及其他的人，吴大骂共产党，蒋则不做声。独秀说：吴蒋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日夜里，独秀写了很久。那就是有名的《汪陈宣言》稿子”^①。写完，由周恩来送汪精卫签名后返回再由陈独秀签名。当时陈独秀似乎颇得意于这个宣言，曾同郑超麟说“大报上好久没有登载我文字了！”宣言实际上是根据共产国际指令上海起义工人避免与蒋发生冲突，以及迎汪抑蒋、拥汪反蒋、汪蒋合作之类纯机会主义策略所作的缓兵之计^②，“宣言”得到领导工人起义的干部的欢迎，以为从此“许多造谣中伤的右派伎俩都将打破”，因此还号召拥护“宣言”；与此同时再次提出“特别宣传我们的领袖陈独秀同志”^③，显然为的是与汪精卫对等。笔者以为此时提出宣传陈独秀，其内在的依据仍然是共产国际的国民党情结作祟，不过这时看好的是武汉国民政府和汪精卫的国民党，但缺了共产党又不行，当然就要汪陈联袂了。不知其时的陈独秀是什么心情。两年后，陈独秀把《汪陈宣言》斥之为一个“可耻的宣言”^④。这当然是“四一二”和“七一五”的教训使他悟到上了一个大当。

《汪陈宣言》四月五日见报，第二天汪精卫登船顶水武汉。当汪精卫登岸受到党国政要和国际代表隆重欢迎的九日，蒋介石离沪赴宁，行前他在向上海总工会赠送锦旗的同时暗中布置好三天后发动政变的一切准备。

也正是九日这一天，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以前所未有清醒的现实主义手笔写成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发表，作狮子吼：“打倒叛变革命，屠杀民众之蒋介石”^⑤，这篇文章使诗人落入南京政府的通缉犯名单，亡命日本十年。

四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武汉国民政府、共产国际代表全都傻了眼，可以说，比较清醒的只有陈独秀一人！因为在离沪之前，他在特委开会时已做好了对付蒋倒戈反共的实力准备^⑥，因此在“四一二”后的第三天白色恐怖下上海工人在罗亦农、周恩

① 《郑超麟回忆录》第 118 页。下同。

②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电令上海中央“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在地下”。《告全党同志书》。

③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 449 页。

④ 同注②第 90 页。

⑤ 载《革命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8 月第 1 版。据周恩来在起义后 3 月 30 日特委会上说“政治部方面，郭沫若快来了，但蒋对郭很好，不知能反蒋否。”就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在民众方面，要推重郭为知识分子为代表。”同注③第 437 页。

⑥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 444 页罗亦农的发言和赵世炎的补充发言。

来、赵世炎等领导下仍然能发动六万工人罢工示威，并作出了党转入地下活动，再次武装暴动实行红色恐怖等决议。

陈独秀苦心经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第一次巴黎公社式的巷战业绩，如今终于被镌刻在历史丰碑上。

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政府作出了免除蒋介石本兼各职并开除党籍命令：“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但这又有什实效呢。具有讽刺意义的，正是武汉政府发布斥蒋令的十七日那天，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组成九人政治会议委员会，任命胡汉民为政治会议主席，吴稚晖为政治部主任，并宣布十八日国民政府正式在南京揭幕，他把武汉政府全都给“开除”了！似乎应当着重指出，那时，国民党的大多数元老和干部都在南京，并服膺于蒋介石的政治主张。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资产阶级政权——中华民国政府（南京政府）只等着武汉投降了。

从此南京和武汉对着干。十八日，武汉国民党部宣布蒋介石“十二大罪状”；南京国民政府则发出包括鲍罗廷、陈独秀、邓演达等一九六六个国共精英齐整的“黑名单”……

一九二七年四月的中国，成了一个共产党两个国民党（宁、汉）和三个政府（宁、汉、北京）的政治格局，还有固若金汤的东北张氏父子天下，够复杂的。

共产国际的态度如何？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十六日就“四一二”事变发表告世界工农和被压迫民族书。《真理报》还配发了布哈林、斯捷茨基等署名文章，归结起来的内容是一，抗议；二，巧辩过去支持蒋是正确的；三，中共仍留在国民党内不准退出；如今指的是不准退出武汉的党和政府。共产国际在武汉的代表就根据莫斯科的原则制定：一，以第三国际名义由罗易起草致电蒋介石批评他违反与汪精卫所订的协议：拥汪担任党和政府主席，“劝告”蒋放弃在南京开会分裂政府和党，一句话，要蒋回心转意，真乃天真到家了；二，厘定中共五大的政策走向；三，仍由罗易出面电报冯玉祥表明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北伐的决定，要他配合，这就是“西北理论”^①。二十五日共产国际代表在鲍公馆召开国际和中共联席会，一是决定二次北伐路线和时机；二是采取让步政策（尤其是土地问题上）。鲍罗廷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形势严峻，与十月革命后新俄受列强包围相似，为解围以使革命能喘口气并选择最佳反攻时机，列宁决定与德（奥、土、保）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四一二”后的中共也应效法。让步是无产阶级单独行为，而且还是全

^① [美]A. B.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1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所谓“西北理论”就是鲍罗廷感到“四一二”之后反蒋已不成，就想拥出冯玉祥建设西北革命根据地。此事曾列入中共五大讨论。但是“七一五”宁汉合流就把冯玉祥也合入南京政府。

方位的，尤其着重提出中共在农民和土地问题政策上要“取缔一切所谓过火的群众运动”的右倾色彩浓厚的让步。鲍公馆的这次会议上所议决的“二次北伐”由于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也就没有任何动作，三个月后，“七一五”宁汉合流一切全成空想。至于限制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农村打击地主、没收兼有地主身份或有地产的北伐军将领和军官们的土地、分浮财抗租、游街示众杀地主阶级威风等“农村革命”泼冷水灭农运之火等等，共产国际一撤走，又全都算入陈独秀农村政策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账上。其实，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是根本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已经无所谓右不右倾了，看看中共方面一个资料即可了然。四月，国民党执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五人组成“中央土地委员会”，国共双方三比二，经过三个多星期的努力出台了国共合作的《对农民宣言》。事后两个共产党委员向中央（也可能是向共产国际）递交了工作报告，中心意思是国民党“根本不想实行改革”，于是才有中共的让步政策。^① 中共方面如若硬起来，只能是提前“宁汉合流”的时间，国共两党全都被酱在黄土地上，因为北伐军将领和军官不少自身是地主或家属亲朋是地主；军阀驻地粮饷基本上靠地主，国民党的主要成分资产阶级大多是大地主走向城市的立业者，像章鱼一样多的腕脚缚住了中共，如何实行土地没收政策？无论从理论从实践上，土地问题是不可能北伐战争中解决的，这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以及半封建半殖民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因此才有国共分裂及分裂后被称之为“土地革命”的国共战争，一战十年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才达到在中共管辖的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最低标准。这么一分析，谁也不必对或左或右的农民和土地问题背包袱了。

“四一二”后的中国共产党如何？一句话：积极挽回残局，陈独秀则在为他的总书记一职尽最后的努力。

四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委派李立三、陈延年冒险赴上海研究“四一二”后的对策，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同来。决定由李立三、陈延年、维经斯基、赵世炎和周恩来组成新一轮的特委，陈延年代理中共上海局书记，罗亦农调武汉。上海特委第一次会议就产生矛盾，即先北伐还是先反蒋。会后，由周恩来起草共同署名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文中述毕出师之政治意义后指出在军事上是有胜利把握的，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也作了与上海特委相同的出师能胜的估计。^② 但是，这乐观估计的政治要求是武汉政府应是真正的左派，令人遗憾：它不是。

^① 参阅蔡和森在中共六大上的发言，《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第1版。

^② 《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周恩来选集》上册第6页。切列潘诺夫的意见见《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537页。

正当国共双方、共产国际与中共没完没了地开会研究如何对付南京政府时，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叛变，二十一日许克祥叛变，前者险些使武汉失陷，后者是著名的“马日事变”，其打击武汉的力度决不低于“四一二”上海事变，共产国际代表，尤其是鲍罗廷真正觉悟到两个国民党和两个政府都已无可救药的就是马日事变。一次鲍罗廷在会上当着中共领袖们说：“血的教训，已无情地告诉我们，靠国民党军队，我们的革命只会革掉自己而不是敌人。”^①果真幡然觉悟改弦更张正好与上海特委、切列潘诺夫想法一致，但是五月的共产国际莫斯科总部，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仍然决定：“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党内和国民党党外的领导作用，就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②，以上是斯大林指令，为了批判托季反对派的坚决退出国民党的中国政策，斯大林还援引马克思加入莱茵省资产阶级民主联盟编《新莱茵报》以发展革命，等待时机成熟才脱离联盟，成立一个具有完全独立的阶级政策的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的例子，证明中共必须坚决留在国民党和武汉政府中等待时机。但是斯大林忘了，一八四八年不等于一九二七年，德国也不是中国，莱茵省资产阶级民主联盟也不是武汉国民党，而马克思的对手更不是蒋介石或汪精卫，这种比喻只能使中共失去自主权、失去警惕性。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五月决议当然是斯大林讲话的诠释和演绎，就不必引证了。五月决议辗转到武汉是六月一日，已经根本没有实行这个纯然是乌托邦式的决议的任何时空条件了。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向国际发电：同意决议，但不能实现。这大概是“老头子”的黑色幽默罢。顺便说一句，这是总书记任上陈独秀致共产国际的最后一个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四月二十七日在武昌第一小学开幕，五月九日闭幕于黄陂会馆。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国民党地区召开的最后一次全国党代会，到会代表共八十三名，国际代表除鲍罗廷、罗易和维经斯基外，又来了两个代表就是把中共推向极左路线的大名鼎鼎的米夫和赤色职工国际总书记罗卓夫斯基，他本是前来参加五月二十日举行的太平洋劳动会议的。主席台上还坐着徐谦、孙科、谭延闿三个国民党代表。陈独秀作了他连任了七年总书记以来的最后一个代表全党的报告《中央政治和组织的报告》。这个作在“四一二”、“七一五”之间的报告，相当全面地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重点在五卅到北伐）时期的风雨历程，既有他个人的教训、失误和整个党在理论和实践（中共自身建设、与国民党合作）上的成功和教训，也委婉地指出了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失策和错误。陈独秀和他的报告，在五大上已经不被重视，似乎也引不起代表们的兴趣了。五大的

①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期第109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307～308页。

重要报告是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他全面地批判了党在理论指导和政策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被归纳为十七点党内“退步”政策的错误（后七条是北伐时期），在当时是令人信服的，今天如何评价则可以研究，本传不必全论。只应指出，瞿秋白这个报告中的十七条意见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托洛茨基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的权威文件，全文一开始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中国的托洛茨基的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雏形”，十七条意见阐述完后留下一个问号：“是不是有孟塞维克第二国际的原素在内呢！”^①瞿秋白把托洛茨基机会主义的中国党化，称之为“彭述之主义”，坐在主席台上的总书记显然明白这是学生放老师一马，尤其是当瞿秋白说到右倾机会主义“并非彭述之一人独创”、“彭述之主义者还很多”时，谁都明白陈独秀必在其中。不过五大时，无论是彭述之、陈独秀，还是在座代表尹宽、郑超麟、汪泽楷、高语罕等后来的托派，都不以为是一顶沉重的政治帽子，瞿秋白提到托洛茨基第二国际，更不会有这个意图。

这里要研究的是，瞿指出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孟塞维克主义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是不是也陷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里拔不出腿呢？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的悲剧就是脱不出共产国际的国民党情结。瞿秋白批判了好一大圈最后竟然也绞入了这个情结：“共产党员绝对应当加入国民党，努力发展国民党，使成为中国平民的真正代表民族的党”。因此五大作出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议决案》中仍然是老一套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闹革命，甚至写得令人感到有点肉麻了：“革命的现阶段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紧密”，“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②，这后一引就是斯大林要中共既留在国民党内又要参加武汉政府的指示的复诵。

五大，陈独秀仍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是陈独秀威望的最高表现，实在是出乎共产国际意料。中国共产党对他的领袖是有超乎寻常的感情的。这就迫使共产国际采取断然措施：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决定，由鲍罗廷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张国焘（负责）、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和周恩来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从这一天起，连续七年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被不明不白地暗中除名。第二天鲍罗廷与瞿秋白突然去庐山，二十一日回来临时常委增加了瞿秋白，并决定召开国共分裂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在国际代表不准陈独秀参加的情况下，选出了新的政治局，其三人常委是瞿秋白、苏兆征和李维汉。瞿秋白成为临时中央负责人，替代了陈独秀。瞿秋白出任总书记是无可厚非的，受命

^① 转引自《六大以前》（中共中央书记处编）第670～73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第1版。下同不另注。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集第56页。

于危难之际。这个仅半年的职务葬送了他年轻的生命，但缺席裁判陈独秀是极端错误的，给中共以后采取非正常手段制裁干部开创了先例，这当然是共产国际授意，下面会专门谈到的。

正是鲍和瞿在庐山期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宣布倒戈反共投诚南京政府，史称“宁汉合流”，又是一派白色恐怖，武汉成了继上海、广州、长沙之后第四个血洗的城市。从此日起，国共两党正式分裂，中国总算“统一”，内战自然难免。

鲍罗廷下山回到武汉的第三天，罗明纳兹和他的助手纽曼抵达武汉，二十七日，从一九二三年起在中国经历了国共合作全过程的“国师”鲍罗廷带了他的庞大的顾问营撤离武汉经内蒙历尽千辛万苦灰溜溜地回莫斯科^①，不仅结束了他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鲍氏对中国革命尤其是对国民党的建设和国民革命创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中山舰事件之后，他虽然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应与他的中国伙伴陈独秀一样，不能负全责，更不必责怪他，一个国际主义战士受共产国际的委派帮助中国革命，虽然和他的妻子、孩子们同来，但毕竟作出了重大的个人牺牲，无论如何是值得尊敬的；从某种特定意义上——比如他特别信任孙中山而给予了国民党的无私援助，国民党更应永志不忘老鲍的业绩。

八七会议开创了中国人民革命新纪元，八七会议前的八一南昌起义，八七会议上决定的秋收起义，宣告了中国共产党转入武装斗争阶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到了从前的朋友变成今天正面战场上的敌人的八月，竟仍然作出：“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此政府仍用国民党的名义，但我们要占多数，成为工农民权独裁的政府，乡村中要农会政权。”^②上述引文是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这次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是新到任的罗明纳兹，可见瞿的讲话代表了莫斯科的最新指示。谁都没有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中国政策右！“宁汉合流”后哪来的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借用其“名义”？既然政府是国民党的，“我们”（中共）怎么占“多数”？八月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南昌打响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一枪，已经成为地下工作的“反动政党”，它的前总书记及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新中共政治局成员几乎全都列入南京政府通缉犯名单，而共产国际要“通缉犯”们把这个政府改造成“工农民权独裁的政府”真是右到了连陈独秀想都不敢想的程度！这才是中共右倾历史真相。

八七会议上罗明纳兹的发言对于指导今后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否定过去的部分，实在令人不快，竟然说出“过去党的策略是反工农的，是可耻的”^③。一笔勾销了一九

① 老鲍艰险的返俄历程可参阅陈丕士《中国召唤我》第三、四部，商务印书馆1983年8月第1版。

② 《中央党委代表瞿秋白的报告》，《“八七”会议》第71页。

③ 罗明纳兹的报告见上书第53页。下面罗亦农和任弼时的发言分别见该书第63、65页。

二七年八月前的中国共产党，且莫说委屈了陈独秀，包括前共产国际在内，谁都逃不脱“可耻”的酷评！

八七会议上六个代表作了关于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当然是全都同意罗明纳兹的报告，惟独罗亦农对共产国际提出批判：“大家都说国际是无错误的，我要公开的批评国际，国际的政治指导不成问题，是对的，但在技术工作上非常之坏。”他说的技术工作是指派出的代表维经斯基没有俄国革命经验，罗易则犯了左派幼稚病，言下之意当然是没有资格指导中国革命。不论罗亦农的话是否讲透，批评是否准确，能向国际提出批评就是好样的。法国留学生罗亦农的发言还有一股情绪甚至可以说是怨气，因此才讲了“中国共产党需要有布朗基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理论当然与布朗基主义革命理论不同，但有些人借口反对布朗基的冒险主义和漠视群众运动的时代局限性错误，连起码的斗争意志都反掉了。陈独秀若有幸听到罗亦农发言也许会感慨万千的罢。

据目前已经公布的资料，八七会议的全部文件和与会者发言除任弼时外，没有涉及陈独秀的任何言论，连罗明纳兹的讲话（文本）中都不露一点清除陈独秀的痕迹，我们只在任弼时的发言中的最后一段找到一句话：“老头子可以去莫”。自此之后共产国际总部曾通过瞿秋白、李维汉等多次提调陈独秀去莫斯科，陈独秀坚决拒绝。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这又是陈的严重错误。其实这是明智的拒绝。不然他将客死饿乡。

中共五大之后的武汉，热热闹闹到了七月十五日，悲惨凄凉过了八月七日，一直处在斗争中心的陈独秀孤独地与秘书黄文容先住在中共出版局开的由汪原放负责的宏源纸行楼上，后来又搬入工人区。从五大到“七一五”之间有时陈独秀还被邀参与共产国际和党的一些会议，后来就冷落下来。陈曾在允许他参加的会议上提出过一些很可参考的意见（说“参考”是因为他的话已没有权和法的保障了），只是因为他仍与共产国际不准退出国民党的指示顶牛，甚至顶到了连鲍罗廷也认为陈言之有理，“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①。也许正是这既有怨气又有道理的话，打动了鲍罗廷，他才直言不讳地对陈独秀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许。”陈独秀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当时在中共内部曾经得到多数的同意，至少是同情的。如当共产国际同意中共退出武汉政府，中共据此发表宣言一见报，工运领袖王荷波就说：“我们工人看了此宣言，虽未扬眉，但觉吐

^① 《告全党同志书》第90页。

了一口气——晦气”^①，可见陈独秀的意见代表着中共大多数。因此后来的托派郑超麟才说过一句沉重的话：“如果没有第三国际外来干涉，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领导底下决不会有大的争论以至分裂的”。

读者不禁要问，共产国际为什么始终怀着国民党情结，以至连瞿秋白都说中共只能等着国民党开除。总归有为一己利益的难言之隐的罢。终于悟出一点道理的张国焘自问自解地说：“共产国际为甚么要如此？”“我们中有人觉得共产国际要中共这样做，是为了使苏俄人不致完全退出中国，避免苏俄的国际地位更加恶化……莫斯科主要是在为苏俄的处境着想，而不是单纯地为着中共前途的利益着想。”引在这儿，但愿不致被认为是在污蔑苏联援华政策。

成了寓公的陈独秀遭受了一次严重打击：四月十八日派往上海的陈延年，于六月二十八日被捕，很快于七月四日被枪决。这位被乃父以“兽性主义”培养起来的硬汉子牺牲时不足而立之年他只有二十九岁！幸好此时乔年在他身边，也许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则花絮，那时乔年已有了女朋友，算是世俗意义的媳妇罢，叫史精益，武汉人，据说很时髦。能不能给晦气星高照的人父带来些许天伦之乐呢？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可能做梦也不至于想到——八月九日，苏联政府在发表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中的中国革命部分中仍然有如下的内容：“共产国际认为，必须及时预见到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的转变……要创建相应的强大据点，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工农和城市贫民去进一步发展和深化革命……实现国民党民主化，撤换动摇的领导者，这就是国际的主要口号。”^②人们不会忘记，这个日子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完成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也已经由八七会议议决，把此项重任交给了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分赴湖南去湘赣边界筹划；国民党已在筹划“各省之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事馆，一律撤消承认”，决心与苏俄绝交，因此而使共产国际指令中国“采取一切措施发动国民党左派基层反对它的上层”啊，“实现国民党民主”啊等等诸如此类的策略，全都落空。凡是这一切，当然已经不必陈独秀来承担右倾机会主义的责任，却分明看出，在陈独秀退出历史舞台随之而起的新一代中共政治家们仍处在共产国际发出的与中国革命发展不相符的指令的怪圈之中。一直到黑色的一九二七年末的广州公社起义，五千死难工人、干部和共产党人的鲜血，才使共产国际彻底地从右的或违反中国革命规律的瞎指挥中清醒过来。

一九二七年秋，当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和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率领整编

^①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9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343页。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开始秋收暴动的日子里，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寂寞地登上武汉到上海的下水船。这是作为中共党员的陈独秀最后告别武汉。我们找到记录此事的一则读来忍俊不禁的资料。原来，这位昨日还是指点江山的“老头子”要回上海这么一个险象环生的重大交通转移都无组织照管，是依赖亲朋安排的——

有一晚，乔年对我说：“今天父亲对我说，要你去一去。明天，我和你一道去罢。”

我们去了走到一个一楼一底的门口，一张竹床上，有一个人面孔朝屋内，头靠着门躺着。乔年和我进了门，他一头坐了起来，肩上披了一条粗夏布的大围巾，手上还拿了一把芭蕉扇，说：“来了？”我才知道是仲翁。

未知读者看到这儿心中是什么滋味儿？不难过一下吗？

陈独秀就能否回上海一事托汪原放先行赴沪与亚东主人汪孟邹合计。当时汪原放公开身份是《民国日报》馆营业主任，内里是中共出版部长。他要乔年帮汪原放把手头工作移交给毛泽民，谈妥，临告别时，陈独秀竟然还有情绪发问：“刚才你来时，看见我像一个工人罢？”汪原放还能选择什么答词呢。前中共总书记就是“像”工人又能如何呢。在陈大概也算是隐身生活给予的神秘主义快感吧。

汪原放很快上海一个往还。向陈独秀说，“四一二”恐怖已过去，家叔汪孟邹以为可以回上海了。九月十日，陈独秀装作病号，在黄文容、陈啸青和汪原放陪同下登上“公和”号英轮。船上并不安全，汪原放发现贴着一张写着大意是“国民政府如果要在船上捉人、捕人，本船概不负责”的英文告示。于是只得猫在舱房内生活，“我们闲谈时居多，只是闲谈”。仲翁有时会说一句——

中国的革命，总要中国人自己领导！……^①

船经安庆，陈独秀可曾隔舷窗望一眼故乡，岸边迎江寺里那座象征着陈家祖坟前一枝笔的振风塔有否记起时年四八脑袋拔顶的家乡人的无限感慨？

含辛茹苦孤身一人强活在破败的安庆城的发妻高晓岚，能心有灵犀遥望江中顺水东去的英国轮船上正载着她的夫君？陈独秀如若知道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顺江淌过家园也许就不会责怪我们婆婆妈妈了。这些全都是我们预测传主的心情，本人是任什么也不想一心只想到“中国的革命，总要中国人自己领导”。这可以算作是陈独

^① 《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29页。

秀七年共运经历作出的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结论,这个结论可能是片面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是重要的,最初的设计也是可取的,中共因此而获得了发展壮大也是举世公认的。不过,当我们设身处地细细品个中滋味儿,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此话也不无由惨痛的教训中得出的真知灼见。关键在于用什么理论和策略一反中国革命由外国人遥控而实现《国际歌》的理想:“全靠自己救自己”。陈独秀不会放弃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意志和信念,但路怎么开拓呢……

船终于靠上了上海码头,汪原放把陈独秀安顿在黄河路酱园弄一熟朋友家中。汪孟邹是陈独秀抵达上海后第一个想见也是最早前来洗尘压惊的老友,已有二十五年天长地久的友谊了。从此陈独秀开始既紧张又危险的地下生活,直到一九三二年冬被捕,东躲西藏长达五年,至于这五年的政治生涯将是本传继续写下去的“重头戏”,读者关心的热点。

陈独秀到上海的同一个月,中共中央亦潜回上海,从此中国共产党作为非法存在的党派一直活动到一九三四年撤到江西苏区。不久,人们将发现中国出现了两个共产党。

令人感到不快的是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后,把跟随陈独秀照料生活和处理事务的秘书黄文容调去编《向导》。从此,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行政上的关系,尽管他仍然是一个“特别”的党员,却真的成了孤家寡人,新中央似乎太绝情了。

第四章 笃信托洛茨基

(一九二八—一九四二)

左右撞击,别谋革命途径

回到上海后的陈独秀踏步在四个月前巷战的街道上,不仅寂寞、窝火而且时刻使他感受到革命受挫的悲痛,来前一个月,大儿延年牺牲在共产国际一股劲地要他退让妥协者的党的枪口下。过不了几天,一直受陈独秀器重授以在法国建党重任的世纪同龄人赵世炎,也在上海被捕并枪决!在亲人和比他小一辈的伙伴的血泊中,素来重感情的安庆汉子不知如何调整自己的情绪,不少研究者说他沉默而又消沉,成天用文字音韵麻醉自己的神经。这种看法实在不敢苟同。

陈独秀一生酷好写诗,前面我们曾写他辛亥革命前那二三年间同乡同学好友一个个倒下,沉痛之余他还能“怒向刀丛觅小诗”,愤怒出诗人嘛,然而在一九二七年上,一个行将五十的老人,经历了暴风雨带来的那种莫可名状的痛楚,诗,有时是思想被突如其来的刺激至于处在真空期的产物。受重大的革命失败冲击的陈独秀在高度理智地总结历史教训时期,尽管被绝情地冷落到一个秘书都被调走的苦况,却谈不上思想真空,无情绪端坐在书斋里写诗以排解郁闷或发怨气,他在“四一二”的废墟上体味旅途中得出的关于中国革命要由中国人领导的结论。革命是速度运动,一个领袖在失败面前只能用理论用逻辑推理总结教训。陈独秀首先为自己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都被共产国际纪律压服而后悔,因中共受到严重损失使他对共产国际和苏共产生强烈不满,是可以理解的:“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身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我虽未能及时彻底认清这个失败的教训在找出新的出路”^①,看来我们前面的分析是有道理的,陈独秀并不消极,他在反省在找革命新出路。他的不满或抱怨是

^① 《答国际的信》,《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1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以下未注明引文之出处者,均出自此文。

“过去整个的政治路线之必然应有的结果。然而国际的领导机关却轻轻地把这个失败几乎简单的归过我个人”。陈独秀认为把过失归于他而能解决问题，也就认了，但为了掩盖共产国际错误和事实真相而把他当作替罪羊，“其罪实不可恕！”驳得好，驳出了历史真相：

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国民党的领导”这句话，在史大林口中叫得异常响亮（见《中国革命问题中反对派的错误》），所以始终要我们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用国民党的名义，国民党旗帜领导群众。一直到冯玉祥、汪精卫、唐生智、何健等全国国民党公开的反动，公开的取消了联俄容共……国际还电令我们“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①

陈独秀很为自己和伙伴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只看做是国民党的内阁”抱不平，记得张国焘曾批评陈独秀始终以“客卿”身份对待国共党内合作，孰料整个中共都是国民党的“内阁”，怎么争领导权？难怪他的领袖有客卿思想了。这种对斯大林对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大概就是日后转向托洛茨基对中国政策的一个情绪因素。这里应说明的是，陈独秀虽然对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中国政策有意见，想单干，但绝无排斥国际主义的沙文主义思想，二十年代某些资产阶级国家共产党的壁垒政策，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一开始便受到陈独秀以及邓中夏等工人运动领袖的批判，后来陈独秀在伴有深自懊悔情绪的《告全党同志书》中慎重指出：“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所产生之幼稚的共产党，本来就没有相当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锻炼，一开始便遇着大革命的斗争，只有在国际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指导之下，方可望不致发生很大的根本错误。不幸在以上这样始终一贯的机会主义政策指导之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怎么会看清自己的前途，怎么会有自己的独立政策，只有步步投降于资产阶级，附属资产阶级，以致一旦资产阶级的大屠杀到来而我们没有一点办法。”可见陈独秀不是拒绝共产国际，是拒绝它的错误的指导。但共产国际是绝对权威，批不得的；这个组织一旦自觉发生了错误也决不自我检讨而是归罪于各国“支部”未能“灵活运用”，“机会主义”等等不一而足。陈独秀开始建党时是不同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加入后他确实恪守纪律，是国际的错误指导和专横的组织纪律，迫使中国总书记走向反对共产国际之路。

直到一九二八年，陈独秀还为美国报纸攻击第三国际而撰文反驳以捍卫其声

^① 参阅《告全党同志书》。引文中“冯玉祥……反动”是指1927年6月10~11日冯玉祥、汪精卫郑州会议以及19~21日冯玉祥、蒋介石徐州会议后参与宁汉合流叛卖原与中共合作的契约。

誉。^①

我们现在很难确认陈独秀是在什么时间读到召开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文件的，正是这次会议中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猛烈抨击托洛茨基，以及季诺维也夫提出的中共应当退出国民党甩掉国民党独立革命的讲话的。前曾提到国际五月决议传到武汉是六月一日，陈独秀还回复了一份拒绝执行的“黑色幽默”电报。如六月一日同时见到斯大林的讲话，那么可以肯定托洛茨基的与斯大林截然相反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启示了中共书记另一种思索途径。于是就可以谈谈“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政策的传入、陈独秀研究托洛茨基，以及中国托洛茨基派形成及其活动诸问题了。

在序言中我们曾经说过托洛茨基是在一九〇五年“流血星期日”感召下带了他那“日后使他一败涂地的‘不断革命论’的理论体系”投入俄国革命的。“不断革命论”(Permanent revolution)在相对落后——比如封建制农业为本的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民主革命，指的是在胜利后不必经过建立民权主义的“工农民主专政”而直接进入无产阶级专政。托洛茨基的这个理论直到今天还因存在第四国际仍然有势力在宣传，但近代革命思潮中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历史上，“不断革命论”只是在解释俄国革命(一九〇五、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时发生过具有历史意义的争论。本传关心这一理论纯然因为它不只葬送了托氏本人而且殃及东方同行的就是那场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华岗语)。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在解释俄国问题时，他否定了列宁的关于俄国革命是经过“工农民主专政”而衔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是按中国托派理论家的说法是“俄国革命并未曾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口号，而发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结果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是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完成的”^②。这两种不同的答案，竟然都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符合各自需要的理论依据，笔者当然有倾向，却不能也不必过多地纠缠在枯燥的理论思辨中作传，只想说：若从正面意义上运用“不断革命论”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其重要的一步——按最简单的诠释法——是坚持民主革命(当年的提法是民权革命)；若从相反方向来论证还得取决于参加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既有要求进行民主革命的决心，又不具备革命胜利后向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的政治的军事的力量，没有这两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会胜利；如若胜利，无产阶级只会落到资本主义立国的工业奴隶地位，决不会成功为工农民主专政，也就不必提无产阶级专政。沙皇俄国从十八世纪起已经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农业亦因农奴制逐步解体，又经民粹主

① 《第三国际之野心?》。

② 《郑超麟回忆录》第 222 页，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9 年 7 月出版。

义运动的深入开始萌发自由、民主革命参与意识,因此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克伦斯基政府建立才八个月就被列宁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党和工农红军推翻,一步到位无产阶级专政。这样说来,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没有错误。但是不能这么肯定,因为这只是笔者的一孔之见,面对这段历史可能是“仁者见仁”的仁论,也可能是谬论。当然现在来说“错误”或“正确”,只在历史研究的范围内纸上谈兵,因此,从读者想了解中国托派命运的心理的角度,和本传的需要,关心热点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斯大林的分歧究竟何在?为什么斯大林以为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中共)应比防洪水猛兽过甚之心防范不断革命论?^① 由于半个世纪来一直把托派诬陷为“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②。如今要说明白斯大林和联共(布)用什么原始手段把托洛茨基从列宁的副手打到杀人匪帮帮头的历史,是相当困难了,总而言之斯大林在反托派开始时用的是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写的《论革命的两条路线》一文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批判:“托洛茨基的独创理论,是从布尔什维克方向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向摄取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③这段话不仅使斯大林足够批判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及中共用以批判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犯严重错误也够了。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抨击托洛茨基的主要的一条就是农民与土地问题。他认为中国有“两条革命运动”就是我们常说的反帝反封建。反封建,就是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单轨即只有这一运动,无反帝运动),但“托洛茨基不是完全不承认中国封建残余的存在,就是认为这些封建残余没有决定意义”^④。这是斯大林在“四一二”政变后不数日第一次发表对中国问题的观点,也是就中国问题与托洛茨基发生的第一次论争。斯大林认为否定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与土地问题,等于是“支持、鼓舞、培植和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的力量”。他还讽刺说:“托洛茨基的观点已经是张作霖和蒋介石办事员的观点了。”如若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中反封建运动真是这个观点,斯大林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是托洛茨基的观点是一回事,他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四一二”之后应当采取退出国

① 事实是中共建党初期是把托洛茨基视作与列宁并列的理论家介绍的,比如党成立不久设立的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有限的几种译著中就有托洛茨基的重要著作《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中译本更名《俄国革命纪实》),这是写入《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有案可查的例证。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的第30注。

③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8页。

④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3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下同。

民党的策略,使托洛茨基处在斯大林、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问题的国民党情结的敌对地位,而这恰恰又与陈独秀退出国民党的口径统一,时空相吻。

托洛茨基早在共产国际提出国共合作的一九二三年,就加以反对,陈独秀也反对,但当时托和陈都没坚持,后来陈独秀多次提起退出国民党,托洛茨基亦复如此。

“四一二”事变发生,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公开与斯大林就退还是不退严重对立,并获得了季诺维也夫等一部分人的同意,形成了中国问题反对派,陈独秀则被共产国际除名,同年底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大会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党。后来季诺维也夫曾戏剧性地恢复过两次党籍,终于在一九三六年被处决,他生于一八八三年。

读者也许以为托洛茨基与陈独秀一开始就反对国共合作,“四一二”后又坚决要求退出国民党是彼此通联后的一致行动,那就误会了。他们天各一方,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之后,国民党“中派”一反再反共产党而产生的共识,丝毫没有组织上的瓜葛。陈独秀之倾向于托洛茨基理论那是一九二八年以后的事,传媒者是从苏联归国留学生中的托洛茨基理论的信仰者。

托洛茨基开除出党不久被押送(妻子和长子随同)到阿拉木图流放,又被驱逐出境迁居土耳其期间,陈独秀还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与”中共领导下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令人感到可笑的是“七一五”宁汉合流后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即“七月决议”)中指示中共“必须做到”的七项指示中竟然还有“不退出国民党”一条!这条全文如下:“尽管国民党领导大肆排除共产党人,仍要留在国民党内,更密切地联系国民党基层,由基层作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倒行逆施的决议,要求撤换国民党现领导,以及在此基础上准备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①

请别以为笔者说此条“可笑”就一笑了之。这条决议厉害到不只废了陈独秀,更使中共新领导瞿秋白陷入困境。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瞿秋白曾根据国际指示写下了不退出国民党,那是二月,既无“四一二”更没料到会有“七一五”,如今南京政府已一统天下,被共产国际用来对付蒋介石的“左派”汪精卫亦已去南京联手反共,要谁去“撤换国民党现领导”?又由谁去召开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国民党代表大会”?用什么办法联系国民党基层去反对他的中央?真是荒唐透顶。可见托洛茨基是正确的,陈独秀是正确的;从只窄到退不退出国民党一事而议,三个同龄人走上了两条道路。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极右的国民党政策,促成了中国新领导的极左政策。其结果是:南昌起义失败,江苏无锡、宜兴、江阴、常州、海门长江三角州地区,以及上海崇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334页。

明县农民暴动失败受到残酷的镇压，一直暴动到年底广州公社失败，张太雷牺牲，广暴所遭受的损失比“二七”惨案严重何止百倍！此次巷战所遭到的残酷镇压，比一九〇五年俄国流血周和一八七一年巴黎三月革命还严重得多，这就是现代革命运动处在武器发达、资本高度集中使阶级矛盾空前激烈、帝国主义炮舰直接干预的结果。从而使瞿秋白在一系列的暴动失败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史上第一顶左倾盲动主义的帽子。共产国际则左右逢源，心安理得地派向忠发和李立三替代瞿秋白。

迁往上海的中共中央，由瞿秋白出面敦促陈独秀赴莫斯科不成的情况下，请陈独秀为替代《向导》而新创刊的《布尔塞维克》写文章，发挥他那毛锥之功，这很可能是为学生的瞿秋白尊师的表现吧，陈独秀接受了，但他不下笔万言写长篇大论，写短兵相交的杂文，包揽该刊的“寸铁”栏。他用看来消极的笔名“撒翁”发表长则三五百短仅百余字的“寸铁”。创刊号适逢中华民国双十国庆节，陈独秀就抓住时机写了三篇，这儿引《汪精卫的出路在那里》看看文风亦以存照：

汪精卫题《申报》双十节增刊说：“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请问国民党分子现在有几个不腐化？汪精卫的“出路”在那里？

一段引文两个问号，画出了一个党，画像了一个人。陈独秀开始写“寸铁”，正是鲁迅在广州受惊于“四一五”隐居了半年之后到达上海的十月，瞿秋白说鲁迅的杂文是“战斗的阜利通”授之陈独秀亦当之无愧。所不同的，鲁迅写杂文是他的本职，陈独秀写杂文只能说是历史的错失使一位领袖操牛刀去宰鸡。^① 文思敏捷的陈独秀在写杂文、研究文字学同时仍然密切关注中共中央的政策与中国革命的发展。一当发现错误毫不畏惧地直率地提出他的意见，有些还是属于决策方面的极重要的意见。这就要说到，在共产国际一批再批中共右倾的背景下开始一左再左三左的错误路线，使中共陷入另一个怪圈。

八七会议后，新的中央在共产国际新的代表领导下对革命形势看涨，又急于要用成绩来复苏党在前届领导下的右倾萎顿，发出两湖、两广、江西，乃至中州、华北地区以及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心脏的江苏、浙江两省沿京、沪、甬铁路县分的农民暴动计划，到十一月，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坚决的采取组织工农武装暴动的政策”的《中国现状与党的决议案》，以中共中央决议的最高形式肯定中国革命高潮

^① 从10月24日起至次年2月的十九期《布尔塞维克》上陈独秀合共发表“寸铁”一百五十余篇。

已经到来,现在要作的是:一,把群众自发斗争引向“最高限度的组织性质”;二,把各地农民暴动“变成尽可能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三,工人暴动与农民暴动“互相联络”^①,这实在是左得出奇的三条,但却实实在在地纠正前届领袖陈独秀及前届国际代表鲍罗廷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一直关注中共动向的陈独秀至此实在按捺不住一抒己见的冲动,连续向中共中央写信多封。在十一月十二日第一封信中,开宗明义:“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它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在实际行动上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更是错误。”在同日写的另一信中指出中共新中央作出的现时政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的政纲”,显然是超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企图将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陈独秀的信不止这几封,意见也不是上引如此抽象,而是很具体很值得参考(今天来说是其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但就上引这两点予以研究,如果允许我们说一句无原则的“老百姓”话,就是陈独秀太不识时务了。他是被共产国际被斯大林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革职的,当新的中共领袖们正据共产国际的“高潮说”迎接、鼓动、煽起革命高潮的火焰,他又充当消防队长,顶之以低潮论。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只有勇气,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表现了他接受过去错误的教训,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悟出了符合历史发展的正确认识。他自己知道,这些向背的意见将使国际和中共对他产生更大的政治反感,使他的处境更艰难,“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置党和革命于危险之中而不顾,多么高尚的政治品德,那些在位时唯唯诺诺,退位后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的干部,在陈独秀面前不感到脸红么!令人欣慰的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新中央并没有置之不理,经过慎重研究后以中常委名义向他发了信,虽然否定了前总书记的意见,但从信中却也使今之研究者感到这届中央对于因信仰“高潮论”而到处燃起暴动之火的作法,似乎亦有三分忧虑,对陈独秀两封言简意赅的信的反复而又繁琐的反驳本身,从方法论的角度就使人悟出决策者自己心中没底数,写起来就吞吞吐吐,也许这仅仅是瞿秋白优柔寡断的性格袒露。但愿不如此,但事实确实如此!从八一南昌起义到十二月广州暴动,除了毛泽东秋收起义因觉察攻打长沙之不可取,几经周折,逼上井冈山外,余皆败北。

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在收拾残局时的组织处置必然是惩办主义。统统“熄火”后,十一月七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罗明纳兹的监督下通过了《政治纪律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集第455页。

决议案》^①，开中共有史以来第一次惩罚一群“做出许多违背策略的严重错误”的负责同志，计有（以决议案顺序）：谭平山开除党籍；张国焘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八一南昌起义前委科以集体警告；徐光英（八一起义向潮汕发展时的汕头公安局长）留党察看一年；中共南方局亦吃了警告处分；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被撤消湖南省委委员资格，其中毛泽东和彭公达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公达外加留党察看半年。还有受处分而没有点名者，其中著名的是贺龙。以上处分中谭平山除通常罪名外还扣以企图组织第三党，徐光英是超刑律处罚抢劫犯之外，全部犯的主要错误是军事投机、单纯军事行动、怀疑中央暴动策略、忽视土地问题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后来大多陆陆续续到上海听候中央处置和再分配工作。

我们之所以要较为详尽地列出中共新中央惩办人案一事，主要目的有三。一，证明陈独秀反对中央定一九二七年冬季形势为革命高潮而到处引爆农民运动的意见是正确的，反过来又可证明中国农村革命解决土地问题虽是重要的，却急不得。陈独秀领导国共合作时期，除了指导上的失策和国共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因素妨碍了农运工作，中共独立担负起土地革命重任后，也不存在用暴动方式即时快速解决土地问题的时空条件，以此足证前中央不存在右倾问题；二，“无论是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重要的‘左’倾政策，其创造者都不是中国同志，而是共产国际代表，主要是罗明纳兹”^②。既然如此看待新中央的“左”倾政策，是否也可以改变一下把错误全都堆在陈独秀身上的传统认识？三，作为三人临委政治局主要负责人瞿秋白所犯的“左”的盲动主义的错误，不能以牙还牙，惩办他，应更多地看到严峻的客观形势严重地障碍着他的理论思想和领导才干的发挥，如他曾说过农村发动“游击战争必需进行革命地域之建立”，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可惜的是这样做不能速决战，也就不遂罗明纳兹和纽曼的心愿！这个文弱书生在一整个革命时代被葬送的险境中出山，中国共产党在上一个革命时期所受到的创伤远未复苏，国民党却在上一个革命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它得到的苏联军援尚未耗尽，如今又获得了买办资产阶级地主豪绅的新经援，全都冲着中国共产党及其新的领导，确实谁也难以对付！

罗明纳兹“左”了几下，惩办了几下，回莫斯科参加联共（布）十五大。留下纽曼筹备广州起义。

短短三个月的暴动史证明陈独秀的估计是正确的。各地起义暴动失败的消息传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集，第478页。

^② 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到上海,有的还在《布尔塞维克》上公布,深深地刺痛陈独秀,因此当新中央在一系列失败之后仍坚持只要各地继续掀起暴动,时局还是“有汇合而成较大范围内的工农总暴动夺取政权之趋势”^①时,陈独秀更关注这继续的盲动主义,并力争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基于一系列的农民暴动失败,一九二七年形势就看年底的最后决策:广州暴动。并且把“广暴”视为“全国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一个‘信号’”^②,于是陈独秀倾力研究“广暴”,恨不得参与指挥——因为他有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成功的巷战经验,可惜这个“局外人士”仍只能止于向中央写信以献策,于是留下了著名的关于广州暴动意见信。令人十分遗憾,由于叛徒告密,迫使广州提前二天仓卒暴动,等陈独秀的信到中央领导手中,中共中央已经沉痛写下“四千英勇战士的尸首纵横于广州街上……”^③的革命讣告。于是广州暴动连同陈独秀的信都不必讨论了,这里留下陈独秀信中一段话让大家纪念一下:

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遭到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搁,暴动时要立刻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这还不够,并且解决农村一般的病苦事件,如此方能发动更大的群众参加革命。不如此,则不独广州孤立,不能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④

原来,陈独秀已预测到广州暴动没有胜利的可能,因此提醒中央的是“一旦失败”的善后处理。这不是悲观而乃出于科学的分析,只是他知道写信劝告中央“熄火”是不行的,因此信是从“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开始的。如果中央有时间又愿意听取他的意见(如撤走非战斗员),就可以少牺牲和多保存些武装力量(农民的投入),但在纽曼的心目中这些无疑是投降,前面说到陈独秀写信时广州已失陷,但实战情况恰被陈独秀不幸而言中!这里引一段笔者对于广州暴动十三日失败那天的考证和描述:

起义第一天就暴露出了相当严重的军事问题。深通战争要求的叶挺将军心里最明白,一支文齐武不齐的五千人的队伍经过一天的战斗,马上要与正在广州郊野四处集合起来向广州进攻的训练有素的军阀部队作战而守住广州,其后果肯定比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起义的国民自卫军还要惨。唯一的出路是立即集合队伍向农村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集第537页,《中央通告第十六号》,在这一号通告中还提出了民权革命“急转直下于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不断革命论,以支持“高潮论”的左倾冒险主义。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集第562页,《中共通告第二十三号》。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④ 此信写于上述两封信的第二天11月13日。

作战略撤退，与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武装会合，然而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种“投降主义”的行为。所以，在起义的当夜，当叶挺“正确地主张把队伍撤到农村时，纽曼便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①。

其结果当然是遭到军阀围堵，起义彻底失败，大约五千七百具革命军人和工人赤卫队的尸体，葬送在“进攻进攻再进攻”的盲动主义瞎指挥上。起义总指挥张太雷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在蒙蒙细雨中乘车向小北门阵地指挥途中，车开到黄泥巷口时，遭到广州机器工会工贼的伏击，牺牲在暴徒的乱枪之中……目击者说，太雷同志负伤时，用俄语讲了这样一句话：“Ах, чертцполосатые”。这句话的中文意思是：哎哟，可恶的魔鬼。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没有完成的起义的遗恨，还是对工人队伍中出现叛徒的诅咒？^②

德国人纽曼(H. Neumann)来中国指导“广暴”时年仅二十五岁，他太熟悉法国大革命史了，因此把丹东的绝对进攻论搬到了黄土地。革命，总是要进攻的，但只准进攻不准退守是战术指挥中最害人的无谓冒险。广州暴动失利之夜战死者不多，而是牺牲在军阀包围圈收缩入城的十四—十九日，差两天就是巴黎一八七一年五月流血周。^③当然我们不必责难纽曼，他也是为了完成共产国际委托无私来华的，后来他也难逃斯大林镇压无辜之网，被处决于一九三七年。罗明纳兹则“畏罪自杀”于一九三五年，都作了阴谋政治的牺牲。

在左和右的撞击中，思考中国革命要由中国人自己领导的陈独秀，是正确的，他一九二七年最后三个月内交致中央几封信应当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重要见证。这时还得插一句，中共中央常委复陈独秀的信写于“失败的消息已经来了之时”，因此就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若干错误，只是不同意一点，就是：“此次广州虽失败，或不至于一无所获”^④。

新中央的全国总暴动夺取政权的“信号”熄灭，共产国际除了老一套的发表抗议

① 叶挺为此事受尽冤屈。“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见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从这一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左”倾盲动主义之风确实刮自莫斯科。

② 摘自拙著《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第九章《广州起义》一节，文中关于张太雷之死，见《回忆张太雷》第207页，张太雷好友舒米亚茨基的回忆，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③ “这些军阀，李福林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为保持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的剥削起见，竟大施屠杀，在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九日五六天之中，杀死了五千七百多人。”见《悼广州死难的五千七百工农兵士！》，《布尔塞维克》第12期。

④ 中央复信和陈独秀为广暴致中央信均见《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

书之外也是老一套的撤换中央领导,几个月之后瞿秋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撤了下来,又换上新的一茬:向忠发、李立三们。历史在候着我们写下去,但读者已经明白了这一茬犯的是什么错误,而最大的错误,读者未必猜得着……

三个同龄人走两条革命之路

对陈独秀来说一九二八年是他前半生最凄凉的年份了。隔年广州暴动牺牲的伙伴的阴魂老是在他眼前萦绕,无形之中使他对最高决策权在别家手中的革命运动屡遭失败产生了过分谨慎的考虑,更为忍俊不禁的是他的生活——行年四九孤寡独处,因为白色恐怖的关系,住所鲜有人来,显然更不便访友,与他关系最深的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还常去看望他,但亦不便请他去店堂或住所与安徽老乡店友们书林漫游:“他很想来。大叔对仲翁说,‘仲甫,你不要再去了。我老实告诉你,我的老太婆常说:不能来了,我要吓得爬屋走了!还有我的老嫂子,要吓死了’”^①,陈独秀很体谅妇道人家为子女安全的心思,甚至还主动向前党中央出版局长汪原放建议,不要再去中央联系,脱离党组织,以“灰色”躲过白色恐怖,办好亚东图书馆为上乘。这是迫不得已的以退为进,使亚东成为我国进步出版社中维持三十多年的老字号,直到整肃托派的一九五二年。据郑超麟回忆这时陈独秀能够走走的地方只有他那里,这样笼罩着危险的孤单生活维持了三年,直到迁往邓脱路遇到邻居而同居的潘兰珍。

以上只是飘泊无定的生活,另一使陈独秀苦恼的是经济,有一段回忆很使人感到心头发紧:“一九三三年,我到南京看仲翁的时候,他谈起:‘我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了,心里很难过,你可以把《独秀文存》重印出来,让我快快拿版税把亚东的账结清才好。’”这是他人狱次年,从语义语气,可以资证前四五年间的生活花费皆透支亚东的,显然亚东主人无催债之意,欠主却难为情了。不久就出版了第九、十两版《独秀文存》(九版有蔡元培序),十版累计印三万二千册,按当时百分之十五版税计约可得万元之数,从一九二二年起入狱十年间,《独秀文存》于总书记生活不无小补,但也只够勉强糊口,好在他不是“老馋”,一生“除却文章无嗜好”。

一九二八年给他最大的打击是二儿乔年被捕。二月六日这一天,陈独秀照例为下一期《布尔塞维克》写“寸铁”,其中有一篇写到:“何健、周澜自始至终是反共健将,最近还在长沙大规模的枪杀共产党……”陈独秀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一天,上海的“反共健将”逮捕了乔年!六月处决。不久一直在安庆陪伴母亲的女儿玉莹病逝于上海。这打击之大,是超乎寻常的。乔年是去年底从武汉调来任中共上海区委组织部

^① 《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31页。下同。

长的，正当事业和家业（他的夫人精益在武汉最困难时期曾卖田契毁家业投入革命）均处黄金时期，“他被捕，谁都跟着难过，仲翁真难过，两个儿子都很能做事，现在一个也没有了！而且死得多苦！惨！……”与乔年同辈亲密无间的汪原放直到五十年代，想起乔年还悲从中来，留下感人诗篇：“枫林桥畔待车时，磊落英姿仔细思。血肉欲寻何处是？斑斑点点在红旗。”^①现在，陈独秀只剩下十七岁的松年和不足十五岁的鹤年，再也没有勇气要他们踏上革命之路，于是总算陈家香火继至如今，也许还会永续未来过太平日子的罢。

本章第一节已经简述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及他因对中国大革命的观点与斯大林相左而受到惩处的事。托氏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后仍然不放弃自己的主义，在获悉六月即将召开共产国际六大的信息后撰写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被批判的六大纲领是由布哈林起草与斯大林合署交由大会讨论的。托洛茨基的批判共三个部分：一《国际革命的纲领呢，还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纲领？》；二《帝国主义时代的战略与策略》；三《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正是在第三部分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异常关心并相当了解——为论述方便，本书给予一个专用词：“二七年冬季暴动”时期的中国形势。这第三部分在写完第一节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后的第二节，就是从广州暴动写起的，托洛茨基以“冬季暴动”为例联系一九二七年总体形势提出了中国革命不存在俄国二月革命的条件：“蒋介石叛变以后在‘左的’汪精卫底武汉政府形势下，中国克伦斯基‘独立’统治的试验时期。俄国民粹派与门雪维克底短命的‘专政’采了一种公开的两重政权底形式，而中国底‘革命民主派’底专政还没有成熟到这步田地。”在托洛茨基看来，日后的中国无论是国民党统一或者重新分裂瓦解，除南京政府外，已没有任何政治力量，于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超越一切，“因而无产阶级专政，引导被压迫的城乡无数万贫困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议事日程”^②，这个理论是否正确，用在中国有否效应，以后将会提到。有一点，托洛茨基是对的，那就是广州暴动后“领导贫农运动的任务已经完全落在无产阶级底，直接则落于共产党底肩上了”，接着指出：“要真正解决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任务，必须集中一切政权于无产阶级手里。”这是中国的第三次革命——托洛茨基把辛亥革命说成是中国第一次革命，北伐为第二次，全都是资产阶级性质，如今的第三次才是无产阶级革命。后来中国托派承认了这个分期和这场革命的性质。托洛茨基在为上述理论作解释说，“四一二”和“七一五”事件“不是叛变了他们的阶级而是叛变了我们的幻想”，共产国际仍然不放弃国民党的旗帜的这个错误决定，是被广州暴动粉碎的，因为广州公社“宣布国民

^① 枫林桥，指上海枫林桥国民党监狱，陈乔年等不少中共党人被关被处决于此。

^② 《中国革命底总结与前瞻》第二节《中国革命底阶段》，香港信达出版社。以下引托洛茨基言论凡未注明出处均引自此书，不另注。

党都是非法的”。以往在研究广州暴动史时，决不提此事，但从历来把广州公社比作是巴黎公社，马克思肯定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砸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嗣后又把十月革命肯定为巴黎公社革命的继续，共产国际说广州革命是“苏维埃革命”建立的是“苏维埃政权”^①这一连串的定义，似乎证明了托洛茨基对今后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至少在估计“冬季暴动”时期，是准确的。

我们不深谈理论问题，尤其对那些长期被歪曲、禁锢的历史和理论更想少谈或“要而言之”，然而不成，原因也正因为它的长期歪曲和禁锢，为免读来枯燥，就取了剥笋的办法，随着编年的发展一瓣一瓣向内里深入，这时谈的与第一节谈的相衔接，也就差不多说清楚了托洛茨基的中国观，至于他被开除联共，驱逐出境最终被暗杀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的研究不是本传的责任，但也会有所叙述的，写到此，只剩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与陈独秀的关系，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得先谈托洛茨基理论的传入和中国托派的组成。

托洛茨基这个领袖人物，中国并不陌生，他是随着十月革命信息与列宁同时传入中国的。他与列宁之间在理论上政策上的某些对立与争论，当时国人不甚了了，但分歧是知道的，比如北京《晨报》上就刊登俄共十大中央政治局准备会报道的标题就是《列宁托洛茨基有意见冲突说》，为“紧要新闻”：“共产党行政部以六十二票对八票之多，采用了列宁之政见。”^②在另一则报道中则强调了大会“归列宁派之大胜利”。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矛盾公开化之所以受到国际上各派政治力量的关注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是领导十月革命的两大领袖，后者又是军委主席，当时直接的争论是对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过渡的认识诸问题，想在“冲突”中发现共产党分裂的隙缝是徒劳的。瞿秋白在哈尔滨参加一个布尔塞维克欢庆十月革命家宴形容“屋里放着盛筵，电灯泡上包着红绸，满屋里都是红光，红光里是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肖像”^③就是见证，但那是一九二〇年，八年后的今天，可就不同了，列宁一死，矛盾就发生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而在中国问题上激化，致使八年前那则报道上出现的“托洛茨基派”成为现实，季诺维也夫、加缅涅夫、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米尔诺夫等反对派都是十月元老，与中国反对派发生联系只托洛茨基一人，而且已经是逐出苏联的他。

无论是中国的托派还是铺天盖地的反托派者，都承认是被遣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洛茨基派把他们的理论和组织行为传入国内的。当时中山大学校长就是托派拉狄克，因此中大是莫斯科的一个托派集中地，又由于中山大学生中大

① 《广州起义》第158~160页。

② 《晨报》1921年2月25日第2版。

③ 《饿乡纪程》第9节，《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版。

多对失误于中国政策的共产国际心怀不满,就很容易被托洛茨基的中国政策吸引,这些留学生中较有影响者有区芳、梁干乔、张特、陆一渊、王文元、曾猛、宋逢春、刘仁静、黎彩莲(女)等等。其中最激烈的几个还公开参加了那年十月革命红场检阅的反对派队伍。不久,矛盾激化,尤其是当拉狄克被判处与托一起流放西伯利亚之后,开始整肃中大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先是开除但不准离校、听候处理,有两个这类型的学生被称为“托派中的两件活古董”,然后则采取开除党籍(或保留党籍)遣返回中国的政策^①,这批人就在一九二八年陆续回国,其中刘仁静还特意绕道欧陆去土耳其伊斯坦堡市近海的太子岛上拜访定居在这儿的托洛茨基,取得理论上的和组织派别的嘱托后回国。据王文元回忆,他们在回来之前开过会:“我们回到了上海,遵照莫斯科那次反对派会议决定,立即向中央报到”,但刘仁静例外,他是先回国而后报到的。^②可见中国托派的产生确系中大托派学生的造次,按现代语言来说,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打入中共从事破坏”的。这些留学生回国,接上组织关系,即与先期回国参加过从上海工人起义到“广暴”革命的老同学尹宽、郑超麟、彭述之、马玉夫、汪泽楷等取得联系,于是使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等文件历经艰辛运到中国,又经过与陈独秀有过三次起义时生死与共战斗友谊的尹宽、郑超麟、彭述之等媒介给陈独秀。郑超麟的回忆说明托洛茨基理论传入中国的初期状况:“我们并非一下就接受托洛茨基主张的。就我个人说,我经过了多次考虑,多次讨论,然后同意这个主张。”接着往下道:“问题牵涉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本人。……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时,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③

这里首先要插入一个情况,就是有人说陈独秀不是“彻底的托洛茨基派”,又有陈“一九三二年被投入监狱之后已与托派断绝来往”等说法。这个评断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他不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政见和策略,他要把托的理论消化入“中国人自己领导革命”之中,这是陈独秀成熟的表现;再是有些好心的或疏于深入的研究者为“落实政策”方便而“网开一面”。笔者诚不敢苟同,在中国陈独秀不算托洛茨基派,谁还是?这不必争论也避讳不得,需要的是花功夫深入研究。陈独秀自始至终与托洛茨基在中国问题上有不同见解,是事实,却也是正常的。郑超麟就说过当陈

^①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十三章《中山大学与托洛茨基主义传往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该节详细回忆了中大学生托派受到残酷斗争的往事,并说明此事由苏共、格柏岛和共产国际协同办的。盛岳本人是参与斗争托派的学生之一。

^② 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六节《回国工作——被逐出党》,香港周记社1977年12月第1版。

^③ 《郑超麟回忆录》第9节《左派反对派》。以下引郑超麟的话皆出自此节。

独秀已经完全倒向托派后还曾撰文不同意中国目前革命为的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制，就是一个严重分歧，致使“正宗”托派刘仁静据此攻击陈独秀倾向托派的不彻底性。

当时陈独秀与尹宽、郑超麟、彭述之、汪泽楷等对托洛茨基问题反复争论的是些什么大问题，恕笔者孤陋寡闻，至今找不到详确资料，亦无二手可让“倒一把”。实在说来，中国的托派并没有从立场、理论、理想以及历史和环境与托派理论的关系等方面全盘研究后成为反对派的，大多数是对共产国际中国指导方针不满，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不满，尤不满的是发现错误后文过饰非，左挡右推使中共和陈独秀里外不是人产生强烈不满，再加上革命失败总想另辟蹊径等偏重于感情方面的投入，此时发现原来莫斯科的领袖层中早就有人坚决反对并产生了与斯大林与共产国际迥异的理论，当然就倾倒了；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托派感情胜于理智，是反潮流的产物。这批青年，二十多岁，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激情，没有斗争经验，只知革命要改变策略却不知什么策略才能救中国——首先是中共自救。他们当然不会相信中国的希望在井冈山；中国之命运握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手中！马克思列宁没有说过，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无此实践，自然而然地就信服了托洛茨基救中国的话。其实托洛茨基理论中错误部分亦正在如何对待农民问题上，在中国开直达车到无产阶级专政，其本身就是超前意识的；或者说以之对中国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错误的。谁也不会说革命要抛弃农民，农民只配恭候“拯救”队伍的到来；任谁都坚持工农联盟，但用什么政策能使农民全身心投入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九二七—一九三六；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实践，胜利的恰恰是井冈山，是毛泽东，包括托陈反对派在内的全部救国方略都错了。但是，这个错，乃是思想上的理论上的；从党政角度则是内部矛盾，是路线上的方法论上的错误，直白地说来是如何反帝反封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怎么办”的分歧，再要讲得明晰一些是：革命“一步走”还是“二步走”的分歧，在理论上倒是有过“不断革命”，抑是“不断革命论—革命阶段论相结合论”的争论，但处理则是极端的公安手段。这，前面已经说过。如今，受罪的已受了，该自我反省的也作到了，谁也不背历史重负，于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也就卸掉了包袱。明乎此下面的话应该好说了。

一九二八年对中共对共产国际是个重要年份：中共于六月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七月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共的会是批判左倾盲动主义，上届临时中央检讨，大会始终在布哈林所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长篇报告范围内进行，斯大林曾向部分代表座谈自己的见解，最后以撤换中央领导而告终。共产国际的会则由布哈林提出了个继续左倾的“第三时期理论”，这是一次把托洛茨基反对派由联共内部推向国际并定其为反革命派别的会议，但反对托派的议决

只是在表面上取得一致，骨子里反而对斯大林产生不满，至少怀疑他的动机。一九二八年的共产国际可以说除了中国之外，所有欧洲的美洲的全部活动都因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经济上升而政治稳定，迫使工人运动步入低潮，于是就全部投入中国革命，在布哈林向国际执委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甚至设《保卫苏联和中国革命》专章，终于谈出了苏联援华的直接目的，因此，本届大会议题的重点是中国革命焦点是广州暴动，而且把中国革命与反托派斗争捆在一起谈，纠缠在派性斗争中引起代表们的关注，越来越复杂了。如前所述，大会在极严格的监控下将托洛茨基的批判提纲中的第一和第三即中国部分（此部分又经过删节）译印成大会文件交部分代表参照，会后并照单全部收回，然而依然被有心人留下一份并传到欧美传到中国，为一股反潮流势力奉为圭臬，这是国际始所未料者。

三句话讲尽两会，并不是我们慵懒，原因出在虽是中共和国际大事，却已与传主无关，曾经有过劝说和国际训令召陈独秀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事，仍被陈断然拒绝。

至关重要的是共产国际六大结束后，中共代表团领受了什么样的决策回国继续革命。也许读者会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共产国际批判了瞿秋白一届临时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把他撤下来，对今后中共革命的走向将会拨正舵把一直向前了罢。不，为节省篇幅起见我们略过争论讲结论，要而言之是：照左不误。

布哈林在七月十八、十九连续两天发言中虽然承认中国革命“汹涌澎湃的高峰时期已经终结”，却仍然看涨：“准备新的伟大革命高潮为主要任务的时期已经开始”，而且还加以肯定地说：“种种客观迹象表明，革命高潮必然到来。”^①在座的中国代表中肯定有人愿意接受这个预测，布哈林还让下届中央接班人高兴的是在《提纲》中他把中国革命提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非中国莫属的极致，“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和印度革命形势必然加剧，可能会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形势，打破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稳定”，而这正是实现“第三时期”理论的重要步骤——瓦解资本主义的稳定，“使得资本主义总危机急剧尖锐化”直到总崩溃。为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在批判前届中共左倾错误之后指示中共仍然反对右倾强化左倾：“中国在愚蠢之极的右倾时期以后，又出现了‘左’倾。目前‘左’具有盲动情绪、盲动策略等形式。但是，一般来说，现在脱离正确路线的倾向是右比‘左’更甚。”“愚蠢之极的右倾”显然骂的是陈独秀一届中央，“又出现了‘左’倾”显然批的是瞿秋白临时中央，下一届中央呢？布哈林告诫道，以后永远是左比右好。这使向忠发尤其是李立三听来是相当顺耳的。于是就可以往下写向忠发主中共中央时期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了。然而，且慢——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366页。

这里还得叙述一段与陈独秀直接有关的重要史料,就是两个“六大”结束后的十一月,斯大林召见被留在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瞿秋白和张国焘,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交谈。斯大林与瞿、张交谈是从关心宋庆龄和陈独秀的政治态度开始的,他问:“像宋庆龄这样的人,如果在中国大城市的大街上,遇见一个共产党员,会不会叫警察逮捕他?”张国焘对此作了否定的答复,“我看不会的”。斯大林接着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须的钱和获得其它条件来办一张报纸?他这个问题,似是判定陈独秀被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排除中央之后,可能会采取反共产国际的态度。他所担心的是陈独秀有无能力另行办报或另行组党等等。

张国焘向斯大林作了排除办报或组党的回答,并说陈独秀在六大以前“还希望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改善关系,他之所以没有来莫斯科出席大会,也并非表示决绝”^①。斯大林对上届中共两位领袖提出这么两个问题,表现了他对中国政局发展的关注和不安。宋和陈各代表一个党。他并不清楚宋庆龄是代表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政治和联俄联共政策,正因为她持倾共的政治态度,才在“七一五”之后立即去苏联,出国前于八月二十二日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中赞扬“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到了苏联之后在受到共产主义劳大(由中山大学改制)不明真相的学生的冲撞的情况下仍与当时已在苏联的邓演达、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以“国民党临时委员会”名义发表声明抗议南京政府。^②

另一关心热点,作为联共领袖来说对陈独秀担心的程度要超过宋庆龄。但陈独秀根本没有办报组党以对抗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想法。据郑超麟回忆,八七会议后,中共党内高层中是有些同志极不满于国际新代表和中共某些领导人对陈独秀采取极其无情的一脚踢。无形之中有了“陈独秀派”,当时要召唤一伙倾向他的同志反对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共中央,以实现他那中国革命要由中国人领导的思考,按照他的独断专横的性格以及威望,是可以夺取成功而且据此与共产国际抗衡,但他没有做,此公生性梗直,光明磊落,鄙视偷偷摸摸,他只是戴了“右”倾帽子摇着蒲扇默默地自我反省。郑超麟说“八七”会议后,“在武汉,他毫无意思团结拥护他的人实行抵抗。他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在武汉,他执行的新路线是国际路线,是秋白代表的路线,但他并不以为是屈服于别人的主张”,“武汉失败,到了上海,他有新的认识,常常根据这种认识写信给常委……那时他仍没有另外进行小组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十四篇第三章。此次会见只有张国焘留下回忆。

② 尚明轩等编《宋庆龄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宋庆龄于1927年8月22日发表赴苏声明,9月6日抵达莫斯科,年底离苏赴比利时,次年3月再到莫斯科住到5月去德国,于1929年4月从德国经过莫斯科归国。在莫斯科时曾受到因反蒋而不明真相的中共留学生的误解,因此导致斯大林亦怀疑她可能反共。

织的意思”。但是二年后的陈独秀还是成立了反对派，怎么解释？很简单，一九二八年的陈独秀一是处于思考建党至国共分裂全过程；二是没有找到他自己认同的中国革命新理论新路线，一旦找到继续革命之路，陈独秀是会举旗亮纲联合一群人为中国革命奋斗——或说是碰得头破血流终不悔。

一九二八年秋末，参加两个六大的代表陆续回国，新的中央委员会由二十三个委员和十三个候补委员组成，党员数已突破十万，为“七一五”前的两倍，中国共产党发展了而且壮大了，此能一笔勾销陈独秀们的功业吗？这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开创了“唯成份论”的坏风气，在三十六个中委里有二十一个工人，“由于太过强调工人成份，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就受到限制”，周恩来认为这是苏共中央强加给中共的两大错误之一，“如布哈林在大会上做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来替代他们”^①。“六大”最致命的是选向忠发（一八八〇—一九三一）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说起来把这个曾是汉阳兵工厂的工人拥为总书记也不是一时之兴，他一九二二年入党后算得是个工人运动领袖，中共五大选入中央委员，“四一二”后又被送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次年二月被选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他和李震瀛还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代表联共（布）的斯大林和布哈林共同签署过《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应当说是个出入风云的人物，但实在由于教育程度低，谈不上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就给中共造成了最高决策人的脑袋长在下属智囊肩膀上的悲剧。这届中共政治局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瞿秋白和张国焘组成。前五人是常委，后面的瞿和张是作为妥协的“名誉安排”，被留在莫斯科。到年底分工为宣传部长的蔡和森被撤并被遣去莫斯科，李立三补入常委，次年二月苏兆征病逝，实际控制中共中央的是向、周、李、项四人，其中周恩来管党的组织，项英单一管工会工运，此时，中央决策权与其说在总书记手中莫如说在李立三手中。李立三无疑是赤诚的革命领袖人物，但一贯偏左，六大时他敢于顶撞斯大林指出的中国革命现处于低潮期：“当时有过争论，中国代表团曾争到斯大林同志面前，斯大林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同志则说，现在还是高潮。”^②如今党权在握，他就要试一试。正当李立三在酝酿“毕其功于一役”的全国工人大暴动计划之期，共产国际于一九二九年二、六、七月相继向中央发来了四个文件。从二月八日第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强调“在当前情况下，特别危险是右倾”起，再而三、三而四地在反

^①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7～187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周恩来认为苏共中央和布哈林对中共六大的另一个错误是“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因此“他要高级干部都离开红军，比方说，要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这一错误坚定了李立三的城市工人总暴动的极左计划。

^② 《周恩来选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右呼声中对中国形势看好、上扬、高潮迭起，这正投李立三之所好，这些文件集合在一起编成《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执委会特号》并发布《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一次全体执委会会议决议的决议》。^① 这决议的决议是继续扫荡右倾，发布于十二月十二日，其中提到的“二中全会”召开于六月底，就在这六个月中，本届中央干出了一件惊人大事：开除陈独秀党籍，开除了与陈独秀相同政治主张的一批党员的党籍，开除出了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现行革命决策的派别。这个派别名称很多，比较通俗易懂的非正式称呼是“托陈取消派”，当然还有别的称谓，将会随着历史的推演写下去的。

立三路线总决策发表于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通称“六月决议”，他的灵魂就是六届二中全会。

中共反对托派与共产国际同步，这一年八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的国际局势决议中的《中国革命的教训》一章，是联共党内首次把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理论作为重点批判并传入国门；九月斯大林把这一批判扩大到国际执委会，这时已经明确提出“托洛茨基反对派”，令人感到多少有点意外因此而能激发我们研究兴趣的是“八七”会议后新中央和新国际代表于十一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提到了不断革命论(用的是瞿秋白译文“无间断革命”)^②，一个月后爆发的广州暴动而建立的仅有二天生命力的广州公社，被中国托派理论家认为是属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产物，是不是执笔决议案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有点儿乱了阵脚以致发生了理论上反托洛茨基却又在实践中不期然地与之接上了轨？后来，对一九二七年八月至次年五月之间的革命负全部责任的瞿秋白因此而在中共六大上作了检讨，说是“十一月扩大会议在决策上，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不正确的采用了‘无间断革命’的名词，于是解释革命为不断高涨之可能，就可以发生由此而得到不正确的策略”^③，这在以往陈独秀研究中显然被有意识地避讳了。然而这正是解开陈独秀等在托洛茨基被打成反革命派开除党籍逐出国境的极端不利的政治大背景下崇信托洛茨基的谜的关键，到时，我们将予以研究。现在再顺着托洛茨基派成为中共重要打击对象的历史写下去。

六大之后，打击托洛茨基既是完成共产国际的使命，又是李立三为执行极左路线的“世界总决战”扫荡绊脚石中最坚硬的一块。在六届二中全会上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中明确提出“国际上之托洛茨基反对派，最近在中国党内已经开始有了活动”，文件中虽然提到了托洛茨基的“理论”，但没有作出具体的批判，只是说已经得

① 载《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1期，1930年1月出版。下面引文均出于此，不另注。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集第445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集《政治决议案》。

到了国际六大的“严厉之驳斥”，斥之为“已作了进攻苏联及反对共产国际之工具”^①。这样虽然无补于弄清问题，但从情绪上引起全党关注已经足够了。以个人名义再次提出批托的是周恩来，他写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是他为解释中共中央文件《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而向中直干部作的报告。^②可以说文件和周恩来的报告是中共从理论上批判托洛茨基的最早文献，从中央文件上提到中国反对派不同意加入国民党、不承认国民党是各阶级联盟，尤其是关于“保卫苏联”的口号之争等等，在在都使人想到是在批判陈独秀，虽然也未点他的名，但已经把反对派的活动说成是“必不可免要与统治阶级勾结”，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到了十月五日，在发布《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首次点陈独秀的名字，但仍称他同志：“陈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下工作。”^③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的党籍的决议案》。^④从首次点名到开除前后只共四十天，就从同志变成叛徒，真是晴天霹雳，太突然了！照直说来，中共中央开除本党创始人的党籍，也不是轻松事，除了从组织原则上开除分裂党的党员的权力之外，十月二十六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训令起着中共开除他的绝顶作用：“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托洛茨基派。”^⑤见了这个斩钉截铁的训令，一向唯国际马首是瞻的中共还敢违抗？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这一天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马克思主义传媒到中国实际应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被他历尽艰险创建的党清洗出门。至此南陈北李中国共产党的两根擎天柱轰毁了。

开除党籍后的陈独秀先后发表两份政治上针锋相对的声明。我们从陈独秀答共产国际的信说起。

一九三〇年二月八日，中央政治局把共产国际训令陈独秀去莫斯科开会的电报转给了他，并要求于一个星期内予以书面答复。十七日，陈独秀没有给中央而是写了致共产国际的信，交由中央转达。信中有如下一段：“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领导’，然而自一九二七年以后直到现在，你们应该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集第166页《反对派问题》。

② 《周恩来选集》第44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集第495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集第549页。

⑤ 国际训令载《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81页。

已经取消了‘陈独秀机会主义派’而引导中国党于正轨，两年来事实的经过是怎样的？”^①问得好辛辣！

六月决议发表的第二天，中共中央致信共产国际要求批准这场象征“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的全国暴动，并要求国际动员全世界共产党支持从中国打开的无产阶级的世界大战；这还嫌抽象，还要求国际军援，派苏联红军和蒙古共和国红军从西北杀入中国配合从东南沿海的上海到东北哈尔滨一线的中国城市工人暴动圈。李立三的这个后来被共产国际称之为“异想天开”的计划，连当时的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罗伯特都急电国际总部坚决反对，要求赶紧制止。为此疯狂的李立三竟然写信给斯大林，要求他批准这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于一役的大暴动。^②这时的中央，已经没有任何执行立三路线的阻力：陈独秀开除了，党内强烈反对李立三计划的恽代英已被国民党逮捕，国际代表被晒在一边不予理睬。那么这场大暴动的结果如何呢？我们没有篇幅详述惨败的过程，借统计数字证明惨败损失：红二军攻打武汉，这是李立三总暴动寄予莫大希望的一役，结果是部队一万六只剩下溃兵千余，丢了洪湖根据地；红七军攻打柳州，丧失右江根据地，六千部队减员四千；红十军攻打九江，精兵两万败退时只剩下不足三千；红三军受命攻打长沙，攻占后，彭德怀研究了敌我双方兵力和形势，认为守不住，决定退出，李立三飞去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撤下彭部，命令朱德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再次进攻长沙，屡攻不克，不得不擅自决定挥师江西，不然损失不堪设想。这就是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九月三个月内革命根据地和军力的损失，而这只是六月决议城市工人总暴动的边远农村根据地的军事配合，立三路线的重点是城市。这是本届中央远较广州暴动更庞大的唯一的一次众多城市连锁暴动，计划中有武汉、广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青岛、大连、哈尔滨，城市惨败后的损失，绝对减员当然不会超过军队的损失，但白区损失大多是干部，是发动起来的工会和工厂中的精英，政治上的损失更无法定量统计。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地下党由二千减至不足千数；江苏和南京在李立三亲自督战下，暴动计划只在意想之中，就被特务侦破，牺牲至少二百党员；武汉地区配合红二军动作，牺牲了包括多位省委级干部在内的几十名党员；北方（顺直）党的天津五百多位地下党最后只剩下二三十人，全功尽弃了由李大钊等第一代党员辛苦培植起来的党的北方工作，甚至可以说从此一蹶不振。

李立三城市暴动的最严重的结局是造成三年后王明路线时期不得不把中共中央迁去江西瑞金。这一大迁移，当然应由中共第三次左倾路线承担主要责任，但不得不

^① 《答国际的信》。下同。

^② 李立三致斯大林的信被引述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92~112页的文件中，后一个专批李立三的，指出：“李立三同志玩弄了共产主义的一切右派叛徒和‘左派’叛徒的破了产的理论”(第112页)。

指出中央白区工作整个时代(一九二一—一九三四)的元气伤在“立三路线”上。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这封信虽然严正指出“六大”中央极左错误,却没有丝毫幸灾乐祸的坏心眼,他是写得沉痛而批评则是中肯的:“一个国际的领导,却在当进攻的时候,教中国党投降;当退守的时候,教中国党胡乱地拼命。列宁以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失败后能够‘最整齐地、最少损失他们的武装,最少损失他们的中心而退下来’……为成绩,而国际的领导,却教中国党至卸甲丢盔一兵一卒都不留”,应当说陈独秀是在为中国共产党说话,必要的注脚只消说当进攻时全党投降,指的是他领导的党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应当对国民党采取攻势(退出国民党也是一种攻势);当退守时令党进攻,指的是本届党的暴动计划。^①

陈独秀给国际政治书记部的信已经表明他服膺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理论,而且在阐述这一观点时常用复数,“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得到国际之列宁主义的领导,才可顺利地达到他的解放之前途,这是必然的,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些苏联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是真正的根源所在”,从此“我们”就反其根源而行之。陈独秀反“根源”的政见,最早向中共中央阐明是在八月五日致中央常委的信中,于是就得先谈一谈“中东路事件”。

中东铁路始建于一八九七年,名义上是由清政府和俄国政府合资建设,清政府筹资五百万两白银股金,该路起自旅(顺)大(连)经由长春哈尔滨(中东路总局所在地、全路枢纽中心)分岔一路至满洲里一路至绥芬河与俄境西伯利亚铁路接轨,一九〇一年七月开始运营,当年是辛丑条约缔结,沙俄全面入侵东北,此路的军事战略因素大于商业用途。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俄方失利,致使中东路长春以南段划入日本国利益圈。中东路权名义上维持到十月革命苏俄政府宣布把路权归还中国,由于南北分裂的国势,故而于一九二四年厘为两国共归。“中东路事件”由张学良着令哈尔滨东省特警部队武装接管哈尔滨总局并及查封苏联船贸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火油公司,以及搜查并逮捕路局机务处、车务处、工会、共青团、少年先锋队、妇女部等等下属部门,二百余人勒令限期回国,并迫使苏联方面正副局长交出路权,是在七月十一日;但是在这之前的五月二十七日,张学良已据白俄特务格里果夫密报“苏共定于本日正午十二时至下午三时在哈埠苏联领事馆地窖内召开‘第三国际共产宣传大会’”一事,派出大批军警突袭搜查并逮捕了铁路沿线各站以及上开七月被查各单位前往开会的三十九个代表,七月的接管只是五月的继续和扩大,此举有明显的反苏反共政治色彩。

^① 应当公允指出关于立三路线的极左,国际是采取否定态度的,只是由于信息传递过慢而立三行动神速,当肩负制止立三路线任务的瞿秋白、周恩来持了国际七月决议匆匆忙忙于八月下旬赶到上海时,李立三已铸成大错无法挽回了。

七月十七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驻苏代办提出最后通牒,如不恢复原状,苏维埃政府将采取断然行动,由于当时东三省仍保持独立,苏联的通牒是发向“奉天政府”和“南京政府”的。^①

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立即以《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为题发出第四十一号通告,第二天发出中东路事件的《宣传提纲》,指出“必须认清,国民党这次收回中东路,并不是站在民族社会的利益上,乃是站在帝国主义利益上,利用中东路问题,向苏联进攻”^②。

七月十八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至此,中东路事件产生三个效果:一,国民党由对内反共扩展到对外反苏,加入了国际反苏阵线;二,殖民列强支持南北联手反苏乘机欲使中东路“国际共管”,此议得到南京政府默许;三,中共坚决保卫苏联,成为当务之急。从政治立场的角度,中共提出“保卫苏联”早已成为共产国际及其苏联周边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共尤首当其冲。但是,万事不能超越时空条件,政治口号是政治目标的抽象表现,既然指责国民党政府收回中东路不符合民族利益,那么中共应当提出符合民族利益的口号。“保卫苏联”的口号,从当时的民众利益和民众觉悟的实际,是错误的。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就表现在这个错误的口号在中央是不得不提的,且不说当时中共中央被控制在极左分子手中,即使执行的是正确路线,要提出既符合民族利益又不失党政倾向还要使苏联满意的口号和与之相应的举措,也是非常不易的,要有国际统战决策水平而且还得有不怕冒犯苏联的胆量。这时,又是在这“风口浪尖”上,熄火大半年的陈独秀再次站出来向中央常委提出正确的意见。这就是直到现在仍莫衷一是的“陈独秀一九二九年三封信”^③。

当时陈独秀是很惨的,他的孙子即乔年的儿子不幸夭折,这一“天伦”打击,万勿以为对这位已是五十岁的老人没有影响,可贵的是他能顶住生死存亡的别离情,几乎发了疯地投入托洛茨基理论研究的同时仍然全力以赴去为中共挽回革命损失。读者记忆犹新,去年他曾经再三再四向中共“奉献”他的政见,均遭到不应有的冷落,这次,他以为换了一届中央,“估料现在的情形和从前稍有不同,或不至因我的发言引起大家的误会与揣测,所以我以后对于重要问题,都想有点意见贡献于党”。这位前总书记真是自作多情到了家,这届中央实比上届中央对他更绝情。八月二十八日信的一星期后即复信全盘否定了他的意见。对于以后陆续发出的两封信则被锁入石匮。

① 有关中东路事件的编年资料,主要资料采自《黑龙江历史大事记》1900~1911年本和1912~1932年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和9月出版。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集,有关中东路事件的中共文件引文均出此书,不另注。

③ 三封信指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五日和八月十一日三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集中只收入第一封信。本节所引三信均据上海人民出版社《陈独秀著作选》文本。不另注。

信中,陈独秀认为,考虑到国民党收回中东路权,“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因此我们的宣传应该获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理解,“似乎不能像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要以能使群众明白现在收回中东路是“有害无利的幻想”,口号如离开这一导向,其后果“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真是说到了家。读者记忆犹新,军阀也罢,国民党也罢,说共产党卖国的第一法宝就是这个“卢布作用”论。陈独秀全信所提的意见只是宣传方法上的问题。统观全信,从中东路事件而使“帝国主义间的第二次大战在中国做战场……都是实际可能的前途”诸内容分析,此信也染有“第三时期”理论色彩。就这么一封谈方法论的信,中共在回信中首先指出不是策略或宣传方法问题,“而是包含了严重的原则问题”,是陈独秀“走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的暴露。现在读者也许很不理解,在二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谁若被扣上国家主义这顶帽子,就等同于右派分子一样令人可怕,不只当时据以围剿陈独秀,还把他列入开除党籍的重要罪孽。当时正候着空子等待上台的王明撰文追究陈独秀的中东路事件的“思想根源”,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历史继续”^①,后来,蔡和森把陈独秀的中东路致中央的信看成是“绝对的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观点相反”,并上升到此乃陈独秀“非走到反革命的营垒不可”的“最后的转变”,甚至说陈独秀“带着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的影响跑到中国共产党内来,现在不得不带着这副本来面目跑出中国党的队伍之外去”^②。

中东路的结局是苏联诉诸武力。十月上旬开始苏军从满洲里、绥芬河、三江口三路向中国进攻,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张学良派北满特派员蔡运升“揭白旗投降”^③,总共一个半月,苏联目的终于达到,打的是政治仗,目的达到,苏军即时撤退。讲完中东路事件,作为余兴可以讲两个故事,一是曾是国共合作时期军事总顾问布留赫尔(加伦)将军担任这次给东北军以沉重打击的苏军总司令,他可狠狠地出了一口上国民党的当的气。第二个故事,参与调停全过程的中俄中介国是德国,而且就在德国柏林通过电讯联络苏联、南京和沈阳、哈尔滨解决中东路事件,于是时任驻德公使蒋作宾就成为中方首席代表,他在获悉“揭白旗投降”之后曾发电向南京大发牢骚云:“既愿接受此低条件,何不告知。朝有电来,夕即可与俄人堂堂正正平等发布共同宣言,一可表示吾国酷爱和平,相当让步,非如今日形同乞和投降……”因此,他恨极而言:“东三省各负责者真可杀矣!无故挑衅,又无故投降,辱国丧权,莫此为甚”。

① 韶玉《论撤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布尔塞维克》第2卷10期。

② 《论陈独秀主义》,《蔡和森文集》第801~83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第1版。

③ 全部调停见《蒋作宾日记》1929年7~10月相关日记条目,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

回过头来再说几句陈独秀与中东路事件。近来有的研究者认为中东路事件是导致中共开除陈独秀出党的主因；也有持相反意见者，认为中东路事件是偶发事件，没有它，陈也得被清除，笔者同意后者但要补充的是：中东路事件加速了中共对陈的处理的决心，于是就得说到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后发自八月五日的第二封信。

“不断革命论”的教训

上一节在中共与陈独秀就中东路事件的争执中结束，三封信中我们只讲了第一封，第二封信写于八月五日；十一日他向中央发出的第三封信。这最后一封信是就中央就中东路事件对策一信的驳斥的反驳斥。在信尾，陈独秀提出：“我希望这封信和前几天论党内各种问题的那封长信，都能早日在《红旗》登出”。“那封长信”即五日的信与中东路事件没有关系。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央拒绝刊登“八五信件”乃是由于此信明显宣传托派观点，理所当然不能提供宣传阵地。这起码违背了党的民主原则，至于“真理越辩越明”之类的大道理也就被不民主的作风所遗忘。此信是陈独秀向中共阐明他“方向转换”的第一个文件。^①

本传在处理长时期来被禁、被歪曲的历史或理论问题时，为避免一时之间说不清楚，于是就采取分而谈之的方法。一经点出，读者将会记起在这之前的若干章节的相关叙述中我们曾经研究过二次革命论、不断革命论之类的问题，本来是可以不必专门谈了，但考虑到从来的陈独秀研究中几乎没有进行过专项研究，更要紧的是不断革命论在中国并不只陈一人谈，因此议论中国革命而不了解这个简直谈虎色变的理论，总是一个缺憾，尤其是在陈独秀传中，为了能使本传对不断革命论有一个较明晰的交待，我们从中共指控陈独秀和中国托派犯的“罪状”谈起。

把几十年来历数托陈取消派的罪状拢在一起大体上有：一，组织反对党分裂中央，对抗共产国际；二，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三，抗日战争时期反对国共合作终至于拿日本津贴当汉奸“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②；四，右倾机会主义。综上所述的最后一条主要是陈独秀个人的，第二条是理论问题，主要指控的也是陈独秀，于是就可以谈谈“八五信件”了。

全信从八七会议尤其是现中央犯左倾盲动主义兼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实际上是对共产国际近期指导无所适从之表现）使革命正遭受惨重损失谈起，分十个编号段落，下面这段话是认识全信的关键，甚至可以说是由陈独秀挑起来的中共中央与他尖

^① 此信全文载《陈独秀著作选》第3集第37～57页。下面引文不另注。

^② 康生《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延安《解放》周刊第1卷第29、30期。

锐矛盾的理论焦点：

现在的中央政策，是否已经改正了这些错误呢？我以为一点也没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根本上也同时存在。始终不认识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危险，始终不认识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之阶级性，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则在政治分析与估量上自然要发生错误。政治上有了错误的估量，即是把敌人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坏，把自己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好，自然要发生盲动主义；盲动主义者碰着不动的阻碍，自然要发生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唯恐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死党内德莫克拉西，排除一切意见不同的分子，造成自己褊狭性的一致，以便令出推行，好证明其“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说”及盲动主义路线之正确。有许多同志都感觉着中央在政策上组织上或工作方法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以为不是这样零碎的问题，而是有系统的一贯的总的路线之错误。

“一贯的总的路线之错误”，这就是“八五信件”的出发点，于是引出来的必然是用另一种路线改正中央的路线错误，陈独秀提出的就是前一高潮和后一高潮“二个波间过渡期”理论。问题当然不在于这个政治术语，而在于就一九二九年秋季的形势下用什么政策和策略去填补“二个波间”这个令人恼心的过渡期的低潮，使革命前后衔接。这就是分歧或矛盾，那么其焦点何在？在陈独秀看来，就在中共中央“始终不认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社会现实：“革命失败和资产阶级之胜利”，接下去是如何使矛盾转化，达到革命胜利与资产阶级失败。“向李”体制的中共作法是“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一切工作以此为准，从小暴动到大暴动，以至全国总暴动夺取政权。陈独秀则认为应当改弦更张，在两个波间的低潮期进行“合法运动”，信中的第八条就是陈独秀的主张：“现在是一种什么时期呢？……现在还是两个高潮间过渡时期，在这过渡时期中，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工作路线，都应该和这个时期相适应，即列宁在一九〇八年所说的：‘过渡时期之特殊任务是准备力量，集中力量。’我们要准备集中力量，首先要铲除盲动主义的精神，低下头来设种种方法接近群众，然后才说得上调动群众向前斗争，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接着陈独秀引述了列宁在一九〇六年俄国革命“两个波间”的低潮期与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召回派“有过剧烈斗争”的历史，坚持自己的用合法运动来填补两个波间以衔接下一个革命高潮。有一点应该特别指出，以往对于“八五信件”的研究全都不谈信中批判立三路线错误估量敌人“坏”，我们“好”；把好必定打倒坏的终极真理当成现实，而恰恰是这一点使“八五信件”成为“向李”体制的中央

推行“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不动的阻碍”，于是就非除陈而后快了。不指出这令人不快的史实，不仅是不公允的不符合历史的，也是无法解释陈与中共矛盾的焦点的形成和各自的理由。隐去了这重要的一条，传统的研究者们接着就引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提出的合法运动举措如用“民主主义”替代“建设苏维埃政权”、“为召开国民会议而奋斗”、“直接普选”、“八小时工作制”之类偏离阶级斗争的口号，于是，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帽子飞向陈独秀就很方便了。把这一切写出来就说明笔者不同意那种偏袒研究，这是一；其次，在我看来更为严重的是，以往研究者还孤立地引用陈独秀的上述合法运动举措，在陈独秀，合法运动是过渡时期的策略和战略，他没有放弃党的秘密工作，其所追求最终目标的手段仍然是武装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八五信件”中陈独秀明确写道：

当然，我们领导群众做一切斗争，必须指出总的中国革命前途……一直到武装暴动的力量，和宰割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剧烈冲突，国内统治阶级内部不断的冲突所加于中国各下层阶级之榨取与痛苦及因此而发生绝大的经济及财政恐慌等事情结合起来，那时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必然形成；那时我们的党在群众中如有强固的领导力量，革命必然获得胜利……

也许有些人会说这是陈独秀以“二次革命论”的观点所开出的空头支票，“二个波间”理论还能引发或积蓄“暴动的力量”？好，我们暂且搁下不议，只说明一点，那就是陈独秀与中共的终极目标仍然是一致的。这就是当今有识之士指出的“他与党的争论，仍是革命阵营内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路线和方法上的分歧”^①，于是问题就归结到：开除陈独秀党籍，对不对呢？从陈独秀立场，他反对中共的政治主张，若不被开除，成为党内反对派，党不会容忍，也不利于他组织反对党；从中央立场，开除他是符合中共二大党章中第四章《纪律》中关于开除党籍的第二十五条的。各自都别无选择，可选择的是“向李”路线的错误和共产国际的误导加速了这出悲剧的启幕，这是值得总结的教训。教训终于和着血向我们袭来……

八月二十四日，租界西捕与上海警署逮捕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四位共产主义战士，他们自知必死无疑且距死期不远（六天后被秘密枪决），就向中央发出最后的遗言，其中有道是：“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②烈士遗愿诚可贵，然而在当时无论中共还是陈独秀一派全部已经无法在一张桌子上议论

① 唐宝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页。

革命了。陈独秀对四位同志的死是悲痛的，尤其是颜昌颐，他与赵世炎都是留法的党员，都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陈独秀是熟悉的。

正因为历来在研究“八五信件”时都采取不提信中正确意见和所揭露中央的错误事实，以致直到今天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三封信中的一封信，是陈独秀向中央“贡献”意见的同时，宣布他的政治主张。可以批判他的主张的错误，却不能说他“造谣”。陈独秀八月五日信中对于“向李”中央的盲动主义的批判不消半年历史就证明是正确的，指出因盲动主义而扼杀党内民主推行命令主义也是正确的。由于全信十条最后归结到从“八七会议”以还党的总路线全盘皆错而用他“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结论”改变党的总路线，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开始用托洛茨基理论组建他的新的革命中心，这也是无可选择的选择。

在中共革命的全过程，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甚至直到如今，不断革命论以及与之相关的二次革命论、过渡时期理论等仍在争论，历史，往往要碰在南墙上才知道走错路而欲改道。第二次国内战争以八七会议为起点，在新一任领导瞿秋白和新一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思想理论中都曾有过运用“不断革命论”探索改道的经历。新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后的第一次临委扩大会（十一月）决议，由罗明纳兹起草经与瞿秋白商议定稿并作为党的工作任务决议案下达全党的，这是用不断革命论指导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文件：“中国革命带着长期的性质，但是无间断的性质。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①。为什么会在托洛茨基已经流放西伯利亚一年后莫斯科派来的代表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不断革命论，简单的回答是中国民权革命不可能落在疲软的资产阶级政党手中，因此“中国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就是说不能产生二次革命理论的实践形势，“必然是急转之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一个月后发生的广州暴动就是罗明纳兹不断革命“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尝试，如果胜利了，历史就得重写，然而根本是不可能胜利的。因为他没有“不断革命”的必要前提：资产阶级“统治不能稳定”，很快就会垮台估计入内，加上本届中共中央乃临时性质，再也没有向他提供继续实践无间断革命的时间，只半年就被新的国际代表所替代。另一不能提不断革命的原因是它正撞在斯大林全面整肃托洛茨基的枪口上，于是在中共六大同时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上罗明纳兹作了检讨，但没受到处分甚至还受到他的格鲁吉亚老乡的袒护，最终的结局当然在秋后算账风中于一九三四年基洛夫案大清洗中自杀了。

瞿秋白作为不断革命论形成临委决议的中方代表，在临委会决议下达时，还就不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集第453页。

断革命论这新的革命导向,写了《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国革命是由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根本上不能在民权主义的阶段上再成一段落,像法国大革命似的,中国革命……要胜利便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据中国托洛茨基派理论权威郑超麟说,这还不是托洛茨基理论意义上的无间断革命^①,但瞿秋白也在中共六大上作了传播无间断革命论的检讨。看来无论是罗的瞿的,更不必言陈独秀的,只要提到这个政治术语就得检讨就得倒灶。其实,瞿秋白是对的,他不仅提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工人以及农民参与打倒王朝的革命,因领导权在资产阶级手中,使革命胜利后的工农倒在巴黎街头,被敌人打死的血和被朋友打死的血竟然淌在一起,真是太像中国大革命了。在这个历史教训中罗明纳兹和瞿秋白皆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法国工人再发动革命就得“砸碎”国家机器的提示,决不允许出现民权革命胜利之后,“只开阔些‘民治气象’得着纯粹资本主义”的间隙,要一口气直到社会主义胜利。为什么说临委会决议案中的不断革命与托洛茨基的不同呢?郑超麟认为凡承认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应具备三个要素: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工农民主专政;在剥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同时剥夺资产阶级所有制;在世界革命中解决工农矛盾,就是一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郑超麟承认广州暴动是不断革命论的实践物,因为这次暴动的政治目的符合前两条,既剥夺封建所有制又剥夺资产阶级所有制。这就是说理论虽欠缺而实践则完成了不断革命论。“广暴”惨败,不断革命论并没有就此收起,接着就是陈独秀的不断革命论。那么陈与瞿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郑麟超没有说,笔者以为区别就是所谓的两个波间过渡时期理论上,瞿秋白坚定地认为中国从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不能出现过渡期,不能产生法国大革命后的资产阶级专政,不能发生“民治气象”的资本主义制度。陈独秀认为会,其出发点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南京政府胜利后并不能很快消亡,与此相应,下一个高潮决不会很快来临,这就产生了二个波间的空白,如何处理?陈独秀的办法恰恰是瞿秋白批判的“民治气象”,必然的结果是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等于是二次革命论。在这一点上,陈独秀是错误的,至少在国民党强制专政下没有任何可以让持不同政见者从事政治活动的民主自由气氛可言,更谈不上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陈独秀的一系列过渡时期理论派生出来的行动举措,确有社会民主党的味道。

我们这里研究不断革命论,如若只为了辩个是不是反革命,就太没意义了,我们是想说,从北伐开始到南京政府成立,从八七会议到“广暴”失败,直至六大“向李”中

^① 详见郑超麟《瞿秋白与不断革命论》,《瞿秋白研究》第5辑,瞿秋白纪念馆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央策划“毕其功于一役”的左倾盲动主义，全部敌我双方在政治舞台上大打出手，个中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不断革命论的形势：于国民党是争资产阶级一党专政的立国权；于共产党是通过土地革命无间断地长入社会主义实行先工农民主专政而后无产阶级专政，事实证明国民党赢了，共产党输了。中共之所以失势，主要原因不在于中共内部分裂，在于国民政府的资产阶级统治超过了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力量，而中共既弱于敌人，又犯了盲动主义（败于立三路线）。从一九二七年算起到一九四九年南京政府撤出大陆，经历了二十二年，不是一个短时间，陈独秀说的革命高潮不会很快到来，应当认为是说对了。以上历史一切平息后，一九三〇年，毛泽东在寂寞的井冈山写下了一篇著名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全文是在如下一段抒情散文中结束的：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们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的见桅杆尖头上的一只航船，它是在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就高潮的时间问题，写于一九三〇年的毛泽东文，显然有写于上一年八月五日陈独秀信的影子。

似乎太危言耸听。

然而这确实是历史和它的辩证法。

那么陈独秀错在何处呢？前面已经点明错在过渡时期的政治决策上，为更能说明问题，请读者勿嫌麻烦，再引一段毛泽东权威之言。

抒情过后第十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不断革命论指出，在民权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二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就理论意义，毛泽东的见解与瞿秋白的见解一模一样，但是毛泽东称之为“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避去了“不断革命论”这个政治术语，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九四九年，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为只剥夺了封建制度解决了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城市，资产阶级剥削依然存在，但不会发生对抗，这就是瞿秋白说的“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民权主义生长成社会主义的最明显的实行”，中国革命能避开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专政的命运而直达社会主义，除了毛泽

东领导下的中共的政治路线正确指导中国革命,还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助长了各国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国际局势使然。这当然已经与本传主人无关,但他的不断革命论可不可以作为一种正面接受的革命遗产呢?值得考虑。中共在一九五六年完成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从理论上说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阶段的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新发现的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宣言》上一段批示里有一句千钧分量的话:

“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①。

如若资产阶级不可以和平过渡呢?看来,罗明纳兹的瞿秋白的甚至是陈独秀的不断革命论,都不能轻易推倒,当然现在提出这种问题已经进入了研究领域,没有什么实践意义了,历史,毕竟是历史。

组织托派,普罗米修斯被绑

写毕命运多舛的“不断革命论”,反倒感觉沉重,这不是因了陈独秀为实践这个理论证明确实错了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假如确实错了,只是代价大小的问题,打个比喻,就如犯了一年的罪被判了三年,量刑不当,毕竟有罪,而中国的托派和他们的领袖是在没有获得用“不断革命论”(两个波间过渡期)实践中国革命(或者说是干扰中共)之前就遭受到了来自共产国际、中共和国国民党三个方面的打击,前二者把他们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后者却把他们当作马克思主义者投入监狱,此话真不知如何说才好。

先谈谈中国托派组织状况。

对于中国托洛茨基派的组织,目前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分四个时期和四个组织,中经两次统一和一次临时统一。本传则从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出发分三个时期予以研究。三个时期为:一九二八年起莫斯科中大、东大和列宁学院中笃信托洛茨基理论的学生陆续被遣返归国次年起筹组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到一九三一年五月第一次统一大会。这个时期虽只不足三年,却是中国托派的黄金时代。第二时期是统一大会到一九三二年十月陈独秀、彭述之等托派中委被国民党几乎一网打尽,期间托派仅剩的几员坚定分子在社会上活动,陈独秀则在狱中遥控指导,但没有什么活动,中国托派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还矣。第三个时期是抗战开始南京沦陷前夕陈独秀等被提前释放至一九四二年陈独秀逝世。当年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等再次筹建统一组织,由于陈独秀已经去世,致使名义上统一的大约百人之数的组织,实际上是四分五裂,

^①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宣言批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

大体上讲是以对彭述之的政治态度为基准,分成多数派(彭述之)和少数派(王文元),一直活动到一九四九年,甚至可以说活动到现在,这时期由于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苏联亦已肃清托派,因此中国托派的国际压力已不存在,虽有第四国际的大一统组织,但国际共运的集团意识已经淡薄,成不了气候。

从以上简单的叙述中分明可以悟出,虽然陈独秀是抱着托洛茨基主义撒手人间的,但他的全部活动在第一时期。

中国托洛茨基派在统一前共有《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战斗》社。以上四个组织总体而论除《无产者》社,其他三个组织是清一色留苏学生,其中最早最具实力的是《我们的话》,该派有个“全国总干事会”的组织,其“总干”梁干乔,在苏联加入托派时,曾受到托洛茨基接见。由于他们是被遣送回国的公开的托派,因此不久中共中央就得到苏共密电而彻底暴露身份,中共曾派周恩来、恽代英等对大约二三十名已经在党内得到工作而隐蔽下来的托派办学习班,要他们放弃托派思想,不准从事分裂党的活动,终因彼此信仰分歧,皆被开除出党。照理,这个组织应有较强的凝聚力和-work实力,但事与愿违,致命弱点是老子天下第一,瞧不起国内托派尤其反对陈独秀,加上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社会及其革命策略,只会在《我们的话》上发表文章,尽管文章“写得很生动”(刘仁静评语)。《我们的话》还是中国托派未被开除出党之前办的一个受到中共点名批判批出了名的刊物:“他们也如欧洲各党的反对派一样,有他们党的组织,命名为‘中国列宁主义者布尔塞维克反对派’,有他们的出版物《我们的话》,在党内秘密宣传。”^①但不了解中国革命而发表的教条主义的“我们的话”到处碰壁,被多数托派斥之为门罗主义,就门庭冷落难以维持,终于被迫散伙。

留学归国的托派中曾经是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可谓大名鼎鼎。他是抱着坚定信念拜访一九二九年二月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的唯一留苏学生。刘仁静没有暴露身份,是得到共产国际同意后归国的,去见托洛茨基当然是秘密行动,一九二九年四月经由波兰、捷克抵达柏林获悉托洛茨基的住处,再折经罗马尼亚库斯坦察港轮渡到了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并在洋面上的太子岛(亦译成王子岛)叩开了托洛茨基的家门,“托洛茨基见到我,便站起来和我握手……说我是他认识的唯一的中国人”^②。刘仁静在太子岛住了一个多月,“每天吃了早饭就到 he 家里去,多半在他家吃中饭。在我回国前,连下午多在他那里谈。我和托洛茨基谈话的内容是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和反对派的任务”。临回国前托洛茨基很兴奋“为我取个名字叫‘聂里奚’……后来我和他通信时,就用这个名字”。也许年代久远也许刘仁静疏忽,他与托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集第417页。

^② 《刘仁静谈托洛茨基派在中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1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下同。

洛茨基通信用的是英文名“Lels”，在托派内部用的是其谐音列尔士，不是聂里奚。最后托洛茨基口授由他儿子打字完成《中国目前形势和反对派（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任务》一文交给了刘仁静。刘归国后与郑超麟一起将此文译成中文作为第一时期托洛茨基直接参与中国托派理论建设的重要文件之一，由于陈独秀向中央第一次公开反对派理论的“八五信件”写于刘仁静回到上海的前十天，因此托洛茨基亲授的这个文件与陈独秀之反对派理论没有直接关系然而却异常吻合，因此可以认为截至一九二九年冬，作为中国托派领袖的陈独秀在理论上已成熟了。

刘仁静回国后没有留在党内隐蔽开展工作的想法，也没有与前去接头的恽代英吐露真相，因此他是被中共查出后开除党籍的。刘仁静与梁干乔同样以“老托”传人自居。他回来时适逢《我们的话》派中人讨嫌梁干乔独断专横而分裂，其中王文元、宋逢春等就转而加入了刘仁静的《十月》社，《十月》社唯一贡献是在《十月》上发表了上面提到过的那篇托洛茨基太子岛口授文章。大概刘仁静独钟托洛茨基口授文中的第四条即“作为过渡时期的口号，应提出以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产生国民议会”，后来被同派中人斥为“议会迷”而被开除出反对派，成了中国托派中被中共开除又被托派开除的第一人，因此统一大会后就无其人，他又独自组织《明天》社，但已经没有什么明天可言了。上面提到刘仁静是双开除的第一人，那第二位双开人物也许读者不至于想到，笔者在此先透露，就是中国托派第一人——陈独秀。为何如此，只得慢慢道来。

留苏回来的托派学生成立的第三个组织是《战斗》社，这个社除出版一期《战斗》外就没有任何战斗了。

把《无产者》社作为压轴予以介绍，聪明的读者想到必定是由陈独秀等一大批中共干部参加的、实力最强的托派组织的缘故，其中包括彭述之（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长）、郑超麟（历届中共党报党刊编辑）、尹宽（先后任江浙区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以及马玉夫、汪泽楷、蔡振德、罗世藩、吴季严等等至少有骨干三十多名。其实此派中人也大多留法留苏，但较之后来者，他们是已有四五年国内斗争经历的“老干”了，以致被别的年轻的托派瞧不起。开始时，他们是中共党内的反对派——“陈独秀派”，曾经在上海、在江苏省委中有过几乎控制的势力，也曾影响过相当一部分中央和地方干部，其中有不少重要干部，致使“向李”中央感到危机。《无产者》社是陈独秀等被开除出党后组成的，有以下特点：一、大多是中共元老和具有实际斗争经历的老革命；二、不仅具有较高理论水平且具有实际斗争经验，写成的文章对中共有威胁；三、深受国共合作分裂之害，反国际和反苏意志坚定；四、熟悉共产国际和苏共内部斗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对国际指导错误抱有很深的意见乃至成见；五、在工厂、学校、文化领域（书店、报界、印刷厂）有支部，有较多的工人支持者，还有

一些高层次的朋友可供地下工作活动的掩护,这一点很重要。以上五条决定了中共对中国托派的主攻对象就定在这个组织上,陈独秀身上。《无产者》社于一九二九年底成立后立即发布由八十一人签署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作为该组织的纲领,这在中国托派组织中是唯一全面批判国共从合作到分裂的五年(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和八七会议到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近两年的反对派文件。这份陈独秀起草的纲领的原则在研究“八五信件”时已基本阐明,这里把意见书的章目立此存照。

- 一、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
- 二、党的现状与危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与官僚主义
- 三、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源与苏联危机
- 四、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两个路线斗争
- 五、我们的态度与建议^①

第五章共六条,其中涉及中国问题的是两条,涉及国际革命的是四条,可以悟出中国托洛茨基派完全是一个国际组织的架势,稍一延伸就可证明中国托派主要反对的不是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明白,中共决策来自国际,另一原因则是感情因素,他毕竟是中共创始人,与党有血肉之情,被开除党籍的滋味不是常人所能体味的!如果从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态度,《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涉及中共的部分(主要是第二条),应当说是有不少值得向忠发、李立三等决策者考虑的,当然由于卷入了国际反托大潮,中共显然无法接受,况且持“高涨”论的李立三连党内的意见都听不进而采取打击排斥异己,更甭提陈独秀了。但陈独秀明摆的主攻对象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矛头主要集中在斯大林身上:“公布五六年来反对派对联共及国际政策发表的各种文件,公布列宁遗嘱及其它被史大林派隐藏着的列宁遗著”,“重新审查五六年来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所犯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并重新决定联共的政策及国际的政策”,这两条像两束激光射向莫斯科,从中国托派立场是相当勇敢的,也符合陈独秀的性格。

这里还得谈谈共产国际因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导致分裂。抛开苏联内部问题不论,当时分裂的唯一焦点是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彻底失败至于连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国际最高领导都分裂成为斯大林苏共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反对派,后来斯大林又把一直受到列宁重视的布哈林清洗出党等等作法,不能不引起各国共产党强烈不满和心有余悸,斯大林采用公安手段,即用沙皇时代对付革命者流放西伯利亚的办法

^①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106~137页。引文不另注。

对待托洛茨基派,这对于各国共产党尤其是欧洲党是无法容忍的反民主倾向,他们在母国受尽了统治阶级的压迫,到了莫斯科仍有压迫感,心理压力不小,以致当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从阿拉木图传到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国际共运发生分裂就不是斯大林和苏共所能控制住了,产生被斥之为“阶级反对阶级”的窝里斗现象,成为共产国际史上一个时期的(一九二八年六大布哈林第三时期理论起到二战发生)象征:“各国共产党在奉行一九二八年提出的‘阶级斗阶级’的政策时,发现自己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并且在各自国家内日益陷于孤立”^①。从此“共产国际便失去了任何稳定的标准”开创用公安手段打击异己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且愈演愈烈,共产国际的“转变到‘阶级反对阶级’的政策,尽管苏联领导人认为这方法对他们国内的用处很大,对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却产生失去战斗力的后果”,中国共产党截至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止的历史既然受共产国际和苏共的格外关注,对于托派而言就被认为受害最深,在各国一夜之间发生的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中,越是缺乏民主的国家的共产党越是强烈,中共在没有对陈独秀等托派采取组织措施之前就把党内托派的调子定在“必然不可免的要与统治阶级勾结”,“如果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了,他们必然会整个卖给统治阶级”^②,看来多年后把陈独秀诬为国民党特务或日本汉奸只是上述预测必然要加上的罪名。但是退一万步,中国托派纵有千错万错,也没有“勾结”或“出卖”给统治阶级或民族矛盾上升后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可耻行动。来自中共的批判和压迫自是意料之中,使陈独秀大惑不解的是另外三个组织尤其是《我们的话》派,与中共同样把《无产者》社作为进攻对象:“我们这些被正式党(指中共——引者)斥为‘机会主义者’的人,虽然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在莫斯科回来的反对派同志眼中,仍不能算是左派反对派。他们也跟着斥我们为‘机会主义者’。他们也许欢迎我们所影响的群众,但反对我们的领袖,尤其陈独秀本人”^③。其中梁干乔等尤为强烈,成为托派中的极左派。

此时的陈独秀可谓是四面楚歌,共产国际和中共反对他,托派也反对他,国民党要捉拿他,他孤独一人住在老靶子路中州路,时年已五十岁,不是容易改变信仰的“小C.P.”,如若没有坚毅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认定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能救中国的痴迷,是不可能贸然接受的,托洛茨基不是斯大林,稍微有一点私心杂念也不会站在托洛茨基一边去反对如日中天的斯大林,对吧?这个孤苦零丁的老人肩负重任等于是爬行,一个人冒着危险冒着年底的寒风,穿出老靶子路向北走至少四里路,走到

① 珍妮·道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1929—1943)·序言》,东方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② 《周恩来选集》。

③ 《郑超麟回忆录》第237页。

薛家浜(今昆明路)彭述之、汪泽楷两对夫妇的寓所。这是个不吉利的贫民区,抬头就是上海人称之为“外国牢监”的提篮桥监狱带电网的围墙,就在这里他接受了托洛茨基理论,看到了已经出版的《我们的话》,开始了党内反对派的活动,“开除前几日,中央派了汽车来接陈独秀去一个地方同国际代表谈话。国际代表坐在写字台背后,有人引陈独秀到写字台面前,国际代表坐着,毫无礼貌,说了几句话,态度很不好;翻译站在他旁边,把他的话翻译给陈独秀听,态度同样不好。不像同党内同志谈话,却像法官审问犯人。陈独秀于是掉过头来,向房门走去……”当他向郑超麟等追述此景此情时仍愤愤不平。接着中共大清洗托派分子。此时,陈独秀警觉起来,他即时搬到邓脱路,就巧遇潘兰珍,一个不成其为鳏夫一个结束寡居,总算有个煮饭铺床的人,至于锅里煮的是什麼,任何一个靠卖稿为生的知识分子是不难想像的。一九二八年完成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卖给商务,不能出版,后来您和赵元任先生等才送他千元稿酬,维持了好久生活”^①。按照“给予别人,应忘却”的古人雅训,胡适会是“忘却”的罢。第一章中我们已经交待过,潘兰珍不知与她同居的“李先生”乃是“老西”,但纸里包不住火,邻居把隐情告诉了潘兰珍,为了稳住慌了神的小潘,沉住气的陈独秀过了好一阵子,才请郑超麟帮着在岳州路永兴里内的一个裁缝铺楼上安了新居,陈独秀用意也是明白的,如即刻就搬等于承认“老西”的身份,岂非砸了铺盖。但从此陈独秀就更警觉起来,新居只有被潘兰珍戏呼为“小胖子”的郑超麟一人知道,陈的一切对外联络概由郑负责。^②

中国封建制度长达三数千年,虽经旧民主革命使资产阶级步入社会革命舞台,仍摆脱不了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说了算的独裁政治机制,此处当然不必议论向忠发、李立三,更不必议论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的专横导向,要议论的是中国托派一开始组建也陷入争正统争领袖,并互相攻击对方的理论之错误,谁也不听谁的,倒还是刘仁静看穿错综复杂的“窝里斗”,毅然写信给托洛茨基,要求他出面调解,使中国托派能得以统一,托洛茨基回信一是支持陈独秀,二是建议四个组织各派代表成立“协议委员会”,统一各派力量组建统一组织。经过几番努力,还是由陈独秀领导的《无产者》社出面召集其他三个组织各派代表二名组成协议委员会,展开不比资产阶级议会争议席逊色的明争暗斗。陈独秀没有参加协议,他也讨厌争来斗去那一套,如果没有尹宽出面干涉,这个委员会不是在争论中解散便是无休止争下去。尹宽立了一功,再加上陈独秀很宽容,他认为不应瞧不起莫斯科回国的青年托派,他们若五四青年,“朝气蓬勃,很有常识”。“老头子”如此豁达大度,一切迎刃而解,终于议定成立统一的中

^① 何之瑜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第306页。

^② 抗战胜利后又成孤寡的潘兰珍从四川回到上海找寻的第一人也是郑超麟并在他家住了好一阵子方去浦东安的家。据郑超麟向笔者口述。

国共产党左派反对党,时序已是一九三一年四月,由《无产者》社何资深负责会务,李伸三捐出一件猞猁皮袍由郑超麟典当得大洋二百,作会议费用,在托派集中地的舟山路租得楼房一幢于五月一日召开统一大会。大会代表共二十一名(内四名列席)。会议开了三天,议决了政治纲领,决定出版机关刊《火花》,最后选出了七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内二人为候补委员),五个中委的分工是:陈独秀(总书记),陈亦谋(组织部主任),郑超麟(宣传部主任),王文元(党报主编),宋逢春(书记处书记)。这里应当解释几个人的情况,争正统最烈的梁干乔没能进入中委,他一气之下想起了他是黄埔一期生的光耀出身,就跑到南京找老关系终于当上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政训处处长。从此不只对托派,也对共产主义彻底背离。抗战时期梁干乔在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任上时还接济过一九三五年被捕关在苏州反省院中表现良好而当上“自治会”主席,而被托派彻底唾弃的刘仁静。这算是惺惺惜惺惺吧。

刘仁静,曾为托派全国统一立了大功,因“议会迷”一事被《十月》社开除,后一个人单干的《明天》社不被协议会承认,只允许他以个人名义参加,刘予以拒绝,但他仍笃信托洛茨基。刘仁静若一九三五年不被国民党捉拿,或不在苏州反省院有所悔悟,必定是以托派而告终,然而不然,出反省院后为家庭所累,一直为国民党工作,后来在国防部政工局邓文仪属下某单位工作,出脱不久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没有去彼岸,第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们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刘仁静和李季的声明》,编者按语说:刘仁静既是托派又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工作的反革命,解放后“刘仁静和李季现在表示他们开始认识了自己过去的反革命罪恶。……刘仁静现改名刘亦宇,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教师”。总算逃脱了一九五二年斯大林生日夜大兜捕的缙继之苦,日子难过自是不必在此多言。

统一大会结束,五月五日和九日先后两信发给托洛茨基报告会议状况和今后打算,这两封信最近才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托洛茨基档案库中找到,总算弄清楚了一些问题;除以上所写者外,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证明当时共有托派分子四八三人;二,当时适逢托洛茨基“那个无法估价的珍贵的图书馆被焚烧”,中国托派为此成立一个为重建托洛茨基图书馆募集资金的特别委员会。^①

令人遗憾的是,就在统一大会召开那个月二十一日以后几天内,除陈独秀、彭述之以及游离分子刘仁静外,郑超麟、宋逢春、陈亦谋、王凡西等中央委员,以及郑超麟夫人刘静贞、会议留守王芝槐夫妇、何资深夫妇、楼国华(一丁)、濮德志、江常师等十三人被捕,这是托派分子马玉夫给国民党献上的礼物,由于马玉夫不知陈独秀和彭述之地址,“头功”未能荣立,这是中国托派第一次大难,三个月后,重要干部尹宽、蒋

^① 这两封信由当事人王文元译成中文后交笔者并允许转载。

振东等七人受命重组新托派中央，竟又被一网打尽，他们在龙华司令部与郑超麟等会齐，至此，中国托派已名存实亡。

五月大兜捕的同时端掉了托派总部，致使统一大会上制定的政治纲领、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以及工、农、青、妇等决议案以及党章等全部被搜去一空，时过境迁，如今只留得研究人员叹一声遗憾而已，历史也会抚平人们的创伤，不会如形容词所说“难以磨灭”。这次被捕中有不少人一直关到抗日战火烧到南京的前夕与陈独秀等相继释放，各奔东西，有的退隐，有的继续干下去。下面我们对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到被国民党投入监狱前（一九三〇年一月——一九三二年冬）所写的论文作一简述。

无论从阐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理论，还是结合中共历来所存在的问题以及陈独秀认为所产生的种种错误，共产国际的误导方面以及中国托派（当然是陈独秀派）的政治原则和革命策略上，大多在“八五信件”、《告全党同志书》、《答国际的信》中有所表达，作为《无产者》社的政纲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则算是中国托派未统一前的最权威的《无产者》社派思想的总其大成之文。也即是说为蔡和森等中共理论家所批判的“陈独秀主义”，如若不作学术上深入研究，通读上述四文不说足矣也可算是八九不离十了。这一概括决不认为陈独秀的托派思想没有发展，不，首先，以“八五信件”为滥觞的时期，陈行文感情太盛，溢美的说法是战斗性强，但毕竟是怨气大于理智。后期文章就不同了，有相当部分是熠熠闪光的理论探求，抛却偏见，其中不乏可以称之为中国革命文献之文，如《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国际路线与中国党》，而《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领导爱国运动》等一类文章是随着“九一八”事变逐渐上升的民族矛盾，陈独秀笔下生辉令人记忆起了五四时代陈文的感召力。因此，下一个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是陈独秀一生又一理论高峰期的结论是不为过的。十分令人遗憾的是理论家们对陈独秀的批判止于“八五信件”、《告全党同志书》、《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等少数几篇文章的车轱辘转。这就不只失之公允，对中国本来就不丰厚的理论建设，似亦太过自我作践了。

本章上一节专门研究几种不同政治态度者对“不断革命论”的见解，从历史角度考察了中国革命确实有此论的生存的社会和革命的条件，但我们把陈独秀对此问题的认识放在这儿单谈绝非是写作方法，乃是因为直接引述并运用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原意解释一九一七年苏联十月革命和一九二七年四月国共分裂的，唯有陈独秀的《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这篇论文正是从批评罗、瞿提出不断革命论有悖于马克思此论开始阐发他的见解的，他说，“当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已经失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由反对‘不断革命’的观点而放过了，此时罗明纳兹和瞿秋白忽然大叫‘不断革命’，然而他们所叫喊的‘不断革命’仍然没有走出民权革命的范围，仍然没有放弃反对‘不断革命’的观点，他们的所谓‘不断革命论’，只是他们的‘直接

革命形势不断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①。这不仅直接批评了“罗瞿”也间接批评了斯大林布哈林向忠发李震瀛合署的中国问题决议案中对于“罗瞿”的批评。读者一定感到奇怪，一个“不断革命论”闹得全世界国际共运不安宁，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共运分子和各国共产党员被打成托洛茨基分子，特别是，怎么罗明纳兹代表国际和瞿秋白代表中共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竟然既受批于斯大林又受批于陈独秀，真玄啊。

正因为此论太玄，从蔡和森写《论陈独秀主义》起，直到近期为陈独秀落实政策而立论相对公允的研究，对于不断革命论仍然采取含含糊糊一略而过的简陋批判，造成这种衰弱研究其原因是，谁都没有去翻翻不断革命论的理论本源。于是使笔者带了某种程度的历史遗憾和探秘的兴趣谈谈此论，要知道这可是陈独秀灭顶之灾的一论啊，不谈行吗？原来，“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写的一个内部文件：《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②（以下称《告同盟书》），写于一八五〇年三月，伦敦，由该盟中央特使鲍威尔携带回国散发，德国警方缉获后被“两个最无耻的警棍”（恩格斯语）编入官方的《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阴谋》一书，直到一八八五年才由恩格斯编入马克思早期最著名的论文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事件》。可见此文是马克思为德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无产阶级一方失利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草拟的总结过去展示未来的策略性文件，并无特殊的理论深意。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鉴于无产阶级从参加到失败的不重复，马克思一直在研究对策，有关不断革命论的思考——无产阶级如何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保存自己的政党地位以便能“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阶级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接着，文件又指出“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两段引文中的四个“直到”和三个“不在于……而在于”，等于是宣告夺取无产阶级政权，那么手段呢？就是不断革命论。因此，不断革命论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阶段性对策性理论。可见就陈独秀来说他不只运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而且直接运用此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原论。还有一个特别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告同盟书》所议与中

①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1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1~371页。引文不另注。

共与国民党从合作到分裂的历史简直到了令人惊诧的“何其相似乃尔”，上面所引已昭然，下面则更相像了。

弟兄们，我们早在一八四八年就对你们说过，德国的自由资产者很快就会执掌政权，并且立刻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获得的政权来反对工人。你们已经看到，这个预言是证实了。一八四八年三月运动之后，资产者果然是立刻就夺得了国家政权，并且随即利用了这个政权去迫使工人即自己的战斗中的同盟者回到他们从前的被压迫地位。

如若把上引中“一八四八年三月运动”改为“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件”，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简直等于是给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警告。这也就是不断革命论能在中国有一席地位的社会因素。这且不说，问题严重在中国“四一二”之后没有得到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文件中提出的警告：“无产阶级对于这种联合应该采取坚决的拒绝态度”。很遗憾，共产国际恰恰与马恩相反，指令“八七会议”后的新中央仍然打国民党的旗号去实行土地革命的八月南昌、九月秋收暴动，直到广州暴动时才有所觉悟，但为时晚矣。我们现在不能确定陈独秀在什么时间读到的《告同盟书》。据《告同盟书》关于坚决拒绝合作的意见，陈独秀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多次要求退出国民党既是合理的，也是正确的，不然还谈什么“不断革命论”呢。再则，在陈独秀的理论探索中认为国共合作在被国民党“四一二”和“七一五”破坏后，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因“反对‘不断革命’的观点而放过了”，不复存在了，于是就产生了他的“二个波间”论，这，在笔者看来恰恰是“阶段论”，虽然陈独秀必定会遵守《告同盟书》中所指出的“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换句话说他不会与资产阶级妥协，尽管他填补二个波间所用的是国民议会的口号，但是他也没有遵照《告同盟书》中如下的重要指示：“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反对这个从胜利的头一个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政党，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使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当然《告同盟书》中所有这些指示后来由于德国和欧洲“资本主义工业的新的繁荣时期已经开始，短期内新的革命高潮不会到来”而取消了“不断革命”的号召。^①在一九二七年后的中国，虽然没有作到“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但武装农民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却意外地发生了，这是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故事，于是我们就可

^① 参见周尚文主编《国际共运史事件人物录》第40~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

以谈谈这时期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这个错误了。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的两次实践，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想到中国革命“基本上是农民战争”，毛泽东的井冈山实践竟然成功了，确实是个天才创造出了别一条革命之路。于是什么二次革命论，阶段论，不断革命论，直接革命形势不断论等在“农村包围城市”论面前统统黯然失色，不论也罢。

一九三〇年四月，陈独秀闯了一个大祸，就是写了《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由于文中有“‘红军’大半是土匪”^①的说法，别的一切错误也就相对而言被“缩微”了，因为这乃是反对毛泽东井冈山闹革命的最大的罪恶，于是也就被无限扩大了，在他没有被作为日特汉奸宣传于世之前这是最高罪限。此文发表在托派刊物《无产者》上，一直是禁区中的禁区，可以说是绝对地不准公开的绝密文件。尽管所有的研究者都在文章中要就此问题斥责几句，但，很少有人看过全文。当然“那年头”有一句半句也就能够成为控诉陈独秀诬蔑农民运动的“炮弹”了。

我们冷静地想一想，以陈独秀光明磊落的性格和学者必备的学风，写文章能像文痞似地肆意造谣泼妇骂街吗？如可以否定，那么斥红军为“土匪”必定有因。陈独秀显然犯了由于红军中有投诚过来的大股土匪的“因”，得出红军不是一支可以干革命的土匪队伍的“果”。《关于所谓“红军”问题》全文是从引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中指出“每个工人领袖，他若要利用游民无产阶级为卫军，且企图在他们当中找着自己的支柱，只此便证明他是出卖工人运动的叛徒”^②，接着又引述他本人参加过的共产国际四大上列宁曾批判法国共产党犯有“接近此种秘密会党的倾向”，据此展开对于中国红军的挞伐。文中，陈独秀抓住的主要是党刊《红旗》上的一些报道，如有一则报道中说，“至于全国广大无比的灾民，半农半匪的武装以及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等农民群众组织……是必然会走上游击战争的道路而生长成为红军的”等言论，予以猛烈的抨击：“凭借这种社会基础的‘红军’来推动革命高潮，这就是叛徒们的革命策略”。中国向来有“官逼民反”之说，反成功了就是农民运动，失败则成为土匪或半农半匪，怎么能阻拦这类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人参加红军呢？一九二八年后在湘赣闽浙山区打游击的红军如若不绥靖地方土匪山头，又如何站住脚跟建立根据地呢？那么用什么办法对付这股邪势，一是清剿二是晓以革命大义让他们靠拢革命投诚入伍，二者必居其一，后者为上策。事实大抵亦是如此，如不把工作做到袁文才、王佐两股土匪投诚红军，井冈山根据地是难以存在的。当然，在这一问题上不只陈独秀

^① 全文见《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164~179页，引文不另注。陈文中转引了当时《红旗》等党刊上的若干文章，有些经笔者检查，并无随心所欲、断章取义式摘引。

^② 引的是《德国农民战争》第2版序。此序的现在中译文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2页，下面引文不另注。

犯错误，后来共产国际的错误和立三路线的极左镇压远较陈独秀一篇文章严重得多，就以井冈山袁文才、王佐为例，一九二八年七月，六大中共中央发布《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其中第十节《对土匪的关系》，开头就写下这一段极左之言：“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①，此文件传到井冈山，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有功的时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和副团长王佐，就是被这一极左的政策最早“消灭”的山大王。这是一九三〇年二月的事，三月，红军就被迫撤离，第二年落入国民党清剿队伍之手。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也不是开脱陈对红军的错误认识，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中国土地上用恩格斯理论撑腰是不行的。恩格斯此书讲的是德国农民战争，但批判的却是当时德国革命组织者无原则网罗的城市流氓无产阶级，为陈独秀引的恩格斯原话中有一段今译如下：“流氓无产阶级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同盟者中之最坏的同盟者。这帮游荡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的，非常厚颜无耻。”德国和中国，上世纪和本世纪，城市 and 山沟彼此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党策略，因此，陈独秀援引恩格斯的话是无补于说明当时毛泽东等发展根据地而策反土匪加入红军队伍是“叛徒们的革命策略”。相反，错误的恰恰是把王佐、袁文才杀掉的中共六大的“卸磨杀驴”的政策！

陈独秀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事情闹大了，“不用说，斯大林主义的中央大发雷霆的，当时所谓‘调和派’，项英和罗章龙领导下的人，也认为老头子‘老糊涂’。我们以外的反对派同志向托洛茨基攻击‘机会主义者’陈独秀这篇反对‘红军’的文章，托洛茨基回信指出‘红军’发生的意义及其积极的方面，不能完全反对”，据郑超麟回忆，后来国民党还把此文大量印发以扩散红军是“土匪”的说法，给中共支持农民运动和农村根据地的毛泽东等造成极大的困难。

但是我们既然提出了这篇罕有人研究而只是斥责一通了事的文章，就得发表笔者认为此文不能一概否定的理论和社会的原因。

农民暴动已经有二三千年的历史，而工人运动尤其是工人政治运动是随着工业化社会大生产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后的事，马克思主义更只有一百五十年的近代历史，但是一旦形成了主宰近代社会的劳资两大阶级，政治活动只取决于这一对阶级的矛盾运动，于是运动只有依附在工人阶级的政党运动中才能最终获得解放，这些共产主义 ABC 不必在此多说，但是中国不同，中国在形成现代社会意义上的革命运动之后，无论是孙中山还是陈独秀全都为农民问题所困扰，民权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间特别漫长，从中共的角度，他们首先背上的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包袱——土地问题，本传在前三章中曾多次提到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社会制度性的胜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集第390页。

利,谁争取到农民谁就能在战场上取得绝对优势而革命成功。但是农民问题的解决单靠农民自身是不成的,因此国民党提出“平均地权”或“耕者有其田”,共产党提出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改革;国民党把农村作为单纯的兵源,共产党把农民作为工农联盟的一方,谁都重视这堵土墙却谁都感到棘手。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在向封建制度宣战时农民为解放土地而积极参与,革命胜利后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或者是农民参与后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破坏势力,这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或教训都可以在法国大革命中找到例证,有鉴于此,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头一项带有根本性质的动员教育就是提高农民的——无产阶级——觉悟,我们不必对此作方巾气十足的理论探索,“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一句话道尽了领袖苦衷。一心一意在以井冈山为象征的根据地红军运动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能站住脚跟解决庞大军队的粮秣辎重以及扩大红军。前面已经提到过,毛泽东采取的是团结教育改造土匪的政策,使他们“劫富济贫”的行为纳入革命轨道,这是绝顶聪明而又绝对必要的且行之有效的办法,是连托洛茨基都赞同的,但陈独秀没有看到“土匪”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军事将领的教育改造下已质化为红军,这是他的错误。但是在这篇既有调查研究又有理论的万言文中对于农民武装、农村苏维埃运动和农民的革命投入等问题却有正确的部分,我们也不必多引,看看下面这段话如何?“在资本主义关系统治的社会,只有两个阶级(有产与无产)的力量决定一切。……没有城市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潮来领导,农民暴动是没有出路的”,因此,陈独秀指出:

我们的结论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是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绝对不能做我们的卫军与支柱;缺乏土地的贫农,在中外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几重榨取压迫之下,势必起而斗争,我们当然应该和他们有很好的联络,并领导他们的斗争,但仅仅是这个还不是革命的出路;主要的是要加紧城市工人的组织与斗争,必须城市工人革命高潮蜂起(即普通的政治罢工),才能够得到城市及农村苏维埃及赤卫军的组织,才有转变现有的所谓“红军”的武装为民众之直接的武装势力一部分可能。

陈独秀的这个结论,在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除了有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外,是正确的。我们以此了却《关于所谓“红军”问题》这桩公案,顿感轻松不已。

前面我们曾提到陈独秀被中共开除党籍后生活处在四面楚歌的危地,其写作亦处在四面出击八面来风的险境。首先,他矢志不变继续猛烈抨击国民党,这就促使当局不只用中共的和托派的叛徒还动用了各路宪兵特务军警和租界捕房力量加紧对陈独秀的侦破和捉拿,再是批判四中全会后的中共第三次左倾路线,使他更其成为王明

博古中央的眼中钉,在这时期所发的文件上批判陈独秀成了例行公事,三是研究中国托派的理论建设和社会革命对策,并以此批判国际的中国政策,为此国际令中共加强对陈独秀的批判,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作出的关于中共任务的决议中,甚至把因反对四中全会而被开除出党的罗章龙也说成是“反革命的陈独秀集团的代理人”,指示“中共必须在报刊上,在各级组织,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开展一场有力的斗争,以反对国民党和反革命的这些走狗”^①——指的自然是陈独秀派。最后是随着沈阳“九一八”和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再次掀起类似五四时期强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贡献毛锥之功,只有这一条直到把他诬陷为汉奸才被封住嘴。上述四个方面中论贡献第四项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时评和政论起到过很重要的社会作用,显示了陈独秀民族独立的反帝爱国精神,但无论是陈独秀本人或本传读者,关心热点显然是第二、三两项,也就是成为托派之后的陈独秀是如何以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理论去批判中共及他的指导者共产国际的,当然这应是托派总书记的重任。不论是对是错总得有个结果,因为他快被捕入狱了。

中国共产党真正地受到打击始于李立三左倾路线,但受到严重打击的是在瞿秋白临时“接管”了几个月之后的四中全会产生的新中央所执行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条路线一直的称呼是“王明路线”,实际上王明于当年十月即去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央的权在秦邦宪(即博古,总书记)张闻天和又一个工人配角卢福坦三人组成的中常委。既然历史上一直如此称呼,我们也就约定俗成罢。陈独秀对本届中共的批判的火力是相当猛烈的。

人们记忆犹新立三路线的总纲叫做《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曾受到陈独秀批判。王明路线的总纲也叫做《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如同一个模子铸成。一月七日四中全会结束半个月,陈独秀立即发表《国际路线与中国党》,指出:“国际现在的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和它自己以前的路线也根本没有两样”,“所以党决不会在仅只反对所谓‘李立三路线’和反对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运动之下,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陈独秀把此现象讥讽为“王麻子汪麻子旺麻子闹不清楚的国际路线”^②。无论人们是否同意上述分析,后续历史果然证明王明与李立三犯的是同一类型的错误,区别在于本届中央的左远超上届中央,一直左到革命遭受惨重损失,党中央撤离连续工作了十三年的党的发祥地,又毁于后两次反围剿而失去了南中国的全部苏维埃区被迫长征大转移。到江西后的党中央由博古、周恩来和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奥托·布劳恩(李德,一九

^① 《共产国际文件(1929—1943)》第210页。

^②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190页。

〇〇—一九七四)主政。

一九三一年五月托派统一大会之后就中国托洛茨基运动,陈独秀曾撰文多篇,其中纠缠在托派四个组织(主要是与《我们的话》,和与刘仁静一个人的《明天》社)中的相互扯皮外,真正谈得上是理论建设的主要是写于统一前夕的《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中国将来的革命发展前途》和《中国将往何处去?》以及如《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论国民会议口号》诸文,这些论文的中心议题(从理论角度)仍然离不开不断革命论的“两个波间”理论的“国民会议”口号,反对民权主义的工农民主政府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农民运动只能在城市革命工人运动高涨时始能奏效等等重大托派原则。不少研究者认为陈独秀自始至终没有笃信过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论,这也是他遭到《我们的话》等托派组织或成员的非议和批判的原因。我们当然不否认这种研究的合理成分,但总是感到不足,原因嘛,说起来也简单,不是他不笃信托洛茨基理论,而是在应用这个理论时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一种把握性不大的怀疑,笔者推测造成完全与他性格相悖的那种怀疑,是:一,国际性的强大的反托压力造成的心理压力,这厢,我们采取“因小见大”的办法,试研究陈独秀的心理压力,如他这时用了两个笔名,一个叫“三户”,一个叫“顽石”,后者照字面解释即可,前者显然取小楚三户亡大秦的典故所蕴藏内涵的信念和意志,这当然是向国民党作斗争而言,但形势相当严峻,托洛茨基派确实陷于“三户”的孤独处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面前“三户”究竟有几分把握“亡秦”呢?四面楚歌中的陈独秀的这一心理状态不会是笔者胡乱臆测罢?第二,进入托派门槛期的陈独秀,实际上仍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左倾思想,他一再批判中共极左,认为业已完成统一的南京政府不会很快垮台,又认为革命高潮不会很快来临,然而这些被中共和国际一批再批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在他的潜念中有时又往往发生疑问,使自己也落入左的思考之中,于是就表现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左右无定的思维走向,比如下面一段话就充分表示出某种理论恍惚:

国民党政府在工人群众中的信仰,早已在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屠杀中打破了;在农民中的信仰,早已在长沙马日事变……中打破了;剩下的学生群众,亦在最近南京的“一二一七”血案中,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仰更是扫除得干干净净。……并妨碍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①

也即是说“九一八”之后的南京政府已经丧失了工农学商,因此而下了个“同时就是更加掘溃了它自己的政权统一之基础”,这就是个“左”的结论。在中国“工农商学”

^①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270页。

加在一起抵不了“兵”这一行的分量，然而“连年‘剿赤’战争”并未伤着南京政府的武力基础。至于谈到报纸刊物“无不一致公开的攻击国民党之只顾向内争夺权位而不向外抵抗日本，国民党奉为‘国母’的宋庆龄，更是公开的发表宣言，直认国民党宁粤两方，皆依赖军阀，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之罪人”云云，以至又导出的结论是“国民党的统治确是难以支持下去了”，这种“左”的看法适与他的“低潮论”相克，于是必然的革命结论是：“我们很有理由可以说，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已是一新时期，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已开始发展的时期”，更是左得出奇了，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就是在此时重蹈“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立三路线覆辙。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借毛泽东的“速胜论”一言以蔽之，是错误的。一九三〇年的南京政府的国力没有因工农学商的怨气、舆论离间、在野政治派别的反对，以及湘赣苏区的打击而丧失。中共据此而定的“毕其功于一役”注定失败，托派的“国民会议论”（集上述反对力量而另立政治权）更动摇不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应当承认，这时期，中国最清醒的政治家是一再被贬损的井冈山的领袖毛泽东。因为他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多的兵和多的人民大众），革命胜利左券稳操，至此，我们就可以对前面提的毛泽东对一大宣言的批语“……没有想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基本上是农民运动”划上句号，真乃一言中的。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输得精光，托陈反对派也没赢着什么。

这一年——一九三一年底，满身是病苦守在南京的高君曼终于死在饥寒交迫的病榻上，她身边的孩子被娘家领去扬州生活。至此，陈独秀面上只剩下大姐和继母谢氏，这两位老人后来跟随着陈独秀，在陈家唯一壮丁松年的维持下到了江津，又在潘兰珍的主政下太太平平地生活到一九三九年撒手人间。

一九三二年在日军侵占上海的隆隆炮声中开始了艰难的步伐，不久，关外分裂出了五千年国故文明史上奇耻大辱的“满洲帝国”，同一年江西瑞金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南京政府暂居其中，但是统治是巩固的，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紧围剿江西而放伪满一马，直到抗战胜利，不能不认为是抗战的最可耻的败笔。光明与黑暗相冲突，谁主沉浮？本传主人在这一年终于在倾轧出了政治舞台之后被倾轧出了社会集群。

这一年，由于抚平了统一大会后“残酷的破坏”（托洛茨基语）的创伤，托派组织有所发展但连昙花一现都说不上，灭顶之灾正候着他们……

这一年托洛茨基对陈独秀、对中国托派及个别成员写了不少信件，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万言书《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①，信中托洛茨基以精当的理论语言论述了农民运动、农民武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可预期的

^①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双山译）第44～52页。

革命作用和破坏作用,信中除了他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中农大大超于工的阶级成分构成破坏力量以外,有些意见是值得听一听的,此信是在理论层面上再次纠正陈独秀派对坚持在深山老林中搞农村工作同志的错误认识。此信很难摘引,我们从结论部分摘引几段,看看能不能认可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与农民运动的观点:

我们必须大胆地公开地照着事实底原来样子来看它。农民运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因素,因为它是反对大地主、军阀、农奴制和高利贷者的。但是在农民运动底本身,是有着很强的私有性和反动倾向的,并且在某一阶段,它会仇视工人的,因为早已有了武装,会更增加这种仇视,谁忘记了农民的两重性,谁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红军”底活动必须给予严重的注意,我们必须向工人们有系统地说明农民战争之方向、意义与前途;而无产阶级底目前要求与任务,必须与解放农民底口号联系起来。

根据我们自己的观察,各种报告以及别的文件,我们必须极仔细地研究农民军队的生活过程,和他们在占据区所建立的制度。我们必须从活的事实中发现矛盾的阶级倾向,并清楚地向工人指出,哪种倾向我们是拥护的,哪种倾向我们是反对的。

我们必须特别留心红军与当地工人的相互关系,他们之间甚至有一点点小小的误解,我们都不能忽视。……

以上只是托洛茨基对于共产主义政党如何领导、利用、教育和培植农民武装及其与工人阶级关系的结论的一小部分。笔者以为甚至连有偏见的共产党人似乎也难以在这些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结论中找出“反共”、“反革命”、“破坏工农联盟”、“破坏中国革命”的蛛丝马迹,托洛茨基还严正地指出:“先进的工人愈是明白地理解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之活的辩证法,他们将愈加抱有信心地去找最接近自己的一部分农民与之联合,他们也将更成功地在农民军队中间和在城市中,抵制反革命的煽动者。”陈独秀对此信有否具体反应,恕笔者寡闻,但是据被捕后他对章士钊大律师的辩护词中涉及江西红军一段大为不满并要求删除,看来陈是看过此信而对农民武装的观点有所改变的,这一点下面将具体提及。

托洛茨基关于农民战争的信写于陈独秀被捕前二十天。后续的一封信《要行动的战略不要揣测——致北京同志们的信》^①传到中国,陈独秀已被捕入狱!

托派各地组织中北京(北方)是实力较强的一支,先后有汪泽楷、任曙、杜畏之、刘

^①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54~62页。

家良等坚持活动,因此托洛茨基特意去信北京。这封信的中心议题是“国民会议”,一般说被公认为是托洛茨基理论中的严重错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托派如何运用这个理论从事共运不是本书的研究任务,似乎也没有以此论而成功的例子可以援引,在国民党一党专政容不得民主和国民政治存在的中国肯定是不行的。信中有如下一说:“学生们呼喊‘打倒国民党政府!’先进的工人拥护这一呼声。‘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实行宪政。农民暴动,要求土地,反对军事的桎梏、官僚的压迫和高利贷,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够提出旁的中心口号来,除了国民会议。”为此,托洛茨基要求在“无论是关于什么具体问题之口头的与文字的煽动,罢工、露天大会、示威、抵制,都必须加上‘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的口号”。尽管社会革命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超乎寻常的复杂,但“国民会议”是绝对不成的,利用它作为一种揭露或使国民党在人民民主的强大压力下作出若干或某些政治上的让步,是会起到有限作用的。托洛茨基信中举例说中共向国民党提出“恢复中苏邦交”,使国民党在民众面前暴露反苏反共政治面目,致使国民党中人也有表示出“不得不恢复中苏邦交的理由”,这是“民众压迫的力量”,但是他没有想到再“压迫”也压迫不出国民党同意召开国民会议或实行民主政治协商,这个“度”是国民党坚守不渝的,国民会议口号不得超越这“度”。“度”的超越靠的是军事实力,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一九三六年,中共在延安站稳脚跟,有了十数万精兵,有了从减租减息到局部性土地改革的几块根据地,又有苏联的军援,这才谈得上迫使国民党考虑政治协商、国民参政,这就是双十二事件的政治潜力,是否与“国民会议”口号的强大的民主政治压力有关,就让给抗日战争史专家去研究。笔者在这里可以下一个算是“机会主义”式的结论:国民会议口号所富含的民主政治的强大攻势,不得不使南京政府的专制独裁政体有所节制,这就是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的政治效应,继而促进两位将军杨虎城和张学良顺应民意,在枪杆的后盾下行“双十二”兵谏,造成国共合作“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有了民主议政的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曾邀请陈独秀参加,陈予以严词拒绝,关于国民会议的议论为免闪失,还是听听托派郑超麟的一席话罢——

我们和其他同志讨论政治问题时,往往谈到最后遇着一个论据,即说:无论中央和国际如何错误,但“红军”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发展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既然只能依靠“红军”夺得政权,要国民会议甚么用呢?毛泽东主义于是支配全党了。^①

^① 《郑超麟回忆录》第300页。

正当陈独秀认真研究托洛茨基寄来的信,写毕《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之日,一群军警冲入托派总委员会会址谢少珊(德盘)的家,抓走了正在开会的彭述之(化名张次南)、宋逢春(王武)、罗世藩(王兆祥)、濮一凡和谢少珊。一进捕房,谢少珊申言“甘愿自首”,供出陈独秀在上海的最后居所,“即于当日下午七时带同该犯至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楼上,将共党首领陈独秀拘获”^①。

一次兜捕托派如此之多,使人记起去年一月四中全会之后不几天,一次兜捕反对四中全会的包括左联五烈士以及何孟雄等老干部三十二人(后枪决二十三人)的“东方旅馆事件”。据当时报道和警方档案,抓住陈独秀、彭述之等“共党要犯”的行动合共六次,第一次即在东有恒路春阳里二一〇号(今东长治路二一一弄)谢少珊家捕去五人,第二次捉牢陈独秀,第三次在巨泼莱斯路(今已废)四十八号抓住王晓春,第二天上午在大通路斯文里一〇四四号追捕梁有光等时动用了武力,有一名拒捕成功跳窗逃走,第五次在唐山路业广里三三五号捕走王子平(曾猛)和何阿芳,最后一次在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建业里二十二号捕走捉去时年仅二十一岁的郭竞豪(彭述之弟道之)。^②可能是抓梁有光时逃走的那位迅即到另外四个托派藏身之处通报致使警方扑空未能真正做到一网打尽。虽然扑空四处,但对中国托派实乃灭顶之灾,中西探警配合之默契,行动之迅捷堪称一流,抓住濮一凡之后又探明了他的家址在法租界嘉兴路,立即征得法租界捕房许可后押了濮一凡到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商福里二二二二号住家搜查出三十多种“共党文件”。濮一凡即濮德志是陈独秀的子侄辈亲戚,当时在招商局任秘书长编译员,当然要格外防范了。此次共抄走文件和书籍十余箱,后来据江宁地方法院有关人员说至少要审读二三个月才能从中找出“定罪量刑”之证据,够悬的。下面具引陈独秀此行最后一次被捕的情景。当谢少珊带领中西警探前往“搜查时,陈独秀正在室内,该探等立予逮捕,并在其室内抄出中、日、俄三国文字之共党文件甚夥,连陈一并带入捕房。陈为皖人,鞠年五十四岁,迺以多病,貌甚清癯,唇蓄微髭,发已微斑,衣淡蓝色哗叽长衫,戴淡黄色呢帽。被拘入捕房后,捕头诘悉其在病,当派探员送往工部局医院,旋经医生诊察得厥疾并不甚剧,认为尚可受鞠”。陈独秀在上海先后三次被捕,在上海公安刑事档案中竟然保存着陈独秀“犯罪记录卡”,兹特意留在这最后一次被捕时写入:卡的正面陈独秀照片下的编号为B九五二三,及简历,背面是数枚指纹,卡上顺序记录着上两次被捕的简单经过,并再写入本次而

^① 吴铁城密电文,转引自《关于捕捉陈独秀的捕房及地点的订正》(葛庆丰、王福涛),《上海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以下有关此次捕捉托派情况除另注外皆引此文。

^② 当时各报报道和注^①的警方捕捉文有出入,警方报告抓了7人及有关情况,各报记载合共11人,被捕的名单中无郭竞豪(本名彭道之),经笔者检查,与梁有光同时被捕之王晓春即郭竞豪。

打上句号。此卡记载着陈独秀的身高：一点六三米^①，这是第一次被捕验明“正身”时的丈量，十一年（一九二一—一九三二）后由于老而衰微萎缩而病而无定规物质生活的折磨和地下秘密行动的心理压力，读者就可据以想像：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摸黑被推入牢笼时的陈独秀是个什么样的人形。能不令人心酸！陈独秀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伟丈夫，北京大学为庆祝二十五周年校庆曾作的一次“你心目中国内或国外大人物是那几位”的民意测验，在国内大人物栏下推出第一大人物是孙中山；那第二位——就是如今蹲在看守所笼子里的陈独秀！^②

十月二十七日，除叛徒谢少珊外，统统被送往江苏省高等法院二院预审，因陈独秀是第六个被捕的，因此身上缀第六号条码。这次送法院庭讯主要是租界捕房律师与公安局代表、法院方面裁决是否引渡的问题，事关重大。陈独秀等立即坚决抗议引渡，捕房律师厉志山则证明陈独秀有犯科两次记录在案且“系政府通缉有案之要犯”（别的亦查明有的有“前科”，有的则所犯案已越出租界管辖范围等等），要求引渡给能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及同此第六条起诉科其刑的中国司法部门，这就极有可能按紧急治安法设特别法庭处置，南陈的命运将与北李相同矣。抵制引渡是第一场群起攻之的斗争。“陈独秀仅发寥寥数语，然可谓言简意赅”击中要害，但仍然裁决“移提”即引渡给上海市公安局。此次引渡案，公共租界捕房律师是厉志山，法院提讯人是一庭推事赵钺镗，裁决引渡的是时任一庭庭长郁华。

第二天“陈独秀及其党羽十一名，由上海市公安局大批警探押登汽车，径驰北火车站，乘十一时夜车解京，交首都卫戍司令部审办”。这就等于要设特别法庭严惩。陈独秀一从上海起解，新闻就追踪报道到南京，第一个令人惊叹和感佩的消息是，“在京沪车上酣睡一大觉，车到下关才把他叫醒”。传言者赞叹道：“本来坐火车打瞌睡的事极寻常了，不值得一提，但是他这段旅程却不寻常，等于押赴刑场啊！”接着还喻之为曾经被政敌诬告作诗诽谤皇帝而下狱，竟然能在牢房中呼呼大睡的宋朝大诗人苏东坡。认为没有“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的坦荡胸襟是万万做不到的^③，这倒使笔者想起约一九三六年大画师刘海粟到南京监狱中拜访陈独秀并索题词，陈独秀即席：

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④

① 任鸟《陈独秀的〈犯罪记录卡〉》，《世纪》1994年第1期。

② 《北大日刊》1924年3月5日，这个名单上第三位是蔡元培，胡适行五，李大钊行九，殿后者是章太炎。

③ 尉素秋女士《我对陈独秀先生的印象》，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

④ 谷苇《刘海粟与陈独秀》，《团结报》1983年11月5日。

浩然正气的东方知识巨擘！

陈独秀被捕时，蒋介石在武汉，因此曾有陈将押往武汉的传闻，同时则出现了陈独秀“乞见”蒋介石的造谣中伤。不久，报端发布“现闻蒋委员长已有表示，对陈容可移司法机关办理，惟对各方缓颊文电，不作答复”。这“各方缓颊文电”指的是蔡元培、柏文蔚、柳亚子、杨杏佛等等党国元老，胡适、傅斯年、林语堂、潘光旦等等知名学者函电营救，傅斯年撰长文列数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甚至称他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①，明显倾向于“陈为一学者”的新闻传媒，以及章士钊等沪宁著名大律师均勇担义务辩护之责等等的压力，因此不到一星期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即据蒋电向新闻界宣布陈案“始终未得军事上之线索”，决定按“牛兰案”^②处理，即按正常司法程序办事，军政部首领何应钦还为此事协同司法部长罗文干与陈独秀谈了一盘。何应钦忽然风雅起来向当年的朋友今日的阶下囚索字，陈即挥毫写下“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民国廿一年十月廿五日陈独秀”，等于是封杀了降服之门。此字立即被“乌鸦主义”者、著名报人曹聚仁获得制成铜版刊于他主政的《涛声》上，使得关心陈独秀的人宽了心，却引起轩然大波，也即是说，有极不光彩的角色插手此事，在一片“伏望矜怜耆旧，爱惜人才，特宽两观之诛，开其自新之路，学术幸甚，文化幸甚”等等要求当局释放陈独秀声中，某人竟然借机大肆污蔑陷害陈独秀，说什么“在此我给你们（指曹聚仁等——引者）一个喜讯，安慰安慰你们的‘悲痛’！免得‘忧心如焚’，这也是一个公德。——就是陈独秀不但不被杀被监禁反而可以成为汽车洋房中的巍巍乎‘大人’！……我敢担保我这句话是绝对真实的”^③。未知这位署名“吉星”的先生是否健在？当他重读六十年前大作《陈独秀倒底怎样？》而历史又证明陈独秀既没有“升官”更谈不上“飞黄腾达”，后来又死得如此凄惨，是不是还敢言“担保我这句话是绝对真实”！鲁迅曾被某公诬陷抄剽，十年洗清，他愤恨地给诬陷者以“谎狗”的称号，未知套在吉星头上，可正好？这也算是告慰九泉之下的冤魂罢。

这种造谣诬陷如若只是个人恶言中伤，尚可斥之为“私怨”（?!），令人遗憾的是江西瑞金出版的《红色中华》上竟然也出现了吉星般造谣诬陷罗织人罪的“报道”，该报于十一月一日发表题作《不幸而言中，陈独秀要当蒋介石反共参谋了！不信，你们等着！》，不几天又是一篇《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法庭讨饶》，说什么“托陈取消派跪在国

① 傅斯年《论陈独秀案》，《社会评论》第24号，1932年11月23日出版。

② 牛兰案，牛兰(Naulen)原籍波兰，泛太平洋产业同盟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他和他夫人皆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1931年6月17日被捕并被判无期徒刑。于日本侵占南京前夕释放政治犯时出狱。

③ 《涛声》1932年11月19日第31期。

民党法庭面前如此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而且很快便可在国民党的‘皇恩浩荡’下得到大赦,以至起用,大做其官咧!”^①出自中共中央所在地又是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上如此这般污蔑陷害,就不能像对付个人那般说几句激愤之言在感情上找找心理平衡即可了事;更有甚者,直到现在竟还有研究者坚信六十年前《红色中华》上对陈独秀诬陷为真,在一部选评三十至九十年代社会新闻资料集中选入《陈独秀向法庭讨饶》等二文^②,可见遗毒之深。为此,我们被迫卷入与学术研究毫无关系的分析中,首先引用权威的《人民日报》对陈独秀被捕后的表现的作落实政策性质的断语:“陈独秀在关押期间,始终没有屈服拱手投降国民党。”^③短短二十个字为陈独秀一生最后这次被捕作出公正的判决。至于莫斯科《真理报》就陈独秀被捕亦曾以大字标题写着:《托洛茨基者得到国民党的保护》^④,可以认为是吉星或《红色中华》对陈独秀的诬陷的苏共和共产国际的信息反馈,就不必在此噜苏而把它列入造谣污蔑即可矣。于是我们的话题就可转向陈独秀彭述之等全部十个托派面对法庭的英勇抗诉抗辩的事了。本传是从陈独秀(代表全案人员)的抗辩书写起的,因此读者已经对所谓“公堂对簿”有了记忆,对笔者有关此场官司的观点也已了然,叙述起来就方便多了。排除特别法庭或军法从事后陈独秀等被移交至江宁地方法院十凇巷看守所羁押,由江苏高等法院审理。十一月三日江苏高院派出检察官朱儒开庭侦查,陈独秀等则接受“平章法律事务所”章士钊、彭望邨、吴之屏以及蒋豪士等为辩护律师,其中章士钊单一为陈独秀辩护。这次是法院与案犯履行各项司法手续,事后由主任书记官孙增厚调集到庭部分证据已达八箱之多,因此决定“检察官的侦察期限为二至四月完成”。当时江苏高院在苏州,故案情侦调工作在苏州办理。从这一天起算是称之为“陈彭案”进入司法程序,到次年四月二十六日宣判长达四个多月时间,陈独秀等“因所犯案件,性质与牛兰案相同”,而当时牛兰已判刑入狱,陈独秀与彭述之两人就住进曾羁押过牛兰夫妇的四个“优待室”中的第二号室,此室比较宽敞洁净,置二床一桌二凳,羁押期间陈独秀的胃病和彭述之的目疾皆得狱医治疗。^⑤

四月十四日,是“陈彭案”第一次公开审理,南京全城轰动,京津沪各地记者云集听审,南京警厅应法院警卫要求派出武装保安队一排兵力负责刑庭内外安全。那天

① 《红色中华》在37、38、40、41期上合共刊登诬陷陈文五篇。

② 丁世义编《30—90年代中国社会新闻选评》,工人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

③ 李宏《一代伟人失落》,《人民日报》1990年10月28日。

④ 华龄《论牛兰陈独秀并质吉星先生》,《涛声》第2卷第3期,1933年1月14日出版。

⑤ 本节所述全部庭审过程均见《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中的第五次被捕部分,《陈案书状汇录》(原版)和《陈独秀的就逮、起诉与判刑》(王健民编,载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6期)等资料,不另注。各种资料互有出入时由笔者自做选择。

正瓢泼大雨倾盆而泻,也没抵住人们对此案的关注,上午十时半开庭,庭长为胡善虬,检察官为朱儒,辩护律师出庭后陈独秀等十人押抵被告席,“独秀衣蓝布长衫,布棉袍,审问时,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隽语风生,引起全堂哄笑”。如若允许我们说一句俗气话,是可称之为“英雄本色”的罢。回溯陈独秀押到南京后曾给胡适一信,信中坦然地说:“以弟老病之躯,即久徒等于大辟”,“所以我以为也许还大辟爽快一点”^①,抱着决死的无畏,进行司法唇枪舌战,焉能不态度安闲泰然处之也。至于以风生之隽言成哄笑之效果,引一段即可了然。当法官七问八问至于关键一题“问:被捕中十个人,你都认识吗?”“答: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问:你认识那几个?”陈独秀嘲讽有加地答道——

党内情形,我不能报告,我只能说政治意见。谁是共产党,这是政府侦探的责任,我不能做政府侦探。

答得全场哄笑,答得法官一时语塞,确也无有再需问什么了。对陈独秀的第一次开庭是在陈自下结论中结束的,结论是:“说我反对国民政府,我是承认的,但是说我危害民国,则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不只寸步不让,且咄咄逼人,他对答道:

问:资本家要不要打倒呢?

答:那是当然的。

问:你主张要夺取政权吗?

答:当然的,政党不想夺取政权,还叫什么政党。

问:劳资妥协对不对?

答:劳资决无妥协的可能。

问:你主张组织无产阶级政府。

答:是的。

这种斩钉截铁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宣言,同李大钊、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彭湃、杨殷等等革命先烈在敌人面前的不屈形象毫无二致,不愧为先烈们为之牺牲的党的缔造者!

也许有人(如吉星、如《红色中华》)会反驳,陈独秀是托派,犯了分裂党的错误,因此国民党饶了这“托派头子”一命,事实真相又如何呢?请看——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143页。

而谈，立论准确，语言铿锵，文采耀闪使旁听者唏嘘不已。这场陈独秀与法官之间的答问，尤其是章士钊的辩词逼人气势，显然起到了使官方极为恼火的法律反效应和不利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权势，于是中央日报受命撰写《答陈独秀及章士钊》文，企图挽回影响，章士钊针锋相对发表《国民党与国家》^①，借机再次批驳法庭、批评政府专制，然后痛斥“中央记者据国民党不敢据之名，而却为本党尽攫其所欲攫之实”，民主正气浩然，正义一言九鼎，驳得“党报”无地自容。

但是陈独秀对辩护词中关于他与江西中共和红军的对立和分歧在认识上与章士钊产生分歧，后来要求删除，乃至激愤至欲拒绝老友义务出辩，“记得有一天，我到南京狱里去看仲翁，他一见面便气忿忿地，光着眼，对我说道：唉，行严真糟！你回去，你马上去告诉他，我再也不要他替我答辩了！”^②陈独秀要删去的全文如下：

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行，而以己为干部派（指中共——引者）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敌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集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林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茨基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

章士钊心中明白他的这种形式逻辑推理中所表达的明显反共思想陈独秀是肯定反对的，因此他有话在先“此义独秀心不自承”，但法院方若不考虑“此义”则“不得谓之公平”。设身处地为章士钊想一想，如此这般的为陈“开脱”，也真是难为他了，难道以整整三十年（一九〇三—一九三三）的友谊还不了解被他称之为“最难交的朋友”的石硬的反叛性格吗，其所以如此曲辩，实乃救命要紧，政治在其次。^③

公开审理三次，全部十个“案犯”均极尽其顽强的意志和各自采用本能的自卫方式加上辩护律师的辩护，可以说是相当团结、英勇顽强，表现出为了主义而不惜献身的意志力，起到了暴露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的政治效应。

二十六日判决，下午一时半开庭，审判长胡善儁，推事林哲民、张秉慈，书记官沈青仁一应升庭入座，陈独秀、彭述之等十名“案犯”到庭。宣判结果如下：

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罪，各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夺公

^① 事后，因《中央日报》撰文批驳章士钊的辩护词，章士钊遂将辩护词加以文字订正并严词驳斥，标题《国民党与国家》，发表于《申报》1933年5月4日第12版。

^② 《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59页。

^③ 后来在《国民党与国家》文中，终于删掉了这一段。

权十五年。

王子平、何阿芳，帮助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五年，褫夺公权七年。

王武、濮一凡、王兆群，以危害国民为目的，组织团体，各处有期徒刑五年，褫夺公权七年。

郭竞豪，以危害国民为目的组织团体，处有期徒刑两年六月，褫夺公权三年。

裁判前羁押日数，均准以二日抵徒刑一日。

十个中判了八个，王鉴堂和梁有光无罪开释。据报载，听毕判决书，“陈彭等均当庭表示裁判不公，大为咆哮，声明上诉”。记者即随案犯赶到看守所跟踪采访，“陈彭见记者至，二人皆起立微笑相迎，如接待友朋之来到，使人不相信彼等为狱中人也”。写出来，请读者裁决，这种场合，这种形象，这种态度，与“讨饶”能对上号吗？

八个判刑者中王子平、何阿芳放弃上诉权，余皆上诉，陈独秀递上被批驳为“于理于法两俱无当”的抗议判刑的上诉状，以激愤的语言猛烈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践踏民主和法律。陈彭等六人向最高法院上诉终于取得一定的成功，七月二日法庭重新判刑；所有被告的褫夺公民权一项取消，这是政治上的胜利，陈独秀和彭述之改判八年，削刑五年，实在说来更是大胜，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轰动全国的陈独秀托派被捕被有罪判决案到此结束。为扩大影响，陈独秀要汪原放集全案文字编印《陈案书状汇录》出版，如今，不论你承认还是反对，此书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斗争史上唯一的法庭斗争文献。

《陈案书状汇录》内收《检查官起诉书》、《陈独秀自撰辩诉状》、《章士钊律师辩护词》、《南京中央日报论文》、《章士钊答中央日报》和《江苏高院判决书》等六篇。这是一部公理与谬论、民主与专制、进步与反动较量的文献，比得上马克思的科伦审判案及其光辉的记录《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潜心学问，监狱成研究室

六月三十日，最高法院驳回陈彭上诉，仍按有罪判决后即从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押往老虎桥第一监狱服刑。陈独秀独处一室（不是惩罚单身监禁，后与彭述之同囚一室），因他有相当严重的胃病有时几至无法自理生活，候审期间就要前去探望他的汪原放通过章士钊的关系请曾为陈治过病的上海名医黄钟赴宁为之诊治，故判刑后，狱方同意濮德志和罗世藩交替护理，每周一次或随病情破例，后来则几可每日陪伴。别

的案犯则入普通监狱，令人神伤的是化名郭竞豪被捕的彭述之的弟弟道之，因年轻体弱心理上又经受不起政治打击，虽量刑最轻却受不了折磨而瘐死狱中，徒刑中而死的当然不止彭道之，唯他最年轻，刚二十一二。化名王子平的曾猛，化名何阿芳的何子贞，还有宋逢春三个都先后活动出狱，余皆关到抗战战火烧到南京前夕一并放出。两次被捕的二十余名托派分别关在中央军人监狱和老虎桥监狱。陈还在看守所候审，关在军人监狱里的郑超麟等就知道了，判刑后即通过郑的夫人刘静贞接上关系，又通过她与狱外（主要是上海）和托派联系上，陈独秀开始在狱中遥控先后由陈其昌、尹宽、王凡西等劫后余生者组成的临时工作组展开活动，并与刘仁静一派展开争论。

大约在一九三三年秋末，托洛茨基委派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e, 化名李福仁)来中国以图重组因陈独秀等被捕后的中国托派，他公开职业是上海《大美晚报》(英文版)编辑，他和他夫人格拉斯·布尔顿(Glasse Burton)都是托派^①，李福仁与前面曾提到过的其时已成为托派的伊罗生一起联络残留在上海的托派，开始时即找陈其昌、尹宽等，又找刘仁静、斯朝生等组成一个中央，最后李福仁在观点上倾向刘仁静，助其成立中央委员会，骨干有斯朝生、刘家良、扈文章、王树本等。得李福仁的支持而当上了总书记的刘仁静，大发权威，从过去的理论分歧、统一大会拒绝他的《明天》社的报复心，不仅开除了陈其昌和尹宽等对立面，竟然还开除陈独秀！走得实在太远了。此事，在狱中的陈独秀必定很感慨，过去他抱怨第三国际代表瞎指挥，如今第四国际代表仍然瞎指挥，而且全都冲着他！但也无可奈何。他当时的政治思想基本上表露在他写的《几个争论的问题》中，此文就民主运动、“民众政权”口号、国民会议、政治复兴以及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及苏联自身存在的弊端等方面阐述了与过去无甚区别观点。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强调中国当前首要的社会问题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第四节)，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理论问题，弄不好又得套上右倾机会主义或者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现代帽子。其实陈独秀是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强大起来的角度提此问题的，只引证如下论断足矣：“资本主义发达自然是社会的进步，俄国无产阶级与其说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不如说吃了资本主义太不发达的苦(这句话用在中国更适当)”^②。关于这个既是迫切的又是根本性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理论，出狱后在日本全面快速进攻使中国丧失大半后处在战略相持阶段时，又写专论此题的《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听听题目就能使在极左思潮下成长起来的中共党员或是知识分子拒之门外，但却是他晚年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和

^① 据王文元先生致笔者信，格拉斯原系南非共产党员，1931年偕夫人来华，在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期间才成为坚定的托派，遂离开塔斯社，先后在《大美晚报》、《士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工作，重振中国托派。

^②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333~341页，引文不另注。

革命理论至臻成熟的标帜，且引一段看看：

现在的中国，也有许多青年人模模糊糊的反对资本主义，爱好社会主义，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我们必须向他们指出……在科学的社会主义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无产者，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①

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此文令人记起建党前后陈独秀研究并开导工人的那些浅显的有关剩余价值理论的文章，语言通俗，理论真邃，语言石破天惊，这里只就此文作一“广告”，还将在研究他晚年思想时联系时局深谈此文。这里还可先说的是陈独秀当时处境极端困难又危及性命之时，他作此文不只是与他的对立面作理论斗争，还有不怕在汉奸帽子上再戴一顶“鼓吹资本主义”的帽子，因此他有话在先，云：“老成谋国者，要‘负责任，说老实话’，不好有丝毫虚矫之气！”此话不诬，却明显是夹着“政治牢骚”的。在《几个争论的问题》的《民主运动问题》一节中坚持了不断革命论指导中国革命的既定立场，但其中有一个观点，笔者以为是较之过去更为明确更为有益于三十年代中期（抗战前夕）的社会革命运动的：“我们对于关联中国无产阶级运命的民主运动民主口号，必须有深切的认识，必须认识它已经由资产阶级打击封建势力的武器变成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武器；必须认识它不仅是在反动时期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武器，并且是在革命高潮中推翻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武器；必须认识它……是中国革命的骨干，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

这块“基石”是五四运动不久陈独秀关于民主口号可变的唯物史观的发展，也是他晚年坚持到底的信条，却一直被认作陈独秀只能算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资证。笔者是认可这块“基石”的。尽管他晚年在运用民主这块基石时稍稍有点偏离，走向了极端，但是在中国被民主这块基石困扰或撞死的怨鬼，要比压死在封建主义包袱下多得多得多！

李福仁排斥陈独秀等托派而偏听偏信刘仁静的组织举措曾受到托洛茨基多次来信批评，建议他要团结并尊重这位“具有国际声望的人物”，说他虽“现在狱中，但他仍然忠于革命，而且忠于我们这个特殊的派别”，并议定成立第四国际时，“陈独秀无疑

^①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517页。

应选人总理事会”^①。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很信任刘仁静,也打算把他选人。这就使李福仁夹在陈刘之间无所措手足,这个矛盾又是以国民党将刘仁静等五个中央委员一网打尽而解,连李福仁和伊罗生两个外国人亦在班房里蹲了好一阵子。放出后,伊罗生回美国,李福仁坚守在中国活动^②,刘仁静当了叛徒入苏州反省院,另四个则汇入托派“大本营”南京军人监狱,现在,只剩下陈其昌、尹宽和一九三四年释放的王文元、楼国华(一丁)等几个了,李福仁显然与他们无法合作,他本人甚至被陈独秀恨极而曾怀疑他是“租界巡捕房的暗探”,传出要大家不要去理他的意见,于是李福仁就被孤立起来办不成事。^③一九三三年后的中国托派不能说全军覆没亦孤掌难鸣,残局由始终未被捕的陈其昌收拾,王文元说一九三五年后的托派是“其昌的独木支大厦时期”,不久尹宽又被捕,陈其昌暂避他乡,罗汉隐去宜兴在陶瓷学校任教,留在上海的重要托派中最后被抓的是王文元,此时距卢沟桥的炮声仅两个月。别看他最后被捕只关了三个多月就碰上抗战而集体释放,却是惟一遭受皮肉之苦的托派,抓住后要他自首并当特务,先是“文攻”不成“‘肉戏’上演了,数名大汉将我入一个特殊房间,一人用长毛巾蒙住我的嘴和鼻,按在地上,左右两人拉住了我双手,腿子用绳子绑住了,然后由两个家伙用木棍打我的大腿和脚踝骨。……等到我恢复知觉,却发现被放在另一间房的长沙发上……”^④文戏诱叛武戏逼叛周而复始直到皮开肉绽,依然没有“向国民党讨饶”。

从一九二八年中共党内有(托)派,到第二年造成党外有派,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可以下个结论:中国有托洛茨基反对派,却没有多少活动可言。于是就可在专谈陈独秀狱中生活中结束这个可以称之为中国托派命运多舛和陈独秀受苦受难的一节。

陈独秀毕竟是“五四”领袖又是桃李天下的北大文科学长,法庭上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及抗辩时再次复述他的革命经历,当时庭上庭下,幕前幕后不少都亲历了这场“国共之争”(要是“讨饶”了就无所谓之争了)的友伴和学生辈,将同情倾斜于陈独秀的显然大有人在,加上入狱后联合全体同伴与惯用十八层地狱监管犯人的恶法斗争激烈至于绝食,终于在上层权力部门的允诺下获得达到了监狱自由的极限的生存保障。不仅有濮、罗护理,记者采访的自由畅言,更不必提达官显要或名人闻人的拜访,

①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63页,下引同。

② 赵济《三十年代托派组织在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2期。又据王文元先生来信,经他与现健在的伊罗生夫人联系后证实,格拉斯和伊罗生没有被捕过。

③ 有些研究者以为李福仁因此而离开了中国,其实不确。据托洛茨基1939年3月11日致李福仁信(同注①第75页),他仍在上海活动。

④ 《双山回忆录》第213页。

书稿可以出版,论文可以在《东方杂志》这类文史哲名刊上发表,稿酬可以贴补经济,最后达到允诺他的夫人每天探监以调整其生活,以至使这位伟大的囚徒忘乎所以竟然与夫人“敦伦”起来!不仅把监牢当成实验室简直成了家了。有一天,典狱长提问濮德志,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叫看守退出,把门关紧。开始言道:“我今天把你提来,有件事要你转告。陈先生在我们这里,我们没有把他当作犯人看待。但是优待得有个界限,这里是监狱,不是旅馆。陈先生近来忘记了他在坐监狱,把我们这里当旅馆……你可知道有个姓潘的女人经常来看望陈先生……根据看守人的报告说陈先生和那个姓潘的女人,在他的狱里发生过肉体关系,这怎么能行呢,这事传出去,岂不要叫我同他一样坐牢吗?请你婉言转告他……”^①这位典狱长说他也曾是崇拜陈独秀中人,虽然发了一通“文章虽好,道德有限”的议论,仍然文明解决:“婉言转告”,顾全了陈独秀的面子,但陈独秀这方面却泰然地向濮德志说:“在建党以前,在这方面,我是放荡不羁的,可是建党以后,我就深自检点没有胡来了。……难道我不能有个伴吗?”如何评说,读者自由。

读者必定会多少感到有些蹊跷,潘兰珍怎么没有同时被捕?很简单:当时她不在。“小胖子”郑超麟称潘兰珍为“小潘”,时年才二十三岁,她对五十二岁而多病的“我家老头”可说是尽了传统妇人之道,使陈独秀家庭和满,全身心投入托派救国事业。也许是脾气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和睦家庭难免口角,这不是好事,然而世事茫苍难以捉摸,陈独秀被捕前一次大吵,竟致使潘兰珍愤极出走,摆渡浦东回到父母的家中,如若没有这场被捕,这对老夫少妻也许告吹。据见过潘兰珍的人说她七分人才三分装扮,挺时髦,从世俗的眼光为何要跟个伏地蜷缩为生的老人呢?然而当潘兰珍见到报上“我家老头”以“共产要犯”身份被捕的消息,惊呆之余很快冷静下来,处理完上海家事^②即奔赴南京,通过陈独秀友人的关系暂托庇于陈的学生段锡朋(书诒,一八九七—一九四八)寓所。段时年三十五岁,初次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事业有成,但并没有因陈独秀犯叛国罪而避之惟恐不及,也许是师道尊严也许是人格力量使然,稍后他助潘兰珍在南京赁屋住下,致使专心致志伺候狱中夫君。

陈独秀入狱,人们便会记起他写的那篇惊世骇俗的《研究室和监狱》,至此,他身体力行,一入监狱即安之若素,把研究室合并入监狱。据各种资料,这里大体归纳他

^① 濮清泉(即濮德志)《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6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6月合订版。

^② 潘兰珍有一养女,估计即在此时把她送到浦东老家(抗战时随潘父母回南通),直到抗战后潘从四川回到上海接来共同生活,到1949年潘去世。迩来这个养女在不负责任的新闻界的哄抬下竟上诉法律部门提出“继承”陈独秀的“遗产”,并因此而当上了某县政协委员,这纯系无聊新闻的恶果!

在监狱中的活动,首先是遥控指导托派,这在前面已略作交待,今后不再涉及;第二是继续研究文字音韵学问;第三是展开中国文史研究,准备写几部著作,包括要写一部自传;最后是吟诗写字,甚至与狱外友朋唱酬或索字,既风雅又抒发愤懑之情,从中亦可感到他那种生命既可置之度外的超脱,又存在把置之度外的生命充分利用为事业的人世观,真可谓之练达而又潇洒。

前面交待陈独秀在狱中与外界的联系属于政治方面,主要通过刘静贞;属于学问方面主要靠汪原放,偶尔也托胡适或段锡朋等友人为其购书,章士钊则疏通上下为其求医,更以翰墨慰其在友谊的温馨中忘却牢狱之苦!

先说购书、借书、阅读诸事以明其在狱中著书立说的资料本源,在候审期关在看守所时就向胡适发出一信借阅亚当斯密《原富》(英文);英文李嘉图的《经济学与赋税之原理》;英文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崔适先生的《〈史记〉探源》等一批书,另外还在信中提到托胡适向“叔雅先生”讨一部《淮南集解》,还要他觅取有关甲骨文的书。信中使我们获悉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已经去探望过他并带去不少小说以供消遣,蒋以后一直照顾陈独秀直到逝世。

一旦进入学问,他就没完没了地购买或借阅大量的书,我们综合开列如下:

摩尔根《古代社会》(上下)同时还要英文原版

《列宁组织论》

《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罗振玉著《殷墟书契》

《汉晋西陲木简汇编》

《第一国际史》(一、二、三部,日文)

《达尔文传》

《马克思传》

《经济学批评》(注明要汉译和英文本)

《工资、价格与利润》(同上)

《反杜林论》(要汉译本)

开列的书单中还有英、法文本的大量辞书,英、德文词典并且开列日本出版的学习蒙古、西藏、缅甸、暹罗、朝鲜、安南、马来亚和土耳其等语言文字的书籍。当然还有托派的和托洛茨基的《我的生活》等著作,后来竟要买《玉函山房辑佚书》和开明书店版《廿五史》(或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景印《廿四史》)等大型多卷本丛书,他同汪原放说:“我以前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便要头痛,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事实果真如此,在我们所能找到的书单中

他只要求买过一册小说就是德富芦花的《不如归》，恐怕也未必是从文学角度，因为德富芦花（健次郎，一八六八—一九二七）是个民权主义者，晚年向往托尔斯泰过锄笔双耕的与世无争生活。正好与此时尤其是晚年江津生活相仿。以上这些书还不是全部，甚至可以说是一小部分！

凡是到过陈独秀牢房的人都被满满贴壁而立的两只大书柜和满牢房的书卷气叹服他达摩面壁潜心学问，誓将牢底坐穿的恒心。这些书，除在当时上海著名的别发洋行西书部和内山书店外，不少是从国外订购的。陈独秀精通日文，懂英文和法文，又曾学过德文，在家中因钻研文字而习“死语”拉丁文，又从他《识字初阶》中屡次提到古希腊克里特文字或文化，估计还研究过古希腊语。此种对文字的痴迷，不排除监狱寂寞的时光力争完成毕生宿愿《小学识字教本》。在一篇早期的陈独秀传中曾说：“先生无书不读，又精通法、日文。故其学，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当代名家，实无其匹”^①，关入监狱后更“刻苦读书，思想为之大进。对于中国学术谋长足之进展。尝自诩当创造中国五十年新政治学术结晶，以谢国人”。

那么，“以谢国人”的究竟有哪些著作呢？首先是文字音韵学类，主要有《甲戌（一九三四年）随笔》、《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它》、《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连语类编》、《实庵字说》、《干支为字母说》以及扛鼎之作《识字初阶》（即《小学识字教本》）。其中有一类如《荀子韵表及考释》、《屈宋韵表及考释》等则是涉及哲学门哲人著作诠释性质的文字音韵音义的特异研究，属于这一类的尚有《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是与历来有些学者如著名的顾炎武等就广韵门的研究的更新研究。关于陈独秀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功力及其功业，应是此公博学研究中的强项。

把监狱当成研究室的第二项重要工作是中国史研究，如《中国古史表》、《老子考略》、《孔子与中国》等，这只是拟定中著作的极小部分，他不只研究古史还想研究现代史，不只要写中国儒道学说，还想研究西方宗教，可惜的是皆未能完成，残酷一点儿的说法是再关上几年也许就成绩大了，当然数量遗憾之余我们不能不叹服他的研究质量，比如《孔子与中国》，较之于五四时代的认识就有质的变化，有人说，此时对于孔子的研究其“内容与五四时期绝对否定‘孔家店’相比有所进步”，其实，不应该视之“进步”，应当视为陈独秀对于孔子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大发展。民国不久为了扫荡当时仍然铺天盖地的封建意识和清季小朝廷仍在紫禁城一隅窥测方向伺机反扑的社会政治大环境，引进德先生以打倒孔家店，至今我们也千万忘记不得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溥仪当满洲皇帝的王朝复辟史！绝对不必虑其“绝对”。到了三十年代，经过二十年的资产阶级工业生产的发展和西方民主入主华夏的政治环境，以及胡适运用西

^①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陈独秀传》第22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方史学方法论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文化氛围，陈独秀就可赋学术研究以时代精神，笔者以为《孔子与中国》应引起学界重视的是他在文中所言的用“现代知识评定之下”重新塑造孔子形象的开孔学研究之先导的方法论，以此法“评定之”甚至对中国历史造成无穷后患的“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在“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深入研究之后认定孔子是“中国的 Machiavelli”，马基雅弗利很快就随着文艺复兴的深入，被资产阶级民主意识、公民意识所替代；或者说是在对垒之中给君主专制主义强行灌注人民意识而为资产阶级步上政治舞台铺路架桥，但中国不行，故而，陈独秀仍然判定孔子的总体思想对于中国有危害，直到今天，专家们对于孔子的研究尚无出下引陈独秀论孔子言其右：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消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能够多生冯道、姚枢、许衡、李光地、曾国藩、郑孝胥、罗振玉，而不能产生马拉、但顿、罗伯士比尔。幸运的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倒霉的是全中国人民！^①

依然是否定，是在民主民权的高层次上的否定！“束手束足”在监狱中的哲人其思想早已越出牢房直到今天仍不失其孔学研究中的精深之论。

三十年代曾经风行过一阵传记热，滥觞自胡适，他在身先士卒的《四十自述·序》中曾写道：“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被劝动的人中有梁启超、林长民、梁士诒、蔡元培、熊希龄，以及商务元老张元济、高梦旦、叶景葵，本传主当然在约之列，但应者寥寥，有的早逝（林长民、梁启超），有的没写，写的如蔡元培亦只一简传。陈独秀时在狱中，除胡适，很多朋辈都瞩望写成，托派更是希望他能如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似地留下斗争履痕，陈独秀也有写传的愿望，早在入狱不久就表示要写自传，迟迟不动笔的原因千头万绪，但他只归结到“在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其实这个归结并不充分，因为他在狱中既吟诗又挥写擘科大字风雅得很哩，主要还在于对自己五十三年大半生尚理不成作传的头绪，只得托汪原放告诉适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总体说来入狱（包括在看守所）四年又八个月的前三年主要是研究文字音韵，指导托派，读大量的书，其读书之勤之广终于读出了可以称之为智者的结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达尔文的《人类的起源》和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近代

^①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389页。

三大名著”，批为“皆世界不朽名著也”，但他没有想到在苦读中酝酿了四五年才动笔仅两章的《实庵自传》，一经面世，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谈不上“世界名著”，编者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①也不算过誉，如若再关上一二年继续写下去，难道不能比肩于休谟、卢骚或弗兰克林的自传！遗憾之余笔者以为如若把《告全党同志书》、一九二八年八月五日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答国际的信》，和濮德志在《我所认识的陈独秀》中所引的陈独秀狱中回忆，拢在一起也勉强可算作从出生到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自述，多少可以找回些踪影，只缺辛亥革命经五四运动而到达建党这整整十年的行状。

《实庵自传》刊出，陈独秀已在武汉，尽管《宇宙风》编辑陶亢德再三催促他继续写下去，抗战烈火已随江浙失陷而烧向中原，武汉不靖，带着多少有些烦躁的心绪写了一封回信：“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弗兰克林自传，即分三个时期，隔多年始完成者，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必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只能写至北伐以前，显然指的是他被开除党籍转向托派之后的历史一时之间难以说清，即或写成亦难见容于世，这个预测也可能是写作阻力之一，他曾表示过如下情绪：“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这虽然不是指自传，但著书要利于“行”的原则是相同的，那么，读者必定要问，不是指自传，指什么著作呢？是陈独秀拟议中给商务印书馆的写作计划，若交涉成将写的是：

《古代的中国》

《现代中国》

《孔子与儒道》

《耶稣与基督教》

《我的回忆录》（即《实庵自传》）

这个目录开于入狱不久，但除了最后一项完成两节，别的著作一部未成。

陈独秀在狱中另一异于在狱外疲于奔命托派事业期的是写诗。诗，本是他最早用来表述情感抒发心绪或怀念故人的雅好。但据目前可见的诗作资料，似乎一九一九年第二次被捕出狱后写过一首《答半农的 D—诗》之后，已有十多年没“玩儿”韵脚之声了，如今关在狱中，反倒诗兴大作，不只与章士钊、刘海粟、陈钟凡等有唱酬，更写了五十六首《金粉泪》。

曾有“六朝金粉”盛世之称的南京，虽然被内忧外患弄得淮河水混浊不堪，却仍被遗老阔少新贵的阿 Q 式的“臭水也可消魂”一仍酒醉金迷，此被关在狱中面徒四壁心

^① 《实庵自传》初连载于《宇宙风》（旬刊）第 51、52、53 期（1937 年 11—12 月）。

中愤恨怨气无所吐处的陈独秀尽在纸上发泄。

总题《金粉泪五十六首》的手稿是陈独秀交给前来探监的汪孟邹保存下来后由汪原放捐献给中共一大纪念馆而被保存下来的,据最早研究这组“感时伤事之作”的陈旭麓教授说:“诗中涉及面颇广,有军政大事,有生民命脉,有要人隐私,探幽阐微,言之有物有据,可以当史诗读。就诗的内容来说,反映了陈独秀虽历经艰险,失去自由,而字里行间仍流露着平生爱国革命的豪情……全诗所陈者,皆国家民族的安危所系,一无个人的失意呻吟”^①,就这么一部咏叹“爱国革命的豪情”的史诗,竟然仍不见容于某些势力。在此引录五十六首之末以志纪念。

自来亡国多妖孽,
一世兴衰过眼明。
幸有艰难能炼骨,
依然白发老书生。

最后本节拟在陈独秀的一首题画诗中结束。一九三五年,刚从法国回来又上黄山大过画瘾后的刘海粟到南京入监狱探望老友陈独秀,出示刚完成的《古松图》索句。陈见《古松图》上有作者题记:“乙亥十一月游黄山,在文殊院遇雨。寒甚,披裘拥火犹不暖,夜深更冷,至不能寐。院前有松十余株,皆奇古。刘海粟以不堪书画之纸笔,写其一。”海粟捧此画探监之前已请曾是中国职业教育创始人之一的沈恩孚和蔡元培过目并题诗,沈题是:“拥衾僧院寒于铁,起写黄山一古松;何处不留真面目,偶挥秃笔写虬龙。”蔡题是:“黄山元松名天下,夭矫盘孳态万方;漫说盆栽能放大(人言黄山松石,恰如放大的盆景),且凭笔力与夸张。”陈独秀提笔舔砚写下了一个大智者瞬间萌生的不论从社会大环境从监狱小天地皆豁达大度之言:

黄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
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 题奉海粟先生。独秀。^②

被孤在监狱里者有达摩面壁的宁静,但大千世界诸多友辈没有忘却他,“孤而不孤”此之谓也。

中国又将陷在苦难中翻滚、崛起,陈独秀却在摆脱纒继之孤后,被酱在难以忍受

① 五十六首诗和陈旭麓教授批注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3辑。

② “乙亥十一月”是1935年年底,陈诗当写于是年底或1936年初。

的耻辱之中死去……

带着被绑的耻辱走出牢门

上节在提到陈独秀写自传时，我们隐去了写作日期，乃是故意留下与传主一生最后遭到的急剧上升的民族矛盾捆在一起写的。

陈独秀，这位从小就满溢着爱国主义的硬汉，竟然负着“汉奸”的枷锁含恨死于抗日战争年头！请注意：当为穿上皇帝尸衣不惜俯就在日本天皇陛下分裂中国的汉奸王溥仪以“爱国民主人士”被拥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殿堂时^①，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仍在《毛泽东选集》中被“注”为“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指托派——引者）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②，证据是臭名昭著的理论权威康生提出的，说“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③。中国托派正是半垮于“九一八”之前而全跨于“一二八”之后。两个事件之间的一年半内托陈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骨干全都身系大狱，谁在领“津贴”？本传从方法论的角度一是重视历史大背景与传主的思想和行动的关系，再是重视传记本身的历史联贯，我们一开始“言归正传”就指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关心国事到逐步走向革命的起步是甲午战争中国败北”，因此大而为之、为民族小而为之为个人，与日本的关系简直是知识分子的试金石，陈独秀在法庭上慷慨痛斥国民政府罪状之一就是“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退让”，而法院有罪判决的罪状之一恰恰也是：“乘日本之侵略，妄论政府不抵抗”^④，针锋相对的都是对日本侵华的态度问题，但那时指的仅仅是“九一八”到“一二八”的中日矛盾的序幕，匆匆六年，历史推向一九三七年，如何哩？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华北失陷与“满洲国”连片成为日本侵华大本营，八月十三日侵占上海，两造之间五个星期内几乎天天轰炸首都南京，政府溯江而上迁至武汉。于是就可以连上陈独秀写自传了。

《实庵自传》正是日机在南京“下铁卵”连监狱亦挨轰炸的险境中完成的。

此稿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日五日中，时居南京第一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闲。^⑤

① 溥仪于1964年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2页注30。

③ 《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

④ 《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第201页。

⑤ 邳玉汝《陈独秀年谱》第61页1940年5月5日条。

好自在的“遣闲”！有一次轰炸，监狱竟然承受了八枚炸弹的强大冲击，陈独秀被关的那幢房顶震塌，陈竟然躬在桌子底下逃脱了真正的“灭顶”之灾！炸前是否舔墨捷书，桌上是否摆着自传手稿，当然就无从考证了。

有鉴于此，当南京政府陆续迁往武汉，大学等各大机关向内陆迁移时，被关在监狱中的政治犯亦被提前释放。八月二十三日，陈独秀在潘兰珍、陈松年等家属和陈钟凡等友人以及丁默村等国民党有关方面的接迎下走出大墙，结束在行动上与世隔绝了五年的生活。先在时任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家住了几天，然后与潘兰珍一起搬到时任金陵女子大学理学院院长陈钟凡在云南路阴阳营的住宅。陈钟凡是北大学生，始终执弟子礼，把二楼正房让给老师和师母住，他自己住偏房，一直住到陈等九月九日乘轮船去武汉。

关于陈独秀出狱，也是一桩说来不会话短的公案，濮德志说是“当时中共中央，派周副主席和董老驻南京，迫使他（指蒋介石——引者）兑现，他不得不同意释放全国政治犯。陈独秀能够出狱，完全是中共的救援”^①。比陈独秀迟放数天的郑超麟则说：“现在有一种传说，说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释放的政治犯名单中包含陈独秀在内。我过去未曾听说此话，以常理推之，也不会有这件事”^②。有据可查的陈独秀出狱是一批知名学者和政界人物（多半是他的学生）未能忘情于他对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和科学立国的贡献而发动营救，也与国际反法西斯超越政见的大一统的时局的政治气氛有关，现且引几则当时有代表性的要闻略作诠释以了却此事：

适之先生惠鉴：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敬复并颂著安弟汪兆铭顿首八月十九日。^③

可见陈独秀出狱是胡适等通过汪精卫以行政院长职司向蒋介石提出后交国民政府核准再由司法部训令法院按正常司法程序以战争特例宣布减刑释放的，因此而有司法院长训令：“呈为呈请减刑事。查陈独秀……入监以来，已逾三载，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据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④此训令由司法部长居正呈“钧府”（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核准，由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执办的。程序是合“法”的。至于中共是否按照“双

①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第73页。

② 《郑超麟回忆录》第321页。

③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64页。

④ 《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第229页。

十二事件”国共第二次合作事宜中有关释放政治犯的条款要求释放托派尤其是陈独秀，“政策落实”至今亦无官方文件可以资证。按政治常规，正在抗战初期再次要求苏联政府的军事援助和军事专家参与抗战军事指导，中共是不会违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反托总路线的，曾骂陈独秀“与托派合流以后，一切言行，都由变色龙变成一条蛇”^①的回忆录中说是中共救陈独秀出狱，究竟是神话还是阿谀，由读者去分析。我们再提供一些史料。陈独秀等托派作为政治犯释放出狱不数日，中共在法国巴黎发行的宣传抗日统战的机关报《救国时报》九月十日第一版上就出现要求政府“对汉奸托洛茨基分子实行严刑峻法”，二十天后该报发表署名文章《要求逮捕和惩办托洛茨基匪徒》提出严惩托匪汉奸并点名陈独秀：“陈独秀等决不是政治犯，而是卖国叛国犯。……应该逮捕，应该治罪的”，一时之际镇压苏联和中国的托洛茨基匪帮，成了该报呼声日高的新闻，竟至最后以“本报同人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立场，特别向我国政府当局及海内外同胞呼吁”用枪决韩复榘的毅然手段枪决陈独秀等托派^②，还要再引当年的那些不愉快的文字吗？

当然也应说一个特例，到了八月底，所有的托派全部出狱后，惟独王文元（凡西）仍不见放出，陈独秀曾委托国民党中统局方面的熟人探听，“回说并无此人”，接着罗汉找到叶剑英，希望他出面营救。关于这件事，王文元有详细的回忆，引在这儿以接上陈独秀出狱后与中共的一次接触。王文元回忆里，叶剑英利用八路军军事代表身份的方便条件与罗汉四出查询交涉终于使如今有中国托派理论界“四大金刚”之一的当年“小孩子”出狱后发出如下的感叹：

中共党员对于托派关系，并非一贯敌对，亦非一致敌对的。站在斯大林主义的立场上，他们当然要反对托派……只有极少数如陈绍禹一派，才把反托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本……叶剑英当时仍对罗汉以老友相待，并偕同着去营救另一个托派，我们不能不作如是解释。^③

正因叶剑英个人对于托派中人有此友善，使出狱后一心向往抗日救国的陈独秀与叶剑英等中共方面就抗日统一战线有过意见的交流，尽管最后闹得极不愉快，但毕竟有过这段历史。

陈独秀出狱，当然与一般托派不同，此话怎说？简言之，代表国民政府的法院要

①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第78页。

② 《救国时报》第151期，1938年2月5日第1版。《救国时报》1935年12月9日创刊至1938年2月10日出至第152期停刊，吴玉章等主编。本书引用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

③ 《双山回忆录》第227页。

求陈独秀对据以判刑之罪“深自悔悟”后才能考虑释放，而托派领袖的陈独秀则拒不认罪，坚决维持两次抗诉，要求无罪释放，不然宁可坐穿牢底。假如承认托派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派别，这也是“国共”关于释放政治犯的谈判。因此，当出狱后的陈独秀看到有“深自悔悟”，“以示宽大”的谤言释放文书时，可谓怒不可遏。二十三日中午出狱，第三天就向《申报》馆编辑部写了封可以称之为“第三抗诉书”的信——若执法机关到牢中向陈独秀宣读释放令，陈会拒不出狱而关死而成遗书；假如不是信而是诗，堪称千古绝唱。如次——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因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我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盖以日来都中有数报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悟。

陈独秀(朱文名章)八月廿五日^①

稍有政治斗争经验的读者必定会悟出这封信是不会被《申报》馆接受的，果然，由于中共某些人的干预，胎死腹中^②，于是抗战一开始，陈独秀就戴上了一顶向国民党“深自悔悟”的耻辱的帽子，五年前《红色中华》上关于陈独秀向国民党“求饶”的谣言终于不明不白地兑现。待到平头百姓于一九八〇年读到此信，只明白了什么叫作人言可畏！

综合各种资料可以把出狱到去世五年间的陈独秀总体思想简约述之为：一，继续坚持托洛茨基理论，这方面的行动是几乎所有的托派成员出狱后都去看望陈独秀，他则设法安排出狱后无出路的如郑超麟夫妇、何资深、濮德志、罗世藩等人的生活。要求郑超麟暂勿参加活动，全力协助濮德志、罗世藩完成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的翻

^① 信件由上海市档案馆提供，载《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373页。全文一逗到底。

^② 详情见马荫良(当事人之一)、储玉坤《关于陈独秀出狱前写给〈申报〉的一封信》，《党史资料》1981年第1辑第186页。

译工作；陈独秀对此书评价很高，认为不只是反对斯大林统治苏联“而且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①；二，继续反对中共但同意并从策略角度支持国共合作抗日；三，全力以赴投入抗战舆论，从初到武汉的《抗日战争的意义》到临死前不数天的《被压迫民族的前途》，论文不下二十篇，陈独秀的一生觉悟于中日甲午战争而死于声讨日本侵华声中；四，再次提出民主自由和发展工业，它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工业救国”，而是从现代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要求中国成为工业强国，造成一支强大的产业无产阶级，而这又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中国革命不经过民权主义而直达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有联系，也与“两个波间”的“国民会议”口号有潜在关系，这一口号抗战中果然有所影响，就是国共合作并有民意团体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五，力图摆脱政治干扰——最重要的是摆脱中共由康生等出面的诬陷其为日本汉奸的干扰，然而恰恰是纠缠似毒蛇的这一条导致这位巨人含冤含恨死去。

我们从上述的第二条，即支持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谈起。首先要指出的，正是支持国共第二次合作导致了陈独秀与抗日中重组的托派（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产生了严重矛盾，李福仁在致托洛茨基信中斥他为一个“仍然对资产阶级（指国民党——引者）存在着强烈幻想”的“标准的机会主义者”，并宣布将与他“决裂”，当时基本上操纵在格拉斯（李福仁）手中的托派的这种态度，使他愤极而说“我与托派无关”之类的言论。实在说来他至死也是中国托派领袖，但是在拥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上确实与托派（第四国际）的中国抗日政策意见相左，因此而促使陈独秀与设在南京的中共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有过两次会谈。据当事人罗汉（他是陈等被捕后重组托派临委的组织部长，隐在苏州和宜兴两地陶磁工专教书）回忆，八月下旬到南京以叶剑英老友关系到博厚岗“八办”提出了关于合作抗日的意向，交谈时李克农在场，罗汉说写了一封信要求转交延安中共中央考虑，这纯系罗汉个人行动，“剑英兄接此信时，还答以电报拍往延安，且谓本人纯以军事代表资格驻京，军事以外的问题无权决定，他劝我最好到延安去一次，如果西安有负责人的话，或者到了西安，即可得一结果”^②。叶剑英是诚恳的，不但打通了托派与延安的联络而且还给了罗汉等三人去延安的旅费。罗汉于九月二日抵达西安会见了在七贤庄中共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林伯渠以礼以友热情相待。都眼望很快得到延安同意罗汉前往的回电，“但彼时因山洪毁路，汽车不通，一时无法前往”。林伯渠遂将罗汉的意见书电报拍往延安待示，待到罗

^① 《郑超麟回忆录》第324页。

^② 本节所引罗汉的话以及由此而引发开的有关陈独秀与叶剑英等的谈话，《新华日报》上的相关反应及其他，全部引自尼司编《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新中国出版社1938年5月出版，非特殊情况不一一注明页码。罗汉信载该书第35～44页，原载汉口《正报》1938年4月25～26日。

汉接到关于陈独秀托派参加抗日应先履三个条件回电，于九月十五日匆匆返回南京，“往与博古剑英相晤，据他们告诉我已和独秀见过面，关于合作抗日问题谈得很融洽”。

嗣后他们又告诉我，独秀对他们与国民党抗日合作的路线是大体赞成的，不过只是觉得未转变前的路线未免太左，既转变后的路线又未免太右了一点。最后博古并且告诉我：据他们的观察，独秀的意见，很少有同托洛茨基相同之点，故近来中央在刊物上已不把托陈并为一派，至于中央电文还恐辞句上会引起独秀的反感，他再三叮嘱我，不妨口头传达，原电暂时不必交给独秀看。

从上述引文看来，陈独秀仍然脾性耿直到左右直陈，无话不谈，而听者则从善如流，以诚相待，明乎此，我们既不必考证陈对中共种种前左后右，也不必对陈与托洛茨基就抗日问题少有不同之点进行考证了。但是延安方面对陈独秀提出合作的回电连叶、博都感到棘手，预测陈独秀难以接受。当时陈独秀已去武汉，竟然使本想去武汉会见陈独秀的博古怯步，以“自己党龄太浅”为托词，取消了武汉行，而且还同罗汉说：“如果电润之（即毛泽东——引者）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无论直接间接的谈，都有闹翻的危险，最好候恩来南下后，约他一起去谈，成绩或者会圆满些，且不久必武会回武汉，他自然能和独秀先行交换意见。”以上博古的意见是罗汉从南京赶到武汉与陈独秀当面交待讲出的。下面就是回电中的三项谈判条件全文：

（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①

上述三个条件，从陈独秀托派的立场等于是他要他当一次叛徒。叶剑英，尤其是董必武、林伯渠等元老太了解陈独秀的性格了，这等于是把陈独秀拒之抗日门外孤立起来。那么，叶剑英，尤其是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博古为何如此害怕致托陈的三个条件，以至于自己不敢去谈还建议暂勿给陈看呢？问题还不尽在于三项条件的苛刻，而在于这份电报是由洛甫（张闻天）和毛泽东签发的。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的是署在前面的洛甫当时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领导权则是“中共七大筹委会主席”毛泽东。

^① 《关于对待托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1937年9月10日洛甫、毛泽东致林伯渠），引自《中共中央文件》第11集第335页。据罗汉信，此文由林伯渠在当天电话约请罗汉至七贤庄口述转达。

苛刻的三条，似乎这还不够刺激陈独秀，在接到延安回电后，叶剑英、博古和董必武立即改变私见和态度，“再三向罗汉说：‘托派已成日寇工具之汉奸组织，陈罗必须坚决反对托派的理论和行动，作为先于一切的条件’”。这是中共方面以三个高级干部署名方式第一次披露他们与罗汉与陈独秀谈判结果的公开信^①，以往全部所有为陈独秀落实政策而辩解诬陷他为汉奸一事的文章或著作中，都说是王明、康生的罪恶，似乎与组织无关，讲多了大家也就信了。历史真相当然不是个人行为，乃仍然是受命于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的组织决定，这方面的资料是不少的，只举一例：早在一九三六年由从延安回到上海的冯雪峰(O. V.)，在鲁迅重病难以执笔时以鲁迅名义发表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就埋下了托派是日本汉奸的一粒恶籽。^② 鲁迅此文发表不久，前面我们已经引过的《救国时报》上就出现《全国联合战线运动高涨中，托陈派甘作汉奸，反对联合战线》的长篇报导。文中把鲁迅当作斥托陈为汉奸的替罪羊谈起：“本年八月间，托陈派首要陈××为反对共产党抗日救国统一战线之新政策，曾致函全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游说其勿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公然为日寇张目。鲁迅回信在讽示陈××中指出了托陈这一流人的日本走狗的面目。”^③把陈独秀及其托派是日本汉奸的诬陷公诸国外！但造谣者也不翻翻日历，一九三六年八月，“双十二”事件未发生，国共合作抗日还只是舆论或者说还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密议之中，更无从测度卢沟桥事变；更距康生撰文诬陷陈独秀是汉奸足足一年半，陈独秀还在国民党监狱中替共产主义坐牢尚欠整整一年，冯雪峰就带了要把陈独秀定为汉奸的使命从陕北赶到上海，借用鲁迅之名封住陈独秀的嘴！

使罗汉愤极而言：“你们一面在和我‘拉朋友’，一面却又遣人造些无根据的谣言来中伤我；这些手段真有些使我不寒而栗”，“‘公道’的造谣先生们！……这又作何解释呢？”“你们的机关刊物（指《解放》周报——引者）上有这样捏造事实，含血喷人的文字，你们若是一个革命……”真不想再引下去了，这就是罗汉！从此之后他就消沉下去，但与陈独秀一直保持着师友甚至是一种特殊的上下级关系，不仅护卫陈独秀，还护卫陈在安庆的全家人直到江津定居，自己却终于默默无闻地死在日寇空袭重庆的炸弹中。

现在就可以谈谈陈独秀了。从八月二十三日出狱到九月十日离别南京，他先在傅斯年府上住，后在陈钟凡家，不卑不亢地婉谢胡适引见他去美国应某出版公司写自传的邀请，拒绝了周佛海、朱家骅等新贵要他出山或参加国防参议会或参与国民参政

① 公开信载《新华日报》1938年3月21日。

② 《答托洛茨基派的信》，《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

③ 《救国时报》1936年10月13日第2版，文中陈××是陈其昌。引此文的论者竟误以为是陈独秀。

会,甚至资助他成立新共党或给他一个劳动部长当当。在监狱中关出了更为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陈独秀,心中明鉴这是在新的时局下国民党或亲国民党的势力欲借其往昔荣光达到“制共”目的;同时他也一概不收受带有政治条件的经济资助,这一切深深感动了朝夕相处的陈钟凡,不禁诗句涌上心头:“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临离南京前,陈独秀和诗告别耿耿忠心的老学生:

莫气薄大地,憔悴苦斯民。
豺狼骋郊邑,兼之征尘频。
悠悠道路上,白发污红尘。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能驯。

顶水西进缓缓而行的长江轮船再度经过安庆时,他知道继母谢氏和三儿松年全家都在候着他接去武汉团聚:“祖母对父亲长期流浪在外,总是担心受怕,常常叹息自问:能否由儿子抱头送终”^①,这时,我们只能请老人勿担心,“无情未必真豪杰”嘛。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陈独秀夫妇抵达汉口,在旅馆稍事休息即找妥居停,新居在武昌城里双柏庙后街二十六号,据在此住过半个月的王文元描述,这是一所颇具庭园风味的平房,房主是个桂系军人,陈象征性地支付一点房租。新居大概还算宽敞,不只王文元住下,不久濮德志从安庆赶来,“小濮还是小濮”,陈独秀对他来武汉很是高兴,新居很快就成了武汉三镇文人学者政界人物和学生们的向往之地,也成为新闻记者守株采访热点。其间他曾经应邀去华中大学、汉口青年会等处就抗战立国问题发表演说,接受记者采访,畅言抗日诸问题——从战场作战一直讲到民众协力支前,又从货币改制讲到抗战费用,既表彰“前方的血战是何等牺牲精神”,也没忘记鞭挞“后方赶不上去……竟是这样松懈”。当时他身体状况尚佳,精力更被热气腾腾的抗日所鼓舞,加上罗汉同他说过中共方面尤其是周恩来说托派中陈独秀一派“赞成抗日”因此“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②。哪知好景不长,先是延安出台令他无法忍受的三项条件,继而王明到武汉任中共长江局书记,大放厥词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③。一时之间陈独秀托派是日特汉奸在延安过来的和武汉出版的中共报刊,从中共长江局,从“八办”等机关劈头盖脸、铺天盖地而来,

① 沈寂《再访陈独秀谈话记录》,《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第234页。

② 《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第44页。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33页。

“而陈独秀数月以来，逆来顺受，连起码的声辩也没有。有人去问他，他也不怎么表示，一般人也觉得奇怪，他的许多朋友们都忍耐不住了”。于是武汉报纸上出现了由九位知名人士署名的公开信为他辩诬：“中国共产党内部理论之争辩，彼此各一是非，党外人士自无过问之必要。惟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①署名者为：王星拱、周佛海、傅汝霖、段锡朋、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陶希圣、林庚白，显赫的一群，读者必定猜中此信辩诬之权威性及社会影响之大，社会大哗。从政党立场，无情的政治斗争迫使中共方面再次掀起一口咬定陈独秀是日本汉奸的原议，从九人公开信的第二天起《新华日报》立即接二连三地反击，再加上微妙而又复杂的政党形势，迫使九人中有的人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登报反悔，不是反悔说陈不是汉奸，而是反悔公开信上不应出现涉及中共“内部理论之争辩”之类语言，以免陷入党争云云。反悔者受到了《新华日报》的褒扬但仍能感到压力，于是一直沉默不言语的陈独秀才认真起来，写了《致〈新华日报〉之公开信》，该报当然拒绝发表，于是只得在名声不理想的《扫荡报》上发表，兹抄引一段以正视听：

我在去年九月出狱之后，曾和剑英博古谈过一次话，又单独和剑英谈过一次，到武昌后，必武也来看过我一次，从未议及我是否汉奸问题，并且据罗汉说，他们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近读贵报及汉口出版之《群众》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报，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顷见本月贵报短评，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评可以看出，你们所关心的，并非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而是陈独秀能否参加反对托派运动的问题，你们造谣污蔑的苦心，我及别人都明白了。^②

陈独秀最后愤怒了：“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陈独秀的信尽管只能发表在《扫荡报》上，但仍然引起武汉三镇政界和民众尤其是知识界的震动，显然使正处在共产国际猛烈反对托派压力下的中共大感棘手，不仅被迫由叶剑英、博古和董必武出面强调陈独秀必须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还发动宣传力量把陈独秀和支持

^① 《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第22页。

^② 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475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发布此信。

陈独秀的声音压下去。“做人的道德”确乎不应如此，但政治，为了既定目的，有时是需要什么都不管不顾的。

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向陈独秀飞去的这顶汉奸帽子，这是连被宙斯陷害而锁在高加索山上达三万年的普罗米修斯也未曾受到过的耻辱！

终于没有走下高加索

日军“七七”在卢沟桥，“八一三”在上海五个星期内相继开辟北南两大战场，打的是蓄谋已久计划周密战略速决战，企图利用精良的武器装备和高技术的辎重运输能力，加上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造成强大的威慑力迅速解决中国战场。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八一三”上海战役，不仅可以轻取首都而且可以顺长江向纵深发展胜利，在当年底以屠杀三十万南京居民的魔鬼般凶残制造战争恐怖，不只会从形式上摧毁了中华民国，更从政治上打击了政府抗敌意气，短短五个月日军已完成其侵略目的之大半。

一九三八年是中日战争的关键年，日本人的作战计划是溯江而上摧毁“抗敌中心”武汉和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广州虎视香港切断英美支援中国的海上运输线，从而结束中国战场，为即将开辟的南太平洋战争夺取东南亚拉开序幕。五月，徐州会战以中国失败而告终，国民党和共产党全都高呼“保卫大武汉”，六月安庆失陷，武汉保卫战已成问题，因为日军溯江经赣向鄂进逼，中国军队已无巩固的防线了，因此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上一开始就提到“敌人是否会进攻武汉”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八月，中共中央在党内文件《关于保卫武汉方针问题的指示》中从合作抗日大义出发，提到“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汪精卫派——引者），应是我们的总方针”^①。但是不论怎么支持、动员抗战，武汉还是与广州同时在十月失陷，“抗敌中心”经长沙继而设陪都于重庆。一九三八年也是国民党内部分裂（或者可以说是净化）的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从重庆率领陈公博、周佛海等逃往越南河内于二十九日发表“艳电”提出臭名昭著的三条：“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成立于三月的“南京维新政府”终于找到了中国的贝当和赖弗尔。汪、陈、周中两个曾是中共一大代表，与汪精卫又是一个“国共合作”，却是铁板钉钉的两党汉奸的合作。过去似乎谁也没有说起过：一九三八年六月后的中国真够“五胡十六国”的：东北是满洲国，华北是日伪政府，南京是维新政府，张家口是“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重庆是“陪都”，延安是新中国的雏型，还存在没有收回租界的“孤岛”上海。十月广东失陷后，香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第538页。

港暂算是块净土，尚可在南方掀起抗日运动，保留了东江和琼崖两支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但能维持多久呢？

一九三八年还可叙述的一事也发生在六月，即国民党中央监委忽然心血来潮，据国共再次合作精神，把十一年前分裂后开除的二十六名进入国民党高层的中共党员宣布恢复国民党籍，名单中既有毛泽东、周恩来，又有陈独秀、彭述之。这种胡子眉毛一把抓的“落实政策”其结果可想而知是闹剧一场。

对一九三八年陈独秀本人来说，这可怜兮兮的五十九老人孤单地蜷缩在家中仍在写抗日的论文，却已经遭到接二连三的政治打击，不仅情绪烦躁也拖垮了身体。毛泽东《论持久战》通过《新华日报》向全国发布，成为总结一年而能指导持久抗战全程的抗日战略决策经典，至今仍使汗牛充栋的抗日论文在《论持久战》前黯然失色。陈独秀看了必定十分悲伤，因为文中提出争取抗战胜利之诸多要事中有“镇压汉奸托派”^①一条，这是中共领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首次肯定托派是汉奸，于是陈独秀更被彻底孤立。连民主党派中那些政治敏感的过去的老朋友也视陈宅为畏途。这时他已经搬到汉口模范区吉庆里附近的一个成衣铺楼上，那时陈独秀的居住条件已极差，生活就更无法提了，据陶希圣回忆，即使如此，陈仍不领受来路不明之财，他当时主持的文艺研究会弄到了一笔钱，欲接济陈，怕陈拒绝“只有去找他的女工（即潘兰珍——引者）每周或每月补助一点买菜”，有一次潘兰珍摔伤了腿，医疗费亦是陶希圣设法解决的。这，就是一代伟人抗战初期的窘迫生活！^②

这一切该他受似乎还说得过去，最使他伤心的是托派洋钦差李福仁在上海亦对陈采取孤立政策；不仅对陈甚至对所有出狱托派都如是，直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还没有将国民党释放托派以及出狱托派仍“都没有放弃他们的立场”的消息正式通报托洛茨基。^③与此正相反，正在筹建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却十分关心陈独秀的命运，他写信给上海整顿托派组织的李福仁，信中再次提出要重视陈独秀，并要求设法把陈独秀送到美国，认为陈独秀到外国，能使他在第四国际中起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片山潜的作用^④，在六月二十五日的信中，托洛茨基特别强调：“陈独秀如到美国，能为中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展开很有效的宣传。他以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老革命家，且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资格来进行这种宣传，对于美国工人所能发生的影响会比莫斯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竖排本）第432页。

② 《关于陈独秀先生二三事》，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

③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67页，在托洛茨基致李福仁第二封信中还在询问陈独秀等政治犯是否已经被释放。

④ 片山潜（1860—1933），日本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长期在国外，曾协助建立美国共产党，后一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

科的代理人们所能发生的要大一千倍。”^①信中托洛茨基还担忧斯大林会暗害陈独秀，因此建议不惜与国民党达成某种可以接受的妥协，以便陈能顺利出国。此信后来是送达到陈独秀手中的，那是后话，写下去会有提到的机会。

六月安庆失陷前，陈松年扶着已双目失明的祖母和妻儿老少乘轮船经由武汉而西去宜昌，据陈独秀给松年的信本拟在宜昌全家集齐同行或各自西进在重庆团聚，陈独秀夫妇则由时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的包惠僧安排好离武汉的船只，这是六月十四日之前的事，后因一别三十年未见的姐姐亦逃到武汉而误了船期。“卅年未见姐，见姐在颠危。相将就蜀道，且喜常相随。”后来在罗汉的相陪下乘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包船入川，据同行的郑学稼、尉素秋等回忆陈独秀夫妇扶着祖母一路辛苦异常，竟然“未买到铺位，在大菜舱的外面打地铺，当时称之为三等活动舱”，这种散舱客不只躺在冰凉的甲板上，还得挨住客和夫役乘务的白眼受气就不必提了。船行驶到万县停泊，陈独秀竟然还有劲头与几位友人游西山公园，并拍电报给重庆《时事新报》社长薛农山接站并安排旅馆暂住。升火后又行了两天于七月二日下午四时抵达重庆口岸，由高语罕等友人接去暂住在上石板街十五号川源公司友人家，并与松年一家人及大姐团聚，这是陈独秀一辈子唯一的老少四代同堂虽称不上天伦之乐亦总算拢成一个家。当时陈独秀的抗战决心和干劲仍然十足，不数天就撰写了《抗战一年》提出敌人侵华一年虽然霸占我中华大半江山但却已注定不可能征服中国的三大失败因素，并针对一年形势提出四条争取胜利的意见，其第二条就是申明统一战线大义号召“在野的党派应该心口如一的援助政府抗战，获得胜利”^②。在素有长江三大蒸笼之一之称的重庆，陈独秀虽感到烘热难熬，但身体尚算硬朗，有人形容其当时的形象：“陈先生穿一套中装短衫裤，顶上灰白的头发，剃去周围，只留中间像茶壶盖样一片……镶着一只金牙……展露笑容时可以看到”^③，有不少朋友形容他那双“特有光芒”的眼睛，“他谈笑自然，举止从容，像老儒或有道之士，但有时目光射人，仍令人想像到《新青年》时代文章的叱咤锋利”^④。以上加在一起就是重庆江津时期的陈独秀，物质生活已降到低谷，而精神则依然上扬，是庸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十四日，又应邀在国民政府中央电台作《抗战中川军之责任》，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军事预测，他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四川和“川军(泛指驻屯在四川的军力——引者)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最后长城”，当时仍处在保卫武汉的全国呼声中，陈则说“万一不幸，武汉

①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3页。

②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486页。

③ 尉素秋《我对陈独秀先生的印象》。

④ 台静农《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转引自《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2期。

失守,在经济上、文化上,也只有四川能够领导云、贵做复兴中国的安哥拉”^①。后来确实证明四川最终成了国民政府的抗敌中心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接收大员像蝗虫般地下山,飞向全国,在发了国难财之后又发胜利财,败坏了国府的名声,撕裂了两党合作。

一九三八年重庆时期的陈独秀已经远没有当年振臂一呼的土壤和气候了,文章和口才救不了他夹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尴尬局面,靠北大同学会的接济和柏文蔚、潘赞化、邓氏一族以及别的朋友们的资助,开始时生活能过得去,却不能使处在政治困境中的他有丝毫的自由感。过去一般都认为陈独秀离开三大蒸笼之一的重庆是因恶劣气候条件不利养病和窘迫的经济所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碍,主因仍然是迫于难于启齿的政治夹击使他离开抗战政党中心和政治中心,躲到江津县,他是被无情的政治抛弃的,曾借李白诗以自嘲:“问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②

搬到江津是当时在江津县里开延年医院的邓仲纯的邀请。读者必定记得一九〇七年陈独秀第三次留日住东京神田区汪寿馆的两位朋友,一个是苏曼殊另一个就是邓初(仲纯),他是东京帝大医科学生,较之大名鼎鼎的花和尚曼殊来说,这位医生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履痕,为使读者记住这位晚年陈独秀的挚友,我们报一下邓初的出身。他是晚清著名书法大师邓石如的重孙,二三十年代曾有很高声誉的美学家,“南邓北宗(白华)”的邓以蛰是他的同辈,这么一攀不仅使读者记住了也明白了陈独秀在江津当寓公继续他那“实庵字说”时与友人谈谈诗书画印,还是不乏鸿儒雅风的,然而他天生是以天下之忧为己任的政治家,也就不得安生了。陈独秀在江津虽被冷落却并不拥有自由,据曾是北大学子的江津县长黄鹏基与同学龚灿滨探望老师归途中黄向龚说:“陈先生是受监视的,重庆方面常派人来侦察他的行动”^③云云,中共方面是否注意陈独秀在江津的行踪,没有资料。根据中共中央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中说他逃到武汉后“在党外去寻找反党同盟者,他的会见陈独秀,当然不是偶然的”^④,以及不久前才“衷心赞同”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国内

①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488页。

② 李白《山中答问》,在石墙院时抄赠前院主人的友人罗务滋。

③ 本节叙述陈独秀晚年生活状况主要资料是《陈独秀晚年在江津》(史折),《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和《飘零枯叶度残秋——陈独秀在江津》(黄永盛、王亚非),《石墙院调查报告》(靳树鹏,油印资料并配有图片),《酒旗风暖少年狂》和《〈早期三十年教学生活〉(杨亮功著)读后之一》(台静农),《陈独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郑学稼)以及陈松年回忆资料,何之瑜关于陈独秀逝世的详录,高语罕的回忆录等,除特殊情况,不一一另注。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第499页。

外继续大规模地反对托洛茨基派,加上托派正在筹办第四国际等等国内外形势推测,中共注意及提防陈独秀有动作,决不是武断的猜测。为使陈独秀摆脱困境,汪孟邹曾受上海托派及众亲友之托致信时任国府驻美国大使胡适,请他设法让陈去美国,未果。一九四一年将上任的广州中山大学校长的许志澄曾打算邀请陈独秀和陈钟凡同去中大执教,亦未果。陈独秀留下一首眷恋广州的诗:“江南目尽飞鸿远,隐约罗浮海外山。曾记盈盈春水阔,好华开满荔枝湾”,表明他想去广州和对昔时广州的眷恋。

陈独秀搬到江津是一九三八年八月三日,在城厢内外住到第二年底,短短一年五易居处,初到时住在县东门内郭家公馆,不久迁入黄荆街八十三号延年医院后进邓宅,然后搬到邓燮康在县西郊的康庄别墅,复又迁到距江津三十余里之遥的白沙镇邓燮康的叔叔邓蟬秋老宅住了两个多月。江津时期的陈独秀完全落入了无人照管而成为世间之累,但搬家事还没完,出白沙后还搬到江津中学校长施怀清的鹤山坪施家老宅“延陵别墅”住了好一阵子后才搬到他告老的石墙院。在陈独秀全家未搬来江津之前,完全是依靠罗汉和邓家相帮。^① 罗汉一九四〇年五月死于重庆后由北大同学会就近请时在江津国立九中执教的何之瑜照顾,直到陈独秀去世及身后料理一切,尤其是整理遗著等文牒工作皆由忠心耿耿的何之瑜完成的。当时这一切又都是时任国府教育部次长的段锡朋的关照。照顾这孤独老人的全都是北大学生或再早的辛亥老人如柏烈武、章士钊、朱蕴山、潘赞化、方寿远、沈尹默、明光甫、台静农、魏建功等,陈独秀是在五四余辉的温暖光照下强活了四年,如没有这一点,请恕笔者说一句气上心头的话:还不如关在国民党监牢为佳——那儿虽然失去人身自由却不遭饿饭之虞,况且监狱只能监人的行动却监不住人的思想!

离开重庆后的陈独秀还活了三年九个月逮四个年头,江津只一年,我们之所以要详考江津五易其栖身之处的原因是那些个日子里陈独秀不寂寞,朋友是不愿忘情于他而常来问寒问暖并带些解燃眉之急的钱物,国共两党是怕忘记他,一怕他再“胡闹”二怕他被对方拉去。下面先谈后者,留下温馨殿后,免得越写越凄苦。

抗日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一九三九年,中日“两国四方”都发生战略变化,日本是继续采取战争恐怖巩固已占区和蚕食国统区,再就是利用南京汪伪政府拉拢国内的主和派、战争悲观主义者以及暗藏的汪精卫派,散布“和则存,战则亡”,如今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必定会记得汪伪政府一度被叫做“和平政府”,它的那支臭名远扬的军队亦叫作“和平军”,实际上是与日军共同扫荡中国军队侵吞土地,尤其是江浙两省协同日军扫荡新四军和中共抗日游击队,以图永远奴役中国建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

^① “邓家”指留日老友邓初和江津望族士绅邓蟬秋、燮康叔侄两家。二邓因攀同宗而化邻为亲。

中的“速(议)和”产生的政治效应形成战略相持的“和平阶段”，制造摩擦，使国共合作产生缝隙。中共方面则坚持“战则存，和则亡”，一方面继续争取战场主动，利用游击队干扰敌战区，开展“锄奸运动”，与此同时则在党的报刊上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发言中提出“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到底！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国共合作精诚团结！”^①以明中共坚守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信谊。

在这种既热火朝天又异常复杂的政治大背景中的陈独秀却处在频繁搬家、生活困难、身心均疲惫的困境，如果说一九三八年是他大张旗鼓投入抗日宣传的光辉的一年，如今却被迫疲于奔命而无暇顾及时局，因此他那支犀利的笔竟然熄火！“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山似火红。闲倚柴门贪晚眺，不觉辛苦乱离中。”^②这就是刚满六旬的五四老人一九三九年凄凉一景。真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忽然国共双方对各自都认为是叛逆而被轧在柴门孤立的老人热乎起来。先是中共驻渝代表董必武“以个人名义到江津去看望”^③陈独秀，这位中共一大代表面对前总书记谈了些什么，没有记载，若记起去年三月十九日他曾与叶剑英、博古联名发表公开信责令陈独秀与罗汉“必须坚决反对托派的理论和行动”，估计彼此都不会有什么结果，亦谈不上“美好回忆”了。另有记载周恩来曾到江津看望住在延年医院时期的陈独秀，也就是一九三九年的一二月间^④；周访陈可谓规格高矣，据朱蕴山回忆：“那时王明问题已经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对陈是宽容的；但陈独秀的思想还停留在抗战初期受王明排挤打击的状态中。”显然把不愿去延安责任推在陈独秀的偏见上，但是真相如何呢？据吴亮平回忆：“当时党中央想把陈独秀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因为他毕竟当过几届总书记。”周恩来本人无访陈的记载，从朱蕴山和吴亮平的间接回忆则显然是矛盾的。怎么看待？当然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体现党的政策，也即是说诬陷陈独秀是汉奸的是王明，现在“王明问题已经解决”了，应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宽容”。明眼察之，“宽容”对被宽容者是不平等的，是“宽容”他的托派罪逆？还是“宽容”他的日特汉奸罪逆？我们这么发问，并无恶意，政治斗争本无个人恩怨可言，况且我们一贯本着唯物主义的治史观，首先是要把个人的思想和行动放在历史大背景中，究其目的，周恩来访陈独秀决不会是他的个人同情心使然。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虽然“解决”了王明问题，改组了长江局，但是毛泽东在为六中全会作的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集第143页。

② 《书赠同乡胡子穆》，胡是获巴拿马赛会金奖的“酱油大王”胡玉美后裔，曾与陈独秀同赴日本留学，晚年同在江津对陈有所照顾。

③ 史折《陈独秀晚年在江津》。

④ 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5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此事笔者未见别的资料，周访陈的日期是由笔者据陈独秀丧母百日不理事的常规推断的。

《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号召包括“第三党、国家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派，或其它任何集团，任何党派”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仍把托派作为“锄奸运动”整肃的对象之一。^①周恩来作为本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驻渝的首席代表找陈独秀到延安去的“宽容”，能除却托派是“锄奸运动”对象的毛泽东的决定吗？读者也许会说，那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周访陈是一九三九年，政策可能有变。其实不然，抗战二周年时，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博古和刘少奇在纪念抗日二周年纪念文章中仍然坚持反托，而且对托派性质加上了更具体更有时代感的恶谥：“汪派托派”。确认其是“民族危害分子与反共死硬派”^②之一，这是博古的文章。继王明后任长江局书记的刘少奇的文章则把“加紧反对汉奸托派汪派”作为“全国军民及一切爱国党派必须洞察”并予以粉碎的五项重要举措之一。可见周恩来访陈援以“宽容”确如吴亮平的老实话“把陈独秀弄到延安去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陈独秀一生从来没有“胡闹”过，其所以“闹”错了那是政治失算，认识跟不上社会革命。下面所述一事更足以证明陈独秀有理由耿耿于怀。直到一九四〇年，陈独秀仍在致友人信中指出：“示函云：‘恩来昨日来蓉’，不知是否周恩来，兄曾与彼接谈否？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理，然亦为群小劫持，不能自拔也，彼等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致，甚无理取闹”^③。还需要再唠叨什么吗？

中共如此对陈，国民党呢？一九三八年四月逃到国民党的张国焘曾向蒋介石提出设法利用关系把陈独秀弄出来“扩大对付延安的宣传，是有力的武器之一”。于是就发生了蒋介石得意门生之一的胡宗南和军统头子戴笠微服访问陈独秀的决定。^④事前戴笠曾向周天廖、梁干乔等前托派军统反共智囊人物作极周密的计划，携带九位知名人士为陈独秀辩诬的署名公开信去访陈。此计划经蒋介石亲自批准，考虑到戴笠回忆中的陈独秀言论对他晚年的思想言行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摘要披露如下：

戴笠回忆道：“我与宗南最后商量结果，准备了水果、茅台酒等礼物，微服到江津白沙镇去访问陈老头……陈对我们之去是出乎意外的……他慢吞吞地表示，‘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问来意如何？胡将一年前的那则启事剪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第620页。

② 博古《抗战两周年献词》和刘少奇《巩固团结粉碎敌人阴谋》中的引文，见《党的生活》合订本第85~88页，上海市档案馆编辑出版。

③ 据笔者推断，周恩来可能没有访问过陈独秀。写入注解，存疑。

④ 此事详情见沈醉、文强《戴笠其人》第207~21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8月版。本文所引陈独秀言论是未经删节的原话。

报取出来送给陈看,并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都不平则鸣。……今天特来求教,请陈老谈谈对国事的看法。’接着,胡宗南发表了一通欧洲战场形势:值兹二次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在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敌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

陈独秀沉默了一会儿又看了看坐在座的高语罕——高夫妇当时恰在白沙常伴在陈左右,发表了如下见解:

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而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要求。

戴笠对陈独秀的“言及世界局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

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胡、戴匆匆告退即返重庆向“校长”(蒋介石)汇报,据戴笠回忆:“校长说,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共产党内连这样的人容不下,难怪张国焘要逃走。”

不必怀疑戴笠回忆的真实性,因为确实是陈独秀晚年的思想,既爱国忧国有可取之处,又有明显的谬误。思想则被整肃得情绪老处在亢奋状态而时出乖谬之言。

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
病如垣雪消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

斩爱力穷翻入梦，炼诗心豁猛通禅。

邻家藏有中山酿，乞取深卮疗不眠。^①

诗是会写的，亦自知残年无多，但他的性格，能通禅入定心如古井吗？酒虽不拒又何来酒资？如此处境却仍然脾气耿直乃至冥顽不灵，关心时局且仍主张石硬。与胡、戴的谈话道出了他的克制，如若真要公堂对簿控告王明、康生等辈以诽谤罪，那可够延安方面收拾的；也说出了他的忧虑：苏联败则延安无前途，这里既有偏见也有对延安仍受制于共产国际的苦衷的同情。

不少研究家们曾引包惠僧、邓仲纯等当年探望过关照过陈独秀的老人们回忆江津时期陈独秀已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普通一百姓了，果真如此？笔者始终不信。一九四〇年二月初陈独秀因牙病去重庆住入宽仁医院疗治，章士钊去探望多年不遇的老友。从生活上说，当时一个是靠少量稿酬和友辈接济的瘪三，另一个却是国民参政会议员阔佬，但章士钊反倒说：“你很好，我像小瘪三！”记录此事者说：“仲甫为追求他的理想，垂老入狱”，“章士钊则一失足，便掉进泥坑而不自拔，‘小瘪三’是自嘲，也是对老友谈真心话”^②，英雄，毕竟是英雄。这一年八月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莫洛托夫与希特勒交谈，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杯觥交碰，此事至今仍被史学家视作同盟国苏联外交和斯大林的失策，争论不休。后来陈独秀曾在致他人的信中抨击此事，晚年他把斯大林和希特勒，苏联和德国拴在一起无原则的痛斥，皆于苏德条约有关，但在当时他却不发一言，只是借诗句发泄情绪而已：“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旁行越郡国，势若吞舟鲸。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黄金握在掌，利剑腰间鸣。二者唯君择，逆死顺则生。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营。”真是愤怒出诗人，但诗中他也以过来人拳拳之意勉励后生“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③。此诗写毕，黯淡的一九三九年终于降下帷幕，但且慢进入一九四〇年。还有一件大事得叙述一下，就是上海托派李福仁等尽管反对“老机会主义者”陈独秀，但仍然服从托洛茨基的意见设法让陈去美，把托洛茨基六月二十五日的信交给了时在香港的陈其昌，嘱他亲自去江津找到陈独秀协议此事。陈其昌取道广东、湖南等省历尽千辛万苦和通过沦陷区的危险于一九三九年初终于踏进陈独秀家门，一九三六年陈其昌写信给鲁迅使当时在狱中的陈独秀大光其火，如今见到这位被托派呼之为“大哥”的老实人，应当别有一番至深至爱的情分，使困在穷乡僻壤的老人精神为之大振，使他在最后两年岁月写出了带有根本性质的几封信和几篇论文，被陈独秀研究家称

① 《病中口占》。陈独秀当时满身疾病，致命的是高血压，而痛苦的则是牙和胃，时常痛至翻滚、昏迷。

② 《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

③ 《告少年》。

之为“最后见解”，竟致形成单项研究课题。

陈独秀看了托洛茨基的信并在与陈其昌的交谈中了解到了出狱后一直无法知情的上海托派临委方面的情况之后，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回信。^①

这是一封无论对于中国托派，对国民党，对共产党等多方面的抗日决策都是极其重要的信件。首先，陈独秀毫不容情的狠狠地批判了上海临委对时局的分析和抗日决策上的极左政纲，“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在例举诸多极左行为后概括指出：“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对国内独裁者的共同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从中分明看出陈独秀仍然是支持国共合作抗日的，陈独秀还深刻地甚至是沉痛地指出中国托派掌握在如下一群人手中：

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起参加抗战，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释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讽“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同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

在这段批判——如果我们把陈独秀仍然作为托派领袖那就等于是自我批评——中，假若中共能放弃偏见，看到陈独秀在明显地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赤诚之见，也许嗣后接踵而来的董必武、周恩来，以至于完全倒向中共的朱蕴山等等民主权威探望陈独秀会产生积极的效果，说服他去延安是不可能的却能使孤立 in 江津的陈独秀调动起来对于全国民众，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国民党内接受过五四洗礼和陈独秀教泽的文官们，起到从内里促进国民党民主抗日的积极作用。陈独秀的信是写给托洛茨基看的，当然没有期望于中共，却大失所望于他为之背尽黑锅的托派：“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话还有不少，但笔者写到这里已经感觉莫可名状的沉重，把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视为中国托派领袖的一份特殊的遗嘱也不为过；尤其是下面这段话：

^① 全信作为附录载《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6~79页。引文不另注。所引托洛茨基致李福仁信见第75页。

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的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那么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

托洛茨基是位老练的政治家,他接到陈独秀信并没有急于表态,回信李福仁说:“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的分歧”,表示一时之间很难弄清陈的“严斥是否正确”,但确认陈独秀的意见“在本质上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李福仁、彭述之根本不听托洛茨基同意“老朋友”的意见的意见。只是从这个狭窄的意义上,一九三九年的陈独秀才不能被算作是中国托派组织的领袖,或者可以称他为中国托派的精神领袖的罢。

一九三九年还有一件使陈独秀陷入悲痛的是继母谢氏的死,按传统记事她于己卯二月初二日(三月二十二日)寅时仙逝,谢氏生于一八六二年享年七十七岁。^①据松年回忆“在逝世前的一段较长的时间,祖母双目失明,吃饭都由父亲亲手送给。祖母逝世,大姑母一定要为死者披麻戴孝,守灵等尽孝仪式,父亲是顺从了的”。也许有人会生疑:陈独秀是新派人物,其所以披麻戴孝乃出于对大姐的顺从,是被动的,不,意识形态上的反孔,“非孝”,并不等于在形式上横扫一切,六亲不认,这应当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陈独秀发自内心的孝远较松年回忆为甚。在致杨鹏升信中曾写道:“先母抚我之恩尊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酬应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②,诚心“丁忧”,一九三九年之无文于此亦找到了一个原因,根本不是什么思想低谷。正因继母死于三月,可以考出董必武、周恩来相继来访应是本年第一季度,说中共方面是在探得陈其昌一月访陈之后即遣“周董”往访,免得他继续“胡闹”,也非武断之见。至于国民党方面访陈应是在七月之后的事了。

江津为川中长江沿岸风景秀丽、富庶而又繁华的“江中要津”,当时有大批安徽流亡师生集聚在国立九中,佛学研究的支那内学院巴蜀分院亦在城内,院主欧阳竟无精通佛道,对书法碑版法帖有特殊研究,先后两任县长黄鹏基和罗宗文皆北大学生,不仅对陈独秀私下有所照顾,亦是谈谈的儒生。白沙镇亦沿江繁华之地,那儿有邓

^① 关于继母谢氏,现已查明她原来是陈衍庶辛亥卸任后在北京琉璃厂他投资开设的崇古斋闲住期间的续弦,谢氏原本系清季宦官之后出身亦算名望,据调查者说谢氏贤慧,善于处世,治家亦精明,乃陈家最后一位金字塔顶人,可惜也未能为衍庶留后,见陈重远《陈独秀家开崇古斋》《大成》第231期。崇古斋开业于1904年,一直营业至1956年公私合营。

^② 《陈独秀书信集》第481页。

蝉秋义举的著名的聚奎中学，邀陈来江津的邓仲纯亦是台静农私谊甚笃的老友，当时已是“伟岸长髯，用红线绳扎起，戴僧帽有江湖道士气”的柏文蔚亦时来江津，另一留日挚友潘赞化一度任职九中，重庆方面旧朋新友章士钊、沈尹默、魏建功、许德珩、薛农山、杨鹏升还有若干仍尊其为师的国府新贵朱家骅、傅斯年、段锡朋亦不时来信来访，友人畅谈古今风雅，亦不露声色地予以经济资助，多少使这位被无情的政治轧出本应属于他的地位应得的环境的孤独者能以在美好的回忆和友谊的温馨中摄取生命延续必不可少的雨露。……“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依然深感寂寞，见此诗者注云“毕竟‘烈士暮年’，另是一种境界”，但是在江津，在白沙还不算过于寂寞，总还是有与三五旧友把酒论当世的愉快，而当搬到鹤山坪施家大院继又住入石墙院，可真是死一般地沉寂了，这，不只指的少有人来问寒暖或抒发胸臆，人亦在孤境中产生了精神上的落漠感，“除却文章无嗜好，也无朋友实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加上此时微薄的稿酬、北大同学会的贴补等经济来源已经抵不住物价上涨，大有饿饭之虞，其实陈独秀是不至于如此的，这就与他坚挺的性格和顽进的信仰有关。凭陈独秀的名声和关系，钱，在他还能成为问题吗？翻翻当时他给杨鹏升、郑学稼以及别的友人的信件可证明他一再拒绝来路不明的“嗟来之食”。但有一件事，实在使笔者也不敢恭维其“迂”：那就是《小学识字教本》的出版。当此书尚在成稿之中，经多位友人的推荐尤其是台静农和魏建功的努力，教育部国立编译馆先后两次共拨一万元作为稿酬预支，但因陈立夫希望改一个书名（怕研究文字学的古称“小学”与今之小学生之小学有混），陈不允，“若教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①，结果当然是两败俱伤：陈是书未得出版，教育部因此而没能得到一部有价值的文字工具书，稿费也就躺在那儿分文未动。后来达成协议由时在江津的编译出版所印刷厂油印若干册，终于留传了下来。

这可应验了俗语“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潘兰珍苦矣哉，为解决生活，她甚至在院子里种植菜蔬以解伴饭下咽之餐佐。就在此困境下进入一九四〇年的陈独秀奇迹般地发生了又一思想探索的高潮，真是“且喜疏狂性未改”。先得交待一下最终选择石墙院的事。

某日，陈独秀闲逛江津市肆在冷摊上买得杨鲁承读《皇清经解》的手稿，第二天与邓蝉秋叔侄茶馆闲话中谈到此事，始知杨鲁承是清朝进士，于生前著作不辍，大撰手稿不及整理就去世。邓又将此事传给了杨家第三代传人杨庆余，他慕陈独秀的学养，遂邀请陈独秀住在杨鲁承旧居石墙院编整修订遗稿，时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底，一代“思想界的明星”暮年穷落到为一个屋顶被迫去整理他认为“并无创见”的古老书文，

^① 1941年9月19日致魏建功信，《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583页。

实在是末路了。在这之前之后他曾多次想离开江津离开当时中国两大政治中心之一的四川，一是想回老家重操旧业：“一九三九年七月间，仲翁有信给大叔，有东下的意思，他想去重开芜湖科学图书社”，也许“想过文章瘾”，也许只想“卖卖铅笔、墨水、信封、信纸来，很有味，又可以解决生计问题，糊口了吧？”^①次年八月二日破烂的家竟然遭窃贼光顾“窃去衣被等十余样”，这个贼也该倒霉，他不知这穷措大是国府特殊关心之人，不久破案衣被等追回，“惟失去先生在武昌为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未出版之草稿，甚为可惜”，亦未追回。这时他又想“移居赤水或江安县城居住”^②，甚至请友人在上述二城找关系以备方便，临逝世那年还曾因四川生活费用过昂想迁往贵阳，但一切的一切均成泡影。

陈独秀一生可谓有三大阶段和两大争议热点。三大阶段是：一，五四运动；二，创导中国共产党；三，成为中国托派领袖。两大争议热点，一是用托洛茨基理论实践中国革命的功过，或者不说功单说过；二是晚年几篇论文和几封信件中所阐述的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陈独秀的“后期见解”一般指的是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日《给西流等的三封信》到写于临死前半个月——五月十三日的论文《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笔者以为这项研究的内容还应包括到武汉不久所作《给陈其昌的信》和一九三九年《致托洛茨基的信》。“后期见解”的研究框架，是由当时在上海的何之瑜、郑超麟等托派提出的，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出版了《陈独秀最后的论文和书信》一书，确定了“后期见解”的四篇论文和七封信。此书由亚东图书馆汪原放送给了胡适一册。据胡适日记，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三日，阅读此书并写道：“深喜他晚年大有进步”。四月六日胡适在上海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永别大陆，在航行途中他为陈独秀此书写了万言长序。序尾记有：“一九四九，四，十四夜在太平洋船上”，四月十六日抵达美国，即将此书寄往台湾出版，书名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集）》^③，遭禁。二十年后，一九六八年台湾王家出版社出版了《陈独秀自述》（增加《实庵自传》和陶希圣的半研究半回忆《记独秀》^④），这个版本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的是胡适的长序扩大了陈独秀“最后见解”中崇尚资产阶级民主与法治部分对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作用。我国的读书阶层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者是直到一九八〇年才发行了广义（即包括陈出狱后抗战文章和部分书信）的后期论文集。^⑤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不能不

① 《回忆亚东图书馆》第200页。

② 《陈独秀书信集》第501页。

③ 无出版单位。

④ 台北王家出版社1968年3月20日初版。

⑤ 张永通、刘传学编《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认为是不利于陈独秀革命形象的媒介局面呢？笔者只能说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政治折射，我们换一种方式予以研究。话从“揭短”说起，陈独秀“后期见解”中具有强烈的反苏反共意识，以《我的根本意见》为例，此文以油印本^①分寄上海托派和几个朋友，立即得到反共分子的认同，郑学稼在读此文后认为陈的思想“超过托洛茨基，因为，托氏把一切罪恶归于斯大林的官僚统治，而未了解百病之源，在于共产党专政”^②。陈独秀在回信郑学稼时首先指出此文系“乃为托派（国外以至国内）先生们的荒谬见解而发”，因此“不免为外人所误解”，他语出惊人：“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这不比国民党说个没完的“马列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的老调子弹得还响跑得还远吗？的确如此：“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论理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话到此尚未了结，接着还说：“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评论他们都用科学的态度”。一九四〇年陈独秀的政治态度“科学”到了把共产党与纳粹合而为一，是不是中了希特勒纳粹叫“德国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党”（德国国家社会党）的邪魔？实在令人费解。他还说郑学稼来信中的“‘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之说，不禁拍掌大悦”^③，简直不敢相信其出自陈独秀手书，但是因此而判定陈独秀此时已“堕落为反苏反共反人民”的三反分子，也是不对的，此话恁说？

太复杂了，我们又为本传找了麻烦，但既然是争议热点，又因胡适的权威介绍致使影响深远，就得予以阐述。简单说来，陈独秀是被苏联肃反的“红色恐怖”（一九二八—一九四〇）时代一系列破坏党内外民主，无视国家宪法和法律，滥用专政手段，以及中共把他及他一派诬陷为日特汉奸等轰毁了对于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的信任，又因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最后轰毁对于苏共党及其政府的信念。他恨的是“伯强”，但把产生“伯强”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归结在列宁的政党理论和实践上，因此他连列宁和托洛茨基全都怀疑起来，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三大来源）理论则坚守不渝，他在给 Y（何之瑜）的信中针对 H（胡秋原）的误解，指出“H 等希望我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陶孟和也是如此），乃彼辈一向之偏见，不足为异”^④。反列宁而仍在马克思主义圈子内，不矛盾吗？这就涉及到无产阶级的民主和法治问题。如果陈

① “最后见解”中除了《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的前半部分曾在 1942 年 3 月 21 日见诸《大公报》外，当时未能全部公开发表。现除上述版本外，全部收入《陈独秀著作选》第 3 卷。本节全部引文皆据此版。

② 郑学稼《陈独秀传》下册第 1352 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89 年 3 月初版。下引陈独秀回信亦同。

③ 致郑学稼此信亦被编入《陈独秀书信集》第 521 页。

④ 《陈独秀书信集》第 513 页。

独秀“后期见解”是一个整体,其中心思想就是关于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态度,是批判继承还是全盘否定,在陈独秀来说是前者,而列宁和托洛茨基尤其是斯大林(还涉及六届二中到六中全会期间从李立三到王明的中共)是后者。他曾惋惜地指出:“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L、T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①应当承认陈独秀对列宁的评价有正确的成份。就历史,加上一九二七年起十年间中国陷入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封建王朝统治妨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与法治的建立,于是陈独秀再次提出“我们不要怕资本主义”的口号,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这最突出的表现在那份资产阶级民主与法西斯专制的对照表上——

(甲)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派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允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绝对不允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真为陈独秀捏一把汗! 迩来在研究陈独秀的著作或“后期见解”的文章中都认为他已经远离马克思主义,最温和的批评也说这位前中共总书记在四十年代又回到五四时代,以证其思想之落伍。实际上不是陈独秀走回头路重复五四理论,是当时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局面恰恰可以列入表乙的国家之内:人民没有选举权,更提不上政治权和为求生存而与资本剥削进行罢工之权;一党专政的国府对中共及进步力量的迫害亦实足证明了东厂统治的白色恐怖延续到了民国,一切都证明中国在呼唤五四运动的德先生再次莅临。至于把苏联与德、意法西斯并列当然是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连托派都因之而唾弃他,仍然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但也不必讳言,苏共在斯大林领导下确实存在表乙中指出的违反民主和法治的弊端。顺便也说一句,陈独秀的这张表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的分野,当时作为同盟国之一的国民党也是反对的。除了戳

^① 《给西流(濮德志)的信》,《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553~558页。信中提到吴季严、赵济、王凡西等,因此可以视作他对托派的建设性意见。下面的“表”也在此信上。L、T指列宁和托洛茨基。

到痛处,还主要在于:不论斯大林直到德军兵临城下还在红军中展开消灭“红色拿破仑”图恰切夫斯基元帅的恐怖运动,犯下了战前最后的残杀异己的罪孽,但他仍然沉着坚定地在东部战场上以空前的战略智谋和绝对的指挥权力赢得了直捣柏林的胜利,与盟军会师易北河,然后又配合美英军队的太平洋战争,出师亚洲穿越中国东北迫使日本投降,结束亚洲战场,使二战终于胜利。斯大林战功不可轻易抹掉,但是陈独秀因早逝未能经历。

时至今日每一个具有推动人类社会向民主自由幸福方向发展的有识之士都应从表甲列出的五项资产阶级民主与法治的原则反思,应当有勇气吞下这个苦果!

托洛茨基曾经说过“陈独秀不是理论家”^①,本传在一开始涉及陈的政治思想时也指出他不是理论家而是政论家,郑超麟曾说他有“敏锐的触觉”,触觉这个词用得绝好,但是一个领袖靠“触觉”制订政纲和革命策略是不行的至少是不足的。理论家在任何政治局势和斗争形势下总能具有哲学上的坚定性和哲学家的“敏锐的触觉”——历史唯物论指导下的应变力,其稳定若研究自然科学的恒常定律。一九四〇年的陈独秀终于暴露出了他的哲学缺憾,用了机械唯物论或形而上学的判断方式:把现象看成本质,把特殊当成规律。不然无法解释他把苏联与德国意大利相提并论,把社会主义民主的不足(或被强权者强奸)等同于法西斯暴政。正是这极端本末倒置导致他最后抉择欧洲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之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同意说他回到五四,并以崇尚法国大革命思想的革命家的局限而逝世。假如非要认为这是陈独秀的悲剧——不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而死,那不只是他个人的而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封建官僚(土地私有和一党专政)和列强殖民统治双重压迫下畸型发展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带来的摆脱不掉的阶级缺憾的悲剧。宽容些,成败可以不计,形成“最后见解”的思想动机,值得认真作规律性的研究。人们都知道陈独秀晚年恨极了斯大林,但他懂得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可以称霸一时,最终还得归顺(或逆)历史潮流。他曾经多次说过“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那么何是“原罪”?陈独秀答之曰:摧残民主。苏联之所以产生斯大林,关键在于十月革命后“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陈独秀对于产生民主的历史的认识是非常可贵的:“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

^① 《郑超麟回忆录》第125页。

史大林所做的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①轻视民主,践踏民主,一切由一个人说了算“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正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②,确实值得“我们反省”。陈独秀更认为“近代民主制……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五四运动先则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继则引进社会主义,这三大天才发明接踵而来,可惜的是以俄为师的中国,没有接受“十月(革命)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的教训,于是我们想再为先后引进三大天才发明的陈独秀说一句:不要再“孤立”他了,为他松绑,让他从高加索山上下来吧。

陈独秀语出惊人的两年是极端苦难的两年。他,一面要为杨鲁承整理遗稿,一面要完成中国文字研究,一面又不甘寂寞写指点江山关心世界大事的文章,前二者是为生存需要,后者是政治家的毕生追求,一面钻故纸堆,一面研究新问题,人被撕裂了,精神亦在新旧交感研究中分裂,他的肉体承受力已到极限,“独秀晚年患血压高,经常不食盐,犹能深思著作,完全由精神支持。尤其是血压过高时,不能伏案执笔,则不吃东西,硬将血压饿下去。乡间无医无诊,只此一法,如是者不止一次”^③,未知咱们的读者看到这儿会震荡一下不?

一九四〇年陈独秀还遇到两件刺激他情绪的事即蔡元培的死和大姐的死,前者国殇后者家丧,却同样震动陈独秀。蔡元培于三月五日默默地在香港去世,陈独秀立即满怀深情撰文哀悼,文中概括出蔡元培两大“令人佩服的”优点,其中之一是民主自由宽宏大度兼容并蓄的教育精神,“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④,只要稍微拨动思维即可解其说乃另有所指或者说这应是越出教育兴学而旁及政治家也应有此雅量。在这篇纪念文中陈独秀还认为五四运动应由蔡元培、胡适和他本人“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责任的人”,这当然不是标榜吹嘘而是责任所至的真言!陈独秀的《蔡子民逝世后感言》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的重要文献之一,难怪何之瑜,郑麟素把此文列入“后期见解”之中。纪念文发出,陈独秀情绪一直落在悲哀之中,“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

① 《陈独秀著作选》第3集第554页。

② 苏联二十年指1917~1937年。

③ 《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

④ 《陈独秀著作选》第3集第543页。

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①感情至深莫盛于此！但是蔡先生逝世的伤痕未抚平又增加新的伤痕——与他三十年不见而同从武汉到重庆又从重庆到江津，终因经济困难不得不被迫离别的大姐于六月某日逝世，陈独秀作长诗哀悼大姐伤夫后颠沛流离的孤苦一生，怀念了他与大姐最后一别，谈到他离江津迁往鹤山坪的情景：

今春还山居，余病静是宜。
姐意愿偕往，临行复迟疑。
送我西廓外，木立无言辞。
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
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
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

真是景情交融声泪俱下，陈象五儿女四个“惟余为少焉”，至今他成了“老大”，却也在强活中候死。

也许读者会奇怪，这一年八月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身亡，应当对陈独秀有所震惊，但一点也没有，他没有在日后的论文中提到此事，也不见有人回忆陈有关托被刺的片言只语，这也很能理解，因为批判列宁和托洛茨基无视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后见解”正写在托洛茨基被刺后不数日，也许，这正是陈独秀告别托洛茨基的遗言罢。^②

一九四一年是全世界人民遭受法西斯全面摧残的一年，以六月二十二日德军全线入侵苏联开始，以十二月七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结束这血腥的一年，当然也是盟军和全世界进步力量开始全球战略围剿德意日东西法西斯的一年。贫病交加生活狼狈不堪的陈独秀竟然唱出：

孤桑好勇独撑风，乱叶颠狂舞太空。
寒幸万家蚕缩茧，暖偷一室雀趋丛。
纵横谈以忘形健，衰飒心因得句雄。
自得酒兵鏖百战，醉乡老子是元戎。^③

这是醉醺醺的狂言？还是“元戎”发自内心之言，壮志未酬壮心未已，有谁理解？

① 《陈独秀书信集》第493页。

② 托洛茨基被暗杀身亡于1940年8月21日。

③ 《寒夜醉成》。

一九四一年因病得厉害又因迫于生活而钻故纸堆加紧整理杨鲁承遗稿和《小学识字教本》，完成了《杨鲁承先生读〈皇清经解〉手稿》和《杨鲁承先生遗作六种》，总算没白住石墙院。但是就在穷到他帮潘兰珍开垦田园种蔬果苦苦撑持生活时仍然不接受他认为是不应得的钱；三月二十五日，郑学稼突然接陈独秀一封信内附五千元支票一张。五千元，当时是北大同学会月支助二百元的二十多倍，《时事新报》名义上主笔的酬金一百六十元的三十多倍，不是一笔小钱，正可解燃眉之急，但他却退还，据郑回忆，“当局知道陈穷困，由朱家骅先生赠五千元，被拒。朱以为张（国焘）为陈友，又要张转”，陈独秀又拒绝并责怪张国焘多管闲事，不愿搭理，就信交郑学稼退还并写道：“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①。无论从旧道德新道德，这种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总是超越阶级超越时空受人尊敬的。一九四一年岁末一个严冬之日，陈独秀给欧阳竟无写了一首诗央人捎到江津面交：

贯休入蜀唯瓶钵，卧病山居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羨武荣碑。

但愿独秀先生真的“独羨武荣碑”，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此事被转诗的朱蕴山识破，就提了几只鸭子去石墙院看望陈独秀，进得门内，真是令人心酸，“见陈独秀胃痛得在床上打滚”，后来朱蕴山向友人回忆道：“当时他可怜得很，没有东西吃！”^②

陈独秀要用精神压倒苦难！

然而他已经没有多少活头了。

然而构成“最后见解”中的四篇论文中有三篇正是在忍痛挨饿中完成的。它们是：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被腰斩）

《再论世界大势》（被禁发）

《被压迫民族之前途》（被禁发）

对于上述三篇论文的批判或给予是非分明的研究是很必要的，而且这方面已不乏远见卓识的述评，我们只想大声疾呼，对于不惜矫枉过正语出惊人并语出伤人的陈独秀，笔者再重复说一次：宽容些，在陈独秀带刺带钩的话中吞下不民主一言堂作孽历史的苦果，庶几才能结束“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局面，造成良好的民主和法治的社会风气。在陈独秀深思熟虑而形成“后期见解”之前曾说过：“我不懂得什么理

^① 《陈独秀先生晚年一些事》，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

^② 《飘零枯叶度残年》。

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说不错又不对的话。”^①“我在此发表的言论,已向人们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读毕这个“人”的心迹,似乎不必多说什么,只指出一点,就是在时过境迁的当今再研究这三篇时评,只要在总的原则上把握住:一,批判陈独秀把两种不同制度、不同主义、在二战中又是敌对的苏联和德国意大利统统说成法西斯专政的“乙方”,在此大原则上大前提下;二,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由于对资产阶级民主中理应被无产阶级专政继承和吸收的部分作了彻底的否定,因而产生一言堂专制独裁、领袖欲、无限扩大专政功能而视民主为敌。吸取这一惨痛的教训,那么,我们是能够在“最后见解”中获得有益的政见,至少是可以使我们免蹈前苏联覆辙的教训。对于“最后见解”我们已经说得不少了,且引下面这段话就更臻完善了:

我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较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它的唯一前途,只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②

不发达国家的团结互助,不结盟运动,联合国协调国际争端,防止战争狂人再起……孤立既然没有前途,那就打开世界之窗!终于发现陈独秀的遗言还是有其生命力的……话,讲得太远了,而如今——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写毕上引这段话后的陈独秀躺在床上痛得打滚,用桌角顶住胃以止痛……我们不忍看他,把眼光往别处扫,环顾四周,上面是晴天见亮雨天漏水的瓦顶盖,连个天花板也没有,下面是始终湿漉漉的泥地,连块地板都没有,大雨滂沱屋里屋外雨水流淌自由自在,人却只得缩在一隅静听雨声,三间小屋谈不上像样的家具,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板凳,最富有的是书,满满的书柜满满的书籍,满地堆积着书报……书桌正中在展开的白纸上有一个字:

抛

陈独秀在写毕“最后见解”的最后一篇论文,即欲加紧完成《小学识字教本》以换

^① 《给陈其昌等的信》,《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431页,下同。

^② 《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同上书第3卷第604~608页,引文在605页。

米粮,不巧也巧,巧也不巧,正好写了这个“抛”字,一病躺下不起。

说起陈独秀的病及死,早在一九四〇年,北大同学会在江津为陈独秀延名医会诊,医生检查后说“陈独秀的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否则活不到三年”^①;但却活了三年,这主要是邓仲纯的延年医院以及与他关系密切的重庆宽仁医院的医生们悉心治疗,潘兰珍的精心护理。上海托派临委李福仁、彭述之等虽然一再非难陈独秀,但王文元、郑超麟等对陈仍然十分关切,他们根据陈独秀来信中提到的病情请“上海的一位相识的医生给他处方,并寄送一些内地无法买得的药”。上海方面得到医生对陈独秀病的结论与四川相仿,认为“是随时可以发生意外的”^②。在正规医疗的同时,陈独秀亦接受一些民间单方,作辅助治疗,如他曾接受建议用玉米须须泡水喝以止血压,后来又说蚕豆花晒干后泡水喝能奏效,他亦认真服用。总之陈独秀在石墙院如此困境下还活了两年又九个月,终于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七日躺倒……应验了“抛”字的潜意。

迩来关于陈独秀石墙院生活状况和病情调查报告,有江津地区等官方调查,有研究人员的采访记录,有文人据各自感兴趣的资料“做”成的报告文学,当然还有当地老乡捐献出保留下来的陈独秀遗物和朴素的记忆令人感动不已。比我们早约摸二十年,台湾方面如今健在的陈独秀当年好友或当事者亦在回忆或开展研究,凡是这些都使笔者记得郁达夫的一段哲理深邃的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③比照之下,对陈独秀的回忆、记录和调查研究,证明经过大劫大难后的中国开始懂得了尊重伟人而大有希望,至少脱离了“奴隶之邦”的不体面的禁锢时代。然而一切都得有个认识过程,尤其是像陈独秀这样简直是铁板钉钉的叛徒、“托匪”,对他的认识,更应有一个相对冷静的收集资料、筛选资料的初级阶段,然后才可进入研究,现在倒好,从生辰八字到死了没有闭眼,什么都有了。但是笔者实在不敢恭维暴冷后的暴热;在暴热中出现的那些昏话那些拿肉麻当有趣的“报道”,是正确认识还是继续糟踏这位有争议的巨灵?干脆举个实例:

他们把一切收拾停当之后,人们才发现陈独秀两只眼睛还圆圆地睁着

……

潘赞化见状,俯下身子,悲酸抽泣道:“仲甫呀,仲甫,你还有什么不瞑目的?你这一生有光辉之时,苦难过,风尘过,已名垂青史,你就把眼睛闭上吧

① 《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

② 《双山回忆录》第269页。

③ 郁达夫《怀鲁迅》,《文学》1936年第7卷第5号。

……”然而陈独秀的眼睛依然不闭，潘赞化不得不用手把他的眼皮往下抹了又抹，直到他……^①

这种无聊的描写，真不敢相信其写的是一个反对宗教迷信反对封建礼教的伟人之死。真是俗不可耐，像是在写一个生前唠叨没完的老太婆的死！再说这么一位襟怀坦荡通体透明的人，有什么不能“闭上眼睛”的？闭了又是什么命运的象征？

当然经过严肃认真调查后关于陈独秀的死亡报告也是有的，但全部卷帖拢在一起其实性的资料皆未超过受北大同学会的委托照管陈独秀生活的何之瑜在丧葬结束后五天写的《陈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这是作为委托人向包括捐助治病和丧葬费用在内的经由家属同意向各界发布的公告性质的文书，全引如下以结束关于陈独秀的逝世“公案”：

先生素患胃肠症，四年前又患高血压，迄无起色，年来息影深山，生活不安，营养尤为不良。本年五月十二日上午用蚕豆花泡水饮半小杯（约十二日），腹胀不适，初闻诸医言，用蚕豆花泡水，服之可治高血压，今春不时泡服，虽未奏效，亦无损害。此次所服之豆花，采摘时遇雨，经数日始干，中有发酵者，泡服时水呈黑色，味亦不正，或系酸酵后含有毒汁，一时失机，因以中毒也。次日（十三日）上午，友人过访，午餐食四季豆烧肉过量，晚餐时又食，言食物作梗，夜不成寐，午夜呕吐大作，吐后稍适，仍难入梦，自后精神疲乏，夜眠不安，间服“骨炭末”，似觉稍适。至十七日晨起盥漱，顿觉头目晕眩，随即静卧，少眩欲奏厕，以头晕未果。午后七时半，强起上圜，即起晕倒，四肢僵厥，冷汗如注，约一小时许，始苏。少顷（九时）又复昏厥，约三刻钟，始苏，周身发寒，冷汗如浴，旋又发烧，约一刻钟，始复旧状。十八日清晨，先生遣人来告，乃约先生之公子松年及先生之至友邓仲纯医生上山探视（先生出函请邓先生上山医诊）；同时上函重庆周纶、曾定天两医师莅津诊治。因周、曾两名医年前曾为先生详细诊察病状，最为先生所信赖，时以先生病状甚危，又草以详细病历送重庆周、曾两医师过目，两医师虽医务繁忙，然莫不细心研讨处方，且各赠药品，而尤以周纶医师将其太夫人预防血压变化之针剂分赠，其情况尤为可感。但因先生所病实无挽救之方，故两医生均未能来津，于是数日之间，辗转床第，苦闷不安。至二十二日上午，又复昏厥，前后接连三次，虽经注强心剂苏醒，然病难治矣。二十三日又请江津西医邹邦

^① 吴晓《破屋春秋——陈独秀一家人》第27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

柱、张熙尧两医师上山诊视，施行灌肠，大便得通，然病情仍未少减。先生于二十五日上午命夫人约之瑜至榻前略有所嘱。二十七日午刻，先生乃陷于昏睡状况，强心针与平血压针交互注射，均无效验。延至晚九时四十分逝世。时除先生夫人潘兰珍女士、公子松年夫妇、孙女长玮、长琦、侄孙长文及邓仲纯医师与之瑜外，适包惠僧君由重庆来山探病，均亦在侧。先生之衣衾棺木与墓地安葬等身后大事，均承江津邓蟾秋老人及其侄公子燮康先生之全力赞助，始得备办齐全。而邓氏叔侄之古道热肠，诚令人铭感！先生灵柩乃于六月一日下午一时半安葬于四川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之康庄。

是年底，何之瑜全部办毕丧葬事宜后开列了一份《先生逝世前后用费收支》，以应家属、北大同学会和各界备查，录引于下：

收入部分

蒋先生 5000 元
 朱骝仙先生 5000 元
 段书贻先生 2000 元
 王抚五先生 2000 元
 许静人先生 10000 元
 余骥先生 500 元
 以上医药费
 蒋先生 5000 元
 陈立夫先生 2000 元
 许静人先生 2000 元
 胡小石先生 100 元
 金鸣宇先生 100 元
 欧阳竟无先生 50 元
 以上赙(殓)仪费
 总收法币 33750 元。

支出部分

医药 2496.50 元
 衣棺 11295.30 元
 葬费 2254 元
 修墓 9255 元
 招待 3631.50 元
 酬谢 2299.20 元
 工资 680 元
 杂用 3392.51 元
 整稿 2949 元
 总支法币 38253.01 元。

附注：

一、医药费由北大同学会经手转来，系先生卧病床第时所收受者。

二、赙(殓)仪费由北大同学会经手转来，系先生家属及同人等所领受者。

三、自先生病逝以来，由北大同学会经手转来医药费赙(殓)仪等费总共 33650 元，至本年十月间止，除金鸣宇先生寄赠赙(殓)仪百元外，并未必受任何方面赠与款项及礼品。兹收支两比，尚超支五千元，尚超支之数拟由北大同学会拨付外，以后并无其他用途，凡各方赐赠，概行谢绝。

四、所有收入详细账目，经先生公子松年与邓仲纯、何之瑜等共同审核如右。(三十一年十二月六日于江津)

[引者按：收入部分数字有误，已无法核实。又据传闻所收的医药费和赙仪费“蒋先生”名下的各五千元系蒋介石的赠和赙。]

这里可以略加诠释的是，一，病倒的当时何之瑜为陈独秀书稿事在江津^①，闻患病即于次日——十八日赶到，替换出潘兰珍去重庆延医并取回周、曾二医师所赠之药品；二，在这之前不数日包惠僧的妻子夏松云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带了段锡朋等北大同学集拢的三百元前去探望时已病入膏肓的陈独秀，夏松云回重庆后立即告诉包惠僧说陈独秀想见见他，包二话没说，第二天就赶往石墙院，“只见他安静地躺在床上，已经是弥留状态”。二十五日临终之前一刹那，陈独秀微睁开眼看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一九二一年他提议代表他去上海参加一大的包惠僧^②，但其时他早已脱党，时任职国府内政部为参事。包惠僧永别他的老师时见到唯一引起他注意的是院子里堆的一堆土豆并特别说明：“是陈独秀和潘女士种的”……抗俄运动义士，讨袁斗争元老，五四运动旗手，中共创始人，托派领袖，一堆土豆——还是自己种的！历史确实“抛”弃了他！

穷人是连死也死不起的，然而穷得只剩下一堆土豆的石墙院却别有一番景象——

当独秀先生患病消息传到城内时，邓燮康先生即偕周弗陵先生与(高语)罕下乡探视；探视之后，燮康先生即和我们商量先生的身后问题，未等大家开口，他便毅然一肩担去。回城后，四处奔走，寝食不遑。所有衣衾棺木等等都办得十分美满。中因棺木问题，

① 据《给 Y 的信》写于躺倒前四天，《陈独秀著作选》第 3 集第 611 页。

②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陈独秀评论选编》第 306 页。

几经变化,几经周折,至于舌敝唇焦,声泪俱下,卒底于成。蝉老年逾七十,息影白沙,一闻先生噩耗,便急遽来津,登岸之后,毫不休息,便马上赶至鹤山坪石墙院先生寓所吊唁。关于墓地,燮康先生早已慨愿以其大西门外桃花林边新建别墅康庄园地辟作先生墓地,蝉老又欣然力赞其成。同时,育才中学校董孙茂池先生亦代表育才中学慨然愿辟校中适当地区,迎葬先生灵柩,并愿在先生墓旁独立建筑房屋数间,陈列先生遗物其中,俾资观感。此等情谊,纯出天真,此等苦心,非可力求,不唯在近时浇漓之俗,成为凤毛麟角,即求之古人,亦属不可多觐!现先生墓地终于选定燮康先生之别墅——康庄,殆有夙缘,盖先生居津四载,其平素过从最密者,就江津士绅说,厥为邓家叔侄。先生曾数度与蝉老游桃花林……俯瞰大江风骚上下,流连不忍去。谁知昔时先生驻足游目之所,即其今日放足长眠之地!①

陈独秀出丧,虽不是地方大事亦震动社会各界,但生前左右不是死后亦被左右冷落,故而是纯民间式的平头百姓出丧。

身穿青丝棉衣裤的故人按安徽乡俗被裹在白绸中入棺。六月一日,灵柩从石墙院抬出到双石桥下船驶至鲤鱼石上岸,一路由潘兰珍、三儿松年夫妇及孙女长玮、长琯、长琦、侄孙长文扶柩,抬往康庄,参加送葬行列的有安徽同乡和双石小学学生约百余人,值得本传留下名姓的是何之瑜、邓仲纯医生,邓蝉秋、燮康叔侄,周弗陵、邓茂池等乡贤,安徽老乡潘赞化、光明甫、光宣甫、方孝远、李运启、程筱苏、胡子穆、翟光炽、何海若、高语罕和素昧平生因仰慕先生为人的刘竞生,还有从重庆赶来的张国焘、段锡朋、俞飞也,江津数位政要算是“国府方面”的人。②

墓碑“独秀陈先生之墓”,由葛仲温之子葛康俞书写。不必思索即可想像此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葬仪由邓燮康、周光午主持,高语罕发表概括了陈的一生的讲演。干净利索入土为安。抗战胜利后,陈松年遵乃父遗嘱几经周折终于“把父亲的棺材、墓迁回到安庆北关”,时为一九四七年,与发妻高大众合穴,筑有墓碑,上书“先考陈公仲甫之墓”,亦不必多言毁于“文化大革命”,因墓早已被踏平,因而未遭掘墓大劫。

中国现代史是从一九一九年算起的,整整一个甲子,到了一九七九年,人们从大

① 高语罕《参与陈独秀葬仪感言》。

② 据各项资料及数种调查报告综述。

梦中醒来，重又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获得救国救民的养分，再次召唤德先生以反对一言堂专制，召唤赛先生以肯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寂寞的陈独秀亦被大家从记忆中唤出，由中共中央批准再造陈独秀墓，一九八一年五月竣工，墓碑：“陈独秀之墓”，既不是“先生”亦不能“同志”。碑阴刻陈独秀和高大众生卒年月，以四个儿子的名义“泣立”。细心的拜谒者会发现在“延”和“乔”周围有黑框，他们比乃父更惨，如今连尸骨都无！笔者在写上述之言时，三儿松年亦已作古三载，留下鹤年孤苦零仃于香港……

关于死的故事，应当完了罢，不，还没完，最后好消息一条：一九三一年死在南京薄葬清凉山义冢的高君曼的墓于一九九三年冬找到，经长孙女祯祥和江苏省公安厅法医科学确认后迁往南京黄金山公墓安葬并树墓碑以志永念^①，安庆统领高登科将军的一对女儿总算福星高照，连同夫君陈独秀的墓今后——大概再也不至被砸了罢。

……人们发现这终于安静的陈独秀新墓周围水泥砌一圈圆墩，墓不封顶，黄土冲天，杂草丛生，象征着什么呢？也许是盖棺未论定的缘故罢。

鲁迅曾先后两次说过如下一段话：

人往往以神话中的 Prometheus 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②

宙斯令冶炼神赫淮斯托斯把普罗米修斯钉锁上高加索山，仍不解气，当晚即遣神鹰去噬咬吞食这偷“天火”温暖人类的不悔者的心肝。岂料普罗米修斯得全民佑护，晚上被吞噬，第二天又长成，周而复始三万年，终于活着走下高加索，成为天上地下众所爱戴的半神半人，人们还将高加索宝石用金链镶嵌系于颈项，打成戒指套在手指，象征性地与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受罪——他终于见到了光明，享受到了荣耀。陈独秀则走出监狱即被套上汉奸帽子，被抛出轰轰烈烈的抗日战线之外，默默地死在周边毫无生气的石墙院冰凉的竹席板床上。偷“天火”点燃革命火种的“人类哲学日历上最高尚的圣者兼殉道者”（马克思语），终于没有走下高加索……

^① 吴伟凡《陈独秀夫人遗骨在南京发现》，1993年11月27日《北京日报》。

^②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后 记

感谢您——偏爱本书的读者能够耐着性子读完它，未知您的心情是否感到沉重？这是历史转化为民族精神包袱后的重力。不论政治倾向，都不能回避推动（或阻挡）历史发展的力量，所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俗不可耐的形容，仔细想想一点也不俗。发起一场革命，固然要付出血肉代价，扑灭革命也要付出血肉代价。同在“亚洲西点”黄埔军校同一个课堂同一块操场一天八小时五操三讲堂，毕业了，或者因为信仰的关系，更多的只是遵照军令站到了各自的队伍。到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忽然看到对方竟然是敌人，都认定自己一方是在推动历史，用自己的枪在对方的身上留下枪眼丧失他的战斗力是天经地义的行动，于是消灭北洋军阀的同时，一批最优秀的民族精英和他们的伙伴工农劳苦大众亦被杀害。面对着这场革命，您能不感到沉重？

这样说，我们并没有忘记阶级、阶级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和阶级立场：在“四一二”之前，是新三民主义还是三民主义；之后，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不容忘却的。这是第一层面上的历史沉重感。

中国的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是由一群知识文化思想意识层次极高的铮铮铁汉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掀起的。二十年代的国民党是依靠中共的崭新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和他的强大的后盾——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援助才制服了北洋军阀，不论愿不愿意听，一九二七年后的中华民国的历史就是这么写成的，其苦果是“昨天的朋友成了今天的敌人”，不少英烈尚未醒悟过来就倒在血泊之中祭了轩辕。这是第二层面上的历史沉重感。

二十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第三国际大一统下行动的，各国共产党无论多么强大，都只是它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可以在中国在日本，在美洲在欧洲，指挥权则在莫斯科——一九二四年前在列宁集团；之后在斯大林集团，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与国民党合作北伐开始运作，正是共产国际的斯大林时期，当中国支部在经历了“四一二”国民党反戈清剿，共产国际就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办法，在造成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在惩办中共前领导人的过程中，组成新的领导班子，这个新领导班子以广州公社失败而告终。

中国大革命（一九二四—一九二七）的失败是辛亥革命遗留、南北分裂军阀割据、

国共双方根本对立的主义下的合作等等错综复杂的历史组合的悲剧，它既不能完全责怪中共的政治失误，似乎也不能责怪国民党方面的反动。“反动”是一种立场，如同共产党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相仿，国民党要实现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封建式一党专政。共产党=社会主义，国民党=资本主义，都是党的铁律。共产国际的错误就在于把国民党视作中共从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专政方向过渡的天生的同盟军，直到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也没有完全摆脱笔者称之为“共产国际的国民党情结”的困扰，于是陈独秀就以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结束他的政治生命，而以“托陈日特汉奸匪帮”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中结束他的肉体生命。

对于陈独秀，其严重性还不止在一个名声问题，乃在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同时，“托洛茨基主义”（不断革命论）成了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死敌，偏偏在中共党内有一批留苏（部分留法）青年干部成了这个死敌的主义的信仰者，而这批信仰者偏偏又找到了正得出“中国的革命，总要中国人自己领导”的结论时期的陈独秀，于是就产生了在本书中主要陈述的第三个层面上的历史沉重感。

笔者的全部笔力是对历史负责，不是为陈独秀翻案或落实政策，那是组织部门的事，作出“量”和“度”的历史结论记录在案，显然这是一种权与法的象征。作为一个历史研究人员只是为通过全书能比较真实地再现历史，再现陈独秀和他的伙伴们的历史行为。至于人们有一听说“写陈独秀”就以为是在翻案的世俗观念，也在情理之中，要申明的是若作“翻案文章”，是不会使笔者在写完了全书之后就像掉了魂似的痛苦和沉重！丝毫没有翻案成功后的愉悦。

本书写了整整两年半，原因不在历史研究的难度，主要出在笔者双目视网膜脱落疗治后只剩下左眼零点二视力的“可怜见”生理局限，本书几乎是在放大镜下完成的。在写作此书的二三年间以及在此之前的若干年里，有一批伙伴，中外朋友，师辈，以及如今虽立场不变却心平气和的前托派（他们全都是接近九旬或超过九旬的老人），还有包括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在内的若干资料单位，给了我莫大的资料方面的支持。没有这种支持，本书是难以写成目前这个分量的。在《后记》中理应予以显彰并表达我穷于笔力的无限深情，然而正由于那个使我带有时代敏感的掉了魂似的痛苦和沉重，经过再三考虑还是把他们的名姓隐在我的记忆中埋在我的心坎儿里，随同我今后的岁月共托着我的沉重。

王观泉

写于哈尔滨南岗区复兴街

一七一二五二欣然居孤灯下，时为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責任編輯 = 羅漢

裝幀設計 = 生生不息

